



*OVERSEAS CHINESE WORLD CONFERENCE FOR
PROMOTING PEACEFUL REUNIFICATION OF CHINA
(2010·HONG KONG, CHINA)
CONFERENCE PROCEEDINGS*

**全球華僑華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會
(2010·中國香港)
論文匯集**

全球華僑華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會(2010·中國香港)論文匯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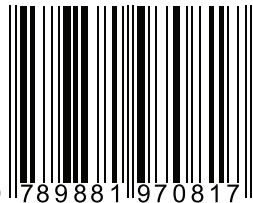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出版

推進和平發展

促進和平統一

實現民族復興

ISBN 978-988-197081-7



9 789881 970817

全球華僑華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會
(2010·中國香港)
論文匯集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 出版

序

在中央領導和中央各有關部門領導的關愛下，在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和香港特區政府的高度重視並大力支持下，以「推進和平發展 促進和平統一 實現民族復興」為主題，由“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主辦的“全球華僑華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會(2010·中國香港)”，於2010年9月杪假亞洲國際博覽館隆重舉行並獲得圓滿成功。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專為大會發來賀函；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統戰部部長杜青林等在大會上作了重要講話；大會一致通過了綱領性文件——《香港宣言》；同期舉辦了四場大型論壇：兩岸和平發展論壇、兩岸經貿合作論壇、兩岸文化教育論壇和港台青年交流論壇。

大會論壇共收到論文近150篇。論文作者中不乏致力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海外僑領、支持兩岸和平統一的台灣社團領袖、大力宣傳「一國兩制」在香港成功實踐的專家學者、全力推動兩岸經貿交流與發展的企業家、弘揚中華文化的先進名流、熱衷兩岸三地交流的青年才俊等。

春風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塵。縱觀一百多篇論文，有的侃侃而談發聾振聵，有的寥寥數語卻瑩瑩大端。它們長短不一、風格各異，不乏精彩篇章。近40萬字的論文代表了全球華僑華人期盼祖國和平統一、渴望民族復興的熾熱激情；彰顯了每位專家學者心繫兩岸和平發展的殷殷信念。它們是獻給祖國和平發展宏偉大業的重要的精神財富。

循眾所盼，本會現將百篇論文集納成冊，並以此獻給參加大會的1500位代表，獻給致力於「推進和平發展 促進和平統一 實現民族復興」的全球華僑華人！

全球華僑華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會(2010·中國香港)大會主席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

高敬德

二〇一〇年十月於香港

目錄

高敬德 序

兩岸和平發展論壇論文

2	辛旗	兩岸和平發展論壇總結篇
4	辛旗	化解政治定位難題推動兩岸關係向深入發展
8	劉迺強	共建民族復興 促進和平統一
10	王武郎	論後ECFA時期的民意建設
13	趙宗鷹	力促兩岸和平發展邁向康莊大道
18	紀欣	胡錦濤“四力”深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20	張志剛	台灣問題是民族內部問題不是外交問題
21	邵育群	兩岸和平發展的國際環境
23	梁大夫	中國統一關乎民族振興
25	劉夢熊	兩岸聯手捍衛海疆
27	夏瀛洲	兩岸構建軍事互信機制之我見
32	林岡	兩岸和平協定研究
39	王化榛	和平發展是和平統一的必經途徑
41	袁純正	呂秀蓮理應放棄台獨走向和統
42	吳惠秋	開創海外反獨促統新局面
45	單聲	警惕“和平獨台”陷阱
47	王炳忠	台灣需要一個純正的“統派”媒體
52	任昌鼎	兩岸應和平競賽不應軍備競賽
53	李志鍾	“台灣關係法”不利兩岸統一應終止
56	宋南屏	新形勢下反獨促統工作思考
61	黃希魯	兩岸和平統一展望芻議
62	許水樹	2010年看海峽兩岸關係發展趨勢
64	張曼新	對新形勢下反獨促統的思考與建議
68	謝大寧	“一中三憲、兩岸統合”與兩岸互信

73	張馥堂	“一國兩制”是台灣的最佳選擇
75	馮撼山	發揚兄弟情誼增進兩岸關係
76	王宗炎	中國必應“分久必合”之說
77	賴文鑫	遺孤何以問蒼天 祈望兩岸共團圓
79	黃家策	以“讓”爭取台灣大眾民心
81	林秋妹	和平發展應尊重多元族群
84	林竹松	中國：就是統一基石與統一國號
90	蘇靈	和平與發展是兩岸關係的硬道理
93	潘慶林	要敢於開創兩岸關係新局面
95	葉國勝	由兩岸關係看和平發展
97	黃企之	聚同化異、僑務休兵與和平發展
98	丁仁方	通過國際非政府組織促進兩岸和平發展
100	楊開煌	ECFA之後政治仍是禁區
104	郭俊次	“和統真經”與“和統道業”
111	李勝峰	有統一的條件才有統一的機會
113	周鴻昌	馬英九“外交休兵”與兩岸關係
118	陳孝忠	對台工作不可重北輕南
120	黃企之	由ECFA簽署所想到的
122	廖天欣	六成台灣民眾希望兩岸簽訂和平協議
124	董拔萃	增進政治互信破解政治難題
127	廖智鋒	把握時代機遇 共促僑團和諧
129	吳仲振	求同化異推進兩岸和平發展
131	陳仁端	兩岸關係形勢和展望
133	梁義大	馬政府的警訊
135	周慶峻	兩篇愛中華反台獨小品文

兩岸經貿合作論壇論文

138	王祿閻	兩岸經貿合作論壇總結篇
139	王祿閻	兩岸簽署經濟協議促使台灣更國際化(發言提綱)
140	藍鴻震	香港應在兩岸和平發展中做出新貢獻
142	李非	後ECFA時代兩岸經濟關係與海西發展

146	蔡武璋	兩岸應“化戰略危機為經濟轉機”	214	陳少峰	促進兩岸家庭文化交流的思考
148	李君豪	香港人民幣離岸中心功能意義重大	217	李中	台灣學子高教新選擇—求學西進
150	林有田	兩岸共建技術標準提昇國際競爭力	220	司徒乃鍾	中國書畫藝術與中國和平統一
153	朱磊	ECFA與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222	余小云 邵建民	兩岸文教交流之契機與新局
155	方方	淺談經貿合作之貨物流、資金流以及人才流動	225	張信剛	三個故事的啟思
156	曹小衡	ECFA推動兩岸經濟關係走向新階段	226	紀欣	擴大兩岸文教交流 增強兩岸文化融合
158	鄭光禮	台灣可利用香港金融資源發展海運	227	陳沛雯	國共敵對宣傳應該休矣
160	譚再利	從ECFA簽署看兩岸未來經貿發展	229	沈國楨	兩岸文化交流之中文書寫探討
165	蔡水安	ECFA有利加強兩岸經貿統合	230	趙少平	儒教文化應為中華富強統一基礎
167	于衛民	兩岸經貿合作前景廣闊	231	張世飛	內地應加強國軍抗日宣傳活動
169	唐學斌	以休閒觀光推動兩岸互動互信	232	殷壽鈺	台灣青少年網絡教育不可忽視
173	王勝煒	論ECFA之影響和新契機	235	戚嘉林	推動轉型正義恢復台灣正史
176	馬文新	蔡英文為什麼反對ECFA	237	葛建業	“中道哲學”與兩岸和平統一
178	郭良生	農業經貿應是兩岸交流主軸	240	廖妙瑋	冀望兩岸統一正體字
180	黃玠	金融海嘯對經濟與教育發展之影響	241	田立仁	被遺忘的“北大人”
182	歐陽承新 歐陽又新	架構協議的意涵與啟示	243	李汾陽	應強化兩岸四地高等教育交流
185	潘偉華	從富士康事件看台灣經濟轉型	244	詹文源	和平統一是佛教之最高祈望
188	周榮光	簽訂ECFA對台灣產業的影響	246	葉富乾	文化傳統與現代教育
191	林大慶	閩台科學園區應建立互動機制	248	趙善燦	論海峽兩岸書法藝術的傳承與發展
196	樂可銘	中華民族騰飛需要兩岸和平統一	251	龔仁漳	對兩岸文化合作之建議
			257	賈寶俊	發展兩岸文創產業可達雙贏
			258	陳麗玲	統一先從文字開始
			260	楊立	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
			263	王瑞陞	遙知兄弟登高處 遍插茱萸少一人
			265	張世飛	兩岸統一宜叫兩岸合一
			267	翁和毓	兩岸宜合作設立文字研究機構
			268	陳玲美	文化是兩岸和平發展的基石
			272	孫若怡	現代生活面對大自然挑戰
			275	陳欽銘	兩岸合璧中華民族復興之始
			279	張鏡湖	文化大學致力推動兩岸文化交流

兩岸文化教育論壇論文

200	吳瓊恩	兩岸文化教育論壇總結篇
201	潘宗光	宜恢復中國傳統道德文化教育
203	王曉祥	新世紀兩岸電影創意產業初探
206	劉夢溪	21世紀人類能否在非對抗中重生
209	申麗珠	“同文”通兩岸“促統”創未來
211	王炳忠	獨台意識對兩岸政治互信的利與弊

282	王正	港台青年交流論壇總結篇
283	王正	建構兩岸青年集體歷史記憶
289	陳麗妍	傑出義工分享愛心人生
291	盧彥澤	青年公共參與與實踐
293	林珧五	兩岸關係與台、港、澳交流
295	孫翊倫	開放陸生來台政策與兩岸學術交流
296	甄韋喬	成功方程式
298	張晉豪	是否應全面開放台灣企業赴大陸投資
299	耿春亞	創業香港
301	賴弘仁	論兩岸三地青年交流之未來
302	李樂詩	青年精英聚香江 共話世博與環保
303	陳軍翰	陸生入台對台灣教育的影響
304	陳孟好	對於開放大陸學歷的看法
305	章鈴	以ECFA為例淺論兩岸三地經貿
306	洪千雯	中國近代城市發展
307	鄭亦麟	ECFA對台灣經濟的衝擊與再突破
309	鍾彥右	應不應該開放大陸醫師到台
310	洪子茵	城市變遷模範：廣州大學城
311	柯惟文	兩岸簽訂ECFA的優與缺
312	楊懷箴	兩岸青年“拜網絡為師”共識多
313	王策緯	大陸不再是廉價工廠台企怎麼辦
314	溫騏華	陸生來台交流學習好處多
315	林子翔	全球化下海峽兩岸交流共贏
320	蔡敏純	也談兩岸文化教育交流
321	黃怡珊	兩岸民俗信仰交流簡評
322	沈易	對兩岸科技交流的感想
323	黃洹翎	促兩岸教育交流 創中華人民利益
325	沈容	消除仇視走出陰影
326	張玲甄	兩岸學術交流之必要性
327	黃聖翔	城市按等級劃分不如按功能劃分
328		編後語

兩岸和平發展論壇論文



兩岸和平發展論壇總結篇

報告人：中華文化發展促進會副會長 辛旗

本大會收到多篇來自海峽兩岸四地及海外有志於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與國家統一之士的論文。在論壇上多位專家學者及政界人士發表了非常精彩的演講，他們為化解兩岸政治難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行了大膽的、前瞻的探討，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見。經過認真梳理大體歸納為10個方面。

一是兩岸政治定位問題。提出目前兩岸政治定位的難點主要是兩岸對一個中國內涵認知的差異和“主權”在國際社會代表權的認知差距，解決這一難題需要新思維，主要包括兩岸要深化政治互信、重塑共同的價值追求，以及樹立合作、談判、雙贏的思維模式，並據此提出用“共同推動和實現一個政治上統一的中國”的觀念化解一個中國內涵的爭議；以“治權談判”化解“主權”爭議等解決難題之道。

二是和平發展與和平統一的辯證關係問題。提出兩岸目前的和平發展是以和平統一為前提和基礎的，沒有指向和平統一的和平發展是不長久的，也是不穩定的；和平發展不能不講統一，和平統一是和平發展的目標和方向，失去這一目標和方向就是“和平分立”或“和平獨立”。

三是和平發展與和平統一的階段性問題。提出和平發展是和平統一的過渡階段，統一工作在不同階段會有不同的表現形式。ECFA的簽署，一方面使兩岸關係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和平發展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另一方面，也將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台獨的社會基礎和民意基礎，使台獨更加成為不可能。要針對不同階段面臨的環境特點和規律制定推動兩岸關係發展的政策措施。要看到，無論是兩岸和平發展還是推動兩岸和平統一，都是手段和過程，根本目的是實現國家富強和民族復興。

四是和平發展的國際環境和美國因素問題。提出美國兩岸政策歷來具有兩面性，美國對兩岸政治對話的警惕，以及在東海、南海等問題上的動向，再次表明美國是阻撓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最大負面因素。如何進一步塑造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有利外部環境，關鍵是要處理好中美關係，促使美國向有利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方向調整對華對台政策。

五是“台灣主體意識”對未來和平統一的影響問題。提出“台灣主體意識”的上升，表明兩岸經濟合作的日趨密切和經濟、社會一體化進程，並不必然導致兩岸政治上的最終統一。因此，必須在台灣島內旗幟鮮明地推動和平統一運動，島內政治人物和有識之士，要加強對民意的引導，使其向支持統一的 direction 走。推動統一既要有法理基礎，更要有民意基礎。

六是兩岸政治談判的方式問題。提出兩岸綜合實力的差距和台灣必須回歸祖國的趨勢，要求兩岸都要理性面對現實。兩岸政治談判是形式對等、實力不對等，形式對等就是雙方在談判時地位對等、尊嚴對等，兩岸談判既不是中央對地方，也不是中央對中央，而是以解決內戰遺留問題的方式解決彼此分歧。

七是兩岸簽定和平協議的內容問題。提出要在雙方都認同一個中國的前提下，盡快推動簽署和平協議，為兩岸最終統一奠定基礎。並就和平協議的內容提出了“一個中國政治定位”、規範雙方涉外活動、用“政治上互不否認、法理上互不承認”來解決台灣國際空間問題等四條建議。

八是兩岸統一之前過渡階段的實踐問題。提出兩岸在經濟、文化實現融合和一體化之後，要為盡快過渡到政治談判創造條件，台灣不能只享受兩關係和平發展所帶來的紅利而不倡導統一。解決這一問題，關鍵是要找到兩岸由和平發展走向和平統一的契合點，這樣一來才更有效果。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新階段，推進國家統一不能太急，欲速則不達；但也不能無所作為，推動兩岸由和平發展過渡到和平統一，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九是推動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建立問題。提出建立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要按照民間、准官方、官方等三個階段推動，並對未來兩岸建立軍事安全互信機制的的方法、步驟和內容等提出建議；同時認為美國反對兩岸建立軍事安全互信機制和不放棄對台軍售，根本原因是由美國大的國家戰略決定的，反映了美國對華對台政策的本質。

十是東海和南海主權問題。提出中國無論是在東海還是南海，都面臨着主權被蠶食、權益被侵佔的嚴峻挑戰。與會代表一致認為，維護中國的主權和海洋權益是包括海外華僑華人在內的所有中國人的責任；一致認為要擁護中國政府在維護東海、南海主權和海洋權益方面的政策立場，強調兩岸四地要攜起手來，以實際行為配合中國政府維護國家主權和海洋權益的政策。一些代表還就如何發揮民間力量，與侵犯我主權和海洋權益國家進行堅決的鬥爭，提出了一些具體的、操作性強的鬥爭策略，如兩岸應攜手在歷史、文獻、法理和現實中攜手捍衛中國的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等等，很多看法和建議可以說是振聳發聵。

在大會論壇的討論中，大家也有一些不同看法，主要是“中華民國”的政治定位問題、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和平發展與和平統一的進程快慢問題等等。但這些分歧都是方法問題，是推動統一的手段和模式問題，而不是要不要統一的問題，在追求統一問題上，大家立場高度一致。而且在討論中，我們有一個很強烈的感受，就是所有發言的會議代表都滿腔熱情的為中國的國家統一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建言獻策，而沒有任何的私心雜念；再者，所有的與會代表都對兩岸最終走向統一和民族復興抱有強烈的信心和意願，都認為中華民族作為一個有智慧的民族，是有能力、有辦法靠自己的智慧解決彼此間的矛盾和分歧的，而中華民族也會在偉大復興過程中，使中華文化成為引領世界文明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

化解政治定位難題 推動兩岸關係向深入發展

中華文化發展促進會副會長 辛旗

化解政治難題，推動兩岸關係向深入發展，涉及諸多敏感議題，都是兩岸關係發展的難點、焦點問題。其中，關於兩岸政治定位問題，我個人認為是這諸多難題中最難解決的根本問題，解決這一難中之難，也就找到了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推動兩岸走向統一之門的“鑰匙”。

一、兩岸政治關係定位的難點

難點主要來自兩個方面：

一是兩岸對一個中國內涵認知的差異。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基礎和前提是體現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九二共識”，但圍繞“九二共識”中一個中國的內涵，雙方爭論了幾十年，而且在爭論中又不斷衍生出新的矛盾和問題。大陸方面認為“九二共識”是兩岸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不能分割，核心是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台灣方面則認為“九二共識”是“一中各表”，台灣所堅持的所謂“憲法一中”是指“中華民國”，堅持“中華民國主權獨立”，強調兩岸應“互不否認”各自的客觀存在。在此過程中，大陸擔心台灣會走向“和平分立”或“和平獨立”；台灣方面則擔心被矮化、被吃掉。其間的差異，正是當前兩岸關係固有矛盾的癥結所在。

二是“主權”在國際社會代表權的認知差距。主權是指一個國家在其領土領空領海內擁有的最高權力，其基本屬性為國際交往中的獨立權和國內範圍內的治轄權。前者指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代表權，後者指國家的中央政府（或聯邦政府）代表國家行使的最高管轄權；前者折射到國際社會就是“台灣國際空間”問題，後者折射到兩岸關係上就是“中華民國”政治定位問題。大陸方面認為聯合國1971年2758號決議恢復大陸代表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之後，中國主權在國際社會的代表問題已經解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與171個國家建立外交關係，中國主權代表權得到國際社會絕大多數國家的承認。台灣方面堅持“中華民國”仍得到23個國家的外交承認，在國際社會仍有代表中國的權力。馬英九先生曾提出過“正視現實，互不否認”、兩岸“不是兩個中國，不是國與國，而是在海峽兩岸的雙方處於一種特別的關係”的政治定位。如何處置兩岸在國際社會中國主權代表權，也考驗著兩岸中國人的智慧。

二、化解兩岸政治定位難題需要新思維

當前的兩岸關係可以說是處在60年來最好的發展階段。梳理總結其間的經驗，至少有兩點：一是互信

有基礎。這個基礎就是雙方堅持有一定解釋空間的“九二共識”、共同反對台獨。二是和平有意願。大陸和台灣都強烈希望以和平方式解決分歧，實現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正是有了這些共識，才推動兩岸簽署了包括ECFA在內的一系列意義深遠的經濟方面協議，成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中新的里程碑。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經驗表明，兩岸要化解政治難題，需要雙方解放思想，用新的思維創新思路，進而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

首先，要深化政治互信。2008年4月29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會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時，提出了發展兩岸關係的16字方針，即“建立互信、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共創雙贏”，第一條就是要“建立互信”。馬英九主席也講過建立兩岸政治互信的重要性。目前兩岸政治互信的基礎是“九二共識”，兩年多來兩岸關係的高速發展首先得益於雙方政治上的互信與默契。兩岸一個中國在文化、民族、歷史、血緣、地理等層面已經解決分歧，但在政治上、外交上、國際法上均存在爭議。要突破兩岸政治難題、引導兩岸關係向更深處發展，需要雙方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沿著一個中國原則和追求兩岸統一的方向上形成凝聚力更強的新共識，探討解決政治、外交、軍事、法律等方面的分歧，為兩岸深化政治互信奠定更堅實的基礎。

其次，要面對現實。兩岸都在講要面對現實，但要弄清甚麼是兩岸關係的現實。一是兩岸同屬一個中國。這是兩岸最基本的現實，否則就沒有60年來兩岸關係大和平格局的基本維持；二是兩岸內戰尚未結束，兩岸之間的問題說到底還是上個世紀四十年代開始的內戰尚未結束所遺留問題；三是兩岸經濟實力對比快速變化。2009年，大陸GDP為4.92萬億美元，台灣GDP為4162億美元，大陸是台灣的11.8倍。如果按照購買力平價標準和各類生活消費指數測算，兩岸經濟實力差距更大。目前，大陸地區已有三個省份（廣東省、江蘇省、山東省）的年度GDP超過台灣地區，今年浙江省也將超過台灣。從發展趨勢看，台灣地區在整個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在不斷發生變化，不僅是大陸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者參與者，同時也是大陸經濟發展的受益者，兩岸經濟一體化已經成型。對這些現實，雙方都要理性正視，理性面對。

第三，要重塑兩岸共同的價值追求。兩岸共同的價值追求包括民族、國家和利益共同體三個層次。民族層次就是承認民族中國、歷史中國、文化中國、地理中國；雙方都認同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認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雙方的共同責任。國家層次就是無論大陸還是台灣，雙方都承認一個中國原則，都認定通過政治談判解決未來統一的政治安排、國家形式的重組。利益共同體層面，雙方都有責任推動中國的現代化，實現共同繁榮；都有義務維護兩岸同胞的共同利益，建設兩岸共同的家園。今年上海世博會開幕前夕，胡錦濤總書記在會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先生時提出要增強兩岸和平發展的推動力、激發和平發展的生命力、提高兩岸經濟的競爭力、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可以說是抓住了兩岸共同價值追求的本質。兩岸通過價值追求的重塑並在此之下看待兩岸政治難題，就會站得更高、看得更遠，也就能擺脫歷史與現實的羈絆，克服思維的僵化。

最後，合作、談判、雙贏理應成為雙方共同的思維模式。兩岸關係存續60年的歷史告訴我們，政治意

識形態對立、軍事對峙、外交對抗和統“獨”對決解決不了問題，只會讓兩岸關係動盪，兩岸人民利益受到損害，會使原有問題變得更加嚴峻；回避拖延也解決不了問題，只會讓問題變得更加複雜。兩岸解決問題相應的思維就是客觀面對與合作，解決方式是談判，結果是雙贏。在此思維模式下，雙方各提出了16字箴言，中國共產黨胡錦濤總書記提出要“建立互信、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共創雙贏”，中國國民黨馬英九主席提出要“正視現實、累積互信、求同存異、續創雙贏”。在方式上，雙方都主張先經後政、先易後難。以此思維尋求化解政治難題的方案和辦法，是正途，由具體經濟、文化、法律問題一個一個的解決，才能為統一談判積累條件，水到渠成。

三、化解兩岸政治定位難題的幾點建言

我從事台灣問題研究26年來，曾對化解兩岸政治定位難題進行過深入的研究與思考，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就相繼發表了《對中國統一前景的幾點思考》、《關於一個中國內涵論述的理論思考》等論文。現重新梳理，提兩點建言。

第一點，用“共同推動和實現一個政治上統一的中國”的觀念化解一個中國內涵的爭議。目前，兩岸在一個中國內涵上儘管存在著較大分歧，但兩岸在協商談判和簽署各項協議時，均未違背以下共識：一是法理上都認同一個中國，大陸和台灣都在一個中國的領土和主權範圍之內；二是都反對台獨；三是都追求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主張“先經後政”，而不是“先經不政”；四是對統一問題雖然有時間認知差異，但沒有目標背離。這些共識是未來兩岸共同推動實現一個政治上統一的中國可以依賴的基礎和條件。未來兩岸應拋開一個中國內涵的爭議，站在更宏觀和前瞻的高度，著眼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從兩岸中國人的根本利益著想，本著尊重歷史與現實，通過平等的協商，結束敵對狀態，共同參與規劃未來中國之完全統一的模式、方法、階段和步驟，共同設計一種合情合理的政治性安排，包括兩岸統一的政治綱領，兩岸憲法的銜接與整合，大憲章的制定，兩岸各自治轄權力的關係，兩岸軍事關係中安全互信機制的問題，兩岸不同社會制度之下民眾自由遷徙及享受國民待遇問題，等等。這種宏觀的設計與微觀建構及具體的實踐，才能實現在和平發展的基礎上整合兩岸政治力量、公權力、經濟力量、文化力量、社會力量和民眾力量來共同推動實現一個政治上統一的中國。

第二點，以“治權談判”化解“主權”爭議。對於兩岸主權爭議的現狀和性質，胡錦濤總書記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3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有明確的表述，指出：“1949年以來，大陸和台灣儘管尚未統一，但不是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分裂，而是上個世紀40年代中後期中國內戰遺留並延續的政治對立，這沒有改變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兩岸復歸統一，不是主權和領土再造，而是結束政治對立。”這一政策論述準確界定了兩岸關係的本質屬性和政治定位，也表明了從1949年以來，中國的主權和領土一直是完整的、統一的，解決主權爭議，就是解決內戰遺留問題。循著這一論述，提出如下解決思路：“主權完整，內外有別，治權談判，漸進統一”。“主權完整”，就是雙方都秉持統一中國的政治理想，中國只有一個，主權不可分割，兩岸中國人都共同享有中國主權。“內外有別”，就是在對外方面，鑒於目前

國際承認中國主權之現實，中華人民共和國客觀上繼承了中國歷史的政治遺產，完成了國際法意義上對歷史上中國主權的全部繼承，代表兩岸處理外交和國際關係重大事務上的一個中國行使主權，台灣在統一之前可單獨處理國際交往中的一些具體事務，但不得製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更不得宣佈“台灣獨立”，對兩岸事實上在國際上已經形成的公認主權，可暫各說各話。在對內方面，按內戰遺留問題解決雙方政治分歧，雙方爭議不涉及主權爭議，不存在兩岸關係上使用國際法通行處理方式，也不需要任何外部勢力介入或所謂“國際擔保”。“治權談判”，就是將雙方主權爭議拉低到治轄權層次，將政治談判與主權問題脫鉤，雙方分擁治權、互不統屬，各自均享有立法、司法和終審權，以及統一談判之前制定最高法律的權力，在此基礎上開展治權談判，完成對統一中國的政治、經濟、法律、外交、軍事等各方面的安排。

通過化解兩岸在一個中國內涵和主權問題爭議兩大難題，擬就兩岸政治關係定位作如下描述：“海峽兩岸是主權完整統一，各自在統治區域行使治轄權，正在邁向統一進程中的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和兩個治轄地區。”或可簡要表述為“尚未實現統一的一個中國原則下的兩種制度兩個地區”。以上建言，為個人研究心得，供各位學者專家參考。



共建民族復興 促進和平統一

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 劉迺強

兩岸關係是為它的現狀所決定。兩岸的現狀是一個簡單的事實：它是內戰膠着，沒有結束，但不戰不和的狀態。拋開這事實談兩岸關係，只是某些人為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一廂情願的憑空“構建”。

不戰不和這一狀態是不穩定的，它始終要結束。結束這一狀態，只有兩種方法，一是戰，一是和。自改革開放以來，大陸主張和平統一，得到全球華人的熱烈響應，這也是今天大家聚首一堂的共同願望。和平統一也很簡單，到最後只有談判這一途徑，此外並無選擇。

台灣島內有些人想以“不統，不獨，不戰”拖延時間，面面討好，企圖盡量維持這不穩定狀態。但是全世界華人對國家統一的強烈訴求，是誰也阻擋不了的。我們對此有絕對的信心，因此有耐心去逐步創造條件，促進祖國和平統一。但是我們也需要毫不含糊的告訴某些人，台獨不是出路，因為《反國家分裂法》都已經無誤地指出，台灣就意味戰爭。而“不統、不獨”的不穩定狀態不可能長久維持，一旦從此滋生出台獨，或者動亂，結果又只可能是戰爭。

我們促進祖國和平統一，就是要促成兩岸盡快進行政治談判，結束不戰、不和、不統、不獨這個不正常，不穩定的狀態。

未來的政治談判，在政治現實引伸的法理根據，就是一場，其中一方是世界上絕大部份國家和人民承認代表中國的合法執政政府，與另外一方是內戰失敗局限於台灣偏安政府的談判。雖然在談判桌上雙方是對等的，但談的內容就只可能是偏安政府如何帶領台灣人民和平歸附於中國大家庭之內。我這樣提好像過分強硬，政治上不大正確，有些台灣同胞聽了會覺得不很舒服，甚至有點抗拒，但這是不可逃避的事實。

台灣這一方可以說：要嘛你大陸就過海來武力征服我，要我接受和平統一的話，我還得提條件。對，這正就是談判桌上雙方對等的意思：談判也者，就是互相討價還價；如果只有一方頒佈條件，對方只能接受的話，就不叫談判了。

大陸提出和平統一，就是主動表示願意跟台灣以對等地位在談判桌上談條件。不但如此，它還以法律的形式作自我約制，只有在某些十分極端的條件之下才會使用非和平的手段。這也即是說，大陸並無意圖以其強大的武力優勢，逼台灣作城下之盟。經歷過漫長而殘酷的內戰中被征剿的地位，最後從內戰中取得勝利的大陸正式宣布，今後再沒有內戰，中國人堅決不打中國人，只會打某些已經不承認是中國人，並且惡意破壞和平統一的分裂分子。

我們這和平統一的過程，要求台灣同胞心悅誠服，自願統一。一言以蔽之，這叫做“王道”。為達此

目標，大陸對台灣讓利十分重要。但這些措施只能顯示大陸的善意和誠意，並且讓台灣廣大老百姓們都能親身嚐到和平友好的初步紅利，為政治談判創造條件。不過光是讓利還未能達到心悅誠服，自願統一的號召力。有些人還會以此誤導群眾，指這是“不統，不獨，不戰”的良好效益，維持這狀態將會得到更多的好處。

號召力有兩個關鍵元素：首先，它是屬於價值和道德層面，而非物質層面。其次，這個價值和道德觀，是大陸和台灣共通的、共同嚮往追求的。際此中華民族復興，已成不可阻擋的世界潮流，凡我炎黃子孫，莫不踴躍以赴；台灣同胞，亦有其獨特的角色可以扮演。他們選擇投身於這三千年一遇的偉大事業中，與13億大陸同胞共同奮進，創造歷史光輝的一頁？還是自絕於潮流之外，袖手旁觀，作為這一頁不太光采的註腳？答案是最明顯不過的。我相信只要我們每一個人在日常交往中，都不忘宣傳這一點，慢慢形成兩岸以至全球華人的共識，中國和平統一，必在不遠。



論後ECFA時期的民意建設

台灣勞動人權協會幹事 王武郎

ECFA標誌兩岸和平發展向前推進一大步

2008年6月，兩岸在九二共識的政治互信下，採暫時擱置爭議的辦法，恢復中斷近十年的兩岸兩會制度性商談，依“先經後政”途徑，為開展兩岸交流新局陸續簽署包括直航大三通、大陸觀光客入台等多項協議，自此兩岸關係被認為進入和平發展的軌道，兩岸關係的發展站在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在此基礎上，2010年6月底的第五次陳江會上，兩岸就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完成簽署，標誌兩岸和平發展進程又向前推進了一個階段。

大陸因素作用的增強

有關ECFA有利於台灣與大陸在經濟發展方面的論述在此無須再贅言。但論及ECFA對台灣經濟社會的影響有必要略提幾點。有台灣經建部門官員評論稱：“台灣方面若無相關產經配套，則台灣經濟發展軌道自此將改變”。言下之意，是ECFA將把台灣經濟的運行整合入大中華經濟圈中，一改過去於冷戰時期所形成的依附美日的發展型態。

也有評論指稱“後ECFA時期，兩岸社會經濟交往將呈現愈來愈密切，愈來愈融合的複雜態勢”。換言之，由於“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因素，大陸因素在台灣社會內部的作用將會增強與擴大化。長期下來，部分台灣民意裡的“脫中心理”將逐步被扭轉，進而削弱台獨的支持群。亦即，ECFA作為更快的形成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經濟基礎的推進器作用是被肯定的。

向政治領域對話的轉折點

從兩岸和平發展的進程來看後ECFA的兩岸關係，意味未來推動兩岸關係發展的重點，就將從經濟性議題進入到政治領域的商談對話，ECFA正是此一重要的關鍵轉折點。ECFA簽訂之際，大陸方面根據胡六點講話內容“弘揚中華文化，加強精神紐帶”中的倡議，提出兩岸有必要下階段就文化教育交流協議進行協商。

但台灣方面對此，仍持保留態度。加上ECFA商簽過程中留下了“兩岸經濟合作委員會”，台灣方面稱是為了處理後續還相當多的經濟事務。顯而易見，台灣當局目前並無意於進一步開展非經濟性議題，對可能涉及兩岸政治對話發展的議題目存有相當的疑慮。

民間統運與胡六點

儘管如此，ECFA完成簽訂則已清楚展現胡六點在推動兩岸關係發展上的指導性與實踐性，兩岸關係

的發展與時俱進又處在一個新的歷史起點。繼續增進與擴大兩岸政治互信基礎，推動有關兩岸間政治對話協商，正式終止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構建兩岸和平發展框架等，都將不可避免的要逐步提上議事日程。短時間內，兩岸上政治談判桌儘管不易，然雙方皆認可中華民族的身分，求同存異的適時推出文化教育協商不只是有必要性，也是有助於積累雙方互信的一種辦法。

在此兩岸和平發展新局勢下，台灣社會的民間統派團體也應積極把握新形勢下的有利條件，繼續扮演推動“促和談、促和議、促和統”的先進團體角色；既配合大局的開展，也針對島內的政經形勢設定議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運動。

擴大社會民意的支持 推動促和談促和議

眾所周知，“台灣是法理上的中國領土，政治上的未統一地區”，今日所謂的兩岸關係的問題本質或是台灣問題的產生，因其時空背景而言，簡言之是上世紀的中國內戰和世界冷戰雙重因素交錯影響下所形成的國家與民族的悲劇性殘局，演變至今成為棘手的政治難題。

對此胡六點已清楚的指出：“1949年以來大陸和台灣儘管尚未統一，但不是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分裂，而是上個世紀40年代中後期中國內戰遺留並延續的政治對立，這沒有改變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兩岸復歸統一，不是主權和領土再造，而是結束政治對立。”胡六點接著提出“兩岸在事關維護一個中國框架這一原則問題上形成共同認知和一致立場，就有了構築政治互信的基石，甚麼事情都好商量。”

本來，一個人若認同中國人身分，認為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領土，反對國家分裂，不論身處兩岸或世界的何處，認可“國家應統一、民族要復興”，那麼對於胡六點的內容大都會表示贊同與支持的，而成為這個人在時代變換中的行為動機。但就兩岸關係的現實情況，對於國家統一的問題，在台灣當局方面90年代在名義上也曾有國統綱領和國統會的裝置形式，但卻因政治事實變遷，尤其在歷經李陳二任執政者的台獨路線橫行，與近於惡性膨脹的“台灣主體意識化”和“本土化”過程後，即便馬英九上台，對於國統會和國統綱領也只能“冷凍”處理，算符合其主張的“不統、不獨、不武”的兩岸交往“三不”原則，並以此回應大多數的藍綠選民。台灣當局與社會民意、藍與綠，如此互為表裏形成一致的拒統防線。

正是此複雜的台灣社會背景，自2008年兩岸交流新局開展後，與即將到來的後ECFA時期，社會觀察家發現，台灣群眾的心理因此而產生多種多樣的壓力症候群現象，包括“有交流過度的不安，有經濟摩擦的害怕，有政治促統的回避”，這些已表現在有關的幾種“兩岸交流、統獨趨勢、軍購意願”的民調數據之上。簡言之，這是群眾心理中“維持現狀”心態升高及日呈固定化的現象，實有待予以消解或解構。

營造推動兩岸和平發展與反台獨的社會氛圍

根據這樣的思路，七月初ECFA完成簽署後，島內統派通過兩岸和平發展論壇的平台舉辦支持與慶祝活動，論壇向馬英九當局提出包括：“擴大社會福利，企業善盡社會責任，增進兩岸政治互信”的三點呼

籲和建議。主張：應把經濟發展的成果，更合理的透過再分配予每一位社會成員，特別是廣大的中下層群眾。從增進民眾的民生福利，來讓全社會共享兩岸和解、合作之下所取得的和平紅利，如此才能更好的取得民意的支持，以深化和推動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同時，為增進兩岸政治互信，台灣當局也應停止對美軍購，把預算轉為公共社福支出等。

論壇的用意，是希望藉此形成有助島內擴大支持兩岸和平發展的民意，有助於營造反對台獨傾向的政治氛圍。畢竟ECFA簽訂後，島內政局緊接而來是被視為2012年大選前哨戰的年底五都選舉，也漸入藍綠兩軍交鋒階段。

島內選舉民意壓力與兩岸政治對話進程

先前，據民調顯示ECFA獲得逾六成民眾的滿意度。因此，國民黨有意把ECFA的成果作為選舉宣傳重點，向城市選民做訴求；同樣的，早先民進黨也一直把ECFA的意涵過度政治化，並刻意放大扭曲ECFA的負面衝擊，藉以繼續操弄“反中心結”。該黨選戰策略也將依地方需要不同程度的提及ECFA。年底五都選舉的結果，多少可以視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局開展以來，及ECFA簽訂對台灣民意影響的呈現。屆時如何解讀選舉結果和民意表現，不止會影響2012年選戰的主要政策制訂，還會影響兩岸政治對話及和談的進程。甚至，馬英九面對2012年大選的壓力下，會不會因此調整兩岸關係的走向？或是進一步爭取戰術主動，在辛亥革命百年的2011年，同時是後ECFA的第一年，提出“新論述”既迎戰民進黨“十年政綱”的提出，也平衡處理“維持現狀與和平發展”的題目，突破被稱為“禁區”的兩岸政治協商對話，是否將成為明年時局觀察的重點？

結語

現今擺在兩岸政治談判之前的難題，除了有關“台灣政治定位”問題外，還有深層次的結構性“台灣社會民意”問題須予化解，幾已成為現代政治常識。但無論如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主題在島內確實普遍獲得支持。不同的群眾與社會集團按各自的主觀意願，希望能爭取各自期盼的美好時代。此外，也無須諱言，目前一方面恐有不少的民眾(不分藍綠)是把“九二共識”解讀或誤讀為陸方似乎一時默認“二個中國”，以此作為抵制陸方促談促統壓力的暫時性“實用主義工具”；但另一方面，面對後ECFA時代下，發自陸方的促談壓力卻也明白那將是大勢所趨。

後ECFA時代下，基層民眾對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日常生活化的體驗是真實的，這是兩岸人民共同建設我們的家園的努力，是推動構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框架的最根本動力。

力促兩岸和平發展邁向康莊大道

美華友好促統會會長 趙宗鷹

兩岸經過多年牴牾，歷盡無數紛爭，儘管依然分歧多多，障礙重重，但是近年來兩岸關係豁然開朗。何以能夠如此？無它，“心有靈犀一點通”。這靈犀就是和平發展。在當前歷史時期，兩岸找到了一個最大的公約數，把握住一個最好的切合點，這就是和平發展。

和平發展是當前海峽兩岸切合點

歷史進程往往有某種類似而又不雷同。八年抗日戰爭中，全國人民最大的渴望就是和平。抗戰勝利，正當全國人民期待和平來臨之際，朝野政黨發起內戰，全國人民和平夢碎。歷史事實證明，違逆人民和平意志的政黨和政權必然失敗。“國民政府”撤到台灣，內戰實際上還在延續和演變。兩岸之間也曾出現多次和平協商時機和實際探索。從李登輝到陳水扁“執政”時期，情勢急轉直下，急性台獨、法理台獨使兩岸關係極度緊張，瀕臨戰爭邊緣，處於一種尚無直接交戰的戰爭狀態。海峽兩岸同胞和海外華僑華人，強烈反對台獨引發的戰禍危機，真誠希望兩岸和平。從柏林大會以來歷屆大會都旨在實現祖國和平統一，都明確指出對和平的威脅來自台獨的猖獗喧囂。

中國大陸自從改革開放以來，就逐漸進入了發展的黃金時期。要延續現有的黃金期和開創更好的黃金期，需要推動和力促兩岸持續和平發展。曾經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台灣，何以急劇下降、危機凸顯？主要的原因就是被熱衷台獨的勢力，推向製造海峽兩岸麻煩和危機的深淵。一度似乎黃金在望而不得，最終只能望金興歎。

歷史又到了一個轉折關頭。可貴時機宜於立即把住，緊緊握住。2005年4月29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與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舉行60年來兩黨領導人首次會談，達成並共同發佈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揭開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局的大幕。胡錦濤與中共中央領導審時度勢與毅然決策；連戰、宋楚瑜、郁慕明等敢於破冰、毅然登陸；吳伯雄一仍前任勇氣和方針，都體現了島內要求和平發展民心所向。2006年4月14日胡錦濤在會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一行時強調，和平發展理應成為兩岸關係發展的主題，成為兩岸同胞共同為之奮鬥的目標。為兩岸同胞謀福祉是實現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根本歸屬。實現兩岸和平發展，目的是為了維護發展兩岸同胞的利益。以謀取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國人民福祉為目標的中共和中國政府，充分認識到只有和平發展，兩岸黃金時期才大有希望的事實。事實充分證明，在兩岸關係發展道路上，國共兩黨、兩岸政治家共同邁出得民心、順潮流、開新局的歷史性一步是十分正確的。

在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中，中華民族要邁向偉大復興，和平統一才是康莊大道。台灣獨立，分裂祖國，是獨木危橋。隨著推動祖國和平統一的聲勢日漸高漲，人們進而充分認識到，統一不能一蹴而就，但

和平較易立竿見影，關鍵在於遏制和消除台獨危機。祖國大陸綜合國力的空前提高發展，與中共對台政策的成熟完善，成為遏制台獨危機、化解兩岸矛盾的決定因素。兩岸廣大同胞與全球華僑華人，顯示了和平的堅強願望、意志和力量，也是極為重要的因素。島內政權更易主要在島內進行，祖國大陸日益富強，國際風向迅猛轉變，華僑華人聲浪高漲，直接間接地給予兩岸和平發展巨大深刻的影響。

島內政權更易、馬英九先生就任以來，對台灣島內有一個良性期許，提出台灣發展“十年黃金期”規劃。“十年黃金期”會不會空洞無實？會不會竹籃打水？關鍵是，在島內避免口號政治，實實在在謀求民眾福祉，方有真正黃金可言。在兩岸促進和平發展，切切實實加強關係，才有真正黃金可掘。ECFA的簽訂讓台灣輿論大談紅利，即是證明。顯然，兩岸和平發展千真萬確是兩岸都追求各自的和平發展黃金時期，是分心分力、互相牽制好呢，還是同心同力、互補互促好呢？不言而喻。分心分力、互相牽制，各自的黃金時期都深受影響，尤其是台灣島內受影響更甚，更無從談到整個中華民族新的黃金時期。

和平發展的重要界定與關鍵把握

在兩岸和平發展蓬勃進行之際，應當充滿信心，樂觀未來；也要把握關鍵，正視難題，明辨界定，排除障礙，才能推向康莊大道。

一、和平發展是放棄和平統一嗎？

有人誤以為，和平發展就是放棄或擱置和平統一。也有人片面認為，和平發展與和平統一完全等同。突出和平發展豈是放棄和平統一？如果和平發展與和平統一完全等同又何必另提和平發展？更多的人認為，兩者有區別也有聯繫，相互依存相互促進。依筆者淺見，當前的和平發展是為了實現和平統一，實現和平統一又為了更好的和平發展。和平發展——和平統一——和平發展是辯證統一過程。實現中國完全統一又為了甚麼呢？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了包括海峽兩岸在內的整個中國的更大的和平發展。正如胡錦濤總書記所概括：“堅持以一個中國為原則，以兩岸共同發展為主題，以祖國完全統一為目標，以民族偉大復興為願景，努力推動對台工作科學發展。”

真正堅持和平統一，關鍵在於審時度勢，在不同情勢下把握住不同的切入點。前些年，台獨氣焰逐步升高，台獨浪潮迭起波瀾，反獨情勢嚴峻。反獨促統抓准並把住了切入點。因而獨退統進。反獨逐漸佔領制高點，一手以法理統一（制定反對分裂國家法）鉗制法理台獨；一手以和平相處、和平發展的洪流淹沒獨流，從根本上以主動態勢扭轉了被動局面。現在，應當繼續前進，把握住和平發展的切入點。

二、先經後政是只經不政還是經先政後？

實現祖國完全統一，兩岸之間還有許多政治難題需要解決，政治障礙需要破除。如果目前糾纏在這些難題和障礙，兩岸和平發展勢必受到拖延。相對而言，兩岸經濟難題雖有，畢竟較易解決一些。解決經濟問題，雙方既有迫切願望，情勢也不容拖延。先經後政是先易後難的一個突出點。

歷史糾葛無疑需要解開。呆板地簡單地糾纏於歷史糾葛，越解越難解。邁步前行，跨越推進，往往

反而滌盡了歷史的沉積。近年來雙方在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期許，共同謀求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的機會，為中華民族實現光明燦爛的願景。當然不可無視還有許多政治難題有待解決。可以預期，兩岸和平發展加速加力，尤其是中國大陸綜合國力在和平發展過程中有極大提高，難題的難度也會隨之降低。難題不能坐待自解，但可以前進態勢努力化解。先經後政，雖有先後之分，絕無有無之別。經濟問題解決好，實際上就為政治問題的解決創造條件。反過來，兩岸經濟關係越是加強，政治瓶頸越易突破。

在台灣島內，只經不政的傾向早已存在，現在還在滋長。民間如此，官方更凸顯。今年5月13日，馬英九先生接受《中央通訊社》專訪表示，朝著完成兩岸經濟協議（ECFA）簽署目標邁進，這是可取的。但其談話要點堪稱急經延政，只經不政的概括。在經濟上，儘管承認全世界對大陸的依存度都在提高不是只有台灣，但把兩岸關係界定為“雙方是（經濟）相互依存的關係”，顯然缺乏勇氣。

大陸對台灣的長遠設計，當然是“一國兩制”、和平統一，但台灣提出“不統、不獨、不武”，實際就是與之抗衡。台灣當局不會現在去支持所謂的“台灣獨立”，尤其是“法理台獨”，但實際上並無排除台獨選項。目前完全沒有打算跟大陸去進行統一談判，實際上以拖延排除統一談判。其實，大陸在耐心等待和努力爭取，只是台灣在拖延，在迴避。兩岸問題的確有相當大的複雜性和極大困難點，不能急於求成。但絕不可以拖延卻步，畫地為牢，令統一無限期地拖延下去。

為甚麼台灣當局遲遲不將政治尤其是統一提到談判的日程上來？表層來看，沒有形成關於政治協商起點的共識；深層來看，根本在於究竟把兩岸關係定位為經濟關係還是政治關係？經濟關係確實是兩岸一個極重要方面，但不能掩蓋和模糊兩岸關係最本質的內涵是政治關係，是上一世紀四十年代以來的中國內戰及其延續所造成的政治對立，延續六十多年的中國內戰的事實必須正視和尊重。必須兼顧到新時期新情勢下的演變發展。

“國民政府”退居台灣以來，大體經歷迴圈式三個階段：保台——謀獨——保台。兩蔣時代，雖然有過反攻大陸的計劃，但逐漸意識到反攻無望而偏重保台，總體而言是抵制和反對“一中一台”。在李登輝、陳水扁的謀求台獨階段，曾經面臨國家領土主權完整遭受損害的嚴重危機，既受到統一力量阻擋，也受到保台力量的牽制。政權更易、馬氏執政後實際上又回復到類似保台階段。值得肯定的是，暫時避免了台獨危機。宜於深省的是，如今的保台與當年兩蔣的保台，不但情勢有異，而且並不異能排除演變為和平分裂的可能，更未能消除台獨危險潛機。如果長期拖延政治協商，滿足於停留在經濟依存，而不肯邁向政治協調，這種危機就越大。

三、維持現狀是停滯不前還是與時並進？

對台海兩岸，動態的和平發展，與靜態的維持現狀相容嗎？一些人不免質疑。其實，如此質疑者對於維持現狀具體內涵或不求甚解，或甚不求解。維持現狀各有各說，各有意圖，不可不辨。

1、首先要辨明維持甚麼現狀？

美國所維持的是甚麼現狀呢？美國布魯金斯研究院東北亞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今年6月12日在台北發表演說時，依然重彈美國政策“要求兩岸都不得採取改變現狀的片面行動”。可見美式維持現狀是一把限獨與阻統兩面刃。在台獨囂張之時，在面臨法理極獨、急獨可能挑起台海戰火的危機時刻，美國為了避免捲進戰禍和美中直接衝突以維持現狀來限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讓其懸崖勒馬的作用。這有可取的一面。在特定情勢下中國大陸適當借助其限獨也有好處。但一直以來，美式維持現狀其實就是維持實質台獨，在其智囊們設計中，在其實際推行中，對台灣最有利的最聰明的是不宣獨而實際行獨。在急獨、極獨消退後，美式維持現狀的阻統一面就更為凸顯。對台軍售，不僅僅是為了銷售軍火，更重要的是以平衡兩岸的姿勢為台灣內部抗統力量打氣，也對中國大陸示以勿統紅牌。其核心就是謀求緊握台海兩岸關係的開關。他們妄自推測中國似乎希望同美國共管台灣或控制台灣的領導人，其實就是擔心兩岸和平發展會衝垮美國的主導權調控權。台灣島內包括馬英九在內的維持現狀就是“不獨不統”，有人認為這與美國一脈相通，是事實台獨，頗為一針見血。

中國大陸目前有條件有前提地提到維持現狀，但一則從來沒有把維持現狀作為台海總方針；二則有明確的規定性內涵，就是維持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現狀。正如胡錦濤所闡明和強調，50多年來，雖然兩岸尚未統一，但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沒有改變，兩岸同胞血濃於水的民族感情沒有改變。堅持“九二共識”兩岸才能夠實現和平發展、共同繁榮，反對和遏制台獨，才能夠消除損害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最大危險。事實上，由於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中國式內戰及其延續，在絕大多數時間裏交織兩個相關方面。一方面雙方爭奪中國唯一的合法地位，另一方面不因為爭奪地位而損害國家領土主權完整。在大陸時期的國共內戰固然如此，在台灣的兩蔣時代也依然如此。蔣介石寧願被逐出聯合國也不接受“一中一台”或“兩個中國”，就是明證。

2、要認清維持究竟是凝固靜態還是演進動態？

維持，當然在一定歷史階段保持基本大局不變，但絕非凝固停滯。台灣島內維持兩岸尚未統一的大格局大框架之下有很多具體變化。不向統路進，就向離路退，甚或向獨路化。中國大陸目前的維持也有突出的兩方面：其一、尊重和維持兩岸尚未統一的現狀；其二，堅持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沒有改變。尚未統一，排除分裂，力促統一，包含著前進動態。沒有改變，既守又進。守者，防止有人改變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進者，經過兩岸和平發展，由階段性維持同屬的舊現狀，進而達到同一、統一的新現狀。中共與國民黨的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也表明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謀求台海和平穩定，促進兩岸關係發展，維護兩岸同胞利益。概而言之，既防止歷史倒退，防止和平分裂，又推動歷史前進，以實現和平統一為前途。這與阻統的維持現狀，“不獨不統”的維持現狀，迥然有別，截然不同。這是前瞻性、建設性的、推進性的維持現狀。

3、要確認維持的主導權由誰掌握？

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先後與國民黨主席連戰和吳伯雄的會談和達成的協議，給世界最大最強的資訊就是，無論維持現狀還是推進發展，台海問題是兩岸中國人的事務。中國的事主要由同屬一個中國的兩岸來解決，中國人的事主要由兩岸中國人來主導來掌控。他國他人任何善意的良性的尊重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相助，當然無任歡迎。任何侵犯中國主權、強加於海峽兩岸中國人的干涉不能容忍。美國完全明白此意，但也擔心自己出局。本來，台海是同屬一個中國的兩岸自己的棋局。由於歷史原因美國涉足其中，自行入局，這是異常現象。回復兩岸自己主導是恢復正常狀態。和平發展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以和平態勢代替戰爭態勢，削弱外國以軍售等形式對台海事務的介入；就是創造兩岸中國人自己協商解決問題的條件，消除外國從中作梗。



胡錦濤“四力”深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台灣中國統一聯盟主席 紀欣

2010年4月29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上海會見了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等應邀出席世博會開幕式的台灣各界人士四十餘人。該次會見在時間及出席人選上均經過精心巧思安排，而胡錦濤當天提出的“四力”，更值得吾人關注。

在出席人選方面，除國民黨兩位榮譽主席連戰、吳伯雄，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新黨主席郁慕明，無黨聯盟主席林炳坤，國親兩黨副主席，縣市長、立委外，當天出席者還有台灣宗教界代表（惟覺法師）、教育界代表（張鏡湖、成嘉玲等）、商會、農會、漁會、觀光旅行公會、演藝公會理事長，民間統派團體負責人，以及具民進黨背景的許信良、許榮淑等。從出席者的多元代表性可見，大陸對台工作的確已擴及台灣社會各界。

胡錦濤在會見最後，就兩岸關係的發展進一步提出：要繼續增進兩岸政治互信，不斷增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推動力；要繼續擴大兩岸各界交流，不斷激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生命力；要繼續深化經濟合作，不斷提高兩岸經濟的競爭力；要繼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不斷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

以上四點意見包含了“推動力、生命力、競爭力、凝聚力”四種不同的“力”，而每一“力”均扣緊“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顯示“四力”是繼胡錦濤2008年底提出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六點意見後，另一次重要講話。對該四點，筆者有以下幾點感想：

第一，“四力”之前，均加有“繼續”、“不斷”，顯示大陸當局體認兩岸關係雖有一定進展，但應總結經驗，進一步做出積極努力，認真思考和務實解決兩岸關係前進道路上的各種問題。

國台辦主任王毅今年以來數度表示“要考慮到兩岸關係的複雜性”，“穩步推動兩岸和平發展，妥善處理面臨的多種困難和問題，我們有著足夠的耐心”。勇於承認困難與問題，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兩岸當局應在現有的基礎上，穩步推進，把握好節奏，保持好勢頭，堅持正確方向。尤其，台灣民調一再顯示，兩岸政策是馬政府最受到民眾肯定的政績，馬英九政府就應在未來兩年把握時機，大刀濶斧，為所當為。

第二，在論述第一點“和平發展的推動力”時，胡錦濤表示：“保持兩岸關係發展勢頭，乃至今後破解政治難題，需要在反對台獨、堅持“九二共識”的基礎上不斷增強兩岸政治互信。”“反對台獨，意味雙方都反對分裂國家；堅持“九二共識”，意味雙方可以在一個中國的基礎上求同存異。”胡錦濤還特別提到“在不斷增強兩岸政治互信的過程中，兩岸之間存在的各種問題都可以通過協商尋求妥善解決。兩岸中國人之間，甚麼事情都好商量。”

上言除強調政治互信是兩岸關係發展的核心，也表明大陸將繼續貫徹“寄希望於台灣當局”方針，但馬英九政府應知：兩岸中國人有能力解決自己的事，不需要亦不應該靠外力。筆者希望馬英九能深刻體

會，兩岸關係在2008年5月後能夠和平發展，兩岸經貿能夠交流合作，關鍵皆在堅守“九二共識”，認同“兩岸同屬一中”。惟，政治與經濟不可能分開，馬政府要想取得台灣民眾對兩岸和解合作政策的支持，要想兩岸經貿進一步互惠合作，就必須以循序漸進、逐步累積的積極態度，來增進與擴大兩岸政治互信，進一步推動兩岸政治和解的進程。

第三，胡錦濤論及第二點“和平發展的生命力”時強調：“希望台灣各界同胞以更高的熱情和更積極的作為，最廣泛地參與到兩岸交流合作中來，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注入蓬勃生機，把兩岸關係前途真正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這顯示大陸當局除將繼續落實“寄希望於台灣人民”方針，也深刻認識到，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必須著眼於台灣民眾更廣泛的參與。

各方數據顯示，過去兩年來兩岸經貿密切交流合作，確實使台灣經濟重現生機，也為台灣民眾帶來諸多便利與龐大利益，但因受到台灣自身經濟結構所限，部分基層民眾尚未親身享受到和平發展的成果，又受到綠營政治人物的政治操弄與媒體的挑撥離間影響，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尚未完全認同。兩岸當局應努力使兩岸的交流合作惠及更多台灣基層民眾，讓台灣民眾普遍感受到和平發展符合自己的利益，也為兩岸關係奠定堅實的經濟基礎。其次，捍衛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人人有責，島內統一運動亦應把教育群眾，開闢民間支持和發展發展的輿論陣地，激發民眾的熱情和積極參與，作為今後運動的方向。

第四，有關第三點“要繼續深化經濟合作，不斷提高兩岸經濟的競爭力”，在會見後，已有具體成績。6月29日，兩岸經濟協議（ECFA）在重慶簽署，它不僅使兩岸經濟合作走上正常化、法制化、機制化的軌道，也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重要里程碑。

從台灣在ECFA早收清單爭取到539項、金額計138億美元；大陸的早收清單僅為267項，金額只有台灣的五分之一，即可知，自承“收穫頗豐”的台灣，獲利的確高於對岸。大陸之所以如此讓利、誠意頗誠，道理很簡單，就是因為兩岸都是一家人。而ECFA協簽過程也充分證明“海峽兩岸的中國人，有智慧和能力來共同透過協商，解決我們自己的問題。”不過，儘管ECFA已做到利益極大化、衝擊極小化、時程緩步化，但在藍綠對立的政黨生態下，馬政府必須展現魄力，才能避免朝野紛爭削弱ECFA所帶來的有利經貿形勢。同時，馬政府也應積極規劃社會政策，擴大辦理各項社會福利，將兩岸經貿合作與ECFA效應創造出的“和平紅利”，轉化為民生福祉的社會資源，使台灣民眾發自內心地支持兩岸和解合作政策。

第五，“寄希望於台灣人民”同樣展現在第四點“中華民族的凝聚力”上。胡總書記強調“兩岸同胞是血脈相連的命運共同體”，“兩岸中國人不僅有責任共同終結兩岸敵對的歷史，撫平歷史創傷，更應當增強休戚與共的民族認同，共同完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

筆者一向認為，唯有當台灣人認同兩岸同胞共為中華兒女、同根同源、同文同種，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才能持續與深化，並且走向和平統一。要達此目標，兩岸當局應依據7月11日剛在廣州閉幕的“第六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所達成之多項共同建議，大力開展文化教育交流合作，以增進兩岸文化和民族認同。台灣統派亦應把重建、恢復與增強台灣同胞的愛國主義傳統，作為今後的重點工作。

台灣問題是民族內部問題不是外交問題

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 張志剛

香港是最早實施“一國兩制”的地方，每當我接待一些外國政界人士、學者和國會議員的時候，他們最常問的就是“一國兩制”在香港實施得怎麼樣。我這樣對他們說，如果問我們香港人回歸當初最擔心是甚麼，用這個標準來看，1997年回歸之後，所有香港人所擔心的事情都未有發生過。這就是香港實施“一國兩制”後的情況。今天我想談一談，香港的經驗可否為未來台灣統一作一個參考。

香港回歸的模式跟未來台灣統一的模式有一點相似，但又不盡相同。香港的問題是通過外交談判來解決的，也就是中國跟英國兩國政府的談判，談好了就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決定在1997年7月1日把香港的主權交還給北京，這是一個外交的管道；但是將來兩岸的問題不是國際問題，所以不存在透過外交來解決。那麼未來兩岸怎麼可以和平統一，我覺得目前還未有一個理想的整體發展框架。

香港“一國兩制”的落實，可以作為台灣和平統一的一個參考例子，我今天早上也特別跟台灣來的朋友說，近來台灣那邊拍了一些廣告片，說香港實施CEPA以後，經濟蕭條了很多，大學生也要當建造工，針對這些不符合實情的報道，我們有責任將香港發生的真實情況告訴台灣的同胞們。於是我就跟台灣的朋友說，很簡單，你看看那個廣告片，它說香港大學生要作建造工，但是畫面中的人卻是50、60歲的人，連一個年輕人也找不到，這怎麼可以說是大學生作建築工人呢？真是講大話也不會講。由此可見，我們有責任跟台灣同胞將香港回歸十三年的實際情況說清楚。

但是，如果你問兩岸如何談判解決統一的問題，我個人覺得我們必須面對巨大的阻力，因為現在整個談判的架構都未有建立起來，如果我們看以前解決國共兩方面的問題是通過談判，這個國共談判談過很多次，那時候的框架是在中華民國框架下，共產黨跟國民黨兩黨談，如果談得好，內戰就結束了，談不好，就要打仗。可是現在整個情況已經不是在中華民國框架下的國共談判，也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底下的國共談判，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從中華民國繼承過來的台灣政府之間的談判，更麻煩的是台灣已經過了政黨輪替，就是民進黨的人已經當過台灣的“總統”。如果我們把現在的情況跟60幾年前的情況比較，你可以發現，當年國共談判的模式現在是不可用的。假設馬英九個人覺得，我同意談判，我派代表去北京，去簽一個協議回來，能不能搞定，從現時的政治現實來看，恐怕搞不定，因為你不能只針對國民黨談判就能解決兩岸的問題，所以未來談判不只是國共兩方面的，而是多了一個或多個政黨，問題比以前複雜了很多。還有，如果我們要達成一個協議，兩邊誰代表誰來談，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好好的想一想，談好了，台灣那邊能不能用公投來決定接不接受協議，又是一個大問題，大陸那邊不同意台灣是一個政治實體，故此不會同意由台灣兩千三百萬人來投票決定台灣未來的政治前途。由此可見，未來兩岸統一問題不是國民黨，也不是公投可以搞定，即便是談判，也不能把民進黨排斥到外面，這是個政治現實。

我覺得針對整個台灣未來的發展要清楚告訴台灣的同胞，在選擇台灣前途的時候，應該清楚，台灣問題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問題，不是只有台灣人自己可以決定的，但總的講，台灣前途有三個，一個是不統不獨，一個是獨立，一個是和平統一。這些都不是台灣自己可以決定的，你可以說未來500年1,000年可以不統不獨，但是最終你必須面對要麼是統，要麼是獨的後果，所以未來台灣的同胞還是需要面對這個政治的現實，要戰爭還是要和平，相信不要說對民族負責了，就是對自己負責的話，也應該有個清晰的選擇吧。

兩岸和平發展的國際環境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台港澳研究所副所長 邵育群

2008年以來，兩岸關係進入和平發展階段。“三通”啟動後，兩岸關係呈現出“大交流、大合作、大融合、大發展”的新局面；兩岸協商進入制度化軌道；“法理台獨”的危險也基本消除，兩岸關係的緊張局勢得到緩解，兩岸同胞正在共用和平發展所創造的福祉。

今天會議的主題是兩岸關係，目前兩岸關係發展最重要的主題當是和平發展。關於和平發展這一主題，自2008年以來，我們已經做過許多討論，內容牽涉到和平發展的框架、前景、架構、途徑、動力、條件和內在聯繫，和平發展與和平統一的關係等等，今天我想談的是和平發展的國際環境。為甚麼要談和平發展的國際環境呢？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兩岸關係的發展是以整個東亞地區，乃至亞太地區和全球化為國際背景的，國際環境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重要的外部因素；二是目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國際環境仍然存在一些不確定因素，值得我們重視。所以，我今天將分三部分來談一下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國際環境，第一部分是當前的國際環境總體上有利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第二部分是國際環境中的不確定因素；第三部分是如何塑造有利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國際環境。

首先，我想明確的是，當前的國際環境總體上有利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為甚麼這麼說呢？有三個原因。第一，在民進黨當局執政8年的時間裡，由於民進黨當局推動“法理台獨”，造成兩岸關係高度對峙和緊張，直接對地區和平構成威脅。台海因此成為全世界關注的焦點。2008年當兩岸關係進入和平發展階段以來，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紛紛表示歡迎，希望這種局面能夠繼續發展。由此可見，台海和平與穩定符合地區國家的利益。第二，當前國際社會面臨的主要挑戰是在國際體系和機制進行調整的過程中如何通過國際和地區合作有效地應對一係列非傳統安全問題，如全球經濟危機、氣候變化和能源問題、恐怖主義問題等等。各主要經濟體都希望在和平穩定的環境中通過地區合作、國際合作推動經濟發展，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實現社會的和諧發展。兩岸簽訂ECFA實際上是東亞地區一體化發展過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受到了地區各主要經濟體的歡迎。第三，目前的中國正在迅速發展，已經成為一個具有重要全球影響力的大國。在中國迅速發展的過程中，國際社會存在相當多的擔心和憂慮，其中之一就是擔心中國會採取非和平的方式實現國家統一。大陸政府關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論述和當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良好局面使國際社會免於這種擔憂。國際社會歡迎中國的和平崛起和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其次，雖然當前的國際環境總體上有利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但我們必須看到在國際大環境中仍有一些不確定因素，妨礙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大局。今天我主要想說一下美國的政策。我們都知道，美國的台海政策框架自卡特政府以來就沒有變過，即“一個中國”政策、中美三個聯合公報以及《與台灣關係法》。這個框架的兩面性在於，它一方面通過對“一個中國”的背書來穩定美中雙邊關係，另一方面又通過國內法支持台灣不受大陸所謂的“脅迫”，為兩岸分離的台海現狀提供保障。美國通過這種兩面性很強的政策維護其台海利益，並且有意無意地為台獨的發展創造了空間，雖然目前美國官方的政策表述是“我們不支持台灣獨立”，但島內台獨勢力依靠或利用美國的政策達到其一己之私利也是不爭的事實。雖然美

國歡迎兩岸關係進入和平發展階段，但美國與中國大陸在台灣問題上的終極目標卻並不相同。中國大陸的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政策的最終指向是和平統一，但美國出於維護其地緣戰略利益和地區霸權等因素，並不樂見兩岸最終和平統一。由於中美兩國在台灣問題上的終極目標不同、中美兩國實力對比未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以及美國的亞洲政策仍然以冷戰時期的輻軸政策（hubs and spokes）為根基，美國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階段仍將繼續其兩面性政策，雖然美國學界有人願意承認美國對台軍售被台灣島內台獨勢力所利用，有人擔心台灣民進黨內溫和派至今都未放棄台獨理想，但這些都尚不足以使美國改變其三十多年的台海政策大框架。美國在兩岸建立軍事安全互信機制和進行政治對話方面的態度以及將要表演的角色，都令人頗為擔心，這種擔心並非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其根據就是美國三十多年來在台海的負面影響。

雖然國際環境總體上有利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但其中也有不利因素，那麼接下去我要講的就是如何塑造有利的國際環境，爭取國際社會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乃至最終和平統一的支持。我要講的是個人的一些非常粗淺的看法，與我今年前幾個月在美國的調研工作有關。國際環境中非常重要，或者說最重要的因素是美國的政策。現在美國國內有人開始提出這樣的問題：中美關係發展已經進入了第二個三十年，美國應該對前一個三十年中的一些政策，如對台軍售，進行評估，為新的三十年的雙邊戰略關係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但是，持這種想法的人現在還太少，美國國內仍有相當數量的人停留在現有中美雙邊關係的框架中，尚未做好準備在戰略上迎接一個和平崛起的中國。我們塑造國際環境的工作應該著重改變這種局面，促使美國的台海政策乃至對華政策進行調整。當然，這首先要要求我們做好自己的事情，實現中國經濟、社會、軍事和政治的全面發展；除此之外，我們應該加強涉台公共外交，把大陸政府關於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策的基本目的、基本路徑、和平發展與和平統一的關係等問題向國際社會講清楚，增信釋疑，不給反對兩岸和平統一的人以空間破壞當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良好勢頭。

中國統一關乎民族振興

台灣海峽兩岸和平統一促進會副會長 梁大夫

1997年7月，本會在香港主辦“全球華人中國和平統一研討會”，邀請全球各地華人菁英、專家、學者及兩岸政壇貴賓，齊聚一堂，共商國事，會中充分表達中華兒女對和平統一的想法與期盼，三天會議達成了三點共識與決議。

- （一）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共同邁向和平統一。
- （二）兩岸對等，和平共存，主權領土，共有共用。
- （三）台灣不獨立，中共不以武力解決兩岸問題。

這三點原則，獲得參會菁英一致同意，三天熱烈的討論，喚起了海內外同胞關心國事的熱情。會後，代表們紛紛在各僑居地組織起來，為我們共同的理想，盡心盡力。十年之間，在全球各地，組成了160多個“和平統一促進會”，遍佈世界各地。同時在香港、澳門、日本·東京、澳洲·悉尼，紐西蘭、菲律賓、泰國、美國·紐約·芝加哥·費城·休士頓·舊金山·洛杉磯、中美巴拿馬、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魯、歐洲柏林、維也納、布達佩斯、俄國·莫斯科、南非·約翰尼斯堡……等地，舉辦了二十多次大型全球華人和平統一會議，造成了深遠的影響，也留下了歷史記錄。

近代史上，中華民族在危機時刻，國內外有識之士與海外僑胞挺身赴難，拋頭顱，灑熱血，他們有三次大結合。第一次是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第二次是對日戰爭，第三次是這一波的和平統一運動。這三次大結合，我中華兒女，在全球各地熱心奔走，犧牲奉獻，都為民族的復興做出極大貢獻。

台灣問題的解決，中國的和平統一是中國在二十一世紀是否能真正成為富強康樂的世界強國的關鍵所在，尚有待各地炎黃子孫繼續努力。在此，就美國地區和平統一運動做一簡單說明。

美國華人為國家的和平統一努力了多年，從早期華盛頓的黃企之先生、王冀先生，紐約花俊雄先生，費城的程君複先生（已故），芝加哥的侯大正先生（已故），舊金山的祖炳民先生（已故）、吳天威先生（已故），洛杉磯的李惠英女士（已故）、齊振一先生（已故）、巴山先生等，都為這一理念奮鬥了一生，在艱苦的環境下，堅持信念。一方面與台獨分子鬥爭，一方面與當時台灣的政權抗爭，在那國共對峙的時代，都被台灣當局列為不受歡迎的人物，百般汙衊、打壓。他們個人的奮鬥過程傳播了“和平統一”的種子，而今遍地開花，在此特別表示敬意。

李登輝、陳水扁執政二十年，他們用台灣同胞的納稅錢在美國公然支持台獨團體，透過美國公關公司與僑委會大搞台獨活動，同時有計劃收買美國學者、輿論媒體、政客，為台獨分裂製造理論基礎，甚至

在國會層級還成立了“國會連線”，企圖左右美國政府支持台灣獨立，對中、美、台三邊關係，造成極大的困擾。這期間，億萬的台灣同胞血汗的納稅錢，由李登輝、陳水扁主導，進入了美國社會，光是華盛頓一家凱西迪（Cassidy）公關公司，就從李登輝手上，簽了超過一千萬美元的“公關服務費用”。李登輝下台之後，凱西迪公司繼續為陳水扁政權服務，在其所謂的“機密外交帳戶”中，陳水扁集團，上下其手，已經查出的八年之間，有將近九千萬美金，不知去向，相信除了陳水扁集團中飽之外，應有相當大的數目進入了美國，造成了一定的影響。相較之下，在美華人，全憑對國家民族的執愛，以一己的力量，艱苦奮鬥，他們的堅持，他們的精神，他們的犧牲奉獻，扭轉了態勢，也造成了新的局面。今日在美國就有三十多個和平統一促進會的組織，遍佈美國各大小城市地區，老僑、新僑攜手共進，為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盡心盡力，在此也再表尊敬之情。

2008年，在台灣的國民黨重掌執政權，兩岸關係逐漸和緩，在擱置爭議、和平發展、經貿合作、共謀雙贏的戰略思考下，全力推展經貿、文化等交流。經過二十多年動亂，台灣同胞日漸覺醒，對新中國有了新的認識，也對兩岸對等，和平共存，主權領土，共有共用的主張逐漸認同，讓我們加把勁，共同完成“和平統一”這偉大的歷史任務。



兩岸聯手捍衛海疆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務顧問 劉夢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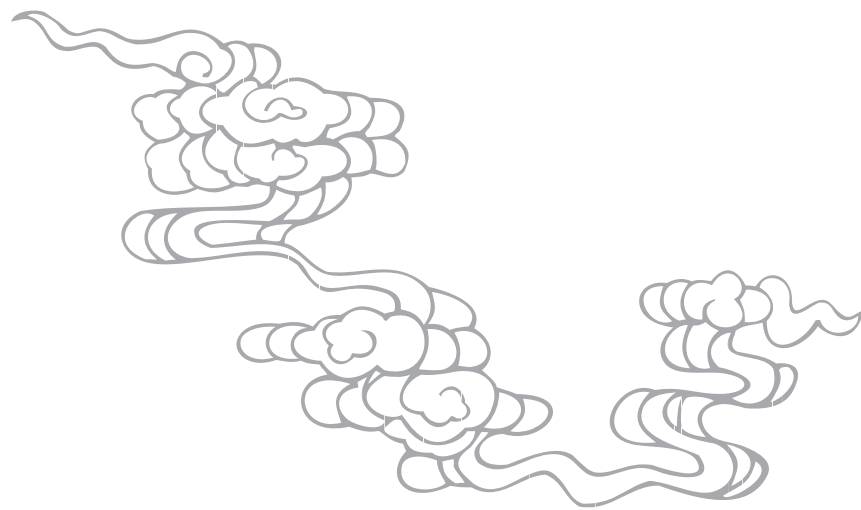
非常高興在這裡與兩岸三地的學者專家、社會賢達聚首一堂共同交流。眾所周知，中國的內地海岸線1萬多公里，而台灣，台、澎、金、馬，也是跟海洋有密切的關係，所以說這個海洋海權是我們中華民族，是我們兩岸的生命線，這個講法是不會太過。但是大家知道，最近一段時間，從黃海、東海到南海，我們海權被侵佔，島礁被掠奪，海床被盜取，這個現象愈來愈嚴重。這裡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兩岸的分治和對峙，給人家一種鷸蚌相爭，漁人得利的可乘之機。

我們的海洋國土三百多萬平方公里，其中52%跟朝鮮、韓國、日本、菲律賓、馬來西亞、越南、汶萊、印度尼西亞這8個國家有紛爭，這裡頭我舉個例子，比如說釣魚島，我們在保釣問題上如果兩岸能夠配合默契的話，我們絕對是事半功倍，因為在日據時代的50年，釣魚島都是在行政轄區裡頭，是歸台灣的宜蘭縣所管的，所以在前年的時候，台灣9艘艦艇圍繞釣魚島轉了1圈宣示主權，這是令炎黃子孫大快人心，吐氣揚眉的一件事情；又比如說南海，南海諸島，現在的形勢非常嚴峻，光是南沙群島，越南就侵佔了我們28個島嶼，每年在我們的海域盜走了1千萬噸以上的原油與1億立方米的天然氣。去年3月5號，馬來西亞前總理兼國安部長闖上我國的南沙群島的彈丸礁，他的海軍司令揚言如果中國的漁政船來這裡巡邏的話，我們的軍艦把他堅決驅逐；去年3月12號，菲律賓國會通過了領海基綫法，把我們的中沙群島到黃岩島，中業島以至南沙群島裡頭的八個島洲劃為菲律賓的領土、領海，他的國會議員揚言不要把中國的抗議當一回事，甚麼原因，就是因為我們兩岸的對立在這個方面給人可乘之機，就如南海諸島而言，眾所周知，二次大戰結束以後，跟據盟國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的精神達成的默契，是由當時的中國政府接收南沙群島、西沙群島，當時來講是在1946年的11月，中國政府派出軍隊在南沙群島的主島太平島駐軍接收，豎立了中國領土太平島的碑，這就是南沙群島屬於中國最有力的證據。

1947年，當時的國民政府向全世界公告了南海的U型的九段線，向全世界公告了東沙群島、西沙群島、中沙群島、南沙群島直至最南的曾母暗沙都是我們中國的領土，南海諸島，而當時南海周遭的鄰國包括他們背後的宗主國，以前的宗主國，和當時的宗主國，美國、英國、法國等等，皆無異議，所以在今天要捍衛我們的海權，兩岸的攜手合作是必不可少的，1937年，盧溝橋事變發生以後，當時蔣介石委員長說：“戰端一開，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今日我們從黃海到東海到南海，我們的海權被侵佔，威脅是我們兩岸，我們的炎黃子孫，沒有甚麼兩岸之分。所以我覺得在這個問題上，台灣由於他的檔案，歷史裡頭所存在的各種文件，當時為甚麼會提出九段線U型把幾個群島作為中國的領土，當時世界各國的反應是怎麼樣的，究竟國際會議的時候人家的評價是怎麼樣的，當時各個的世界地圖、國家出版

的地圖版本又是怎麼樣，都是以這個為基礎，承認南海諸島是中國人的領土等等。這些理據，如果兩岸可以加起來的時候，就更強而有力了，尤其是，比如說，陳水扁，作為台灣地區的領導人，他做10件事情，我有9件事是不贊成的，反對的，但是有1件事實我絕對支持，絕對贊成，絕對是正面評價，就是在他下台以前，飛到南沙群島的主島太平島一趟，到那裡視察，宣示主權，這個來講我完全覺得他做得非常正確。現在我們的經濟領域裡頭，兩岸三通直航，陸資入台、陸客登台等等，以最近的兩岸經濟合作協議都已經得到解決，那麼跟下來無可避免的要接觸兩岸和平協議、軍事互信等等一系列的議題，我覺得兩岸攜手，保衛海疆就是軍事互信裡頭的一個切入點，尤其是在南沙群島如何互相協助、如何交換天氣情況，以及防區協調的設定、物資的供應，以及海上救援的呼應等等，這些都是可以利用我們兩岸軍事互信的議題作為切入點的。

反正來講，把南海諸島保衛好，把釣魚島捍衛好等等，這是對兩岸都是有利的，所以我覺得，兩岸合作，保衛海疆應該成為我們兩岸三地和平發展的一個議題之一。



兩岸構建軍事互信機制之我見

台海兩岸和平發展促進會榮譽顧問 夏瀛洲

李登輝就任台灣領導人後曾公開宣示所有中國人，應共謀以和平與民主方式，達成國家統一目標。一九九零年十月十七日成立“國家統一委員會”，邀集各界具有代表性人士集思廣益，共同策進未來統一大業並於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三日，“國家統一委員會”正式通過“國家統一綱領”訂定四大原則重點綜合於後：

大陸與台灣均是中國領土，促成國家統一是中國人共同的責任，以全民為依歸，發揚中華文化，時機與方式以理性、和平、對等、互惠原則下分（一）近程；交流互惠階段。（二）中程：互信合作階段。（三）遠程：協商統一階段。該綱領在李登輝參與下完成，於其任內無任何改變。阿扁上任後承諾沒有廢除“國家統一綱領”與“國統會”的問題。但二零零六年春節阿扁自食其言，表示要廢除“國統綱領”及國統會“終止運作”。在泛藍各在野黨及美國壓力下將“廢除”改為“終止”不再編列預算，負責業務人員歸建。自此之後兩岸互信基礎蕩然無存，兩岸對峙升高，軍事衝突一觸即發，台灣海峽被世界列入最可能爆發衝突地區之一，此時有識之士呼籲建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避免偶發事件被誤判而導致嚴重後果。

兩岸軍事互信機制構建議

台海兩岸自90年代開始公開接觸後，不缺乏溝通管道。但，兩岸並未建立降低誤解與誤判有關軍事事務的管道，在過去溝通的過程中，常因管道錯誤或管道過多及下情不能上達，或傳話人誤傳，都可能造成誤會。台灣海峽航空器及船艦活動頻繁，稍一不慎，可能擦槍走火，造成衝突。因此，軍事互信及有效監督機制之建立，宜及早規劃。

建議由兩岸民間社團、專家學者及退休軍職人員，舉辦各類學術交流活動，交換意見，累積善意為爾後官方接觸奠基，建立第三軌對話管道。

由兩岸官方授權之民間學術團體，納編專家學者及退休軍職人員建立第二軌對話管道，形塑良好互動氣氛，並先期討論雙方議題。

海基、海協兩會以上述接觸雙方所提意見為基礎，納編現役軍職人員，推動官方接觸，建立正式軍事互信機制，以穩固互信、和諧、合作，解決兩岸軍事對峙問題。

關於兩岸軍事互信機制規劃建議具體如下：

（一）軍事互信機制概分為下列項目

- 1、 溝通性措施，如：建立間接或直接熱線、非敵意越界識別、海上意外事件通報管道、軍事研究人員交流等。
- 2、 透明性措施，如：國防白皮書之公佈、軍事演習公告預先告知等。
- 3、 限制性措施，如：台灣海峽限制大規模演習及不使用核生化武器等。
- 4、 規範性措施，如：海上軍事遭遇行為準則及海峽中線之遵守等。
- 5、 其他安全性措施，如：海事安全、打擊犯罪、海洋資源維護等。
- 6、 其他如反恐等之合作。

（二）依據上述項目建議劃分為近、中、遠程實施階段

A 近程階段

- 1、 海峽兩岸同步檢討放寬大陸退休軍職人員赴台限制，參加學術研討及雙向交流活動項目優先檢討放寬。
- 2、 兩岸軍事歷史編輯單位對國共八年抗戰歷次戰役，成立聯合研究小組共同研討，還原歷史真像。
- 3、 雙方於海基、海協增設軍職人員席位，並設立熱線預警機制，以直接對話方式避免因誤判而爆發意外事件。
- 4、 海事安全方面：
 - （1）海上援救。
 - （2）氣象、海象現況及預報資訊交換。
- 5、 海洋資源方面：
 - （1）捕魚、護魚及外國船非常進入海域之驅離。
 - （2）石油及天然氣探測及開探。
 - （3）海事地圖研究及繪製。
 - （4）海上漏油事件之處理。
- 6、 打擊犯罪方面：

防止及打擊走私、販毒、偷渡、海盜等不法行為。
- 7、 反恐情報交換及合作。
- 8、 雙方情報蒐集任務發生意外之協商。
- 9、 機艦意外碰撞之處理及潛艦意外事件之救援。

- 10、 槍、彈意外走火之處理。
- 11、 機艦劫持或判逃之處理。
- 12、 演習預告及取消針對性之演習。

B 中程階段

- 1、 檢討修正民航機進出台灣防空識別區航線，規劃進出“安全走廊”及安全規定，截彎取直，縮短航程，節省油料及成本，降低票價，嘉惠旅客。
- 2、 兩岸聯手舉辦海上搜救，人道救援，打擊走私偷渡及販毒等不法行為之演習。
- 3、 雙方協議訂定非軍事化地區、軍事緩衝區及飛機禁、限航區。
- 4、 國防軍事人員交流訪問，先自軍事院校教官及學生開始再逐步提高層次。
- 5、 設置高層聯絡熱線及雙方建立危機預防中心。
- 6、 檢討部隊及針對性武器系統之佈署。
- 7、 地區安全情報交換，降低軍事衝突發生。
- 8、 國防資訊公開及透明化。
- 9、 核生化武器管制。

C 遠程目標

- 1、 建立高層軍職人員互訪及軍事協商。
- 2、 互相派員觀摩大型軍事演習。
- 3、 聯合軍事演習。
- 4、 進一步發展兩岸安全合作關係。
- 5、 簽訂和平協議，結束兩岸軍事對峙。
- 6、 按國統綱領遠程目標進行。

影響兩岸軍事互信機制推動因素

（一）中國大陸對建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基本原則有二：

- 1、 必須在一個中國前提下推動，如果不承認“九二共識”，則無法商談，這也是民進黨執政期間，雖然也透過某些渠道與大陸溝通而遭拒絕的主要原因。
- 2、 台海問題不僅是台灣與大陸雙邊思維的問題，不可諱言是涉及中、台、美的三邊思維。惟大陸堅持：台灣是中國核心問題，一再宣示堅決反對第三國（如美、日），直接或間接插手。

（二）台海兩岸任何變化，不僅影響亞太地區的穩定，也會對全球造成很大的衝擊，直接影響美國大戰略的佈局及其國家利益。美國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嫻熟兩岸事務的葛萊儀（Bonnie S.Glaser）女士，2009年訪問台北與北京後，提出報告中提及美國支持兩岸建立軍事互信機制的主要原因是：如果台海發生軍事衝突，不預期或誤判引發的戰爭，美國最終有可能會介入其中。美國並不期望直接參與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的會談，或尋求對會談議題之影響及會談的步調。她認為：台北是意圖利用軍事互信機制避免意外，並創造一個安全環境，更重要的是維持現狀；而中國大陸則希望利用軍事互信機制促進統一。由葛萊儀女士的報告中可以看出美國對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的關切，及台灣某些人歡迎美國介入的渴望。期盼未來的談判，美國能扮演重要角色。但，中國不會容許並堅決反對第三者介入或插手台海議題的立場，不可能改變。至於美國未來扮演何種角色，對兩岸的領導人，將是很大的考驗及挑戰。

（三）台灣一向以“民主政治”而自豪，也逐漸走向“政黨政治”。但，很遺憾台灣的政黨政治卻是畸形發展。民主政治是少數服從多數，在立法院及各級議會，當法案涉及台獨利益（不是台灣人的利益）時，在野黨立委或議員人數如少於執政黨時，則採取激烈的抗爭。他們霸佔主席台，鎖上大門不讓會議主席入場及採取暴力行為，傷人事件國外媒體均大幅報導。這種民主政治，絕不是孫中山先生所倡導的民主，這種專扯後腿的政黨，當ECFA在立法院表決時，老戲再度上演，未來“軍事互信機制”推動時，如條文內容與台獨利益相悖，必定會杯葛，因此作決策時，必須非常謹慎。

（四）媒體影響政策及民意因媒體享有“言論自由權”，台灣媒體開放的程度令歐美國家咋舌，影響不可小覷。如媒體公正客觀報導則有端正視聽，有利於監督政府施政為民喉舌之功能。但，很遺憾的是有些媒體（含名嘴）輪為政黨工具，只有立場沒有是非，混淆視聽誤導民眾製造對立。“軍事互信機制”是一個高度政治敏感的課題，執政黨在推動之前，要以言簡意賅民眾易懂的文字宣傳，如用英文字母之組合，易讓人墜入五里霧中。

（五）政黨再度輪替之隱憂。馬英九先生當選台灣領導人後建樹良多，兩岸關係，大幅度改善，外交休兵使台北與中國大陸不再受小國勒索，在全球金融海嘯中，藉大陸之助力，經濟回春。但，因受扯後腿政黨負面的宣傳，民調始終徘徊在百分之三十左右。2010年4月1日，中國時報“陸以正尊欄”報導，三月二十三日華府著名智庫CSIS太平洋資料網刊出現任AIT理事卜道維，撰文公開鼓吹“在台灣民主的正常旋律下，民進黨必定會再度執政，如果2012年就發生的話，必須面對兩岸關鍵性的問題”。卜道維的話，雖然不一定會成為事實，但泛藍尤其是國民黨必須警惕，如何防止泛綠的“奧步”、抹黑，及虛心檢討執政團隊不得民心的原因，是馬英九先生的當務之急。

此外，民進黨主席曾公開宣示：“如民進黨再度執政，將廢除ECFA的協議”。如果不幸成為事實，則兩岸關係很難有進一步的發展，甚至倒退，因該黨不承認“九二共識”，兩岸“軍事互信機制”非但不會簽訂，台灣海峽必將風雲再起，劍拔弩張，這不是兩岸同胞所樂見的。

（六）美國對台軍售的問題是中、台、美之間一個難解的結。由於兩岸關係日趨緩和，軍售的重要性

亦隨之變化。對美國而言，對台軍售不可能僅止於商業利益，也不意味著對台有任何安全承諾，而是基於大戰略牽制中國的佈局。台灣方面由於內戰及台海軍事衝突陰影揮之不去，再加上有心人士對“中國威脅”之渲染，希望購買先進武器與大陸抗衡。軍售對鼓舞台灣團體及支持台灣利益人士之間具有相似性，但也有不同點必須謹慎處理，處理不當，將會影響兩岸的政治信任及軍事互信機制之協商。兩岸對軍售立場之差異，有待雙方領導人以智慧尋求解決之道，切莫讓大陸與台灣之間矛盾擴大。

結語

今年五月台灣國防副防長，楊念祖先生訪美時，曾公開表示兩岸軍事互信機制不是政策選項。因為，還有更重要的經濟問題要處理。7月16日，台灣行政首長吳敦義先生，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要談和平架構協議，需要累積足夠互信之後才可能觸碰政治層面的問題。官方接觸尚須假以時日。目前雙方退伍將領已開始第三軌接觸。至於由兩岸官方授權民間社團之二軌協商應及早準備。軍事互信機制是政治性極高的課題，也是海峽兩岸必將面對的問題，在溝通協商的過程中，預期將會遭遇諸多挑戰。兩岸分治六十餘年，思想觀念不盡相同，所有猜疑不信任有待溝通化解。大陸方面，要了解及體諒台灣政治生態，一切以民意為導向，如悖離民意，透過選舉將會失去執政權。台灣方面則要嚴肅思考大陸各級領導人背負國家統一的使命，及全球十四億炎黃子孫的期望，更要了解走向獨立的嚴重後果。兩岸軍事互信機制及和平發展的協議固然是重要的過程，但也非最終目標。

我們終極目標是要依“中華民國憲法”內之領域完成國家的統一，在孫中山先生思想主導下，建立一個全球華人理想的中國。此呼籲民進黨調整大陸政策，廢除台獨總綱。我們也殷切盼望國民黨要儘快恢復及推動“國統綱領”並朝向此一目標邁進。

兩岸和平協定研究

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林岡

兩岸和平協定的核心精神是在雙方均認同一個中國的前提下，維持台灣不獨、大陸不武的現狀，妥善處理雙方的政治關係定位、軍事互信、涉外關係、和正常交流等四個領域的問題。前三個領域屬於高階政治（high politics）的範疇，第四個領域主要指涉兩岸在民間層次的經濟、文化交流，屬於低階政治（low politics）的範疇。本文從追溯兩岸和平協定的緣起和比較不同協定版本入手，探討和平協定的基本內容。

一、兩岸和平協定問題的緣起

和平協議的題中之義是結束敵對狀態，避免兩岸因為政治分歧而發生戰爭。1979年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首次提出國共兩黨“通過商談結束軍事對峙狀態”、促進民間三通、實現和平統一的主張。1991年台灣當局正式宣告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將中華人民共和國視為“有效管轄大陸地區的合法政權”，同時頒佈“國家統一綱領”，要求中國大陸承認台北為“對等的政治實體”、放棄對台使用武力、停止“打壓台灣的國際空間”作為開放兩岸三通、舉行高層會談的三個條件。按照台灣官方和主流學者的論述，這意味著台北已經片面終止了兩岸內戰。然而，兩岸的敵對狀態並未真正結束，只是由誰代表中國的意識形態之爭，逐漸演化為一方謀求“獨立主權”和國際社會“雙重承認”，一方憑藉軍事和外交手段，反獨促統的統獨之爭。雖然1992年由兩岸政府授權的海協會和海基會曾幾經磋商，達成雙方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追求國家統一的共識，但對一個中國的實際意涵，缺乏共識，各說各話。台灣方面認為“中華民國”從未被消滅，享有主權國家的地位，應當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承認。大陸方面則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視為一個中國原則的三要素之一，反制台灣當局以“交叉承認”和“平行代表”為要旨的務實外交。兩岸在統一前的政治關係應該如何定位？如何處理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九十年代期間，雙方在這些核心問題上的嚴重分歧不但造成敵對狀態的延續，而且還導致了台海危機的爆發。

兩岸和平協議難免涉及兩岸政治關係的定位和台灣參與國際活動問題。九十年代中期，大陸方面明確提出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就“正式結束敵對狀態，逐步實現和平統一”進行談判，其優先步驟是，正式就兩岸敵對狀態的終止，進行談判，並達成協議。對此，台灣方面的公開回應是，舉行談判的前提是大陸方面正式宣佈放棄對台使用武力。當年不少人士認為，既然大陸方面已經表示保留使用武力手段只是為了阻止台灣獨立，而國民黨當局亦公開宣稱反對台獨，兩岸可以就“台灣不獨，大陸不武”達成協議。但事實上，當時台北對以結束敵對狀態或簽訂“停戰協定”為唯一內容的政治談判並不感興趣，而是希望同時

解決兩岸政治對等和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台北擔心的是，兩岸政治談判一旦啟動，將使其它國家產生一種印象，即和平統一已被列入兩岸的議事日程，國際社會沒有必要再關心台灣的“外交空間”問題。可見，兩岸和平協定的內容，難免要超出軍事安全的範疇，而涉及其它敏感議題，包括台灣的對外交往問題。

1995-96年台海危機後，一些學者開始研究兩岸和平協議問題。如1996年李登科提出的“台海兩岸締結和平協議之研究”（1996）和楊開煌提出的“台海兩岸和平協議書”（1999），研究內容涉及兩岸的政治定位、軍事互信、經貿關係、社會文化交流等議題。國民黨人士還曾一度考慮透過“國家發展會議”，提出突破兩岸僵局的建設性建議，即兩岸簽訂“五十年互不侵犯協定”，台灣承諾在五十年內絕不碰觸“獨立”問題，甚至願意消極維持“邦交國”數目不增加，其條件是中國大陸放棄對台用武和“打壓台北國際空間”。經常游走於兩岸之間的美國學者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和何漢理（Harry Harding）也先後提出“中程協議”（interim agreement）和“臨時協議”（Modus Vivendi）的構想。李侃如建議兩岸在最終開始正式談判統一前，通過對話協商，先行簽署一項“台灣不獨立，大陸不用武，維持現狀五十年不變”的“中程協議”。在這一過渡時期，兩岸關係既不是兩個主權實體的關係，也不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係；台灣明白宣示其為中國之一部分並同意不會尋求獨立，中共則同意不對台灣使用武力；雙方在內部事務與對外政策維持各自的自治；雙方高層可舉行定期的會談，以避免衝突並增進互信；同意以更改國名來進一步降低緊張：中華人民共和國改名為“中國”，“中華民國”改名為“中國·台灣”。在這一協定終止時，雙方可以就台灣的最終地位（final status），亦即兩岸的永久性關係（permanent relationship）問題進行談判。何漢理（Harry Harding）則建議兩岸通過對話協商，簽署“臨時協議”。該協議不是簡單凍結兩岸現狀，而是使其動態發展具有可預測性，其內容包括：1）一套相互的保證，即只要台灣不宣佈獨立，大陸就不以武力相向，反之亦然；2）擴大台海兩岸的經濟文化關係，包括直接通商、通航；3）在台灣不片面宣佈獨立的情況下，提升台灣的國際社會角色；4）兩岸軍方建立互信。何漢理認為，這一臨時協議可以避免中國大陸強制台灣接受統一，但又不排除中國統一這個最終選項。在這一框架下，台灣應考慮未來統一的可能性，但不必現在就作出決定。但上述建議，當年並未得到兩岸官方的正面回應。

台灣二次政黨輪替為兩岸簽署和平協定，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條件。民進黨執政時期，台灣當局曾提出建構兩岸“和平穩定互動架構”的設想，陳水扁在就職演說中以大陸放棄對台使用武力的意圖為前提，作出“四不一沒有”的承諾，頗有“大陸不武、台灣不獨”的意味，但民進黨當局不但刻意否認兩岸曾經達成的“九二共識”，破壞兩岸的互信基礎，而且在2002年8月後，公開鼓吹兩岸“一邊一國”，推動“公投”、“制憲”、“正名”、“入聯公投”、“烽火外交”等法理台獨路線，導致兩岸關係的多次危機。大陸於2004年發表“五·一七”聲明，在表明反“獨”立場的同時，提出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兩岸平等協商，正式結束敵對狀態，建立軍事互信機制，構造和平穩定發展的框架；實現全面、直接、雙向三通，建立緊密的兩岸經濟合作安排（CEPA），互利互惠；妥善解決台灣地區在國際上與其身分相適應的活動空間

問題。2005年大陸在通過《反分裂國家法》後，與在野的國民黨建立了對話平台，在胡、連共同發佈的《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中，雙方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確立促進終止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定，構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框架的目標。國民黨重新主政後，馬英九主張在“憲法一中”和“九二共識”的基礎上，維持“不統、不獨、不武”的台海現狀，以兩岸經貿往來與文化交流全面正常化為起點，以雙方“和解休兵”為近期目標，而將兩岸問題的最終解決留待未來。大陸方面在宣導兩岸恪守一個中國、增進政治互信、結束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定的同時，首次提出“兩岸可以就在國家尚未統一的特殊情況下的政治關係展開務實探討”，“適時就軍事問題進行接觸交流，探討建立軍事安全互信機制問題”，“在涉外事務中避免不必要的內耗”，協商安排“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活動問題”，以及“簽訂綜合性經濟合作協定”。一年多來，兩岸關係出現了良好的互動，和平協定隨之成為學界研究的熱門議題。

二、兩岸和平協定的不同版本比較

關於兩岸和平協定的內涵，有不同的研究版本。台灣知名人士邱進益於2008年8月提出的《台灣海峽兩岸和平合作協定草案》，涵蓋建立兩岸政治互信（大陸不武，台灣不獨；雙方互設代表機構）、維護軍事安全（大陸撤除對台導彈部署，雙方停止針對對方的軍事演習，建立金廈和平實驗區）、推動經濟合作（簽訂“台商投資大陸之保障協定”以及“更緊密經濟合作協定”，簽署三通協定，談判建立共同市場）和國際合作（“外交休兵”，協助台灣擴大國際參與，雙方合力維護中國領土主權）等項議題，有效期為30年。張亞中提出的和平協定包括七項內容：1) 兩岸同屬整個中國，共同維護整個中國之領土主權完整；2) 兩岸在平等之基礎上發展正常關係；3) 雙方均尊重對方之內部憲政秩序與對外事務方面之權威；4) 兩岸同意，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威脅對方，完全以和平方法解決雙方之歧見；5) 兩岸決定在雙方同意之領域成立共同體，以促進彼此合作關係；6) 兩岸同意，雙方在國際組織中彼此合作，雙方在國際組織之共同出現並不意涵整個中國之分裂，並有責任共同維護中華民族之整體利益；7) 兩岸同意互設常設代表處。上述兩個版本均屬廣義的和平協定，不同之處是邱進益的版本較為具體，帶有中程協議的性質。張亞中的版本更帶原則性的規定，且沒有規定有效期。

大陸學者周葉中提出的《海峽兩岸和平協議》版本包括十項內容。第一、兩岸宣告建立政治互信，正式結束敵對狀態，共同維護台海地區的和平穩定；宣告兩岸同屬中華民族，共同維護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共同致力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兩岸承諾不單方面改變現狀。第二、兩岸授權海協會和海基會，建立協商機制，可就經濟、文化、社會等事務性議題和政治性議題進行協商。第三、兩岸通過協商機制，可以簽訂兩岸事務性協定和政治性協定。第四、和平協議生效後，兩岸民間機構在和平協定簽訂前簽訂的協定繼續有效。第五、和平協定簽訂前台灣與香港、澳門相互簽訂的協定繼續有效。第六、和平協定由海協會和海基會負責聯繫，兩會應建立定期聯繫機制；可以向對方派駐常駐代表。第七、和平協定具有法律效力，兩岸應根據和平協定制定、修改和解釋有關法律；兩岸協定不得與和平協定相抵觸。第八、和平協議由海協會和海基會通過兩岸協商機制予以解釋。第九、和平協議由海協會和海基會通過兩岸協商機制予

以變更。第十、兩會簽訂和平協定後，兩岸應在協定簽訂後40日內按照各自規定完成接受程式，和平協定自兩岸均完成接受程式後生效。這一版本除了宣告兩岸同屬中華民族、維持現狀較為具體，以及對兩岸協商、簽署和平協議的涉及者規定明確外，其它條文只是就和平協定所能涵蓋的議題範疇、和平協定和其它協定的關係、和平協定的法律效力、解釋、變更、接受和生效作出原則性的規定，得益於作者的學術背景，該協議版本的法律意味濃厚。

美國學者孫飛和卡斯勒（Phillip Saunders and Scott Kastner）認為兩岸和平協議的核心要素是台灣保證不尋求法理獨立，其前提是中國大陸不對台使用武力或進行武力威脅。和平協定可以僅僅讓這一核心協定（core bargain）具有法律效力，也可以將兩岸在軍事領域的信心建立措施（CBMs）包括在內。前者保留協定的模糊性，較容易達成，也可減少對內說服的成本，但將限制協議的約束力，增加日後爭議的可能。後者詳細列舉雙方將不會採取的特定行為，但耗時多而較難達成。除了這一核心協定外，和平協定的內容還可以包括其它條款，例如增加兩岸經濟和交通聯繫，允許台灣擴大國際空間，參與國際組織等。但對可能影響台灣問題最終解決方案的其它安排則難以列入和平協議。例如，統一導向或台灣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均難以列入和平協定的範疇。對兩岸和平協議的涉及者，這兩位學者認為在諸多選項中，認為半官方的“兩會”代表出面較為可行。如果由雙方的政黨領袖簽署協定，在台灣出現政黨輪替的情況下，協定的合法性將受到質疑。台方的簽署者也可以是“台灣人民選舉產生的代表”（elected representative of the people on Taiwan），作為介於政黨領袖身份和政府首腦身份之間的折衷安排。作者認為，書面協定比起口頭協定或經過立法批准的正式條約更為可行。和平協議的有效期限可以明確規定（從25年到50年之間），也可以不規定有效期，但說明在一些條件發生變化時，例如在台灣人民傾向接受統一或是大陸變得更加民主時，協議可以終止。但作者強調，這種附帶說明難以為雙方同時接受。

三、兩岸和平協定的基本內容

從以上對兩岸和平協定的緣起和不同協定版本的比較，結合兩岸關係的近期發展，本文謹就和平協定的基本內容，提出以下幾點不成熟的看法。

1、明晰兩岸一中的關係定位

兩岸同屬一個中國是海峽兩岸在九十年代初就已經確立的原則；追求國家統一，既是這一原則的邏輯延伸，也是當時雙方的共同目標。在當時的語境下，一個中國有兩個層次的意涵。其一是雙方都認為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彼此都屬於中國的一部分，也就是不搞“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其二是雙方都追求未來統一。簡單地說，前者就是不獨，後者就是要統。前者可以稱為一個中國的弱原則（weak principle），後者則可以稱為一個中國的“強原則”（strong principle）。這兩個原則性的規定或共識，均未涉及到一個中國的概念意涵，也就是誰代表中國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個中國的原則，和原則上的一個中國（one China in principle），有一定的相似之處。民進黨執政時期，否認“九二共識”，以雙方對一個中國概念意涵的分歧（即“雙方對一個中國的認知各有不同”）為藉口，否認雙方在一個中國問題上已經

達成的共識（即雙方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追求國家統一）。台灣政黨再次輪替後，國民黨當局提出“不統、不獨、不武”的主張，承認“九二共識”，但其意涵跟當年已有相當距離，即拋棄一個中國的強原則，只保留一個中國的弱原則。儘管如此，這一弱原則還是雙方所能共同接受的，也就是說，兩岸在一個中國的原則問題上，還是有交集點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台灣只要不獨，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認同了一個中國的原則，大陸雖然不滿意，但是可以接受。

兩岸同屬一中，意味著在中國重新統一前，兩岸政府（或政權）分別對內行使治權，對外代表整個中國，以相互競爭排斥（在兩蔣時期）或默認彼此既有涉外空間（在馬英九時期）的方式共用一個中國的主權，而不是像李登輝中後期和陳水扁時期那樣，追求互相承認彼此主權的獨立路線。兩岸主權共用意味著一個國家主權可以包容兩個對等的政治實體或政府，但兩岸政府間的關係不是對等的主權實體關係，更不是國與國關係。雖然在中國重新統一前，國家主權實際上是由兩岸政府在不同程度上予以分享，但不應妨礙雙方平等協商，或將對方視為對等的政治實體。這裡所講的平等和對等，都是就中國的國家主權由生活在海峽兩岸的中華民族共同享有而說的，亦即“任何涉及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問題，必須由包括台灣2,300萬同胞在內的全中國13億人民共同決定”。從學理的角度分析，“胡六點”有關“兩岸同胞是血脈相連的命運共同體”、“包括大陸和台灣在內的中國是兩岸同胞的共同家園”的說法，意味著中國的國家主權、領土和人民所指涉的範圍是完全重疊的，也就是所謂“屬人主義”和“屬地主義”的主權觀，但未必是“屬政府主義”，因為兩岸同時存在著代表同一個中國的不同政治實體。主權共用、治權分屬思路的確立，有助於破解兩岸是否可以視為對等的政治實體這一難題，加強雙方的政治互信。

2、確立不獨、不武的政治互信

確立“台灣不獨，大陸不武”的政治互信，既是一個中國的弱原則的邏輯延伸，也是兩岸和平協定的核心內容。自從九十年代以來，大陸政府就曾多次表示，保留使用武力的可能，是針對台灣獨立的圖謀和外國勢力干涉台灣。從1995年發表“江八點”到中共十六大報告，均延續了這一說法，似可解讀為大陸單方面宣告“台灣不獨，大陸不武”。誠然，2000年2月發表的《一個中國的原則與台灣問題》白皮書，提到如果台灣當局無限期拒絕進行兩岸統一談判，大陸可能使用軍事手段來解決台灣問題；2005年發表的《反分裂國家法》也提到，如果和平統一的條件完全喪失，大陸可能對台使用非和平手段。但這兩個例外提法，應該視為對台灣當局拋出“兩國論”和推動“公投制憲”的強烈反彈。也就是說，當台獨的危險性不斷增加時，大陸也可能擴大使用武力的條件，採取以武力反獨促統的策略。但只要不存在台獨的可能，大陸也就不可能對台使用武力。

不獨、不武是馬英九當局“三不”政策兩大支柱。如上所述，就是民進黨當局在其執政之初，也曾做過類似“大陸不武，台灣不獨”的宣示，並將後者明晰化為不宣佈台灣獨立，不更改“中華民國國號”，不推動“兩國論入憲”，不推動“公投”台灣前途，但卻口惠而實不至。其後，民進黨以“切香腸”策略，推進法理台獨，不斷測試大陸所能接受的底線，其結果是兩岸爆發台海戰爭的危險性不斷增加，迫使

對台灣安全有所承諾的美國採取強勢外交，反對台北單方面改變現狀，以維持兩岸“不統、不獨、不武”的和平現狀。從目前中國大陸、台北、華盛頓的三方博弈關係來看，確立“不獨不武”的政治互信，有較大的可行性，理應成為和平協定的核心內容。

確立不獨不武的政治互信，難免涉及到兩岸的軍事互信機制問題。因為軍事互信機制的缺乏，影響到了政治互信的建立。台灣當局就表示，不願意在大陸維持甚至增加導彈數目的情況下，商談兩岸結束敵對狀態的問題。而從大陸的角度看來，在兩岸關係明顯緩和的情況下，導彈部署問題基本上已經是假議題，因為大陸不可能在台灣沒有走向獨立的前提下，對台使用武力；既然兩岸不存在戰爭的危險，台灣還要對外採購先進武器，包括F-16CD型戰機在內，就難免使人懷疑背後的政治意圖。政治互信的缺乏同樣會影響到軍事領域的信心建立措施（CBMs）。有的台灣人士擔心，兩岸在軍事領域採取信心建立措施，固然可以通過軍方交流，增加透明度，避免誤判的風險，但大陸也可能借此反對美國對台軍售，使台灣在未來的政治談判中處於不利地位。由於政治議題和軍事議題難以分解，這兩項議題需要同步解決，建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應該作為和平協定的重要內容。

3、規範兩岸涉外活動

樹立兩岸主權共用、治權分屬的思路，有助於解決台灣的對外交往問題。治權分屬意味著台灣有必要參與國際活動，而主權共用則意味著這種參與模式，既不同於互相否認、“漢賊不兩立”的零和交戰遊戲，也不同於互相承認彼此主權的休戰狀態，而是以政治上互不否認、法理上互不承認的方式，處理敏感的主權問題，以非交叉承認的雙代表制和非平行代表的雙席位制的方式，分別處理兩岸與其它國家交往及參與國際組織及其活動的問題。從兩岸在國際場合“和解休兵”的發展趨勢來看，雙方正逐漸磨合出一種和平、雙贏的交戰模式，為主權共用提供了經驗案例。例如，兩岸的邦交國數目穩定不變，在涉外事務中既避免了不必要的內耗，又共同維護了一個中國的主權。台灣以中華台北的名義，作為“世界衛生大會”（WHA）觀察員的身份，參與聯合國下屬專門機構世界衛生組織（WHO）的活動，為台灣參與其它國際組織提供了可資參照的模式。

規範兩岸涉外活動，可秉持先易後難的原則，逐步破解難題。台灣目前所擁有的23個邦交國數目，是民進黨留給國民黨的“遺產”，也是當年蔣經國留給李登輝的“家底”（僅就這一數目而言）。雖然這些邦交國的維繫對台灣的對外發展僅具有象徵性的意義，但由於島內藍綠的持續對立，一旦減少，容易成為反對黨的炒作議題。因此，只要台灣方面不企圖增加邦交國的數目或採取敵視大陸的做法，大陸也沒有必要，採取主動行動，改變這一暫時現狀。但隨著中國大陸經濟實力的增強和大國外交的拓展，可能增加暫時凍結台灣邦交國數目不變的難度。假設一些國家在不附加任何經濟條件的情況下，主動要求改變關係，大陸可能難以拒絕。一旦出現這種情況，兩岸應該增加通氣，同時也可以在涉外交往時，訂立一個潛規則，即其它國家在與兩岸分別斷交和建交過程之間，要有一定的間歇期，以增加其改變關係的成本，從而有助於穩定現狀。

就台灣參與國際組織的活動而言，區域性的國際組織較有彈性，也較容易解決。台灣既然已經以中國台北的名義參加亞太經濟合作組織部長級會議，留在亞洲開發銀行，應該可以比照前例，參加其它類似組織（如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此外，與世衛組織一樣，聯合國所屬的糧農組織、教科文組織和國際海事組織的章程除規定只允許主權國家獲得正式成員國資格外，還允許不具主權國家身份的領土或領土群，經一定程式以准會員或聯繫會員身份加入，而不作為國際法的主體。而台灣以台澎金馬獨立關稅區名義，作為非主權國家，加入世貿組織，則為台灣參與同屬聯合國專門機構的世界氣象組織，提供了一個先例。比較難解決的是，多數聯合國專門機構的章程明確規定其會員資格只限於主權國家，台灣自然不具備加入的條件。比較可行的辦法是吸收台灣代表，與大陸共組代表團參加活動，但這需要雙方在涉外活動方面，累積更多的互信。

4、推動兩岸正常交流

兩岸正常交流，也應屬於和平協定的範疇。這裡的正常交流，既包括民間層次的經濟、文化（包括新聞、教育、體育、科技、宗教等）交流，也包括官方層次的互訪。台灣政黨二次輪替以來，兩岸恢復了海協、海基兩會協商，達成了九項協議，一項共識，兩岸三通順利開啟，金融合作的MOU已經簽署，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定也將提到議事日程。這些已經簽署或即將簽署的協定，將自然成為兩岸和平協定的既定內容，其它更高層次的經濟合作，如兩岸共同市場的建立，也可納入和平協定的框架，循序漸進，予以推動。至於兩岸的官方交流，在政黨交流、地方政府交流、准官方交流（兩會）方面，已經日趨正常，形成制度化的模式，這些既有的交流模式，也可通過和平協定，予以確認，使其具有不可逆轉性，並在更高層次上和更廣範圍內加以推動。

綜上所述，兩岸可以在一個中國“弱原則”的基礎上就兩岸的政治定位、政治互信、涉外活動以及正常交流等四個方面進行探討，達成和平協定，以確立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框架。進而，以此為基點，兩岸可以在各自發展的基礎上，互相提攜，共同發展，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和平發展是和平統一的必經途徑

台灣中國全民主統一會總會長 王化榛

兩岸分隔轉瞬已逾60年之久。兩岸四地以及全球的中國人，所共同關注的問題即是祖國何時真正統一？如何統一？台灣會不會宣布獨立？台灣如果宣布獨立，後果如何？這是大家都想知道的答案。

先說台灣會不會逕行宣布獨立？答案應是否定的。

大家也許要問現在是國民黨執政，馬英九的政策是：不獨、不統、不武。在他任內，當然不會宣布獨立，但是年之後，如果再度政黨輪替，政權重新淪落到民進黨手中，民進黨會不會乘勢宣布台灣獨立？或者更進一步修改憲法，將“中華民國國號”改為“台灣共和國”？

成立“台灣共和國”，雖然是民進黨和台獨分子夢寐以求的目標，可是民進黨人也深知：這是他們最難實現的夢境。陳水扁在任時就曾經說過：台獨是不可能做到的，別人做不到（應指李登輝），他也做不到，他不能騙人。陳水扁此言，不是說他不想台獨，或指他放棄台獨的理念，而是他深切的感受到國內外的情勢是不容許他驀然宣布台灣獨立的。08年他所發動的入聯公投，不是被台灣人民所否決了嗎！

首先講國際情勢：台灣雖然和20幾個國家維持外交關係，但這些國家，都是蕞爾小國，在國際上常靠大國援助以維持生存，鮮有影響力。而在國際上有影響力的大國又都不支持台灣獨立。尤其是台灣的靠山美國，曾一再表白：反對台灣獨立的立場，所以台獨在國際上是得不到支持的。

再看台灣內部的情勢：台灣的民意，原本是統派大於獨派的，但在李登輝取得政權以後，推行假統一，真台獨政策。在他手中，曾經成立國家統一委員會，並訂定國統綱領，要分三階段完成國家統一，使大家誤把他當成統派，直到他權力鞏固以後，他在美國康乃爾大學演說時說：“兩岸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才顯露出他真台獨的面貌。在他往後的任期中，更明目張膽的把台灣引向台獨的方向。最顯著的行動如：多次修憲，實施總統直選、廢除台灣省、說國民黨是外來政權等，他更暗中扶植民進黨，分化、拖垮國民黨，使民進黨取得政權。

從李登輝到陳水扁，他們披着“本土化”、“愛台灣”、“主權獨立”等外衣，逐步走向台灣獨立的目標。而大陸又不時宣揚以武力為解決台灣問題的最後手段，被台獨份子大力運用、宣傳，使不少台灣民眾對被大陸統一後的後果，發生疑慮，影響所及，使統派日漸萎縮，而獨派則更形囂張。但民進黨因陳水扁的貪腐而失去政權，國民黨重新執政，雖然馬英九宣示不獨、不統、不武的主張，在其任內固難實現統一的目的，但最少我們不用擔心民進黨天天搞“入聯公投”等台獨花招來污染民心。

自從五年前，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到大陸訪問，在和胡錦濤總書記會談中，定調今後兩岸關係以“和平發展”為共同努力的目標後，使兩岸緊繃的情勢，一下子得到極大的舒緩，不僅兩岸人民稱幸，也贏得國際社會的讚譽。也讓台灣海峽戰的引爆點，化解大半。馬英九上任，隨即大力推動改善兩岸關係的各種措施，諸如：恢復海基海協兩會會談、推動兩岸三通直航、開放大陸同胞來台觀光旅遊、舉辦兩岸各種論壇，以加強溝通，增進瞭解；又如最近共同努力簽署的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E C F A、承認大陸學校學籍、開放大陸學生來台就學等等，都得到大陸善意的回應和積極的配合。雖然民進黨仍使用各種手段，全力阻擾，確讓台灣民衆體認大陸今天的對台政策，已經不是過去的對台態度；也使台灣民衆進一步認清民進黨的所謂的“本土化”、“愛台灣”等等，不過是騙取選票的花招，其結果只會造成“鎖國”和禍害台灣，是違反台灣主流民意的。

話雖如此，我們不能不認識到民進黨確實是一個擅於操弄民意和輿論的高手，而馬英九上任至今，民調始終在低檔盤旋，最近兩年的多次選舉，國民黨皆落居下風，年底的五都選舉，國民黨能否保住三都？關係到2012年的大選，因此今後兩年的兩岸關係必須繼續朝向“和平發展”的方向邁進不可，唯有穩定的兩岸關係，才能為國民黨加分繼續執政。

致於如何推動“和平發展”？個人不揣鄙陋，提出下列淺見以供參考：

兩岸應從多層面多角化加強交流，以同文同種、血濃於水的基礎，發展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境界，雙方做到不炫耀武力、不強調主權、不製造對立。因為如果任何一方向另一方炫耀了武力，難免會埋下戰爭的種子而擦槍走火；又如果一方強調主權問題，會使所有的協商、談判擱淺停滯不前；又如雙方在交流談判中不把對方當朋友或一家人看待，而是存有敵對的心態，則兩岸關係就永遠無法“和平發展”了。反之我們如果同以炎黃子孫的立場交往，互補互助、互相尊重、互相包容，做到我少不了你，你少不了我的地步，不容民進黨有任何挑撥離間的空間，到時候不必爭甚麼“你吃掉我、我吃掉你”的問題，大家以區域合作和地球村的概念和心胸，來看待兩岸問題，以後無論用“邦聯”、“聯邦”、“國協”或“歐盟模式”、“東協模式”或“筷子理論”（聯合報社論，認為兩岸關係如一雙筷子，缺一就不能發生作用）“屋頂理論”（認為兩岸關係是一個屋頂下的兩個政治實體）“統合論”（大陸學者提出：兩岸以三部憲法規範雙方關係）日後實現和平統一的大業，就水到渠成了！

呂秀蓮理應放棄台獨走向和統

台灣全統會嘉義分會主任委員 袁純正

從目前的國際環境著眼看，台灣的確沒有走向獨立的空間和機會，當然，如就台灣內部現有的情勢來論斷，我們也很難毫無條件地來接受祖國所謂的“一國兩制”，其間自然還有一些折衷的方式，值得兩岸政治菁英去商討，這樣才能得到大家的認同。

對於兩岸關係未來的發展，目前台灣政府所應急於付諸行動的，還是要如何維持一個安定的局面，有時間來從事各種政治革新和經濟發展，使台灣真正成為一個自由、民主、富強的政治實體，以激發祖國的逐步演變，在政經體制上能夠一步一步地走向民主自由化；若能如此，兩岸同時又能拿出誠意來，彼此互助互讓，共同努力，才能創造統一的契機；否則，兩岸的統一，將會受到台獨言論的誤導，孽蔓難圖，難以順利和解。

呂秀蓮女士，在陳水扁執政時期，乃是台灣的備位元首，依據國際慣例，她是不應該提出變更國號或分裂國土的主張的；只因她的政治思想一直是反中的，才主張台獨。不過這種意識形態的形成，也是受了時代潮流的影響，如果未來的祖國，乃是一個自由民主的政體，呂女士或許會改變她的觀念，而不會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也不會因為接受政治文化薰陶的不同，成了台獨運動的健將。

未來兩岸關係的發展，何時能夠完成統一？目前的確難作定論，那要看雙方的立國理想是否接近，政經等制度是否能夠整合成功而定。呂女士既然承認兩岸同胞為遠親近鄰，其家兄亦曾率領呂氏家族前往福建詔安探親祭祖；浙江省長呂祖善，於端午節前夕率團來台參訪時，他在呂氏宗親盛大的歡迎會上，非常感動地說：“宗親相見情感，深深打動我的心，更加證明兩岸本是同根生。”這種血緣關係，既然難以割捨，呂女士就應發揮民族大愛，共同來商談兩岸和平統一的問題，以創造一個富強理想的新中國，而不應受了國際反華勢力的鼓動，提出親痛仇快的台獨言論來誤導民眾，進而導致兩岸同胞的對立和仇視，為中華兒女帶來一場最愚蠢的大悲劇。我們誠懇地期望兩岸英明的政治家，彼此都能為後代子孫的幸福著想，大家拿出誠意和信心，共同來謀求兩岸和解統一之道。

兩岸同胞，五百年前共一家，不是兄弟，就是姻親，彼此的生存發展，可以說是唇齒相依，休戚與共，關係之密切，由此可想而知。對於促進兩岸的和平統一，基於民族大義，我們不只是責無旁貸，而且也共同肩負著偉大的歷史使命。

因此，為了增進兩岸同胞的福祉，以建設一個富強康樂的新中國，才是我們努力以赴，到達的最終目標。

開創海外反獨促統新局面

美國華盛頓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 吳惠秋

聚同化異共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近兩年來華盛頓統促會結合兩岸關係的局勢特點和海外的地區優勢，堅持開展海外反獨促統活動。在兩岸關係出現的新形勢下注意團結海外台灣同胞，聚同化異，共同推動兩岸關係的良性發展。隨著兩岸關係新局面的出現，華盛頓統促會定期召開理事會議，總結工作，暢談形勢，佈局年度工作計劃。理事們認識到，當前台海兩岸關係良性互動的新局面賦於海外華人華僑新的任務和挑戰，統促會要把握這個良好機遇，團結廣大華人社區同胞，做好兩岸增進互信，擴大交流，共創雙贏的有力推手。自2009年以來，統促會聯合大華府地區的兩岸僑胞，共同建起了大華府“和平發展論壇”的平台，並使論壇運作常態化。

華盛頓統促會在馬英九先生執政後，於2008年6月初及時召開“兩岸和平與發展座談會”，邀請紐約大學熊階教授演講兩岸關係發展，邀請華盛頓地區泛藍朋友和有關台灣同胞一起共議選後兩岸局勢，討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大計，認識兩岸和平發展進程的長期性和複雜性。

隨著大華府“和平發展論壇”的開展，也從非政治層面向政治議題討論和深化。例如論壇組織的“兩岸一甲子”座談會，把兩岸關係的討論引入兩岸政治領域的討論，由統促會原統促會副會長，知名政論學者印鐵林博士作題為“兩岸關係的展望，和平統一的歷史性分析”，和華盛頓統促會理事熊源漪先生作題為“準備破解政治難題，促進兩岸和平發展”的演講。

華盛頓統促會注重運用互聯網工具加強促統工作。多年來網站為宣傳反獨促統理念，彙集反獨促統文獻，溝通訊息，組織活動，鼓舞鬥志起著重要作用。設網站至今，華盛頓統促會能及時報導所舉行的各種反獨促統活動，對訊息傳遞，保持與兄弟反獨促統組織間的聯繫，召開和籌備大型會議等都有重要幫助。至今華盛頓統促會已經開闢了十個文章專欄，已經論壇論文彙編。去年起在文獻塊中增加了“近期文獻推薦”，及時介紹和轉載全球優秀文章和評論。

在海外開展反分裂活動的工作

華盛頓統促會認識到本統促會的宗旨是要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反對分裂中國國土和主權的一切言行，為中國的最終完全統一努力。由此，開展反對藏獨和疆獨等一切分裂勢力的活動也應該成為統促會工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每當分裂勢力製造事端和國內外反華勢力勾結活動時，統促會都在第一時間舉辦活動和發出聲明，表達海外華人華僑的聲音。典型的活動有：

2008年三月十四日，西藏自治區街頭發生極少數不法分子打砸搶事件波及附近省份，連中國駐外使領

館也相繼遭到不同程度上的恐怖襲擊，使國家財產和駐外人員的生命安全受到嚴重威脅。華盛頓統促會在3月21日發出嚴正聲明，譴責“藏獨”勢力的野蠻行徑，達賴集團妄想用謊言和野蠻的手段來達到分裂中國的圖謀是不可能得逞的。當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不顧中國人民的反對到印度會見達賴，並提出的要求布希總統以所謂西藏問題來抵制參加8月8日在北京的奧運開幕時，華盛頓和統會給佩洛西議員直接寫信，堅決反對其反華立場。堅決反對佩洛西在美國國會所主導的1077議案，所謂要求中國停止在西藏的鎮壓，認為這是與事實完全不符的，中國政府完全有權力制止國內的騷亂，打擊恐怖事件以維護社會的穩定有序，這絕不是甚麼自由和違背人權問題。

2009年7月5日發生在新疆烏魯木齊的嚴重暴力事件，使一百多位無辜百姓喪失了寶貴的生命，上千民眾受傷，數百民用交通車輛被毀，財產被搶，房屋被燒。華盛頓統促會於第一時間7月7日就發出譴責聲明。表示身居海外的廣大華人華僑堅決聲討新疆分裂勢力的這種暴力行為，堅決支持中國政府依法嚴懲行兇作惡的犯罪分子，堅決譴責熱比婭為代表的分裂勢力的卑劣行徑。任何反華勢力和分裂分子都不能阻擋中國的和平發展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7月15日晚華盛頓統促會和大華府新疆同鄉會聯合召開新疆七·五事件座談會，座談和聲討海外熱比婭分裂分子和國內分裂勢力勾結，破壞社會和諧的罪行。華盛頓統促會在召開座談會和發出聲明的同時還起草了一封給美國國會議員的信件，讓與會者簽署，呼籲美國國會議員們認清熱比婭和中國分裂勢力企圖分裂中國，蓄意製造事端的惡劣行徑，從中美關係發展的大局考量，不要支持熱比婭等的分裂活動。

在“莫拉克”颱風肆虐台灣和大陸沿海地區期間，台灣地區的高雄市領導人邀請達賴訪台，進行所謂的慰問和宗教活動。華盛頓統促會及時發出聲音，表示是台獨勢力和達賴合演的一種政治秀，達賴喇嘛不是一個單純的宗教人士，到台只是為了破壞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良好局面。

今年2月18日美國總統奧巴馬計劃在白宮會見到訪的達賴，華盛頓統促會於2月12日給奧巴馬總統發出一封公開信，敦促奧巴馬總統不要會見這個企圖分裂中國的政治和尚，指出達賴喇嘛一直從事著企圖分裂中國的活動，他支持暴力犯罪，破壞西藏的和平與穩定。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允許破壞主權和領土完整的行為，美國也不例外。奧巴馬和達賴的會面將不可避免地傷害到中美兩國關係，給分離主義者發出了一個錯誤的信號。

加強海外反獨促統的合作和相互支持

(1) 加強全美和統會聯合會工作

華盛頓統促會認識到海外的促統工作必須最大程度地聯合反獨促統力量，最大程度反映海外華人華僑期盼中國統一，民族復興心聲，因此海外統促會組織間的合作，協調，相互配合，聯合作戰是非常重要的。全美統促會聯合會是由程君複教授等海外反獨促統人士於2002年創立的，在台獨勢力囂張時期曾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直至2005年程君複教授不幸去世，大部分在美國的統促會組織並沒有加入或參與到這個聯合組織中。

（2）加強本地區反獨促統組織的聯合和協同工作

在大華盛頓地區反獨促統組織共有三個，即：“華盛頓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理事會成員由各界僑領代表，台灣僑胞代表和大學組織代表組成，具有完整的組織體制和廣泛的僑界代表性；“華盛頓中國統一促進會”（促統會），由洪門致公堂等傳統僑團人員組成，其會長分別兼任華盛頓促統會的副會長和常務理事；“喬治華盛頓大學促統會”，為全球唯一在海外大學中的促統會組織，組織負責人為該校“學生學者聯合會”的負責人兼任，同時兼任華盛頓促統會的理事。雖然三個社團為獨立的民間團體，但在大華盛頓地區的反獨促統活動中，慣由華盛頓促統會牽頭，共同合作，在活動中相互尊重，協同開展工作，建立了良好的關係。

（3）加強和本地區其他主要社團的合作

華盛頓促統會還經常根據海外反獨促統工作的需要，聯合大華府地區的普通僑團共同舉行有關活動。華盛頓促統會會長吳惠秋博士，常務副會長何曉慧女士曾任多年擔任校友會，同鄉會，藝術團體等社團負責人。華盛頓促統會經常參與或共同組織這些華人僑社受歡迎的如春節，中秋，國慶，中國文化節等傳統活動。2009年中秋節前華盛頓促統會與大華府同鄉會協會，台灣同鄉聯合會聯手，共同舉辦“中秋月圓”大型演出，兩岸海外僑胞團聚一堂，由台海兩岸歌手同台獻歌，取得很好效果。

堅持做美國主流社會工作常態化

台海問題的形成和現狀的形成和美國政府脫不了干係。美國國會議員中的保守和右翼勢力總是企圖插手中國內政，損害中國的主權和核心利益。他們不時利用台灣問題，西藏，新疆問題給中美關係發展製造麻煩。因此，華盛頓促統會始終堅持把做美國主流社會的工作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代表美國的廣大華人華僑向他們反映中國人民要求和平統一，民族復興的意願和追求。希望有一個健康發展的中美關係，不要干涉中國內政，不要損害中國的國家利益，要創造互利雙贏的結果。

每逢聖誕促統會都會給議員們寄去節日賀信，在恭賀聖誕時闡明希望議員們支持中國的和平統一。這樣的節日賀信已經連續6年未間斷。同時，每當反華分裂勢力製造事件，促統會都在最快時間內作出反應。近期的事件例如，在眾院佩洛西議長去印度聲援達賴喇嘛時；新疆七·五事件時；在美國政府決定向台灣出售武器時；當奧巴馬總統要會見達賴時，華盛頓促統會都及時向議長，議員，總統直接發出呼吁或公開籲信件，希望他們從發展中美關係大局出發，不要損害中國的國家利益，不向分裂勢力發出錯誤信號。在有社區大型活動時，華盛頓促統會會盛邀議員參加，讓他們有機會接觸華人社區，了解華人華僑期盼中國和平統一的理念。典型的例子如在2007年的華盛頓全球促統論壇時，在華人慶祝中國60周年國慶活動時，在華人社區慶祝傳統佳節時，在社區有大型演出活動時都會邀請議員和地方當局領導人參會。

警惕“和平獨台”陷阱

全英華人華僑中國統一促進會總會長 單聲

兩岸和平發展，終極走向和平統一是中華兒女共同的心願，但是從和平發展走向和平統一應該有個期限，不然永遠和平發展，永遠兩岸維持現狀，就會陷入“和平獨台”陷阱。

從邏輯上來講達成完全和平統一應該分成兩個階段，（一）立法制獨，（二）依法統一。第一階段經“反分裂國家法”於2005年3月14日制定後，制獨基本上已見成效。而第二階段的“依法統一”在“反分裂國家法”制定後已經五年時間尚未能積極開始。正因為缺少一道統一法，因此兩岸統一似乎愈走愈遠，連訂定一道ECFA，經濟協議框架法律都成了問題。很多人都認為先經濟後政治是自然的發展方案，卻不知多年來發展兩岸經濟與政治發展完全是兩碼事。很多台僑台商在大陸賺了錢回台灣去支持陳水扁，支持台獨。前兩年大陸幫助台灣解決經濟失業問題，給台灣賺了一百多億美元，而台灣卻拿賺來的錢65億去買美國的武器，買的竟是愛國者飛彈及黑鷹直升機，甚至還要去美國買F16 C/D攻擊性武器。很多人甚至把兩岸和平統一看作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必然性，總以為祇要國家綜合國力上昇，經濟可以援助台灣，台灣自然會與祖國達成完全統一，卻不知從立法基礎上觀察我們缺少了制先權的法律。從純法律觀點上來分析，“反分裂國家法”祇是一部消極性的法律，它告訴台灣這不能做那不能做，但並沒有積極有效的去立法規定台灣在何時何刻你應該為兩岸統一做些甚麼？的積極立法。所謂制先權就是居安思危，就是讓美國讓台灣知道甚麼叫做一國兩制，多少年之後必須達成兩岸完全統一，讓美國讓台灣沒有一線機會去搞法理台獨。一國兩制內容必須形成法律，兩岸完全統一時間表必須訂定。

馬政府的不統不獨不武，與美國的維持兩岸現狀正是回應反“反分裂國家法”最好的方法。我不獨不武也不統，“反分裂國家法”發生不了作用。美國的維持兩岸和平現狀也是對付“反分裂國家法”的又一方法。又一手段，我們必須堅持不統就是“獨”，兩岸無限期的維持現狀就是獨。台灣與美國是有默契的，他們的默契就是儘量爭取時日，儘量爭取國際空間，因為晚一天統一就多一天增加兩岸分治分割的既成事實的獨立條件。誰能擔保在某一個特別情況時間下美國不挑動台獨獨台？新疆、西藏已經在中國版圖之內的地方反華組織都要挑動分裂。台灣已經與祖國分裂分治60年，你能擔保他們不在台灣法理獨台上做文章？我前面所提的制先權、居安思危就是為制定積極法律、一國兩制法制化，兩岸必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慶賀百年國慶之前達成完全統一。中華民國已不復存在，誰再說中華民國是一主權獨立國家，誰就是搞分裂，誰就是台獨。台灣口口聲聲說不統就是台獨，支持兩岸維持現狀就是獨。所以必須立法刻不容緩，要將向美國買攻擊性武器列入叛國行為。台灣地區領導人必須是贊同兩岸統一的人物，否則祖國不予承認。台灣領導人經中央認同之後自動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這一切都必須立法。

以上理論經2009年世界各國僑領認同者已有130多位簽名，有據在此，呼籲中央鄭重思考此一建議，以減除他日不必要麻煩。並少武力衝突之可能，是走向和平統一唯一必須的道路，兩岸完全統一藍圖訂定後，支持台灣統一大同盟爭取70%的中間游離份子投入統一大同盟，則兩岸爭取有一天大同盟能在台灣執政，兩岸完全統一就指日可待。最近美國正在出賣攻擊性的武器予台，又接見達喇嘛，無視兩岸和平發展，我們必須反擊，反擊最好的方法就是立法，完善“反分裂國家法”，訂定完全統一時間表，將一國制的容法制化，並可將叛國法考慮列入，以求永遠有效阻止向台灣買賣武器的行為，這是立法最好的時機。

很多老華僑都認為促成兩岸和平統一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我們不能將責任推給下一代人身上，我們不能迴避責任。因此才有簽名呼籲之情事發生。



台灣需要一個純正的“統派”媒體

台灣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國際關係組碩士生 王炳忠

台灣與香港不同，更與日據時期的東北不同，她承受了日治、反共、外力、久分、本土五個因素影響，使得獨素有如計算機中潛伏的病毒，很難掃毒根治，會一再活躍蔓延。台灣現在就是這樣一台當機的計算機，最後只有整個程序洗掉重灌。這不是以人的意志可為轉移，也不是氣得亂按鍵就能解除了，必須做整個基本結構的改正。

2009年8月，《旺報》在台灣發行，與原中國電視(中視)、中天電視、中國時報形成旺旺中時集團。旺旺中時至今發揮的作用，就像是對一個癌症患者進行的化學治療，僅僅將體內獨的癌細胞堵住使之不易擴散，但並不能還他一個純淨的健康身體。2008年馬英九當選領導人後，也只是暫時抑制了極獨的聲浪，未能撥亂反正，台灣社會的統獨光譜仍繼續朝獨的方向挪移。

應當務之急，我們必須探究台灣在旺旺中時之外，另起爐灶闢建一個純正的統派媒體的必要性及迫切性。台灣是一個政治與媒體高度結合的社會，一般民眾的政治立場及統獨意識深深地受媒體左右。對台灣媒體進行有所作為的工作，就是貫徹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對台工作方針。

從認識台灣媒體的統獨生態著手

1990年代初期以來，台灣因解嚴伴隨而來的媒體開放，使得各家電視台如雨後春筍般開放。除原老三台(中國電視、中華電視、台灣電視)外，無線電視頻道又多了第四台——由民進黨人創建的民視。有線電視頻道方面，至今已超過八十的電視台中，二十四小時播報新聞的幾家新聞台成為台灣百姓收取公眾輿論的主要取道，影響力遠遠高於報紙。每天晚上，各家新聞台便開始自家製作的政論節目，當天節目中請來的名嘴、談論的內容、打上的標題，都直接決定了台灣的政治風向。當然，也就包括了台灣統獨光譜的挪移。

十年前，在那個台灣普遍仍習以大陸稱呼對岸的年代，民視率先稱對岸為中國，為台獨主張的一邊一國在媒體上製造聲勢。隨著李登輝後期隱性台獨的明朗化，以及其後八年的陳水扁執政，台獨逐漸從城外作亂進渡到攻入王師，堂而皇之地登上台面為所欲為。這是台灣內部本就存在的獨細胞擴散的高峰。至此，台灣媒體已清一色稱呼對岸為中國，一邊一國在媒體上已成主流，甚至連名為中國電視公司的中視新聞也不例外。

當台獨站上了不可抵擋的勢頭，我們便會看見各家媒體不分藍綠地被這個勢頭吸引。這本是人性中免不了的扈從心理，但在台灣這樣一個信仰薄弱的社會尤其明顯。“台灣是個獨立的國家，她的名字叫中華民國”這種似是而非的獨台論述，就在這樣的環境下應運而生。此外，台灣還有一群受美國影響的自由

派，或者故意喬裝成自由派的媒體。他們自認言論自由，結果就成了要藍不綠、要統不獨。這樣的媒體一樣是扈從，那邊勢頭高，就往那邊靠。如此一來，台灣的媒體不是台獨就是獨台，箇中的差別，僅在於她與極獨的距離稍遠稍近而已。

細數台灣各家媒體，三立、民視長期被民進黨控制，靠一邊一國的正統旗幟號召她的鐵桿護衛隊。諷刺的是，被民進黨稱之為統派媒體的媒體，卻也只是獨台而已。TVBS以在野黨自居，自陳水扁弊案爆發後發揮高度制衡力量，因而被民進黨冠上統派媒體的帽子；但我們不要忘記，2000年總統大選時，TVBS卻是大力支持陳水扁這個高喊台獨萬萬歲的在野改革勢力的。東森新聞則是喬裝出來的自由派，在藍綠立場上製造出迎合大眾的模糊表態，在統獨立場上迎合一邊一國的主流氛圍。這些統派媒體，都繞不出獨台這個大圈圈。

2009年8月，旺旺中時集團成形，這的確是對台媒體工作走上正確道路的第一步。然而，旺旺中時有其無法拋卻的包袱。解嚴以來，《中國時報》所走的路線，一直是在藍綠之間游走的自由派，說穿了就是接受獨台的論述，窩藏了大批的台獨編輯。旺旺集團買下中國電視(中視)、中天電視、中國時報以後，又另辦了台灣唯一專以報導兩岸為主的《旺報》。這的確是過去未曾有過的氣象。但是，旺旺中時仍受制於內外兩股勢力，無法旗幟鮮明地與民視、三立、《自由時報》這種台獨媒體分庭抗禮——內部阻力來自過去遺留的一批台獨老臣，外部阻力則是上述十年來台獨製造出的獨台氛圍。旺旺中時像極了近十年來台灣社會的縮影，被一張張以台獨及獨台編織成的天羅地網牢牢困住。

台灣既是號稱言論自由的社會，沒有理由缺乏一個純正的統派媒體。我們絕不能滿足於今日的旺旺中時，而必須進一步改造台灣的媒體統獨生態。旺旺中時只是第一步，一個純正的統派媒體才是奠定整個工程的基石。

推動台灣人的扈從心理向統挪移

上面提到，各家媒體不分藍綠地朝獨的光譜挪移，是受到人性中免不了的扈從心理的影響。這種心理在台灣人性格中尤其明顯。台灣人過去受日本殖民，後又由國民黨統治，即便後來由陳水扁執政號稱台灣人當家自主，這種扈從心理沒有消除。台灣人眼光狹窄、視野有限，對自己的未來既缺乏一個具國際觀的認識，也不想做一番太認真的探討。因此，台灣人的信仰是十分薄弱的。

台灣人對信仰的薄弱反映在對台獨的堅持上。過去國民黨威權時代的白色恐怖，政治犯大多是因共產黨之名被判刑，因主張台獨獲罪的沒有幾個。陳水扁執政八年，雖高喊一邊一國，但亦稱李登輝做不到的，我也做不到，始終不敢改變憲法一中的架構。台灣人講台獨，並非真要鬧革命，只是愛叫囂，叫囂可以讓統一的声音沒有喘息的餘地。長久以往，小孩子受媒體影響，逐漸稱大陸為中國、認中國人是外國人，此種國族認同的變質，對未來的統一自然種下不利的因子。

許多善良樸實的台灣人，也許不認同統一，但也並不主張台獨。根據歷年來台灣官方的民意調查，

無論如何都主張立即統一的，與無論如何都主張立即獨立的，始終各佔約一成左右。台灣絕大多數的民意是七成人主張的維持現狀。然而，在這七成人當中，他們的意識光譜仍會不定時朝獨或統的方向挪移。過去十年來台獨勢力攻入王師大鳴大放，使得他們又往獨的方向愈加趨近。促成他們靠向獨這個方向的，就是台灣人普遍存在的扈從心理，選擇屈從聲勢浩大的社會主流。這種樂隊花車式的從眾現象，套句台灣俗語，就是西瓜偎大邊，靠向看似強大的那一邊。

了解了台灣人此一扈從心理，我們便可解釋旺旺中時不夠統的原因——在同時受到內部台獨老臣及外部獨台主流的夾攻下，旺旺中時頓感孤力無援。因為在台灣內部，已經沒有比旺旺中時更統的媒體了。所以，我們必須儘快地在台灣社會扶植一個純正的統派媒體，作為旺旺中時及更多台灣社會潛在統派勢力的領頭羊。這個勢頭是要靠我們透過媒體去掀動起來的，在這個勢頭成功起來之後，才能帶動廣大的台灣人隨波逐流。

其實，美國學界近年來強調的軟實力，就是以硬實力為後盾，用自身的文化、經濟、政治制度、價值體系去吸引對方遵循。今日的中國大陸，在經濟成就及軍事力量上已絕對足夠支撐對台的軟實力，我們必須對這一點充滿信心。旺旺中時產生之後，中天新聞台開放新中國每日對大陸定期報導、文茜世界周報對大陸各地建設深入介紹，確實帶動了TVBS、東森新聞等台也跟進製作一個又一個中國大陸的專題欄目。這便是西瓜偎大邊的一個體現。去年十一閱兵之後，軍容壯盛的景象透過台灣媒體送達台灣人眼前，更有不少台灣年輕人對一個強大的祖國產生欣羨。美國運用軟實力使世界許多人認為自由、民主、人權就是普世價值，同樣地，對台媒體工作也能使台灣人無形中認為傾向大陸就是一種時勢風潮。

台灣社會有沒有統派

我們許多人都在問：台灣到底有沒有統派？統派還剩下哪些人？在台灣搞純正的統派媒體有人看嗎？無庸置疑，台灣當然存在著統派。在1990年代之初，台灣尚有近六成的民意是支持統一的，經過李登輝及陳水扁台獨的操弄，統派的声音才逐漸轉弱。那麼，當初支持統一的人到哪兒去了呢？絕大部分的人受制於台灣高漲的台獨氣燄，躲藏在獨台的圈圍裡、或者根本成為了獨台的一員；另一部分的人則繼續高喊統一，孤獨地搖著統一的大旗。至今仍在統派陣營裡的，有台灣第三大黨新黨，也有中國統一促進黨、中華愛國同心會、中華四海同心會等小黨。

不可諱言，這些統派政黨的組成分子以外省籍老人為主，裡頭又多是較為激進的人士，使得社會大多數人望之卻步。然而，我們也不能忘記，台灣還有一大群躲在獨台圈圍裡頭的潛在統派。他們包括學界教授、藝文名人、商業鉅子等等。這些人是必須透過一個媒體搭建平台讓他們發聲的。如果今天台灣能有一個規模像樣的媒體，就可以讓這些潛在統派敢於公開他們的立場。《旺報》在成立之後，短短的時間裡便聚集了台灣各界對兩岸關係、祖國統一關心的有識之士，共同對於兩岸統合乃至統一提供意見。由此可見，潛在統派的勢力是不可小覷的。

我們今日要在台灣關建的統派媒體，並非成天成日地宣傳統一，而是模仿香港鳳凰衛視的定位，透過

文史、娛樂各類型的節目傳送大中華的意識型態，扭轉台灣人的獨台意識。馬英九就任之後，不但沒有領導國民黨擔負起撥亂反正的民族大業，反而落入獨台的圈圈，倡導“中華民國就是台灣”的論述。去年三月，時任台新聞局駐多倫多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新聞組長的郭冠英，因在網絡博客上用筆名發表支持統一的文章，竟被民進黨立委揪出來批鬥，最終遭國民黨的馬英九政府予以免職處分。如此看來，國民黨和民進黨，一個獨台，一個台獨，追根究底都在打壓台灣統派的生存環境。

馬英九的兩岸政策，強調先經後政、擱置爭議。當馬英九繼續放任台獨勢力囂張、愈趨向獨台論述靠攏時，我們不禁要懷疑：先經後政會不會變成只經不政，擱置爭議會不會變成擱置統一。我們應該結合台灣的統派力量，他們當中不少有理有則，是最好的掃毒軟件，可以把乾淨的計算機串聯起來，對國家統一和平長遠發展做最好的雲端計算，保存國家發展的資料和動力，載運國家在無縫的鐵軌上高速前進。一個純正的統派媒體，就是結合統派力量的最佳平台。

對台媒體工作的對象及目標

因此，為了更好地貫徹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方針，對台工作應該進入一個更加有的放矢、有所作為的新時期，更加積極主動地影響、改變，進而是塑造台灣的民意，建立一個純正的統派媒體正是這方面的重要努力。中國大陸自身實力的不斷提升為這種轉變提供了物質與精神的支撐，台灣特殊的政治及傳媒生態也為這一目標的實現提供了可能。我們不能沉迷於馬英九上台後兩岸一時的春暖花開，更不能自滿於旺旺中時在台灣內部帶起的兩岸熱潮。

具體而言，可以將重點放在這樣一些群體身上：

一、大陸新娘。據統計，當前台灣至少有40萬以上的大陸新娘，如果將其配偶與子女計算在內，其人數將極為龐大，是未來影響台灣政治的重要因素。大陸新娘在台灣往往社會地位偏低，缺乏歸屬感，對於大陸抱有深厚的感情，因此，未來的統派媒體將很容易吸引這個群體的關注，也能夠成為這個群體的精神歸屬。一個強大的統派媒體的存在，對於提升大陸新娘在台灣的社會地位也將發揮正面作用，而這又將反過來提升統派的力量。

二、尚未或是初獲投票權的年輕人。這個群體更為注重個人的現實發展，意識形態色彩較淡，投票的傾向尚未確立，應該加以積極爭取。兩岸關係的性質與現狀決定了年輕人必然將越來越多地關注中國大陸，統派媒體的存在可以滿足其了解各種大陸資訊的需要，同時亦能在潛移默化中培養其對大陸的好感。同時，應該在這部份人中積極塑造了解中國大陸，等於了解整個世界，等於具備國際視野的觀念，使關注、討論中國大陸成為一種時尚。在台灣其他媒體對於中國大陸報導遠遠不夠的情況下，統派媒體有可能吸引這部份年輕人的關注。

三、統派或是潛在的統派。接續前文所述關於台灣統派的生態，在當前的台灣政治生態中，這部份人在台灣的力量往往被低估。實際上，如果有合適的平台與契機，這部份人的潛能將得以被激發。統派的學

者、知識份子可以在統派電視、報紙、雜誌、網絡、廣播等各個渠道發文、發聲，其價值追求與現實利益能夠實現有機結合。

就目標而言，則可以分為這樣幾個部份：

- 1、為統派提供發聲、發文的平台，使統一不再成為台灣的政治禁忌。
- 2、強化潛在統派的統一傾向。
- 3、改變台灣的媒體生態，迫使其他媒體製作更多關於大陸的節目，使其從獨的一端向統的一端移動。
- 4、逐漸消除台灣人對於大陸的種種偏見。

當然，以上所列的對象及目標都只是短時間內所能預期的。建立一個純正的統派媒體，只是整個對台媒體工作的基礎，一旦等到她在台灣站穩腳跟，便能帶動更多的統派媒體扈從，進而壯大統派在台灣主流論述中的聲勢。這一效應是無可限量的，將會比台灣內部政黨輪替更徹底地改變台灣社會的統獨生態。

結語

胡錦濤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三十周年的重要講話中，特別提到“在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台灣同胞將同大陸同胞一道，共用一個偉大國家的尊嚴和榮耀，以做堂堂正正的中國人而驕傲和自豪。”無疑地，要貫徹寄希望於台灣人民，就必須給台灣人民信心，使台灣人民感受到統一是值得期許的，身為中國人是值得驕傲的。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需要台灣人民的力量，台灣人民更應為參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自豪。一個真正的統派媒體，必將承擔起這個喚醒、凝聚台灣人民，進而走向兩岸統一的光榮使命！

兩岸應和平競賽不應軍備競賽

台灣中國文化統一促進會理事長 任昌鼎

第二次世界大戰無條件投降的德國與日本，半個世紀後都國富民強，反觀戰勝國的我們，卻瞠乎其後，時至今日，中國大陸人民生活雖已改善，台灣經濟仍處於艱困狀態。德、日之富裕，原因固有多端，但追本溯源，應歸功於不必負擔龐大的國防經費，將全部資源投注於經濟建設，財富成幾何級數增加。而號稱兩大超強的美國與蘇聯，天文數字的軍費開支，前者被拖得經濟蕭條，赤字與年俱增。後者土崩瓦解。

海峽兩岸雖自一九五八年以後已沒有正面作戰，但長期軍事對峙未消，五十多年來在軍費上的開支，大概沒有人能算得清楚，更糟的是兩岸的武器來源，都非自產而需外購，結果是苦了納稅人，肥了工業國，若能將購買軍火的費用用作社會福利，升斗小民的日子將會好過得多。

由於資訊取得不易，中國大陸年度國防預算編列幾何，我們不得而知。但最近外電報導，中國大陸正向獨立國協洽購買航艦與戰機，交易額應在十億萬美元以上，雖然這些武器並不全然拿來對付台灣，但台灣一直是中國大陸最大的假想敵，應是不爭事實。

台灣的國防經費歷年來都高達百分之廿五左右，每年度政府總預算用於武器採購數字均甚龐大。近年來由於美國限制對台軍售，海軍艦艇與空軍戰機多已超齡，必須汰舊換新，目前的物件是法國的幻影或以色列的戰機，包括後勤裝備金額龐大難以估計。

海峽兩岸都不富裕，十二億人口更嗷嗷待哺，既然彼此已有經貿往來，何不開誠佈公同步削減國防經費，將有限資源用於民生建設，以中國大陸的龐大人力，台灣的科技經驗，戮力同心和平發展，若干年後，中國人將會脫胎換骨，傲視全球，實現先人“振興中華民族”夢想，豈不美哉、壯哉！

“台灣關係法” 不利兩岸統一應終止

美國Dominican大學教授 李志鍾

美台維持現狀立場與“台灣關係法”之適用，為和平統一之一大阻撓，必須變更與終止。

美國 Clinton 總統曾說過三不：(1) 不支持台獨；(2) 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3) 不支持台灣參加以主權國為主的國際組織。但諱言台灣統一。馬英九先生亦有三不：(1) 不統；(2) 不獨；(3) 不武。台灣本是一事實上獨立政權，何獨之有？不武，台灣無力與中國作戰，故依賴“台灣關係法”，售台武器。不統乃是關鍵，與美國立場一致，維持現狀。繼“三不”後，馬又提出了五個堅持：(一) 反對“反分裂國家法”；(二) 捍衛“中華民國”主權，台灣的尊嚴與主權性；(三) 台灣的前途必須由台灣人民自己決定；(四) 執行三不；(五) 推動兩岸和平共榮。特別是第三個堅持，為美國六大保證的180度大轉彎。這是採用Randall Shriver薛瑞福之建議。以前的“九二共識”，各自表述，但大家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至於如何統一，則各說各話。現在馬英九先生失言“不統”，似已修改了“九二共識”。

其實兩岸統一，亦非美國所樂見。兩岸統一有美國參與其事，其成就一時恐難實現。胡錦濤主席曾說過，美國可扮演兩岸戰略關係上的重要角色。美國不支持統一，可從以下幾點來驗證。

一、美國維持現狀的主張，等於不支持統一。陳水扁的公投入聯，目的在求法律上台獨。美國官方認為台獨就是變更現狀，亦就是戰爭，必須避免。當時國務卿 Condoleezza Rice以及副國務卿 John D. Negroponte先後疾言指責，公投是挑撥性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指責，卻同時出售給台灣軍火。言詞的指責，不過是口頭風光而已，無補實際。

二、Bush總統 2000年上台初期，有一派支持台獨者入政，包括前國防部部長Donald Rumsfeld，以及Paul Wolfowitz、Douglas Feith、Steven Cambone、Lawrence DiRita、John Bolton等。國防部幾乎每週都派人赴台，共謀策劃。其中John Bolton（曾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2007年在台灣發表演說，支持台獨，並主張台灣應加入聯合國。並說如果台灣真的宣佈獨立，中國亦無可奈何不會動武。

前美國在台協會主席 Terese Shaheen曾說美國不支持台獨，亦不反對台獨，為此一中會曾去函駁斥。近年來前美國議員 Dan Tancredo於2007年提出法案，主張承認台灣，與台恢復邦交。2008年眾議員Steve Chabot提出決議，取銷對台灣高層官員訪美的限制。美國國會議員 Gus Bilirakis等九名議員上函Bush總統，要求取消一中，又眾議院於2008年3月5日，以401對1票，通過決議，支持台灣的選舉，以及台灣的民主政權。同年又有三位眾議員去函Bush總統，不要反對台灣的入聯公投。

三、Obama總統上台以後，與Bush總統作風不同，但對台政策依舊，最近根據“台灣關係法”決定售台軍火，導致中美兩國戰略會議中斷。去年11月在台協會主席Raymond Burghardt對台保證，美國有責任保衛

台灣。今年5月國務院副助卿Joseph Donovan唐若文指出，美國反對兩岸任何一方變更現狀。前駐台協會主席Richard Bush亦在今年6月在台演講中，持同樣立場。

四、此外有一些智庫人士，雖不明言台獨，但不支持統一。Bonnie Glaser女士即不支持統一。Dan Bumenthal卜大年及Randall Schriver薛瑞福則認為中國軍力的擴大，以及中國在國際上孤立台灣，實不利於美國在亞洲的利益。主張美國與台灣加強高層聯繫，以免中國誤解美國將放棄台灣。J. Bumenthal 曾任職國防部。Shriver 曾任職國務院。Shriver 主張修改一九八二年Reagon 總統對台的六大保證，加強美國對台的支持。他建議修正六大保證之一：台灣之前途由台灣人民自決之，被馬英九先生採納為五個堅持之一，已見前述。

Michael Cole 則認為他們是鷹派，並不是台灣的真正朋友，支持台灣是維持美國的霸權。台灣是不沉的航空母艦，用以圍堵中國，並且游說銷台軍火。

五、美國軍方認為中國軍力的快速發展與擴大，是對美國的威脅。RAND 的報告指出，台灣可能是中美衝突的導火線。中國可能用反進anti-access 戰略，阻止援台美軍，美國必須設法因應。美國中美經濟安全評論委員會，每年向國會提出報告，報告指出，為保衛台灣，國防部與台灣須有實質上的軍事交談，並應與台灣討論有關威脅分析及軍力部署等問題。前美國太平洋總司令Timothy Keating曾多次指出，中國的軍力增強，又不透明化，美國必須加以防衛台灣。軍方的考慮是，台灣如與中國統一，勢必大為削減美國在亞洲的勢力，是有損美國的利益。

在此附帶一提，1951年因為韓戰及防衛台灣，美國劃了一道台灣海峽中線（北緯 23到27度，東經 119到123度）。韓戰早經結束，美國與台已無外交關係，並廢除了1954年的中(台)美共同安全條約，美國既已承認一中，這一中線也應予廢止。

美國的對台政策可歸納為：(一) 遵守三個公報，承認一個中國，不反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二) 維持現狀；(三) 根據“台灣關係法”，繼續供應“防禦性”的武器予台灣。維持現狀，實質上是反對統一，亦是確保台灣為一事實上的獨立政權。美國對台政策是建設性的模糊。美國遵守三個公報，確認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之一部份，這是建設性的一面。但是模糊的一面是，並不明言台灣與中國統一，亦不確定美國是否出兵協防台灣。

“台灣關係法”之制定，干涉他國內政，是違反國際公法之立法。亦不無違背美國憲法之處。三個公報與條約有同等之效力，對於以前提到的Dan Tancredo提出法案，主張承認台灣，與台恢復邦交，一中會曾去函駁斥，應遵守公報的規定。公報為一行政協議 Executive Agreement與條約不同，無須經過國會同意，但其效力則與條約同，有美國最高法院判例為據。根據美國憲法，公報亦為美國之最高法律 supreme law of the land。

“台灣關係法”規定售台軍火。一九八二年中美公報，有關軍售者，有以下規定：(一) 美國重申，不

侵犯中國之主權與領土完整，不干涉中國之內政及不推進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政策；(二) 不執行售台軍火長期政策，不超越前售台軍火之質與量；(三) 中美兩國將盡力解決售台軍火問題。其規定明顯與“台灣關係法”抵觸。公報與“台灣關係法”，同為法律，根據後法優於前法準則，“台灣關係法”與以後簽訂公報有抵觸之處，應以公報為準。統一是中國領土完整的基本國策，不容絲毫動搖或放棄。誠如前國務卿Madeleine Albright在其書“給當選總統的備忘錄(Memo to the President Elect)”中所說，統一台灣是中國的底線，新任總統與中國胡錦濤主席討論國是，如反對統一，支持台獨，則一切免談。

和平統一，任重道遠。是一項非常艱巨的工作，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走，但要有信心，假以時日，必可水到渠成，完成統一大業。為此，本會今後將致力於：

- (1) 積極推動統一，促使美國朝野對一中及統一有正確的認知與支持。
- (2) 美台維持現狀立場，就是事實上的台獨，必須促使變更。
- (3) “台灣關係法”與“上海公報”抵觸之處，應依公報為準；美國“台灣關係法”干涉他國內政，違反國際公法，不無違憲之處，必須促使終止。



新形勢下反獨促統工作思考

巴西中西部地區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 宋南屏

兩岸關係自從國民黨的馬英九執政以來，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進入了和平發展時期，以經濟貿易、民眾往來為特徵的兩岸關係發展，基本上比較順利的。目前的形勢，可以說是兩岸60年來最穩定最好的時期。

先經濟後政治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可靠、可行的路線圖，但與此同時，如何營造有利兩岸政治進一步接觸的客觀氛圍，如何讓兩岸民意早日脫離對立的怪圈，如何讓兩岸民心同歸於和平與發展，則需要兩岸各界人士凝聚共識，共同努力，早日創造一個兩岸同胞之間“人通、情通、心通”的新三通大環境。

怎樣才能讓兩岸“一中”各表，過渡到“一中”同表。從歷史與現實的瓶頸中突破出來，創造兩岸開啟政治談判的良好氛圍，均是新形勢下有效開展反獨促統工作的思考重點。

如何才能突破兩岸和平發展的深層次問題瓶頸，已經日益突現出來，“經熱政冷”的現狀還應該持續多久？兩岸政治談判何時啟動？掃除兩岸關係中的誤解和誤判，兩岸民意的溝通，如何看待兩岸關係，“等不得”與“急不得”之間的難點，台灣意識不等於台獨意識，台灣意識不同於民粹主義，正確對待台灣意識與兩岸關係；客觀對待台灣主體意識 尊重台灣意識，反對分裂祖國之間如何平衡。美國在兩岸關係上態度和影響在發生變化的程度範圍。

前不久，台灣朝野領導人馬英九和蔡英文在“雙英辯”之後，不約而同地釋放出動作。首先是馬英九在接受CNN專訪時強調，台灣永不要求美國為台灣與中國大陸作戰。一天後，蔡英文又公開表明，不排除在不預設任何政治前提之下，和中國大陸進行直接對話。

馬、蔡兩人釋放的資訊雖說在時機上是巧合，而且內容上也沒有彼此邏輯關係，但卻折射了一個深層原因，即在兩岸關係在經過一段時間的穩定之後，對無論是國民黨、民進黨還是中國大陸來說，其實都已經到了一個需要認真思考的關鍵點。如何掃除兩岸關係中的誤解和誤判，有三個問題值得人們深層思考。

第一、如何認識馬英九。就對馬英九的認識而言，不同立場的人似乎對其都有不滿。無論是台灣內部有人說“馬英九親中國大陸”，還是中國大陸有人說“馬英九是變相台獨”，顯然都失之偏頗。撇除馬英九面臨的內部困境及其各人性格上的因素，馬英九施政過程中的中道、理性和謹慎的風格，似乎一直為許多人所忽視。

第二、如何看待未來美國、中國大陸和台灣三方關係。馬英九在強調兩岸和平穩定，反對美國參戰的同時，又強調台灣需要美國武器維持兩岸和平。這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如何看美台軍售的問題。從台灣內部角度看，美台軍售及其所代表的美國對台支持是維持兩岸和平唯一的法寶；從中國大陸角度看，美台軍

售是破壞兩岸和平的重要因素。但坦率講，兩者都未能觸及兩岸安全結構的本質。

第三、如何建構一個建設性的兩岸關係。其中既包括中國大陸如何跟馬英九互動，同時也包括中國大陸如何與民進黨以及與以民進黨為代表的台灣綠營民意的互動。畢竟，兩岸關係存在兩個結構性問題：一、兩岸的政治定位問題；二、台灣民意的主體意識，以及在此基礎上的綠營民意和更小一部分台獨極端思潮。

最後，解決台灣問題，如何既照顧到中國大陸的民意，同時也照顧到台灣的民意，而且照顧到台灣問題在整個地區戰略格局中不可回避的微妙角色。所有這些都是馬英九一不小心便打破戰略格局之後，各方應進一步警惕與思考的問題。

加強兩岸民意溝通夯實兩岸關係基礎

就民進黨方面而言，蔡英文表示願意與中國大陸不設前提對話，不管其背後有多少選戰的考慮，其實同樣折射了民進黨在兩岸關係上的困境。由於中國大陸的迅速發展和地區戰略角色日趨重要，民進黨已不可能對大陸採取“鴛鴦心態”，這就是民進黨十年政綱願意就其大陸政策展開討論的背景。但對中國大陸而言，與民進黨及其代表的台灣綠營民意對話，恐怕也是無法長期回避的問題了。

就目前而言還很難設想，在可預期的未來中國大陸會在民進黨不願意放棄台獨黨綱的情況下，願意跟它展開全方位對話。但如上所述，兩岸關係雖然近兩年大幅改善，但有兩個結構性問題不容回避，即兩岸政治定位和台灣綠營民意。兩者本質不同，但在台灣目前時空背景下卻又相輔相成，互相影響。

如果說兩岸政治定位是兩岸關係中的前沿工程，其課題之敏感和難度之大都可想而知，那麼中國大陸與台灣綠營民意的對話則是兩岸關係中的基礎工程，它需要花費更大的心力，也需要更為耐得住寂寞的心態。必須指出，綠營民意其實是一個不甚嚴密的表達。對今天的台灣而言，主體意識是跨越藍綠界限，尤其是台灣年輕一代的主流意識，其對未來任何一位元台灣領導人都會形成某種牽制作用。

就目前而言，兩岸關係雖然在第一步非敏感議題上進展不錯，而且許多內容也已深深嵌入到兩岸關係的深層結構之中，未來民進黨很難即便上台也很難立時推翻，但必須承認，兩岸關係的更為重要和深層的問題並未解決，甚至尚未觸及。因此，如何讓兩岸關係不可逆轉，仍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兩岸關係：“等不得”與“急不得”之平衡

對中國大陸來說，兩岸關係發展至今，實際上處於“等不得”和“急不得”的兩難之中。首先，雖然許多人對馬英九有諸多不滿，但畢竟馬英九是台灣六十年來對兩岸關係最有建樹的領導人；然而馬英九的任期是有期限的。若馬英九2012年無法連任，那麼一切都無從談起；即使他2012年能夠連任，最多也就能夠連任一次到2016年。屆時，兩岸若還不能就未來發展達成一個相對合理的框架，那麼兩岸關係出現逆轉的可能性就不能完全排除。這就是兩岸關係的所謂“等不得”。

然而，兩岸關係的任何框架又都受制於台灣內部民意的整合，尤其是台灣主流民意對其領導人的牽

制。而恰恰無論是台灣內部民意的整合，還是兩岸民意的溝通和化解，如上所述都是極其艱巨的基礎性工程，這又是所謂的“急不得”。這種在“等不得”和“急不得”之間的茫然，在最近大陸的對台學者思維中也有所反映。去年下半年，有大陸對台學者發表文章，認為兩岸政治對話的時機已經成熟，而其關鍵就是簽訂兩岸和平協定。但也有大陸對台學者接連撰文認為，兩岸關係有其內在發展規律，大陸方面必須尊重這一客觀規律，不要在不適當的時機提出不適當的議題。這種觀點區分了“和平發展期”與“和平統一期”兩個不同的概念，認為兩岸關係即使進入“和平發展期”，它的長期性複雜性艱巨性基本特徵依然沒有改變，兩岸關係依然將在曲折與反復中前進。這種觀點同時認為，要仔細研究馬英九的政治性格及其處境，不要把“和平統一期”的任務提前到“和平發展期”來完成。

兩種觀點各有其內在合理的邏輯，實際上都是對兩岸關係根本邏輯的深層思考。當然，兩岸關係還有另一種邏輯，即隨著中國大陸繼續發展，無論是中美戰略態勢還是台灣在其中的籌碼都會發生微妙變化，時間應該在中國大陸一邊。但這一邏輯假設因素過多，即便具有合理性，也不意味著兩岸關係其間就可完全無為而治。因此，任何現實主義者都還是應建基於目前兩岸關係的結構來思考問題。

“胡馬會” 眾望所歸、大勢所趨

近年隨著兩岸關係的發展，“胡馬會”成為熱議的話題。美國台北辦事處前處長包道格不久前提出，明年十一月美國在夏威夷舉行亞太經合峰會時，可以考慮邀請馬英九以國民黨主席的身份參加，屆時可與胡錦濤見面。奧巴馬總統若能做到這一點，則無異於達成了胡馬奧的三贏局面。包道格的這一建議提出後，立即在兩岸間引起關注。

面對台灣藍綠、中國大陸三方人士的觀點和民調結果，並綜合兩岸結構性認知障礙以及台灣內部的共識和分歧可以看出，“胡馬會”在兩岸現有政治關係上仍是一個高度敏感議題，但從全球華人的樸素情感出發，卻又是一個眾望所歸、大勢所趨的議題。因此，現階段需要的不是在兩岸間豎起新的認知藩籬，而是考慮如何巧妙拆解現有障礙，以策略和藝術逐漸達成中華民族歷史上的偉大和解。

中國大陸與馬英九各自須做些甚麼？

現在要做的是，如何在包括“胡馬會”在內的一系列技術議題的操作上，謹慎伴隨這一良性進程的發展，而非再以各自保守的立場將其扼殺於萌芽狀態之中。毋庸諱言，大陸和台灣內部各自都有不少保守思潮和勢力，民進黨內部的台獨基本教義派和大陸內部的“甯左勿右”思潮若短兵相接，則兩岸關係必將陷入長久惡化的局面。相反，若能陪伴和培養雙方理性力量的成長，那麼兩岸關係就可能步出困境，走向光明。

因此，大陸在台灣雙方各自都有一些需要克服的障礙。對大陸來說，能否接受馬英九不以國民黨主席，而是以台灣經濟體領導人的身份，不但涉及到馬英九能否整合內部民意，而且也涉及到大陸能否爭取台灣全體民意或主流民意。至於美國的角色，既然從聯合制約陳水扁台獨開始，台灣問題部分國際化就已是趨勢，那麼繼續“船借東風”運用美國因素，就應該成為中國大陸在兩岸關係趨緩之後的戰略思路。

對馬英九方面來說，在中國大陸釋放上述善意的基礎上，就應該在內部果斷整合。2012年，胡錦濤將卸任中共總書記，馬英九也將競選連任，雙方都有留下政治資產的決心，因此2011年11月的“胡馬會”對雙方都是機會。

當然必須考慮的是，明年11月距馬英九競選連任還有四個月，馬英九即便有意參加“胡馬會”，也必將考慮這一行動對其競選的正負面效應。惟其如此，馬英九和兩岸從現在起就必須在化解台灣內部藍綠對峙上花功夫。在這方面，馬英九任重而道遠，中國大陸同樣有許多工作要做。中國大陸與民進黨的對話若能放在這一框架下思考，就能獲得不少戰略元素。

人們有理由謹慎期待，若中國大陸從現在起，一方面著眼於繼續給馬英九籌碼，另一方面則著眼於與已開始微妙調整的民進黨展開良性互動，那麼一年半後籠罩在台灣上空的藍綠對峙和籠罩在台海上空的大陸與民進黨的對峙，有可能得到緩解；屆時，也許馬英九參加“胡馬會”反而會為其競選連任加分。

尊重台灣意識與反對祖國分裂如何平衡

對於兩岸關係的現狀，台灣方面一些人士可能忽略了這樣一個問題：按照民主原則，人口數量佔大多數的大陸人民應當在兩岸關係問題上起主導作用，而不能說2,300萬台灣人民有權單獨決定台灣前途命運。比如說，如果大陸人民不希望台灣獨立，台灣方面就應當“少數服從多數”。從大陸的利益和意識形態來看，大陸方面不可能允許台灣獨立。就意識形態來說，正如鄧小平說到香港問題時講“絕不當李鴻章”那樣，不管誰執政，都不可能接受丟失領土的國恥。就利益角度來說，起碼有一點，允許台灣獨立就等於是需要出海通道的中國大陸自己把門封住了，這是不可想像的。顯然，如果讓全體中國人表達意見，“獨立”不可能被允許成為台灣方面的選項；台灣同胞只要站在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角度看問題，也不會同意台灣獨立的。

因此，所謂“台灣前途由台灣2,300萬人民決定”的提法，如果說它也包含了合理成分的話，那麼，它並不是無條件的。

作為既往事實的一個側面來說，台灣的事情也可以說是由2,300萬台灣人民自己決定的：台灣地區領導人是台灣人民自主選舉的，台灣領導人的任何重大決策也是他們自己作出的，並沒有受到別人的左右。但是，必須指出的是，這並不是事實的全部。儘管台灣內部事務未受到直接干預，但祖國大陸並不是一個無動於衷的旁觀者。可以說，2,300萬台灣人民之所以能夠作出這樣那樣的“決定”，是因為這些“決定”沒有超出13億大陸人民認可的範圍。看上去是“台灣人民”在作決定，但事實上13億大陸人民也“參與”了決定，而且事實上這一“參與”具有決定性意義。如果看不到這一事實，那是目光短淺；如果否認這一事實，那就可能是誤解或錯覺；如果回避這一事實，則就是自欺欺人。可以說，這也是“一中各表”基礎上兩岸關係現狀的一個重要方面：至少就現實而言，只要不超出一個中國的範圍，台灣前途可以也應當由2,300萬台灣人民自己決定。

同時，“台灣前途由台灣2,300萬人民決定”也可以在這樣的意義上去理解：台灣的將來不管怎麼樣，

很大程度上就是台灣人民自己選擇的結果，如果結果不好，只能說“腳上的泡是自己走出來的”。比如說，一部分人想要走台獨的道路，假如大多數台灣人接受了這樣的選擇，其前途可能就是戰爭，那麼，這樣的結果當然也可以說是“由2,300萬台灣人民決定”的。當然，這個假設是不存在的，大多數台灣人民並不要戰爭，所以，兩岸關係走上了和平發展的道路。從這個意義上說，說台灣前途由2300萬台灣人民自己決定，只是說別人代替不了台灣人民自己的選擇；在兩岸關係特別是台灣問題上，13億大陸同胞按照民主原則和實力原則應當發揮主導作用，但2,300萬台灣同胞則必須發揮好主體作用；

台灣意識是台灣人民在特定的政治、經濟環境下產生的一種特殊的社會意識，有其深刻的歷史和現實原因。台灣意識內涵包括熱愛祖國、熱愛家鄉的愛國情感，也包括淒苦辛酸的悲情，還包括當家作主的“出頭天”心理。台灣意識的發展對兩岸關係走向融合具有促進作用，但是極少數台獨分子異化台灣意識中的悲情心理、“出頭天”心理，煽動和鼓吹台灣獨立，阻礙兩岸關係的正常發展，致使台獨思想成為影響中國領土統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個毒瘤。大陸要把統一的基點建立在順應和爭取台灣廣大民意的基礎上，加大海峽兩岸在各方面交往的力度，不斷推進社會、政治體制改革，發展經濟文化，只有這樣才能增強大陸對台灣的吸引力，也才能最終實現祖國統一。台獨思想與台灣意識是相互聯繫又有著本質區別的兩個概念，從台灣意識本質涵義上看，我們尊重台灣意識，充分理解台灣人民當家作主的心理，因而貫徹“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方針決不改變，但是堅決反對一切形式的台獨活動。台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一部分，台灣的歷史、文化是中國歷史、文化的組成部分，台灣意識也具有中國意識的特徵，台灣地處中國東南沿海，作為一個緊靠中國大陸的島嶼，2300萬台灣同胞的生活與幸福離不開中國大陸。

警惕台灣政治的不確定性

台灣“陸委會副主委”趙建民3月31日在淡江大學作“當前政府的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專題演講時說，“大陸對台灣永遠是威脅”，“台灣與美國關係優於兩岸關係”。這些表述從大陸的角度來看，有相當的部分是令人訝異的。是否會對正在進行的ECFA協商產生不利影響，值得觀察。

趙建民說，兩岸現在就是做生意，跟統一沒甚麼關係，僅僅就是做生意。對此，台灣當局如果只這麼看，就把兩岸的經貿發展、經貿交流，尤其是大陸採取的對台灣的一系列讓利、優惠措施都說成是做生意，就降低了它的意義了。

如果僅僅從做生意的角度，兩岸之間就不會存在讓利不讓利、優惠不優惠。正是因為大陸把台灣民眾真正看成是自己的同胞，有這種同胞的情誼，才会有這麼多的對台優惠政策的出台。不是從做生意的角度，而是從兩岸一家人，同胞手足的角度，才会有這麼多讓利優惠的措施。

兩岸關係很不容易有了今天一個好的氣氛，兩岸都有責任和義務把兩岸關係的未來往好的方向來推。台灣有關負責官員不應該做有損於兩岸互信、有損於良好氣氛的事情。值得關切的是，趙建民演講的題目是“當前政府的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他的上述不妥言論究竟是他個人的意見還是當局的政策？恐怕台北要有個說法，不然會對兩岸良性互動產生負面影響。

兩岸和平統一展望芻議

台灣中國全民民主統一會執行委員 黃希魯

台灣經歷了五十年的日本教育和國民黨四十年的反共論述，將與大陸、台灣兩岸的鴻溝，拉得既深且闊，短時期內想完全平復，談何容易。近三十年來對兩岸該如何走向？學者名家的高論車載斗量，多不勝數。筆者不揣愚陋，亦將往昔一貫主張，略加整理，就教方家。

1988年台灣領導人經國先生辭世，李登輝繼任，人心浮動。台灣中國廣播公司舉辦一次徵文比賽，題目是“中國(台灣)往何處去？”筆者提出三點意見：在經濟上大膽西進，(當時台灣錢淹腳踝)我們要掌握大陸的經濟命脈，一如華人掌握印尼的經濟命脈。其次強化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的交流，甚至要強化到可以在彼此領域發展組織的境地。最後便是和平統一，至於誰統一誰？則完全視諸人心向背而定。

2002年10月，我隨王化榛先生一行，到北京與相關人士晤面，建議兩岸交流(對台部份)四大策略；以經濟戰為前鋒，武力戰為後盾，以心理戰為主，政治戰為手段；同時對台灣大大小小的資本家，都要想方設法把他們吸引到大陸來投資，讓他們儘量嚐到發財的甜頭，知道交流的好處。

2006年12月本人在澳門向中國大陸智庫建議：盡量不要開口閉口都提“統一”這個名詞，因為一談到“統一”，台灣人就以為大陸要把台灣吞吃掉。所以我們只是團結海峽兩岸四地的炎黃子孫，大家一起齊心協力，共創大中華第三次共和，孫中山先生推翻滿清為第一次共和，共產黨推翻國民黨為第二次共和，而今我們謀求中華民族的完全統一，為第三次共和。真正完成共和大一統以後，我們的國號、國旗、國歌是甚麼？由四地人民共商決定，我們誰也不統一誰。至於國家的政治制度，採一國多制，四地各維持原狀。同時還對台灣提出17條願景；1至4條談必須更改部分，5至8條為維持原狀者：1、除憲法以外所有法律不變。2、所有政黨活動與政治制度維持不變。3、除總統、國防、外交、情報、國安、和駐外使領館以外，所有官署、官銜、職掌、一律不變。9至16條為讓利部分：1、不向台灣人民徵糧納稅。2、不要台灣人民當兵服役。3、不派人到台灣做官。4、不在台灣駐軍。相反地我們歡迎台灣人民到大陸求學、謀職、做官、定居。最後一個期盼，期盼台灣將省下來的國防、外交、情報、軍購等經費每年約七千億元，用之於基礎建設與社會福利上，用10年功夫將河川水患土石流等狀況徹底防治好，將台灣建設成一個旅遊勝地。同時還有一項特殊優惠，即台灣特首可兼任中央政府副主席，從中央的高度專營台灣工作，每年亦可以國家領導人的身份出國訪問，以加強台灣與國際的交流，繁榮台灣經濟。

台灣人多有健忘症，若一貫施惠，他以為是理所當然而無感戴之心，所以還必須視情況在收放與寬鬆之間，好自拿捏，巧妙運用，使人民領悟和諧社會的好處，及對官僚政客與游離份子的乖謬行徑產生厭惡，我想這對催生兩岸四地共創大中華的一統，必將有所裨益。

2010年看海峽兩岸關係發展趨勢

台灣中華海峽兩岸新聞事業交流協會理事長 許水樹

台灣當局自馬英九先生上台執政已逾兩年，儘管島內還存在諸多對執政當局不滿的批評和雜音，然觀察馬先生上任以來大力推動兩岸之間各項交流互動與開放合作，所創造出的成效和商機，凡我大中華子民都應給予高度的肯定、支持和讚揚！

在歷經全球金融海嘯的劫難中，海峽兩岸之間的關係難能可貴的創造出突破性的發展。如從兩岸定點包機直航提升到常態性航班的雙向直航，大陸地區目前已開放了20幾個城市口岸可以直飛台灣；大幅開放大陸居民到台灣觀光旅遊。去年大陸居民到台灣觀光旅遊已近一百萬人次，今年5月4日台灣方面的台灣海峽兩岸旅遊交流協會（簡稱台旅會）正式在北京掛牌成立辦事處，同月7日大陸方面的海峽兩岸旅遊交流協會（簡稱海旅會）由國家旅遊局長邵琪偉先生代表在台掛牌成立辦事處，同時宣佈：開放大陸地區最後六個省份（甘肅、寧夏、西藏、新疆、內蒙、青海）的居民即日起得以申請赴台觀光旅遊。至此大陸地區30多個省市自治區已全面開放赴台旅遊，為兩岸人民的往來互動掀起了歷史性的大浪潮，更為台灣的旅遊相關服務業者，帶來空前的巨大商機！

有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除了大批旅遊客湧向台灣外，更由各省市地區的政黨一把手親自率領黨政官員、社團代表和企業界人士等大批團隊，紛紛到台灣交流、考察、招商、採購和觀光旅遊，較具代表性的有：09年第一波由廣西壯族自治區主席馬飆先生率領的1,500人；江蘇省委書記梁保華先生率領的近3,000人；河南前省委書記徐光春先生率領的3,000餘人；今年由上海市長韓正先生帶領的近1,000人；湖北省委書記羅清泉先生帶領的約3,000人；四川省委書記劉奇葆、福建省長黃小晶、浙江省長李祖善、陝西省、河北省等各地區一波波的大團隊不停地開拔到台灣！這般熱潮的現象足以讓關心兩岸關係的全球華人同胞感到無比的興奮和信心。

在開放兩岸相互投資的設限上也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台灣方面除大幅開放企業到大陸投資40%的上限外，也逐步開放技術含量較高的項目赴大陸投資設廠。台灣方面除原已開放陸資到台灣投資的房地產外，目前更有多家大陸企業申請到台灣落戶投資，雙向投資局勢已逐步形成。

兩岸農業項目的合作也進入緊密而全面的階段。大陸當局為新農村建設項目出爐了許多重大而有力的政策，也釋出了龐大的建設基金，大力扶持新農村的現代化發展。台灣的現代農業科技，正是大陸地區可以借鏡與合作的，近三年來大陸當局陸續核批了10幾個國家級的“海峽兩岸高科技農業合作試驗區”和10幾個“台灣農民創業園”，大力推動兩岸農業科技合作，唯配套尚有不足，雖具合作發展空間，成效仍有待努力。

目前在福建地區火熱上場的“第二屆海峽論壇”台灣地區各界到會的人數就超過1萬人，創造了歷史新紀錄，同時在福建省八大城市分別舉辦為數十個專業領域的論壇和會展活動，全面開展兩岸合作洽談與對接，其中不乏來自台灣各黨派高層和民意代表。“海西經濟特區”這張牌可以說成功的邁出了第一步。尤其在金融的論壇上，中國社保基金會理事長戴相龍先生宣佈，計劃將中國社保基金的一部份投入台灣的金融證市場，如可順利操作，勢必將為台灣的金融證市場，創造可觀的利多條件。

台灣的媽祖文化代表團，為這次的海峽兩岸論壇掀起第一波的高潮。由台灣媽祖聯誼會所組織的“湄洲祖廟朝聖活動”數以萬計的代表以搭船“宗教直航”方式直通湄洲島。我們深信“媽祖”將在兩岸“和平統一”的工程上，扮演起超級和平使者的身份與使命，做出巨大的影響。台灣是一個宗教充分自由，信徒遍佈全島的地區，而台灣眾多廟宇所供奉的神明絕大部份來自大陸地區，所以未來兩岸和平統一的工作，宗教將是一項非常重要且具重大影響的一環。筆者在10餘年前加入從事推進兩岸交流工作時即提出此一觀點，所謂三通的另一詮釋，就是“路通、人通、神也通”。

其他在經貿、新能源科技、文化產業、教育、生物科技、醫療保健等各方面，兩岸交流也都進入了更全面與深層的對接，且已取得良好的勢頭！相信在我大中華子民心手相連，共同努力的創造下，兩岸共謀發展必將取得更加輝煌的成績！和平統一之路也將更為快速與可期！大中華民族傲揚國際之日必將很快到來！



對新形勢下反獨促統的思考與建議

歐洲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主席 張曼新

我十分榮幸參加“全球華僑華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會（2010·中國香港）”的盛會。

今天的大會，少長咸集，群英備至，規模宏大，氣勢雄偉，充分顯示了全球華僑華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反對國家分裂的堅強意願和不可阻擋的力量。

今天的盛會，令我情不自禁地回憶起10年前由歐洲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發起和主辦的首次全球華僑華人推動中國和平統一(柏林)大會。那次會議，共有來自64個國家的649名代表參加，中國全國政協、國家十幾個部委及七個省市自治區代表與會；台灣海峽兩岸和平統一促進會和7個不同黨派的代表和統派人士與會；還有來自香港、澳門的代表以及五大洲的代表。第一次全球華僑華人推動中國和平統一大會，標誌著以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為基礎的海外廣大僑胞在反獨促統這一重大歷史問題上已達成共識，走上了團結和聯合的道路。大會結束僅三個多月，全球推動中國和平統一組織就自發成立了50多個，尤其是中南美洲一些尚未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國家，也都紛紛建立起了反獨促統的社團組織。一個由海外華僑華人民間組織在五大洲自發聯合發起的這一場聲勢浩大的反獨促統運動在世界範圍內的興起，充分向世界證明全球華僑華人繼聲援辛亥革命、抗日戰爭之後，掀起了又一次愛國主義的浪潮。這不是某一次大會的功效，而是歷史發展到關鍵時刻全世界絕大多數華僑華人自覺的民族情感的發酵，中華文化理念的宣揚。

如今，柏林大會已過10年。這10年來，兩岸形勢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台海上空似呈雨過天晴之象；在台灣，反對分裂國家、堅持一中理念，漸成主流民意，台獨勢力日趨暗淡無力之勢。這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球中國人共同努力的結果，也是海外華僑華人“以僑促統”的明顯成效。但是，國家尚未統一，我們還任重道遠，不能有絲毫的鬆懈。

當前，兩岸關係的發展態勢展示了新變化、新機遇，但也仍然存在著新的風險。一方面，大陸在國際影響、政治穩定、經濟發展等方面都發生了顯著的提升，尤其是近年來相應發展的兩岸交流，給兩岸人民帶來了實惠。但另一方面，台灣特定的政治生態、以及根深蒂固的“本土意識”，使台獨勢力，仍然具有再次萌發的土壤。

因此，兩岸當局應高度默契堅持一中理念不可動搖、兩種政體相互尊重、三個交流（經濟、文化、政治）循序漸進的基本方針，在較短時間內完全結束兩岸敵對狀態，在較長時間內完全實現國家和平統一的願景。這主要基於以下幾個因素考慮：

一、台灣放任台獨勢力發展的政治政策：

台灣社會自1970年代以來，受到“中華民國”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合法地位的喪失及中國國民黨的政治制度的缺陷而日益突出的政治影響，台灣“本土意識”及“本土民主化”異軍突起，形成了“台灣本土化”的政治環境。隨著李登輝對“台灣本土民主化”的八年政治操作，打著“台灣民主本土化”旗號尋求台灣獨立的政治勢力具有了政治土壤。在主張台獨的民進黨堂而皇之的獲得了台灣領導權後。台獨勢力和台獨意識得以快速發展和強化。儘管馬英九代表中國國民黨在台灣再度執政以來，官方對台獨言行有明顯收斂，但對台獨的危害仍缺乏打壓的依據與手段。有時仍然不排除把台獨勢力當做與大陸談判的政治籌碼。這使台灣的台獨勢力仍然保持著重整旗鼓捲土重來的幻想。

二、台灣執政當局執行“不統”的兩岸政策：

馬英九執政以來，顧忌國際政治勢力遏制和分裂中國的戰略意圖，以尊重台灣民意為藉口。試圖在“不統”的政治前提下長期維持現狀，這給和平統一的發展道路增添了潛在的威脅，因為在國家統一的道路上，恰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所謂的“維持現狀”，實際上潛伏著巨大的風險因素。在“不統”的前提下兩岸簽訂“和平協定”、大陸協助台灣“拓展國際空間”及開展兩岸“結束敵對狀態”政治談判等等以及“先經貿再政治”的兩岸關係總體發展路線圖，這一切又再一次挑釁大陸的耐心和政治底線，考驗大陸當局的政治智慧。也不得不引起期望祖國早日和平統一的海外華僑華人的關注與擔憂。

三、大陸執行“寄希望台灣人民”的兩岸政策：

大陸從穩定和發展有利於中國統一的國際政治經濟發展環境的角度出發，以“政治照顧”台灣2,300萬台灣民眾根本利益為宗旨，希望通過不斷深化兩岸經貿文化交流的方式，希望在兩岸不斷融合的歷史條件下，以增強兩岸各階層政治互信和廣泛共識為基礎，寄希望馬英九執政當局能遏制或削弱台獨勢力的發展，期望泛藍陣營能制約馬英九執政當局制定的危害兩岸關係及中華民族利益的政策和權力，以培養和發展台灣維護兩岸統一的政治力量為根本，通過循序漸進的方式實現兩岸的民族融合（即“兩岸反獨促統”）、民族統一（即“兩岸形式統一”）、民族繁榮（即“兩岸實質統一”）。

以上我們可以看到，大陸在制定實現兩岸統一戰略方向正確的。但問題、困難和風險仍然是巨大的；更客觀地講仍然缺乏從根本上制約台灣當局游走於法理台獨或事實台獨的強有力的手段。

由此看來在台灣的核心上，中國大陸缺乏在台灣實現兩岸和平統一的政治戰略支撐點。在整個兩岸統一的發展戰略中，大陸在相當程度上受制於台灣執政當局的政策和台獨勢力的發展以及台灣對立政治勢力。基於台灣長期的、特殊的政治發展演變路線，及兩岸長達近60年的歷史隔絕、仇視和對立，台灣維護統一的政治力量不斷式微、宣導民族融合和統一的政治群體不斷弱化是不爭的事實。這就造成大陸實現兩岸和平統一的政治目標必然會受制於台灣執政當局和台獨勢力的發展。尤其是在兩岸和平統一的力量小於兩岸武力統一的力量歷史環境下，如果大陸不能利用十年的兩岸關係發展的機遇期，實現和平統一將失

去可能。原因很簡單，假如兩岸建立互信和共識需要一年的時間，那麼破壞兩岸互信和共識僅僅需要一天的功夫。最終一切和平統一的力量都消失殆盡的時刻，就是不得不武力統一的歷史到來。

所以，兩岸在反獨促統的歷史階段，在實現兩岸人民情感融合的歷史過程中，最根本的核心任務還是需要長期不斷地增強和發展兩岸和平統一的力量，千方百計的遏制和削弱試圖分裂中國的內外台獨勢力的發展，實現兩岸和平統一具有絕對的主導權和控制力。實現以上戰略意圖，有志於促進中國和平統一的人士必須清醒地認識到，要維護兩岸的長期穩定與逐漸融合，必須在兩岸之間共同完成相互認可的政治戰略的發展支撐點。該政治戰略支撐點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若干條：

1、維護兩岸不分裂狀態、促進統一；2、維護兩岸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3、維護絕大多數台灣同胞的根本利益；4、維護台灣特有的政治和社會制度；5、逐漸改善或者完善大陸與台灣各自的政治環境；6、實現台灣主流民意由保持現狀到維護統一的政治轉變；7、建立和擴大兩岸廣泛的政治互信和共識；8、努力在兩岸深入人心建立中華民族復興的戰略目標；

因此，我們海外華僑華人和港澳同胞要在新形勢下對兩岸的和平統一有一個新的認識，我們既不能過於樂觀地估計形勢，錯誤地以為目前台灣是統派執政，而鬆懈了反獨促統幹勁，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忽略台灣社會的特殊政治生態，用簡單的民族感情去針對複雜的兩岸政治關係。下面，我就加強海外僑務和反獨促統工作提出自己的一些意見和建議，以供參考。

1、要繼續加強僑務和反獨促統工作的領導，整合各涉僑機構的力量，建立健全有關工作協商制度，積極探索並創新僑務對台和反獨促統工作的新思路、新辦法。有必要建立統一的僑務對台和反獨促統工作領導小組，明確其功能定位，各涉僑部門都參與其中，提高對台和反獨促統工作的實效。邀請海外重要的華僑華人參加全國政協會議，通過海外僑胞穿針引線，進一步挖掘5000萬僑胞中蘊藏著的僑力資源和工作潛力，借助海外華僑華人反獨促統的力量，在其所在國家和地區政府、國會及主要傳媒宣傳中國政府在解決台灣問題上的一貫方針政策及誠意，進一步壯大海外反獨促統的聯合陣線。

2、及時全面的調整對台政策。從寄希望於美日、寄希望於聯合國、寄希望於泛藍勢力，充分調整到寄希望於台灣人民、並主要依靠大陸人民和海外華僑華人以及大陸實力、意志、決心的政策來，扭轉統一干擾發展、統一與“發展”對立的錯誤看法，樹立統一是發展重要的組成部分、統一推動發展的發展觀統一觀，把解決台灣問題的時間表和方法的主動權決定權牢牢的掌握在中國政府和中華民族的手裡。

3、放棄模糊立場和曖昧態度，公開聲明終止與台灣分裂勢力的各種聯繫，給予時間表要他們明確地放棄分裂中國，台灣獨立的立場，承認並同意在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基礎上發展兩岸關係。要大張旗鼓的處理個別的典型的台獨台商或記者藝人，用行動展示反獨促統的決心和意志。另一方面，應吸收持堅定的兩岸統”立場的現戶籍在台灣的人士參與全國人大、政協。

5、嚴厲打擊台灣分裂勢力，細膩關切台灣民生。在國際場合嚴厲打擊分裂行徑的同時，必須更加直接

更加細膩的關切台灣的民生問題。從民生上讓越來越多的台灣民眾找尋理性與希望，感受台獨的痛苦和代價，從參與和推動兩岸統一，感受到統一的好處與尊嚴。要剛性反獨，柔情促統。在加快與台灣CEPA實施的同時，制止台灣分裂勢力和國際反華勢力搞分裂中國擴大化的陰謀，有步驟的以經濟的法律的手段，打擊支持兩岸分裂的台獨商人。鼓勵台灣的經濟力量脫離台灣分裂勢力或放棄對台灣分裂勢力的支持，制止他們對分裂的幻想。

6、為增強海外台灣民眾對祖國大陸的了解，應該鼓勵在海外建立有台灣同胞與大陸同胞共同參與的僑社僑團，有計劃、有步驟地發展聯合的隊伍，在國際上與台灣民眾一道多層次、多形式、多內容的合作，促進台灣僑民與祖國大陸僑民的民族認同感和身份共同感。

最後，我要強調的是，隨著海外華人在國際社會中政治影響力的逐漸增強，海外華僑華人在促進與維護祖國統一過程中的作用將會日益加強，我們應該堅持不懈地努力，為祖國的統一大業和海峽兩岸的共同繁榮發展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一中三憲、兩岸統合”與兩岸互信

台灣兩岸統合學會秘書長 謝大寧

兩岸整整一甲子的分隔，其間歷經了內戰與三、四十年的武裝對峙，即使後來短暫的融冰，但數十年的互相醜化與仇視，又豈是短時間內所可化解。再加上近十幾年李登輝與陳水扁對台獨議題的操弄，兩岸的互信自然更是雪上加霜。從前國共只有左與右之意識形態的對峙，可是現在兩岸則更增添了統獨的對峙，而當這兩種對峙在台灣政治裡被相互運用時，也就是右成為獨的論述工具時，要談兩岸的互信，那就幾乎是緣木求魚了！

然而這兩年隨著國民黨在台灣重新取得執政權，兩岸的交流卻有一日千里之勢，這現象意味著甚麼呢？究竟是甚麼因素促成了兩岸得以突破原來的瓶頸呢？是兩岸已經擁有了完整的互信了嗎？底下我即想約略分析一下其中的關鍵因素。

維持目前兩岸交流狀態的互信基礎

就我的觀察，兩岸之所以能從複雜的對立因素中，快速地進入目前的全面交流狀態，除了有各自內部發展上的需要之外，還有幾項足以促進雙方互信的政治基礎。

鄧小平先生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主張，無疑是兩岸得以有今天局面的最重要基礎，正是這個主張，為大陸解放了思想，也為兩岸之間創造了已出台或者未來將出台的所有可能性。而且它也具體地在港澳經驗中，展現了成效。雖然說，這個主張從出台以來，它在台灣一直就沒有很高的評價，但是它至少解開了兩岸屬於“左右”這一意識形態上的對峙。大陸不只以一套新的論述，也同時以它在港澳的成功實踐，讓台灣很難再單純地以左右的問題來阻擋大陸的和平攻勢。我以為，正是由於這樣一個主張，讓兩岸的鬥爭轉向到統獨的問題上，也就是說，左右的問題從此退居到次要的，戰術性的戰場上，統獨的對峙不只在台灣內部，也在兩岸的戰線上，成為了主要的問題。我始終覺得這一轉換是具有關鍵歷史意義的。

這也就是說，從最直接的角度上說，鄧小平先生的主張也許並未能立即促進兩岸的互信，但它卻是催化目前全面交流之關鍵性鎖鑰。換言之，在拉開了一定的時間跨距後，我們的確看到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之主張的重要功能。

一九九二年國民黨通過的“國統綱領”無疑是另一個具關鍵性的歷史文件。這個文件論其本身的內在結構，其實是充滿矛盾與妥協意味的，所以有人常戲稱它乃是“國家不統一綱領”。然而無論如何，這份文件確立了幾個關鍵性的兩岸定位問題。首先，它的名稱確定了國家統一仍然是國民黨政府追求的目標；其二，它確立了“中華民國”仍在一中憲法的架構下；其三，國民黨政府仍然確立了它在中國主權範圍內的正統地位，它不是一個偏安的政權，只是一個暫時僻處一隅的政權而已。這樣的定位無論其誠意如何，

至少在形式上，它讓兩岸仍然回歸到左右的問題上，而避免了統獨的對峙。如此一來，結合了鄧小平先生“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主張，基於此一主張給了左右並存的空間，兩岸就立刻從敵我矛盾轉成了人民內部矛盾，這就避免了你死我活的鬥爭。

連戰先生的破冰之旅。“國統綱領”制定後，中間曾經整整出現了超過十年的曲折，這曲折總括來說就是，第一，“中華民國”已經從追求國家統一的總目標上漂移開了；其二，一中憲法的架構也逐漸遭到侵蝕；其三，國民黨政府已經逐步轉變成了從偏安到獨台的政權，其後的民進黨政府則更是從獨台逐步滑向了台獨。於是兩岸遂又進入了完全的敵我矛盾之中。〇五年連戰先生以在野黨主席的身份往訪大陸，才終於重新為兩岸啟動了一條紐帶。從現在的角度看，連戰先生的訪問，事實上達成的關鍵任務，就是讓國民黨重新回到了“國統綱領”之上，並讓大陸充分相信至少國民黨會充分奉行國統綱領的基本原則，這點乃讓兩岸又有了轉進到內部矛盾的空間。

國民黨的重新取得政權：這點當然已經沒有必要申論，然而也必須在此強調的是，當馬英九先生當選台灣領導人，原則上就代表了“國統綱領”重新成為中華民國政府的論述基礎。雖然說馬政府成立以來，事實上並未恢復國統會的運作，但馬政府在所有兩岸定位的論述上，的確是依照“國統綱領”的邏輯在陳述的，只是它一直將之稱為“一中各表”而已。

對目前兩岸互信基礎的評價

以上我簡單歸納了幾項促成兩岸目前交流狀態的互信基礎，綜合來說，也許可以將之濃縮成為這樣一句話，就是基於“和平統一，一國兩制”與“國統綱領”所存在的交集，使得兩岸找到了某些共同的政治基礎，以推動雙方的各項交流。這個交集也可以簡單表示為主權重疊，治權分立，終極統一，基於主權重疊，所以兩岸現階段仍然無法互相承認；但基於治權分立，所以兩岸實質上也互不否定。這裡當然必須強調清楚的是，雙方互不承認的是對代表中國主權的各自主張，互不否認的則是對雙方各自管轄範圍的有效治理能力。而這種互不否認的默契，則是來自於“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政治宣示，與國統綱領所內含的中國終將統一的保證。

而我們現在可以問的問題是，這樣的互信基礎是否足夠強固？此一基礎能夠將兩岸的交流推進到多遠？在我看來，就上述基礎而言，只要國民黨仍然掌握台灣的執政權，其基礎在可預見的時間內，還是強固的，特別是馬英九先生守法的特質，讓他完全無法逃避憲法一中的規範，所以我們將很難想像在法律面前馬政府有動搖其基本立場的可能。然而也正因為如此，所以這樣的互信基礎，其功能至多只能推動兩岸在經貿文化等層面的交流，而不可能僅憑這樣的互信就能跨越鴻溝，而進入政治層次的協商。這道理是很簡單的，任何政治的協商都不能避免要問來談的人你是誰問題，而只要兩岸仍只在互不否認的階段，真正的政治協商就不太可能展開。這樣說當然不是說兩岸只有進到可以互相承認了，才有進入政治協商的可能；由於兩岸的主權是重疊的，所以它根本就沒有任何互相承認的可能性，因為一旦承認了對方，自己也就喪失了存在的合法性。但雖說如此，思考某種比治權上互不否認這樣的政治基礎還要更進一步的可能

性，仍是可能的，只是國統綱領並沒有給出這樣的可能空間，一國兩制的主張對這個問題而言，其內涵也依然是模糊的，所以這就造就了目前這種有局限性的交流狀況。

於是，這就形成了一個非常詭異的局面，也就是某種“互信超載”的情況似乎正在發生，因而有可能為兩岸帶來重大的危機。怎麼說呢？其實這也是很好想像的。我所謂的互信超載，所意指的乃是兩岸目前其實只有低度的互信，可是由於交流的速度和廣度太大太快了，由之而引生了過高的互信期望值，而由此一期望值使我們常會忽略許多仍然存在的困難與阻力，因而當任何挫折發生時，都可能返回來挫傷了原本就已經只是低度的互信，從而促成了危機。因此，為了避免這種互信超載的現象，我們乃有必要先來看看目前兩岸互信中所存在的隱憂。

兩岸現階段互信基礎中的隱憂

此處我想談的隱憂，並不包括台灣所存在的台獨思想與勢力，因為這已經不是隱憂，而是顯性的威脅，這一面向已經不必再做任何申論了。我想談的乃是另外幾個面向：

台灣的逐步偏安化：這是一個很人性化，也極難處理的問題。偏安幾乎是中國歷史上所有相同處境之朝廷的共同宿命，之所以會如此，乃是有著幾個基本共同成素的。其一是“暖風薰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我們看東漢竇憲北征以後，南匈奴南遷內地，遷進來就不想回去了，為甚麼呢？因為南邊舒服，何必再去忍受塞外風寒呢？同樣的，東晉南遷，不到百年，王羲之之類的北方士族，就完全忘了故國河山，南宋不也是如此？這原因很簡單，南方膏腴之地，何苦只為了回到故鄉而拼命？而且另一個面向也更現實，那就是兩三個世代以後，究竟何處是故鄉呢？連馬英九都曾公開說，親人埋骨處就是故鄉了，這不就是心理上的土斷嗎？這個後現代的時代，原本就有文化斷裂的問題，再加上這十幾年台灣教育上刻意的去中國化，這些都讓台灣與大陸的文化紐帶有種難以接續之感。現在台灣的年輕人，已經很難再有對中國發展的使命感了，這如何能不成偏安的溫床呢？而偏安心理最嚴重的影響，就是認同的加速撕裂。事實上今天很多人都意識到了台灣在認同上與大陸的撕裂現象，這是所有民調一致的結論，而且這現象越來越讓人覺得，如果沒有突破性的作為，已經難有逆轉的可能。

台灣對兩岸政治關係不切實際的期待：這種期待是和偏安心理密切相關的，從偏安的心態導致了某種消極的維持現狀的想法。台灣的歷次民調，在兩岸關係上主張維持現狀者，穩定地超過八成。但是我們都知道，現實的政治場域、現狀永遠都是動態的，因此我們如果掌握不住動態的關鍵因素，沒有現狀是維持得住的。可是在台灣，非常奇怪的是，在公共論域裡，幾乎沒有人談應該如何才能維持住現狀，相反的，它只是要求大陸必須要尊重現狀，不能侵犯到任何的現狀。這其中最典型的講法就是“一中各表”的說法。

一中各表如果就“國統綱領”來說，是沒有問題的。國統綱領制定的時期，兩岸正處於將接觸未接觸的狀態，那時當然只能以互不承認，各說各話的方式處理。而以目前的狀態來說，如果兩岸還沒有意願進入政治協商，那就也只能還是各說各話。然而現在的問題是台灣頗有要將一中各表設定為政治談判之底線

的企圖，除此之外，就視之為是對台灣的傷害，也視之為是大陸對台灣不尊重、不體諒的表現。這樣的想法姑且不論大陸能否接受，如果推究其基本思維，就是一種將現狀固定化的企圖。換句話說，台灣並不想去考慮如何處理動態的現狀，而是只想靜態地將現狀凍結在某個結構裡，如此台灣就可以自己過自己的日子了。此所以我說它是一種消極的維持現狀的策略之故。

其實如果我們對歷史熟悉的話，當年鄭克塽和康熙談判的過程，是不是和目前的狀況有些似曾相識呢？

大陸以類比港澳的模式來思考兩岸統一的問題：大陸當然十分清楚，港澳的問題和台灣不同，所以在技術層次，絕對不會以類比的方式來處理兩岸問題，這是可以確知的，但是很難保證大陸不會在思維習慣上，仍以某種回歸的方式在思考整個問題。在我看來，這樣的思維模式確實存在。如果我們姑且不管台灣是不是應該回歸祖國的問題，而純論這樣一種思維背後的心理認知的話，它就不容易有一種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的寬容與自省的心態，也不容易以一種開放這個大家庭的方式，來歡迎、邀請那個在外的遊子來共同參與這個家庭的經營。它比較像是一種照顧式的家長心態，布置好一個溫暖舒適的房間，來安排遊子回到家中。而這樣的照顧看在遊子的眼中，卻很可能只會覺得不自在，也不容易有回家的感覺，於是結果就只是讓雙方覺得尷尬而已。這樣的尷尬很容易讓大陸覺得台灣不知好歹，因而無法體會台灣的某種不知道該如何融入這個家的彳亍之感，這就容易衍生誤會，從而導致互信的崩潰，以至釀成危機了。

綜括來看，兩岸由“和平統一，一國兩制”與“國統綱領”架構起來的交集所營造出來的互信氛圍，如果一旦面臨上述所說的幾個隱憂的話，我們都將很容易感受到目前雙方互信基礎的脆弱，比如說馬英九先生採取了“國統綱領”的論述，卻根本不敢恢復國統會的運作，與其說是因為台獨陣營的牽制，還不如說是偏安氛圍的影響所致。這也是我一直以為現在兩岸蓬勃的交流，其地基並不是一個穩固的岩盤，而只是個浮游的沙灘的緣故。然則我們該如何來建立一個比較穩固的互信基礎呢？

兩岸問題最根本的問題是認同的問題

我們認為，兩岸問題最根本最棘手的問題還未必是政治談判的問題，而是認同的問題。在台灣，如前所述，認同的斷裂現象，已經幾乎到了積重難返的地步了，所以我們乃想到了兩岸不只是需要交流而已，還必須在兩岸儘可能地創造各種“共同體”式的機制，也就是不只是交流與整合，還要更積極地尋求“統合”之道。因為許多研究都顯示，交流對促進認同，其成效是相當有限的，而歐盟這幾十年來的經驗告訴我們，共同體式的機制確實有助於促進歐洲各國人民對歐洲的認同，所以我們應當借鑑此一經驗，以重新彌縫那已經瀕臨崩毀的兩岸認同。在我們看來，這才是現階段兩岸最急迫的工作。

而我們覺得，共同體的設置，還有一個同樣重要的考慮，那就是既讓台灣與大陸重新取得聯結，也讓大陸把整個中國崛起的目標與過程同時開放給台灣，讓台灣同時擁有對中國的話語權。這也就是說台灣這個遊子不是回家作客，而是兩岸一起當中國的主人。如此一來，當兩岸可以從一些低度政治性的共同體開始，逐步累積了彼此的共事經驗，培養了共同為中國崛起而奮鬥的感情，也許才能真正為統一鋪平道路。

這也就是說，兩岸統合作為我們主張的最核心部分，也是我們最要去實踐的面向，正是針對我上述所說的第一個和第三個隱憂而發，這兩個隱憂解除了，才能消除掉影響兩岸互信的心理障礙。

然而，如果要想在兩岸間推動各種共同體，就不可能不先解決一些政治難題，特別是那最核心的兩岸定位問題，兩岸一定要尋求某種彼此皆可以接受的，但必須是共同表述的中國概念，否則所有的合作都將不可能展開。而如所周知的是，這是一個最需要創意的地方。而我認為、“一中三憲”可能是迄今為止出台的所有兩岸定位主張中，最明確、具體而又有可操作性的主張。它不像一中各表的只企圖固定現狀，也不是屋頂理論之缺乏拘束力。此一主張的核心精神，乃是將兩岸定位在“由兩岸加起來所構成的整個中國下的兩個平等的憲政實體”這樣的基礎上，這就維持了現狀，但又超越了現狀。其維持現狀的面向是兩岸的憲法架構不變，彼此尊重對方的治權；其超越現狀的是兩岸都從屬到整個中國的架構之下，中國的主權得到了完整的保障。然而光是如此說是不夠的，為了使整個中國的概念不至於虛化，不會只是個屋頂，一中三憲的主張引進了第三憲的概念。這第三憲並不直接是一部完整的憲法，它是在既存的兩個憲政實體的架構下，通過諸如兩岸和平協議來確認彼此對整個中國的權利與義務，並以之為樑柱；再通過各種共同體協議的堆疊，而逐步架構起來的兩岸統合模式。如此一來，整個中國就成為一個可以與兩岸現行架構並行，並且實體運作的概念。而且，在這第三憲運作成熟完整後，它也可以在兩岸的協議之下，轉成為最高的憲法，到那時，當然也就是中國統一水到渠成的時候了。

關於這樣的想法，我們也可以說，它正是將鄧小平先生“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創見轉個方向的實踐。因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想法是兩岸先和平統一以後，再以一國兩制的方式安排兩岸。可是以兩岸目前的狀況來說，要想直接先進入和平統一的狀況，是有實質困難的；而若我們先以整個中國之下的兩個憲政實體這樣的一國兩制出發，經過上述第三憲的轉接，再逐步過渡到一中（整個中國）一憲，這不就正是“一國兩制，和平統一”嗎？因此，我以為“一中三憲，兩岸統合”的主張乃是平穩過渡到“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最好方法，也是對鄧小平先生之創見的合理補充。

而對本文言，最重要的一點是，通過“一中三憲，兩岸統合”，我們才能消除掉兩岸互信中的所有隱憂，並引導兩岸來共同創造整個中國的未來。所以說，兩岸若是依照一中三憲來定位彼此，並將實踐重點放到兩岸的統合上，便將可以將兩岸從目前的低度互信，過渡到高度的互信，這應該是本文的合理結論。

“一國兩制”是台灣的最佳選擇

台灣中華統一促進黨主席 張馥堂

中華民國於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通過2758號決議後已在聯合國消失。台灣分離主義分子說“中華民國”既然已被聯合國趕出來，那就改以台灣的名義加入聯合國”。但台灣有史以來就屬於中國，從不曾成為國家。跟台灣有所謂邦交的巧邦其對象都不是台灣。聯合國歡迎世界上所有主權獨立的國家，不管國之大小均可以加入聯合國。人口只有13,048人(2005年)的諾魯共和國(Republic of NAURU)，人口只有11,636人(2005年)的吐瓦魯(TUVALU)早已是聯合國會員國，台灣地區人口有2,300萬人，如果是主權獨立的國家，早已經是聯合會員國了。

面臨統治中國267分之266中國國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要統一其國土267分之1的台灣，台灣當局只有選擇統一，台獨固然不可以，維持現狀也不行。維持現狀就是“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均違反中央人民政府於2005年3月14日公佈的“反分裂國家法”。台灣人民面前的路只有和平統一一條活路可走。但統一可以選擇一國一制或“一國兩制”。一國一制的行政機構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省人民政府。“一國兩制”的行政機構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特別行政區政府。

“一國兩制”下的台灣特別行政區政府——如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行政、立法、司法均可自主、自理，比聯邦制下的州(美國)、省(加拿大)、邦(德國)，有更高度的自治。聯邦制下的州、省、邦必須繳龐大的聯邦政府費用，司法的第三審(終審)必須到首都的聯邦最高法院，聯邦軍隊也進駐到每一個州、省、邦。“一國兩制”下的台灣特別行政區政府，不必繳給中央人民政府任何費用，司法有終審權，也可保有與中央人民政府對峙61年的軍隊，這是人類有史以來所沒有過的統一方式。

1984年“一國兩制”解決香港問題之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說“一國兩制是非常偉大的天才創造”。反共、反華的美國總統雷根說“一國兩制太寬大了”。1992年法國前總統季斯卡說“我深信台灣海峽兩岸將於20世紀末到來之前統一”。長期以來被西方右翼反動派利用的前西藏奴隸主達賴喇嘛，於1997年到台灣時表示“希望一國兩制能在西藏實行”。佔西藏總人口95%的前農奴、奴隸均已翻身，享受政治、社會、經濟、民主的社會主義一國一制的自治區。

2002年2月21日，美國前總統柯林頓在澳洲雪梨說“中國的統一不可避免，海峽兩岸統一事遲延只有增加台灣人民的痛苦”。同年5月18日，王永慶先生發表50字箴言，“台灣大陸是一國，大家都是中國人，說共產黨壞不是事實，台灣不要美國保護，台灣人不要給別人煽動，一國兩制有甚麼不好”。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曾指出澳門回歸象徵著本世紀亞洲地區一個時代的結束，也再次實踐中國“一國兩制”政策，港澳相繼回歸後，統一台灣問題應該可以透過談判解決，美國前總統雷根、布希、卡特、柯林頓曾經先後說過

“台灣應該接受一國兩制”。蔣經國的親信張世傑強調“一國兩制台灣佔便宜”。台灣既得利益統治階層佔大便宜，而台灣人民也因於統一後無須再負擔每年六、七千億元凱子外交費、凱子軍購費，而且可以和大陸同胞共享富強大國的光榮與利益。

馬英九經常強調，維持現狀是台灣的主流民意，但台灣希望維持現狀的民眾由於60年來被獨台、台獨當局的誤導，他們從沒有聽過看過統一的好處，而且他們都認為維持現狀不會太久，遲早會統一，絕不向馬先生說“我這一輩子看不到統一”。陳水扁所派的首任“行政院長”唐飛於2000年七月七日說“台灣不能維持現狀”7月21日又說“我再說一次，維持現狀這條路走不下去”。

2000年6月14日韓國前總統金大中說“兩韓的統一是無條件的，是具強制性的絕對責任”。前國家主席楊尚昆曾說“要和要戰台灣決定，但統一的時間由中央人民政府決定”。2008年12月31日“告台灣同胞書”30週年座談會上，胡錦濤主席發表“攜手推動兩岸和平發展，同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講話五千多字提及“和平統一”13次，提及“統一”14次。中央人民政府的對台政策已從反獨改為促統。台灣《天下雜誌》於5月14日的民調台灣64%的民眾希望兩岸簽訂和平協議。此一民調顯示，台灣有三分之二的民眾，希望兩岸早日進行政治協商，簽訂和平協議然後以“一國兩制”的形式和平統一，讓全球中國人看到祖國和平統一，共享祖國偉大的復興。



發揚兄弟情誼增進兩岸關係

台灣中華各省市同鄉會秘書長 馮撼山

我出生在蘇北，為家中獨子，每感無手足之情而遺憾之至。一九四七年秋，在內戰期間，係於萬不得已的情況下，離鄉背井，浪跡異鄉。這些年來，在茫茫人海中，接受無數的挑戰，常覺無手足之憾，而無奈和無助，也因此相識不少知己，彼此互相關照情同手足，分享“不是兄弟勝似兄弟”的手足之誼，誠屬難能可貴。

由於兄弟手足之情誼可貴，令我聯想到當前兩岸關係就是手足情誼關係。一九四九年間，由於戰亂竟使台灣兩岸人民分隔幾十年，如就血緣、地緣等關係而言，該是多麼不幸的事情！吾人皆知，兩岸人民本來就是一家人，兩岸民眾就如同兄弟手足一樣，他們本是同根生，都是中國人；兩岸人民既有血濃於水的關係，有甚麼理由不能解決彼此分割的難題呢？

兩岸民眾在實施三通之後，近年以來，為了進一步拓展兩岸關係，經常舉辦各類論壇活動，真心誠意的要傾聽兩岸人民的心聲，平等互惠的要凝聚兩岸人民的民智民意，採取去異存同的觀念，要去共同研討兩岸人民最為關心的議題，透過各類論壇活動之交流，相信也必能獲致兩岸人民雙贏之願景。

目前，當務之急，兩岸人民應在和平發展的大前提下，擴大兩岸民間各項合作交流，要把各類論壇活動作為交流合作的平台，要以文化、教育、經貿、科技、宗教活動以及旅遊等為優先交流項目，逐步形成兩岸民眾之共識，如此，必將有助於解決兩岸人民之重要議題。

兩岸民眾之交流，在彼此心理上，要有“您是我兄弟”之體認。在交流過程中，要坦誠相見、無話不談。在作法上，要能兼顧兩岸人民的福祉，達到互惠雙贏之效；因此，在要求上，必須多溝通協商，不宜有礙兩全之舉；如此，將能皆大歡喜，完成兩岸人民共同願望。

最近，兩岸協商的兩岸經濟合作協議ECFA，由於兩岸均有兄弟手足之誠意，彼此皆能為對方著想，正是兩岸雙方利用最好的智慧完成之重要議題，更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成功之傑作。兩岸在民間各項交流活動，取得相當進展之後，只要雙方具有兄弟手足之情，相信假以時日，兩岸對政治互信也會逐步加強，在和平發展及“九二共識”的前提下，吾人堅信“您是我兄弟”、“我們都是一家人”，如此，兩岸人民就有福了。且讓兩岸民眾竭盡所能，突破困阻，共襄盛舉。

中國必應“分久必合”之說

台海中華和平發展聯盟榮譽主席 王宗炎

台海兩岸同胞，同根同源、血脈相連，都是炎黃子孫，彼此具有不可分割的關係。我中華五千年歷史文化，雖歷經朝代更替、內憂外患，但強烈的民族意識、永恆的血源認同、綿延的文化傳承，建立統一的國家，始終是歷史的主流。

國父孫中山先生，為救亡圖存，奔走革命。辛亥武昌首義，推翻滿清王朝；孫中山先生為確保國家統一，實踐其建國方略，親自創辦黃埔軍校。黃埔師生精誠團結，並肩北伐，消滅軍閥，統一全國。此役為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的歷史成果。

日本帝國主義曾妄想侵略中國，於1938年7月全面發動侵華戰爭，國共兩黨為確保國家獨立，民族生存，在抗日聖戰中再度精誠合作，一致對外，全面抗日，獲得最後勝利，國共兩黨，黃埔師生，再度建立不朽功勳。

台灣在蔣經國先生主政後期，宣佈解除解嚴令，緩和兩岸對抗情勢，並開放回大陸探親，從此開啟兩岸交流之管道。大陸在鄧小平先生創導下，推行改革開放，近三十年來成果非凡，經貿起飛，工業發達，社會繁榮，財力雄厚，民生樂利，國勢壯大；喜聞大陸多次宣稱，對外不稱霸，對台不動武，全面釋出善意，至今兩岸交流熱絡，從民間至官方，從經貿至文化，多層面、多項目，絡繹不絕，呈現大好的兩岸新情勢。

在近代史上，中國人曾飽經世界列強之迫害、侵擾及欺侮凌辱。今天中國人精實壯大、屹立不搖。面對當前兩岸大好新情勢，全世界華人皆翹首期盼：中國人應精誠團結，國共兩黨應開誠佈公，履行第三次合作：鼎力促進兩岸同胞民族認同，全力推行兩岸各界加強交流與合作，促進兩岸雙方政治互信，化解台獨思潮，遏制台獨勢力，簽署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並肩在經貿，文化、科技、工礦、農林、漁牧多面性之交流與合作，為兩岸和平發展作出貢獻，共創雙贏，必應中國傳統哲學“分久必合”之說，建立富庶繁榮的大中華。

遺孤何以問蒼天 祈望兩岸共團圓

台灣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監事長 賴文鑫

小時候，祖母常背我到一個土堆前，我的記憶是那麼的清晰，哭了很久，紅了眼框，再牽著我的小手一步一步的走下山頭，走一段，背一段。到了小村前的河溝裡，祖母替我洗去了臉上的塵土，自己也擦乾了淚水，又恢復了她堅強的容顏，祖孫倆牽手走過那小村莊。

我們祖母在偏僻的山上，全講客家話，以為全世界都是客家人。也用客家話背三字經，上小學後我才知道還有國語，我才看懂了祖父墓碑上刻的祖籍是廣東大埔，才知道我的祖先來自祖國大陸。

祖國更是個遙遠而模糊的概念。那時台灣有一首歌：“家在山的那一邊”我的老家就在山的那一邊嗎？我們生活的很苦，小學畢業我以優異成績考到初中，但家太窮了，讀不起，下面還有四個弟弟。過兩年祖母的病重了，把我和爸爸叫到跟前，交代父親好好養大五個孫子。

我一直都和祖母睡一起。一天晚上她告訴我，一定要等到你有輝煌騰達的一天，才可以追問祖先的過去。我聽不懂，第二天祖母就過世了。爸爸到對面人家借了一些錢，就將祖母下葬了。其他親友趕到時已經來不及見最後一面。一堆人跪在祖母香爐前哭，確道出了驚人的秘密？我才恍然想起祖母夜晚那段話。我不敢問我不敢說，午夜夢迴時，是我心裡最大的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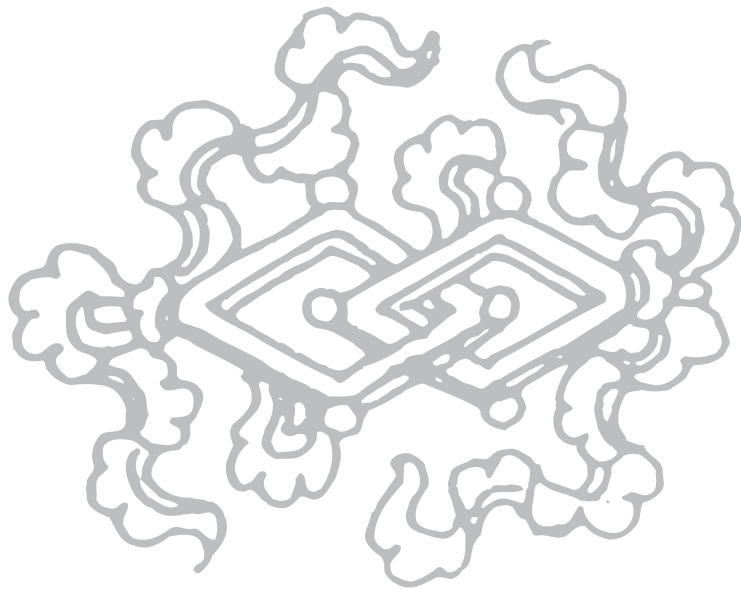
我長大了，我也自認很努力，堅忍的走過坎坷歲月。1952年我到了香港，到了夢幻裡的祖國。集團也在大陸辦了企業，九六年我在台灣元智大學開辦大陸投資實務課程，培訓來大陸投資之台商。兩千年台灣政黨輪替，我毅然接下台灣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監事長職務，開始研究兩岸的近代史。感謝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的關懷與協助，於台灣光復六十周年大會上與大家共同探討台灣的過去。也特別感謝台灣抗日志士親屬協進會連光輝會長與台灣名近代史專家協助。

我回台後拿了一本全國台聯出版台灣同胞抗日史實給我老爸看，我問他這些人他是不是有印象，他只淡淡的回答，你祖父死的時後我才幾歲，不知這麼多，我看的出來，我知道他不想談那段痛苦的回憶。他不知道我在祖母過世時，我就知道了。現在爸爸八十五歲了，偶爾在他口裏又喃喃說著這些親切又怕聽到的名字，我們父子間到今也沒說開這些。

十八年來我走遍祖國大地(除西藏外)。我也積極的投入和平統一的工作。我看了圓明園、大連、旅順。上月在全國台聯蔡書記王部長的帶領下，到了合肥，看了李鴻章的故居。那段不堪的往事又在我腦際徘徊。回台灣後收到和統會的邀請函，我就想要寫下這段不平靜的情緒，讓我無法下筆。這幾天參加了海峽論壇並做科技管理組的召集人及參加津洽會看了塘沽以後，回台看到兩岸經貿協定順利簽訂情緒也平和很多，一看截稿日期到了，也就做最後的論述與整理。

有強大的祖國，台灣的安定才有保障。台灣人民的福祉才能持續。每當祖國國力衰弱時，台灣因為有它的地理及各方的優越性，列強一定不會放過，兩岸的對立是中華民族的不幸與災難。唯有兩岸真誠合作到和平發展到終極和平統一，才是我們中華民族最大的成就與幸福。

如果歷史能夠重來，江水能夠倒流，當初的祖國大陸有今日的繁榮昌盛，一八九五的慘劇不會發生。我家族不會到這樣悲慘的地步。我沒違背祖母的遺願，今日雖談不上輝煌騰達，但也對得起列祖列宗。對得起國家民族。先人英靈不遠，我們也會繼續為祖國統一大業而奮鬥。隨著兩岸經貿協定的簽署，兩岸的和平發展又向前邁進了一大步，祖國的和平統一將會到來。



以“讓”爭取台灣大眾民心

台灣中國三民主義協進會理事長 黃家策

中國統一為海內外絕大多數中國人之共同心願，中國統一為歷史發展之必然。中國必須統一，中國也必將統一。問題是何時、如何統一，因為統一的途徑影響統一的時程。

台海兩岸統一之途徑，不外武力和非武力二者，以武力完成兩岸統一，是萬不得已的手段，其結果是魚死網破。對兩岸的傷害都將難以承受，非萬不得已，不可採用。依目前主客觀情勢，大陸“不可”、也“不必”對台動武。只有循和平統一的方向思考。

首先，大陸應認知“維持現狀”是台灣主流民意。台灣同胞所以要“維持現狀”並不是怕統一，而是怕統一後現狀的利益受損。更明確的說，他們擔心統一後，現在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準不保。對不確定的未來，有後顧之憂，這是他們對統一問題在心理上的根本癥結。若此結得解，和平統一自然水到渠成。解開這個結最有效處方，就是一個“讓”字。大陸對非洲國家，一揮手二百多億美元的債務不要了，“讓”的何其慷慨！令非洲人民感動、全球震驚！相較對台灣而言，大陸何舍近求遠？何厚外人而薄同胞？何吝於對骨肉相連、血濃於水台灣同胞的慷慨？而台灣人民所見的，是大陸對E C F A農產品關稅力爭，最後雖然是讓了少許，卻留下力爭的惡劣印象。它給台灣人民的感受是：“那是我們自己爭取來的”。怎會令人感動、感謝呢？未能主動“讓”在先，又讓不得其時，其效果自然大減。大陸對非洲“讓”的戰略用於台灣豈不更好？

對台灣不僅要“讓”，還要台灣人民要甚麼，就給甚麼，除了要求獨立外。甚至要五角給一塊。如此始可令台灣人民喜出望外，感到溫暖，感到放心。用一個“讓”字，既可化解其對“統一後利益受損”的疑慮，又可建立其統一後有益無損的信心，讓台灣同胞享受到統一紅利，始會堅信統一後會更好。屆時人民自會要求改變現狀，主動要求統一。這才是和平統一的快速大道。

大陸要用“讓”來表達對台灣一般人民的真心誠意，像對待家庭失散的子弟一樣關愛，對台灣的企業視同與上海浦東、廣東深圳等特區一樣呵護；擺脫政治權謀和統戰思維，養肥台灣這隻“金母雞”，將來不知會為大陸生多少金蛋。千萬不要有任何掏空台灣的圖謀，否則，大陸必將因此嘗到喪失台灣人民信任的重大惡果。今天大陸對台灣有太多可讓的條件與資源，若能拿出以對台動武可能耗費資源之半的預算，用作對台灣讓的籌碼，即可兵不血刃，贏得人心歸向，完成和平統一大業，還有甚麼比此更廉價的？

台灣實施民主選舉，政治人物所最在乎的是選票，和民調。而選票及民調的數字，多掌握在普羅大眾手中，所以統一的關鍵在普羅大眾，此一領域絕不可忽視，更值得耕耘。當前絕大多數的台灣人民除企業界外，並未感受到大陸對台灣曾經“讓”了些甚麼。如果大陸已經有讓過甚麼，也多半都被自己某些小動

作消費掉了，應該檢討對台工作績效，何以沒有反映在台灣的民調上。基於台灣此一社會背景的認識，今後對台工作應將部份努力轉注到普羅大眾。多接觸他們，多聽他們的聲音，多站在他們立場設想，多體會他們的感受。特別要多照顧他們的利益，此一領域的成效，若表現在選票與民調的數字上，將比當年工農赴湯蹈火踴躍參加解放軍的成就更大。

讓經常與忍結伴。忍受自己受損，主動讓或被動爭而後讓，效果是不同的。台灣參予國際組織時，主動引介，或積極支持與消極不反對，雖然都是讓，但其對人民感受是絕然不同的。總之讓的境界，一方面是以真情誠意的行動令對方內心感動，另一方面則是以實際利益令對方直接受惠。找機會對台灣慷慨解囊，不是爭那一點點關稅，或國際間的彼此相對公平等。若處處與韓國、東盟各國相同，則如何還能稱為優惠？

除物質上的讓，大陸有更多無形資源可提供為對台灣讓的籌碼。僅略舉一二：

一、尊重偉人

於辛亥革命百年紀念的十月十日，將中山先生遺像永久的安放在天安門城樓上，必將贏得海內外華人，特別是台灣同胞一致的掌聲。其對民族向心力的凝聚，將千百倍於當年所懸掛馬、列、恩、斯等人的芻像。

二、尊重歷史

承認對日本八年抗戰，是國民黨所領導；並公開大力表彰抗戰期間為國族（非為黨）捐軀的國民黨將領；此舉絲毫無損於共產黨的貢獻。勇敢的尊重史實、或以前的敵人，不僅可顯示自信，更會贏得世人尊敬。

三、承認政黨

既然說是一個中國，即應承認台灣的政黨，除主張分裂中國土者外，都是中國合法的政黨，並可以與共產黨公平競爭。

四、容許台生大陸升學

在大陸的某些大學設置“台灣清寒學生獎學金”，讓台灣學生到大陸升學。

以上所舉之“讓”，乃諸大端。其對大陸人民、對中國共產黨，均無分毫損失，卻對祖國統一大業凝結全球華人的向心力。特別是對彰顯大陸領導人偉大的寬廣胸襟等，將有無比的助益。大陸若能用一個“讓”字完成國家統一，何其廉價也！若爭而不讓，令台灣人民離心離德，甚至生靈塗炭，則何其不智也！大陸主動用讓，爭取台灣人民對統一的認同，化干戈為玉帛，乃我中華民族之萬幸也。

和平發展應尊重多元族群

台灣原住民文化產業發展協會理事長 林秋妹

此次受邀參加會議，足見兩岸和平發展中尊重多元族群所累積的知識體系，台灣原住民族(少數民族)在歷史進程中，主流社會所運用的文字，教科書及學校是不存在的，其文化都保有完全屬於自己內部社會原創的傳統知識。由於環境變遷主流社會與原住民內部社會逐漸產生互動，其內部知識開始對外部社會的知識進行轉譯、整合和吸納，以適應族群集體前景的發展，因此，原住民族面臨傳承自己獨特文化及順應環境變化的兩難情況。原住民族(少數民族)在部落機制尚完整的時代，生活場域裡的生命傳承以生活技能為主，透過各種歲時祭儀、樂舞傳唱或生命禮俗，遵從長輩父兄為指導的模式來達成傳承的目的，但卻主流衝擊在忽略異質強調一致的目標下，讓原住民族的知識傳承產生斷裂，而原住民族知識在現代權利資源分配之下，也變成附從地位，甚至連原住民族(少數民族)自己也開始歧視自己的文化或知識體系。但也許會有人問，到底原住民族(少數民族)的知識體系是甚麼？向來主流社會對原住民族(少數民族)知識的關注焦點，只停留在原住民知識是否對主流社會的經濟發展和學術內容是否有價值，實則若更延伸到許多深刻的面向，諸如：政治、法律、教育、醫療、文化與健康等議題上，讓原住民族曾經被迫產生斷裂的知識體系重新連結並得以傳承發展，據此，重新審視社會總體均衡發展及權力分配問題。凡世居某一區域的原住民族(少數民族)，在生存處境中發展出族群認同，資源分配及長久所形成的自然環境情操與哲學觀，面對生存挑戰經驗所淘煉的，具有現實意涵及實用性和動能性。

因此，不適宜只將原住民族知識當作擺在博物館展覽中的研究對象，肯定多元文化並不只是讓原住民族在重要節慶，使其衣著鮮麗地登場表演，而是更應關注多元文化知識體系對其生存發展有所助益。

原住民族知識體系實例：

一、布農族社會政治運作機制：布農族社會秩序講求平權主義原則。

- (1) 在族內的社會地位依努力和能力來決定，而非與生俱來。
- (2) 在族內的社會活動中，個人的能力表現優者，獲得大家認同認定。
- (3) 當族內社會成員意見極端分歧時，便會導致領導人更異。

二、布農族的醫療知識體系：布農族咸認，一個人的疾病是個人心神(is-ang)和靈魂(kanit)。力量減弱或離開軀體所使然，讓更強大的另外的kanito 趁虛而入，導致出現病況。

治療方式：

- (1) 巫醫治療。實行Lapasas(驅邪儀式)召喚一種大自然力量來驅趕造成疾病的不良因素。

(2) 禱告。向Tina Dekanin(天父)祈禱，並召喚自己的指導靈來相助，驅離騷擾病人的其他kanito 以恢復健康。

(3) 施藥。巫醫利用其了解的自然植物的知識給病者施藥，施藥方式有食用、飲用及外用等。

有趣的情況是布農族對外部社會的衝擊，在某種程度上根據自身要求而吸納轉化，因此，現在會有巫師為了尋求力量來源，而向十字架、耶穌或聖母瑪利亞祈禱的現象。

三、阿美族的年齡階級與服飾禮儀：阿美族男子的服飾是年齡組織的識別標緻

(1) 少年組：上身赤裸，身綁腰鈴，頭綁毛巾，打綁腿和大腰飾，是標準成長中少年打扮，他們專司跑腿和傳令工作，重視身體體魄的矯健與靈活。此階級的少年有年齡階級的最低層，無條件服從長階指令是此階段的重要訓練。

(2) 青年組：邁入配備完整階段，拿掉毛巾，改戴頭飾，穿著上衣和繡有家族圖騰的短裙、腰飾及置物袋(又稱情人袋)和首飾，是男子生命發展中最華麗的階段，耀眼絢麗的穿著，也是吸引女性的方式(阿美族是母係社會，女追男、女選男)。

(3) 壯年期：經過華麗耀眼高峰後，再由繁入簡，服飾到了壯年期就趨向簡樸，除掉頭卷、綁腿和腰飾，換上表彰權利與智慧的羽冠。

(4) 老年期：此時屬長老階級，只穿長衣和置物袋，更簡單時也可以在肩上斜披置物袋。

四、達悟族的歌舞：居住在台灣東南方蘭嶼島的海洋民族——達悟族的歌舞表達與其生活環境密不可分，且以原始形態表現。

(1) 歌謠：沒有樂器，僅以胸腔、咽喉發出自由變化的噪音，表達族人與天神溝通的方式，所演唱的歌詞內容與場合時間，重視嚴格區別巫歌與一般生活歌謠的禁忌。

(2) 舞蹈：達悟族的舞蹈也分巫舞及一般生活舞蹈，生活舞蹈是女子專擅的能力在廣場或海邊手拉著手，愉快地跳舞。“甩髮舞”是達悟族最著名的女性舞蹈，婦女排列雙手交叉於胸前，將長長的頭髮瞬間甩下，同時彎身向前，直到髮際觸及地面，再隨腳步的前進，將長髮向後擺動，利用頭髮前後甩動的飄揚韻律，如同大海的波浪一般，這支舞蹈正是依大海的澎湃雄姿來加以模仿的，表示人與海韻相合。

五、鄒族的”庫巴”：男子會所：鄒族早期一向被認為缺乏藝術成就，但自1980年開始，以其獨特的歌舞，結合部落祭儀“瑪亞斯比”與收穫祭“荷美亞亞”的儀式性表演而屢上國家劇院演出，鄒族在阿里山特富野進行的“達納伊谷”溪流的國寶魚復育，成為國際間生態保育運用當地智慧的佳例。

(1) 庫巴(男子會所)。庫巴是鄒族男子議決部落大事的總部，建立在部落中央，舉凡粟祭、獵祭、河神祭、戰祭、成年禮、道路祭都在庫巴裡舉行。庫巴是聖所之意，對族人具有重要意義，是男子訓練與教育場所，部落安定之保障，是部落的中心和部落永續的象徵，也是解決部落紛爭的場所，與早期戰爭與出草

的指揮所。

(2) 農耕共作團體。鄒族和布農族一樣，是分工明顯的社會，經濟生產依賴親友關係結合成共作團體的人力，來解決農耕繁忙階段勞力不足的困難，原住民地區的自然環境決定了男女分工的責任區分，例如：早期男子狩獵，女子則負責採集食物及飼養，以解決生活上食品的來源。

結語：

綜上(以台灣原住民族為例)所述，不論是台灣原住民族與大陸少數民族歷經無數世代，所累積的文化智慧非常豐富，這些有形、無形的資產，是整體人類發展不可忽略的內涵，因此，在兩岸和平發展中，也應推動原住民族(少數民族)背景的學者投入自身族群議題的研究，使其傳統知識擁有合理的發言空間，創造符合原住民族自我存續的知識研究空間，讓其一方面有追溯傳統的機會，一方面也能進行傳統與現代的對話，包括人類學、民族學、社會學、法律學、生物學、自然醫學、藝術美學等兩岸的對話。

雖然知識平等對話並非易事，因長久以來主流社會在面對其眼中的原住民問題時，常刻意忽略或至少無意識到其視角的偏見，造成缺乏對文化敏感度的知識運用，又如在知識平等對話發展過程中，難免會有價值衝突的課題，挑戰不少，但擺脫文化思維，強化整體社會對原住民族(少數民族)文化及文化知識的理解與認識，深具改革總體社會體質的意涵，也是族群平等正義戰線的重要環節。若能突破此一環節，則能開啟人類更大的視野。



中國：就是統一基石與統一國號

台灣中華和平發展聯盟主席 林竹松

海峽兩岸自從1949年隔海分治，長期在軍事的敵對與隔絕。1960年代，兩岸關係開始出現和緩的氣氛；台灣當局改採三分軍、七分政治的兩岸政策。1979年中國大陸通過告台灣同胞書，在對台政策上，提出和平統一的主張，1987年7月14日台灣當局即宣佈解除解嚴。同年11月2日再以基於人道親情的考慮，開放台灣民眾赴大陸探親，開啟了兩岸交流的先聲，並結束了兩岸長達38年的隔絕狀態。面對當時兩岸的時空環境，蔣經國先生和鄧小平先生主導、決定採取的這項開放措施與主張，不僅是歷史性的劃時代作為，更促進兩岸未來長期的發展，產生了結構性的變化。

全面推動兩岸民間交流、為和平發展與統一奠基

基於兩岸生活、語言、地緣、血緣、歷史與文化的相同因素，加上當時兩岸政府對於人民的交流同時採取審慎樂觀的開放態度，台灣當局開放人民赴大陸探親後，接著陸續開放文化、教育交流、商務活動，隨後也有金馬和廈門的小三通，而今更有三通直航之便，促成了兩岸民間交流日愈頻繁和快速的增長。從1987年至2010年4月底，台灣同胞赴大陸探親、觀光旅遊、文教交流、商務活動的累計已高達5,712萬6,459人次，但值得我們關切的是這些人次，只佔台灣2,300萬人的兩成九，亦即還有七成一的台灣同胞都還未去過大陸，其中主要都集中在台灣中南部，急待台灣和民間大力去推動。而大陸同胞赴台探親、居留、文教交流、經貿考察和觀光累計只有373萬1,995人次，僅台灣同胞赴大陸人次的百分之六點五，只佔大陸十四億人口的千分之二點七，相對的難成比率，更有賴於大陸政府和民間全力加強推展。兩岸民間交流是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主要動力。

23年來，兩岸民間各項交流從無到有，從少到多；從未因兩岸關係好壞而影響，一直以來都快速發展，這都是兩岸同胞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兩岸交流就是人與人間的互相交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與和平統一都是要靠兩岸四地同胞和全球華僑華人來共同推動。因此，我們還要加速、加深、加大兩岸民間交流，不分黨派、不分地域、不分族群、不論主張、要遍及各城市和農村，要深入各縣市、鄉鎮村裏、學校和社區，也要深入到農民、工人、青年、婦女、老年和少數民族。這些工作有賴於兩岸四地和全球華僑華人社團一同努力發揮更有力的促進作用，來為兩岸民間拓展更廣領域，開闢更多管道，構建更多平台，創造更新形式，促進越來越多的兩岸民眾都能投入於兩岸大交流、大合作的潮流，成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與和平統一的參與者、推動者和受益者。

中華文化是實現和平統一的重要基礎

國民黨政府時期，鑑於兩岸已經隔離三十八年，雙方政經體制、生活方式及價值觀念都有差異，因此

主張透過民間交流，以增進了解，消除敵意；民間文化交流其最終價值取向是兩岸統一。例如1991年台灣當局通過的“國家統一綱領”便認為文化交流目的在於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共識，共同重建一個統一的中國，而中國的統一，應以發揚中華文化，維護人性尊嚴，保障基本人權，實踐民主法治為宗旨；1995年4月李登輝先生提出的“李六條”回應表示：台灣與中國分別由互不隸屬的政治實體所治理，應在分治的現實上追求中國統一；同時主張以文化作為兩岸交流的基礎，提昇共存共榮的民族情感，培養相互珍重的兄弟情懷，兩岸雙方應加強文化交流領域的廣度與深度，推動資訊、學術、科技、體育、傳播等方面的交流與合作。連主張台獨的陳水扁於2001年12月31日元旦致詞中，也呼籲大陸從兩岸文化與經貿的統合開始著手進而尋求兩岸永久和平，政治統合的新架構。並於2003年1月1日的元旦致詞中，提到兩岸建立和平穩定的互動架構，他建議要邁出第一步，可以從協商和推動兩岸直航著手，為雙方文化與經濟進一步的交流提供條件，進而在兩岸既有基礎及漸進互信上，共同來處理更長遠的問題。

大陸方面則認為，台灣與大陸同祖同宗、同文同種，在共同的歷史文化背景下，文化藝術領域的交流是十分容易獲得台灣人民的共鳴。文化交流的推動符合雙邊人民的利益，兩岸的文化融合勢不可擋，這必將對中華文化的發展乃至中國統一大業產生積極的影響。江澤民先生於1995年1月30日提出對台政策八點主張，除表明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反對台灣獨立外，認為中華文化始終是維繫全體中國人的精神紐帶，也是實現和平統一的一個重要基礎，應繼續強化台海雙邊相互往來與交流。他也指出：兩岸同胞要共同繼承和發揚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胡錦濤總書記也曾揭示，中國對台政策必須以弘揚中華文化的秀傳統為主線，擴大雙邊文化交流。

我認為文化交流是兩岸人民在分離三十八年之後，一個重新相互認識、相互學習過程的開始，了解彼此的價值、生活方式、意識形態，提供兩岸接觸對話的機會。兩岸的文化互動也提供了兩岸人民在心裡上開始建構一種民族主義的社群意識，尋求彼此的認同與好感的建立，並為日後兩岸的經濟、政治的整合奠下基礎。開展兩岸文化交流，可以傳播、弘揚、建設、繁榮中華文化，可以大大加深兩岸同胞之間的民族情感和同胞之愛。特別是新聞交流，帶給了兩岸人民一種期待，希望經由它的擴散效果與連鎖效果，能夠增進兩岸了解，消除誤會，建立情誼，最終有助於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發展。雙方要本著雙向交流，以誠相待，互相切磋，共促繁榮的精神，採取多種形式，通過各種管道，特別是兩岸四地和全球華僑華人社團來積極推動，以中華文化作為實現兩岸和平發展與和平統一的重要基礎。

加強教育交流，有利兩岸和平發展，造福兩岸人民歷史上從未有過如同現今兩岸關係如此複雜的時代。意識型態的差異固然是不爭的事實，但是意識型態的爭議無助於兩岸問題的解決。曾有人比喻稱全世界有那個敵對國家還在相互承認學歷的，可是如果以此否定台灣面對大陸學歷採認問題，則將使台灣的執政者故步自封，未能察覺到兩岸關係的實質進展及台灣人民的需求。既然無法從歷史上完全學習到兩岸問題的應對模式，

以創意的構思來面對嚴肅的兩岸問題

中國大陸自1978年迄今三十二年來的改革開放，使得中國在世界上日漸精進，其給世人最大的啟示，乃在於開放與進步兩者間的密切關係。保守、保護、封閉相形之下便是過去落後中國的寫照，這是鄧小平先生都承認的事實。面對二十一世紀，台灣將要如何面對兩岸關係，如何面對大陸學歷採認問題，其核心思想其實已相當明確。在政府作全盤考量的情形下，政治上雖無法立即有效獲得突破。但積極、主動、進取，應該是對歷史負責的最佳作法，也是面對兩岸高等教育採良性互動與發展的具體實踐。

兩岸教育交流的內涵，包括：學生交流、師資交流、教材交流與學術交流等四大方面。學生交流主要側重在台灣的大專院校接受大陸學生來台灣就讀的可行性分析。師資交流也是以兩岸大專院校專任師資之聘任為分析重點。材的交流則分別以大陸中小學的語文、歷史教科書為例，說明所引發的啟示。學術交流方面則以研討會、到大陸上課、論文口試與升等審查、短期講學與訪問和出版品的交流。

兩岸的教育交流，每一方面都有其重要性，而且展開交流的程度都甫起步，在可預見未來兩岸關係的發展中，真正能跨越省籍情結與統獨情結的，就只有加強教育方面的研究與交流。期盼兩岸當局與民間，都能夠認識此一事實，並同心協力，一起全力推動，以利兩岸和平發展，以造福兩岸人民。

經濟合作、和平利基

2008年11月在馬英九先生主張下“江陳會”實現空運直航與直接通郵的大三通，目的就是擴大和加深兩岸經貿的合作。可見兩岸領導人看法相同，也因此而一直在積極推展。兩岸經濟互動隨著兩岸交流的開放與深化，是越來越重要，尤其是在經濟全球化與區域化的發展趨勢下，兩岸經濟互動的發展根本是無法避免與迴避的問題！而然，兩岸經濟的互動，始終是受兩岸政治局勢所制約，因此，兩岸經濟互動的發展過程，一直是顛簸與起伏，但是，兩岸經濟互動的數量，依賴度與重要性，卻是與日俱增！

兩岸經濟互動的發展過程，在跟隨著兩岸政治局勢發展下，基本可分為六個階段：一、全面中斷期(1949~1978)；二、單邊開放期(1979~1986)；三、雙邊往來期(1987~1995)；四、煞車期(1996~1999)；五、政經分離期(2000~2007年)。六、正常化期(2008年5月起)。

就兩岸貿易關係來說；事實上早在1978年鄧小平先生領導市場經濟改革開放政策後，1979年兩岸就開始通過香港展開小額貿易。從當年貿易總額的7,776萬美元發展到2008年的最高金額1,053億6,910萬美元。自1979年到2009年12月底的累計貿易總額已高達9,636.2億美元，其中包括台灣出口到大陸7,727.5億美元，台灣自大陸進口1,908.7億美元，台灣來自大陸的順差有5,818億美元之巨。中國大市場不但是台灣出口最高的依存度，也是台灣順差最大的來源，台灣已成為中國大陸第五大貿易夥伴。值此密不可分的關係和發展情勢，兩岸貿易早已統合了。

其次，就兩岸經濟合作而言；自1990年10月台灣當局開放台商赴大陸間接投資和技術合作後，迄2010年元月底止，台灣申請到大陸投資企業累計37,859件，投資累計總額834.24億美元。如包括台商通過香港、

英屬維京群島和開曼群島、以及其他國家赴大陸投資累計則有八萬多家，累計投資總額高逾3,800億美元。而台商在大陸投資房地產和股票市場也逾兩百億美元，台商在大陸投資已佔台灣對外投資的85.2%。特別是每年在兩岸地下通匯的更高逾2,000億美元。期中雖然有李登輝先生的戒急用忍和陳水扁先生的積極管理緊縮和鎖台政策，但並未影響到兩岸人民的往來，也擋不住台商赴大陸投資，兩岸貿易額還是持續增長。這已體現出兩岸的經濟合作關係，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您”，早已形成密不可分的共同體，亦即經濟已統合了。互補互惠、貢獻良多、和平基石再就兩岸互相的貢獻；23年來台胞回大陸累計5,712萬6,459人次，每人平均消費兩千美元，就貢獻了1,125.57億美元。1988~2009年台商在大陸貿易累計總額貢獻了逾兩兆美元。2009年底台商在大陸貢獻僱用勞工人數1,504.35萬人。1992年至2009年止台商在大陸貢獻納稅總額逾1,300億美元。1990年至2009年台商在大陸貢獻工業產值累計10兆5,786億人民幣。大陸對台灣的貢獻，則有提供給台灣最大的市場、最多的貿易順差，讓台灣經貿得以持續發展，也給了台商最大的投資發展利基。迄2010年4月底大陸人民來台累計人數330萬2,284人次(今年大陸來台觀光客預估可達120萬人次)，平均每人消費2,000美元，對台灣也貢獻了66億456萬美元，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大陸讓台灣取得早收清單539項，多大陸早收清單一倍，出口總額則高於大陸約五倍，造成大陸一年稅損9.86億美元，多出台灣稅損8.5倍。

這些互補互惠所產生的相互貢獻；都足以證明台灣在大陸經濟發展過程中，不但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也作出了積極且巨大的貢獻。大陸對台灣也提供了優越的投資環境、優惠的稅賦待遇、龐大的商機，為台灣的經濟發展也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同樣的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二十三年來，辜汪會談簽署了四項協議，江陳會談更簽署了十四項協議，為兩岸關係建立更穩固且更重要的基礎。在在都顯示中華民族心已相連，兩岸同胞情已相結，兩岸唇齒相依，相扶相持，已為兩岸和平發展奠定重要基石。

加強兩岸政治互信，首要之務兩岸大和解

2008年台灣二次政黨輪替，藍綠政黨仍然採取相互對抗模式，寧願對手失政，不願看見對手成長及有些政績。可是就台灣的利益而言，除非有重大變化，藍綠二黨是目前及未來台灣最重要的政黨，內外政策與制度缺乏任何一黨的參與，就不完整，也無法發揮整合與團結力量。尤其目前台灣與大陸的關係正處於最為敏感階段，利弊得失皆須慎重以對，但對於民生與人權的堅持不可廢，台灣內部在在需要相互尊重與包容。惟國民黨政府一方面批評過去民進黨鎖台，另一方面排拒在野黨的監督；綠營則以賣台、無能以對，政局始終在衝突、妥協但未進步的階段反覆不停。台灣經過二次政黨輪替，國民黨不可能重為威權政黨，民進黨也不再是沒有執政經驗的反對黨，藍綠兩黨應該在政治上對人民負起更大的責任，不要動輒否定對方；應尊重與包容對手，並從對手的主張中修正與豐富自己的主張。藍綠兩大政黨應從肯定自己是改革進步的政黨出發，也肯定對手的求新求變。蔡英文能夠反省過去民進黨的不足，國民黨馬政府都應該歡迎才是。肯定對手，但提出更高明的政策說服人民支持，應是今日台灣社會和人民最主流的期待。

2010年4月29日胡錦濤總書記在上海世博會開幕，會見連戰時談到兩岸關係往前推進的四點意見：第一

項就是“加強政治互信”，其次才是“擴大兩岸各界交流”、“深化經濟合作”及“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大方面認為國共兩黨已在“九二共識”上增加互動及政治互信，並以此為基礎繼續向前邁進，如果兩岸間少了這一層基礎，恐怕兩岸關係將會難以往前推進。

2007年之前，兩岸關係危險到一觸即發的地步，但從2008年政黨再次輪替後，至今不過短短兩年多時間，卻已超過兩岸分隔六十年來的進展，這個根基，就在於兩岸民間交流頻繁，以及國共兩黨的互信，也有來自於雙方領導人之間的互信基礎。但大陸仍需面對現實，也就是兩岸政治交流的瓶頸，如果只局限於國共的互信是不夠的。要推進兩岸關係，我認同胡總書記的意見：“加強政治互信”，這是要包括兩岸整體政治的互動與互信而言，並非單一國共的政治互動和互信，因此首要之務是先要促進台灣藍綠的和解，而且中共更要發揮愛心、苦心、耐心和包容心，與台灣綠營打交道，建立關係和構建“紅綠平台”，畢竟，台灣政治情勢多變。在台灣島內主張統一的已降到7.5%，主張獨立的又高升到30.2%，維持現狀的也降到54.8%，沒意見的有7.5%，對主統、維持現狀比率的下降和主獨的升高都是一項值得我們注意的警訊。因此，唯有兩岸大和解，面對現實，才能大力推進兩岸關係，也才有機會在胡總書記和馬主席任內實現“胡馬會”，展開政治協商和簽署兩岸和平協議。

兩岸和平統合、實現中國統一

兩岸統一是一個非常複雜且漫長的融合過程，並非當前情勢就可解決，但只要善用智慧，自能化繁為簡，並可縮短時程。兩岸分離已逾百年，中間只有短暫的五年統一，就決定了各奔東西，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社會制度，也形成了不同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要合起來就得經過廣泛的交流、合作發展、共創雙贏和共同締造一個過程。然而，兩岸在近六十年來，也處於對抗與隔絕狀態，直到2008年馬英九先生上台後，兩岸關係才產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才止住了“去中國化”，確認了“九二共識”，恢復了兩會會談”，重建了交流機制，並在短短兩年多就達成了十四項協議，一項共識，也建立了國共平台，實行了外交休兵，降低了軍事對抗，實現了全面三通而真正的開放了雙向交流、交往、對話和談判，雙方都確認了和平發展的目標，使得兩岸進入了“和平發展期”。

而大陸一年多釋放善舉超過了以往六十年，開始形成一個命運共同體，開始建立一個新的民族認同，兩岸正共同走向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一歷史階段的開啟，已意味著兩岸進入了歷史階段，走向兩岸最終統一的大門已開，只是如今還處於初部階段，沒有人再能讓我們走回頭了！誠如章念馳先生5月16日在《中國評論》月刊5月號發表專文所言：“在共同發展的歷史新時期，兩岸關係如解放了的纏足，再塞回以前的鞋裏已辦不到了。在這種情況下，要給大陸從容面對“中華民國”問題創造了條件”。也如海協會副會長張銘清先生在《中國評論》六月號發表文章指出，台灣大學張亞中教授提出的兩岸統合，即兩岸有三個主體，一個是“中華民國”，一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另一個是整個中國(第三主體)。台灣是整個中國的一部份，大陸也是整個中國的一部分。張亞中特別解釋，這不是兩國論，而是在一中統合的終局目標下，尊重當前兩岸實現的一國兩制的運作。張銘清先生認為張亞中的統合論，不失為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

局面的重要途徑之一。我認為這確是可以破解兩岸政治僵局的重要方式之一。統合論是張亞中教授倡議多年的理論，甚至陳水扁於2000年除夕談話也呼應指出，從兩岸經貿與文化統合開始著手，進而共同尋求政治統合的新架構。如果兩岸對張亞中教授統合論的組合有疑義，我則提出同是兩岸有三個主體，一個是中國大陸，一個是中國台灣，另一個是中華民族聯合共和國(簡稱中國)作為第三個主體。如此，三個主體的連結與組合，即不會出現兩個中國，也沒有所謂的一中一台的存在。

章念馳呼籲面對中華民國，張銘清回應統合論，顯示大陸已在嘗試調整兩岸政策。主要方向是：一、似乎已接受一個中國(整個中國)是超越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三主體或第三概念。二、顯然已認知，在張銘清所說的尊重歷史、尊重現實、以人為本的前提下，台灣是大陸有必要面對的課題。

胡錦濤總書記曾提出：“尊重台灣同胞維持現狀的意願”，對台已作了最大的讓步。胡總書記的和平發展主張的概念也是出自維持現狀，其實也是一中各表，只是心照不宣而已。

一中各表可貫通孟子理論，即(台灣是水，中華民國是孟子；盃在水在，盃破水覆)。也可貫通泛屋頂理論或統合論。即將一個中國(整個中國)定位為第三主體或第三概念。因為孟子理論是一中各表，泛屋頂理論或統合論也是一中各表。一中各表，是化異求同；同與異的交替，就是筷子理論。一中各表可守可進；守是孟子理論，進則是屋頂理論和統合論。這三個理論都是兩岸和平發展與和平統一最重要的支柱。

我深信，只要兩岸當局和兩岸同胞都能看大勢、顧大局、識大體、明大義，為中華文化的復興，為中華民族的團結，為兩岸和平發展和為中華千秋萬世著想，肯定能實現兩岸和平統一大業。也唯有如此，才能讓我們的代代子孫幸福萬年長。

和平與發展是兩岸關係的硬道理

日本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秘書長 蘇靈

“全球華僑華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會”在香港召開，這是一件值得慶賀的事情。近幾年來，全球範圍內的促進中國和平統一運動蓬勃發展，兩岸關係亦開創了新的局面。這一切來之不易，也非偶然。這裡有大氣候、大環境的因素，也有小氣候、小環境的作用。

中國：發展才是硬道理

先來說一下大氣候和大環境。這主要是指世界的形勢，中國的發展。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也造就了舉世公認的偉大成就。中國的綜合國力增強了，國際地位提高了，這也就為中國的和平統一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此話怎講？過去中國大陸貧窮落後，台灣相對富裕先進，於是台灣人看不起大陸人，大陸人也嫉妒台灣人。在大陸人看來，台灣雖然富但畢竟小，而在台灣人的眼裡，大陸是又大又窮。這世界是很現實的。人人都想要富，都想要發展，做夢都想著發財，誰都怕跟窮弟兄、窮親戚打交道。此所謂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矣。

現在不同了。大陸人（當然還只是一部分先富起來的大陸人）跑到海外，跑到台灣，就像20年前的日本人，錢包鼓鼓，出手大方。這樣一來，誰還能看不起？誰還敢看不起？如今，大陸各個省的代表團，都由省長或者書記帶隊，到了台灣就大採購，動輒十幾億，甚至幾十億，不是台幣，更不是日元，而是人民幣。大陸這一切變化，都是改革開放的結果，驗證了鄧小平的那句話：“發展是硬道理”。

但發展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也不是說你想發展就能發展的。發展必須有很多的條件，必須付出艱苦的努力。在發展的所有條件當中，有一個最重要的前提條件，那就是和平。只有和平，才能發展。

這樣一來，中國人，包括大陸和台灣在內的兩岸同胞，終於都意識到了和平發展，才是兩岸關係的硬道理。統一當然是必要的，也是崇高的，我們要正確地認識和處理好和平、發展和統一三者之間的關係。簡單地概括，和平是前提，發展是關鍵統一目標。

對世界來說，是發展與合作；對中國大陸來說，是發展與改革；對兩岸關係來說，是和平與發展。總之，一切都離不開發展。甚麼叫大氣候和大環境？這才是國際的、中國的、兩岸的大氣候和大環境。

日本：反獨促統前沿陣地

除了大氣候和大環境之外，對日本的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來說，還有小氣候和小環境。這就是在日本特定環境下，日本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所能發揮的特殊作用。

中國的和平統一，是中國人自己的事。但中國並不是孤立的中國，全世界也並不是只有中國一個國家。一個美國，一個日本，這兩個國家對中國的和平統一，客觀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美國不用說了，日本也是一個重要的碼頭。尤其是反獨促統，日本可以說是前沿陣地。當年日本是台獨的策源地，如今日本雖說不是台獨的大本營，但也還是台獨的一個重要的聚集地。

這些年來，日本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在日本這個特殊的環境下，為反獨促統作了大量的工作。日本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是一個團結的和統會，和諧的和統會。團結與和諧，是我們幹事業、做事的保障。

我們大家在一起，都是沖著同一個目標和理想而來的。假如連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這麼個團體、這麼幾號人馬，都不能做到和，那麼我們怎麼能想像、還有甚麼資格來談論兩岸的和、中國的統呢？

日本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是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們所組成的一個自願與開放性質的集體。由此形成了我們的小氣候與小環境，統一的志願者，日本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是一個志願者團體。大家願來則來，願留則留，願幹則幹，願去則去。

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業，自己的家庭生活。我們都很忙，和平統一在我們這兒是“業餘鬧革命”。日本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的同仁們，有一個口號，叫作“我們幹和統的事，但不吃和統的飯”。這叫共識也罷，覺悟也罷，這些年來，我們就是這麼想的，也是這麼做的。

我在這裡要特別推崇的，是我們日本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的會長陳福坡先生。陳老先生今年已是88歲高齡了，但精神年齡卻不老，這才叫作真正的老當益壯。除了年齡之外，更重要的，是陳老先生的人格魅力。有他這樣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華僑領袖出任日本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的會長，這也是日本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能取得如此成績的重要因素。日本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已經走過十年的歷程，我們希望陳老先生再當十年會長，再造日本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十年的成就。

和統工作需要五個超越

我在這裡還要強調，日本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的五個超越。甚麼叫五個超越呢？就是我們和統會的團體，以及所從事的和平統一的事業，要做到這麼五個超越，一是要超越族群，二是要超越階層，三是要超越黨派，四是要超越信仰，五是要超越年齡。

所謂超越族群，就是要不分是大陸人，還是台灣人；不分是台灣的本地人，還是外省人；不分是“綠營”，還是“藍營”。總而言之，我們都是中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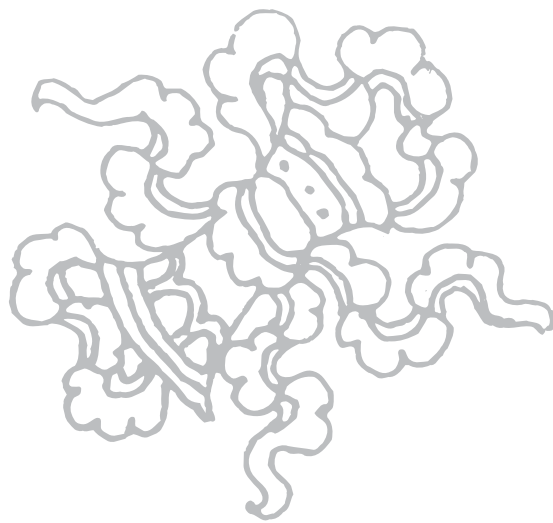
所謂超越階層，就是不分甚麼出身，也不講甚麼身份，你是資產階級也好，小資產階級也好，中產階級也好，無產階級也好，這些標籤在反獨促統的旗幟之下，都是無所謂的。大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即便無錢無力，無權無勢，過來表個態，捧個場，也好，也歡迎！

所謂超越黨派，不外乎是大陸的共產黨，以及台灣的國民黨和民進黨。和平發展與和平統一，是包括大陸人民和台灣人民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共同的事業。這是國家的大事，民族的大業，並不是某一個黨派

的事情。超越黨派，就是要超越各個黨派及其利益團體的既得利益。

所謂超越信仰，這裡並不完全說的是宗教信仰。耶穌基督也好，釋迦摩尼也好，都不會管中國和平統一的事。這裡更多的，指的是意識形態的問題。和平統一，必須超越意識形態；也只有超越意識形態，才能實現和平統一。

所謂超越年齡，要特別注意的，就是要吸引和鼓勵更多的年輕人，加入到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的團體中來，投入到促進中國和平統一的工作中去。我是一個記者，我經常參加愛國華僑舉辦的各種活動，也有機會去參加日本的台獨團體和人士舉辦的各種活動。我發現一個現象，就平均年齡而言，那些參加台獨活動的人員的年齡，要比那些老華僑們年輕得多。人家才是年輕力壯，而我們這裡只能是老當益壯。這個問題相當的嚴重，應該引起我們高度的重視。這些年來，我們日本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已經發展了一批年輕的成員。比如說，向地震災區捐助物資，去長野縣護衛奧運聖火，這些年輕人都是主力軍。反獨促統是一項長期而又艱鉅的工作，任重而道遠，需要後繼有人。



要敢於開創兩岸關係新局面

日本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理事長 潘慶林

來自兩岸及世界各地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的朋友們，前來東方明珠的香港，參加“全球華僑華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會”。謹向本次大會的主辦方香港和統總會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感謝。兩岸及世界各地的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已經走過了十多年的歷程。十歲對一個人來說，還是個孩子；但對一個團體來說，已經步入了成年。如今，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已經是一個很成熟，並且取得了積極的成就，有相當影響的團體了。

全球和統會 日本很重要

全世界的“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這十年來就像雨後春筍，遍地開花。猶如古人詩雲：“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在全世界將近200個國家和地區所有的“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當中，我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講，最重要的當然是中國大陸和台灣的“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其次應該就是美國和日本的“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日本的“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比起大陸、台灣和世界各地的“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來，有甚麼特別之處，不同之點呢？

毫無疑問，日本是全球“反獨促統”的一個重要的障地。且不說，日本當年就是台獨勢力的發源地和庇護所，一度還成為台獨勢力的大本營，直到現在也仍然是台獨勢力的聚集地。這就使得，在日本“反獨促統”特別重要，也特別艱難。

就在日本這塊土地上，在台獨勢力猖獗的同時，誕生了日本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這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日本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成立和存在的本身，就是對日本台獨勢力的遏制。更何況，日本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不但在日本立足了，而且發展了。

會見馬英九 敢為天下先

這十年來，我們做了很多的事情。大家做得很辛苦，也很有成效，我在這裏就不一一列舉了。我只講一件“敢為天下先”的事情。這事是日本和統會的陳福坡會長和我共同策劃，由我一手操辦，親身經歷的。2007年7月，台灣的馬英九先生來日本訪問。當時馬英九的身份是國民黨主席，還沒有當上台灣地區領導人。得知馬英九訪問日本的消息，我立即從中國趕回日本。我從大陸帶來了一個足有十幾公斤重的“馬踏飛燕”的銅像，決定送給馬英九，並配上了一首詩——

馬踏飛燕頌千年，
英雄出自世人間。
九天攬月何所懼，
勝利在望待眼前。

在歡迎馬英九的酒會上，我把“馬踏飛燕”連同這首“馬英九勝”的“藏頭詩”送給了他。據說“馬踏飛燕”至今還放在台北國民黨總部的主席辦公室內。

為甚麼說這件事情是“敢為天下先”呢？因為在當時的情形下，兩岸之間的往來還沒有像今天走得那麼近，那麼熱，那麼親。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政協委員”身份的人，會見馬英九，並且送他禮品和詩，這是破天荒第一招的事。更何況，這禮品和詩的內容是那樣的敏感，而馬英九居然當眾收下，表示感謝。我們站在聚光燈下，像好朋友一樣握手言歡。

當然，一個“全國政協委員”和“國民黨主席兼總統候選人”見面握手，也並不是甚麼了不起的事。關鍵的意義，就在於“敢為天下先”。我們要有“敢為天下先”的精神，並且用這種精神來開創兩岸關係的新局面。

遺憾地是，那天酒會的與會者，除了我和蘇靈等幾個日本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的同仁之外，幾乎看不到有其他“大陸係”的華僑。這使我非常的感嘆，“大陸係”的華僑去會面一下來自台灣的國民黨的主席，又怎麼樣呢？這種“大陸係”和“台灣係”的分別，還要維繫到哪一天呢？難道現在不正是“超越”的時機了嗎？

大陸與台灣 華僑先統一

我在這裏，還要強調一下，日本僑界以及全世界的僑界，都要團結的問題。團結起來，共同推動祖國的和平統一事業。

我說這話，並不是無的放矢。因為長期以來，日本的僑界，被分為“大陸係”和“台灣係”兩大陣營。據說美國和歐洲也一樣。坦率地說，華僑的兩大陣營，實際上是兩岸關係在世界各地區和國家的延續。整個中國分成了“大陸”和“台灣”，在海外的僑界，也就分成了“大陸係”和“台灣係”。這可以說是中國的悲劇，也是海外華僑的悲劇。

如今，大陸和台灣的兩岸關係，已經改善了。那麼，海外華僑還有必要“大陸係”和“台灣係”分得那麼清楚嗎？不但沒有必要，而且應該先行一步，先在海外的華僑當中，消除“大陸係”和“台灣係”的隔閡。尤其是在致力於從事祖國和平統一事業的海外華僑華人當中，更要打破“大陸係”和“台灣係”的籬笆。

在這方面，我認為我們日本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是做得相當好的。且不說，我們的會長陳福坡先生原本就是“台灣係”的華僑領袖，而我和蘇靈先生又是典型的“大陸係”新華僑的代表。這些年來，陳福坡先生和我們之間，我們和陳福坡先生之間，都合作得非常愉快。在我們日本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內部，已經沒有了所謂“大陸係”和“台灣係”的區別。我們都是中國人，我們都是一家人。

責任兼使命 任重而道遠

我本人擔任中國全國政協委員，也已經有兩屆，將近十年的歷史。作為全國政協委員，我又是旅日歸國華僑。中國是我的祖國，日本是我的第二故鄉。同時，我跟日本有特殊的緣分，在日本與陳老先生和蘇靈先生結下了特別的友誼。我非常樂意參加到日本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中來，成為和統會的一員，參與和統會的工作，承擔和統會的責任，分享和統會的喜樂。

在日本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成立十周年之際，我被聘請為日本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的理事長。我首先要感謝陳老先生及其和統會的同仁們對我的信任。當然這不僅僅是一份榮譽，更是一種責任，一項使命——促進我們偉大的祖國和平統一的神聖使命。

由兩岸關係看和平發展

台灣中國全民主統一會嘉義分會副總幹事 葉國勝

“中華民國”推翻滿清所創史績應珍惜

中國這個有5,000多年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歷經長年征戰、內憂外患，兵戎相見，民不聊生；孫中山先生於1911年10月10日發動武昌起義推翻滿清，民國元年1月1日（1912年）“中華民國開國”，民國14年（1925年）“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成立，民國17年（1928年）東北改懸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全國統一，再次建立全國一統的法統政府。“中華民國”及“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是兩岸共同尊敬的國父孫中山先生及無以數計之革命先烈、先賢拋頭顱，灑熱血，犧牲生命，推翻滿清所共創，凡我中華兒女都應擔負珍惜愛護它的重責大任。

民國25年（1936年）西安事變，民國26年（1937年）七·七事變，民國30年全面對日宣戰，抗戰勝利後1946年10月國、共和談破裂，繼而延續第三次國、共兩黨逐鹿天下；（1949年）民國38年12月9日國民黨以蔣介石為首之“中華民國”政府撤守台、澎、金、馬。中國共產黨以毛澤東為首，於同年10月1日在北京建政，改國號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此中國以台灣海峽為界線，兩岸分由“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分治。分離一甲子，歷經30餘年冷戰，繼由開放探親、改革開放、2005年（民國94年）4月26日國民黨和平破冰之旅、三通直航，兩岸兩會2010年（民國99年）6月29日於重慶簽訂ECFA；爾後如何簽訂和平協議，建構邦聯，甚至最終達成和平統一，均需兩岸炎黃子孫以最高至智慧、包容、忍讓之心共同妥善研處。

砍頭論台獨

上海東亞研究所所長章念馳在5月號《中國評論》發表專文“創條件解（中華民國）難題”，文中引述他與一名台灣民眾談話稱：大陸不承認“中華民國”，好比砍下我們頭，留下四肢還有甚麼用。另比喻台灣人民是孟子裡面水，“中華民國”是孟子，盃在水在，盃破水覆。具有這樣想法民眾本就不會支持台獨，大陸當局應該知道，台獨滋長根源就是不承認“中華民國”，要砍掉“中華民國”這顆頭，正因為要砍頭，就造就了台獨的“換頭論”。

沒有“中華民國”就沒有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曾說“儘管兩岸尚未統一，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之事實從未改變，這不僅是我們的立場，也見之於台灣現有規定和文件、憲法。”胡錦濤發表這段談話是在（反分裂國家法）立法時，其意義中“憲法”就是“一中憲法”，台獨豈可“違憲”？大陸既不承認“中華民國”存在，又如何要求台灣民眾奉行“中華民國憲法”？

大陸海協會副會長張銘清在《中國評論》六月號發表文章同意台大教授張亞中提出兩岸統合。張亞中

統合論觀點是兩岸有三個主體：一個是“中華民國”，一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另一個是整個中國。台灣和大陸是整個中國一部分，這不是兩國論，是在一中統合目標下，尊重當前兩岸現實一國兩體運作而設計。

1997年時任海協會長汪道涵指出“一個中國不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等於中華民國，而是兩岸同胞共同締造統一之中國”。1998年上海國際關係學會會長陳啟懋指出：“大陸希望台灣回到一個中國政策，就是回到台灣憲法及國統綱領中的一個中國”。

如前述，大陸當局必需承認台獨大半是被逼出來的，緣由：因否定、不承認“中華民國”及“中華民國國旗”，且親自摧毀台灣人民與中國主要心理維繫；若無“中華民國”，兩岸即無和平發展憑藉，如今既知“一中憲法”是兩岸法理維繫及和平發展準則，即應從孟子理論來了解“中華民國”，如果不使台灣人民感受到“中華民國‘是一部分之中國，即無法使台灣人民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更無法使兩岸關係達成高層次和平發展。兩岸關係與外交關係是一體兩面，必需平衡兼顧，台灣長期遭到孤立與邊緣化不平等待遇，造成人民極度不滿，因此台灣參與國際社會是兩岸和平發展重要關鍵，同時由於台灣民主化快速發展與意識提升，有意義的參與國際組織和區域互動，才能讓兩岸關係持續，朝向互利方向發展。

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共創雙贏

如何面對“中華民國”？砍頭論與和平發展是相互矛盾的，若能體現“一中各表”，現在就是“一個中國”，就可使現狀提昇、改善，又何必將“一個中國”推拒於變化莫測的未來。胡錦濤總書記2008年04月29日主張“兩岸要建立互信、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共創雙贏”。面對兩岸和解的曙光，台灣領導人馬英九2009年10月25日強調“我們會以最大誠意，經由交流協商，化解仇恨對立，讓殺戮走入歷史，使和平成為永恆，我們要用和平來取代對立，用和平來取代戰爭”。和平發展是兩岸同胞共同願景，在達成和平協議之前，就是先終止敵對狀態；海峽兩岸同胞本就是同文、同種、同根生的中華兒女，更應相互合作、扶持，互相在國際社會中獲得認同，（如東、西德，南、北越）讓兩岸在面對全球化的競合挑戰中共創雙贏。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一部分之中國，中國主權和領土不容分割。

祈望兩岸中華兒女、炎黃子孫以我們悠久博大歷史文化及智慧，共同努力奮鬥，相互認同、扶持，將中華民族悠久歷史文化、經濟、醫學、科研、軍事發揚光大，共同迎接21世紀民族復興的到來。

聚同化異、僑務休兵與和平發展

美國華盛頓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創會會長 黃企之

聚同化異、僑務休兵與和平發展，於2009年6月之後成了討論兩岸關係的熱門話題。三詞之間有一貫性，互補性與連環性。而三者連環中心點，以歷史、哲學、科學及兵學的綜合觀點來看，兩岸則應該是以“九二共識”為表，“一個中國”為心，以同心同德、同舟共濟，兼愛兼利兼善天下之心與力，共創一中美好的明天。

沒有一中，三者失去重(中)心，不能偏(安)存。有了一中，一個重(中)心，三者有情有義，有依有靠，互動互信，互助互成。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聚同化異是三者開始第一步，不先聚同化異，僑務休兵舉步艱難，形同紙上談兵。不先聚同，則又化異不易。不能化異，休兵不易，不能休兵，和平發展，能不趨起？

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物以類聚，我們要聚同對一中同心，對化異同德之人，眾志成城。聚沙成塔，聚蚊成雷。聚小同化小異，聚大同化大異。先聚小同(三五人)以化小異(一地區)。再聚大同(一國)以化大異(全球)。

中華先祖堯之時，“聚八元八愷”十六人為一同，天下大治；舜之時，聚“皋、夔、稷、契”廿二人為一同，天下也大治。堯舜之治，不在人多，而在能辨君子與小人，及“親賢人遠小人”(舜退四兇)。

“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弟兄親戚，不能相保”。

“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義，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始終如一”(歐陽修)。

聚同，除對傳統品德：四維(禮、義、廉、恥)，八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與九思(見利思義等)有素養外，對兩岸道德規範也應要有認識。

大陸(延安時代)於1940年2月1日宣稱，“陝甘寧邊區是全國最進步地區，這裡，一沒有貪官污吏，……，十沒有發國難財”，以“十個沒有”為榮。2006年3月4日，大陸又提出“八榮(八恥)”為全民行為之準則。

“中華民國政府”於1935年11月18日通過黨員守則，“一忠勇為愛國之本，……十二有恆為成功之本”，務期父以教子，師以教弟，共信共行，“親愛精誠”。

對上述傳統與兩岸道德規範，素有“修養”的君子，請以“公誠仁中”為心。及時聚同，在和平發展大好起步時刻，協同化異，以利僑務休兵，兩岸休兵，無核世界，天下大同。

仁者無敵，化異之道在一“大”字，化之之道，在一“誠”字。以大慈大悲，大仁大義，大公無私之心來化敵為友。不誠無物萬事空，“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為天下至誠，為能化”(中庸)。

“傾國(傾城)宜通體，誰來獨賞眉”(古詩)。隻手獨拍，雖急不響。(韓非)

“西方功利強權文化，要服從東方仁義道德文化，世界文化才能日趨光明”(孫中山)。西方功利強權文化，自1492年哥倫布登陸美洲，已橫行世界517年。今日正是西方走向東方和平發展，轉型關鍵時刻。我們要把握千載難逢良機，化干戈為玉帛。

通過國際非政府組織促進兩岸和平發展

台灣成功大學兩岸統合研究中心主任 丁仁方

台灣在去年五月間正式成為“世界衛生大會”(World Health Assembly, 以下簡稱WHA)的觀察員,在國際參與的空間有了重大的突破,一般認為這也為兩岸在國際組織中的互動開啟了新的方向。

台灣領導人馬英九提倡為中華民國外交找出路的活路外交,根據馬本人的闡釋,其具體的方法就是在兩岸關係的正面發展下,雙方在國際社會中,找出一個可以共生共榮的互動模式。從WHA開始,台灣方面希望能擴大參與其他“國際政府組織”(International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以下簡稱IGO),不過長期以來台灣參與IGO涉及到兩岸複雜主權爭議,從台灣加WHA之後已經一年多餘,台灣再也沒有機會加入其他IGO,即可見其中困難程度;另一方面,台灣長期缺乏參與IGO,也沒有培養出足夠的參與經驗與專業人才。短期內,台灣擴大參與國際非政府組織(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以下簡稱INGO)的空間反而較大,以下本文即嘗試評估通過INGO作為促進兩岸交流及和平發展的可能性及相關問題。

1. 兩岸國際組織參與現況

過去因為兩岸外交長期處於零合競爭狀態,台灣在國際參與的空間受到高度擠壓,不僅邦交國有限,在民進黨執政八年期間,甚且幾乎每年減少一個一路降到現在的23國,而且在IGO的參與僅能維持在40多個,遠不及中國大陸參與的數目。在目前台灣參與的49個IGO中,又有21個是以觀察員的身份加入,只有28個台灣擁有正式會籍。

台灣雖然在IGO的參與長期受限,但卻在INGO的參與不斷成長,這一方面得利於全球化的進展,過去一、二十年來INGO成長幅度高於IGO成長幅度,一方面也因為台灣社會專業與多元化的發展,得以參加INGO的類別非常廣泛。目前台灣參與INGO的數量已經超過2,600個,雖然仍少於中國大陸近1,000個,但如果以每萬人參加INGO的平均量來比較,台灣遠高於中國大陸,甚至相對於其他亞洲國家,扣除汶萊及新加坡兩個小國,台灣INGO參與的平均量高居亞洲第一。

2. 台灣INGO參與屬性及優勢

多年來台灣國際參與在INGO有很大的進展,對促進兩岸交流及和平發展又有何重要意涵?這個問題應可以從台灣參加INGO的屬性及優勢找到一些思考方向。

根據“國際組織聯盟”(UIA)的資料統計,台灣在INGO參與類別最多的集中在醫藥(405)、社會活動(370)、健康照護(367)、休閒(296)、教育(280)、創新變革(268)、工業(267)、社會(255)、宗教活動(237)、研究(237)、商業(220)、社會問題(202)(括弧內為參與INGO類別總數)。上述統計基本上採重複統計,同一團體

可以分屬不同類別,不過仍可以看出台灣NGO主要參與的INGO類別,從這些數據可以看出,台灣在INGO的參與主要集中在一些專業組織。另外,台灣在WHA的參與得以突破,雖然跟事先與中國大陸彼此建立默契有絕大關係,但部分也是因為台灣已在醫藥及健康照護領域的專業程度,深獲國際社會肯定之故。以此類推,台灣其實在許多INGO相當具備參與優勢。

3. 兩岸交流平台與和平發展

在台灣順利成為WHA觀察員之後,台灣方面當然希望能逐步擴大參與各類IGO,考量中國大陸方面接受程度,雙方最有可能會就功能性高、政治性低的IGO進行雙邊交涉,如經貿、環保、衛生、通訊、治安等專業議題為主的國際組織,或者在正式國際組織下的條約或安排,如WTO架構下的政府採購協議(GPA);WHO架構下的6大通聯機制及其技術性會議等等。這些組織因為偏向專業技術及特定功能,涉及的政治層面較少,較不會觸及對兩岸當局都極敏感的主權問題,兩岸當局可以找到個別有利的詮釋空間。更進一步而言,中國大陸方面如果可以透過已加入的INGO,跟台灣INGO多方互動,也可以開展更多交流的空間,並且逐步提高交流層次,達到和平發展的目的,以下試分幾點說明。

(1) 透過INGO強化交流:因為階段性發展的特性,中國大陸NGO多少都有黨國部門的介入,目前中國大陸在國際組織登記有會籍的NGO高達三千多個,如果能透過黨國部門的統合協調,強化參與同一INGO的兩岸NGO間的交流,則數千個INGO都可以變成兩岸重要的民間交流平台。

(2) 從INGO過渡到IGO:在可預見的將來,兩岸參照WHA的協議模式,或另外協商出其他新模式,台灣應可以有更多機會參與IGO。然而,如果參與IGO數目過多,政府部門一時難以覓得足夠專業人才,勢必要藉助有國際參與經驗的NGO其專業與人才。以台灣NGO目前在INGO參與的密度,可以充分提供過渡期間政府所需的協助。

(3) 從IGO過渡到政治或軍事安全談判:兩岸長期以來在各方面交流越發深入廣泛,但是在主權問題雙方歧異仍大,需要更多時間及空間來逐漸降低分歧。台灣方面因為長期以來在國際參與空間受到壓抑,因此形成社會集體焦慮感,反而讓獨派主張可以獲得相當的共鳴。這種想要當家作的心態,可以透過IGO的擴大參與,讓台灣民眾逐漸降低不被國際認同的集體焦慮,也只有在這種前提之下,台灣當局才有空間與中國大陸展開政治談判,或才有空間進行胡六點第六項所提,建立軍事安全機制的談判。

總結從以上的分析,如果中國大陸當局能夠放寬台灣NGO參與INGO的空間,並且通過INGO及IGO階段性的升高互動,兩岸應該更可以降低分歧,逐漸達到和平發展共創雙贏的目標。

ECFA之後政治仍是禁區

台灣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教授 楊開煌

前言

在今年4月底，台灣“雙英辯論”之後，依民意調查的結果來看，理解的民眾逐步增加，兩岸的經濟協議的方向，也大致確立，際此大家都想知道，兩岸協商的下一步是甚麼，按兩岸先經後政的規劃，理論上可以將政治協商提上日程，但是馬英九在就職兩週年的記者會上宣稱：他不會在簽署ECFA後就與中國大陸討論政治問題或安排與中國大陸領導人會面，時機還沒成熟，現在也無法預測何時與中國大陸討論和平協議。縱觀馬英九在任上有關不與大陸談政治議題的談話，已經出現多次，另外台灣也總有部份人士認定ECFA是兩岸的經濟投降的同意書，所以簽ECFA之後，兩岸就不可避免地政治統一，立場並不一致的馬英九和台灣部份人士卻都對與大陸談政治感到猶豫，甚至是害怕，然而兩岸的政治協商是遲早不可避免之事，從台灣的角度，釐清問題的本質，理性面對實有必要。

解放馬政府的“禁區”

兩岸政治協商對馬政府而言，一直是“禁區”，結果從兩岸競賽的角度來看，政治協商就成了政府最被動的一環，甚至是馬政府的弱點，以至於拖累了馬政府在兩岸議題上的戰術主動性；在過去的兩年中，在兩岸議題上不論兩岸當局討論任何議題，只要大陸當局提出政治性講法，或是在野黨攻擊政府在協商中出賣主權或是懷疑政府與對岸有政治互動，就可以打亂政府的戰術佈局，必須抽出精力、時間、資源出因應原本子虛烏有的情況。久而久之，政府的弱點就暴露無疑，從大陸當局到台灣在野黨都可以公開、大膽、毫無顧忌的利用此一弱點，控制兩岸關係的發展速度，以至快慢由人，陷入被動。兩岸政治協商如何變成馬政府的禁忌？本文不作細論，本文集中在如何走出困境，大膽迎戰，爭回主動的策略作為。

馬政府陷入禁區的原因主要有歷史因素和現實因素幾大類：粗略而言，所謂的“歷史因素”既有傳統國民黨的失敗陰影，也有上世紀末主政者殘留的假議題——要相互承認對方，用一位好朋友的話，叫著誰與誰談的問題，傳統國民黨在國共的戰與和兩個戰場同時失利這是事實，但不論任何原因的失敗，都只能是審慎以對的行動準則，而不能是拒絕行動的理由。至於是“誰與誰”談的問題，在本質上是混淆了政治問題與法律問題的性質。在政治協商上是可以從不確定身份開始去談，談出結果再以明確的身份去進行有法律效果的行動。從此一邏輯來看，如果雙方的身份是確定的，則談判的性質與標的就不相同了。所以不知道是“誰與誰談”本身不是問題。所謂現實因素則包括了馬英九個人的原罪情結，台灣人民的民意反對，在野黨的情緒敵對，以及國際因素主要是美國的牽制；在這一部分我們以為正是馬政府必須在ECFA協議商定之後，應該有所作為的部份。

政治協商之定義

在兩岸的互動中，政治協議意味著甚麼，大致可以包含四大部分，第一部份是協商的參與者的身份，如：兩岸兩會就不是政治協商，所以身份上就必然是政府的官員，以政府代表的名義所參與的談判；第二部份是協商的內容，所謂內容是談甚麼，以現階段來看，其內容應指兩岸的政治關係，這裡又包括了“國”與“國”，政府與政府的關係，憲法與及憲法的關係及制度與制度的關係；第三部分是協商的目的是，以目前的態勢來看，不論是統一或是台灣獨立，應該說都不可能是此一階段的政治協商的目的是，應該說現階段的政治協商的期待，應該是維持現狀，維持現狀為甚麼要談判呢，因為現狀是一種動態的互動過程，所以具有可能的不穩定性，同時也有若干不確定性，因此，當前“政治協商”的目的，是為了使維持現狀的狀態更有保障，更加穩定。第四部分是協商的時機，如果在內部有必要而外部的情勢又能配合時，政治協商的需求必然大增加，反之，如果兩岸當局刻意的操作，則阻力會很大。

按上述的分析定義“兩岸政治協商”時，馬政府的下一個兩岸關係的施政目標，如果是為了穩定兩岸的現狀，則兩岸政治協商不但不是馬政府的禁區，反而是解放的對象。說得更嚴肅些是馬政府的政治責任，而且是在野黨現階段不可能完成的政治資產。只有馬政府願意更嚴肅、更認真地對待“兩岸政治協商”，才有可能提供台灣人民更有保障、更加穩定的台灣。

兩岸政治協商內容的分析

如果我們都同意，目前的兩政治協商的目的是維持兩岸現狀的穩定化，則政治協商的內容就十分明確：一是如何有效穩定現狀，二是在現狀之下安排兩岸當局的關係。那麼這樣的政治協商是否需要前題呢？在野黨提出兩岸在不設前題下展開政治協商，但是不設前題本身就是前題，其實中華民國政府可以代表去談，以至在野黨可以提出協商前題，會受到重視，都有一個合法性的前題，先缺此一合法性的前題，其行為就不會有效，所以政府的行為是必然有前題的，中共提出一中原則前題，我們如果擔心其政治陷阱，則可以提出各依自己的憲法為前題。而不是要求不設前題。因為在邏輯上不存在的。

那麼在“中華民國”的憲法下，兩岸當局的關係不可能是“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因為這是違憲的。所以，中共當局也就不必堅持兩岸先承認其一中原則的前題，只要堅持兩岸各自在現行的憲法架構下為協商的原則。

何謂兩岸現狀呢？按中共的理解是未統一、未分裂，詳細地說是法理上未分裂，現實未統一，所以國家統一是一大陸當局長期追求的政治目標，不過現階段他們的目標則是兩岸和平發展。

按“中華民國”的理解是按現行憲法“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國家，兩岸現狀是存在各不隸屬的兩個政權，未來的走向尊重台灣人民的意願”，所以國家統一是台北當局的選項之一，現階段兩岸平等交流，和平共處。

美方所描述的現狀，最權威的說法是“按我們所定義的那樣，兩岸和平解決紛爭”，美方的定義究竟

為何？以現在來看是一法、三公報、一聲明，總的精神是和大陸當局的未統一、未分裂比較相似，不過更強調和平只能是唯一的手段。

按上述關係各方對兩岸現狀的理解，當然是有分歧之處，所幸這是未來的走向部份；有交集的部份，正好是現在的部份。但是由於“未來的走向”的分歧，就規定了當前努力的不同，這就是此一現狀的動態衝突的根源，此一動態衝突構成地區的不安，大陸發展的干擾，主要是台灣發展的限制。所以大家都希望暫時凍解長期的、未來的目標，將現狀的和平發展暫時固定下來，此一固定自然需要兩岸雙方的同意，所以現階段兩岸政治協商的內容，就是共同尋找有效穩定“現狀”的辦法，依此解釋、宣傳和實踐，台灣的民意不是有近八成主張維持現狀嗎？所以台灣民意應沒有反對的理由。美方不是主張和平解決嗎？則美方肯定不會公開反對，事實上，美方在馬英九主政後也曾在中、美的聯合聲明（2009/11/17）中公開發呼籲“美方歡迎台灣海峽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期待兩岸加強經濟、政治及其他領域的對話與互動，建立更加積極、穩定的關係。”（The United States welcomes the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rela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looks forward to efforts by both sides to increase dialogues and interactions in economic, political, and other fields, and develop more positive and stable cross-Strait relations.）大陸當局自胡六點以來公開催促多次，也不會反對；馬政府如何打開自己的心結，認清下一階段對台灣有利的發展方向，則必須以之為努力的目標。

在上述大形勢不反對兩岸政治協商的情況下，兩岸政治協商的核心內容是甚麼？顯然不會是和平協議的條文內容，因為這一部份國際開參考的文獻很多，只要文字上略作調整就可以運作，也不會是統一字眼，果如此，在精神上就違背了維持現狀的協商，除非大陸希望破局，否則也不可能在此一問題上節外生枝。所以維持現狀的兩岸政治協商的核心內容是兩岸政治定位，由於當代政治學理的局限性，無法借鑑，按目前兩岸學者的研究文獻來看，大部分的討論和文本大都強調擱置爭議、治權不變、對等地位、內外有別、中期協定等五個原則。

擱置爭議是指只要兩岸當局各自在現行憲法的法理、精神約束下，暫不爭論兩岸之中的分歧，以免影響和平進程的推動。治權不變強調是在擱置爭議的基礎上，兩岸目前各自統治的狀態，不容改變，這是維持現狀最為根本的基礎。地位對等強調在上述的基礎上，兩岸的治權是對等的，換言之，大陸當局是甚麼，台北當局也是甚麼，在自己的地區各自為唯一而且至高的治權。內外有別強調上述的原則只適用於兩岸之間的事務，不適用於國際社會的組織機構之活動，有關兩岸在國際社會部份，由於涉及第三方，故而必需另外協議作出適當安排。中期協定是指目前兩岸定位只是30~50年的暫時定位，從而保留了未來兩岸當局和人民調整的空間和可能性，因此有可能化解兩岸間，尤其是台灣內部的統、獨之爭。

兩岸政治協商的當下努力

在上述的推論下，外在的阻力為何，基本上是外力的阻力應該是比較少，因為是以如此的局限兩岸當前的政治協商對外人而言，是沒有太大的影響，太大的傷害，而且時間逐步的調適自己在變局中的利益，這一部份對美國、對日本都是一樣。

至於內部的因素的阻礙是甚麼呢，在此的內部因素包括了大陸和台灣的因素，從大陸的因素來看，最大的問題在部份人士，並不要維持現狀的“政治協商”，他們強烈要求將統一的終極目標明文載入政治協商的文本協議之中，也有些人認為一中原則必須明文載入到政治協商的文本協議之中，如果中共當局最終採取了他們的建議的話，對台灣而言，自然是有疑慮的，從而不敢開啟政治協商，所以大陸必須在此一部分先行做出某些努力，以便兩岸可以順利的開啟政治協商。而台灣內部的阻礙因素，顯然就是部分人士的仇中心態，以及有相當的人士絕不能接受一中原則，而且認為一中原則就表示台灣主權的喪失；台灣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這一部份的則是台灣的菁英和國民黨有責任、有義務把事情說清楚講明白台灣的利益在一中原則下更容易被保障下來，更容易被彰顯出來，特別是當民進黨的十年政綱提出之後，國民黨更急迫必須有自己的新大陸政策的論述，告訴台灣人民如何在新的國際形勢下，為台灣籌劃新的出路，在從中國到世界的發展道路中，保障和發展台灣的價值，創造不同的台灣意義。

除了兩岸的各自努力之外，尚有共同努力的部份，倘若兩岸現階段的政治談判，其目的在於維持現狀、穩定和平，則兩岸當局有必要開啟兩岸的和平教育，和平教育是指透過教育的方式來傳播和平的價值和理念，我們認為唯有讓和平的價值觀在學習的過程中內化，兩岸之間，才可能擁有真正的和平，唯有讓兩岸人民真正體會到和平的手段更積極性、更持久性、更有效特別是更勇敢的方法，才有可能最終讓人們看到，兩岸當局真正放棄非和平手段，相信和平是兩岸的唯一選項，屆時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不僅擁有經濟基礎的保障，有了和平協議的保險，主要是有了堅強的社會價值的保證。所以我們如果真正希望兩岸和平的實踐，敦促兩岸主動、積極地推廣和平教育是兩岸當局的職責所在。

結論

台灣長期以來總是把兩岸的政治接觸、互動、協商、談判、協議，不論是甚麼，只要和政治相關，都被視為改變台灣的現況，因此自然而然就是不愛台灣，就和賣台、台奸有關，就貼上親中、親中共的同路人等等污名標籤；慢慢地在政治互動和不愛台灣、賣台等形成了一個怪圈，終於成為一種禁忌。此一禁忌還特別成為國民黨的緊箍咒，隨時隨地都是有效的醜化工具。而國民黨長期以來也只會被動解釋，馬政府也陷入相同的陷阱和困境，其實在當前全球化的趨勢下，政治協商大半都是鞏固現狀，維持現狀，因此，馬政府有必要從新的觀點認識兩岸的政治協商，以和平教育引導台灣民意重塑一個平等的兩岸關係新局，才有可能為國民黨帶來新的可能，特別是為台灣走出當前困境。

“和統真經”與“和統道業”

台海兩岸和平發展促進會創會會長 郭俊次

凡人，都有一生。

西洋著名政治哲學家——亞里斯多德(Aristotle)說的好：“人為政治的動物”。

我的一生。農家子弟，佛門弟子，世代務農，歷代信佛。生在台南縣北邊，八掌溪下游，一個窮鄉僻壤的很落後鄉下。喝阿里山的水長大的本土台灣人，小康之家。從小喜好中國歷史及地理。

小時，國小五、六年級的作文題上，兩次“我的志願”中，居然前後一致，立志要做一個偉大傑出的政治家。事後長大成人，才知當時的母校老師私下一連串的竊笑及反問說：這個孩子，和統真經與和統道業——台灣·和統會的解行報告胃口可真大，連吃飯都有問題，還想當官呢？

皇天不負有心人。結果，這個鄉下孩子，沒有任何背景，只靠讀書，居然兩關都滿票，拿到島內最高學位——政治學的國家博士(目前，早已取消此一制度)，曾經轟動一時。只靠考試，居然兩度高考“狀元及第”，竟成為媒體的短期寵兒。

學而優則仕。經身家安全調查，家世清白確定之後，才榮幸地進入行政院的核心中心，追隨 經國先生大閣下，去做為國效命，為民服務的頂尖政治工作。

為了理念，為了路線——反獨促統。這個鄉下青年，一度辭官(阿輝時代)，兩度拒官(阿扁時代)——(都是中央政府的特任官)，就這樣，正式離開二十五年的官場。榮華富貴，境界之前，如如不動。就這樣，贏得了：最勇敢的台灣人雅號(梁前會長肅戎先生大閣下的公開讚詞)。

遙想當年，清順治皇帝，棄官學佛，曾說：“我今撒手西方去，不管千秋與萬秋”。不愛江山，深愛佛法。禮敬讚歎，與日俱增。於今思之，很多聯想。

我的官場人生，從事務官到政務官，從科員到特任官。從政府官員到“國會議員”，遊走過“國民大會”、行政院、立法院，到考試院。並曾在第四選區，雲嘉南五縣市，最高票，當選過民選立法委員。

辭官之後，無官一身輕，就與立法院老院長，老領導，國民黨大老，東北硬漢——梁肅戎先生大閣下，共同創辦台灣·和統會(海峽兩岸和平統一促進會)，棄官修統，弘統利生，無怨無悔，光明正大，直到今天。我的一生，自期許：

第一，政治工作者，政治修行人，政治慈悲家，政治苦行僧——代眾生苦。有政治理論，也有政治實踐。

第二，第二，立志做大事，絕不做大官。自認：統派大員，紅海要角，和統專家——隨緣妙用，廣發和統心，妙感難思。

第三，一心一意，均以蒼生為念。不想自己，只想眾生。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當年，北

京·趙樸老召見時的面授機宜。)一門深入，長時薰修，全為政治。發心發願，透過政治，廣度眾生，利益有情。深信因果，離苦得樂。離究竟苦，得究竟樂。

第四，自命為政治慈悲家的先知先覺者，多元社會文化的傳教師。學為人師，行為世範。一步一印，自度度他。無有疲厭，直下承擔。引領風騷，創造歷史。

第五，和平統一，為我一生的最愛，也是唯一的偉大使命。我一再說：我是用這一個方式，來真愛我的台灣。用這一個方法，來真護我的台灣。

第六，修統、弘統、專修專弘，一向專念，一心圓統。解行相應，力行實踐，念念為眾生，念念為統一。斷一切獨，修一切統。是一個理想主義的務實家。普願眾生罪障悉消除，處處時時常行和統道。

二、甚麼叫做和統道業？

——和平統一為最崇高的事業

和平統一，是一種事業，也是一種志業，更是一種道業。

道業之深義及奧秘，大矣哉！

道字為者，儒釋道三家，都有很高的意含與說法。此處從略。

台灣島，是目前全球華人地區，儒釋道三教，融合一體，最成功、最典範的社區。

和平統一救台灣，和統道業愛台灣。這是我修統弘統中，精進的理念與誠敬的訴求。

一位本土的、正港的南台灣人，在走上和統的道業上，他深知：

——這是一條漫長的大道，這是一條艱困的大道，這是一條挑戰的大道。

——在這條大道上，必須要有使命感、責任心、榮譽度。心包太虛，量周沙界。拓寬心量，採紅海戰略。藍天與綠地，兩邊不著，我都要。和統大道上，不捨一人。

——和統道業，要能持久有恆，必須要有宗教性的信仰與狂熱。政教，無法分離分割，必須要配合運作。

——和統道業，一定要可大可久，必須紮根深耕。因此，需要教育、教學與教化。和統君民，教學為先。所以，必須辦班教學，為人演說，廣為流傳。

——和統道業，成功不必在我。薪火相傳，修行辦道，深信因果。修統弘統，為修因，必須往下紮根。成統圓統，為證果，才能往上發展。轉獨成統，此之為人間大利樂，肯定可以添福添壽。我常說：和統道業，主要工作在於：斷惑、除障、離念而已。台灣同胞，鄉親父老，惑、障、念三者為何？妄想、分別、執著而已。

——妄想者，台灣主權未歸屬、台灣地位未定論、台灣前途憲章說。

——分別者，兩國論、一邊一國論、一中一台論、兩個中國論。

——執著者，台灣，自古以來，就不是中國的一部份。台灣，應該獨立建國。

如何斷？如何除？如何離？這是和統道業的主要課題。我們講經說法，讀經研教，有漸斷，解悟的逐

步法。目前發現：上智利根者，以及下愚下智者，速度很快，甚有頓超的奇蹟。一般說來，中根中性的民眾，居大多數，也就是比較難度的苦海眾生。

和統道業的旅途上，我們精準看到，主戰場在南台灣，對象為閩南人。屢試不爽。我們深知：台灣島是政治島。在高度自由民主下，三T一F(台獨、藏獨、疆獨及法輪功)，諸多惡人，俱會一處，不能不高度警惕與正視。

台灣島，亦為一個正宗典型的宗教島。香火鼎盛，歷代不衰。佛道盛行，諸佛、菩薩、神明，威力加持，至誠感通，心淨則土淨。確實是一塊寶島。

古今中外，政教可以配合，更可以合一。台灣島，有此一優勢條件，更加突顯。若能再加肯定，並加強發揚，對和統道業的開展，事半功倍，勢如破竹，自不待言。

我也常說：不怕念起，只怕覺遲。藍綠一念間，統獨一念間，生佛一念間，迷悟一念間，都在島內上空打轉。迷惑顛倒，可憐憫者。

如何轉迷成悟，斷獨修統，這需要教化、教育、教學。我也發現：人之初，性本善。人是可以教化的，人是可以施教的。個人根性雖不同，隨機應教，都會成功的。

和統道業上，為甚麼要有和統真經？身在強顯的政治島及宗教島，在其雙方的互動中，為期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信解與行證相配合。解行不二，善巧方便，深解義趣，其理不言，應已明矣。

三、何謂和統真經？

——和平統一必須要有經論

和平統一，為本人之最愛，也為本人之使命，更為本人之志業。一生走來，始終如一。

和平統一本願經：本願者，根本之志願也，本來之願望也，法爾如是之心願也。

經者，徑也，鏡也。永恆不變，長長久之真理也。

台灣島，為儒釋道三教結合，三家融合的一個宗教島。經典之多，家喻戶曉，汗牛充棟。

——儒者，有五經、十三經、三字經……。

——釋者，有華嚴經、法華經、金剛經、

彌陀經、無量壽經……。

——道者，有道德經、感應篇、因果論……。

在和統道業上，和平統一要在台灣深耕發展，一定要注意到台灣島上的政治、社會及文化生態。將政治與生態，結合在一起，透過無形有力的宗教，才能勇猛精進。

我們已經追隨佛教的法會，及道教的廟會，將和統真經，走入基層，走入民間，走入信徒，走入群眾。將和統道業，生活化，活潑化，地方化，宗教化……。工夫片片，很得受用。

和統真經之為何物？它是一種經典，一種論述，一種文章。一項理念，一項路線，一項願景。它是一

種思想，一種信仰，一種力量，它是一部非常嚴肅感性的經典。

和統真經，它是和統道業的起信論。真信切願，信受奉行。教化眾生，離苦得樂。有人說：它是難信之法。我說：知難行易，不可思議之法也。弘統利生，持統修德，功德無量無邊也。

和統真經，為和平統一本願經之簡稱。大經大論，千經萬論。十六年來的公開行止，我們總共發表了280篇經論，共400萬言。全部集結歸納在四大總綱，也即四大法門之中。法法平等，無有高下。一即四，四即一。一法通，四法皆通。

第一是，堅持一個中國。（佔13%）。

第二是，追求和平統一。（佔58%）。

第三是，認同一國兩制。（佔3%）。

第四是，反對台灣獨立。（佔26%）。

這些大經大論中（共280篇），有些在

——台灣發表（佔29.4%）。

——大陸發表（佔43.9%）。

——海外發表（佔15.4%）。

——港澳發表（佔11.3%）。

千經萬論發表的年度、時間、地點、天數，都交待的清清楚楚，並登上本會網址。事實真相，公開透明，心昭日月。

和統真經，除了圍繞四大法門中，全方位論述外，對於祖國大陸，完全肯定地歌功頌德，禮敬稱讚，包括國家領導人的重要講話，包括國家級的中央慶典活動……。沒有一絲毫的批評或指責。純正純善，一心呵護，再三推崇，就是仰慕祖國，愛我中華。心中有願：希望國家早日完全統一，希望民族早日偉大復興。

為期和統真經的流傳與廣播，順暢快速，我們特別在阿里山神木旁，成立和統新村，作為和統講座的培育所，並為種子部隊的養成地。

這是台灣島高山上，一塊清淨殊勝的好道場。辦班教學，一班20人，三根普被，利鈍全收。三期有成，遍撒雲嘉南，高高屏八縣市，各鄉鎮村裏……，已經有了超勝獨妙的奇景。

和統新村的奇妙誕生，除了有感於統獨民調的怪異發展外——第二次政黨輪替後，抗統、阻統、拒統、反統的民調，一再攀升，心所謂危。此地，要特別感恩：湖北·武當山·玄天上帝的聖旨，才能成為和統弘傳的聖地。

它是至善圓滿的教育道場。為了培養弘統人才，為了訓練和統講座，和統新村是養賢蓄才，紹隆統種的革命聖地。希望日後有心的政治修行人，來到此地，能一歷耳根，永為統種。其目標：就是先有海東的和統之鄉，再有海西的和統世界。

我們又在新竹的玄奘大學，宜蘭的佛光大學，成立修統答問講習營，做為和統道業，紮根教育，深耕

發展，經驗交流的大平台。受持讀誦，績效顯著。

和平統一，必須要有真經，隨文入觀，望文生義。更需要有經歌，聞歌了悟，一悟千悟。我們經歌七首，皆有時代背景與歷史典故。非常感性，非常感人。非常溫馨，非常動容。打入心坎，午夜夢迴，聞歌促統，很得受用。

江山代有人才出，長江後浪推前浪。台灣統派的勢力，長年以來，非常孤單寂寞。我常說：和統會，絕對不能關門。和統新村，一定要永續經營。只要此一盞燈，發光發亮。和統道業，就有希望。

完全統一，就在明天。

四、時節因緣，全已具足

——我們已經準備好了！

台灣和統會，誕生在風吹雨打中，成長在風雨交加中，久經磨練，從未退轉。歷盡滄桑，可圈可點。我們秉持的毅力、勇氣與愛國，是可感動天地的。

多年流汗播種，全方位的思索與探討。有大陸因素，台灣因素，國際因素，華僑因素。有經貿面，有文教面，有社會面，有政治面，有軍事面，有外交面……。面面具足，圓融無缺。

為了開疆闢土，擴大效益。我們的組織佈建與經營，有三經一論（台北·和統會、台南·台統會、新竹·台發會，以及台北·四季紅）、一新村（和統）、一精舍（耕讀）。並有針對性的對象與目標，並有經歌、會歌、村歌、舍歌的配套教唱（詳見本會網站：taitong.china.myweb.hinet.net，和平統一本願經——和統真經第245及261篇）。

——為了推動台海的和平發展，我們早有合九條的提出。內有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軍事、外交……等面向的提法（詳見本會網站：和統真經第253、264篇）。

——為了追求台海的和平統一，我們先後有台七條的提出。內有國號、國旗、國歌、國都、國憲、國體……的提法。（本會網站：和統真經第7、15、17、36、38、77、174、262篇）。

——為了和統道業的加速開展，順暢示現，我們不自量力，已經準備好了。其中有：

第一，經279篇，以經會友。（詳見本會網站：和統真經第267篇）。

第二，歌七首，用歌修統。（詳見本會網站：和統真經第266篇）。

第三，道五門，門門要過，道法自然。（詳見本會網站：和統真經第270篇）。

第四，路四條，路路要通，力用兩種。（詳見本會網站：和統真經第273及274篇）。

第五，願四弘，信解行證，四弘誓願。（詳見本會網站：和統真經第275篇）。

第六，和發聯，統派大團結、大聯合，即荷花蓮化生願的提議。（詳見本會網站：和統真經第277篇）。

第七，發心發願，純正純善。十二大願度眾生，九朵和花登彼岸（本會網站：和統真經第189及224篇）。

We are ready！我們已經準備好了。這些千經萬論，將成為兩岸關係史上的歷史文獻。可以爭一時，也可以爭千秋。對得起列祖列宗，

也對得起中華民族。仰天無愧。

五、解行報告，圓成統道

——野人獻曝都在為統一

台灣·和統會，誕生在1998·4·19，於台北市。十三年的風雨歲月，從無變有，一再創造佳績。從島內到海外，從海東到海西，從北台到南台。一路奔波，一路辛苦。從未休息，從未停止。

這個史無前例，前所未有的島內公開行腳愛國大運動，猶如摸象過河，一步一印，非常謹慎。我們憑著一股宗教性的信仰與狂熱，愈挫愈奮，愈戰愈勇。我們憑著一股愛國心的驅使與呼喚，不敢停滯，不敢懈怠。

一路上，從不懷疑，從不夾雜，從不間斷。真心、深心、直心、發心。斷疑生信，信心不逆。

我們有論述，我們有活動，我們有表演，我們有示現。在新村及講習營中，這是我們的革命基地。我們講究六和敬及三和殿（太和、中和、保和），我們強調和合精神，我們深知：見和同解及暗和道妙的奧旨。

我們歡唱經歌七首，我們讀誦真經279篇，看到很多鄉親父老，點頭微笑，並說：願跟我們一起走。半夜興奮到失眠，非筆墨文字，或口頭語言可以形容。這種成就感，非局外人可以體會。

雖然，南台灣的台統會（台灣人民推動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成功率只有二成八，但我們不灰心，不氣餒。我常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地藏菩薩說：地獄不空，誓不成佛。我也說：統一未竟，絕不往生。我們沒有悲觀的權利。

真的，今天不做，明天會後悔。只有原鄉的人，回到自己的故鄉，才能起造偉大的事業。這就是我一生中的無私抱負。

台灣·和統會，信解行證，已經做到了。一路上，解行相應，有智慧，有悟證。有理論，有實踐。感應道交，無量議。看到我可愛的鄉親，有解悟，有漸悟，有頓悟。看他轉型，看他修統，看他弘統。不思議，妙矣哉！佛曰：不可說，不能說。

願解和統真實義之後，就要見諸行動。這中間，還要有願力。我曾為此，發過許多願。有十二大願度眾生，有九朵和花（和平、和解、和諧）登彼岸。其中，今年春節期間，在統派大會上，我又提出願四弘，共勉焉：

——第一願：藍綠眾生誓願度。（次困難）

——第二願：迷惑顛倒誓願斷。（最困難）

——第三願：和統真經誓願學。（次重要）

——第四願：統道無上誓願成。（最重要）

（詳見本會網站：和統真經第275篇）。

我深知：信·願·行三資糧，決定和統道業之成敗。真信·切願·力行，這是台灣島上，和平統一成功與否的關鍵不二法門。

我已奉獻我一生的寶貴青春。我常說：修統，為我人生最大的快樂。弘統，為我人生最大的享受。修統，必須斷獨，不論台獨或獨台。弘統，旨在利生。利生者，中華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根本利益與核心價值也。

眼看青天，仰望上天，當下求願：今生，希望能看到海西的和統世界。來生，希望能登上西方的極樂世界。此之為冥陽兩利，法喜充滿也。同志們，朋友們，福慧兩足尊，盡在此中矣！

修統四十年，從官場到民間。弘統二十年，從理論到實踐。世味那有統味香？一位和統道業的慈悲家，自度度他，自行利他。虛空有盡，行願無窮。自信他在走一條歷史性的康莊大道。



有統一的條件 才有統一的機會

台灣新黨秘書長 李勝峰

1988年，台灣開放大陸探親，正式開啟兩岸人民的交流，一直到08年開放三通直航陸客來台觀光。打破兩岸分隔數十年的藩籬，建立了人與人交流的機制。今年兩岸簽署ECFA建立更緊密、更自由、更正常的商品、資金交流的機制。從此兩岸間如人之雙手，一手人的交流，一手經濟的交流。兩岸建立起完全不同於冷戰對立的關係，也不同李、扁時代“民間交流，政治對立”的現象。

說兩岸關係，從此走向正常化是樂觀了一點，但說兩岸關係，從此再也難輕易被割裂，應是事實。深為中華民族一份子，強烈期待民族的統一與復興，但如何穩健邁向統一，邁向一個兩岸人民都能接受的統一，也絕非易事。面對當前的情勢，吾人以為，應先做好以下六事，統一才有討論的空間。

還原國共史

成王敗寇的法則下，國共雙方的歷史，都遭受雙方長期的扭曲。不只是政治宣傳的扭曲，更是將文學、藝術、影視、教科書、政治運動，進行政治社會化，成為人民內心價值的一部份。如台灣方面對中國共產黨的宣傳，至今仍深深地影響台灣人民對大陸，對中共的看法。也相當程度，提供助長台獨氣燄的養分。

大陸方面，對國民黨某些扭曲性的歷史評價，也影響著台灣對中國的認同。還原國共史，讓台灣人民了解，共產黨不是毒蛇猛獸，也應讓中國人民了解，中國國民黨曾在民族統一，領導抗戰，在台灣建立民主、富裕民生的功勞。從相互肯定雙方的歷史的正面出發，才有正面結合機會。

認識新中國

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新中國，不同於紅星八角帽、藍制服的革命小將。中國走出革命的狂潮、穿起西裝，在外是必須負起國際責任的大國，對內必須是建設大陸成為新世紀的新中國。讓台灣更認識與台灣差距愈來愈小的新中國，有利雙方認知的交集，有利雙方的互信，和相互欣賞。進而營造有利統一的氛圍。

認識原中國

原中國就是歷史的中國。不是政權的中國。中國自古以來，追求大一統的中原政權心態，也不容國土分裂，更不容外族侵略，所以中國強盛了幾千年，鄰國不會被併吞。反之日本只強盛了幾十年，即東侵韓國蛇吞中國巨象，自食苦果。這種大一統，不分裂，不侵略反侵略的王道中原政權心態，不是當今大陸政府所獨有，係中國歷史的遺傳價值，國民黨執政於南京如此，愛心覺羅執政於紫金城也是如此。

認識原中國，就是要讓台獨們及帝國主義者不要誤判，所有與原中國價值的反動，都只是歷史的小漣，歷史潮流浩浩蕩蕩，不是少數人意志能左右的。

認識新台灣

1949年後的台灣，經歷使西方民主的洗禮，落實西方民主體制的運作，多黨政治、政黨輪替、多元異見、多元文化罔異於大陸的現行體制、和生活方式。大陸必須以更寬廣的視野，更大的胸襟欣賞，多元意見的台灣。台灣的成就是民族資產的一部份，講統一，也要將多元、分歧、異見的台灣，一併接納進去。

思考台灣路

台灣往何處去？這是一個嚴肅而難解的問題。統、獨之外，不統不獨的現狀維持，如何走？主張民族統一的中國大陸，不能強硬的安排台灣的出路，而是能理解台灣、了解台灣人當家做主的現狀。同時也必須體會台灣人，“擔心一夕巨變，一覺醒來，失去現有的生活方式”。這不是杞人憂天的說詞，而是台灣人內心深處的恐懼，這份恐懼不除，台灣往何處去，永遠是分歧。

共建新價值

兩岸的差距，是生活方式的差距，也是價值觀的差距。

兩岸在不同政治制度，不同思維的統治下，兩岸有價值觀的差距是正常的。價值是判斷是非對錯的標準，兩岸無法拉近雙方的價值觀，進而建立共同的價值觀，就容易衝突，不易整合。即使勉強整合，也可能貌合神離。衝突不止。

價值的重整、重建是一項巨大的工程，交流是必要的橋樑，法治是起碼的條件，道德是必須的規範。在此三前提之下，兩岸從不同不合，到同而不合到既同且合，兩岸統一就會水到渠成。

要實力更要魅力

1900年，八國聯軍的鐵蹄踩進北京城時，任誰也不相信二十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2010年的今天，任誰也不敢否認，21世紀不是中國人的世紀。

強大為訴求的中國，對世界和台灣，都是一種威脅，至少是，心生畏懼的威脅感。做一個偉大的中國，中國將是人類的資產，吸引台灣的磁場。中國大陸對台灣展現了實力，會讓台灣人恐懼擔心，中國大陸向台灣展現了魅力，會讓台灣人心動靠攏，偉大而散發魅力的中國大陸，是促進兩岸統一最大的動力。

馬英九“外交休兵”與兩岸關係

台灣國立政治大學國發所碩士 周鴻昌

前言

馬英九上台后曾表示：新政府自上任以來採取“活路外交”與“外交休兵”的政策，不再與中國大陸在對方的邦交國惡性競爭。

2008年台灣政權輪替，馬英九上任、國民黨重新取得執政權之後，兩岸之交往開始有了新變局與新契機。馬英九於競選期間就已經大打，有別於民進黨執政八年時期的兩岸開放牌，兩岸政策也成為馬英九與其對手謝長廷政見最大差異之處，選舉過程中，雙方陣營不論在公投議題、蘇花高興建、經濟願景上都採取相似而模糊的手法，唯獨在兩岸政策上，雙方採取了開放與保守的政見方式，馬英九也在競選政見中大力抨擊民進黨，主張採取開放態度具有彈性的“活路政策”。

而馬英九於2008年5月20日就職典禮演說上強調：“兩岸不論在台灣海峽或國際社會，都應該和解休兵，並在國際組織及活動中相互協助、彼此尊重”。除明確的表達兩岸休兵政策外，馬政府也的確在兩岸交流開放上取得不錯的成績。但是，兩岸休兵政策的主張卻受到不少的質疑與抨擊，畢竟兩岸休兵並非單方面宣佈即可貫徹執行，是必須靠兩岸共同協力完成的。而本文之目的就是要來檢驗兩岸休兵的內涵以及可行性之評估，從馬政府執政的一年半來檢視兩岸休兵政策的恰當性。

兩岸休兵之淵源與意義

一、“外交休兵”的源起

“外交休兵（Diplomacy Truce）”並非創新之名詞，在兩岸兩會會談初次成功，兩岸政治氣氛和緩之時就有人提出“外交休兵”的想法，但隨著李登輝出訪美國導致兩岸關係急凍之後，就沒有後續的說法了。一直遲至2004年大選之時，連宋陣營在政見中的“外交政策白皮書”提出了類似的概念，主張兩岸擱置政治爭議，共同參與國際組織的政策。

在連宋提出了類似“外交休兵”的概念之後，真正將“外交休兵”一詞提出的卻是在2000年民進黨政府時代，由“外交部長”田弘茂所提出，田弘茂部長主張兩岸不互挖邦交國，但卻遭到陳水扁的駁斥，陳甚至公開說：“外交是應有的作為，外交不能休兵。”

因此，“外交休兵”在民進黨執政八年間就未再出現。而之後到了2008年的“總統”大選，與連宋同屬泛藍陣營的參選人馬英九在“外交白皮書”中則嚴厲批評民進黨政府的“烽火外交”路線造成台灣的外交困境，其主張應該採用“彈性務實”的手法，製造兩岸雙贏的局面。到了馬英九於2008年5月20日正式就職之後，馬英九就正式在公開場合提出了兩岸“外交休兵”的名詞，並且作為兩岸政策具體落實施行。

中共對“外交休兵”之態度

中國大陸方面是台北方面推行“外交休兵”最主要的互動者，如果中國大陸方面抵制台北的“外交休兵”政策，那麼“外交休兵”幾乎就會變成台北一廂情願的泡影，就如同“雙重承認”一樣，成為空談。因此，中國大陸的態度將成“外交休兵”成敗與否的最大關鍵。而中國大陸方面最早在1999年3月中共第九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記者會中，即有記者向當時的中共外長唐家璇提出，台灣有部分人士希望“外交休兵”，停止與中共的外交對抗，不過唐家璇對於兩岸能不能進行“外交休兵”的回應頗耐人尋味，他指出“還不能就事論事地從字面上來議論這個問題，而應該透過現象看到實質。”所以唐家璇並沒有拒絕或反對這樣的概念，中共的態度基本上是非常“模糊”的。而馬英九政府上台之後，正式的在公開場合中拋出了“外交休兵”的議題，而中國大陸方面的回應基本上呈現了一種“模糊但具善意”的情形，也就是不在對台灣發表強硬的話語，並且減少國際打壓與增加兩岸交流。但中國大陸的對台態度仍有一定之規範可循。

一、兩面手法、內外有別

馬英九政府上台執政之後，中國大陸方面對於台北的態度明顯較陳水扁執政時期熱絡和善許多，對於台北方面釋出許多善意，例如三通的開放、開放陸客登台等等。但是，又例如說馬英九曾在2008年12月間投書國際媒體，公開呼籲中國大陸方面撤除對台飛彈，但是中國大陸方面卻予以冷處理，中共國台辦發言人王毅回應兩岸關係應該要“先易後難”、“先經濟後政治”沒有正面回應台北要求。

二、“有條件”或“有限制”的開放

基本上中國大陸對於“外交休兵”至目前為止是採取了“不反對”的態度，但是要看到中國大陸主動公開支持，或是認同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因為在中國大陸的主張中，台北方面是沒有國際外交權力的，中國大陸如果公開支持，無疑就是承認台北的外交權。不過兩岸氣氛當前是非常熱絡和緩的，中國大陸如果對“外交休兵”全面反對或是拒絕，將對當前回暖的兩岸氣氛造成傷害，因此中國大陸採取了“有條件”或是“有限制”的開放方式。

最明顯的實例就是關於台北在2009年5月18日成為世界衛生大會（World Health Assembly, WHA）的觀察員，這是台北自1971年退出聯合國之後第一次重返聯合國組織，意義非凡。從外觀來看，中國大陸對於台北在外交上釋放出極大的善意，但是台北方面得以參加的方式是WHA，以邀請台北成為觀察員的方法來參與大會，仔細來看，台北方面參與的名稱是“中華台北”（Chinese Taipei），而WHA觀察員參與的方式是一年邀請一次，也就是說如果2010年中國大陸與台北關係惡化，北京是可以決定拒絕在2010年邀請台北以觀察員身分加入，此外，台北參與的名稱也並未有進步，仍然是採用奧運模式主權色彩非常低的“中華台北”，從這樣看來中國大陸開放台灣參與WHA所做的讓步實在有限。

此外，中國大陸方面之所以會用“有限制”或是“有條件”的開放方法，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也是顧

忌台北方面是民主政治，採用政黨輪替的執政方式，萬一馬英九政府在四年之後無法連任，中國大陸若是一次性的對台北退讓開放，有可能像是“潘朵拉的盒子”似的，一發不可收拾，反而讓中國大陸不喜歡的台北繼任者得到好處。

三、強調一個中國原則，關於主權議題絕不退讓

由於中國大陸方面在建國之後，經歷過一段長時間被國際孤立和包圍的時期，因此中國大陸高度重視國家主權和政權合法性的問題，在台灣問題上中國大陸方面更不能放手，盡管中國大陸在1971年進入聯合國之後，已經開始獲得世界大部分主要國家的承認與支持，但是依舊放不下台灣問題，而且遲遲不願放棄以武力犯台之想法。

四、採用個案處理原則

所謂的個案處理原則就是指台灣的國際空間上有官方與非官方之分，在官方中又有多邊組織和雙邊組織關係，而在國際組織裡面，又分成聯合國組織與非聯合國組織，這些不同的情況給予了中國大陸操作應付台北“外交休兵”的主張。原則上中國大陸對於非官方組織都採取開放態度，但是對於官方組織就多所限制，尤其是聯合國組織中更是如此。例如前面提及的WHA觀察員，還有像是兩岸三通的航線問題，究竟要列為國際航線還是國內航線？最後採取了折衷、模糊的“特別航線”模式來解決。

“外交休兵”的實踐與挑戰

一、“外交休兵”的內部挑戰

1)、藍綠對立隱憂

從2000年政黨輪替之後，台灣的內部政治板塊逐漸形成藍綠兩大塊，除了政黨認同壁壘分明之外，藍綠各自所屬的陣營也有著強烈的意識形態對立。在民進黨執政的綠色時代，對中國大陸方面采用非常強硬的態度面對，而中國大陸也回以顏色，在國際上全面壓迫封殺台北的生存空間。因此，當政黨輪替之後，國民黨的藍色陣營重新取回政權，將兩岸由對立轉為合作。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往往會出現非理性的政策，也就是綠色陣營有可能為了鞏固意識形態與選票，不願意去理性評估兩岸開放政策，而相同的，藍色陣營也有可能為了自己的選票與意識形態，忽略了固守台北利益的情況，而當這樣意識形態極度分明對立的情況下，就很容易出現“為了反對而反對”的不理性行為。因此，“外交休兵”這樣需要高度專業性評估的外交戰略，也極有可能會犧牲在這樣充滿對立不理性的政治氛圍中。

2)、國家認同問題

台灣基本上是屬於移民社會，有五大族群：“原住民、閩南人、客家人、新住民、外籍移民配偶”，而且又在短短的四百年歷史中經歷過了六個不同政權的統治或殖民，因此對於國家認同是有很大歧見與差異的。尤其是在國民黨政府遷台之後，出現了所謂的本省、外省的對立，使得國家認同出現了裂痕，因此連在最基本上的國家定義都有爭議，出現了台獨、統一、維持現狀的說法，台北與中國大陸間的關係

究竟為何？連政府也都是隨著執政者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從李登輝時代提出“特殊國與國”論到陳水扁的“一邊一國論”，再到現今馬英九政府定調的“一國兩區論”。由此可見，連國家認同這樣應該一致對外的基調都無法決定，“外交休兵”基本上是建立在極不穩固的基礎上，隨時都會被推翻改變的，加上“外交休兵”中在中國大陸觀念裡必須有個前提共識是一個中國，但台灣民眾的國族認同卻是隨著時代而改變，越來越多人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比例明顯增加—見表1，因此國家認同問題也是“外交休兵”中的重要隱憂。

台灣民眾 台灣人/中國人認同趨勢分佈（1992~2009.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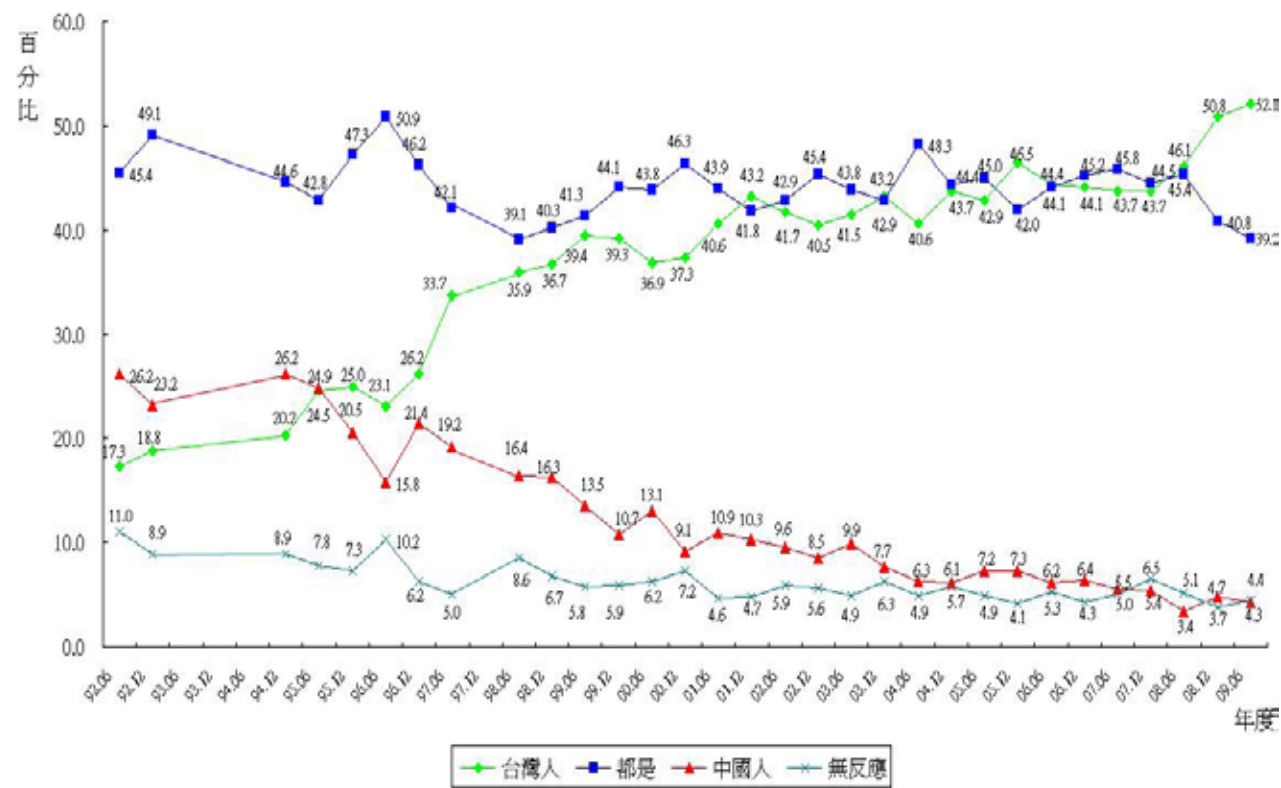


表2

	樣本數	中國	美國	日本	南韓	不知道/拒答
全體	1078	51.70%	3.80%	5.40%	9.30%	29.80%
民進黨	226	74%	2.50%	0.70%	9.80%	13.10%
國民黨	398	49.40%	2.80%	9.70%	12.10%	25.90%
親民黨	8	49.10%	0%	25.60%	0%	25.30%
台聯黨	16	44.50%	12.80%	0%	4.40%	38.30%
新黨	12	48.40%	5.90%	0%	37.40%	8.40%
其他	2	34.60%	0%	0%	65.40%	0%
無政黨傾向	378	42.20%	5.50%	4.10%	6.10%	42.10%
不知道/拒答	38	44.70%	0%	0%	2%	53.30%

結語

兩岸自從民國三十八年國共內戰之後就陷入了長期對立的氣氛，在東西德、南北韓相繼統一、相互承認之後，兩岸間的問題也讓大家開始思考究竟如何解決，是要跟德國一樣和平收場、還是得像越南一樣血腥結束，我想後者絕非你我所望。和平與發展已經成為當前國際政治普遍認同支持的價值，因此各國外交政策也都以和平發展為目標，在兩岸經歷過2000年至2008年這段期間的高度緊張對立後，台北方面藉由政黨輪替之後的機會，重新訂定兩岸政策，並且率先提出“外交休兵”的戰略，向中國大陸遞出和平的橄欖枝，這樣的作為應該是被肯定與支持的。但筆者認為，“外交休兵”絕非我方長久戰略或是最終目標，“外交休兵”只是一種戰略，應該是過渡時期的，兩岸和解才應該是最終目的，筆者不敢奢望兩岸能夠在短時間做到東西德那樣大和解的氣氛，但是希望台北方面能夠莫以達成兩岸“外交休兵”就自滿，應該是以兩岸全體人民的福祉為目的，簽署和平協議，共同創造兩岸和平發展的環境。

3)、選民喜好問題

學者徐永明在他的文章“兩岸外交休兵對台灣內部政黨生態的可能性衝擊”一文中提到，基本上台灣民眾的國際地圖喜好是相當穩定的，並且也有一致的喜好性，跟對於“國內”議題是有所差異的，徐永明也舉了2008年選舉後的年代民調中心的民調來做佐證，民調中發現台灣民眾不分藍綠政黨傾向，認為對台灣最不友好的國家都是中共。

對台工作不可重北輕南

台灣傳統倫理文化發展協會理事長 陳孝忠

一、目前兩岸關係發展的現狀

自2008年以來，兩岸關係發展，發生了積極性的變化，在兩岸政府及民間共同努力奮鬥下，兩岸關係發展目前呈現出良好的趨勢，交流交往機制化和制度化的態勢也正在逐漸形成，社會發展融洽的氣氛，不斷的鞏固和發展。而且這種變化是越來越朝歷史性的和平發展轉變的。做為一個中華民族炎黃子孫，此時都更應該感到內心的激盪與澎湃，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可以說是所有這一代的中國人的共同事業，共同理想。兩岸之間，儘管目前很多事情問題沒有解決，但都朝著解決問題的方向在前進。

兩岸之間，人員往來交流、觀光、考察、學術、教育、商貿文化也越來越頻繁，只要這樣的態勢繼續發展下去，兩岸同胞之間就很容易產生互利互惠，感情融洽，情感深入，兩岸爆發戰爭可能性就越少，和平發展的前景就越廣闊。這是呈現在世人面前的兩岸關係的現況，做為中華民族的一分子，都應該分擔這一份歷史遺留下來的責任，也為後代子孫創造一個良好的和平自主氛圍。

二、目前兩岸關係發展呈現的問題

依筆者觀察，自2008年以來，台灣政局發生正面性的變化以來，雖然交流機制化，制度化不斷的確立，然而令人憂心的一面仍然充滿變數，充滿嚴峻的挑戰。作為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府和民間單位，更應以臨淵履冰的態度來面對。個人覺得有以下幾個方面：

1、台灣內部、朝野民間對國家認同，統獨認同差距過大，呈現了兩個極端，這兩個極端形成對立已經是長久的事，如何拉近這兩個極端，則是一個長期性、深入性的問題，尤其在台灣中南部，更形成南北對立意識的型態，統獨無法相處對話、交流。在台灣內部尚且如此，更何況大陸對台的工作的不易，台獨思想分子，法輪功分子，疆獨，藏獨，幾股力量在民間尤其中南部，潛伏深入，到處流竄，串連互相結盟，可以說這幾股力量是在伺機而動，不可不慮。而台灣中南部也是台灣執政當局比較輕忽，比較不重視的地方，同時也是大陸對台工作中最不重視的地區；所以這幾股力量的流竄，串連是很自然的。

2、大陸執行對台工作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給台灣內部的觀感是重北輕南，重高輕低，好高騖遠，不能落實胡錦濤主席關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六點意見”。經常做的是親痛仇快的事，硬是把純樸、敦厚，樸實的基層民眾推向對立面，實在令人感到扼腕。但此一現象在最近兩岸交流中，許多團體深入基層直接向農漁民採購案中，似乎看到了逐漸在改善當中了。

目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另一令人憂慮的問題，就是過高的期待執政的國民黨能解決所有兩岸問題，

國民黨本身就是一個積重難返，利益集團盤據的一個黨，內部傾軋，買空賣空，投機倒把處處皆是。真正在為民眾謀福祉，為兩岸和平發展貢獻心力者，寥寥幾人？只有個人利益，沒有黨的利益，沒有國家民族的利益，試問如此的黨能靠的長久嗎？能靠的安穩嗎？兩岸交流參訪中越是層級高者越應往基層走。過去來台參訪交流中往往層級不是很高的就越是想見層級高的，最後看到的問題是見樹不見林，不能見森林之堂奧！

三、兩岸和平發展的期待

綜上所述，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筆者認為必定是一個過程，而且可能是一個很長的過程，必須所有兩岸四地包含海內外所有炎黃子孫，共同投入，共同努力。具體落實胡錦濤主席所提“六點意見”一步一腳印，凝聚共識，深入基層，傾聽來自最基層的聲音，真心實意的關心、關懷、關愛基層民眾，從生活上，工作上去解決基層的問題。唯有如此，也才符合胡錦濤主席指出的，要牢牢把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主題，積極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由ECFA簽署所想到的

美國華盛頓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創會會長 黃企之

從長遠處，廣大處，根本處，實質處，善導處來看，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定(ECFA)於2010年6月29日在重慶簽署，是中國近100年戰亂，由南北對峙，軍閥互鬥，日軍侵略，國共內戰，台海分裂，邁向兩黨合作，“左右合掌”的歷史新境界與促進世界大同的大好事。

這一新境界，是過去幾代人，以血以淚，一點一滴，以(勇)氣以力，一步一印開創出來的，來之不易。1911年推翻“大清國”後，八九十年前，為南北統一，共建中華，孫中山放棄兩廣，先後兩次北上(1912與1924)，惜於1925年病逝北京，遺囑召“開國民會議已廢除不平等條約”(以“還我河山”或“七子”，即旅大，威海衛，廣州灣，香港，九龍，澳門與台灣)。

六十五年前，為抗戰勝利(1945年8月15日)後，國共合作，重建家園，蔣介石與毛澤東舉行“重慶會談”(1945年8月29日—10月10日)，同意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解決，終因“讓利”不均而破裂。血戰三年，國民黨“轉進”台灣，以迄於今，六十年。

五年前，“為人民找出路，為歷史盡責任”，中國國民黨黨主席連戰，應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錦濤之邀，於2005年4月29日，即“汪辜會談”十二周年之日，在北京舉行“胡連會”，達成“五項共同願望”共識。

不打不相識。國共打鬥八十三年(1927年清黨)，方始體驗到古訓：“有反斯之仇，仇必和而解”之可貴。今日，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定之簽署，對今後兩岸，乃至全球之和平發展，邁向天下一家，都具有極為重大歷史意義。

謹以所見所聞，所思所想，秉筆直書如下：

1. 說事易，做事難，成事尤難。感謝江丙坤與陳雲林以及二人助理，辛苦了。作為海外孤臣孽子，向你們歡呼！
2. 溫家寶“讓利”說，是“仁者無敵”，“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我們應將中華文化，此一美德，向四海傳播。
3. 大前研一說，ECFA 是台灣維他命。“一中市場”是“兩國一制”。又說台灣約有2%人反對ECFA。
4. 我想，ECFA不僅是台灣維他命，更是台灣“救生圈”。沒有ECFA，台灣經濟勢有“滅頂”可能。所謂“兩國一制”是誤導，如為“兩岸一制”則無疑義，可保長久。偏安不能自保，分裂必將滅亡。唯有回歸祖國，才能確保平安(孫運璿)。

5. 據評估有2%人反對ECFA。但綠營於2004年“228”，舉行“反中公投”遊行，動員228萬人，聲勢浩大，而2010年“626”，舉行“人民公投作主，反對一中市場”遊行，擬動員10萬人，僅到3萬人，聲小如蟻。
6. “一國兩制”思想，源於“一人兩手”，左右兩手是天生；“一家兩制”，女子二人(女字加子字合成好字)是人情。皆和平發展，自然形成。在這個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的新世紀，“一國兩制”與“一球兩制”，勢將在和平發展與逐漸調整中完成實現。
7. ECFA對台灣有大利：對五大企業，化工，機械，鋼鐵，紡織，汽車有利；對2.27萬中小企業有利；對26.3萬人就業有利。台灣GDP提高1.72%。社會福利增加27.7億美元。ECFA簽後三年，外資平均每年流入140-240億美元，利莫大焉。這不是“黃金十年”，而是黃金百年開始。台灣簽署ECFA：無矮化自主權，無對外開放農產品，無開放大陸勞工，又有“日落條款”保障，可以說有百利無一害。
8. 台獨之興起，始於國共內戰方殷之日。廖文毅兄弟於1947年6月15日，在上海發表“台灣再解放聯盟聲明”，主張台灣由聯合國託管二至五年。台獨之衰亡，始於國共言歸於好之時。兩黨首腦，與2005年4月29日，在北京會談，達成“五項共識願景”，以“九二共識”為基，共謀人民福祉，達成和平協議，參與國際行動。
9. 蔣經國謝世時(1988年1月13日)，台灣零台獨，零負債。李登輝，陳水扁主政20年，台灣綠營蠢動，負債5兆。行筆至此，想到1991年所寫：“台獨者，台毒也。台毒必需早日化除。否則，必將台灣人民弄得民窮財盡，民進黨已成民盡黨了。陳水扁主台時實況是三高：高負債，高外流，高失業；四無：機場無飛機，港口無貨輪，園區無廠商，捷運無運量。
10. 台聯黨是目的性台獨，佔台獨1%。民進黨是工具性台獨，佔99%。台獨在島外鼓吹40年，在島內主政20年。陳水扁在2005年說，台獨他(李登輝)做不到，我也做不到。做不到就是做不到，不能騙自己。
11. 孫中山說：“凡事有順乎天理，應於人情，適於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為先知先覺者，所決意行之，則斷無不成者也”。搞台獨違天理，反人情，逆潮流，不合需要，勢必不成。
12. 以歷史的，世界的，哲學的，科學的，人性的觀點來看，在ECFA簽署後，順天理，應人情，適潮流，合需要之大事是聚同化異，一心一意促進中止敵對狀態與達成和平協定。

六成台灣民眾希望兩岸簽訂和平協議

台灣中國統一聯盟顧問 廖天欣

1871年在普法戰爭中敗給普魯士的法國，被迫將阿爾薩斯和洛林二省的一部分割讓給德國(普魯士統一德國)，當年被迫和祖國法國分離的阿、洛二省省民的痛苦，由〈最後一課〉可充分了解。61年前的1949年8月5日，美國國務院認定中共將統治包括台灣的全中國而發表白皮書。白皮書關於台灣的部分稱：“台灣人民受異族管轄50年，因之歡迎中國解放，於日本佔領期間台灣人民最大之希望為重歸祖國，1945年9月根據日本投降書，中國軍隊從日本手裏收回了該島。”

台灣人民被迫與祖國隔離、對峙有兩次，第一次是1624年荷蘭殖民主義者佔領台灣38年期間，台灣人民被壓迫、剝削非常痛苦。1661年2月1日鄭成功收回台灣四個月後去世，由其子孫鄭經、鄭克塽先後統治20年、2年，在鄭經父子統治台灣的22年間台灣人民一樣非常痛苦，因為鄭家小王國以20萬人民養2萬多軍人，還要去對抗土地三百倍大，人口上千倍的大清帝國。鄭經於1681年去世兩年後，其子鄭克塽向攻台的清朝水師提督施琅(原鄭成功部將)投降，台灣重回中國大家庭。

第二次是，1894年日本新帝國主義侵略者趁清末混亂、衰弱時打敗清朝佔領台灣。台灣人民在日本殖民帝國主義佔據50年期間被屠殺65萬人，日本在台灣的治罪，50年間一天都沒空過，台灣人民被摧殘、壓迫、剝削整整半個世紀。1945年8月15日台灣人民從收音機得悉日本投降都飛奔相告，呂秀蓮的父親興奮得三天睡不著覺。1945年10月25日台灣光復，全省六百萬同胞除了十來個漢奸莫不興高采烈，家家戶戶張燈結綵，廖文毅就在這一天出版《前鋒》雜誌，其發刊詞〈告台灣同胞書〉中指出，“我們是最有民族意識的中國人……”，他在另一篇〈光復的意義〉中說，“台灣光復的第一個事實是民族精神的振興，第二是國土重圓，第三是家人再聚，第四是統一的國家和統一的政府。”他因反對當局的獨裁貪污走入台獨歧路，後來改邪歸正放棄台獨。

台灣島與祖國大陸隔離、對抗、對峙兩次，時間間隔271年(1624, 1895)其隔離原因、過程、結果都很類似，即先由殖民帝國主義侵略者佔據然後收回，但因執行收回者都由於不願放棄既得利益而令台灣民眾與祖國大陸繼續隔離、對抗、對峙，第一次的最後結果，鄭家王國局促在東南小島台灣22年，因撐不下去而投降，台灣島回歸中國，大清帝國完成統一全中國。

台灣與祖國大陸第二次隔離(1895)，本來可於1945年日本投降而結束，不幸1946年內戰，使我國於1949年分裂迄今已逾一甲子。在這61年間從未訂終止敵對的停戰協議，因此在法律上技術上兩岸目前還是戰爭狀態。1947年到1987年這40年間的白色恐怖解嚴統治與長達40年未經改選的立委、國代，讓所有的台獨分子有了藉口：“國民黨搞獨台40年沒事，我們搞台獨有甚麼不可以。”1982年蔣經國失去結束兩岸敵對

狀態的機會，他不但拒絕了廖承志寫給他的勸和信，而且提不接觸、不和談、不妥協的三不。他說“我也是台灣人”與馬英九不說“我是中國人”，他們的說與不說，使台灣民眾說“我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的越來越多。蔣經國讓台獨分子李登輝繼承大位，李登輝又提拔陳水扁，使兩岸的分離逾一甲子還得不到解決。

1989年10月10日李登輝發表雙十節祝詞：“台灣的前途絕不能獨立於統一的中國之外，國家的法律絕不能寬縱任何分裂國土的主張。”1995年1月1日連戰行政院長發表元旦祝詞時說，“海峽兩岸可以進入國統綱領的中程階段了”。然而15年後馬英九竟然說，“我這一輩子看不到統一”。馬英九經常強調要維持現狀，他不知道陳水扁所派的首任行政院長唐飛於就任48天后的7月7日說，“海峽兩岸不可能維持現狀”，再過兩星期的2000年7月21日說，“我再說一遍，維持現狀這條路走不下去”。美國前國務卿奧布萊特再三說，“台灣不可能長期維持現狀，因為現狀有高度的危險性。”馬英九也蔑視《天下雜誌》2010年5月14日的民調，“有64%的台灣民眾希望兩岸簽訂和平協定。”

2000年6月14日韓國前總統金大中說，“兩韓的統一，並非條件式的題稱：而是具強制性的絕對責任。”2002年2月21日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在澳洲雪梨說，“中國的統一不可避免，兩岸統一的遲延只有增加台灣人民的痛苦。”61年來台灣當局在國土267分之1的台灣與人口多台灣60倍的祖國大陸對抗，台灣人民的痛苦可想而知，兩岸的統一遲延一天，台灣人民即多痛苦一天。2008年12月31日“告台灣同胞書”30周年座談會上，胡錦濤主席發表，“攜手推動兩岸和平發展，同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講話，提的六點宣示等同新的“告台灣同胞書”。講話全文五千多字提及“和平統一”13次，提及“統一”14次，中央人民政府對台政策顯然已從“反獨”轉為促統。深盼熱愛國家民族愛好和平進步的朋友們，為了早日解除兩岸敵對狀態，為了早日解除台灣人民的痛苦，請踴躍參加促進兩岸和平發展、和平統一的工作，共同奮鬥，早日完成歷史使命。

增進政治互信破解政治難題

菲律賓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秘書長 董拔萃

民進黨陳水扁政權時期，瘋狂的台獨活動導致島內社會動蕩，經濟重挫，台海局勢一度惡化至瀕臨戰爭邊緣。為緩和兩岸關係與尋找台灣的出路，國民黨主席連戰沖破台獨政權的重重阻撓，頂住巨大壓力，於2005年4月底果斷地率團訪問大陸進行“和平之旅”，國共兩黨以“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為政治互信基礎，胡錦濤總書記與連戰主席共同發表“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會談新聞公報。國共之間建立了溝通新平台，共同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2008年國民黨在島內重新獲取政權，海協會海基會隨即恢復協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成功舉辦，海協會海基會兩會領導人五次會談，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實現三通、ECFA簽署，兩岸關係進入和平發展軌道，開啟全新局面。

隨著兩岸經濟關係日漸密切，增進政治互信顯得極為重要。無需諱言，“九二共識”作為兩岸建立政治互信基礎進行良性互動，但由於對“一個中國”涵義認知的差異，這一基礎即顯得薄弱。在兩岸大交流、大合作、大發展迅猛異常的新局勢下，沒有雄厚堅實的政治互信基礎，不足以支撐這一大局。在兩岸關係又將進入另一新起點向前發展的關鍵轉折時期，沒有正確的安全軌道，不堪負載中華民族走向復興的時代列車，因而，必須增進政治互信，必須破解政治難題。

胡錦濤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三十週年座談會上提出“六點意見”，首要是“恪守一個中國、增進政治互信。”4月29日在上海會見出席世博開幕式的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及台灣各界人士，提出了“推動力、生命力、競爭力、凝聚力”促進兩岸關係，最重要的同樣是“要繼續增進兩岸政治互信”。7月12日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會見出席“第六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的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又再次強調：“兩岸增進在共同政治基礎上的互信，對下一步兩黨和兩岸關係發展至為重要。”

筆者認為，增進政治互信，即必須對一些“政治符號”，政治議題有準確的認識和有正確的解讀。諸如“九二共識”的核心，“一個中國”的內涵，兩岸的定位及“中華民國”身份地位等等。再者，要明確兩岸新局由何而來，如何鞏固，發展的路向及終極目標。要做到這一些，需要發揮智慧，更新觀念，活躍思維，超脫窠臼，不受“折磨人的政治符號”所困。

“九二共識”是過去兩岸打破僵局、建立政治互信的重要基礎，目前是兩岸增進政治互信不能不加以究竟的議題。也可以說，兩岸關係要深入發展，已是到了必須面對之前“擱置的爭議”，化解“對於一個中國涵義，認知各有不同”所存在的“異”的時候了。這是增進政治互信重要的切入點，化解這一“異”，兩岸關係將會朝著和平統一的方向快速發展。

目前的兩岸關係仍然本著“先易後難，先經後政，把握節奏，循序漸進”的精神發展。當形勢發展無

可迴避探討政治議題，解決政治難題之時，更應“正視現實”。兩岸對“九二共識”認知的差異在於：大陸方面為“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台灣方面認為“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筆者認為，在新時期新形勢下，可尊重“各自表述”，讓台灣當局完整地表述“一個中國之政治涵義”。即使因意識形態而與中國大陸對“一中”的認知迥異，只要表述出“大陸與台灣均是中國領土”，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不能分割，並願意擔負國家統一的責任，謀求“共同重建一個統一的中國”。這樣，即基本與大陸詮釋“一個中國”的“新三句”相呼應，在“一中原則”、“一中涵義”及追求為大目標基本達成一致，“各自表述”殊途同歸於“一個中國框架”，今後在進入談判之時，即使台灣當局把“要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國號應是“中華民國”，要施行資本主義制度作為條件提出也是可以的。

馬英九多次強調“正視現實”，為的是強調“中華民國存在的現實”。對此，筆者認為，1949年以前，中華民國政府代表著全中國，這是不可抹煞的歷史事實，國民黨政權退踞台灣之後，仍然沿用“中華民國國號”，這也是事實。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取代“中華民國”，時至今日，聯合國、國際社會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這更是不能視若無睹的現實。馬英九當局在強調“正視現實”不應片面，不應以小失大的同時，也應從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出發。

另一方面，大陸方面必須理解和正視的是，一部份民眾對“中華民國”的依戀、擁戴之主要原因在於，對中國民主革命先驅孫中山先生的信仰和對三民主義的執著，他們的理想在於“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雖然意識形態差異，但他們同樣是擁護國家統一、反對台獨、反對分裂的一股力量，這一力量，即以在台灣島內及海外傳統的國民黨人及支持者為主。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新時期，分別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為正溯的不同意識形態，不同背景、觀點的兩股力量，亦即對“九二共識”之“一中涵義”認知不同的兩岸雙方，應走到一起，坐下來探討解決政治難題，求同化異、凝聚力量，振興中華。筆者認為，在堅持一中，反對台獨的基礎上增進政治互信，兩岸在尊重歷史、正視現實，在法、理、情之間，會找到解決問題的好辦法。

眾所周知，自2005年國共“相逢一笑泯恩仇”，兩黨及至2008年5月以來兩岸當局的積極互動，兩岸關係的良好局面六十年來前所未有的。但是，如何看待“中華民國”、“台灣政治地位”，仍然是不可避免的棘手難題。對此，海內外專家學者提出了不少的見解和主張，較早前有認為應“互相承認”或“互不否認”；有認為“一國兩制”不適用台灣，要“一國兩府”；有認為要考慮建立“聯邦制”或“邦聯制”。2009年11月14日，兩岸政治學者在台北的“兩岸一甲子”研討會，這次被媒體稱為“兩岸二軌對話，重量級人物激烈交鋒”，有關增進政治互信議題的研討會，兩岸政治學者提出了不少主張及觀點。台大張亞中教授提出“一中三憲、兩岸統合”，建議以“一中三憲”明確界定兩岸政治定位關係；廈大台研院劉國深院長提出“國家球體”論述，以“國家球體”涵蓋兩岸現有兩個政權，做為處理兩岸政治關係依據。並認為“台灣所堅持的‘中華民國政府’在特定場合，事實上依然行使著代表中國的政治功能。”還有台灣地區其他有藍營背景的學者分別認為：“如果把‘中華民國’這套法統繞過去，兩岸談統一是有根的”；

“一中原則如擺在前面，兩岸甚麼都談不下去”；“對於‘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不能視而不見。”（<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又在最近，台灣政治大學邵宗海教授發表在新加坡《聯合早報》“探討馬英九的‘正視現實’”一文中提到，張亞中教授提出“一中三憲”的主張，最重要的是要解決“台灣的政治地位”問題，其構思“應是維護中華民國的合法及合理存在。”邵教授文中也提到他今年開始思考的一些看法，有兩個維持“中華民國”的建議給兩岸當局思考，其中之一是“回到‘1949年的中國’，讓台北以‘中華民國’的名義面臨兩岸談判”。

筆者之所以引用這麼多的資料，一則，這些基本可反映出國民黨關於政治互信議題和發展兩岸關係的看法和主張，二則為說明涉及政治議題的兩岸關係之複雜，各種主張之繁多，破解政治難題，確非易事。

對於上述的一些主張，筆者認為，互相承認或互不否認不可行，這樣有可能導致造成兩個中國或一邊一國，在兩岸尚未走向統一，未可預期的過程中存在著難於預測的變數及隱患。“聯邦制”或“邦聯制”不足取，台灣與大陸是兩個地區，不是“國與國”的關係，中國無可能先分裂成兩個國家，“中華民國”成為主權獨立國家，並加入聯合國，然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對等”的談統一，或“聯邦”。“聯邦”或“邦聯”不符現實，是行不通的邏輯。也不符合聯合國憲章和相關國際法，不符合國共兩黨和國際社會長期恪守的一個中國。恪守一個中國，正確看待尚未統一的兩岸，是中國內戰遺留並延續的政治對立，是有待解決的中國內政問題。兩岸關係發展要向前看，不能走回原點再次折騰，要懷有真正解決這一歷史遺留問題的誠意。

就現實而言，作為聯合國承認代表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一方，應放低身段，以最大的包容和誠意，作為大陸地區與台灣地區進行平等協商，這樣，既不是“國與國”，也不是中央與地方，而是兩岸談判，以滿足台灣方面所要求的“對等”，而不是被矮化、被吃掉。如果知不可為而強求，要求承認“中華民國”存在的合法和合理，“以中華民國的名義面臨兩岸談判”，這一瓶頸將無以突破。

建立“兩岸和平發展委員會”此正其時也。“兩岸和平發展委員會”可就經濟文化領域之外的相關政治、軍事、法律等著手研議，逐步把成果轉化為政策實施，在實踐中讓民眾了解，理解、檢驗、認可。兩岸在共同發展經濟和探討政治議題時逐漸磨合，假以時日，水到渠成，統一成立共同的願望。“兩岸和平發展委員會”在條件成熟之時，因應需要，轉換為“兩岸和平統一委員會”，解決政治難題。自家兄弟坐下來談，協商國號、憲法、社會制度，共同實現國家統一、振興中華。

為推進祖國早日完全統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兩岸同胞應從長遠利益出發，活躍思維，找出新辦法，好辦法，有效地破解政治難題，不應長期糾纏於歷史恩怨，不應無休止地讓政治符號折磨，耗費中華民族寶貴的資源和錯失走向復興的機遇。

把握時代機遇 共促僑團和諧

塞舌耳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 廖智鋒

不同背景的海內外僑胞本來就應該團結在一起，共同為中華民族多做有意義的事情。過去，由於兩岸關係的歷史原因，海外的華人華僑也形成了兩種派別。作為反獨促統重要力量的海外統促會，如何通過立足所屬國或地區，結合當地實際情況發揮各自優勢，促進最廣泛的團結，凝聚最廣泛的力量，圍繞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主題，促進海外僑界社團的和諧交往，是一個十分值得探討的議題。

關注中國對台政策，宣傳中國對台善意

中國政府歷來高度重視解決台灣問題，始終把實現祖國完全統一作為莊嚴的歷史使命。從確立“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基本方針，明確發展兩岸關係、推進中國和平統一進程的八項主張，到提出新形勢下發展兩岸關係的四點意見；從推動實現“汪辜會談”，到邀請國、親、新三黨主席率團訪問大陸；從制定《反分裂國家法》，到主動推出並積極落實一係列惠及台灣同胞的具體政策措施，都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堅強決心和不懈努力，表明了祖國大陸為台灣同胞辦實事、謀福祉的極大誠意和善意。兩岸交流交往的日益活躍，既體現了兩岸同胞感情上的融合和人心所向，也反映了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和祖國統一的歷史潮流不可阻擋。海外統促會可以登陸中國政府網、國務院台辦、僑辦以及統戰部、中國僑聯等相關政府部門的官方網站了解最新涉台方針政策，通過與當地外文和中文媒體的關係傳播出去，並在與當地僑團交往中及時傳達，使當地政府、市民和華人華僑及時了解祖國對台政策，理解祖國對台善意並逐漸形成共識予以支持。海外統促會關注祖國對台政策，不但可以正確領會、解惑釋疑，而且還可以同肆意歪曲者針鋒相對、據理力爭。

加強統促組織聯繫，互相交流總結經驗

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心願。在這一偉大進程中，遍及五大洲八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其中也包括與台灣有“邦交”的一些國家的近200個海外統促會，從無到有，從弱到強，是團結聯繫海內外同胞的重要橋樑和紐帶，是推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的重要力量。他們以拳拳愛國心，濃濃中華情，遍灑耕耘著中國和平統一事業的種子。他們其中不少人做團結華人華僑、促進祖國統一的工作已有十幾年、二十幾年，工作中在克服困難的同時總結了豐富的經驗。各地統促會通過“請進來，走出去”的方式加強統促會之間的聯繫，可以廣交朋友，交流心得，傳播經驗，少走彎路。近年來，塞舌耳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與印度洋統促會和全非洲統促會等同行保持了密切聯繫和溝通，筆者受聘擔任了印度洋統促會和全非洲統促會等一些同行的副會長，同樣，塞舌耳統促會也聘請了一些同行的骨幹為副會長或特別顧問。筆者認為，海外各地的統促會之間加強溝通、聯合和協作，能有效形成相互聯繫、相互

協調、相互支持、相互促進的機制，有效促進各地統促會之間和與其他僑團之間的聯合與協作。

貫徹統促組織宗旨 廣泛團結促進交流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的宗旨是高舉愛國主義旗幟，團結一切擁護中國和平統一的海內外同胞，推動台灣海峽兩岸的民間交流與往來，反對製造各種分裂中國的活動，促進早日實現中國和平統一。海外統促會也都是以實現中國和平統一為目的，以團結旅居海外僑胞及友好人士，促進海峽兩岸人民交流互惠，和平共處為宗旨。因此，為了團結海內外一切有利於促進祖國統一的積極力量，海外統促會要以海納百川的寬廣胸懷，始終堅持求同存異，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前提下，以共同文化淵源、共同民族感情、共同民族利益為基礎，努力與海外同胞聯繫更廣泛、合作更深化、感情更融洽，努力促使廣大海外僑胞圍繞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大目標形成凝聚僑心、彙集僑智、發揮僑力的局面。近年來，有的分裂分子已在某些國家成立所謂的“全僑民主和平聯盟”，與我們針鋒相對地爭奪海外華人。不團結海外台僑，就等於放任分裂分子的分裂活動。同時，海外各地的統促會要努力做好所在國家和地區政府、國會、智庫和主流傳媒的交流工作，宣傳中國政府在台灣問題上的基本方針政策，宣傳祖國對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誠意，盡力爭取國際友人理解並支援中國的和平統一事業。

促進加強合作交流 深入台內交往聯誼

去年6月8日，中國僑聯主席林軍與台灣“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理事長簡漢生在台北簽署了“加強合作交流協議書”，這是一個令全球華人振奮和鼓舞的喜訊，是全球華僑華人的福祉，是僑界社團和諧發展的一個良好開端和契機。

兩岸僑聯簽署“加強合作交流協議書”的目的是未來雙方將共同舉行論壇、進行專題討論，相互邀約訪問，加強彼此的合作，促進海外華人的團結。海外統促會趕乘這股東風，將聯誼活動深入到台灣島內去，既可主動與島內各界人士接觸，耐心聽取他們的看法和主張，並有的放矢地做工作，不斷向台灣島內同胞宣傳和平統一的好處和分裂的危害，以及廣大海外僑胞盼望祖國統一強大的心聲。又可讓更多的台灣同胞聽到海外統促會的聲音，感受到海外統促會的力量。本著平等互信、和睦和平的原則處理各種關係，是推進僑社和諧的關鍵所在。海外統促會赴台交往聯誼時要宣導和諧、和平、合作的理念，對於一些可能影響和諧的問題，應通過增信解疑，對話協商，求同存異，為存在的問題找到妥善解決的辦法。筆者認為，海外統促會以親情、鄉情、友情為依託，促進兩岸各個方面、各個層次的交流交往，可使兩岸同胞在擴大交往中增進了解，在深化交流中增強共識，共同反對分裂勢力、共同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

求同化異推進兩岸和平發展

菲律賓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 吳仲振

2008年5月，國民黨在島內重新執政，兩岸關係實現了歷史性的重要轉折，進入了和平發展軌道。特別是在兩岸同胞盼望數十年之久的三通實現後，又在6月29日簽署了“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標誌著兩岸經濟合作制度化，機制化進程邁向新階段，為兩岸共同發展經濟打下堅實基礎，兩岸交流合作，共創雙贏的前景將更為廣闊。

兩岸和平發展呈現的良好局面和強勁趨勢來之不易，這是海內外華夏兒女堅決反對台獨，堅定捍衛一個中國原則的成果。海峽兩岸和平發展的新形勢使海外華僑華人深受鼓舞，並期望兩岸朝著和平統一的方向持續發展，但也充份意識到，兩岸關係深入發展仍然存在著種種阻力。一方面，台獨分裂勢力還存在，仍然在破壞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另一方面，國際因素復雜多變，反華勢力不希望兩岸關係真正地和解，步調一致地走和平發展的道路，更不希望兩岸同心協力謀求中華民族的強盛，最終走向統一。這一勢力“以台制華”、對台軍售仍在繼續，加緊軍事圍堵的意圖更為明顯而且毫無忌諱地進行。

面對極為復雜多變的島內政治生態和國際環境，處於和平發展時期的兩岸雙方，增進政治互信，求同化異十分重要。遍佈在全球的海外兩岸僑團僑胞為振興中華的共同目標，積極地“求同化異”，在海外營造有利於兩岸和平發展持續地順利進行，並且向更深層次發展，向有利於中國和平統一方向發展的外部大環境，同樣十分重要。這也是海外華僑華人面臨的新課題，也是重要任務之一。

胡錦濤總書記在2008年12月31日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三十週年座談會，評價海外僑胞心係祖國統一大業，是反獨促統的重要力量，同時希望海外僑胞為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實現祖國和平統一做出新的貢獻。民進黨執政時期，陳水扁團夥瘋狂的台獨活動，導致兩岸關係惡化至臨於戰爭邊緣，在國家受到被分裂的威脅，民族的根本利益受到嚴重危害的台海局勢高度危險的時期，海外兩岸僑胞以民族大義為重，自覺地凝聚起反台獨、反分裂的共同力量與意志，與陳水扁台獨政權進行決不妥協的鬥爭，有效地遏制台獨勢力在海外的蔓延及台獨思潮的流毒，取得了反台獨的階段性勝利。台獨的直接威脅亦暫以解除，在和平發展時期，作為海外統促組織，在繼續高度警惕和注視台獨動向，堅持打擊台獨、遏制台獨的同時，針對新情況，新問題，以新思維，新舉措，把促進祖國和平統一向前推進，海外華僑華人極為注重並積極地探索。

中國僑聯林軍主席在去年6月7日應台灣華僑總會邀請訪問台灣時曾提出，只要贊成振興中華的偉大目標，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不論甚麼背景，甚麼觀點，大家都可以團結起來，走到一起。台灣華僑總會理事長簡漢生表示，邀請中國僑聯赴台訪問的目的，是在共同的總目標下，搭建起合作平台，為僑胞創造更好的接觸環境，共同建構和諧僑社。同樣是在去年6月，到美國訪問的國台辦主任王毅對兩岸可會出現的新矛盾，新問題即明確地指出，不僅要做到求同存異，更要爭取聚同化異。亦即“聚合兩岸同胞致力於

振興中華的大同，化解歷史遺留下來的種種心結和歧視。”兩岸僑團聚同化異，營造華人社會的和諧，對於整個國際大環境有利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積極作用不言而喻。

胡錦濤總書記7月12日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會見出席第六屆兩岸經貿論壇的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時表示，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的簽署，是落實“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的成果，表明在反對台獨，堅持“九二共識”的共同政治基礎上，只要雙方良性互動，平等協商，就能夠推動兩岸關係不斷向前發展，也能夠為逐步解決制約兩岸關係發展的難題找到可行辦法。胡錦濤強調兩岸雙方增進在共同政治基礎上的互信，對兩岸關係發展至為重要，希望通過增進政治互信，求同化異，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創造更有利的條件。

ECFA成功簽署，在一中框架內具有兩岸特色的經濟合作模式的成功範例，為今後兩岸之間良性互動，平等協商，解決難題積累了極為寶貴的經驗，這是兩岸關係重大推進的里程碑，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又一個新起點。兩岸有智慧處理複雜的經濟難題，同樣會有智慧解決敏感的政治難題。“只要厚植共同利益”，“增強休戚與共的民族認同”，當完全理解兩岸是不可分割的命運共同體，必須十分堅定地捍衛一個中國，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以保護共同的家園、謀求共同的福祉，實現振興中華的共同目標，兩岸同胞、海外的兩岸僑胞將會以務實的態度積極求同化異。

海外僑胞盡管有意識形態差異，有不同的政治信仰和政治觀點，但對於“大陸與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是海外華僑的娘家的認知卻是絕不會模糊的，在陳水扁台獨政權時期，兩岸僑團僑胞共同捍衛國家統一的意志即是最好的說明。

與兩岸大交流、大合作同步，海外的兩岸僑團也逐漸形成廣泛交流的局面。一階段來，兩岸海外僑團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感，維護中華民族根本利益的使命感正日益增進，親台僑團到大陸訪問、親大陸僑團到台灣訪問已極為頻繁，並取得積極的成果。

6月1日至12日，菲律賓中山學會、中國國民黨支部組團進行“溯源之旅”，訪問北京、武漢、南京、浙江、廣州等地，拜會了中央統戰部、中國統促會、全國人大華僑委、民革中央、宋慶齡基金會，與有關方面負責人進行座談，就加強聯繫、交流和合作深入交換意見，訪問團成員在參訪中表示，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經濟發展取得偉大成就，人民從溫飽逐步走向富足，社會從安定走向繁榮，呈現出欣欣向榮的發展前程，使海外廣大華僑華人感到由衷的高興。同時參訪團的“溯源之旅”，在香港碧雲寺拜謁孫中山先生衣冠、參觀宋慶齡故居、盧溝橋、辛亥革命武昌起義軍政府舊址、南京大屠殺紀念館、杭州秋瑾墓、西湖嶽飛廟、中山市翠亨村孫中山紀念館、廣州黃花崗七十二烈士陵園、廣州黃埔軍校等。他們表示，通過“溯源之旅”，深感國民黨的歷史主線是愛國反分裂、求統一，同時感受到中國大陸開始正視國民黨在民主革命和抗日戰爭中所起的重要作用。2005年開始，國共兩黨的溝通交流，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起著積極作用。

實現國家完全統一，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與崛起是全體華夏兒女的共同心願。有強烈民族自尊心和歷史責任感的海外兩岸僑胞，應義無反顧地履行莊嚴的歷史使命，只要認同中華民族，有志於振興中華，堅持一個中國，沒有跨越不了的意識形態鴻溝，新形勢新時期的海外兩岸僑團，應與時俱進，努力踐行求同化異。

兩岸關係形勢和展望

全日本華僑華人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副會長 陳仁端

自從2008年6月台灣的政黨輪替以來，台海的緊張局勢趨於緩和，兩岸關係進入和平發展的階段。隨著這種形勢的變化，海外華僑華人的反獨促統運動自應重新審視目前形勢和展望，調整今後活動的方針政策。兩岸關係雖然進入和平發展的軌道，可是應該看到內外反華、台獨分裂勢力對和平發展、祖國統一的阻撓和破壞陰謀活動從來沒有停止過，對此，我們必須提高警惕。

最近值得注目的是今年6月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定(ECFA)簽署後台灣當局的一些動作。一個是今年8月4日，台灣陸委會主委賴幸媛在華府美國企業研究院的演說。據各方媒體的分析報導，賴幸媛演講的要點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 (1) 呼籲大陸廢除“反分裂國家法”。
- (2) 台灣可能要以政治利益出發與其他國家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有關過程要排除大陸及兩岸關係因素。
- (3) 對美國暗示台灣仍可以起遏制大陸發展的作用。
- (4) 呼籲美國繼續在兩岸關係方面介入，保持軍事壓力。

另一個是，與賴幸媛演講的同一時間，“台灣總統府”發言人羅智強宣佈台灣與新加坡聯合發表一份聯合新聞稿，雙方決定推動台新在WTO架構下簽署經濟合作協定。

上述的最近動向說明甚麼？它說明兩岸之間的政治互信，做為互信基礎的反對台獨，堅持“九二共識”的政治基礎已經面臨考驗了。我們再看看賴幸媛是怎麼說的。她說大陸當局持續擴增對台軍事部署，同時在思維上不願改變不放棄武力對台的政策與法律，這兩項問題是兩岸關係發展中必須去除的障礙，中國大陸必須改變思維，調整政策。她又說“中華民國”是一個高度民主的主權國家，這是既存事實，中國大陸必須正視。台灣未來一定是由兩千三百萬人民做出民主、自由的選擇，不能任由中國大陸片面決定。

大家都知道“反分裂國家法”是為了遏制台獨而制定的，它表明為了維護統一，為了維護“一個中國”不惜一戰的中國人民的意志。而這在賴幸媛眼中竟是“兩岸關係發展中必須去除的障礙”。不久前，大陸國防部發言人提出兩岸可以在“一個中國原則”下談撤飛彈，而賴幸媛的說法等於是把這個提案打了回去。

關於與新加坡簽署經濟合作協定一事，並不能視為純粹的經濟問題。馬英九本身是這麼評價ECFA之簽署的，他說因為台灣與大陸改善關係，歐美、東盟等國家也更願意或敢於和台灣改善關係，因此台灣願意

在這個基礎上跟這些國家促進更多的往來。大陸對台灣出於經濟發展的需要，與其他國家商簽FTA(自由貿易協定)的需求也是抱著理解的態度的。在和平發展的大方向下，應該會“合情合理對待，務實妥善處理”(王毅)。可是這裏須要注意的是，國際上FTA被認為是主權國家之間簽訂的協定。而事實上在目前的台灣，一些政客特別是台獨在反對ECFA，指責簽ECFA是“傾中”、“賣台”；另一方面又把能否對外簽成FTA當成馬政府是否“傾中”、“賣台”的首要指標，甚至於迫使馬政府要“自主”去對外談FTA，不能“依附”在中國的“同意”或“允許”之下。而台灣陸委會引述賴幸媛在華府演講的說法強調，與其他貿易夥伴簽署FTA是台灣身為WTO會員的權利，決定權在台灣不在大陸。顯然，這種論述是跟著民進黨走的。

馬英九政府的大陸政策基本理念，就是在“中華民國”的“憲法”架構下，維持不統、不獨、不武的現狀。2008年大選時馬英九就提出這個所謂的“三不政策”，當時就受到藍營選民的不滿和質疑。而馬英九之所以能獲勝，根本原因是由於陳水扁民進黨的貪污腐敗，而在選民眼中馬英九即代表台灣的安全和經濟發展的希望。可是上台後馬英九拋棄了藍營而討好綠營，起用李登輝人馬，如起用曾當過急獨組織“台聯”的立法委員賴幸媛是其表現之一。結果綠營並沒有拉過來，藍營卻離他而去。他上台後比較重要的台灣地方選舉已經吃了“四連敗”，馬英九聲望也下滑至29%。年底的五都選舉被認為是2012年大選的前哨戰，馬政府欲藉簽署ECFA的政績來打贏這回選戰，但是到目前為止，選情對馬英九不很樂觀。

總言之，目前兩岸關係看似已進入和平發展的軌道前進，可是種種跡象表明內外反華勢力和台獨分裂勢力對祖國統一的阻撓和破壞並沒有停止，統一前程仍是任重道遠。“九二共識”就是“一個中國，各自表述”，而在馬英九“不統、不獨、不武”路線下，“一個中國”指的就是“中華民國”。“一中各表”立場，實際就是“一國兩府”或“兩國論”的台獨立場。“不統、不獨、不武”就是維持現狀，它符合美國要遏制中國崛起的目的是，因此得到美國的支持。海內外真正主張祖國統一的愛國人士是不允許“不統”的。

馬政府的警訊

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第二十二屆會長 梁義大

自2008年3月20日台灣馬政府從新執政後，迄今已近二年四個月。兩岸關係從緊繃對峙開始邁向和平發展。海協會與海基會的多次協商，兩岸開放直航。台灣開放大陸同胞觀光。農產品大量自台灣輸入大陸，尤其是最近ECFA的簽訂，更使兩岸互利雙贏的關係往前邁出一大步。這是我們海外同胞所樂見的。

台灣年底的五都選舉即將到來，而選舉的結果，則牽制著2012年的馬政府能否繼續執政的大選。故今年年底的五都選舉，則可以說是2012年大選的前哨戰。依日前台灣著名立法委員周守訓，在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第三十三屆年會專題演講時說，依目前民調顯示，選情對藍營並不樂觀，只能是坐二望三。目前台北市郝龍斌市長與蘇貞昌競選對手差距僅高三個百分點。雖說南部的大台南與大高雄選區，綠營有分裂的危機，可是綠營的選民大多是死忠派，他們是選黨不選人。綠營提名的人再不好，綠營的選民也一定都會支持。藍營的選民則不是這樣，且綠營選民的投票率不管是地方選舉或是大選均很高。而藍營的選民則較注重於大選，對地方選舉的投票率則相對較低，這次五都選舉定位於地方選舉，藍營選民的投票率則不會很高，值得擔憂。必須激起藍營選民的危機感提高藍營選民的士氣，才能有轉機。而馬政府執政以來，民調持續下降，最近ECFA簽訂後，才回升一些。為甚麼馬政府的民調持續下降？馬政府的警訊如下：

一、馬英九先生是一位溫良恭儉讓，且沒有大作為的人。過去他尊崇李登輝，拜會過李登輝。可是李登輝並不支持馬英九，反而發表“棄馬保台”的言論，還要台灣的老百姓不要支持ECFA。

二、為了藍綠和解，討好綠營。五百多萬投票給綠營的選民，反而是馬英九先生2012年競選連任時，希望拿到選票的人。取用綠營的人為政務官，台灣的“國營企業”仍充斥著扁朝時期綠營留下來的人，而海外僑務榮譽職，仍續聘那些扁政府聘請的僑務榮譽人員，造成藍營僑胞的不滿，已有很多僑胞在2012年大選不回去投票或助選，對馬政府非常失望。

三、司法的缺失。陳水扁的貪瀆案舉世皆知。而最近的司法判決卻是越來越輕，加上最近法官的集體貪污和白道黑道掛鉤，治安亮起紅燈。

四、八八水災造成的民怨。由於八八水災造成台灣六百多民眾喪生，尤其小林村遭土石流淹沒，救災不盡完美，以致前行政院長劉兆玄辭職下台，到現在災民仍聞水色變。

五、牛肉事件的影響。民進黨反對牛肉內臟自美國進口，而國民黨的立法委員連台北郝龍斌市長也加入反對的行列。蘇起因而下台，造成台灣老百姓認為只有民進黨在為台灣老百姓的生活健康而打拼。民進黨大力打擊牛肉事件，使民進黨的聲望提升。而導致以後縣市選舉，立委補選，台灣鄉鎮村長的基層選舉，都是民進黨獲勝。

現在距離馬政府五都選舉還有三個月，希望在選舉的當天ECFA能發揮成效，使台灣的經濟更好，兩岸和平發展更穩定。而最近台灣立法院通過不再給陳水扁卸任總統的待遇，則對五都選情有幫助，至少藍營應拿下台北市、新北市與台中市三席。2012年的大選才會轉危為安。



兩篇愛中華反台獨小品文

台灣中華愛國同心會會長 周慶峻

第一篇

法輪功不是邪教是甚麼？

法輪功是否邪教應從其李“教主”到了美國之後搖身一變，成為一個擁有可以設立電視台，出版多份報紙雜誌，大量製作光碟，印製大量傳單的財團巨富說起。今日法輪功每天出動2千餘人佔據台灣幾百個旅遊據點和政府機關的“門口”派發傳單、光碟、撥放廣播錄音帶，而其派發傳單光碟等宣傳文件所訴求主體，不是教人練功，卻完全是政治語言！宣揚要如何鬥爭誰、鬥垮誰、逮捕誰等等極度的政治言論，其實這些都已違背宗教以慈善為本、寬恕為懷的基本原則，所以引起國際社會普遍質疑。法輪功根本便有很多不透明，不合情理令人懷疑的因素存在，法輪功自己不願說清楚講明白，反而壓制外界不得質疑、不得說三道四，未免太不符合台灣地區的民情了。

法輪功財大氣粗擲錢請律師打壓異見人士太霸道，這種法輪功自己說起來是宗教，但做起來卻十足的政治鬥爭團體，如此似教非教的所謂宗教，在世人的眼下怎能掩得住邪教之說，況且今日世界之上最少最少有十三億人口都說法輪功是邪教，難道在自由的台灣反而不能說這個似教非教，似政非政的怪胎是邪教嗎？

我們沒有直接證據證明法輪功是帝國主義者的走狗，也可能沒有直接證據證明帝國主義者，將資金注入法輪功帳戶的直接明細數據，但我們會恭請世界上千百萬像我們一樣，質疑法輪功所作所為的廣大民眾及深切了解法輪功的專家，向法院陳述與我們同樣的觀點，我們也能提供證明不接受法輪功工作人員派發傳單時，遭受破口大罵的人、時、地證據，我們更能提出為法輪功開車和派發傳單的員工每日領取工錢的人、事、物證據，拆穿法輪功口口聲聲說他們派出來的員工都是義務免費的假面具。

另外我們要鄭重警告法輪功的朋友們，中華愛國同心會的同志們無財無勢，只有一顆熱愛中華民族的赤子之心和一條不怕死的老命，我們都作好隨時準備抵抗外侮、美日強權，為中華民族的和平統一與中華民族的共同尊嚴而犧牲的規劃，我們問心無愧，無所顧忌，請放馬過來吧，不要再發律師信浪費我們的時間，把我們告到法院，讓社會大眾共同來關注，共同來評鑑。我們要奉勸法輪功的弟子們，假如你認為法輪功是宗教，便要好像慈濟一樣以慈善為本、寬恕為懷，專心為世人服務，假如你認為法輪功的主旨與任務是政治，就向愛國同心會學習，像我們一樣登記為政治團體名正義順地評論時政為苦難的中華民族，為兩岸中國人民的復合做點好事，積點功德，回來吧，朋友。

第二篇

維護社會公信 警告邪教法輪功

台灣地區的法輪功在美帝國主義者的扶持下，無孔不入地、無天無法地滲透台灣地區的這個旅遊景點和公共場所，他們以積非成是地影響社會公信，已到了非整頓社會正義不能伸張的地步，中華愛國同心會基於維護兩岸中華兒女炎黃子孫共同利益的最高境界，決定在一中憲法及台灣地區法律、法規的規範下，對法輪功集團的非法團行為進行抵制與檢舉告發，協助政府維護台灣地區好山好水與安和樂利的社會秩序。為了廣徵法輪功集團在台灣各地的無法無天資訊，本會將在中華愛國同心會的網頁中增設“邪教法輪功”專欄，提供台灣各地的熱心人士上網列舉法輪功的非法活動訊息，本會處理後，亦將在網上向各界公佈。



兩岸經貿合作論壇論文



兩岸經貿合作論壇總結篇



報告人：中國中小商業企業協會副會長 王祿閻

自從兩岸簽署了經貿合作協定ECFA後，兩岸經貿合作不僅進入了議事日程，而且進入了實質性合作階段。研判ECFA實施後對推動兩岸經濟關係、兩岸和平發展關係，以及港台經濟合作前景等，成了一些專家、學者的熱門課題。本次兩岸經貿合作論壇上來自大陸、台灣、香港的學者、專家，就兩岸三地的經貿合作進行了熱烈的探討。

兩岸經過二十多年經濟上的合作，正好到了一個轉變期。ECFA使兩岸經濟合作走向制度化，也使台灣避免經濟被邊緣化和走向更為國際化。兩岸從低層次的加工合作，提升為技術、資本的合作，如此一來可以在全球價值鏈中佔有更大的比重。兩岸一起推動經濟正和的博弈，避免軍事負和的博弈，也暫停政治零和的博弈。有大陸講者指出，ECFA為兩岸提供了進一步合作發展的新的機遇；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推進亦會產生巨大的利益空間，而這些為兩岸經濟合作開闢了完全不同以往的合作天地。如果說兩岸過往的經濟合作是一種面向國際市場的“外向型”的經濟合作，那未來的合作則更多是面向大陸或兩岸市場的“內向型”的經濟合作，這對台灣企業、台灣經濟乃至兩岸當政者而言都是個全新的課題。兩岸若能抓住此次機遇，不僅經濟合作能出現全新的境界，同時密切的兩岸經濟合作也能使台灣經濟再上層樓。有台灣講者表示，對於無法與其他國家建立自由貿易區體制的台灣，為避免邊緣化，ECFA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香港不應停留在橋樑的角色，應該更積極的參與兩岸經濟活動，並把握由此帶來的機會，包括從人民幣離岸中心到貿易金融及資本市場。簽署ECFA所帶來無限的合作新契機，兩岸應共同促進雙方產業優質化，運用大陸資金與市場優勢，結合台灣創新研發的基礎與靈活彈性的管理能力，創造雙贏互補競爭優勢，共同開拓大中華、亞太以及全球市場。有香港講者認為，香港的國際金融、貿易、航運等行業，和台灣有很大的合作發展空間，尤其是金融領域，應該更緊密地加強合作，比如可以研究港台兩地金融證券市場全面合作，讓兩地公司同時上市等。

兩岸走向穩定合作，擴大共同利益，增進相互認同，促使貿易自由化、投資便利化、產業合作化，再進一步走向人才互通、資金互通、技術互補。長遠講，更重要的是兩岸產業應該在不同領域建立技術標準，技術標準象徵的是權力，也是話語權。制定標準就控制了技術，控制技術就控制了市場，反過來說有龐大市場做為後盾才能定標準。有台灣講者建議兩岸產業共建技術標準提升國際的競爭力，受到與會代表的歡迎。

以上歸納難免掛一漏萬，請各位與會者指正。

兩岸簽署經濟協議促使台灣更國際化

（發言提綱）

中國中小商業企業協會副會長 王祿閻

一、兩岸簽署經濟協議將促使台灣 更國際化

- 1、避免台灣經濟走向邊緣化
- 2、促使兩岸經貿合作的制度化
- 3、促進台灣企業能更加國際化

二、科技合作 產業分工

- 1、逐步減少，消除兩岸的貿易與投資障礙
- 2、建立經濟繁榮與發展的機制
- 3、進入制度化合作的新階段

三、兩岸共同開發資源

- 1、並同開發南海資源
- 2、共同開發南海旅遊
- 3、共同開發台灣海峽資源

四、香港應把握優勢，積極參與，主動合作

- 1、金融服務
- 2、物流服務
- 3、營銷服務
- 4、知識產權服務
- 5、法律服務

香港應在兩岸和平發展中做出新貢獻

香港前民政事務局局长 藍鴻震

一、港台關係的回顧與現狀

香港和台灣的交往具有悠久的歷史淵源，就算在香港回歸後13年來，按照“一國兩制”和“錢七條”的方針政策處理港台關係，還是不斷向前發展的。比如，從人員交流來看，十多年來，平均每年都有二百多萬台灣民眾來港或經港到內地，而香港市民也由三、四十萬人到台灣，今年估計還將達到五十萬以上。

尤其是近年來，在兩岸關係的大幅度改善的背景下，香港特區政府將提升港台關係作為施政重要內容，積極推動港台多層次、多領域的交流，包括成立“港台經濟文化合作協進會”，與台方的“台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互為對口機構，共同推動港台之間的深層次、全方位的交流合作；特區政府官員多次應邀赴台參訪交流，台灣多位縣市長、知名人士乃至政府部門官員分別來港參訪交流；在經濟、文化及民間社團交流更加頻繁，已經形成了一股“台灣熱”。相比起港英回歸前的情況，在當時是難以想像的。

不過，我們也需要看到，兩岸“三通”對香港傳統的仲介地位是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有人士預測，“三通”後將有七至八成的貨物不會再經過香港轉口，令香港可能損失上千億元轉口生意額。事實上，有數據顯示，兩岸貨運包機已經導致香港轉運量業務降幅高達近五成，兩岸直航導致香港空運客運量同比下降一到兩成。加上過去台商對大陸投資中，有八成是以香港為仲介，今後台商無需在港設名義公司，這樣一來香港的投資仲介地位將會削弱，連帶對香港的金融業、專業服務業、餐飲業、酒店業、旅遊業等行業都將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因此，香港迫切需要調整角色，以適應兩岸關係發展新形勢。

二、面對新時代，積極探索香港在個兩岸關係中的新定位

上面講了一些“三通”對香港的仲介角色的影響，而我們對前景的態度如何呢？我個人對此是很樂觀的，因為，香港人一向善於根據時世的變化來調整策略，上世紀的多次實質性危機，從五十年代美國對中國大陸的經濟封鎖說起，到八十年代的工業轉型遷移等，港人不但安然渡過並把危機轉為新機會、動力和創造力，從而令東方之珠更加發光、發亮，揚名天下，我想這次也不會例外。問題是我們必須積極探索出一條新的路子，在全面推動港台關係發展的同時，進一步探索香港在促進兩地經濟、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合作之中扮演的角色，從而創造出雙贏的局面。

因為，香港的確有很多大陸尚未具有的優勢，比如說，在政治層面上，香港目前實行“一國兩制”，既是一個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又享有與大陸社會制度不同的“兩制”，在兩岸交流之中享有相當大的空間。

在社會制度方面，香港和台灣都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有很多的共通之處。在經濟結構上看，香港和台灣的台北、台中、高雄等主要城市類似，都是服務業比較發達的地區，城市之間的經貿合作存有很大的空間，經貿交流方面比較順暢。尤其是香港長久以來在珠三角區域辛勤耕耘，建立了特殊的關係並擔當重要角色，和福建省的經貿關係也十分密切，憑藉著香港具備CEPA的優勢和在廣東“先行先試”的新機遇，相信未來香港將可以成為港、粵、閩、台這個新的大經濟區內的重要樞紐，發揮連接各區、溝通四方、聯手共進的不可缺少的作用，且有條件和空間去發掘新思維和新創意，找出新方向。

三、有關促進港台關係進一步發展的具體建議

(1) 利用香港和台灣之間擁有的特殊條件，包括國際都會和回歸後的新角色，繼續為促進兩岸關係的發展扮演重要的、更加積極主動的仲介角色。

目前兩岸關係發展良好，但國家和平統一畢竟是要經歷一個漫長的過程，香港還要繼續爭取國家的支持和授權，扮演作為兩岸之間的仲介角色，有些事情直接到大陸做不方便，可以先在香港進行溝通協商，也可以通過香港先培養良好的氣氛和打下基礎，然後再擴展到兩岸。

(2) 以金融為龍頭，全面加強港台兩地的經貿合作。

香港的國際金融、貿易、航運等行業和台灣有很大的合作發展空間，尤其是金融領域，應該更緊密地加強合作。比如金融方面，可以研究港台兩地金融證券市場全面合作，讓兩地公司同時上市等，打造出一個港台金融區的設想，令港台兩地的金融市場連成一起，發揮各自的優勢，為整個大中華經濟區服務。

(3) 建立香港與台灣主要城市的城市合作交流機制，互相結成友好城市。

香港和台北、台中、高雄等台灣主要城市應開展更為緊密的合作，雙方成立交流機制和結成友好城市並和大陸的主要城市進行“多城論壇”式的交流，以進一步加強彼此之間的合作與了解。

(4) 採取更多措施，方便港台兩地的人員往來。

目前，港台之間各方面的交流已經相當密切，但還要繼續加強並提昇層次和消除一些人為的障礙，如對一些不合時宜的規定就應該進行檢討及修正。香港現時已經允許持有台胞證的台灣民眾直接進入香港並停留七天，我們可以考慮進一步延長這個時間，放寬台灣民眾來香港創業和工作的限制，以此推動經貿合作及人員往來。

(5) 充分發揮香港在兩岸交流中的橋樑作用，鼓勵包括青年和專業團體之間的對口民間交流，以此全面推動兩岸的民間交流。

當今時代的潮流是要重視民意，要建立和平與發展的兩岸關係，最基礎的工作是全面推動民間交流，讓雙方進一步增進了解，建立感情。香港在這方面完全可以發揮橋樑作用，為推動兩岸四地的民間交流做更多的工作。另外，應多鼓勵專業方面的交流，如教育、科技、法律、會計等領域，兩地的有關專業團體要多交流溝通。

後ECFA時代兩岸經濟關係與海西發展

廈門大學台灣研究中心副主任 李非

當前，海峽兩岸關係正逐步朝和平、穩定的方向發展。隨著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的簽署，兩岸關係進入了一個以經濟交流為主軸的全面交流與合作發展的新階段。如何抓住這個歷史機遇，總結相關經驗和不足之處，提出今後更有成效的交流政策、措施和建議，促使兩岸建立牢固的經濟利益紐帶，從而構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新局面，是我們當前面臨的緊迫任務。

一、兩岸經濟關係的發展趨勢

兩岸經濟關係是一種以市場原則為取向，以雙方經濟利益需要為動力的經濟聯繫。ECFA的簽署後，兩岸經濟關係在合作協議的基本框架下，不斷朝縱深方向發展，不僅貿易貨值快速增長，貿易方式向直接型態轉化，而且台商投資層次進一步提高，投資範圍由南向北，由東向西全方向擴展。更重要的是，相關的制度性安排也有利於兩岸經濟交流逐步形成規範化和多元化的發展格局，呈現出合作領域逐步拓寬、交流規模不斷增大、合作型態從加工出口模式向生產內銷模式轉變的發展趨勢。

首先，兩岸經濟合作領域從生產層面轉向技術和服務層面。

在大陸經濟快速發展的磁吸效應下，未來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將持續升溫，從而促進第四波熱潮的到來。台商為進一步降低代工成本，將繼續不斷地轉移島內生產基地，擴大在大陸的生產。不僅台灣傳統產業進一步加快外移的步伐，高科技生產廠商也將大量前往大陸地區設廠，外移產能。從廠商外移項目看，技術成熟度高的產品生產基地的外移，主要是以降低生產成本為競爭手段；技術成熟度低，仍靠研發以保持競爭優勢的產品生產基地的外移，主要是出於市場佈局的考慮。

隨著台商製造業投資日趨成熟，未來在第四波的經貿交流熱潮中、服務業將是熱門領域。島內研發基地正加速向大陸轉移，許多知名企業紛紛在大陸籌設研發中心，集成電路設計中心及軟件開發基地，利用大陸軟件人才，開發設計新產品，提供生產性服務。此外，零售業、物流業、房地產業、金融業、保險業、證券業、電信業、醫療業、專業服務等服務行業的投資也將逐年增加，尤其是生產性服務業將成為台商投資的重要行業。

其次，兩岸經濟合作對象從中小企業轉向大企業主導，並形成產業鏈。

隨著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規模的不斷擴大，先行一步來大陸投資和發展的台資中小企業，主要是中下游企業，拉動了對台灣生產原材料及半成品的需求，從而促進供應原材料的台灣中上游工業生產企業也前來大陸投資設廠，提供配套，連鎖的生產與服務。在新一波的產業外移熱潮中，越來越多的台灣大企業將加入外移生產的行列，台灣科技大廠已全部聚集大陸，帶動相關配套企業形成產業鏈，從而形成大企業主導的新

格局。

其三，兩岸經濟合作形式呈現台資企業本地化趨勢。

在國際和兩岸經濟環境發生較大變化的情況下，大陸台資企業如何進一步創新發展，走出經營成本逐步提高的困境期，完成企業轉型和技術升級，是兩岸經濟關係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因素。為因應市場競爭的需要，降低企業營運成本，越來越多的台商採取就地取材的策略，從而帶動了大陸台資企業的本地化趨勢，包括行政管理人員本地化，產品銷售市場本地化，生產原材料供應本地化，企業資金籌措本地化和技術研發本地化等現象。雖然台灣仍是大陸台資企業生產所需原料或零組件的重要供應地，但是，台商對台灣原材料或零組件的供應依賴度逐年下降，由當地提供所需原料的比重已超過對台灣的依賴。未來台灣企業在生產，管理，銷售等方面的本地化趨勢將越來越明顯，並成為台商在大陸經營和發展的重要策略之一。

其四，兩岸經濟合作地區從南向北，由東向西擴展。

隨著大陸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水平逐步提高，早期轉移到大陸的台資企業逐步進入成熟期，並面臨新的產業轉型。未來台商北擴和內移的趨勢將更加明顯，對大陸投資的熱點地區，將從過去以東南沿海地區為主戰場逐步向北部和中西部“新土”擴展。當前，台商對珠三角、海西區、長三角的投資步伐已有所放緩，投資區域繼續向北延伸，逐步發展到以京、津地區為中心、山東半島和遼東半島為兩翼的環渤海經濟圈。從長遠趨勢看，台商對大陸的投資，將在環大陸沿海外凸弧形地帶的基礎上，進一步由東向西，由沿海向內陸輻射，形成“遍地開花”的全方位發展格局。

可見，兩岸經濟關係在和平發展的背景下，人員、貨物、資金、信息交流規模持續擴大，呈現出良好的發展前景和樂觀趨勢。

二、兩岸經濟關係的發展對策

兩岸經濟關係經過 20 多年的長足發展，初步形成互補，互利，互惠的雙贏格局，但是，從現有情況看，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

首先在貿易層面，存在商品互補性問題和貿易不平衡性問題，兩岸貿易由於台貨輸往大陸與大陸貨輸往台灣的非同步擴張，引發了日益嚴重的大陸對台貿易逆差。

在投資層面，隨著中國大陸經濟的快速發展，東南沿海地區與台灣地區的經濟發展差距逐步縮小，台資傳統產業在沿海地區的生產成本明顯增加，生存空間越來越小，投資門檻越來越高，開始面臨新的抉擇：一是繼續向生產成本相對低廉的內地轉移，延續企業的生命週期；二是進行產業升級或企業轉型，從事高科技產業或投資服務性行業。同時，各地在對台產業對接方面，錯位發展不夠突出，往往存在某種程度的惡性競爭或不規範操作，選擇相同或類似的某類產業為平台，而不夠注重發揮本地的優勢來建立特色產業，實現產業鏈的錯位發展。

發展兩岸經濟關係，符合兩岸同胞的根本利益，有利於兩岸經濟的共同繁榮。多年來，大陸方面為實現兩岸經濟關係的正常化和制度化做出了不懈努力。

首先，不以政治分歧去影響，干擾兩岸經濟合作。在市場運作越來越國際化的趨勢下，市場經濟力量日益成為推動兩岸經貿交流的主要動力。處理兩岸經濟合作事宜，應更具彈性和務實，盡量讓經濟規律決定經濟關係的發展進程。

其次，切實解決經貿合作中的實際問題，引導經貿交流進入良性循環軌道，促進經濟合作向雙向、直接、全面的方向發展。

第三，推動建立兩岸經濟合作機制，適當讓利於台灣同胞。在完善投資硬環境的基礎上，在投資軟環境建設上多下功夫，尤其是在運行機制上營造拓展兩岸經濟關係的政策優勢，為台資企業構造一個按國際慣例辦事的軟環境。

三、ECFA的簽署后海西的發展機遇

在海峽兩岸關係出現和平發展的新形勢下，如何進一步發揮海峽西岸經濟區的獨特對台優勢，努力將其打造成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的先行先試區和對台交流政策的綜合試驗區，構築兩岸交流合作的前沿平台和對台政策的試驗窗口，從而推動兩岸交流合作向更廣範圍、更大規模、更高層次邁進，不僅有利於促進區域經濟合作和經濟發展，而且有利於推進兩岸經濟整合以及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的簽署，是兩岸經濟交流逐步實現正常化後，兩岸經濟合作制度性安排的啟動，即從功能性整合走向制度性整合。但是，簽 ECFA 的實施是一個複雜的過程，需要分步驟，分階段實施。因此，海峽西岸經濟區仍可作為簽 ECFA 的特定先行先試區域，在 ECFA 的實施過程中，比照 CEPA 簽訂時廣東的一些做法，先行實施某些正在商談或將要商談的項目和條款，為今後 ECFA 的補充協議的簽署和全面實施探索途徑，積累經驗。

鑑於簽 ECFA 是兩岸之間關於經濟貿易合作與一體化發展的總體框架協定，雙方在此框架下，還要分別進行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便利化協議的商簽。在此過程中，海峽西岸經濟區作為兩岸合作的一個特殊區域，可在某些領域進行先期探索和實施。如在設立兩岸金融合作試驗區以及台灣服務業市場准入等方面爭取中央更多的政策支持，積極試行兩岸金融機構設置及信貸、匯兌、結算的開放，放寬匯率、稅率、利率限制。

兩岸制度性經濟合作不僅需要一個逐步推進的開放過程，更需要局部地區漸進試行。因為兩岸經濟合作機制的構建，除需要兩岸之間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資金流等生產要素的順暢流通，還需要兩岸就相關事項進行制度性協商，其間肯定會涉及到一些比較敏感的議題，短期內全面實現和一攬子地解決有相當難度，需要一個長期的、分階段實施的過程，因而應統籌安排，從點到面，從局部到整體，逐步推進。海峽西岸經濟區可在對台經貿政策試行方面創造一個有利的“外殼”和平台。沒有“先行先試”的區域合作試

點，就不能解決兩岸經濟制度化安排的一攬子政策問題。可見，海峽西岸經濟區既為兩岸經濟合作提供新的平台和載體，又為兩岸經濟關係發展提供新的動力和機遇。

海峽西岸經濟區就是要在擴大對外開放，深化體制改革和加強對台合作方面，積極探索新路徑，努力打造新模式，建立一整套適應科學發展、體制創新和兩岸融合的全新的政策機制。因此，應充分利用對台特殊區位優勢、工作基礎和中央的政策支持，在進一步落實“同等優先，適當放寬”政策的基礎上，把先行先試工作融入簽 ECFA 的總體框架中，有步驟地讓一些帶有探索性的經濟貿易合作議題，在 ECFA 的每次補充協議之前，比照早期收割條款的形式，在海峽西岸經濟區內“先行先試”，發揮“政策試驗”的功能，通過局部先行和試驗，探索建立具有區域特色的兩岸合作新模式和新機制，為推動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進程和促進兩岸經濟一體化做出新貢獻。



兩岸應“化戰略危機為經濟轉機”

台灣一國兩制研究協會理事長 蔡武璋

前言

維繫台海的和平穩定、保持雙方經濟發展的優勢，是現階段中國利益之所在。因此，在兩岸關係領域中，我們積極致力於尋求創造和解與和平的環境，開啟對話與溝通機會之窗口，這不僅是為台海兩岸，更是為整個亞太地區共同的繁榮與發展。追求兩岸和平與發展才是走向建設性的解決兩岸問題的正途。

兩岸雖然分隔六十年，但現階段兩岸人民已共同體認到，兩岸發展和平穩定的關係，對兩岸人民最有利，和平、發展、繁榮已是兩岸人民共同追求的目標。未來基於歷史、血緣、文化等各方面的淵源，或是基於經濟合作的事實需要，台灣人民會在自願的前提下，與大陸攜手合作，共同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現代化制度。台灣與大陸地理位置相近，運輸距離短，商業交易習慣相似，台灣若要開發拓展大陸市場，相對於其他地區應有其優勢條件。

兩岸間交流互動大勢所趨

兩岸經貿橋樑的形成始於1980年代，首先它是透過台灣——香港——大陸三角貿易，以間接投資的方式進行，其後再逐漸發展成直接投資與直接貿易，這種貿易方式稱之為Economic links，大中華經濟圈力量是全世界最大的體制。

中國大陸自1978年採行經濟改革開放政策以來，隨著改革深化，使計畫經濟人力統包、統配制度開始分解，競爭與績效體制引進，行業自由化與機關要求的“雙向選擇”發展，配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深化，又因其改革前景帶來良好的發展，有助國家現代化。

兩岸彼此之內部與外部政經環境均在變動，相較於目前大陸之蓬勃發展，台灣地區的政經情勢，乃陷於不利之困境。中國大陸在經濟現代化與行政體制運作之變革，乃至於政經上之有利情勢，有其不容否定的一面。兩岸間之交流互動是需要的，兩岸無需敵對，進而兩岸需要更進一步之互動，應有其特殊的意義。

建構經濟整合環境解決兩岸和平爭議

首先，由於兩岸問題的重要性，台海局勢的發展良窳，也成為各國評估國際局勢的一項重要因素。近年來，美國政府全球戰略新的走向，使東亞區域和平受到了強化。在此情況下，兩岸和平解決爭議的主張，已成為主流。其次，由於兩岸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雙方外交活動空間與彼此互動產生變化。在世貿架構下，經由各種管道，兩岸間的經貿諮商與往來也持續穩定增加。

關於建構兩岸和平發展架構的思考

人類社會進入二十一世紀，和平已經成為世界上絕大多數人接受與追求的價值，歐盟體制的建構及成

功的運作，即為最明顯的例證，海峽兩岸人民亦不例外。避免發生戰爭，確保兩岸和平是在兩岸政策上的共通點，建構一種兩岸和平框架也是全體華人的明確訴求。雖兩岸都希望兩岸和平，但對和平發展的目標取向不一，這就顯示了建構兩岸和平發展架構，必須做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之環境。

1、“和平”是兩岸全體人民最大公約數。“恢復兩岸對話與談判，平等協商，正式結束敵對狀態，建立軍事互信機制，共同建構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的框架”。和平共處原則不僅能用在處理國際關係問題上，用之於解決兩岸內部的問題，恐怕也是一個好辦法。兩岸協商正式結束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構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框架，開創兩岸和平發展新局面，正是兩岸全體人民的願望。

2、兩岸建構“和平發展”的架構。建構“和平框架”的目的是為了使兩岸和平能夠長久化、穩固化。“維持現狀”雖然不是處理兩岸問題的最佳策略，而希望維持“現狀”終究能稍為兩岸緊張氣氛解套。

對維持“現狀”看法，大陸方面提出“儘管兩岸尚未統一，但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從未改變，這就是兩岸關係的現狀”。大陸方面為了表明其認為的現狀，也是台灣方面所承認的現狀，強調“一中”為架構的台灣地區法律法規。但大陸維持和平的現狀的目的是為了兩岸逐步走向統一。國民黨自然也支持維持現狀，因為維持現狀，對國民黨而言並無法律與政黨理念上的障礙。

3、兩岸政治定位問題難解。“台灣與中國”問題。對“一個中國”的內涵，過去大陸方面主張不予討論，國民黨主張各自表述，為了順利開展兩岸事務性談判而採取的權宜之計。今後兩岸若要進入政治性協商，這一模糊空間勢必被大大壓縮。

如果說兩岸政治定位還有慢慢思考的餘地的話，那麼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則變得緊迫棘手，因為此一問題處理不當，似乎有違兩岸目前友好的氣氛。如果說在“邦交國”問題上兩岸還較易達成共識的話，那麼在台灣加入有關國際組織上，大陸方面則不能不有所顧慮。外交是內政的延伸，兩岸政治定位的困難，使處理台灣國際空間問題頗具難度。

4、台灣島內政治生態及民意問題。台灣政黨政治的日漸成熟，使兩岸在建構和平發展框架時，必須重視島內野力量對執政黨政策的影響力。民進黨的得票率意味着部分選民的支持，國民黨在處理兩岸關係上不能不考慮這些人群的想法。政黨輪替作為台灣政黨政治的一種常態，誰也不能保證島內某個政黨永遠執政，所以兩岸間的任何協議，都面臨一個在台灣政黨輪替後能否繼續有效的問題。

其困難度在於雙方不了解對方在兩岸現狀，及台灣未來走向的看法與主張上南轅北轍。所以，兩岸要建構穩固的兩岸和平框架，就必須在政策立場上逐步由模糊走向清晰有所不同。建構兩岸和平發展框架的道路上，目前仍存在不少困難和阻力。但兩岸最終完成這一歷史性的偉大建構依然充滿信心。

香港人民幣離岸中心功能意義重大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 李君豪

提要

香港推動和加強人民幣離岸中心，必須要繼續創新以吸引更多不同需要的市場用家在香港匯聚。中央政府既然已明確支持香港發展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香港亦應該在爭取業務發展的同時，為中國未來的壯大發展作出實質貢獻。深信香港這個平台，必能為兩岸投資者開闢一條美好的大道，讓兩岸經濟合作有更多的發展空間。

香港回歸祖國，十三年來按照基本法，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取得重大的成功，目前最大的目標，是協助國家促進和平統一。中國和平統一是國家大業，亦是全國人民的願望，但怎樣達成和平統一，就是今天我們討論的議題。我個人認為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環節就是先弄好社會的經濟。因為經濟繁榮，民生才會豐裕，民生豐裕，磨擦自然減少，磨擦減少，社會才易和諧，社會和諧，人民才能團結，人民團結，國家才有機會和平統一。

一直以來，香港是中國對外的窗口，無論在金融、經濟、貿易和文化等各方面，都佔着很重要的地位。曾經香港也是台灣投資大陸，溝通交流的唯一渠道。香港可以說是連繫兩岸的橋樑，對兩岸經貿的合作發展，發揮很重要的作用。

所以，應探討怎樣利用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的平台，幫助促進兩岸三地經濟的合作和發展，以達成和平統一的目標。

一、利用港金融中心平台促進三地合作

今天中國是最有潛力的發展中國家，並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係，現在全世界都看好人民幣升值，因為人民幣慢慢的走向國際化，最終有一天自由流通以至成為全球儲備貨幣，我國將於全球經濟大國舞台上擔任重要的角色。對我們中國的經濟長遠發展極為重要。

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經濟嚴重衰退，金融市場大幅波動，除了影響中國的經濟發展，更令中國的外匯儲備投資蒙受相當大的損失，因此，中央政府意識到有需要加快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從近期中央公佈的多項政策很清楚顯示，中央政府已開始加快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並確定香港作為人民幣離岸中心和上海作為人民幣在岸中心的地位，基本上已為人民幣建設了一個從內地流出，離岸流通以至人民幣回流境內的資金循環流通系統。

這個係統一旦在香港運作，就會促進各種人民幣業務和投資產品在香港發展；當更多人民幣產品在香

港出現後，就會有更多的中國貿易夥伴願意在經貿方面接受以人民幣結算。而這些貿易夥伴亦一定會有興趣將手裡的人民幣轉移來香港投資在人民幣產品上以爭取回報；到時香港這個唯一的人民幣離岸中心的地位就更加穩固了。

二、發展離岸中心助人民幣國際化

當人民幣在香港流通的數量快速增長，香港亦可以發展其他更合適的人民幣產品，甚至可以容許企業在香港籌集人民幣資金。屆時香港不僅可以容許內地企業在香港籌集人民幣，更可以容許外資包括台資企業在香港籌集人民幣。現在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近年跟台資企業接觸時的一些體會。台資企業近年面對的最大挑戰就是集資困難，尤其是在內地投資或經營的台資企業，因為近年內地加強管制外匯資金流入，令到很多台資企業在香港上市集資後都未必能把資金轉移到內地支持企業發展業務。截至2010年7月底止，有46家台資企業在香港上市，總市值達512億美元（3,988億港元），約佔香港上市公司總市值2.2%。可見台資企業在內地的經濟發展中亦扮演重要角色。但台資企業長期面對集資困難會妨礙台資企業在內地的發展，亦不利內地和台灣的經濟結合。若台資企業未來可在香港這人民幣離岸中心上市集資人民幣，便可大大方便台資企業在內地的發展。台資企業在香港上市籌集人民幣資金一方面可以令內地的監管機構毋須擔心大量外匯流入；另一方面台資企業能籌集到人民幣資金亦可減低企業要面對的匯兌風險。

因此，香港若能提供籌集人民幣的上市平台，將可吸引更多台資以至其他外資企業來港上市籌集人民幣。同時，持有人民幣的投資者無論是國際或內地機構也可以成為這些台資和外資企業的股東，既可幫助達到人民幣走向國際化的目標，亦有助中國的經濟長遠與國際結合。

總括來說，香港在推動和加強人民幣離岸中心的發展中，必須要繼續創新以吸引更多不同需要的市場用家在香港匯聚。中央政府既然已明確支持香港發展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香港亦應該在爭取業務發展的同時，為中國未來的壯大發展作出實質貢獻。深信香港這個平台，必能為兩岸投資者開闢一條美好的大道，讓兩岸經濟合作有更多的發展空間。展望將來，兩岸就是一家人，大家都是公司的股東，經濟統一就有利促進和平統一。

兩岸共建技術標準提昇國際競爭力

中國文化經貿發展總會代表團經貿代表 林有田

“三流企業賣原料，二流企業賣產品，一流企業賣標準。”這句話說明掌握標準在產品製造過程中的重要性。對標準化領域中需要協調統一的技術事項所製定的標準，稱為技術標準。它是從事生產、建設及商品流通的一種共同遵守的技術依據。技術標準包括基礎技術標準、產品標準、工藝標準、檢測試驗方法標準，及安全、衛生、環保標準等。按其標準化對象在生產流程中的作用，可分為零部件標準、原材料與毛坯標準、工裝標準、設備維修保養標準及檢查標準等；按標準在企業中的適用範圍，又可分為公司標準、工用標準和科室標準等。

技術標準意味著企業財富和國際權力，不但是世界高新技術產業競爭的制高點，也是產業經營的高級典範。隨著經濟全球化和現代科技的發展，圍繞技術標準的國際競爭愈演愈熾熱，成為技術、經濟和政治的動態博弈。台灣雖然已發展成為世界資訊產業硬體的主要生產基地，但仍然面臨嚴峻的發展瓶頸。由於兩岸合作可擁有龐大產業規模、創新研發能力、龐大的市場，以及國際間討價還價的能力，彼此合作制定並擁有技術標準的條件，可以成就雙贏的局勢。也就是說，台灣高新技術企業可以通過和大陸合作共同制定技術標準，必然可以實現歷史性飛躍，成為擁有或分享技術標準者。兩岸有可能從這一合作出發，由“中國製造”、“台灣代工”邁向擁有自主技術標準的“中國創造”時代。

台灣的產業不能再靠硬體賺錢，需靠發展建立技術標準，並爭取腦力和智慧財產，發展建立技術標準將是台灣經濟發展最大的瓶頸。政府應鼓勵企業在海外從事研發，並與大陸建立合作關係，以發展建立技術標準，提昇國際競爭，目的在於提升台灣在國際技術標準中的地位。中國大陸“世界工廠”地位早已形成，台灣投資大陸企業的技術含量也持續提升，台灣與大陸之間的產業合作似乎要進入一個須要加重深化的過里程碑。事實示，台灣的企業與大陸地方政府之間的合作基本模式繼續發展。台灣企業為大陸提供了就業的機會、經濟的增長和外貿指標的提升，而大陸的地方政府則為台灣企業提供廉價的土地、勞動力和優惠的引資政策，雙方互助合作。

雙方互助合作，是擋不住的趨勢。未來兩岸之間的產業合作，如何在相互獲利的基礎上更上一個台階，已經成為兩岸業者以及經濟規劃人士共同關心的問題。國民黨副主席江丙坤先生2005年7月再度訪問大陸，與大陸有關方面商談兩岸關於技術標準的合作。該議題對於台灣、對於兩岸都可以說意義非常重大，它涉及到兩岸未來高技術產業戰略合作，以及建立技術標準的合作平台，提供重要的指導和省思。茲就兩岸建立技術標準的合作必要性，做戰略層次的說明。

一、技術標準是拓展權力和財富的新工具

技術標準在生產和應用層面的意義，是要使不同要素或系統之間通過遵守共同的標準體系而實現相容互通，它構成設備系統有效運行的前提。

1、提高經濟活動的效率

標準的建立，提高了關於產品和工藝資訊的編碼化，有助於降低廠商之間、消費者和廠商之間的資訊成本，促進了規範技術發展和提高經濟活動效率的作用。

2、強力相容互通性的功能

資訊技術產業產品具有顯著的網路效應，以及技術鎖定效應。跨國公司通過技術創新和市場爭奪，在資訊技術領域形成了許多事實標準。資訊網路時代的來臨，使技術標準中所展現的相容互通性的功能更顯現出其重要性。

3、技術標準是拓展權力和財富的新工具

跨國公司不願將其公共產品化，反而將技術標準和專利緊密化，讓其成為具有明確產權特徵的商品性的代碼，技術標準變成跨國公司拓展權力和財富的新工具。新的技術領域的技術標準的形成和確立，它涉及到市場主體間技術、經濟和政治的動態博弈程；在技術掛帥時代，它是影響一個國家或地區在全球權力和財富分配體系中地位的重要問題。

4、決定在國際經濟情勢的地位

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一些重要行業是否具有制定技術標準的能力，和推行技術標準的能力，在在決定了它在國際經濟格局中的地位，同時，也奠定了討價還價的能力。當然，也對共同市場的建立，和區域一體化方面，帶動著強大的促進作用。

對於兩岸的相關業者來說，能在世界主要市場上推行技術標準，也就意味著在國際經濟領域中的權力和財富的擴充，對於兩岸生產要素的有效配置，以及國際競爭力的提升，有極為關鍵性的影響。

二、技術標準決定著財富的流向

在經濟全球化、知識經濟和資訊社會的環境中，自主制定技術標準，並被世界市場接受，是使自己的經濟利益最大化的重要手段之一。也就是說，國際間技術標準之爭，就是經濟利益之爭。

1、收取高額的標準使用費

從企業的角度來看，當它擁有了某一項國際技術標準後，就可以向其他使用這一標準的生產廠商收取高額的標準使用費。這樣，它不僅可以坐收由技術標準帶來的額外收入，而且可以通過許可證的發放來限制其他企業的進入，從而減輕市場的競爭壓力。從現實來看，微軟和英代爾兩家公司的聯合，通過開放標準、許可證頒發，以及產品和處理技術創新等策略，迅速靠技術標準擴大了市場佔有。微軟和英代爾通過

許可證頒發，它們允許付費的企業使用其標準進行生產，看似讓出了部分市場率，但實際上卻控制了未來市場的結構，並贏取了高額的標準使用費，這樣做，確保自身在該產品領域的領先地位，獲得更大的技術標準壟斷優勢。

2、壓制第三者的技術創新的突破

技術標準的壟斷還可以壓制他國的技術創新的突破，使他國的人才湧向技術標準擁有國。因此，技術標準是一種重要的國家財富，是國民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美國新經濟近10年的持續增長，技術標準的貢獻率特別高。

三、技術標準象徵著國際權力

技術標準屬於國際政治經濟關係中的結構性權力(structural power)。專家指出：結構性權力並不直接決定物質權力的多寡，而是決定了財富和物質權力彙聚的方式。

1、制定技術標準佔盡優勢

創新、設計領先，和品優價廉都無法保證一個企業或經濟體的國際競爭力，唯有那些能夠建構產品生產標準並控制廣泛的、快速流動的、競爭性生產市場的經濟行為體才能佔盡優勢，獲得國際的競爭力。對於制定者來說，技術標準是獲取並佔有市場的工具，對於非制定者是進入市場的壁壘。

2、技術標準具有的強制性

技術標準不僅是世界高新技術產業競爭的制高點，而且是高新技術產業經營的高級形態。技術標準一旦確定，就具有事實的強制性，就成為其他生產廠家進入市場的必要條件。由此看來，技術標準已成為一個國家實行貿易保護的重要壁壘和非關稅壁壘的主要形式。

總的來說，誰控制國際技術標準，誰就控制了國際市場，以及國際貿易利益的流向，這在高端技術產品的貿易中表現尤其突出。我們希望各行各業建立更多適用產業國際標準，並與國際接軌，在降低成本、加速產品上市時間、強化綠色競爭力等面向協助廠商獲取最大的利基，以持續地協助台灣產業向前推進。另外，在目前的形勢下，怎樣透過兩岸合作發展建立技術標準，使企業今後能自覺地貫徹技術標準，提昇國際競爭力，是今後各行業和有關機構必須關注的問題。

ECFA與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經濟室主任 朱磊

我基本上把研究兩岸統一的思路用圖形歸納為三種模式：第一種是完全同一種顏色的圈，第二個是黑白各一半的圈，第三幅是一幅太極圖。這是對兩岸統一的三種思路，也就是三種思維模式。第一種是一體趨同，兩岸統一後完全一致，“你就是我”，包括台灣曾提出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以及大陸提出的“解放台灣”都屬於這種模式。第二種是黑白分明，“你是你，我是我”，包括台灣方面提出的“一國兩區”，“一國兩府”，以及大陸提出的“一國兩制”等都屬於這種模式。第三種是太極圖，陰中有陽，負陰抱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思維方式。這樣的思維方式會導致怎樣的結果？還沒有人明確提出來，但我們可以去想，因為很多制度都是創新出來的。我們知道，包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兩岸特色合作機制，這些帶有特色的東西其實都是制度創新，制度創新可以極大地開創我們的創造力，想像力，所以在第三種思路下可以有很大的潛力空間可以挖掘。

兩岸走向統一的前提是兩岸關係趨於收斂，這就需要有兩岸執政當局的政策合作。然而光說合作還不夠，需要強調穩定合作。只有穩定合作才能保持兩岸關係穩定地趨於收斂。今天合作了，明天“戒急用忍”了，後天“積極管理”了，那肯定不行。一定要穩定合作。簽 ECFA最大的作用就是建立了兩岸執政當局穩定合作的基礎和框架。簽 ECFA的影響從經濟角度來說，包括貿易自由化、投資便利化、產業合作化。其最終結果，將使兩岸經濟合作更加密切，兩岸四地會在國際經濟格局中形成美國與歐洲之外的第三個重要的全球經濟中心。如果從政治角度分析而言，ECFA的政治影響有三方面：第一是增進政治互信，比如說兩岸在ECFA的談判中迴避了政治分歧，在文本中沒有使用敏感的政治用語，在內容中沒有對利益分配斤斤計較，推進了雙方的政治互信。第二個是開創了兩岸互動的新模式。海基會與海協會簽署協議本身就是一個創新，未來將會成立兩岸經濟合作委員會更是兩岸互動的創新模式。第三個是培育共同利益。雙方合作互惠互利，對大陸戰略機遇期與台灣黃金十年均具有重要的影響。

ECFA為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提供了不可逆的制度性保障，連台灣的民進黨也說重新執政後會“延續前朝兩岸政策”，不會廢除ECFA的，這就為兩岸穩定合作奠定了堅實基礎。有了穩定合作，就可以追求共同利益。經濟規律往往是互利雙贏，這與政治上很多情況是零和博弈不同。因此我們推進兩岸關係發展時“先經後政”，兩岸經濟互補性強，合作空間巨大，經濟合作可以帶來龐大共同利益。兄弟兩個分開久了，要突然擁抱在一起是很難的，因為缺乏互信。互信需要慢慢培養。在具備足夠互信之前，需要有共同利益進行聯繫。因為，即使你不相信對方，你也會相信自己的利益，所以兩岸發展共同利益的結果會反過來促進兩岸的穩定合作。當然，共同利益與穩定合作並不能保證兩個地區會必然走向統一，還有另外一個，也是最重要的條件：相互認同。有了ECFA後，兩岸交往程度會逐漸升高，相互認同也可以逐步推進。

美國學者約瑟夫奈提出4個軟實力，包括價值觀，政策，文化與制度。如果兩岸在價值觀和制度認同方面短期內達不成共識，可以在文化與政策方面增強認同。這四個方面的認同最終會為兩岸統一創造條件。

ECFA之後會怎麼樣？我們發揮想像力，做一個長程分析。ECFA的簽署後，貨物貿易，服務貿易生效後，很有可能不再是幾百項的減免關稅，而是一萬多項，也就是兩岸間絕大多數商品往來是免稅的，再往後兩岸ECFA的培育了產業合作的共同利益，那麼有可能兩岸共同制定產品技術標準和對外關稅，這就是關稅同盟。關稅同盟後，如果兩岸四地貨幣趨於一統，就可能形成一個貨幣同盟。在這個過程中，無論是關稅還是貨幣，都涉及到公權力，都涉及到兩岸公權力的合作與讓渡，事實上高度敏感性的政治難題已經水到渠成地破解了。

最後，我總結一下。實際上，世間事物的變化大體上有兩種：一種是突變的，一種是漸變的。對國家統一而言，武力統一接近突變，和平統一多數時候則是漸變的。漸變的特點是可控性強，成本較低，但它的過程也較為緩慢。所以兩岸和平統一需要有一個相對較長的歷史階段，也就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兩岸需要培育和保護 3項促進兩岸關係走向統一的條件：共同利益，穩定合作和相互認同。ECFA的為兩岸穩定合作創造了良好條件，它具有實質意義，而不僅是象徵意義。這是我的基本觀點。

淺談經貿合作之貨物流、資金流以及人才流動

摩根大通投資銀行亞太區副主席兼中國區首席執行官 方方

今日很高興有機會跟大家分享對兩岸經貿合作的膚淺認識。自2008年的三通開始，兩岸從此開創了經貿交流和發展的嶄新局面。

第一步的發展就是物流的直接互通。貨物的互通對於兩岸是雙贏的。我也看到大陸有不少經貿訪問團去台灣採購，這勢必對台灣的經濟會有一定促進。

第二步，我覺得更重要的是資金流。台灣原來自己限制自己，未有利用大陸這一巨大的資金流的優勢。而其他很多的國家都看到了大陸的資金，比如歐洲到中國來拉投資，美國的基金來中國拉投資者。從我的工作中讓我看到很多耳熟能詳的資金管理公司，聽起來名聲很大，但是它們後面的資金可能來自中國。但台灣卻把自己困起來，還未有解決大陸資金怎樣流入台灣這個問題，這是一個令人感到十分可惜的情況。

現時，有一個新的發展，大陸的企業可以在台灣上市，這是很好的發展趨勢。這樣的話，對於兩岸經貿溝通很有幫助。然而，我們一定要利用共同的市場，共同的方式，讓台灣可以“抽”到大陸的“水”，將資金以各種方式投放到台灣去。

我們看到台資當年投資到大陸已是一個成功的經驗，在這個基礎下，我們也看到大陸專門讓台灣投資的企業可以在大陸上市，這解決了台資在當地融資的問題。但這些錢都還是留在大陸，沒有回到台灣去。我相信這主要的是來自台灣方面的問題，他們沒有看到這是一個新的機遇。現在越來越多的外國政府和企業去大陸招商。英國的企業、美國的企業、歐洲的企業、澳洲的企業，美國的各個州，都在大陸設立一個招商融資辦公室，要把大陸的錢拉到外國去，辦館、辦企業。這一方面，我覺得台灣是最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一個是語言文化上的優勢，另一個更重要的是兩岸雙方對資金交流也有非常強烈的意願，所以這是一個重大的領域，也是一個重大的機遇。我呼籲在座各位經貿界的朋友，看看有甚麼辦法來解決大陸資金流到台灣的問題，大家一起去推動。

第三步，另一個重要的當然是人才的流動。台灣的人才到大陸來發展已經是大行其道，大陸很多保險公司的高管、零售公司的高管等等都有很多是來自台灣的專家。但是台灣企業的發展現在還未能充分利用到大陸的人才優勢。三通之後，我曾帶領全球清華大學的校友代表團去台灣拜訪，那時候還受到馬英九先生在其辦公室的接見，會面談論的一個重要的話題就是人才的流動。中國的學生到美國去，在美國的公司做事的話，可以取得該公司的股票。但是他沒有辦法獲得宏碁電腦(Acer)股票的資格，因為法律上規定不可以拿，大陸居民是不可以持有台灣股票，這就影響大陸人才向台灣企業的流動。

總括而言，我認為在物資流的基礎上我們要突破資金流，想辦法讓大陸資金流到台灣去，其實在現時香港的資本市場上已經有很多的大陸資金，這個“水喉”是很大的。但是這個錢還無法調到台灣去。此外更重要的是人才的流通。我們希望廣東的大學畢業生可以以優材的方式到香港發展，我們也希望看到北京的大學畢業生將來以台灣作為他們事業發展的基地，如果達到這樣的互動，兩岸經貿真正雙贏的局面就為時不遠了！

ECFA推動兩岸經濟關係走向新階段

南開大學台灣經濟研究所所長 曹小衡

一、兩岸商簽ECFA是歷史的必然

當前，台灣為大陸第七大交易夥伴、第九大出口市場和第五大進口來源地，大陸為台灣最大的交易夥伴、出口市場和貿易順差來源地。2000-2009年兩岸貿易總額8,022.2億美元，台灣累計順差額達5,106億美元，佔兩岸貿易總額的63.6%。台灣出口市場的40%在大陸。截至2009年12月底大陸累計批准台資項目80,061個，實際利用台資495.4億美元，大陸是台灣最大投資目的地，佔台對外投資70%。

兩岸經濟聯繫密切到如此程度，說明兩岸經濟具有巨大的互補性，當台灣70%的投資、40%的出口和100%的貿易順差都與大陸相關時，兩岸簽署ECFA就是明智的、必然的、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市場選擇。ECFA無論對台灣經濟還是兩岸經濟合作，都具有長遠的戰略意義。如果說兩岸過去對立是歷史的偶然，未來的合作是歷史的必然，ECFA就是歷史必然的開始，從這一角度理解，如何評價ECFA都不為過。

大陸改革開放初期，港澳台和海外華人給予大陸最為直接的支持和幫助，迄今為止，僅台商在大陸投資就達8萬餘項，對大陸的經濟發展、投資環境的改善、技術的進步、就業率的提高做出了極大的貢獻，今天大陸發展了，有必要有所回饋，兩岸都要從歷史的、長遠的角度看兩岸關係，看雙方長期的互惠互利關係。

二、ECFA後兩岸經濟面臨難得的發展機遇

從全球經濟走向、兩岸經濟發展的特點及兩岸經濟合作趨勢看，ECFA又為兩岸提供了進一步合作發展的新的機遇。金融危機發生後，中國大陸仍保持了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在亞洲地區乃至全球的地位得到了提升，在世界經濟中的話語權也進一步增強。而其背後最重要的支撐是，中國大陸的內需市場由此將展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伸展，大陸將由“世界工廠”邁入“世界工廠與世界市場”並列的新階段，大陸的消費市場發展潛力不可估量，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推進亦會產生巨大的利益空間，而這些為兩岸經濟合作開闢了完全不同以往的合作天地，如果說兩岸過往的經濟合作是一種面向國際市場的“外向型”的經濟合作，那未來的合作則更多是面向大陸或兩岸市場的“內向型”的經濟合作，這對台灣企業、台灣經濟乃至兩岸當政者而言都是個全新的課題，兩岸若能抓住此次機遇，不僅兩岸經濟合作能再上層樓，出現全新的境界，同時密切的兩岸經濟合作也能使台灣經濟再上層樓。

三、ECFA為兩岸共建中國經濟區奠定了基礎

自古以來台灣經濟即為中國經濟的一部分。台灣經濟發展與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偏離的根源在於中國清

朝後期國力衰退、積貧積弱。台灣經濟發展與大陸經濟發展軌跡偏離的重要事件是荷蘭殖民台灣的38年和日本殖民台灣的50年。在這近90年的殖民統治中形成了20世紀以來台灣經濟發展的特點和當今所謂“台灣意識”的第一個重要原因。當然，我們也看到，近代資產階級殖民制度在給台灣人民造成政治上的屈辱經濟上的剝削的同時，相伴而來的還推動了台灣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奠定了台灣資本主義發展的基礎。形成當代台灣經濟發展的特點的第二個重要原因，是戰後台灣經濟快速融入西方資本主義世界，走向一條繼續與祖國大陸經濟隔絕，依賴世界市場的特殊發展道路。台灣經濟因殖民入侵形成的資本主義基礎、西方產業結構調整、轉移和跨國公司建立的國際分工體系這三個主要原因，使戰後台灣經濟開始融入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並形成了當代台灣經濟發展的基礎。

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徹底改變了中國經濟發展的軌跡，也迎來了兩岸共建新的中國經濟區的歷史性機遇。從1978年到2009年，是同期世界經濟年均增長率的3倍多，經濟總量坐四望三，綜合國力邁上新台階，成為帶動整個東亞地區經濟增長的引擎，也為帶動包括台港澳在內的整個中華民族復興、共同重建一個嶄新的中國經濟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台灣可利用香港金融資源發展海運

台灣海峽兩岸文化經貿保障促進會 鄭光禮

ECFA的簽訂，緊緊地牽動著兩岸關係的發展，也同時關聯到台灣和世界經濟體制的整合，自然是值得大家關注的焦點。不過，筆者無意評論為甚麼選擇在重慶簽署ECFA，或是選擇與CEPA同一日簽署的政治含意；也無意附隨時論去探討究竟立法院應該逐條審查抑或是包裹表決來審議ECFA。而筆者則認為，我們實應自問：ECFA簽署後，台灣應有的視野是甚麼？

兩岸間ECFA後，世界貿易組織WTO秘書長拉米(Pascal Lamy)接受台灣中央社書面專訪時，肯定ECFA是台灣達成整體貿易目標的重大作為，可改善兩岸關係，確保島內產業競爭力，進一步和世界經濟整合，並可吸引外資。確實，中國的反對與抵制會阻礙WTO會員國家與台灣開展自由貿易協議FTA研議與簽署的意願，但是目前海峽兩岸間完成ECFA簽署後，將會提昇他國與台灣建立經濟整合的意願。歐洲國際政治經濟中心(ECIPE)在其最新出爐的研究報告中即持同樣觀點。但是，如此是否就會為台灣帶來經濟利益？全球貿易自由化是會開創競爭機會，但它不會保證經濟發展成果！根本上是我們必須著眼於競爭力的提昇。至於怎麼做，或許有二方面值得努力：一、強化區域資源整合，活化發展彈性；二、透過產業提昇創新，拉大市場差距。

舉海運發展為例，兩岸兩會於2008年11月4日簽署了“海峽兩岸海運協議”，其中約定“雙方同意兩岸資本並在兩岸登記的船舶，經許可得從事兩岸間客貨直接運輸”。而台灣也於2009年9月28日出台了“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海運直航許可管理辦法”，具體地就兩岸海運直航發展給予規範。然而，海運發展多涉及主權，台灣即便擁有特殊的海域位置，但是台灣的特殊國際地位使得台灣的航海事業發展不易，也導致航海產業鏈發展不全。例如，專業船舶管理人與船舶保險公司稀少。另外，船舶融資(Ship Finance)在台灣取得不易。由於銀行評估船舶融資條件時(例如：5Cs+Risks)，台灣的船主多減分不少，例如有關技術、政治或法律的風險評估，以致融資不易或授款比例過低，減損投資意願。但是香港則不然，除了航海產業鏈發展完整周全外，香港的金融服務業對於船舶融資也相當熟悉。若台灣能充分整合利用香港金融資源，再利用船籍國選定及船舶租賃等投資策略，如此台灣對於中國大陸的海運市場發展或許就能去除自身障礙，活化競爭力了。這就是筆者前述“強化區域資源整合，活化發展彈性”。

法國設計協會創辦人及被法國藝文界尊稱為“設計夫人”的包汀女士(Ann-Marie Boutin)曾言：“產品的價格不再是影響消費者意願最大因素，逐漸取而代之的，是產品的創意與設計”。宏碁集團創辦人施振榮先生也曾說：“全世界最便宜的創新，就是工業設計”。設計是最具評效的產業投資，也能夠扭轉消費習慣及產業方向。所以透過“設計”將可拉大創新產品與比價血拼的微利市場的差距。舉個例子來說：目前

台灣的陶瓷業者正在為ECFA簽署後的市場競爭苦惱著，但是他們或許可以在煩惱的同時思考一下如何鍛造精密陶瓷並將之用於行動電話或筆電外殼上。電子業能夠“精密”發展，難道陶瓷業不能嗎？這種研發目標，不是山寨機廠商有能力生產，也不是他們有興趣研究的！台灣的設計家們經常是世界知名工業設計大獎IF或IDEA的常客，成績斐然。因此台灣政府如要以此方向作為落實“產業創新”政策的具體方針，執行上應該不困難才是。

有論者曾試圖從香港加入CEPA與墨西哥加入NAFTA前後比較，試圖從失業率增高等指標悲觀地預測台灣後ECFA的“下場”。但筆者認為經濟制度的好壞很難單從一、二項指標去評斷，其他如產業特色、產業發展策略與力度、經濟自由度或政治透明度(Transparency)等都是影響未來成果的變數，也同時是反應競爭力的條件，不可不察。簡言之、透過上述的觀察，台灣在後ECFA時代應該要有明確的經濟發展戰略及方針，政府應從規劃總體競爭地位，到決定多元競爭策略，再到具體融入產業發展內涵，最後再具體細化產業創新方針。經緯俱足，才是正向。當然這些規劃或許應該早在ECFA簽署前就完成才是，並且廣為政策宣傳，而不是一味地宣傳簽署ECFA有多好。不過，時日未晚，現在做也來得及！另一方面台灣在1995年由行政院院會通過經建會所提“亞太營運中心計劃”，其中規劃台灣“未來”成為生產製造中心、貨物及旅客轉運(海運及空運中心)、專業服務金融中心、電信中心及媒體中心。



從ECFA簽署看兩岸未來經貿發展

台灣中華文化教育學會 譚再利

前言

台灣海峽兩岸60年來經過雙方的共同努力，從軍事對峙與互不信任，以迄台灣的開放大陸探親及旅遊、台商投資與經貿往來、文化與學術交流，以及政黨和民間人士的互訪；大陸方面的緩和敵意及釋出善意等長期過程，兩岸的民間機構代表海基會與海協會終於在今年6月29日正式簽署“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大陸方面稱之為“經濟合作框架協定”），這可以說是兩岸分治一甲子以來最重大的事件，這在任何一個因為戰爭而分裂的國家裡，都是史無前例的大事。該協議簽署後，不僅得到兩岸高層與人民的肯定與讚賞，歐美各國政府、世界各主要媒體，以及著名經濟學者大都報以好評，並稱之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里程碑。深信在兩岸政府的互諒、互信與互助的努力之下，必能創造台灣與大陸未來經貿發展的互利雙贏局面。

一、兩岸經貿關係發展歷史回顧

（一）戒急用忍以避免風險：為了防止台灣企業在大陸過度擴張投資，台商對大陸市場依賴日深，升高兩岸經貿風險，影響國家整體利益，台灣於2006年提出大陸投資的“戒急用忍”政策，下達有關台商赴大陸投資的重要政策，其中主要的限制在於規模達5千萬美元以上的投資案，和某些台灣視為極重要的產業，不許前往大陸投資。其後因台灣內、外的經濟環境與制定“戒急用忍”政策時出現劇烈變化，尤其是面對全球化發展及兩岸加入世貿組織後的新情勢，必須考量提升企業全球競爭力的迫切需要，將兩岸經貿納入全球市場的一環，乃持續調整“戒急用忍”此一防堵大陸投資之消極作為。

（二）有效開放以面向全球：2000年陳水扁執政後，適逢全球經濟不景氣，產業界紛紛要求鬆綁“戒急用忍”政策，陳乃將“戒急用忍”改為“積極管理，有效開放”，本於“台灣優先”原則，改善國內投資環境，強化科技實力，並鼓勵企業進行全球佈局，向外延伸力量，厚植台灣做為全球化經營及資源整合者的條件。基於此一新經濟戰略，大陸投資是企業力量向全球市場延伸的中繼站，大陸市場也將成為企業生根台灣、佈局全球的一部分。

（三）大陸和平之旅開創新局：2005年中國國民黨的中國大陸和平之旅，使國民黨主席連戰成為1949年後第一位踏上大陸的國民黨最高領導人，並達成國共兩黨促進經貿交流，推進雙向直航、三通和農業交流等“五點共識”，為兩岸的經貿往來開啟新的篇章。2008年5月馬英九就職後致力於改善兩岸關係，馬對中國大陸的立場與其前兩任的主張迥異，迄今兩岸已達成直航及其他重大合作項目，其意義與成就非凡。

二、“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對台灣與大陸的影響

（一）經濟方面：

1、有利兩岸經貿互惠合作：正如馬英九先生所言，兩岸簽署經貿協議，象徵台灣已經在突破經濟孤立、兩岸走向互惠合作，以及加速區域經濟整合等三方面跨出了一大步。對台灣而言，中國大陸已是它最大的貿易夥伴；對大陸而言，自從改革開放後，台灣一直是大陸最大的投資者。ECFA簽署後，除可獲得關稅減讓的好處外，雙方企業在台海航運、融資、保險等商務流程都能獲利。

2、長期效益仍有待觀察：ECFA只是一個架構協議，不是自由貿易協定（FTA），很明顯的大陸在早收清單中對台灣大幅讓利，兩岸並不是平等互惠，以降低台灣內部反對聲浪與擴大支持基礎。但在ECFA協議當中，台灣仍然違反世界貿易組織的最惠國待遇，沒有開放片面限制進口的2,249項中國產品。ECFA對台灣經濟的短期效益恐怕有限，長期效益則取決於未來4項協商成果。兩岸在6個月之內將啟動4項協商，包括貨品自由貿易協議、服務自由貿易協議、投資協議及爭端解決協議。

3、推動大規模兩岸自由貿易困難度高：因為台灣內部對兩岸關係存在高度政治疑慮、沒有產業利益整合機制、沒有朝野共識、沒有社會共識，因此執政者存在明顯的保護主義。以目前台灣內部的氣氛與執政者的作法，恐怕要改變執政者的保護主義不太容易。也就是說，至少在2012年前，未來台灣要推動大規模兩岸自由貿易協定的困難度相當高，或者只能期待中國大陸對台灣更大規模的經濟讓利。

（二）政治方面：

1、ECFA對兩岸政府都是政治勝利：胡錦濤先生一直尋求能夠改變過去對台灣的威嚇途徑，尋求結束與台灣的敵對狀態並協商和平協定；對台灣而言，ECFA是馬英九先生推動兩岸和解政策的高峰，但他面對台灣生氣蓬勃的民主政治及分裂的民意，仍面臨須證實ECFA是成功策略的壓力。但無論如何民調顯示大部分台灣民眾支持兩岸簽署ECFA。

2、ECFA的政治意涵引起爭議：兩岸經濟進一步融合，將對台灣安全和政治自由構成威脅。因此根本問題在於兩岸進一步經濟融合，是否會使台灣未來更易遭受中國大陸的約制。顯然，中國大陸為台灣以及馬政府提供了有利的結果，而其動機可能正如反對黨所認為，透過兩岸經濟融合以有助達成政治統一目標。中國大陸希望在建立兩岸互信後，台灣人民長期來講，會比較願意考慮加強兩岸政治關係。

3、台灣仍須審慎因應：台灣接受了中國大陸所提供的利益，未來必須謹慎因應，以防ECFA的檯面下磋商方式成為未來的模式。中國大陸對台灣的民主仍有戒慎之心，尤其是諸如ECFA公投等訴求，因為這會令人聯想到這是台灣的統獨公投。同時目前無法確定中國大陸是否會同意其他貿易夥伴國與台灣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此等情況台灣自然仍須審慎因應。

4、有利於國民黨的政治前景：這項協議標誌著台灣在克服政治障礙上已向前邁進一大步，雖然台灣純粹是由經濟因素所驅動，中國大陸的重點則主要是政治，北京是在試圖削弱台灣內部與大陸更密切關係的

反對力量。馬英九先生似乎確信 ECFA的簽署對台灣的政治影響是正面的，他希望依靠預期的經濟利益轉化為選票，以使執政黨贏得11月的5大都市市長選舉。如果國民黨在這次選舉中表現很好，則將是國民黨過去兩年以來政治命運的轉折點，亦將有利於馬先生在2012年的競選連任。

三、“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在台灣的民意反應

（一）反對黨的主要論述：

1、ECFA最終將是兩岸政治問題：ECFA絕對不只是經濟和出口市場的問題，它牽動的是兩岸政治議程、經濟互動安全性，及產業與財富的重分配，絕對需要詳盡的評估與政策討論的過程。ECFA涉及經濟主權以及政治主權，即先經濟統一，接著政治統一。

2、ECFA必須經過充分討論與整體評估：台灣社會從沒有充分討論過ECFA，許多民眾對ECFA並不了解，執政當局也從沒有提供過完整的評估，事先告訴社會協議的實際內容為何？是以甚麼條件來進行？是否有附加政治代價？做出甚麼政治讓步或暗盤？

3、與他國簽署FTA的問題：中國大陸尚未做出任何未來不排擠台灣和他國簽訂FTA的承諾，只和中國大陸簽ECFA就是給中國大陸高於其他國家的開放和優惠，未來台灣的經貿只能往中國大陸大陸發展，結果是更依賴中國大陸。

4、使台灣失業問題更趨嚴重：台灣若與中國大陸簽訂經濟合作協議，未來將會進一步開放技術、人員、資金、勞務、商品等的自由流動，不僅中國大陸的勞工將直接得到台灣的就業機會，同時也讓台商更方便到中國大陸投資設廠，造成更多的台灣企業關廠歇業，衝擊內需產業的生存，讓更多的台灣勞工飯碗不保，造成島內失業問題的惡性循環。

5、“實質審查”淪為空話：ECFA完成簽署後才送立法院，並非國民黨所承諾的“實質審查”。兩岸之間的任何協議都是台灣政府重大的對外協議，絕對不是行政部門可以完全主導、獨裁。

6、必須經由全民公投：對台灣民眾而言，他們最關心的事項就是與大陸的關係，如果不交付公民投票，就是違背“台灣前途由台灣人民決定”的承諾。

7、形成“一中市場”的憂慮：儘管兩岸已經簽署經濟協議，但仍有民眾擔憂兩岸將變成“一中市場”。因為執政當局要將台灣鎖入“一個中國”與“一中市場”，民進黨並於6月26日舉行了“反對一中市場、人民公投作主”大遊行。

8、“終止條款”的爭議：中國大陸未來會持ECFA的“終止條款”，要脅台灣以遂行其政治目的，片面終止ECFA。若是台灣無法在一年內與其他國家簽署FTA，民進黨將要求啟動兩岸經濟合作協議中的“終止條款”。

（二）社會輿論的反應：

1、雙英ECFA議題辯論結果之一：台灣史上首次由總統和在野黨主席的政策辯論會於今年4月25日舉行，台灣“聯合報”於4月26日公佈的民意調查顯示，有四成二受訪者肯定馬英九的辯論表現較優，三成認為民進黨主席蔡英文的表現較佳。調查也發現，雙英辯論改變了6%收視民眾對於兩岸簽署ECFA的立場；這些改變立場的人，八成一由反對變為支持，一成改變為反對立場。

2、雙英ECFA議題辯論結果之二：台灣“蘋果日報”4月25日於辯論後所做民調結果顯示，有52.09%的受訪者支持簽署ECFA，反對簽署者43.07%。台灣“TVBS”有線電視台民意調查中心的結果則顯示，41%贊成簽訂ECFA，較4月21日該中心所做調查增加了3個百分點，反對簽訂者則從先前的36%降至33%。

3、ECFA的滿意度逐次增高：根據台灣大陸事務委員會7月6日委託“中華徵信所”針對第5次“江陳會”所進行的民意調查結果，在簽署的兩項協議中，ECFA的滿意度超過六成一，智慧財產權保護協議的滿意度則達到七成三，有高達近八成（79.3%）的民眾贊成繼續透過兩岸制度化協商，來處理兩岸交流問題，這是陸委會關於ECFA的3次民調中，滿意度最高的一次。（前2次係委託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所做，支持度分別是五成四及五成三。）對於ECFA所帶來的效益，六成二的民眾認為有助於與其他國家洽簽自由貿易協定，近6成民眾認為對台灣經濟的長期發展有好的影響。

四、國際社會對“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的觀點與評論

（一）亞太國家：

1、朝日新聞（Asahi Shimbun）社論：兩岸簽署ECFA對日本與韓國形成壓力，可能會使亞洲貿易環境重組，迫使日本一面催促企業建立新關係，一面扭轉貿易談判策略。日本對於韓國與中國大陸談判FTA需小心提防，因為日、中貿易談判可能很棘手，特別是在智慧財產權保護和農業方面；若ECFA形成了韓、中談判的動力，日本就可能被迫主動推進三方談判。ECFA還可能迫使日本企業檢討策略，以透過和台灣企業加強關係來打進大陸市場。

2、韓國時報（Korea Times）社論：在台灣與中國大陸簽署相當於自由貿易協定的協議後，整個地區已經感受到其影響。其他經濟巨頭如日本和韓國現在已開始擔心，台灣未來對大陸的出口可能會大幅邁進。該協議簽署後將重塑亞洲的貿易環境，迫使日本改變其策略。韓國“聯合通訊社”（YNA）甚至呼籲首爾迅速與中國大陸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以減少韓國出口大陸受到重大損害。

3、日本時報（Japan Times）社論：簽署ECFA可能改變雙方政府之間的關係，不但將深化兩岸的經濟一體化，也將開啟雙方更密切的政治關係大門，而這也是大陸方面的期望。兩岸需要更加努力，才能從ECFA獲取政治利益；北京應有更大耐心，以贏得台灣人心。ECFA的簽署除了經濟利益外，它也是兩岸一種信心建立措施（CBM），表明兩岸有共同的意願解決政治問題，雙方政府都在努力改善關係以尋求雙贏的解決方案。

（二）歐美國家：

1、英國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兩岸簽署ECFA乃1949年以來雙方關係發展的重要里程碑之一。該協議雖無法確保和平或中國大陸追求的統一目標，但的確是令人樂見的發展。各方應務實看待ECFA，亦即這是個貿易協定，應能在經濟和政治雙方面為台灣提供助力。然而，讓人擔心的是中國大陸會因此強化對台主權要求的心理，使台灣內部對ECFA的立場嚴重分歧。台灣的反對者將ECFA視同另一場戰爭，有如木馬屠城一般，這些反對者認為中國大陸意在爭取台灣民心。

2、加拿大媒體網站（The Canadian Press）：ECFA使美國與台灣安全關係面臨壓力，兩岸簽署ECFA大幅緩和了這個地區的衝突熱點，但隨著兩岸關係趨近，以及中國大陸影響力提升，長期以來美國維持的對台安全關係也面臨壓力。迄今美國對兩岸的發展持正面態度，但美國也授予中國大陸籌碼，中國大陸已在美國發動遊說，擠壓美國與台灣的長期性安全關係。美軍目前在西太平洋的海軍優勢已面臨風險，台灣位處於第一島鏈的中央，兩岸關係密切，台灣海域將落入中國大陸的控制。

3、美國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ECFA將提供馬政府良機，使台灣能“再次全球化”，並提振衰退的競爭力，但台灣仍需制定明確的經濟和政治策略加以配合。馬總統若要採取進一步的兩岸貿易行動，將面對嚴峻的政治挑戰，一則民進黨現仍反對ECFA，再則中國大陸仍堅稱對台灣擁有主權，顯然馬總統將面臨內外雙重壓力。

六、結語

ECFA的簽署是兩岸交流至今官方色彩最濃厚及影響最為深遠的一項協議。簽署ECFA之後兩岸關係已正式邁入後ECFA時期。畢竟ECFA只是一個架構協議，而不是自由貿易協定，真正挑戰在ECFA簽署之後才開始。兩岸在6個月之內將啟動四項協商，包括貨品自由貿易協議、服務自由貿易協議、投資協議及爭端解決協議，因此後續的執行面還有許多環節需要兩岸持續努力。目前台灣人民在ECFA簽署後最為關切的議題就是與他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這將是進一步測試中國大陸善意的指標。台灣人民期待FTA乃是出於對過度依賴大陸的不安全感，也是希望獲得更多國際承認以強化主權尊嚴。在這方面中國大陸雖然已表達出較為正面的態度，但台灣民眾仍然期待看到真正的進展。

ECFA有利加強兩岸經貿統合

台灣商工統一促進會副主席 蔡水安

台灣屬海島型的經濟體系，本身天然資源相當匱乏，面對國際經濟市場的高度競爭環境，要想高度發展經濟，惟需仰賴對外貿易，只有採取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政策，始能維持穩定的經濟持續增長。因此，推進兩岸經貿統合平台利基，實在是強化與鞏固台島經濟持續發展的需求。

近年來面對全球區域經濟整合的趨勢，中國大陸和東協國家簽訂經濟合作協議，成立自由貿易區，實施關稅減讓與排除非關稅貿易障礙，對於台灣經貿發展造成一定壓力。台灣為了避免在區域經濟整合體系中被邊緣化，惟在積極簽定“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後，進一步促進兩岸經貿關係正常化持續發展，並順勢推進兩岸“經貿統合”平台利基的發展，進而推動兩岸“政治統合”的起端，最終邁向和平統一大道。

兩岸地緣血緣關係的融合

兩岸地緣及血緣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就血緣關係的融合而言，台灣與閩南間有地緣、血緣、文緣、語緣等關係相連，人民多講閩南話，民間信仰也一樣，由民間信仰所衍生出的文藝形式與人民的欣賞習慣也一模一樣(例如，民間布袋戲等)，又如；道教信奉媽祖、臨水娘娘陳靖姑等。其他戲曲的閩劇、南音、梨園戲等，這些都是閩台文化交流的優勢所在。因此，未來閩台間在兩岸地緣血緣關係的融合中，顯得更形密切重要。

就地緣關係的經濟而言，台灣高科技產業及農漁牧業的產品，已得到內地消費市場的信賴。也因此導引陸資來台投資，這對台灣經濟發展現有資金流動產生正面效應外，更能創造兩岸經貿合作關係的雙贏局面。

開啟兩岸經貿統合的起端

兩岸人民交流關係的正常化，必須是從經貿及文化關係正常化開始做起，然從其基礎的地緣、血緣融合、文化融合、經貿統合，進展到兩岸政治統合的基點；要有步驟、有目標的開啟兩岸經貿統合的起端，進而促成兩岸政治統合的願景，最終達成和平統一的康莊大道。

從東西德歷經40餘年的分隔狀態，兩德在人民的期盼支持下，終在1990年10月3日正式宣佈和平統一；緣於人民隸屬於地緣血緣融合、文化融合、經貿統合等有著密切關係，再進行政治統合，最後終成和平統一的目標。由此可見，兩岸在經濟貿易投資旅遊的發展過程階段，對“經貿統合”急速交流，未來發展理應看好。

推進兩岸經貿統合平台發展

兩岸積極推動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的目的在於促進兩岸經貿關係正常化的發展，避免台灣在區域經濟整合體系中被邊緣化，以促成兩岸經貿投資國際化，排除關稅和非關稅的貿易障礙，以待爭端解決機制。因此，未來推進兩岸經貿統合平台的利基，將以一年交流、二年洽商、三年合作統合方式，締造兩岸經貿合作模式，共同攜手布局全球國際經貿市場為主軸。

兩岸人民交流日益密切，但在經貿合作的發展方面，仍存有許多限制及障礙。亦由於台灣未能參與東亞區域經濟整合，而產生了被排擠的負面效應，未來恐怕還將逐漸擴大，勢必產生台灣在經貿發展不利於國際競爭的危機感。而簽定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後，則可促進台灣產業結構轉型及提高投資產業的意願與增加就業機會等，亦有利於推進兩岸經貿統合利基，完成和平統一的基業。



兩岸經貿合作前景廣闊

台中市政新聞記協 于衛民

有關的兩岸經貿合作也好，和平發展或教育文化也罷，此類議題，早就在國際間炒的沸沸揚揚了。兩岸本一家，血脈相連，這也是不爭的事實，就是有一小撮台獨分子，他們疑似忘記了曹植、曹丕兄弟間發生嚴重矛盾，曹植痛心之際唸出的七步詩“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故事了。

近日來，台灣方面針對兩岸共同簽署ECFA一案，民進黨方面就為了反對而反對，在此議題上不斷的大做文章，同時提出了各種假想的問題，來引導民眾及學子們去作出錯誤的判斷。

據了解，兩岸經貿論壇是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繼續開展政黨交流與對話的一次重要活動。兩黨人士和兩岸企業界人士以及專家、學者、台商代表等與會人士就“在全球化浪潮下，兩岸經貿交流對雙方經濟發展的影響”、“兩岸農業交流與合作”、“兩岸直航對產業發展策略、企業全球佈局的影響”、“兩岸觀光交流對雙方經濟發展的影響”、“兩岸金融交流與兩岸經貿發展”等等多項議題，都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研討。

2005年間，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與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就促進兩岸關係改善和發展的重大問題深入交換了意見，取得廣泛而重要的成果，其中在促進兩岸經濟全面交流，建立兩岸經濟合作機制，推動兩岸實現全面、直接、雙向三通，加強兩岸農業合作和解決台灣農產品在大陸銷售、推動大陸居民赴台旅遊等涉及兩岸經貿合作方面達成的共識，對於維護兩岸同胞的利益和福祉、改善和發展兩岸關係、實現兩岸雙贏和共同繁榮，有著重大意義。論壇積極評價去年以來兩黨在推動兩岸經濟關係發展方面所做的各種努力，並就進一步落實兩黨領導人會談成果、在新的歷史發展機遇面前加強和深化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提出以下共同建議。

面對國際經貿的發展趨勢，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確實符合兩岸同胞的共同利益和期望。此外；面對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整合的各種機遇與挑戰，兩岸同胞也應當在兩岸經濟關係持續發展之基礎上，更加緊密地攜起手來，全面深化和擴大經濟交流與合作，相互扶持，優勢互補，實現兩岸共同繁榮，推動兩岸關係朝和平穩定的方向發展，造福兩岸同胞。

在兩岸推動直航方面，也有一段時間了，就兩岸貨運包機便捷化和客運包機節日化、周末化、常態化的相關問題方面，是作出了安排，然為維護兩岸市場的需求，更應務實、靈活處理相關事宜。大陸“海峽兩岸航空運輸交流委員會”與“台北市航空運輸商業同業公會”應儘早就兩岸空中通航的航路進行協商，爭取各省市建立更為便捷的直達航路。此外；也有甚多台商強烈反應，在祖國大陸要遊走各省市搭乘飛機

時，民航公司為了促銷機票，也多會有優惠政策出台，然一些二、三折票，確常僅限使用身分證者，台商就被屏除在外，難道心向祖國的台商是被定位為外國人士嗎？既然所持有的是台胞證，又要台灣民眾認同兩岸統一，我們祖國大陸的航空業者，是否也應配合國家的既定政策？

事實上，在兩岸的農業方面，具有很強的互補性，兩岸應結合雙方的農業優勢，強化研發、技術管理及行銷的能力，互惠雙贏，擴大兩岸農業技術交流與合作的平台。大陸方面將進一步擴大開放台灣部分農產品的准入品種，對其中部分農產品實行關稅優惠政策。雙方共同努力促成兩岸民間團體就有關台灣農產品輸入大陸所涉及的原產地認證、檢驗檢疫等技術問題進行協商，並採取措施防止假冒台灣農產品。大陸方面積極提供方便條件，歡迎台灣農民、農業企業到大陸投資、興業。推動兩岸農業組織本著互利互惠的原則，加強經驗交流，相互合作，振興農村經濟。呼籲台灣方面同意農產品採用直航方式銷往大陸，以爭取時效，減少損耗。

共同探討構建穩定的兩岸經濟合作機制，擴大和深化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促進兩岸關係發展，實現共同繁榮。要努力推動兩岸經濟關係實現正常化、規範化、穩定化，消除在兩岸經貿關係中的各種障礙。共同推動兩岸學者專家、工商界人士就更緊密的兩岸經貿合作關係、兩岸共同市場的相關問題進行探討。

江丙坤在簽署ECFA致詞時指出，這次要簽署的兩項協議，基本上屬於兩岸大三通的一環，算是通商的重要協議。特別是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牽涉單位之多，內容之廣，複雜性之高，不是過去12項協議所能比擬，對今後兩岸經貿發展影響深遠，ECFA以及其後續協議，將會讓兩岸進一步互相排除貿易與投資障礙，促進貿易、投資和就業機會發展，讓兩岸人民同蒙其福。尤其對台灣來說，ECFA不僅打通任督二脈，同時在中國大陸這麼龐大的市場取得與東協產品公平競爭的機會，對其他國家的產品居於捷足先登的優勢。

陳雲林在ECFA會議上致詞時，引用了一首詩句“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指出：“兩年來為深化兩岸經濟合作，增進兩岸同胞福祉，我們面對重重困難和無數干擾，貴我雙方以‘咬定青山不放鬆，任爾東西南北風’的執著精神，相繼簽署12項協議，達成2項共識。”

陳雲林說，隨著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的商簽，兩會圍繞經濟議題的商談將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希望協議達成後，有關各方能積極推動，保證協議順利實施，讓這一紙乘載兩岸同胞期待，凝聚兩岸各方心血的協議，早日取得經濟效益，早日切實造福兩岸同胞。

本人認為；在經貿發展全球化的浪潮下，兩岸經貿的進一步推展與合作，必能產生互利互補的效果。因此，除了透過民間力量將大會所做結論認真推動外，並呼籲透過兩黨溝通平台所建立的機制，將大會結論運用各種管道積極研商付諸實施的辦法，同時將建議轉達兩岸有關方面重視並獲得支援，才能創造兩岸全民的福祉。

以休閒觀光推動兩岸互動互信

台灣經濟科技發展研究院總院長 唐學斌

前言

近幾年來，政府開放大陸探親已獲具體成果，對兩岸關係的建立又向前邁進一大步，這代表著中國兩岸衝突訴諸武力解決的時期已經結束，而是一個嶄新、充滿和平與理性的互動模式開始。在社會不斷演進發展過程中，休閒觀光活動增加了兩岸人民互動的機會，藉由觀光活動促進彼此間相互了解與認識，對擴展兩岸觀光事業時具有正面的意義。

觀光事業係屬綜合性、多目標之企業，現階段兩岸觀光交流之主要目的，在謀求中國富強與民族長遠的發展，這是中國海內外中國人共同的願望。中華民族傳承了五千餘年的歷史文化，擁有無限的觀光資產，亟待共同努力開發，尤其博大精深的中華傳統文化，需要結合有志從事於觀光旅遊人士智慧，共同研究開發，本著和平、理性、對等、互惠的原則，重建觀光旅遊良性互動的環境，共謀中國觀光事業的發展。

今天的觀光事業已成為國際服務性企業主導的事業之一。為加強兩岸的聯繫與各種交流，在不違背政策體制下，由民間機構做為溝通的橋樑，積極拓展觀光旅遊所建立的關係，進而促成海峽兩岸統一，是最佳之捷徑。是故，建立海峽兩岸觀光合理交流程序，制度交流規範，設立旅遊交涉仲介機構，在休閒交通觀光交流過程中不危害對方的安全與安定，及在互惠中不否定對方為政治實體之前提下，才能確保兩岸觀光互動所產生的效益，消除觀光之障礙，縮短兩岸人民生活上差距，秉持政治民主、經濟自由、社會開放、公平公開的原則，充分運用觀光資源，發揮其功能，並開闢聯繫管道，建立資訊網路，舉辦觀光學術研究會等，均為提高兩岸休閒觀光互動關係，進入常態化交流之佳途徑。由此，吾人更應體認觀光的重要性，共同維繫兩岸良性之休閒觀光發展，相信在兩岸善意的合作下，對於社會安全、繁榮與進步，均具有深遠的意義。

休閒觀光互動的重要性

由於兩岸休閒觀光旅遊問題涉及政策面與技術面，兩岸必須摒棄相互對立的政治意識與主權主張，共同為建立利益共享與文化交流的管道而努力。在世界經濟成長快速情形下，人民生活水準普遍提高，從事休閒觀光旅遊活動對人類生活之影響日益重要，且兩岸文化交流在結構上，具有多重之特質存在，不僅可促進、加速推動大陸經濟改革，增進兩岸人民福祉，達到互信合作階段，而且能宣揚中華文化，促進雙方社會繁榮，因此，今後進行兩岸休閒觀光交流，應採取務實及彈性的政策，以朝向理性化、良性化的方向發展，逐步開拓兩岸觀光交流，進而在國家統一的原則下，落實休閒觀光旅遊自由化的目標。為確保兩岸關係良性互動，增進彼此相互了解之先決條件，並為祛除兩岸敵意，因此，在邁向另一新時代來臨之時，

宜先建立雙方共識，完全以善意的合作為基礎，共同致力於觀光外交的互動關係。基本上，我們統一的訴求目標，係以海峽兩岸的互動為導向，唯有以持續不斷、鍥而不捨的精神，積極推動海峽兩岸的互動，才能建立共信與共識。

海峽兩岸僅一水之隔，同屬中華民族一脈，基於彼此對觀光重要性之認識，實有利於兩岸適切發展觀光旅遊事業，加強“觀光互動”之關係。吾人認為兩岸休閒觀光旅遊發展之原則，可歸納為下列幾項：

- 1、 加強休閒學術團體合作及互訪機會。
- 2、 適度訂定旅遊合理收費標準，提升旅遊品質。
- 3、 提高觀光軟體服務，健全休閒整體環境。
- 4、 合作開發旅遊資源，改善遊憩設施。
- 5、 減少旅遊限制與障礙，通盤考量兩岸旅遊發展對等關係。
- 6、 重視休閒旅遊經營管理及專業技術之輔導與訓練。
- 7、 健全休閒教育制度，培育觀光專業人力。
- 8、 透過休閒學術交流，加強兩岸旅遊文化探討。
- 9、 建立旅遊商品化制度，強化觀光旅遊資訊系統。
- 10、 蒐集休閒旅遊最新資訊，增設旅遊機構服務。

由前述各項可得知，目前加強兩岸休閒交流，對於穩定兩岸互動關係，促成國家統一，係中國人統一共同的責任，同時，互信合作為達成中國統一的必要條件。在政府積極推動兩岸民間文化、經濟交流之際，如能在對等基礎上，建立誠意的互動關係，相信中國休閒旅遊交流的進展，會更為具體化。

如何加強兩岸休閒觀光常態性交流

中國的統一在謀求國家富強與民族長遠的發展，也是海內外中國人共同的願望。為推展休閒觀光國際化，海峽兩岸觀光互動關係，應在理性、和平、對等、互惠的前提下，彼此善意的回應，以作為雙方進一步觀光交流合作的基礎；亦惟有漸進而謹慎的觀光互動，才能使兩岸未來觀光發展關係，不致出現緊張或倒退的突變現象。

盱衡兩岸休閒發展主客觀條件，凡事不涉及政治、政策、法律、主權等問題，均可採取觀光合作善意的原則，同時，為促進兩岸的和睦，對於兩岸觀光互動關係應是主動積極的。為確保兩岸關係良性互動，增進彼此相互了解的最重要條件——當前海峽兩岸敵意的祛除，因此，在邁進向新發展的里程碑上，宜建立彼此共識，完全以善意合作為原則，共同致力於觀光外交的互動關係，在此基礎上，兩岸才有統一的契機

與可能。基本上，我們國家統一的訴求與目標，係以海峽兩岸的互動為取向，唯有以持續不斷、鍥而不捨的精神，積極推動海峽兩岸的互動，才能建立共信與共識。現階段兩岸休閒交流為促進了解，摒除敵意狀態，增進兩岸人民福祉，發揚中華文化，推動經濟改革、促進雙方社會繁榮，藉由觀光交流階段達到互信合作階段，進而步入協商統一階段，依據兩岸人民意願，共商統一大業，務期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國，海內外全體中國人同心協力，共圖貫徹，以達目標。現階段為了解兩岸休閒旅遊關係的發展，在本質上，除應考慮雙方的經濟、政治等因素外，對於旅遊定位問題亦不容忽視，尤其是在旅遊服務品質未達完全受到旅遊契約的保障之前，更應審慎予以考量。就目前台灣的大陸政策，已開始逐步走向制度化、精緻化的道路，且較之於大陸，更為自由、民主和富裕，在處理大陸旅遊事務上，仍願以“對等”原則相待，希望海峽兩岸均以務實開朗的作風，互惠互利的合作態度，共同推展休閒旅遊事業。

自開放兩岸民間交流以來，旅遊文化交流逐步趨於熱絡，在在顯示透過交流，逐漸讓兩岸人民建立和平、民主、統一的觀念，並在潛移默化中改善兩岸的關係。由於休閒旅遊事業具有許多無形的效益及功能，已成為世界各國積極開發的產業之一。在旅遊文化交流推展過程當中，為保持雙方組織交流合作，應把握下列幾項原則：

- 1、 以觀光交流促進彼此了解，以互利互惠化解兩岸敵意。
- 2、 建立兩岸休閒交流秩序，制訂旅遊規範，充分發揮兩岸仲介機構力量，維護兩岸人民應有權益。
- 3、 擴大兩岸旅遊文化交流，放寬各項限制，促進雙方社會繁榮。
- 4、 積極推動休閒旅遊事業，逐步開放市場，採取自由競爭體制，增進兩岸人民福祉。
- 5、 摒除兩岸敵對狀態，並在互重、互信的立場下，建立正常的溝通管道，減少兩岸旅遊糾紛產生的機率。
- 6、 協力參與國際觀光旅遊組織與活動，奠立在國際間的地位。

如若兩岸能在互惠中不否定對方為政治實體，取得互信合作的共識，則在未來共同參與國際事務的可能性將大為提高，也會使我國觀光外交的空間更為廣闊。

兩岸休閒旅遊未來的發展，須視經濟社會對旅遊的需求而定，因此，除了自由化與科技，助長旅遊業的發展外，整個社會結構，對服務品質與休閒活動的重是，以及身處資訊爆炸時代，人們對資訊的渴望追求等，都將成為海峽兩岸旅遊發展的方向。今後不論海峽兩岸旅遊的互動關係，及旅遊業創造的工作機會如何，休閒事業將會不斷向提升國民生活水準方向。如此，不但提高了兩岸人民生活的品味，同時也造就了許多的就業機會，對社會安定、繁榮與進步，均具有深遠的意義。

結論

鑑於休閒事業已成為現代先進國家發展之目標，再加上觀光事業具有複雜多角性，在穩定一國之收支平衡與持續成長方面，佔有一席之地；當然開發的同時，對於一些外在變數，如季節性、吸引力、功能性等，應於開發前妥善加以規劃利用，以充分發揮其實質效益。就觀光旅遊事業的發展潛力而言，其前瞻性的效益在於透過休閒互動關係，縮短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增進彼此互、互賴的依存性，藉由服務提，共達到多元化經營管理之目標。吾人認為休閒事業是台灣與大陸，一致努力開發的目標，宜增進雙方文化交流機會，透過溝通建立共識，縮短彼此意見上之差距。因此，為加強兩岸的聯繫與各種交流，在不違背政策體制下，由民間機構作為溝通橋梁，積極拓展旅遊所建立的關係，進而為促成海峽兩岸統一而努力不懈，實為一最佳途徑。為引導海峽兩岸休閒旅遊活動，進入正常化、良性化的互動階段，在拓展休閒旅遊工作上之基本依據，不外乎下列幾點：

- 1、擬訂合理旅遊規範，全面檢討旅遊缺失。
- 2、結合規劃遊憩據點，因應未來旅遊變化。
- 3、加強休閒學術交流，重視觀光人才培育。
- 4、考量通航實質效益，是度放寬通關限制。
- 5、設計新穎旅遊行程，改善服務旅遊品質。
- 6、重視旅遊型態結構，積極開發旅遊市場。
- 7、加強旅遊安全措施，維護旅客基本權益
- 8、健全旅遊保險制度，訂定市場合理需求。

休閒事業的未來發展，對於整個社會結構及經濟成長，均有莫大的影響，尤其是帶動人們對休閒生活的重視，與縮短兩岸人民的距離，在在顯示休閒觀光互動之影響。為增進兩岸休閒交流活動，舉凡有助於休閒事業之發展，及建立彼此合作等事項，吾人君當全力以赴，時時以文化觀光融興建國巨業，提振民族壯志；從中華世界釀化大同正氣，促進人類和平為職志，發揚中華文化精神，加速兩岸休閒事業發展，以順應時代潮流趨勢。今天休閒事業已成為國際性競爭的新興企業，中國地大物博，擁有無數天然資源，如能善加運用開發，必能成為觀光大國，進而在互重、互惠及對等的前提下，展開雙向的互動關係。

論ECFA之影響和新契機

中美友誼交流協會會長 王勝煒

兩岸大三通之後，一波波的大陸觀光團，為台灣帶來一年百萬觀光客，使全台觀光業、相關服務業都因此受惠。2010年6月29日中國內地和台灣又簽署了一項超越經濟意義的歷史性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並決定設置“兩岸經濟委員會”處理相關事宜。兩岸經貿關係的機制化影響深遠，將成為兩岸未來處理政治等複雜事務的開端，使兩岸跨入分治60多年來聯繫最緊密的時代，也為兩岸和解創造了積極的氛圍。

短期影響

台灣產品輸往大陸能享受零關稅的優惠，無形中增加台灣產品的競爭，為台灣企業進入大陸服務業市場，創造有利條件，對提升台灣經濟成長、增加就業市場需求，具有正面效益。兩岸經濟雖然是互補，不過大陸對台灣讓利更多，台灣比大陸更需要ECFA的簽訂。

深入長遠影響

兩岸經貿關係邁入一條正軌，有利於兩岸共同應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機遇和挑戰。特別是ECFA牽涉單位之多，內容之廣，複雜性之高，對今後兩岸經貿發展影響深遠，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的里程碑。2010年1月，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國家聯盟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已生效，ECFA將台灣與東亞自由貿易區綁在一起，過去對台灣日益“邊緣化”的憂慮可望解除；更重要者，是ECFA重新定位了台灣在亞太、乃至全球經濟中的地位，使台灣作為“亞太營運中心”有起死回生的可能。至於此後台灣尋求與其他國家商簽“自由貿易協定”，國台辦主任王毅強調，大陸的建交國都奉行“一個中國”政策，這是國際客觀現實，但對台灣出於經濟發展需要，與其他國家建立經濟關係是可以理解的；在和平發展的大方向下，應可找到解決之道，大陸會“合情合理對待，務實妥善處理”。國際社會也肯定兩岸關係和緩，走向“互利互惠、合作雙贏”。

新契機：

執政的國民黨

馬英九政府採取戰略轉換，一舉扭轉了過去十餘年來李登輝、陳水扁執政時在兩岸關係上採取的衝撞戰略，而代之以合作戰略。馬政府除繼續努力，使該協議獲得台灣立法院審議通過，更應該認清美國一直利用中國大陸與台灣的矛盾，同時牽制住中國大陸和台灣，在兩者之間漁翁得利的現實，這是中美時有碰撞，大陸和台灣之間無法和平統一的主要原因。國民黨要有膽量打破以軍購建立“安全感”的迷思，節省國家資源，用於民生，並擺脫“不與大陸交往很可惜；斷絕來往很危險”的“機會主義心理”，以“回中

國化”，積極化解台獨基本教義所造成的台灣民眾對大陸情感的疏離，並與中國大陸進一步發展，建立軍事互信機制以及簽署和平框架協定。台灣《遠見》雜誌近期的民調顯示，58%的台灣民眾認為馬英九有必要和中共領導人胡錦濤建立直接溝通的管道。而一些中國大陸領導人也曾表示願意調整軍事部署。在複雜的國際形勢下，兩岸應抓緊時機，打破僵局，加快實現中華民族國家統一的偉大事業。

在野的民進黨

兩岸經貿關係更形緊密後，民進黨終該醒悟，台灣是一個小島，2009年全年島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已下降為中國大陸的7.7% (1999年為25.8%)，人口亦僅為大陸的1.7%。台灣未來要發展，便不能與國力迅速上升的大陸巨人搞對抗，必須以合作、融合的方式，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看得遠、跑得快。台灣《遠見》雜誌近期的民調顯示，64%的台灣民眾認為民進黨如果要維護台灣民眾權益，有必要和中共進行接觸和交流(台灣過半民意亦支持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進行直接溝通、交流)。繼雲林縣長蘇治芬、台南縣長蘇煥智後，民進黨籍屏東縣長曹啟鴻，2010年7月將派先遣部隊赴天津推銷屏東農特產及名品，12月再由他本人帶團赴青島行銷。此外綠營內部已有務實理性的聲音出現，蘇煥智更在嘆浪上表示，“一個長期漠視中國市場的觀點，只會讓台灣弱化，更進而邊緣化”，“如果政治領袖也如市井匹夫，以暴虎馮河方式來領導社會，則台灣危矣！”這樣正視現實抓住機會的態度，值得其他綠營領袖深切省思。民進黨的兩岸論述，已到了該徹底檢討的時候了。

中國大陸

台灣《遠見》雜誌2009年的民調顯示，台灣人民已有高達95.9%認同自己是“台灣人”，只有46.6%民眾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在統獨立場方面，67.5%民眾反對終統(即“立即統一”與“維持現狀後走向統一”)，50.6%民眾贊成終獨(即“立刻獨立”與“維持現狀後走向獨立”)；另外在“民眾終極統獨立場”方面，67.5%民眾並不贊成兩岸最終應該統一，贊成的僅有19.5%；有50.6%民眾贊成台灣最終應該獨立成為新的國家，不贊成的有34.1%。面對台獨軟實力的無孔不入，這是大陸尋求和平解決兩岸問題必須面對的瓶頸。因為台灣民眾支持兩岸經貿密切交流，但是不願意改變自己的認同物件。

大陸試圖以和平發展實現和平統一，而台灣目前試圖以和平發展實現和平分裂。雙方統獨立場不同，對於兩岸何時啟動政治協商，尚無共識。當前雙方是遵循“先經後政，先易後難”的談判思路，務實地繼續深化兩岸經貿交流，逐步開展經貿合作。大陸認為，政治問題是兩岸關係的核心，也是兩岸關係的癥結所在，隨著兩岸關係不斷向前發展，兩岸遲早要面對政治問題，要通過協商來尋求解決的辦法，現在要為將來時機和條件逐漸成熟的時候來創造條件；大陸的信念是把相互的繁榮和台灣所認知的共同利益極大化，以建立未來所需的善意來促進和解，實現和平統一；台灣則更重視經貿發展及參與國際社會。由於雙方存在著一種統獨博弈關係，各自的意志能否實現，完全取決於彼此力量的消長與對比；統一的力量愈大，統一的可能性就愈大，而分離的實力愈大，分裂的可能性就愈大。在合作雙贏的同時，就應當考慮對統獨博弈的影響。兩岸和平發展的關鍵問題是，兩岸關係如何和平發展，如何避免誤解和操作不當，如何

排除國際勢力干擾，以避免兩岸和平分裂或兵戎相見。

審慎樂觀展望未來

談到台海現狀與兩岸和解之路的探討，目前兩岸都能接受的“九二共識”，其精神為“求同/一中，存異/各表”，努力的方向應該是化“異”為“同”，由“各表”到“共表”。和解的第一步是，兩岸首先共同確認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不容分割。可以說，目前兩岸執政雙方都是認同“一中”的，可以表述為“三句話”：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和大陸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不容分割。這三句話的相關內涵，均見諸於海峽兩岸的有法律性檔案。

在目前兩岸執政雙方法理上都認同“一中”的現狀下，任何規範兩岸互動原則之協定，可以在“兩岸共同體”的精神下法制化，以“兩岸統合”的方式推動兩岸和平發展以示“共表”，如最近簽訂的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定為兩岸共同體內的經濟合作框架協定；對兩岸已經發展的經濟關係要做及時的提升和訴求，不能只在物質利益方面有所交集，這包括未來也可能簽訂其他功能性的框架協定，如兩岸文化、媒體、教育、科研、打擊罪犯、油氣勘探、氣候研究、法治改革及互設辦事處等等，透過機制，學習協調共處，以制度的方式增進認同。框架協議愈多愈好，以擴大內涵，並由第一軌道的兩會(官方授權或半官方)、第二軌道的國共平台(政黨間)，擴大到其他政黨高層、一般黨員、無黨派人士、宗教界、商界、專業人士等的多軌道交流。對於官方、半官方軌道無法討論的問題，即“被擱置的爭議”，要認真面對，為“創新思維”和“設計政策”做好準備工作，直到兩岸對“一中”內涵產生偉大的思想共鳴。

願兩岸傑出的政治家、聰明理性的人民，為中華民族的復興與中國和平統一，共創美好的未來。

蔡英文為甚麼反對ECFA

丹麥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永遠榮譽會長 馬文新

6月29日，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定，簡稱ECFA和兩岸知識產權保護合作協定終於在重慶簽署了。島內媒體普遍認為，ECFA的簽署在兩岸關係史上寫下了新的一頁，也為兩岸關係前景開啟了一扇新的大門。

簽訂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定ECFA是造福兩岸民生大眾，推動和平發展的好事。這是兩岸經貿交流時勢所趨的必然結果，也是近兩年來兩岸關係和好緩改善下所取得的成果，這不僅為台灣經濟出路打開新局面，也將兩岸關係向和平發展共創雙贏的新紀元。ECFA的簽訂，正式結束內戰歷史遺留下來的對狀態，才能為兩岸中國人創造長治久安的歷史新局面。ECFA的簽訂，也將兩岸經貿合作推向完全正常化、制度化和自由化。

根據島內媒體報導，約六成四的台灣民眾看好ECFA的簽訂。但是以蔡英文為首的民進黨仍然鏗而不捨地反對ECFA，不過在島內各界對ECFA一片支持的呼聲中，為反對而反對的行徑變得越來越尷尬。

協定簽署當天，民進黨即揚言要在協定文本送到“立法院”審查時，加入“如果ECFA簽訂一年內，台灣無法和其他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TA），就應終止條款”，並提出協議條文必須在“立法院”經過“逐條審查”。民進黨並表示，會在“立法院”審議ECFA文本時，將用“最強烈的方式抗議國民黨壓制台灣民意”，甚至“不惜一戰”等等。

前些時，執政的國民黨高層希望和在野的民進黨就ECFA議題，進行討論和協商以求取得共識，但蔡英文卻以ECFA是圓是扁都不知道，怎麼協商？因而拒絕了，馬英九也曾多次邀請蔡英文就此議題與他討論或公開辯論，但都遭到蔡英文以各種理由婉拒了。

蔡英文究竟怕甚麼？顯而易見，她怕的是，不夠籌碼與馬英九當眾辯論，她很清楚，如果要和馬英九辯論，她很可能會處於被動的狀態，但在主流民意和輿論的壓力下，蔡英文終於同意後馬英九公開辯論，國民黨主席馬英九與民進黨主席蔡英文於4月25日在台灣公共電視台舉辦“雙英辯論”。在長達2個半小時的辯論中，雙方圍繞ECFA議題各陳己見。台灣《中央日報》網路報今日刊載透視集指出，可以預料，“雙英會”辯論之後，馬英九的民調會升高，而蔡英文將在民進黨內特別是一些深綠大老及一般民眾心中，受到很大的質疑。

這場辯論，馬英九的表現優於蔡英文太多，蔡英文緊張到臉部表情嚴肅僵硬，幾度斷話，馬英九臉上始終帶著微笑面對觀眾，再加上幾句強而有力的結語，如“別人已經起跑，台灣還在爭吵”，“不能把全部的雞蛋放在同一個藍子裏，但最大的那個藍子總不能不放幾個蛋”，“找回失落的八年，開創黃金的十年”，非常能夠打動人心。

而蔡英文整場說穿了，就是對大陸讓利的不放心與對於馬英九開放政策躁進的批判，始終對於大陸充滿了先入為主的刻板印象，即使馬英九再怎麼從各方觀點來分析，從國際經貿及全球經貿角度分析台灣未來，蔡英文都不會接受。蔡英文對於國民黨“執政”根本是全盤否定其能力，認為馬英九及國民黨就一定不會賣台，只要兩岸一有交流一有開放，傾中賣台言論立刻出現，更對台灣未來發展沒有信心，只有恐懼，因為恐懼大陸崛起，擔心台灣未來會受到傷害。更嚴肅的問題是，蔡英文及民進黨仍未找出對於大陸政策的正面論述，凡事只想拖延，只會反對，而無法提出不拖延之法及該如何正面解決問題之道。

其實，從蔡英文的資歷來看，她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她曾參與“兩國論”的起草，2000年民主進步黨執政後曾任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蔡英文之前是無黨籍人士，後來在2004年加入民進黨，同年當選台灣不分區立法委員。2006年擔任行政院副院長，2008年起擔任民主進步黨主席迄今。在民進黨中，她是一個出色的政治人物，形象清新樸實，辦事穩重果斷，在處事和辦事能力，完全不亞於馬英九，很受年輕人和黨內新潮流派的擁戴，為了爭取深綠大老的支持，很多時候，在關鍵問題上舉棋不定，而至作出錯誤的舉措，例如：2008年11月6日，蔡英文在抗議海協會會長陳雲林來台的“圍城”遊行中，無法管制遊行幹部與群眾，最終爆發流血衝突並共造成超過200人受傷，其中包含149名員警，這事引起台灣民眾普遍不滿，並把蔡英文叫做“暴力小英”。

台灣一位政論名嘴6月30日在電視節目上說，以民進黨主席蔡英文的高學歷及從政經歷，難道不明白ECFA對台灣的好處？顯而易見，蔡英文之所以極力反對ECFA，說白了，她完全是為了選舉考量，即年底的五都選舉和2012年的台灣領導人大位選舉。如果她真的誤讀了ECFA，那是對不起她的智商，太可悲；如果她是故意誤讀，那就是對不起台灣民眾，更加可悲。島內媒體指出，蔡英文一味反對ECFA，難免讓外界懷疑她根本就是“為反對而反對”，為一黨之私，棄民生於不顧。難道，這也算是“愛台”嗎？

農業經貿應是兩岸交流主軸

台灣新世紀兩岸農業經貿交流協會理事長 郭良生

兩岸關係目前已進入一個創新的時代，社會全方位如：農業、經貿、文化、教育、金融、觀光等雙方皆採自由、平等、互惠方式展開協商，預料兩岸將以緊密的交流互動，打破一甲子以來的僵持，化敵為友，互惠合作，向共榮共贏的大業邁進。

1997年“國共論壇”時，胡錦濤主席與連戰榮譽主席曾達協議：兩岸交流應建立“兩岸共同市場”，其運作以農業與經貿為主軸。兩年多來，海基會與海協會兩會負責人曾舉行多次雙邊會議，終於擇定今年6月29日在重慶召開第五次“江陳會談”，簽訂了“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為兩岸經貿合作跨出了石破天驚的第一步，獲得舉世的注目與讚譽。ECFA簽訂之日，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強調，透過ECFA的簽署，為兩岸建立了互信協商的新世代。海協會會長陳雲林則指出，簽署ECFA是為了提高中華民族的國際競爭力，亦推動了兩岸關係，揭開歷史的新頁。

兩岸簽ECFA台利大過陸利

依據ECFA的文本，大陸承諾對台灣降稅的早收清單高達五百餘項，包括石化、汽車零組件、紡織等，台灣承諾對大陸產品減稅的早收清單提供了200項，集中在紡織、機械及石化方面，兩者的比例約為5比2，台灣受惠的早收清單項目，佔台灣對大陸出口貿易總值比例約為15%，總金額超過大陸約136億美元的獲利，使國內23,000家中小企業直接受益，出口金額一年可達180億美元，就業員工超過42萬人，明年的經濟成長率上看8%。ECFA農產品早收清單據農委會估計，茶葉、石斑魚、文心蘭等18項重點作物均納入其中，零關稅後，年度輸入大陸出口值將從1998年的1,608萬美元翻7倍，增加到1億1千萬美元。

關於金融服務業早收清單，是以WTO承諾表示的方式呈現，雙方作為WTO完全會員國，自有妥善的安排。台資銀行登陸升格分行縮短一年，證券、保險及一般服務業可獨資在陸經營，航空貨運承攬業、電腦及相關服務業亦同。金融、貿易促成便捷化，兩岸智慧財產權亦獲保護。

在關稅減讓方面，早收清單降稅產品台灣比大陸多出272項，大陸預期總稅額損295億美元，台灣損34億美元，等於台灣倒賺261億美元。關於貿易與投資方面，針對貨品貿易、服務貿易、投資等將訂定進一步協商的原則與項目。

民進黨遇中必反黔驢技窮

儘管ECFA對兩岸關係有助，對台灣尤其有利。但民進黨卻在6月26日簽約前夕發動十萬民眾大遊行，宣示反ECFA的決心。根據民進黨自己的民調，只有兩成三的民眾認為不應該與對岸簽訂ECFA，兩成一一的人支持盡速簽訂，另有四成五六的人認為等待有完整配套後再簽，因此傾向支持的民眾有六成以上（因為ECFA不是到此為止，六個月內即有另一波清單，和配套措施出爐。在大陸的善意協助下，與東協及歐美大國簽訂FTA的可能性亦大增，那是台灣產業升級，再度經濟起飛的日子又到了）。

6月24日ECFA早收清單公佈，民進黨主席、立院黨團及反“ECFA情勢因應小組先後發言，以重砲轟擊。蔡英文主席說：本地產業的再升級及競爭力的再強，不是馬英九總統說投入950億就算了，政府必須投入更多的行政資源協助，才能讓產業更有競爭。民進黨立委潘孟安和翁金珠表示：許多農產品的開，都是沒生產的，如秋刀魚。開放的產品不具競爭力，如文心蘭，具競爭力的沒開放，如馬拉巴栗，台灣以267顆鑽石換大陸539顆彈珠，把最有競爭力的產業拱手奉送中國，“喪權辱國”。民進黨反ECFA情勢因應小組發言人郭正亮說：ECFA的文本和附件全文，看不出開放時間表的觀念，包括貨物、服務、投資的開放談判，都只有起點，沒有終點，但世貿組織對貿易自由化訂有開放時程，馬政府應以誠信面對社會大眾，盡快說明開放的進程。

民進黨所說的事，有對有錯，馬政府自會回應，但潘、翁二位立委說：“台灣以267顆鑽石換大陸539顆彈珠，把最有競爭力的產業拱手奉送中國，喪權辱國。”這話與事實完全不符，太誇張了，簡直是潑婦罵街！

事實上民進黨反ECFA的策略，在大環境與民調的壓力下已有調整，將遊行的訴求調整為“反對一中市場，人民公投作主”。蔡英文主席說，若民進黨再度執政，將舉行公投，廢掉ECFA。但民進黨有些務實分子的作為就顯得與黨主席不搭調，號稱最反ECFA的南部縣市長如蘇煥智、張花冠等，近期皆紛紛登陸爭取商機，完全看不出他們對所謂“一中”市場有任何疑懼，民進黨對反ECFA實已黔驢技窮，他們對一再要求的“公投作主”有多少把握能做到，其重量級人物皆霧煞煞茫然無語。

兩岸和平中華民族幸矣

中國近三千年一部政治史，統一與分治的年代各佔其半，統一的時期約1,700百年，分治的時期約1,300百年。歷史的變遷形成統一與分治不斷的循環更迭，每次的分治經過時間的醞釀與形勢的轉換，就促成另一次統一的局面；反之，如各種條件尚未成熟而倉促統一，不久可能會帶來更大的動亂。大陸與台港澳三地分治已達五、六十年，港澳回歸中國，台灣與大陸展開密切交流，ECFA之後，兩岸關係益趨緊密，和平統一時期漸趨成熟。

ECFA簽署的當天，美國國務院主動發表聲明，表示兩岸簽署ECFA與關稅互惠有關，兩岸今後會不斷檢討各自的關稅以求擴大貿易，如此台海和平增進有望，既可使亞洲穩定，亦使東南亞穩定，美國十分樂觀其成。

美國的聲明，透露了兩岸走向和平的訊息。兩岸關係增溫，對於何時啟動政治協商？大陸國台辦主任王毅在重慶會議席上表示，政治問題是兩岸關係的核心，也是兩岸關係的癥結所在，隨著兩岸關係不斷向前發展，兩岸遲早要面對政治問題，要透過協商來尋求解決的辦法，但不是現在，我們要為將來時機成熟時創造條件，藉以緩和台海情勢。

陸委會主委賴幸媛於去年十一月下旬在台北“兩岸一甲子研討會”上，說明馬政府的大陸政策理念時表示，台灣將在堅持主體性的前提下，追求有尊嚴的和平。同時，兩岸的和解也不可能在軍事威脅的陰影下完成。不久，北京高層當即表示願意調整現行對台軍事部署。根據以上的報導，ECFA之後，兩岸和平契機出現，兩岸何時正式把政治談判端上檯面，追求民族大一統局面，在兩岸領導人智慧彈指之間，也在兩岸人民齊心謳歌之間。

金融海嘯對經濟與教育發展之影響

台灣江西省旅台同鄉總會總會長 黃玠

國際金融市場彼此之間有著高度的互動性與整合性，各國政府的匯率政策都應該保持彈性與機動性，以反映各國的經濟基本面。而匯率正是一個國家對外經濟達到均衡的調節器，匯率的穩定對一國的經濟發展有很積極的作用。

自1973年布雷頓森林協定瓦解之後，幾乎世界上所有的國家皆放棄固定匯率制度，而採用浮動匯率，當時每天匯率的變動量甚至高達幾個百分點。匯率的變動意味著在成本或收益的改變，會直接影響公司利益和增加企業及金融機構的匯兌風險。台灣是一個嚴重依賴國際貿易的地區，若能有較佳的預測匯率波動趨勢方法，將可協助企業和金融機構投資績效的評估，進而減少其操作上風險。然而，影響匯率變化的因素非常多，其中包含經濟，政治和心理等各方面的因素，金融市場的重大事件的影響自然不在話下，如1982年的“拉丁美洲債務風暴”、1987年的“紐約股市大崩盤”、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風暴”、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的等重大事件。在全球經濟的蓬勃發展下，金融重大事件造成對匯率波動的影響，進而對進出口與國際貿易造成影響。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泰國棄守固定匯率制度，使得當日的泰銖下跌達 16% 開始，暴風蔓延至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等東南亞諸國，之後亦南韓受其影響，且情形更加嚴重，原本已經蕭條的日本更加景氣低迷。台灣、新加坡及香港雖受波及，但因經濟體質尚佳，受損較輕，但外匯市場仍是出現了少見的重貶及劇烈震盪。

而今風暴再起並更為劇烈，一場自2007年8月9日起爆發的金融危機，又稱金融海嘯。自次級房屋信貸危機爆發後，投資者開始對證券的價值失去信心，從而引發流動性危機。即使多國中央銀行多次向金融市場注入巨額資金，也無法阻止這場金融危機的爆發。直至2008年，這場金融危機開始失控，並導致多間相當大型的金融機構倒閉或被政府接管。

2008年9月15日，華爾街四大投資銀行之一、擁有百年歷史的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申請破產，是美國史上規模最大的破產企業；同日，發明現代證券交易的美林證券（Merrill Lynch）不敵金融風暴所造成的巨大資金缺口，被美國銀行以500億美元購併；緊接著，美國最大保險公司 AIG，傳出倒閉危機。三大金融巨人在同一天傳來壞消息，重挫全球股市。這次的金融海嘯不僅重傷各國的金融市場，甚至進一步危害到實質的經濟層面。

自金融海嘯發生以來，各國經濟金融面皆受其影響，對於這種少見但可能再次發生金融衝擊，實有深入探究之必要，以做為日後避免再次遭受金融風暴衝擊的借鏡，進而降低風險。以降低各國對匯率升貶不確定性風險，避免突發的外力衝擊造成危機，使各國經濟能穩定成長。

早在1960年代最佳的貨幣理論是由弗萊明（1962年）和蒙代爾（1963年）所提出的，根據匯率控制和資本流動彈性各種假說，成為思考匯率決定時間的基礎。自1970年浮動匯率開始發展，經濟學家一直在調查根據貨幣衝擊來決定外匯匯率。在他們所稱的貨幣政策來決定匯率，主要決定匯率水準包括貨幣供給

量，國民所得，利率，通貨膨脹率，貿易均衡和財政赤字。此外，Branson（1977）進一步介紹了資產組合模型來決定匯率。雖然經驗性證據來自於Meese and Rogoff（1983）提出有效預測決定匯率理論。然上述皆無法包含系統風險所帶來的影響。自從Meese and Rogoff（1983）比較貨幣學派匯率決定模型與隨機漫步模型樣本外的預測能力，發現隨機漫步模型優於所有的模型，意味著預測明天最好的匯率就是今天的匯率，也就是說匯率是根本無法預測的，因為其中包含了許多不定數的存在，如同1991年中東的伊拉克戰事、2001年911恐怖攻擊事及各國的政治選情結果等事件，都會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各國匯率的變動。

一個國家的經濟體質健全與否、與各國之間的總體經濟活動是否熱絡都與一個國家的匯率相關，而匯率本身也與其他經濟變數有密切關係，如股價、物價、利率等之間的互動，都將會是影響外匯市場的因素。有關匯率方面的文獻與研究已有許多的學者研究發表如：謝明祥（1998），在亞洲國家匯率變動波及效果之實證研究中發現，在金融風暴發生後，除了新加坡在非預期波動性對台幣報酬率條件變異數的影響上較不顯著外，其他國家的匯率對台幣匯率，不論在報酬率或波動性波及效果上皆是顯著，可能是新加坡具有相當自由、國際化的資本市場，反而成為鄰近國家資金避險的地方，使得其貨幣貶值的程度減緩。至於其他國家匯率大幅的貶值，對台幣而言，在投資人預期心理及國際貿易的競爭上，都造成台幣貶值的壓力，因而其報酬率或波動性波及效果對台幣的影響都是顯著。

多位專家在金融風暴前後對先進國家之股匯市連動關係變化影響中發現，各國股價指數與匯率大都無法拒絕單根的虛無假設，表示原始數列非定態數列，使各國股、匯市間均符合弱勢效率市場之假說，呈隨機漫步的情況。經由VECM及VAR模型檢定中發現，各國無論是在股價指數與匯率間於金融風暴發生後，其兩者間的短期互動關係皆有下降的趨勢，同時也證明了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其影響層面不再僅是區域性，而是全球性的金融危機。然教育工作之演進，從原本的公家辦學到私人創校，又從私人辦學到再到企業興學，再從企業捐助到產學合作，再再顯出經濟成長對教育的重要，這一切的成長與進步，使得不論是中國大陸、台灣、香港亦或是新加坡，企業興學的觀念在華人的社會中不斷成形，相信經濟成長最大的主因，企業對社會責任的規劃與回饋，使得莘莘學子得以茁壯。

所以，經濟成長是教育普及的指標之一，然而好的教育也為國家與企業培育好的人才，在這樣的正循環之下，經濟不再只是供給與需求的問題，而是競爭力的問題，是知識與能力的問題，在這些情境的轉變下，漸漸的知識的力量也成就了企業與國家的力量，二者密不可分如劍的雙刃可以披荊斬棘，也漸漸的造就了經濟的轉型，如知識密集型產業的產生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因此教育與經濟彼此相生相息，然而這種週期性的經濟風暴浪潮一波波的湧現，各國貿易情況低落，匯率波動異常，非但造成國家與企業損失，同時也造成教育上青黃不接的局面，許多教育規劃因而停擺。所幸這風暴的影響到今日總算影響較小，各國經濟日漸恢復，各國貿易也日漸繁榮，但檢討起這些風暴的主因，多為人為所致。

現今，各國經濟之綿密連結，歐盟、東協等經濟聯盟相繼成立與擴大，教育與經濟都不再是一國的問題，而是全球性的問題，為使得教育好還要更好，經濟繁榮還能更繁榮，教育工作，除了專業性的知識教育，教養出國家一流人才，亦應同時加強倫理教育，使各國能互愛，企業能互信，員工能互助，才共創更好的未來。

架構協議的意涵與啟示

台灣中華基金會顧問 歐陽承新 歐陽又新

經過長期的規劃與縝密的安排，由官方主導匯集兩岸學者專家意見所鑄就的成果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於5月29日陳江第五次會談中完成簽署，為雙邊經貿關係正常化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由於“協議”是兩岸加入“世貿組織”（WTO）後續針對“市場准入”的互惠性制度安排進行確認，其中台灣享有更多被納入“早收清單”的產品和服務項目及市場准入的標準下降，獲利尤多；因此，在完簽的消息傳出後，不僅業界感到振奮，台北股市積極回應，國際社會欣見兩岸關係改善，有助於維繫東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也給予肯定；至於批評者若非以偏概全、時空錯亂，就是為反對而反對，無視於兩岸深化經貿互動，趨勢已定，別無選擇這一事實。為進一步說明，以下擬從經貿實務著眼，以兩岸經濟一體化為主軸，淺釋“架構協議”的意涵與啟示。

一、體現市場准入原則

兩岸同屬世貿組織內不同的關稅區，享有該組織既定的“一般權利”，但也應履行“普遍義務”及本身在入世時所做的“具體承諾”，因此，世貿組織的會員得以依據該機構制定的行為準則，包括“最惠國待遇”（MFN）、“國民待遇”（NT）、“公平”與“自由”貿易和“鼓勵競爭”等基本原則，共享相互開放市場、擴大多邊貿易的利益，但由於多邊談判長期磋商不前（例：2001年開啟的杜哈回合談判至今沒有結果），影響各國的利益至鉅，因而驅使有企圖心的世貿成員另尋出路。統計顯示，從八十年代起，許多世貿成員便展開相互提供具“排他性”的“自由貿易協定”（FTA）談判；基於雙邊或多邊區域結盟的“自由貿易協定”及“優惠貿易協定”（PTA）的件數不斷增生，至2009年5月底，實際生效的FTA已達158個；其中中國大陸共23件（含生效、已簽署、正在談判及尚在評估四種），台灣有7件，對比2010年上半年，台灣對大陸（含香港）外貿出口，已佔台灣總出口金額的43%，而這都是在雙方未簽署任何關稅或非關稅相互減讓的基礎上所締造的成果，足見雙邊貿易潛力之巨大；月前ECFA及時出台，正是官方呼應市場趨勢、建立排他性市場准入機制務實態度的體現。

二、早收清單

框架協議計含協議文本及五個附件。根據附件一所載，按照2009年兩岸海關進口稅則及貿易統計，中國大陸同意對台灣提供降稅的早期收穫項目共539項（8位數分類，下同），佔該年大陸從台灣進口貿易額的16.1%或138.4億美元；台灣同意對大陸提供降稅的早期收穫項目（8位數分類）共267項，佔同年台灣從大陸進口貿易額的10.5%或28.6億美元；台灣在減讓項目上祇及大陸的一半，而可預見的獲利，較大陸多110億美元。按照“框架協議”安排，上列清單內實施減讓的產品別預計在未來兩年（2011,1,1-2013,1,1）分

三梯次降至“零關稅”；另有關“貨品貿易早收項目的臨時原產地規定”（附件二）、“貨品貿易早期收穫產品的防衛措施”（附件三）、“服務貿易早期收穫部門及開放措施”（含金融與非金融部門）（附件四）、和“適用於服務貿易早期收穫部門及開放措施的服務提供者定義”（附件五）四份文件分別敘明雙方授與對方市場准入的標準及範圍。

附件一至附件四清楚顯示：(1)無論按產品數目或金額計，有關貨品貿易大陸對台灣讓利的幅度均遠大於台灣對大陸讓利的幅度；(2)非金融服務業方面，由於業務內容不同，雙方對市場准入各有規定，但一般而言，台灣基本採取(i)沒有限制或允許大陸以獨資、合資、合夥及分公司等設立商業據點的方式在台提供服務；(ii)大陸方面對於跨境交付和境外消費兩類服務承諾沒有限制，而對於商業存在則基本以入世時的承諾為準，無額外承諾；(3)金融服務部門，(i)台灣承諾開放大陸銀行設立代表處，一年後可申請設立分行；(ii)反觀大陸對台灣金融服務部門（含保險、銀行、證券等相關業務）則承諾給予較大的空間。

綜合而言，無論是貨品貿易或服務業，“框架協議”可稱為“不等價交易”，大陸讓利遠多於台灣。不過，台灣談判代表在談判期間一直堅持“實質對等”而非“形式對等”的立場，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大陸的經濟與外貿規模、金融機構的資本額均遠遠超過台灣，因此若講求“形式對等”，接受雙方讓利的件數和金額均相同的話，台灣實質上將吃虧。

三、邁入共同監管

眾如所週知，近三十年兩岸經貿一直是由台北和北京的權責機構各自發佈單行法規進行管理。以台灣方面來說，作為指導和規範商品、人員和資金的跨境交易，無論是開放、允許或禁止都根據自身的需要考量及當時的政治氣候和市場競爭態勢，不定期進行調節，以致於在政策的取捨與寬鬆之間的拿捏，多憑國際慣例及可有可無的“默契”，欠缺事前協調與事後檢討；長此，在許多經貿活動領域形成兩不管的“灰色地帶”，更不論廠商活動有無法律依據，其中跨境經濟犯罪屢見不鮮，和兩岸無法實施“共同監管”有直接的關係。相對而言，北京對雙向貿易及台資企業登陸自始採取鼓勵的態度，但對台資企業的投資保障則嚴重不足，而許多中小企業赴陸投資原未獲當局批准，多循免稅天堂註冊的方式間接為之，因此，即令遭遇困難也無從經由正常管道尋求司法救濟，排除糾紛或投資障礙。

綜合過去三十年的兩岸經貿，是在欠缺官方制度框架的規範且乏共識、混沌不明的狀況下所展現的成果，其主要特徵可歸納如下：

1、政經二力背反：就島內而言，李扁亂政長達十八年，政府基於內涵不明確的“政治安全”顧慮（國民黨和民進黨都一樣），決策者一直試圖動員有限的政策工具對台商的海外佈局進行導航，（如1993年的南向政策），輔以道德訴求，（如2000年以後輿論界譴責財團“錢進大陸，債留台灣”），但其作用仍不敵由利潤驅動的自發性市場力。2002年經發會召開後，扁政府被迫順應潮流，以“積極開放、有效管理”的兩岸工作方針，取代歷時五年的“戒急用忍”舊制，但“開放”部分象徵意義居多，“管理”層面有心無力。2006年元旦扁政府進一步壓縮兩岸人民有限的來往空間，用“積極管理、有效開放”取代之，其結果一長

期僵滯的兩岸關係依舊，台灣經濟加速“邊緣化”！

2、**整合動力傳遞方向錯亂**：兩岸間經濟整合動力的傳遞方向是“由下而上”從民間到政府，市場先行，待形成氣候，決策者研判擴大深化兩岸間的產銷分工有利於壯大本身整體的競爭力，並促成產業升級，始於事後追認，或將跨越“灰色地帶”前往大陸投資的台資企業予以合法化。

3、**部門別互動進程不配套**：台灣方面開放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商品貿易方面採取先出口後進口，其次是非金融類投資，而金融服務業殿後的順序，但一直管制大陸進口項目，並對陸資來台設限。

4、**表裡不一的整合模式**：2003年中國大陸成為台灣首要的外銷市場和最大的貿易夥伴，兩岸人民來往頻繁，年度通匯及郵電來往數量龐大，然而這一成果多建立在北京與台北各自頒佈內規或世貿組織多邊協定的基礎之上，獨缺涉及雙邊經貿往來的官方法律文件，從而使得雙邊經貿關係形成“表裡不一”、“有實無名”的離奇現象。

四、後續工作

從類比的角度觀察，儘管海峽兩岸經濟整合實質上已屆臨歐洲共同體（EC）1991年“單一市場”的前沿，但在法理上卻僅止於2003年“京港CEPA”或2004年“京澳CEPA”。ECFA在形式上跨越了“自由貿易區”的門檻，但尚未進入“關稅同盟”與實施“共同商業政策”的中、低階整合階段，因此，展望未來，兩岸經濟整合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儘管如此，鑑於前述兩岸經貿已“高度整合”這一獨特的現象，我們自然無需全盤抄襲歐盟的整合進程：如兩岸四地建立貨幣聯盟，使用共同的貨幣，祇要滿足一係列前置作業的條件，就可以獨立於其他的平行係列提前推出；此外，在持續推進經貿談判，深化擴大經貿合作的同時，更應儘速“結束敵對狀態”，優先針對共同維護釣魚台及南海海域資源利益的緊急事件展開談判（例：兩岸相互租用對方在南海的島礁，以發揮各方打擊入侵者的優勢作戰能力），等此，僅憑兩會協商在人力組合上已嫌不足，而應廣納各行業的專家，探尋對策，切實履行維護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的時代使命。

從富士康事件看台灣經濟轉型

台灣中華基金會顧問 潘偉華

近年來大陸的勞資問題層出不窮。繼大陸深圳富士康公司連續發生員工跳樓事件之外，位於廣東的HONDA本田組裝廠也發生嚴重的工潮，波及整個本田汽車的產業供應鏈。這說明外資企業在大陸的企業營運模式已經到了需要改變的轉折點。

富士康是台灣規模第一大民營製造業鴻海集團在大陸的代表性企業，大陸深圳廠區有高達40餘萬員工，也是大陸最大的出口廠商，包括薪資、保險、福利等勞動條件都較大陸本地企業相對優越，絕不是所謂的“血汗工廠”。但是，在發生員工連續跳樓事件後，不但引起富士康大客戶包括蘋果、戴爾及惠普等對事件的關注，部分西方媒體更評論這是高科技產業發展背後隱藏“不人道工作環境”的高昂代價；是中國現階段依賴外資、廉價勞動力和加工出口貿易之經濟發展模式的悲劇縮影。這等批評對台灣和大陸都是不可承受之重，其實也是以歐美跨國企業為中心的價值分配體系的必然結果，兩岸政府及企業皆有必要針對相關問題做更深層的反省與檢討。

台灣過去一向被稱為全球的“代工王國”，台灣代工生產的都是高普及率的高科技產品，例如廣達電腦代工的筆電；英業達代工的IPOD；富士康代工的蘋果手機iPhone及平板電腦iPad；豐泰、寶成代工的運動鞋；福懋紡織代工的運動衣等。

為甚麼台灣會成為代工王國？這其實是歐美企業1980年代企業再造潮流之下的產物。1980年代歐美企業不斷購的結果，使得企業逐漸過於肥大，回歸企業的核心競爭力的企業變革風潮，使得歐美企業開始重新聚焦於自己的核心競爭力，例如研發、設計、品牌或通路等，而放棄非核心的業務，例如製造。台灣的代工模式可以說是全球化潮流下的產物，歐美跨國企業將產品製造外包（outsourcing）到低成本地區，台灣企業則運用大陸廉價勞工及土地等生產資源，並透過嚴格的生產流程及成本控制，取得國際品牌大量訂單，進行產業鏈底端的組裝作業。由於缺乏自身品牌與技術，光靠低廉人工所創造的附加價值很低。以iPod為例，零售價每台299元，台商代工費用的利潤僅5美元；以iPad為例，零售價每台499美元，但代工費用估計僅11.2美元。這些代工廠的共同特徵均是毛利率極低，一般是9-15%左右的毛利率，必須對各種費用的嚴格控制才能勉強獲取3-5%的淨利率。又必須靠龐大的接單數量來加以補償過低的淨利率。

表1: iPod 成本結構圖

零件	供應商	公司總部	估算工廠銷售價格(USD)	佔生產成本比例	毛利率	估算價值獲取(USD)
硬碟	Toshiba	日本	73.39	51%	26.5%	19.45
顯示器	Toshiba/Matsushita	日本	23.27	16%	28.7%	6.68
多媒體處理器	Broadcom	美國	8.36	6%	52.5%	4.39
控制器	Portal player	美國	4.94	3%	44.8%	2.21
測試及組裝	Inventec	台灣	3.86	3%	N/A	3.86
電池	不確定	日本	2.89	2%	30.0%	0.87
32mb動態存取記憶體	Samsung	韓國	2.37	2%	28.2%	0.67
背板	不確定	台灣	2.30	2%	30.0%	0.69
主機板	不確定	台灣	1.90	1%	30.0%	0.57
8mb手機RAM	Elpida	日本	1.85	1%	24.0%	0.44
前10大零件小計			125.13	87%		39.83
其它投入			19.28	13%		
iPOD所有成本總計			144.40	100%		

所以我們就不難理解，為甚麼富士康等台灣代工廠不能夠營造出一個寬鬆與舒適的人性化工作環境，相反地必須要以高紀律、規格化、集體管理的方式來達成高效率、低成本、準時交貨的代工模式，因為，每一絲一毫的淨利潤都是來自管理上的成本節省而來。鴻海集團的全球代工龍頭地位就是建立於這樣高度紀律性與標準化的管理模式之上的。隨著富士康的成功，“富士康模式”也被很多台資企業及大陸外商及本地企業模仿、抄襲，從而奠定大陸成為“世界工廠”的地位。

然而，隨著全球化快速進展及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對世界經濟的衝擊，加上近年大陸工資不斷上漲，“富士康模式”削減成本的壓力愈來愈大，又遇上承壓能力甚低的80、90後新生代勞工，因而發生不幸事故，並不令人特別意外。再者，大陸經濟靠代工出口發展模式迅速崛起，累積巨額的外匯，也造就許多暴發戶，相對於從事代工生產、工資微薄的勞動階層，勞資矛盾及貧富差距擴大等問題已成為社會隱憂。最近日本本田（Honda）大陸公司罷工停產，更凸顯出此一問題的嚴重性，反映出大陸經濟發展已難再繼續依靠廉價勞力及代工生產模式的轉型壓力。

就台灣經濟發展來看，“以大陸為工廠”的“富士康模式”也已到了必須改變的轉捩點。過去，台灣因為工資土地等要素成本過高，導致台灣代工廠商大量外移中國大陸，以尋找更低的生產基地。然而大陸

工資水準正在快速攀升，代工生產可創造的附加價值及利潤極低，又面臨歐、美經濟進入調整期，國際品牌大廠削減成本的壓力更大；加以人民幣看升，未來“薄利多銷”的代工模式將難以為繼。所以，要維持台商在世界供應鏈上的地位，“以大陸為工廠”的代工出口模式必須在三、五年內快速調整，才足以因應全球經濟的快速變化。

近來在與南部中小企業廠商的訪談中，有許多原本在越南與大陸的台灣廠商正在揪團準備前往孟加拉考察投資以及設廠事宜，其實這反映出部份台灣廠商的宿命。接下來台商該如何調整？繼續外移到更低成本的國家來維持代工的競爭優勢？還是體認到代工模式有時而盡？其實回到蘋果公司Ipad, Iphone以及Ipad的例子，品牌與通路的利潤率已經超過5成，不但反映出蘋果的創新能力以及品牌能力，更反映出他們在美國這個最大的消費市場創造流行的能力以及通路的掌控能力。

富士康事件凸顯出兩岸經濟發展的結構性問題，如果能夠體認此一事件的警訊，說不定未嘗不是台灣與大陸經濟再突破的一次契機。ECFA之後，有企圖心的台灣廠商不應該只看到短期的“讓利”，而是應該看見中國大陸此一未來比美國更大的消費市場的巨大機會。在此一巨大的消費市場，台灣廠商可以建立自主的品牌；也有機會進入內需通路，阻絕外國競爭對手的機會；台灣與大陸同文同種的優勢，更有機會讓台灣廠商在大陸市場創造流行商品的機會，正如台灣的流行音樂與流行文學一樣；台灣也有機會參與制定未來大陸的下一代產業標準。

台灣政府能做甚麼？我覺得台灣政府應該與大陸協商的不只是ECFA的議題，應該共同基於勞動合同法，建立更制度性的兩岸勞動保障機制。這樣可以防止所謂的Social Dumping，亦即廠商競相追逐更低的勞動條件與勞動成本的反淘汰現象。如果台灣與大陸的勞動條件拉近，廠商外移的動機減弱，回移台灣的動機增強，對改善台灣的失業率也會有直接的貢獻。

至於富士康以及台灣其他的代工公司如果能從此一事件記取教訓，更加重視企業的產業升級，以及依託大陸市場的品牌創造與流行創造，廠商的價值創造增加了，就可以給員工更好人性化管理的裕，或許還可因禍得福，再造事業顛峰。

簽訂ECFA對台灣產業的影響

台灣中國統一聯盟執行委員 周榮光

經過海峽兩岸漫長的協商，6月29日ECFA（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在重慶市正式簽署。其中大陸對台灣開放的貨品有539項，服務業11項，金額有138億美元，佔大陸從台灣進口比重的16.1%；台灣對大陸開放有貨品267項，服務業9項，金額28.6億美元，佔台灣自大陸進口比重10.5%。所以大陸開放的項目是台灣的兩倍，金額多了約四倍，因此不論從金額或項目來看，台灣實質受到的利益較大。早收清單於協議生效後兩年內三次完成降稅，目前關稅5%以內的項目中一年內零關稅（佔早收清單超過70%）；而關稅 5% - 15% 的貨品，第一年降至5%，第二年降至零關稅，超過15%第三年降為零關稅。

台灣早期收貨清單貨品項目分析

產業名稱	項目數	金額 (億美金)	佔台灣產業出口至大陸金額的比例
石化	88	59.4	6.90%
紡織	136	15.9	1.85%
機械	107	11.4	1.33%
運輸	50	1.48	0.18%
農業	18	0.16	0.02%
其他	140	50	5.84%
合計	539	138.34	16.12%

資料來源：台灣地區經濟部

以下從早期清單中探討對台灣產業的影響：

一、貨品項目：

1、石化產業 — 此項目共88項，佔早收清單項目16%，為各產業中最多。2009年中國大陸自台灣進口石化產品金額為59.4億美元，早收清單涵蓋出口大陸石化產品的金額約6.9%，為各產業中最多。五大泛用樹脂中PP、PS及VCM入圍。ECFA早收清單生效後PP及PS 較東協享有關稅優惠或成本優勢加大，將有助於PP及PS於中國大陸市場的佔有；但屬於大陸發展重心的石化產品如PVC、PE、EG與CPL等排除在外，也引起部分台商的爭議。

2、紡織產業 — (1) 此項目有136項，金額共15.9億美元，佔台灣產品出口至大陸比例的1.85%。尼龍、絲及下游的不織布等。ECFA簽訂後紡織上游受惠將優於下游，其中的尼龍業最受惠。目前台灣銷往大陸的關稅約6.5%，ECFA簽訂後將降為0%，就關稅的角度來看有利於競爭力。(2) 從2010年起，由於大陸薪資不斷的上漲，平均每年薪資將上漲20%，將使大陸城鎮的居民收入5年之中可上漲一倍，生活的改善使城鎮居民

對服飾的需求增加，可帶動如合成纖維、棉、布、特殊紡織品與高階服飾成長的動力。

3、機械產業 — (1) 此項目共107項，金額有11.4億美元，佔出口至大陸1.33%。目前台灣工具機出口至大陸稅率為8.23%，而部分機械納入早收名單，進而提升台灣在大陸市場的競爭力。(2) 台灣工具機在大陸市場主要競爭者為韓國與日本廠商。由於日本、韓國與大陸之間的關稅將陸續降為0，因此簽定ECFA的降低關稅，為工具機業者保有及提升中國市場競爭力之所必需。(3) 但佔台灣最大出口比例之綜合加工機類，因為是大陸重點發展的工業之一，並未加入早收清單之中，也引起了不少不同的意見。

4、運輸產業 — (1) 此項目有50項，金額1.48億美元，佔台灣出口至大陸的0.18%。由於兩岸汽車市場差異，及整車自製率認定的不同，所需配套措施未能落實，汽車業的整車未能納入早收清單中，引起汽車業對馬政府不滿。但如果台灣的業者能努力提高自製率，從長遠來看也未必是壞事。(2) 雖然台灣汽車零組件佔出口的比重不高，但由於本次有加入清單之中，且汽車零組件為台灣競爭力之強項，今後必定會有倍數的成長。

5、農漁業產業 — (1) 此項目有140項目，金額0.16億美元，佔台灣出口至大陸的0.02%。農產品有部分的蘭花、金針菇、香蕉、柳橙、檸檬、哈密瓜、火龍果與茶葉等。(2) 漁產品包括活魚、生鮮魚、冷藏魚、冷凍魚及未列名動物產品，對台灣農漁業開拓大陸市場有很大的幫助，而且大陸的農漁業產品不能出口台灣，實現溫總理“台海兩岸都是自家人，大陸可以讓利”的諾言，對台灣的農漁民有很大的優惠。

6、其他產業 — (1) 項目有共140項，金額有50億美元，佔台灣出口至大陸5.84%：包括鋼鐵、水泥、染顏料、運動器材、醫療器材、儀器、模具、金屬製品、LCD玻璃、橡膠、漆及油墨、電子、電機、小家電、手工具。(2) 其中，染顏料、運動器材、醫療器材、儀器、模具、金屬製品、LCD玻璃、橡膠皆為台灣強項，此次早收清單中為台灣的這些產業帶來很大的經濟效果。

二、服務貿易類：此項目有11項

- 1、會計、審計、簿記服務業
- 2、電腦服務業
- 3、自然科學與工程學研發
- 4、會議服務業
- 5、專業設計服務業
- 6、取消台灣華語電影片進口配額
- 7、醫院服務業
- 8、飛機維修保養業

9、保險業

10、銀行業

11、證券期貨業

其中以金融業中的銀行業為最大的贏家 1、設立辦事處的一年，之後可以申請設立分行。 2、分行成立一年當年獲利，可以申請辦理台資企業人民幣業務。 3、承作人民幣業務的時間為分行成立兩年，前一年獲利即可申請承作人民幣業務。 4、台資銀行在大陸，可以申請設立專為小型企業提供金融服務的專門部門。 5、台資銀行若申請在大陸中西部與東北部開設分行，在審批上給予優惠及方便。 6、審查分行有關營利性資格時，採用多家分行整體考核等。所以ECFA簽訂的內容優於大陸的外資管理條列，也優於CEPA。另外，保險業中允許台灣保險公司合併，可集團參照外資532條件申請。在證券期貨業中，儘快讓台灣證交所與期交所列入大陸允許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金融衍生商品交易所名單，簡化台灣證券從業人員在大陸申請資格和取得執業資格程序等，都給台灣的金融業創造良好的入門條件。

由於非金融服業中的八項服務業，在台灣皆為較具有經驗的項目，有較大的優勢，將給服務業進入大陸很大的商機，擴大服務業人員就業的機會與視野。

後記：台灣應該“反求諸己”、互利互惠

ECFA簽訂後大陸實現讓利的承諾，當然也不可能使台灣所有的產業滿意。依照ECFA的規定，簽訂後的6個月可再次協商，每半年的補充協議內容將是之後市場的關注之所在，今後可以在“兩岸經濟合作委員會”中定期協商，解決更多的實際困難與問題。台灣不能只單方面要求大陸讓利，而如何展現台灣的誠意及雙方的經貿利益，應該是今後共同努力的課題。

閩台科學園區應建立互動機制

台灣中國統一聯盟盟員 林大慶

世界各國高科技產業的蓬勃發展，再加上網際網路和電子商務的推波助浪，強化科學園區之間的銜接與互動機制，儼然成為當今科學園區建設的一個重要課題。近10多年來，閩台在科學園區領域的交流與合作，雖有一定的進展，但其銜接與互動的機制尚未建立。以階段來看，成功且碩大的“雙贏”合作，在不同階段有不同的合作機制，閩台在科學園區領域的合作，現在到了必須建設立密切的銜接與互動機制的時候了。這樣，既有利於建的“近台優勢”進一步發揮，也有利台灣“近閩優勢”的進一步發揮。

（一）科技園區的銜接與互動

“科技園區”一詞由來已久。目前人們對科學園區的定義是多樣化的。觀察聚集學派的觀點，所謂科學園區，主要是指在某一特定領域中，一群在地理上鄰近、有交叉關聯的企業或相關機構，並以彼此的共通性和互補性相連接的產業聚集活動。這種以企業互動的聚集活動空間，從一個城市、一個區域、一個國家，甚至到一些鄰國形成廣泛的聯接。

從這個定義，我們可以看出，科學園區的基本特質，至少表現以下三個方面：第一，銜接與互動是科學園區的一個重要特質。美國的矽谷是科學園區的鼻祖。加州之所以出現矽谷現象，依斯坦福工學院長詹姆斯·吉本斯的話說，有兩個原因：一是有形的銜接與互動，包括斯坦福大學、創業家、投資家、資金、技術、企業、商品等實物的銜接與互動；二是無形的銜接與互動，包括創業精神、企業文化、商業模式等非實物的銜接與互動。第二，企業群之間要素的緊密銜接與互補是科學園區發展的一個關鍵元素。全球知名的科學園區都具有這種共通性。一是產、學、研的功能要素的銜接與互補，二是購買者與供應商之間的供需連接，三是企業與企業之間的合作等等。第三，依效益的觀點而言，互動的區域越大，互動程度越密切其規模效益也就是越大。從ASPA(Asia Science Parks Association;亞洲科學園區協會)研究資料看，印度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

體現在印度科學園區的銜接與互動上，有以下三個特色：

首先，以軟體領域為主。印度沒有充足的資金發展資訊硬體產業，但有世界優秀級的數學頭腦，可以寫出最好的軟體程式。20世紀90年代初，印度領導人，採納這位元具有“印度軟體教父”之稱的柯里的這一見的。1990年印度調整產業政策，將軟體產業作為經濟發展的重心。

其次，內外並行擴大銜接與互動的區域。為了促進其軟體產業的發展，1989年印度政府先試驗性的設立班加洛（Bangalore）、普內（Pune）與布班斯瓦（Bhubaneswar）等3座“軟體科技園區（Software Technology Parks of India, STPI）”。進入20世紀90年代下半期後，“園區熱”在印度逐年升溫。目前印

度全國共設立了21個軟體科技園區，園區內約有7,202家軟體廠商，並形成了以班加洛、洛依達和清奈（Chennai）這三個骨幹軟體園區與印度其他園區相互銜接、相互依賴的軟體產業聚集活動的格局。

其三、印度軟體企業與美國矽谷的科技公司進行多樣化的合作。其中，“訂單合作”是最為活絡的一項。由於地理的因素，在時差上，矽谷的傍晚剛好是印度班加洛的早上。因此，許多軟體訂單，都處於矽谷在傍晚“下單”，而班加洛的白天，就基本完了訂單的加工，這樣，在矽谷的第二天就可以收到班加洛的“交貨”了。這種內外銜接與互動機制，導致了印度軟體產業在短短的10多年即迅速崛起，並創造令人關注的經濟指標：2009年印度軟體產業總產值達60,700千萬盧比（約122億美元）。其中76%出口，佔印度出口總值的1/10，而印度的軟體出口給印度則帶來了高達960千萬盧比的直接稅收；在技術層面，如果從國際軟體品質認證SEI-CMM（即國際軟體企業能力成熟度）指標來看，全球只有37家公司達到最高的第5級，其中20家在印度。

綜合上述，本文認為，在建設閩台科學園區的銜接與互動機制上，“印度模式”值得借鑒。為此，必須對閩台科學園區發展的態勢與問題做一些考察。

（二）閩台科學園區的發展與問題

1、台灣科學園區的發展

從上述對科學園區的定義來看，在產業聚集意義上，在20世紀60年代，台灣曾建立了3個“出口加工”聚集區。而作為科學園區的建設與發展，則始於20世紀70年代後半期，1976年蔣經國批示台灣的“經濟部”、“國科會”、“教育部”，共同籌建“新竹科學工業園區”。1980年12月15日新竹科學工業園區正式開始營運。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台南科技園區”（1997年）和“中部科學工業園區”（2002年）的建設步伐明顯加快。雖然目前台灣有3個科學園區，但台南、台中兩個科學園區尚未形成氣候，而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經過了20多年的建設與發展，不僅對台灣高科技產業的發展有極大的貢獻，而且，對台灣整體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有極大的貢獻。

客觀地說，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的也是發展比較成功的一個科學園區。

首先，從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的聚集情況來看，其聚集效應比較突出：在產業方面，包括IC（積體電路）、電腦周邊、通訊、光電、精密機械和生物技術這“六大產業”是台灣最聚區域。2009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的總產值為8378億元（新台幣，下同）。其中，積體電路產值最多，達5,645億元，佔園區總產值65.8%，其餘依次為：電腦周邊（佔15.7%）、光電產業（佔11%）、通訊（佔6.6%）、精密機械（佔0.7%）、生物技術（佔0.2%）。從這個比例特點看，前3項的產值佔園區總產值超過9成。因此，新竹科技園區實際是一個IC聚集區。台灣IC產業屬於專業代工。除了從上游晶圓材料到IC設計業、製造業、封裝業、測試業等生產環節的互相銜接與依賴外，例如台灣半導體產業的“頭家”台積電等，在上游環節，還與美國Adaptec連線作業，從訂單的下達到製品的更新、出貨通知、需求預測及工程設計和測試

等，與Adaptec分享即時運作的利益。可以說，在IC領域供需的銜接與互動上，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的這一特色是比較明顯的。

其次，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創造許多了“全島第一”。其中，最為突出的是在人力資源方面，它不僅是台灣知識密度最高的區域，也台灣勞生產率領先的區域。在勞動生產率方面，以2009年為例，園區平均每人產值為734萬元。這一數位是台灣整體製造的平均每人勞動生產率的3倍多。另一方面，園區廠商擁有高等教育程度員工的比例較一般產業高出甚多，博士、碩士、學士、專科、高於台灣平均值兩倍以上。從2009年台灣統計數字看，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從業的人員中，從教育程度看，具有博士學位的約佔3%、碩士佔21%，學士（及大專生）佔62%。這主要得益於，由海外回到園區創業的“海歸”，與美國矽谷的科學家、工程師建立多種多樣的流動網路。因此，在與矽谷的人力資源的銜接互動機制上，新竹園區的特點也比較明顯。

2、福建科學園區的發展。

與台灣相比，在科學園區的建設上福建與台灣的總趨勢是“既一樣又不一樣”。

首先，在科學園區概念的表述上，台灣稱“科學工業園區”，福建稱為“高新技術開發區”。但在對高科技的定義上，兩地是一樣。因為，目前所說的高科技都是建立在以下兩個定義之上；一是“定量”，二是“定向”。這兩個定義事實上在福建與台灣都同時被應用。

其次，在園區的企業聚集上，兩地都是以高科技企業、產業聚群為主軸。但在科學園區發展上，福建起先比較晚。但是儘管如此，福建的發展速度很快。目前在福建各地、各級興建的科學園有10多個，並且形成了以廈門、福州兩個國家級高新區為核心園區，以泉州（萬安園、石獅園）、漳州（藍田園、港尾園）、莆田（赤港園、智舟園）、三明（金沙園、尼葛園）和南平科技園等為“星座”的“核心（園區）——星座（園區）”產業聚集體係。

因此，兩地相比，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在與美國矽谷的銜接與互動上，優於福建；而福建的發展速度以及在形成科學園區體系的運作上，優於新竹科學工業園區。

3、閩台科學園區發展面臨的問題

如前所述，現在兩地在科學園區層面上的銜接與互動機制還未建立，這是兩地科學園區發展中的最核心的問題，其對未來兩地的高科技經濟發展將產生很大的制約。

首先，從區域生產力佈局來看，福建有10多個科學園區，它在整體區域經濟的佈局和園區的組合上，已經成了台灣比較理想的園區腹地。就台灣產業而言，這是“近閩優勢”之一。它就像一座很大很富的寶藏，不是開發的差不多了，而是大大地有待進一步開發。然而，由於在兩地園區的銜接與互動機制建立的滯後，而使這空間近接的優勢難以發揮。就新竹科學工業園區IC產業來看，近年來由於這一產業聚集太過飽和，所帶來的負面衝擊日見突出。一方面，由於IC過渡飽和所引發的公共建設不足，以及由於無法即時有效

因應產業大幅成長造成能源（用水、用電）不足、環境保護、交通擁擠等問題，與當地社區的衝突問題接踵而來。另一方面，就以台灣“9.21”震災來看，僅因無法正常供電、供水一項，就對新竹科學工業園區IC產業造成的高達100億的損失。因此，作為腹地，福建10大科學園區，都可以成為台灣IC領域“前店後廠”的理想區域。

其次，在高科技經濟中，生產、製造總是與消費市場聯繫在一起。科學園區腹地是建立，實際就是開闢市場。當年美國IBM公司進軍台灣市場，以其資金、技術和資訊發展的優勢，僅幾年時間，IBM就擁有台灣30%以上的市場佔有率。同樣，截爾電腦在福建廈門，也僅短短的幾個，就創造“截爾模式”，使截爾電腦在大陸市場的佔有率逐年上升。台灣科技產業界，雖然有“近閩優勢”，但在這種高科技經濟競爭中，台灣高科技公司，至少在目前是處於劣勢的。長此下去，台灣業界從“近閩優勢”所獲得好處勢必帶來不確定性，勢必使新竹科學工業園的未來充滿不確定性。

此外，從科技企業互動聚集態勢看，新竹科學工業園區每年都一定的新增企業入駐園區，但到目前尚無一家福建企業要進入新竹園區。這對兩地科學園區的發展也是不利的。

（三）閩台科學園區的銜接與互動機制的建設

科學園區的銜接與互動有許多不同的形式。由於閩台科學園區的銜接與互動的本質是一體化。因此，就其具體形式而言，依銜接與互動的目標、層次和深度，可以分為以下三種：一是“更緊密合作型”，二是“優勢互補型”、三是“資訊共用型”。

1、就“更緊密合作型”而言，就是閩台在科學園區領域的合作要迅速發展和密切化。就當今世界科學園區的性質和發展目標來看，其表現非常明顯：有的以科技創新為主，有的以技術開發為主，有的以產業發展為主，有的以市場開拓為主，有的以帶動區域經濟為主。也就是說，科學園區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越來越呈現出特色化。

毋庸置疑，閩台在科學園區領域的合作方向上，應圍繞帶動區域經濟和開拓國際市場這一特色的打造上，來強化兩地科學園區的銜接與互動。這主要基於兩點考慮。第一，“開拓國際市場”是台灣業界的相對強項。從歷史看，20世紀60年代，台灣的出口擴張時期，台灣業界就創造了“一個皮包打天下”行銷模式。近年來，台灣業界目標於“運籌全球”，“運籌”的內涵是“物流”。因此，閩台在拓展國際市場上合作，既可以提升兩地園區與世界科學園區銜接與互動的水準，也有利於台灣業界優勢的充分發揮。第二，福建建構海峽西岸經濟區為兩地更緊密的合作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遇。海峽西岸經濟區的建設，對台灣業界來說，顯而易見的一點，就是為台灣業界將“近閩優勢”轉化為現實生產力，提供更廣闊的空間。從而使閩台在科學園區領域的合作，成為推動整體區域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

2、“優勢互補型”，隨著福建經濟的快速發展，近年來福建科學園區的發展出現了新的變化。一是在園區內的跨國公司數量與比例在逐年上升，二是福建民營科技企業的產品升級發展很快，而勞動力市場

對廉價勞動力的需求顯著減弱。也就是說，傳統意義上“廉價勞動力優勢”不是沒有，而是靜態的優勢正向動態的新優勢轉換。因此，在兩地科學園區的合作上，越是高值化的合作，就越能找到利益的匯合點。這也“優勢互補”的銜接點。

如前所述，台灣新竹科學園區在與矽谷的人力資源的互動上，不論的管道，還是經驗都優於福建科學園區。另一方面，第一任新竹科技園區管理局主任何宜茲先生生前留下了一句名言，他說“科學園區的成功是企業的成功”。而創新是高科技企業的生存之道。因此，作為兩地科學園區合作的又一個銜接點，就是“福建——新竹——矽谷”形成密切的互動。就現階段而言，兩地園區科技企業的精英才，可以聯手到矽谷創建諸如“閩台合資的矽谷公司”、“技術引進公司”、“獵頭公司”等等。可以說，如果離開這些企業經營活動很平常的、實際的、大量的合作，就很難將優勢互補推向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3、“資訊共用型”。可以重點在以下兩個方面深化銜接與互動。第一，新竹科技園區的資訊化程度相對較高，對產業技術、市場變化的相關資訊的採集、加工、應用和傳播等方面，已有很成熟的園區資訊共用機制，而且有很高的透明度。但是對福建的科學園區來說，其透明度卻是很低很低的。所以，應該採取更積極的互動，把這次資訊服務銜接起來。第二、廈門、福州兩個科學園區每年都有多起學術研討會、產品推介會，技術交流演示會等。近年來，這些會議更多是局限於特定的專業協會和特定的商圈。對此，也應該採取更開放的方式，與台灣專業協會相關領域共同參與，實現資訊共用。

此外，相比較於印度班加洛園區與美國矽谷的“訂單互動”，福建與台灣的科學園區之間的“訂單互動”更有時間空間的互補性。從這一點說，“班加洛模式”值得借鑒。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建構閩台科學園區的更緊密的銜接與互動機制，是科學園區自身發展的要求，是兩地科學園區建設與發展的需要，更是閩台“雙贏”利益之所在。

中華民族騰飛需要兩岸和平統一

台灣大中華團圓促進會會長 樂可銘

前言

吾人知道，要讓中華民族騰飛，最重要的就是要兩岸和平統一，並且真誠的合作。但是，出於保護主義，全世界可說是沒有哪個國家願意中國和平統一後的強大，尤其是美日等“八國聯軍”，因為他們都是資本主義唯利是圖的侵略者，所以首先必須要使他們的力量比不上中國，他們沒有了強大的經濟實力，自然就無法維持強大的國防武力，沒有了強大的國防武力，中國自然就有可能超越他們，並使他們不敢與中國對抗。

一、美國經濟崩解之分析：

近百多年來我國受帝國主義之“八國聯軍”的侵略欺凌，割地賠款受盡凌辱，才使得中國窮困潦倒，即便1978年後鄧小平實施改革開放，可到了1989年發生天安門事件後，“八國聯軍”又聯合抵制封鎖致使中國一籌莫展。再看1997年香港回歸後“八國聯軍”又再製造東南亞金融風暴，意欲香港回歸不會有好前途，再看2008年的西藏暴動及奧運聖火的阻擾皆為“八國聯軍”暗中之操控，再再的顯示“八國聯軍”謀我之意圖可為無所不用其極。

若是在此金融海嘯讓他們有重新再起的機會，定當對中國和平統一之歷史大業強力阻擾，故在此時中國應對其落井下石打落水狗。首先中國就不應繼續購買美國的公債，因為美國在這方面要穩住經濟的下滑與失業率，就必須要再花費5兆美金以上才有可能止跌，中國沒必要跳入此無底洞，陷本身無法運用自如，唯有他們破產，人才才有可能外流，為我所吸收。

使中南美洲團結成反美的大本營，由委內瑞拉的查維茲總統領軍引進俄羅斯的軍事武力及基地和美國對抗。於今（2010）年9月之聯合國大會，策動委內瑞拉總統，伊朗總統，北韓總理於聯合國提案，討論美國2003年攻打伊拉克的侵略行為乃違反聯合國憲章，應受懲罰，從前它國違反聯合國憲章，美國即組聯軍出兵制裁，並加經濟制裁，故其本身亦不能例外，因為當時美國的民意支持度達90%，所以伊拉克全國的生命財產之損失應由美國按其本國標準加以賠償，並對美國實施石油禁運及知識財產權與專利權取消15年的保護，此將對美國的經濟與財政產生有如核爆的傷害，成為摧枯拉朽的嚴重後果。自然美國無能維持強大國防武力，便不得為所欲為。

二、如何建設中國成世界工廠及市場

雖然從1991年起改革開放加速起飛，沿岸地區現在亦有許多地方比台灣更進步，但內陸地區，尤其是中西部及邊陲地區還是有很多地方非常的落後窮困，需要大力的建設，故現在中國應做的建設步驟如後：

1、建設四通八達的交通網路

對中國廣大的土地由東向西開發有如蜘蛛網式的高速鐵、公路，應以能配合各地觀光景點的規劃方式建設，因為交通能夠高速的四通八達，不但能發展觀光產業，並能使沿海產業有往內陸遷移的誘因，當然可以用最快的速度貨暢其流，尤其是農漁產品的保鮮度也可以達到最佳的效果，自然又可增農漁民的收入。雖然投資很大，但以後每年從運費的回收絕對值得。

2、農村人口集中化

與台灣的省農業改良場進行合作，提高品質與單位面積的產量，達到增加農民的收益，使農地適宜農機耕作，自然農民的收入穩定，農民工就會留在農村。

在農村集中建15層樓以上之環保現代化堅固住宅，將農村的人口集中都市化，因建物往高處發展，多餘的土地即可大量綠化，符合環保節能減排的效果，又因人口集中，商業自然能夠繁榮，更便於建設地鐵等公共運輸系統，亦容易建立方便之醫療與福利措施，但住宅可先以廉價出租，待農村收入增加後逐漸加價回收。

三、兩岸合作如何掌控南中國海

全世界經歷了2008年底的金融海嘯後，各國經濟都受創嚴重，而今各方面都強調全球化的同時，除非有特殊之方式及條件，否則難以置身事外，皆遭波及，甚至有國家破產的，但經一年多絕大多數的國家都尚無法翻身。然而台灣乃因兩岸關係之緩和，中共屢釋善意，大量轉移訂單及觀光客之協助，讓台灣的經濟能渡過難關。

若要作長遠計，最好的策略則是馬英九總統能透過海基會，向中共表達願意將現由我方佔領的南沙群島中之太平島，提供作為兩岸軍事合作互信的平台，由中共出資將該島建設成海空軍之補給站及基地，其功能有如超大型之航空母艦，因為太平島距離台灣太過遙遠，戰鬥機單程尚無法飛到，除非中途加油，若發生危險連馳援都緩不濟急，不如做個順水人情，讓中共的戰鬥機由海南島起飛到太平島降落加油，再起飛巡邏南中國海。而台灣亦好好將東沙島建設好，令台灣戰機可飛赴東沙後，再加油巡邏南中國海，與中共配合由海南島，太平島，東沙島互為犄角，掌控南中國海並控制麻六甲海峽，巴士海峽，台灣海峽，肅清此區海盜使之成為安全之海域。如美，日，韓等船隻要經過此區必須支付保護費，否則請於印尼下方澳洲外海繞道而行。

另外，兩岸與東南亞國家共同合作開發石油資源，如此則東協各國皆會向中國靠攏，而將美，日，韓的勢力由此逐出，而此地區在土地，能源，人工等之生產成本在全球比較皆屬較低者，故會吸引各資本家赴此投資，而使此區人民就業率提高，失業率降低，甚至人人有工作，有飯吃，有錢賺，亦有錢花，就會使之成為世界工廠及市場，讓美，日，韓降低競爭力，那中華民族哪有不富強之理。

四、如何化解人民幣升值壓力並維護債權價值

二十年前因帝國主義從中作梗，製造天安門事件使全球封鎖中國大陸，但第二年後的某件因緣際會使之漸漸突破封鎖，經十多年之努力，靠辛苦之勞力及人民之勤奮，好不容易能掙到今天的成果成為令全球刮目相看地位。可是這些享受風光慣的帝國主義卻見不得中國大陸的富有，而屢屢施壓一再得寸進尺的要求人民幣升值。

自從前年美國發生引發全球金融海嘯的事件後，本人即認為這是給美國教訓的最好時機，因為美國積欠全球十幾兆美金的國家公債，尤其是中國擁有最多近兆美元，試問美國當年因缺錢，而發行公債，向全球搜刮財富購買廉價資源，而不使用及開採本身所擁有，當物價炒高後又要將本身幣值貶值，佔盡所有便宜，中國大陸現在應該領頭站出來為全球的弱小債主據理力爭說句公道話，將美國之氣焰壓下去，否則他們會不斷的得寸進尺加壓，不達目的絕不罷休，因為他們的力量較弱還客氣些，若等強大後更囂張，所以中國應該藉此機會趁勝追擊，因為對敵人仁慈就是對自己殘酷。

方法即是提出要求美國償還公債的方法不應以有如廢紙的美金或公債抵償，而應以其發行債權國所擁有之該債券當年度世界物價價值的物資數量作為償債標的，例如其發行該債券當年度的石油價格一桶是四十美元，不論現今油價是七，八十美元，但擁有該年度債券的債權國，即有權以當時的價值計算數量要求償還，而由債權國視本身所需要的物資資源提出償債要求，因為各種物價皆有資料根據可查詢得到，而美國因要開發或生產該物資即需要其國內人力，等於增加其本國人民的就業率，亦使債權國能擁有其債權之價值，而不會被貶成一無所有，惟有中國在全球公開的場合不斷呼籲並串聯各債權國合作向美國施壓，才能壓制其氣焰，爭得本身應有之權利及尊嚴，也才不會使民族不斷被欺侮而忍氣吞聲，被人看不起。

兩岸文化教育論壇論文



兩岸文化教育論壇總結篇

報告人：《海峽評論》雜誌社社長 吳瓊恩

在兩岸文化教育論壇中，大家提到了兩岸今後的學術文化交流和教育發展方向，應重視中國傳統儒釋道的人文思想教育，修正過於偏重實用的教育現況。本論壇亦有先進提及發展電影與國畫等文化創意產業，十分精彩，頗有啟發。

兩岸的交流，頭二十年以經貿交流為主軸，台商參與祖國的經濟發展，貢獻甚大，現在中國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台灣人將來在中國統一的輝煌歷史中，無疑的將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其歷史意義，好比當年有一些愛國的台灣人參加25,000里的長征，同樣看出中華民族在崛起過程中，兩岸中國人均有共同的願景和振興中華的使命。

今後兩岸交流，將從經貿交流為主軸的時代，轉向並提升為以文化教育為主流的時代。反思並修正或扭轉兩岸交流20年來一些偏差現象，例如暴發戶心態，精神上虛無主義的危機，恢復中國傳統儒釋道的精神文明。

中國領土主權完整的民族大義，是中華民族千百年來永恆不變的原則，一個中國原則高於也重於政權的輪替，張學良的中國民族精神即是一個好例子。張學良在參訪台南鄭成功延平祠時有一首舊作如下：

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義抗強胡；

豐功豈在爭明朔，確保台灣入版圖。

今天在台灣的中國人，重點不在保衛“中華民國”的正朔，而是“保衛中華民國”以阻止“台灣共和國”的誕生，確保台灣入中國的版圖，永不分裂，這是民族大義高於重於政權的正朔問題，張學良的精神正是中華民族最可貴的精神，也是當代在台灣的中國人無可逃避的歷史使命。

宜恢復中國傳統道德文化教育

原香港理工大學校長 潘宗光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在過去五千多年的歷史中，中華民族不僅憑藉中華文化，成為世界公認的最具有生命力的民族，中華文化也是世界上唯一未有中斷的文化。中華文化也是我們凝聚海內外華人、實現國家最終統一的精神紐帶，更是我們實現共建和諧社會、民族復興和國家崛起最重要的軟實力。

文化對於一個民族的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我國社會經濟發展迅速，但與發達國家相比仍然存在著一定的差距。為了奮起趕超，就要充分發掘自身的文化優勢。要讓國家綜合競爭力得到進一步提升，必須在擁有豐厚文化資源的基礎上增強文化軟實力，以此搶佔發展的制高點，才能取得可持續的發展。中華文化特有的文化基因對重塑中華民族的偉大民族精神、促進祖國和平發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這些必然也是我國文化軟實力的首要資源和重要基礎。

近代以來，中國傳統文化曾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國內，尤其是年青人起了一股崇洋潮，看不起自己有五千年歷史的優秀文化。他們逐漸西化了，人只是向名利看，不停地追求物質的享受，越來越遠離中國傳統文化的美德及道德操守。而相反的是，西方國家卻越來越希望了解中國的傳統文化，他們叫中國熱潮，世界上很多有名氣的企業家、政治家、國家元首，他們也以研究中國文化作為他們的發展策略。因此端正對待中華文化的態度，充分認識恢復中國傳統道德文化教育，更加顯得必要和及時。

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報告中指出，“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團結奮進的不竭動力。要全面認識祖國傳統文心，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使之與當代社會相適應，與現代文明相協調，保持民族性，體現時代性。加強中華優秀文化傳統教育，運用現代科技手段開發利用民族文化豐厚資源。”

正如胡錦濤總書記說，中國文化博大精深，有精華，也有糟粕，我們應該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用現代人的思維和現代化的推介方法，重新包裝來從三方面推廣。

（一）首先要從教育入手。現在的教育取向，是深受西方文化價值觀的影響，傾斜教導學生的謀生學問，而不教育學生樹立尊師重道、仁愛、互助、包容、合作的中華文化核心價值觀。中華文化的主幹部，是儒釋道三學。這三學的共通點是教育我們克服自私自利的心態，做一個真善美的人，所以有關當局不要以宗教色彩為藉口而扼殺在學校教育儒釋道的優良文化價值觀。就算從宗教角度看，儒釋道是主張“無神論”，是教育人怎樣積極地透過個人修養提升智慧與慈悲心來自利利他。

中央黨校資深任登第教授在他的《大家都學弟子規》著作中，更強調《弟子規》的1,080字，360句全部講的“禮教”兩個字；書中更提到無論大人小孩、教育工作者均要學習《弟子規》，人人就會心靈向善，個個都有清淨心，社會不就和諧了嗎？

因此，無論在小學、中學或大學，也應將中國傳統文化納入正規課程中，讓這寶貴文化早早植入年青人心中，播下種子。

（二）傳播媒介在推廣中國傳統文化上也擔當一個重要角色。近年中央電視台的百家論壇非常成功，以一個簡易形式講解以往大家認為非常深奧的中國傳統文化道理，並引起全國以致全球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興趣，這就是一個很好的典範。傳媒大可以此作借鏡，利用其影響力，將中國傳統文化滲透至社會各不同階層。

政府亦可以行政手段，要求作為國有資產的大眾傳媒，在傳播傳統文化方面，不應過分功利化，在黃金時段，拿出一定比例時間，播放弘揚傳統文化的劇集和節目。

（三）政府和領導應以身作則，帶領推動中華傳統文化社會化和時尚化。各級政府官員尤其是中央領導，在出席重要活動，應一律穿著中國傳統服裝；宴請外賓時，也要以中國菜式、茶、酒文化為主；以及積極參與各中國傳統文化節日等等。

近年全國許多大中城市掀起了一股興建帶有西洋文化特色的主題公園熱，皆以利益為首，如迪士尼。以我認為，政府在規劃娛樂設施方面，在兼顧利益同時，也要想想如何推廣我國文化，中華傳統文化中的藝術作品，比如《西遊記》、《水滸傳》、《三國演義》、《紅樓夢》等等，也是興建主題公園的極佳文化題材。對此，政府應促成此類主題公園的誕生，提供必要的政策和資源扶持。



新世紀兩岸電影創意產業初探

台灣中華崇德協會副理事長 王曉祥

象徵著人類重要文化創作與文明遺產的電影藝術，從發明伊始（1895年）迄今已堂堂進入第三個世紀。中國電影也已屆百年慶典，值此歷史時刻，兩岸決策單位紛紛慎重推出了“文化產業振興規劃”與“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促使了兩岸電影創意產業由文化產業提升為戰略性的產業之位階，進一步讓電影產業蛻化成關係兩岸總體經濟發展的軟實力。至此，新世紀第一個十年的兩岸電影創意產業的亮點回顧與前瞻，就值得更多的關注。

台灣電影創意產業部份

一、人才的發掘與培養

1、台灣電影界導演的更迭不像中國大陸以“代”來區隔。1982年台灣中影公司一部低成本由三位新導演習作的“光陰的故事”開啟台灣的新電影運動。這批充滿了活力與創意的青壯派導演有侯孝賢、楊德昌、柯一正、王童、張毅、萬仁等人。到了九十年代，在另一股新浪潮下又湧現了李安、蔡明亮、林正盛、張作驥、張艾嘉、陳國富等為代表的導演群。至於新世紀2000年後又有一批被稱之為“新勢力”的新面孔出現在影壇。他們有些是靠新聞局提供之長短片輔導金開始拍片，有些是透過公共電視台“人生劇展”徵案提供資金拍攝電視電影長片。其中許多走上電影創作之途的導演都曾參加過“金穗獎”競賽的洗禮與淬煉，獲獎的高手有李安、蔡明亮、魏德聖及鄭文堂等人。

2、新世紀新導演群中有一個獨特的現象，那就是才女型的導演輩出。譬如：周美玲（刺青）、陳映蓉（十七歲的天空）、王毓雅（雙面情人）、李芸禪（人魚朵朵）、鄭芬芬（聽說）、章蕙蘭（小百無禁忌）、丁乃箏（這兒是香格里拉）、蕭菊貞（銀簪子），她們以多元的創意充實了新勢力電影的形式與內涵。

3、一度因人才外流嚴重而在台灣影壇消失的明星制度，又在新世紀新勢力電影洪流中逐漸回溫。因“藍色大門”脫穎而出的桂綸鎂；演出“陽陽”一片倍受矚目的張嫻媛；流行樂小天王周杰倫由歌壇轉入影壇被捧為偶像明星；台灣第一名模林志玲也躍上銀幕演出了“赤壁”與“刺陵”。其它如2010年演出黑幫片“艋舺”而成為偶像級的趙又廷與阮經天，都在電影公司與經紀人的刻意栽培下成為明日之星為票房帶來了不少利益。

二、電影題材的多元化

上世紀九十年代因主客觀因素，使台灣電影因投資少、格局小在題材的選擇上往往局限在青春校園或同志愛的類型片上，曾迭遭評論界的詬病。新世紀以來電影題材已漸多元，編導們善於在台灣本土的特色上找到各種不同的動人故事。在敘事上亦更趨嚴謹與富層次質感。舉例如講清純校園生活的“藍色大

門”，有關成長故事的“九降風”與“罔男孩”，有懷舊基調的公路片“練習曲”，有勵志本土的“海角七號”，有社會寫實小品“不能沒有你”，幫派片“艋舺”及童話故事“人魚朵朵”等。

三、行銷策略的靈活運作

2008年一部5,000萬台幣成本的鄉土勵志片“海角七號”以石破天驚之勢創下了總票房新台幣5.3億元的傲人佳績。據估台灣有逾250萬人次觀眾看過該片。它所代表的不僅僅是“觀影經驗”而已，而事實上已成為台灣獨特的“文化現象”與“社會活動”，其締造之奇跡應歸功於行銷策略的奏效。片組以有限之宣傳經費依賴網路（絡）、PTT、部落格、BBS（電子佈告欄）等渠道之迅速文字傳遞引起主流媒體之注意，然後引爆市場，製造成一場觀影之潮流，長達數月之久，為久蟄的台灣電影產業拾回了自尊心與自信心。其後2009年“罔男孩”也繼續搭上“海角七號”的順風車，以類似的網路行銷與網民的口碑相傳，創下了不錯的票房紀錄。2010年的金馬獎的最佳影片“不能沒有你”則因上映期間遭逢“八八”水災等因素，票房不如理想。除了上述之行銷策略外，台北市府與高雄市府的電影委員會也大舉以“城市行銷”之策略大力贊助以該城市為故事背景的創意影片。譬如“聽說”（配合台北市聽障奧運會），“不能沒有你”（高雄外景），“海角七號”（恆春海邊），“艋舺”（台北萬華）。

四、合作拍片創造雙贏策略

合作拍片可以糾集人才、資金、技術與行銷的力度，減少投資之風險。新世紀的十年內，兩岸已有不錯的合拍模式。李安的“臥虎藏龍”就是一個典型的成功範例。由兩岸三地資金、人才與技術合作，美國哥倫比亞公司負責行銷策略，結果該片名利雙收，並獲全世界包括奧斯卡等多項殊榮。此外，2001年台日投資侯孝賢的“千禧曼波”，2006年兩岸三地投資拍攝的“雲水謠”，2009年的“白銀帝國”由兩岸合資，三地演員通力演出，同年，朱延平導演的“刺陵”也採取了同樣的模式執行拍攝與行銷。

中國電影創意產業部份

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後，由計劃經濟制度過渡為市場經濟制度。電影產業也在創意加溫，人才輩出與文化主管單位適度的“保護”政策下，新世紀的頭十年得以大步發展。以全國票房為計，從2000年的8.6億人民幣躍升為2009年的62億人民幣，每年以20%-35%的速度遞增。如以電影產業與市場容量而論，中國大陸已儼然躍升為世界第三大電影生產國，並躋身為全球十大電影市場。惟在電影創意產業的一片榮景的背後也出現了讓觀察家們感到關心的現象。根據大陸內地出版的電影專業雜誌“世界電影”2010年3月號的特刊中撰文指出，新世紀第一個十年，大陸電影產業的票房紀錄與影片藝術品質似乎呈現了一個微妙的交叉座標線：那就是票房線躍升，品質線下滑。

一、中國大陸電影產業體制的變革

在市場經濟的規劃下，國營電影製片廠紛紛改制，由過去“包產包銷”轉型為“盈虧自負”的企業單位、股份企業或上市公司。在市場利潤掛帥的大方向與大原則下，製片方針偏向描準大投資、大製作、大營銷、大市場的“大片”。根據票房資訊，中國內地2000年—2009年度票房前十名有九部是所謂的“超級

大片”，票房從2.48億人民幣到4.2億人民幣。在這種體制與潮流下，使得中等投資、中等回報或低成本的小眾獨立製片幾乎找不到適足或生存的空間。以2008年為例，中國內地生產了四百多部影片，其中80%票房收入由九部大片囊括，其餘數百部影片票房總和才佔20%。根據新影聯影業高層向媒體表示：“中國電影呈現出一個很不健康的金字塔形狀，而理想的形狀應該是紡錘型”（2010年1月30日台灣旺報文化週報）。

二、保護與革新兼具的電影政策措施

據報導，中國國家廣電總局為促進電影產業之改革，與相關部門正積極研擬“電影促進法”之起草與頒佈實施。制定深化電影體制改革之相關配套政策，以保障和促進電影產業的持續發展。另一項為公眾關心的電影政策是，2001年在政協上提出的“電影分級制度”，對因應日益豐富和多樣化的電影市場，審查制之尷尬處境似乎可以透過分級制度的規劃與實施，一方面足以保護電影人的創意，另一方面亦可以將不同主題、創意風格做合理的分流。

三、類型電影塑造多樣化的市場

中國內地除了每年固定黃金檔期的“大片”外，其它的類型電影，其實仍不斷以多樣化的風貌向分眾或小眾招手，積極爭取市場這塊大餅。其中不乏兼具藝術品質與商業口碑的作品。譬如寧浩以小兵立大功的“瘋狂的石頭”；賈樟柯的“三峽好人”勇奪威尼斯金獅獎；李揚的“盲井”與陸川的“可可西里”都是倍受口碑肯定的社會寫實作品。此外，主旋律加上創意包裝的佳作亦不時可見，如“天狗”、“光榮的憤怒”、“千鈞一髮”等。除此之外，姜文的“鬼子來了”、“太陽照常升起”與管虎的“鬥牛”則屬於另類創意作品。

四、人才的育成與扶植

以目前中國內陸每年生產逾四百部影片的量而論，電影創意產業中之專業人才與複合型人才之育成與扶植，應是刻不容緩的課題。電影是科學、藝術與技術的綜合體。人才之育成除高等學府院校係所積極培養外，位居中國電影產業“龍頭”地位的中影集團，據聞亦有所謂的“三步走”的青年導演扶植計劃。此外與國外知名電影節中，新導演培養計劃的合作與交流，亦不失為推廣人才之有效途徑之一。

五、建立市場平台，擴大交流績效

新世紀的來臨活化了兩岸電影創意產業的蓬勃發展。雖然兩岸文化交流日益頻繁，惟在電影創意產業領域中之交流，似仍待努力與加強。每年兩岸之金雞百花影展及金馬影展，無論在競賽或觀摩項目上，影片之交流與交易均嫌嚴重不足。造成兩岸觀眾對彼此影片作品的陌生與隔閡。2009年台灣民間在李行導演倡議下，成立了一個兩岸電影交流委員會，每年定期舉辦小型兩岸電影影展，由兩岸對口單位各選六部新片，在台北及內地公開放映觀摩並舉辦專題研討會。惟迄今該項活動之深度與廣度仍待加強。茲建議兩岸之金雞百花影展與金馬影展期間，可增設一項市場交易會活動，藉機大量展演兩岸電影作品，吸引發行商前來選片簽約。此舉或不失為兩岸在積極推動文創法相關措施時，可以付諸實現文創產業外銷的良策之一。

21世紀人類能否在非對抗中重生

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 劉夢溪

世紀的轉換，是歷史的恒常現象，照說不應該對人類社會有甚麼影響，可是歷史卻不儘然。當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時候，也就是上一個世紀轉換的歷史時刻，全世界都害起了“世紀病”。

當時東方許多國家面臨西方強勢文化的衝擊，迎退失據，陷入了自身價值系統崩場的嚴重危機。西方也發生了危機，主要是強勢國家的殖民化政策，加劇了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以及宗主國與宗主國之間的矛盾。東方的危機迫使人們通過變革來改變現狀，因此反倒看到了希望。西方的危機似乎更加深在。後來終於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危機的直接結果，也是試圖擺脫危機的一種方式。正因為如此，上一個世紀轉換時期，也就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才有西方物質文明已經破產的觀點出現。

一個世紀過去了，雖然中間又有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多少世紀累積的人類文明成果遭受重創。但西方的物質文明並沒有破產，不僅沒有破產，而且在20世紀差不多走到了顛峰的位置。當然東方也沒有破產，不僅沒有破產，而且在磨難中逐漸蘇醒過來，紛紛獲得獨立，不少國家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了民族國家的整合過程。從大歷史著眼，如果說西方贏了，那麼東方並沒有輸。中國的站立起來和重新走向世界，不就是20世紀驚世駭俗的一大景觀嗎？何況還有印度，還有日本，還有當時的“亞洲四小龍”。

歷史過程本身，是不可以簡單用輸贏、勝負、成敗來計量的。當然我這裡所說的東方和西方，是歷史地理和文化類型的概念，而不是單一的政治化意識形態概念。

這次20世紀和21世紀的轉換，至少到上一個世紀的九十年代中期，人們還是相當平靜的，沒有甚麼危機感，西方沒有，東方也沒有，不但沒有，反而為一片樂觀的情緒所籠罩。西方浸沉在因前蘇聯和東歐的解體而進入冷戰後的喜悅之中，東方為自己的經濟奇跡而沾沾自喜。特別是亞洲一些經濟發展勢頭強勁的國家，情緒高蹈，對未來作出了極為樂觀的估計。因此“21世紀是東方文化的世紀”、“亞洲的世紀”等話語，都出現了。

但沒過多久，1997年開始，席卷亞洲的金融危機爆發，泰國、印尼、馬來西亞、韓國，傳染似的連鎖反應，全球為之震驚。於是“東方文明破產了”、“亞洲價值崩潰了”一類話語又大行其時。但三年過後，亞洲經濟又開始復蘇。如果僅僅以經濟的浮動指標作為現代文明的尺度，對於亞洲價值作價值判斷，就會像華爾街股指那樣變得不可捉摸。

現在以金融危機為潮頭的經濟危機，又一次洶湧而來，“金元帝國”美國始作俑，席捲西方，彌漫全球。相對這次亞洲所受衝擊要輕一些。但沒有置身局外的幸運者。即使三流四流的政治家，也不敢有所輕忽，更不敢幸災樂禍。流行的語詞，是中國的三個成語：未雨綢繆、亡羊補牢、同舟共濟。此時此刻，需

要的是信心和膽魄，而不是扭捏不清的“高興”與“不高興”的矯情計較。也許已經像通常設想的那樣，一年見底，二年回升，三年重振。我們當然希望如此。可誰都不是預言家，無法預測這次以及下一次人類在21世紀已經或者還要面臨哪些嚴峻的挑戰。

我想21世紀和20世紀一樣，仍然是充滿變數的時代。當人們處在19世紀末的時候，誰想到20世紀會發生兩次世界大戰。歷史的發展、社會的變遷、文明秩序的建構，從來都不是一帆風順的。不斷地挫折，不斷地重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恒常現象。可是人性的弱點是最容易犯重複的錯誤。不肯吸取教訓是人類的痼疾。現在一些國家擁有的最先進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大家都在擴軍備戰。連產生聖雄甘地的“非暴力主義”的印度，也在沾沾自喜地以武力自炫。本來危機尚不算深在的東北亞，也被那只看得見和看不見之手，攪擾得危機重重。

人類大約沒有想到，剛進入21世紀之初，就暈眩地站在了十字路口。看來奧巴馬復活節演說流露出來的“世界重生”的閃光一念，只不過是策略性的權宜之計，也許在他個人是真實的，但世界第一大國的權力中樞和戰爭機器，卻生不出如此慈念，並未因勝心不勝而累積出新世紀的絕地猛醒。

然而，並不很聰明的人類可曾知道：我們的居住之所地球已經遠不像從前那樣碩大無垠了，所謂地球有無窮無盡資源的想法已變得荒唐可笑。當金融家、政客、金錢和權力萬能論者，用各種神話編織全球化的奇妙網路的時候，他們忘記了地球在21世紀會做出怎樣的回應。現代文明惟一被遺忘的角落是地球的超負荷運轉。其實地球被迫做出回應的預兆我們已經看到了：赤地千里，那是地球的饑渴；洪水氾濫，那是地球流的淚水；火山噴發，那是地球的歎息；地震，那是地球的憤怒。

一個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不可能在與世隔絕的情況下單獨完成，需要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文化系統、不同文化理念的點燃與嫁接。20世紀最後一年的早春，恰值我在哈佛大學作訪問學者，當時哈佛大學的資深學者史華慈教授親口對我說，語言並不像人們想像的那樣對思維有那樣巨大的作用。他說這個話不久，就離開了人世。他是堅定的跨文化溝通的宣導者，為了鼓舞人類溝通與對話，他勇敢地提出了關於語言與思維的關係的也許是尚待證實的新理論。

就像一個人不能離群索居一樣，一個國家也不可能逸世獨存於當代世界。亨廷頓教授的偏頗，是過分強調了文明的衝突，而輕忽了文明的融合。而文明的融合，首先需要文化溝通。文化溝通不僅是文明人的禮儀，而且是文明人的智慧和生存方式。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國與國、區域與區域、民族與民族之間，是互為依存的關係。東方離不開西方，西方也離不開東方。同和異，是就達至目標的途徑而言。最終歸宿，常常是相同的。《易經》上說：“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東方文明中，譬如說中國傳統文化裡面，是不是也含有供全人類取資的普世價值？我想那是毋庸置疑的。作為中國學術思想經典源頭的“六藝之學”，也就是六經，其義理內涵與人類的普遍精神追尋可謂同一旨歸。而孔子的“仁”、“恕”思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學說，顯然應該成為人類的共德。還有源於孔孟而由宋儒集大成的“主敬”，也應該是屬於全人類的德律資源。不過西方傳統中，同樣也有近似

或者相同的價值呈現，不是孰好孰不好的問題，而是對話互闡的問題。

人類既然從軸心文明中走過來，就會回到軸心文明中去。所謂“21世紀是東方的世紀”、“亞洲的世紀”——我個人不作如是觀。我更傾向於這樣一種看法，即世界是多元的、文化是多元的、現代文明模式的建構是多元的。社會制度是歷史的階段性型態，文化精神的理性之光是永恆的。21世紀既屬於東方，也屬於西方；21世紀是我們的，是你們的，也是他們的。總之21世紀是大家的，它屬於全人類。

因此如果需要對21世紀的進程作出某種預測，我認為經濟的全球化、現代文明的普世化是必然之趨勢，但各個國家的經濟模式和文明的類型卻不必也不可能完全整齊劃一，本土文化資源的整合必定是各該民族國家追尋的既定目標。“全球化”的理想是令人神往的，因為每個國家都是地球村的一個住戶，誰不希望有一個好鄰居？但“全球主義”則是一個危險的口號，因為那意味著人類將接受霸權的主宰。當然我同樣不能認同“新亞洲攘夷論”，我認為那裡面也隱含有不祥之兆。

距今一千多年的宋代思想家張載，為了啟發人類的良知，寫了一本書叫《正蒙》，書中第一篇是“太和”，裡面有四句有名的話：“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這是對宇宙世界圖景的一種哲理認知。我相信他的話：“仇必和而解。”我們海峽兩岸，如今不是也已經走上了從“有對”、“有仇”到“和而解”的互利雙贏的歷史途程了嗎？已故的佛學大師趙朴初先生有兩句詩，寫的是：“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他說出了兩岸我們每一個人的心裡話。

看來能夠帶給人類未來真切曙光的，是中國的一個字“和”、兩個字“和合”、三個字“將無同”（晉時吊詭清談的“三語掾”，即無不同的意思）。



“同文”通兩岸 “促統”創未來

加拿大渥太華中國統一促進會共同主席 申麗珠

來港之前，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到加拿大進行國事訪問。日理萬機的胡主席，怎麼繁忙也要接見華僑華人和留學生代表。我兩次（2005—2010）榮幸地被邀請參加接見，合影，聆聽他的精彩演講。當講到我們關注的台海局勢時說“……兩岸同胞都是中華兒女，炎黃子孫，甚麼問題都可以談判，甚麼事情都可以商量，唯有分裂祖國不能商量……”。胡錦濤主席指出：兩岸同胞是“血脈相連的命運共同體”。這個血脈就是兩岸同文同種，同根同源，就是中華文化一脈相承的民族認同感。

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在祖國統一大業中具有強烈的聚合作用，這是一個十分寶貴的資源。利用同根同源的文化優勢，通過文化的傳播，交流，增強海內外同胞的民族認同感，促進對祖國統一的文化和心理認同，實現海峽兩岸統一，無疑是實現祖國統一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要充分利用文化優勢，把和平發展兩岸關係做好做大。

文化具有強烈的民族性，民族文化是民族精神的載體和民族形象的標誌；是民族凝聚力和民族發展的重要源泉。每個國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獨特文化，這才使得一個民族之所以不同於另一個民族，也才使民族文化對本民族具有獨特的思想和心理影響力。文化，在國家，民族統一中有著其他方式難以企及和替代的作用。這種作用，是由文化自身所固有的某些特點所決定的。首先，文化是一種環境，人總是生活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文化環境中，文化環境以它客觀存在和難以選擇的方式影響著人的思想，心理和行為。其次，文化是一種生活方式，其中包括思考方式和行為方式，生活方式以它隱柔漸進，滲透薰陶和習慣化的力量影響著人們的思想，心理和行為，具有使人難以抗拒的作用。

文化具有規範的整體性，文化的整體性一般是以民族為單位形成的。整體文化中的各種因素是相互制約，相互補充，共同起作用的。其中任何部分的變化，都要受到其他部分的牽制。文化內部的這種相互牽制，使某種文化總體不易被其他文化所打破，也不易為異文化所吞噬，表現出相當大的凝聚力，文化的整體性為一個民族保持和發揮文化優勢提供了可能性，也為民族凝聚力提供了精神保障。中華文化歷經五千年不曾中斷而一直延續至今，就是以其巨大的凝聚力和包容性而使中華民族得以不斷發展，頑強地屹立於世界之林。

我們中華民族具有五千年光輝歷史，具有璀璨奪目的中華文化，具有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我們的祖祖輩輩在這片幅員遼闊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創造財富。但是，由於外來侵略者和民族分裂主義分子以文化分裂製造民族分裂的種種複雜的歷史原因，致使海峽彼岸的台灣寶島與大陸隔離開來，造成兩岸同胞骨肉分離。六十年分治，一灣海峽，溝深浪急，萬重雲山，目遮路擋。但是文化認同、民族認同沒有發生根本

性變化。兩岸同屬中華民族，同受中華文化的教育和薰陶，都承載著振興中華文化的重任。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神聖領土的一部分，凡是一個真正的中國人，都不容許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將台灣從中國領土上分割出去。旅居海外的華僑華人，要自覺地承擔起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業的責任，當做是祖國人民賦予自己的不可推卸的歷史使命。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的深入和中國國力的不斷增強，中國與世界各國的交往越來越密切，走向世界的華人也越來越多，華文報紙也就應運而蓬勃地發展起來。都說，世界上有人的地方就能看到華人的蹤影，有華人的地方就能找到中餐館，現在是有華人的地方，就有華人媒體，無論是報紙，雜誌，還是電視、廣播、中華文化已通過各種管道傳播到世界的各個角落。

中華文化的影響力日益提高，其中眾多的華僑華人在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我本人在渥太華《加華僑報》曾任編輯，溫哥華《中華時報》聘任特約記者，多年來一直在華人社區致力於宣傳祖國和平統一的基本國策，同時自覺地抵制和批駁分裂勢力製造台獨的輿論。一直在宣傳祖國經濟騰飛，國際地位空前提高的新面貌。同時一直活躍在華人社區藝術舞台上，為弘揚中華文化作出不懈努力。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作為炎黃子孫應該做的，我還會義無反顧地繼續做下去。我的演出以及社會活動受到“渥太華中文電視”關注、專訪，錄製成“在加拿大重塑自己” DVD播放，並榮幸地被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收藏，獲得“榮譽證書。這一鼓勵將使我更加自覺地履行華僑華人在“促進中國和平統一”的責任感。

我非常感謝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為我們華僑華人提供了這個論壇，使我們有了一個很好的交流平台，我願借此機會，廣交朋友，探討人生，共同發展，我希望這樣的論壇今後定期舉辦。



獨台意識對兩岸政治互信的利與弊

台灣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國際關係組碩士生 王炳忠

曾經在台北一家中學英文補習班擔任教師，遇到幾個十四、五歲的學生對著我說：“老師，你說話好像中國人喔！”當下，我著實愣了一下，在心中暗忖著：“難道我們不是中國人嗎？”

許多大陸的朋友，也許便會將上述這類學生冠以“台獨份子”的名號。然而，他們當中不少人卻自認是反對台獨的，他們大都在統獨傾向調查中聲稱主張維持現狀。細究其國家認同，這類人對“中華民國”自是當然接受，但他們心中的“中華民國”是與台灣劃上等號的。在他們的邏輯中，由於“中華民國”等於台灣，中華民國國民與台灣人就成了一個概念，“中國人”便是非本國的外國人了。

這種不追求“法理獨立”、卻自我想像台灣已成為一個名叫“中華民國”的國家的意識，因與追求“法理獨立”的台獨意識有所不同，故宜另稱之為獨台意識。1990年代以來，李登輝為鬥爭國民黨內所謂“非主流派”而炒作“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獨台論述，繼而有2000年後陳水扁為贏得選舉進行的假台獨、真法西斯運動(對內部泛藍的攻擊重於外部中共，對去中國化的在意更甚於法理獨立)，台灣社會在二十年間已瀰漫一片獨台意識。1987年台灣解嚴後出生的一代，幾乎成了獨台意識的最佳代言人。

目前兩岸ECFA已然簽署，兩岸的談判進程必然從經濟領域走入政治領域。事實上，兩岸間的事務沒有一項不是政治，差別只在其政治成份的高低不同而已。由於兩岸關係的政治定位始終未獲解決，兩岸間的政治互信就變成左右兩岸談判進程的關鍵，而在台北的大陸政策必將深受內部政治影響的大前提下，獨台意識這股台灣政治中盛行的意識型態就成了至關重要的因素。

獨台意識有其對兩岸政治互信正面作用的部分：它將促使中共更加顧全台北在意的對等與尊嚴，“大陸、台灣同屬一個中國”說辭的提出就是一例。然而，獨台意識可能使得台灣只思及自己的願景，而不願創造兩岸共同的願景，對兩岸走入高階政治的談判產生阻礙。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獨台意識容易使得台灣與大陸進行意氣之爭，為掩飾因權力不對稱而生的自卑感，反而展現出一種輕視大陸的自傲，而對大陸的現況產生不正確的認識。

更令人擔憂的是，兩岸同時出現了一批法西斯的激憤之士。台灣的獨台意識與對岸盛行的愛國主義，其實都蘊含了危險的法西斯成份。台灣不少人總愛刻意在大陸人面前強調自由與民主，動輒將大陸的政治禁忌話題掛在嘴邊(有些在大陸根本也稱不上“禁忌”)，以此來滿足內心的尊嚴，其實不過顯露了低俗的自大與無知。大陸亦有對歷史了解不清、心胸狹窄的憤青，每每在台灣選手於國際賽事中持中華民國國旗領獎時，粗暴地將選手身上的國旗扯下，將所有關於中華民國的符號視為台獨分裂勢力，嚴重地破壞兩岸人民的感情。海峽兩岸本屬一個民族，因為上世紀國共兩黨的對立而變得相互仇視，至今跳脫不出民粹法西

斯的糾葛，實為中國人千百年來最大的悲劇。

從台灣方面觀之，深層的問題在於朝野對台獨的曖昧態度。許多人或許以為，主張中華民國在台澎金馬獨立，和中國大陸是兩個不同的國家，並不能算是台獨，只是維持現狀而已。但分裂與分治概念不同，無論從《中華民國憲法》或《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來看，中國的主權與領土都從未分裂，僅是因分治造成“國家尚未統一”而已。有學者以“主權在民”觀點出發，認為《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已將中華民國主權局限於台灣地區人民，因此台灣人民可跳脫原先憲法一中的架構，自決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怎樣的關係，統一不能是唯一選項。筆者無意在此進行憲政辯論，只想提出一個擺在眼前的現實：台獨也好，獨台也罷，任何改變一中架構的嘗試就是破壞領土與主權的完整，就是中共界定對台動武的時機。台灣朝野既不敢真正落實法理獨立，卻又礙於民粹政治屈從於“中華民國等於台灣”此等似是而非、自欺欺人的論調。長久以往，傾向獨立的論述似乎成了政治正確，而主張統一的就是叛國。這種不健康的思想氣氛，嚴重壓抑了台灣人民理性研究統一條件的機會。

從大陸方面觀之，深層的問題則在於中共始終不願意正視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早期中共視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為“死亡政權”，認為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既已成立，中華民國便已遭推翻而滅亡；1979年發表“告台灣同胞書”之後，則趨向將台灣視為“地方政府”，強調中央政府在北京，但允許台灣在國家統一後設為特區。中共在取得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後，為穩固自身“中國正統”的地位，對“中華民國”的打壓可謂無所不用其極，而中華民國政府為參與國際社會，只得改用中華台北、台灣、台澎金馬等名稱。1994年，台北陸委會發表《台海兩岸關係說明書》，宣稱“中華民國政府不再在國際上與中共競爭“中國代表權””，台北不再在意自己是否為中國，反而更樂於被世界認作是台灣，以凸顯自身獨立於中共/中國之外。中共對中華民國的打壓，給予了主張“台灣正名”者看似合理的藉口：“既然‘中華民國’走不出去，乾脆以台灣取而代之”。舊版“一中三段論”將一個中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劃上等號的說法，更造成了極大的後遺症：如果認同中國等於認同中共，那麼絕大多數的台灣人都無法接受，一個中國便很容易成為毒蛇猛獸。上海東亞研究所所長章念馳日前發表《中國必將走向最終統一——評曹興誠的〈兩岸和平共處法〉》一文，呼籲中共應正視“中華民國”、創造條件解決“中華民國”的難題，便是一個十分正確的態度。須知：“中國”在台北的代表就是“中華民國”，打壓“中華民國”，也等於為台獨勢力製造氣燄。

主流的獨台意識始終無法轉變成台獨意識的原因，在於台灣人民十分務實，要他們真的為台獨拋頭顱、灑熱血，顯然是做不到。說到底，台灣人不像東南亞某些國家的人民那麼激情，動輒聚眾示威，傳統儒家溫良敦厚的性情仍是多數台灣人的性格。再者，台灣文化與大陸係出同源，生活習慣相近，又沒有種族、宗教的差異，實在很難要台灣人視大陸人為外族。儘管如此，台灣人認同自身為中國人的比例卻也不高。獨台意識有其可塑性。它既可能傾向於期待大陸逐漸變化，而使統一水到渠成；亦可能傾向於永遠維持現狀，與對岸中國和平相處。2009年正值兩岸分治一甲子，台灣《遠見雜誌》一份《兩岸民眾互看價值

觀關鍵調查》發現：台灣人看大陸是生意夥伴，大陸人看台灣則是家人親戚。這就有如中美兩國可以是戰略夥伴關係，但彼此絕對具有你我之分、互認不是一家人。如此看來，台灣社會的獨台意識正引領台灣人傾向永遠維持現狀。對於此一趨勢，支持國家統一的有識之士不可不慎察之。

獨台意識對兩岸政治互信而言，正是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北京的執政者不妨想想：“寄希望於台灣人民，更寄希望於大陸當局。”正如台灣大學教授張麟徵所建議：大陸政府若能與人民齊心協力的努力，把大陸建設好，使大陸對於台灣、乃至於全世界都散發一種致命的吸引力，則統一終究是水到渠成，又何須害怕務實的台灣人不靠過去呢？



促進兩岸家庭文化交流的思考

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副院長 陳少峰

隨著兩岸簽署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以及兩岸各項交流的不斷深化，兩岸之間的互動與合作，已經從單純的經貿交流轉向經貿、文化、教育、政治等全方位的交流，從文化產業的比較單向的交流（以台灣方面的文化內容對大陸同胞的影響為主）轉為雙方平等互惠的交流，從文化共識轉向文化與文化產業的同步互動交流，從一般的文化產業交流轉入專業化和深度化的文化和文化產業交流。

文化和文化產業方面的交流已經成為兩岸交流的新熱點，同時也為兩岸文化教育的深度交流開闢了新路徑。其中，兩岸在家庭文化方面和文化產業方面的交流合作，可以開創一個重要領域，並且將極大地造福兩岸青少年和家長們。

挑戰與機遇

家庭教育和家庭文化決定著孩子們的未來，也決定家長素質的提升和家庭的和諧。然而，當前家庭的文化教育依然面臨著眾多的挑戰，比如代溝問題的不斷深化，比如數位化時代娛樂方式及其對於教育帶來的挑戰，應試教育制度下的綜合素質教育的缺失，面向家庭文化產品的不足，兩岸之間的家庭文化交流和青少年文化交流不足，不同群體對於隔代教養的態度與意願等，都給兩岸家庭教育、家庭娛樂、家庭和諧等帶來了新的課題。

當然，在面對挑戰的同時，我們也應清楚看到，兩岸共同擁有許多能夠為家庭文化教育帶來積極影響的寶貴資源，諸如：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語言文化同源，同受儒家文化影響，在青少年教育問題上，共同信仰和價值觀所導致的文化教育難題也大同小異。在兩岸有識之士的共同努力下，兩岸方面也分別出台了眾多支持文化和文化產業的相關政策，學界也已貢獻了一大批重大的家庭教育、家庭文化方面的好的科研成果，這些都為兩岸家庭文化教育的開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從“家庭和諧”的角度來說，打造兩岸家庭文化交流中心，可以促進“和諧家庭”的文化與教育。它不僅體現在對夫妻關係的改善而言，也體現在促進兒童的文化教育好素質教育，特別是體現在下一代的知書達理、善於溝通、性情開朗、活潑可愛等方面，在家庭生活中為家庭和諧美滿創造有利條件。

打造兩岸家庭文化中心也是一個可以實現雙贏的方式。通過兩岸具有深度關切的課題來開展溝通與合作，可以提升兩岸文化交流的水準，擴展兩岸文化交流的管道，促進兩岸文化認同感和家庭教育水準的提升。此外，只有通過發展家庭文化產業，不僅可以開展兩岸的文化產業，而且可以共同為擴大中華文化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做出貢獻。

從創新的角度來說，打造一個集兩岸家庭文化與文化產業兩個方面內容的基地，是一種結合兩岸交流的新探索。包括集合家庭文化和文化產業交流的資源、資金和已有各項政策支援，可以作為兩岸文化產業合作的新試點。

目標與方法

對於兩岸在文化產業的目標來說，它們各自對兩岸家庭文化交流中心的期待將略有區別。大陸方面將更加重視內容的傳播，特別是針對未成年人的文化教育體驗和文化傳播，以及家庭文化的經驗交流。台灣方面以促進文化產業發展為主，以產業化的成果和大陸文化市場的開拓為主要訴求。

圍繞著文化產業的目標，應當突出教育交流，同時大力發展繼續教育產業。一方面，從素質教育的角度來促進家庭教育、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的有機統一，培養家長好青少年們的禮儀、品德、健康心理、科學思維和社會常識。另一方面，從創新的角度來說，結合新時期的文化傳播和教育環境的變化，共同打造數位化家庭文化教育網路。隨著網路應用的普及，如何應對網路化時代的文化為家庭教育帶來了新的挑戰，兩岸家庭文化交流中心在網路化時代建設方面應當擴展教育內容，包括網路娛樂、網路學習、手機媒體等。易言之，網路化時代的家庭文化產業也應當包含全新的商業模式。通過家長教育來影響家庭文化和未成年人的娛樂，是一個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法。

家長是孩子的啟蒙老師，教育的結果好壞與家長的教育理念、方法密切相關。在兩岸家庭文化交流中心開設家長培訓的內容至關重要，家長培訓可以包括家長學校、家長經驗交流會、面向家長的專家講座等，著重圍繞針對家長如何培育孩子的綜合素質問題展開。通過家長培訓，積極引導家長形成一種好的習慣諸如引導興趣、啟發思維、鼓勵榜樣、親子溝通等；以及矯正各種家長的不正確教育方式，是一種新的家庭文化素質教育方法。

當然，家長和兒童的文化教育體驗必須一體化。因此，親子體驗是兩岸家庭文化交流中心另外一個重要內容，親子體驗的理念主要是讓孩子在玩當中學習、在玩樂中培養品德、矯正不良習慣，達到寓樂於教的目的。例如，兩岸家庭文化交流中心引導人們消除各種誤解、歧視以及對各種挑戰的恐懼心理，讓家長和子女在溝通中學會了解、包容、尊重和欣賞優良品德的能力。

通過兩岸教育文化機構組織的各項交流與合作，是一個促進中華文化好素質教育共識的重要途徑。兩岸家庭文化交流中心將增加兩岸的交流體驗，促進兩岸的家庭交流、學校交流、兩岸中小學校長交流、青少年交流等。利用新媒體等手段，輔之以故事中華文明史、傳統國學等兩岸血脈相連的文化內涵，加強中華民族歷史和文化的傳承，配合經驗分享、研究交流、互派講學、合作研究、研修學習等多層次的專業交流的力度，為兩岸文化教育交流提供更大的平台。

文化交流與文化產業集聚

兩岸共同打造文化產業集聚園，是文化產業合作的新思路、新角度。兩岸文化產業集聚可以包括數位

文化產業、設計與藝術產業、家庭文化產業等方面。其中，從家庭文化的角度來拓展兩岸文化產業合作，可以形成專業化的交流和產業集聚的新平台。

兩岸家庭文化交流中心不僅是個文化教育交流的平台，也是個文化產業集聚園區。這裡不僅可以有比較完善的文化教育內容的系統化提供，還可以打造完整的產業鏈，提供數位文化產業的資源整合，集聚優秀文化教育企業，共同打造以素質文化為核心產品的文化教育的新模式好產業發展新格局。家庭文化產業集聚的內容和產品可以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它是以學術支撐為基礎的兩岸文化交流的平台，包括：研究和發佈最新研究成果，如家庭文化研究報告等，為業界提供可資參考的資料、方法。開展專家共同的創新理論研究，借助教育學、社會學、心理學、文化學、人類學、倫理學等學科的視野、方法論和研究成果，找到自己的研究範式，將理論系統化、邏輯化，形成家庭文化教育完整的理論體系。舉辦各類家庭文化教育的公共講座，開展各類專題輔導和研修學習。舉辦多層次的兩岸家庭文化論壇，每次論壇結束後及時跟進論壇成果發佈好媒體報導，形成對品牌的持續化行銷。

其次，打造一個兩岸家庭文化交流的網路平台。建設一個官方網站，建立有效的家庭教育指導網路，使更多的父母和孩子能夠接受科學的教育培訓。同時，建設一個全球華人的家庭文化網，促進中華家庭文化教育的國際傳播。

再次，吸引重要的家庭文化教育的培訓企業入駐。吸引包括中小學生和家長的素質教育培訓企業入駐，共同開發產品並形成產業鏈形態的模式，包括系統的培訓體系，體驗性的內容好活動，相關產品的配套整合，以及數位化的互動平台建設等。作為家庭文化教育的權威性平台，兩岸家庭文化中心也可以負責推薦好的、健康的家庭文化教育產品，並成為家庭素質教育產品的評價中心和權威測評中心，成為家庭文化教育實施的指導中心。

最後，兩岸家庭文化交流中心也能帶動所在地城市文化教育與經濟的發展，其所在的新型家庭教育產業園不僅可以豐富和提升城市家庭文化，而且為城市吸引客源，包括交流、參觀和旅遊等，同時提升該城市的品牌價值。

台灣學子高教新選擇—求學西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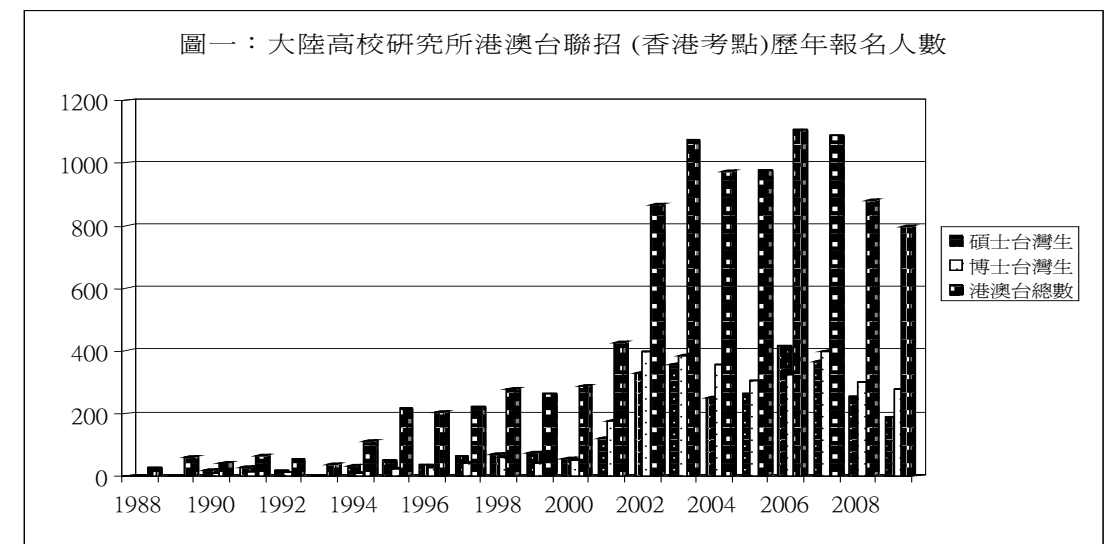
台灣夏潮聯合會秘書 李中

前言

近年來，大陸經濟改革的發展帶動了國際局勢變化，中國大陸躍身世界各國趨之若鶩的最大市場。於此同時，台灣每年前往大陸高校的就學比例有逐年成長的趨勢。相較於向來崇尚留學西方的選擇，到大陸求學儼然成為台灣人的新興途徑。台灣學生在大陸求學所需花費的學費、生活費相對低廉，尤其語言文化近似，加上大陸高校對於港澳台生的優惠政策，在在都是讓報考人士心動的考量。

求學西進

從1985年起，大陸高等院校開始招收台灣地區學生，當時由於兩岸交流剛開始起步，台灣民眾對赴大陸求學的訊息無法得到確實的掌握，每年前往的人數皆在個位數。1990年以降，中國大陸教育部迄今開放了約220所高校，接受台灣人士報考，並提供多項優惠措施，以擴大對台招生工作。據統計，1985年至2000年大陸高校招收的台灣本科生2,895人，研究生864人；而2001年至2004年四年間，共招收台灣本科生2,875人，博士、碩士研究生2,766人。2004年，台生到大陸求學人數創歷史新高，達到1,777人。直至2009年度為止，在大陸高校就讀本科、研究生包含取得學位的台生，已超過30,000人。就香港考點的統計數字來看(圖一)，歷年報考港澳台聯招的碩、博士人數自2000年開始就有逐漸攀升趨勢，特別是兩岸加入WTO之後的2002年度，人數更是呈倍數增加。



研究生報考院校部分就地點而言，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及福建沿海地區。尤以廈門大學、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為每年的報考熱點；上海財經大學、南開大學、蘇州大學由於尚在少數維持招收兼讀生的院校之列，是在職生首要考量；中國政法大學是唯一開放得以同等學歷報考博士，因此受到許多從事相關法律行業人士的青睞；北京語言大學則是由於專業上的特殊性而吸引許多應屆畢業生報考。

最早台生前往大陸，主要就讀本科生，專業較多是中醫藥、傳統文史哲和少數特殊體育項目。爾後，隨著兩岸加入WTO且彼此經貿交流逐漸熱絡，專門技術人才需求增加，考生的性質也隨之調整，有約達6成的社會人士前來報考研究生，專業選擇上則集中於法律、會計、建築項目。而大陸方面亦陸續開放就業條件及證照考試，於此，台灣有不少已是金融、保險界的高階主管相應欲經由就學途徑，一方面爭取學歷進階，一方面透過校園生活來建立人脈、熟悉當地整體環境並取得大陸專業證照。

台灣的留學歷史樣貌

台生赴陸求學的研究中，最多的結論就是“台生基於前途發展考量，在看好大陸市場的判斷下，透過求學方式先行前往”。但若純然以大陸個別的經濟發展，便將這樣的求學潮視作兩岸關係中的自然趨勢，似乎不足以說明其必然性。

現今台灣，從政府官員到教育部，無不以宣示性發言或政策來鼓勵推動台灣留學生前往的美國，則早在1950年就列於台灣主要留學國的首位，且1950年—1990年間的留美人數皆達總留學人數的9成以上。

五十年來通過人員培訓、人員交換和留學政策十分成功地在台灣培育了大批滿腦子美國價值的留美精英，由他們廣泛、深入地佔據了台灣政界、官僚系統、產業界和文教學術界的結果。美國意識形態和價值體系成為台灣朝野精英共同的想法和意志。

過往，由於美國意圖維持西太平洋防線的冷戰結構，一方面對台灣提供大量的軍事及經濟援助；一方面藉教育之名，以優渥的獎學金制度招攬大量台灣學子前往深造，藉此培植親美的知識菁英，作為美國國家利益在台灣的代理人。因此，篤信美國式生活方式及意識型態的留美知識菁英，數十年來盤根錯節的支配著台灣的政治、經濟、教育、文化與新聞傳播等社會領域。然而，即便包藏美帝殖民思維的留美體制廣受批評，許多學子仍然認為學習美國經驗是台灣邁入“現代化”發展道路的唯一途徑，也是個人職業生涯的晉升之途而絡繹於此。加諸，許多工農家庭認為接受高等教育，進入高等學府，才有階級翻身的機會，於是，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成為許多人終其一生所奮鬥的目標。

2000年以後，在跨國公司的出現下，各個民族國家之間形成了一個新的網絡結構。過去國與國之間的分工關係，在跨國公司的序列分工下被打破，全套的生產過程被拆零到不同的國家，形成“區域製造網絡結構”。這個結構改變了原來民族國家彼此間的從屬關係。這當中，已經不再是國與國之間的關係，而是要形成區域一體化的發展。全世界，包含台灣以西進求學潮表現出與中國大陸的聯繫，都嗅到了大陸市場發展的崛起，而台灣政府卻因政治上的自恃，錯失與大陸聯繫以面向世界市場的機遇。在進一步理解到台

生前僕後繼地投入這波大陸求學熱潮之時，卻也為台灣政府始終邁在“計劃明朗、政策緊縮”的進程不勝唏噓。

小結

今天的中國大陸，對台灣而言不再只是資本市場、商品市場，從報考大陸高校的台生性質分析來看，就如陳福裕所說“今後的發展，它將是台灣高教育水準、高技術水準的成人勞動力的出口市場”。時至今日，兩岸之間頻繁的交流互動，似乎透露出兩岸關係日漸明朗的和平契機。然而，政策上，台灣政府卻仍將自身困於政治層面與個別利益衝突的考量。與上萬名台灣學生息息相關的學歷採認事宜遲遲跌宕不明，在採認政策規劃中亦設下多重限制，其規劃與當局的教育政策背道而馳不說，更犧牲了上萬名台生的基本權益。

若台灣政府切實地替人民著想，冀望留住人才並提升台灣的國際競爭力，就應該認識到，意識形態鬥爭所產出的不合理限制，只會把在大陸學有所成、累積專精後，有意返台服務的台生關在自家門外，造成更大的人才損失。與其畫地自限，不如把握目前兩岸之間和平發展的大好契機，在大陸學歷採認制度上有更審慎的安排，配套規劃台生返台就業措施、鼓勵陸生來台學習以促進彼此的認識與交流，才是台灣當前在兩岸關係上的發展要務。



中國書畫藝術與中國和平統一

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 司徒乃鍾

中國書畫藝術是一種無聲語言，是我們中華民族在世間獨自擁有珍貴的祖宗文化遺產。

中國書畫藝術是我們中國儒道佛三家精神滙蓄，是我們中華民族文明，和平，禮義之邦深厚文化大國風範的結晶。中國書畫自古以來都象徵了教化，友誼，國家理想，傳道，個人感受，思古幽情，歌頌表揚忠臣烈子，等等。

例如孫中山先生就經常書寫“天下為公”，“博愛”，以表達他的理念思想。

台灣領導們回鄉祭祖，探訪老家都題字留念，用書法表達心情。

宋楚瑜先生歷史性地拜訪胡錦濤先生都是拿著一張中國畫為禮物在古代，印刷業未像今天這樣普及的時候，我們的科舉，宗教傳播都離不開書法和繪畫。

近年我們華人經濟普遍上升，因為藝術是經濟的花朵，學習文化藝術的風氣隨之普及。值得一讚是全國各省，市，全國的政協現在都普遍設立詩書畫室。一來以身作則提倡國粹，二來以藝會友，增進個人自己學養，加強人與人間友誼，同時可以聯誼各地對文化藝術有同好人士。世界上真正學習書畫藝術的人心中是沒有疆界、地域、甚至朝代和時代之分的。對藝術追求者愛好者而言，您有好的藝術作品，展覽會兩岸四地的觀眾都會讚賞您的，例如我們欣賞張大千先生的畫，齊白石的畫。在香港拍賣時追捧的競投者濟濟一堂，兩岸四地都有。過去的清明上河圖展在港澳展出，我就在展覽場見了不少兩岸朋友正在觀賞。

兩岸四地，因為時局，時代關係，可能有時保守，有時開放。在5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及千禧年代，以至今日2010年，儘管有段時間當年兩岸關係冷落，但兩岸四地藝術家們之間的聯繫，熱情關懷，互動，就一直未有間斷過。例如台灣過海三家之一的黃君璧大師(當年蔣介石夫人宋美齡女士的國畫老師)就經常來港探親，並經常與畫家們包括先父在北角飲茶舊，互贈書畫留念，書法大師，有草聖之稱的於右任先生，就曾在50年代托人從台北帶來特別為先父畫室“蒼城畫院”寫的橫額贈與先父。

隨著世界華人經濟起飛，中國改革開放，在日益普及，兩岸的互動，互聯網、短訊，就經常有微聯，互相比試文采，互相唱和詩詞及文章的網上交流。

書畫方面更熱，個展、聯展，各種名目，專題，畫展藝術論壇，畫會組職個人名義，商業和學術都有。可謂非常繁多，不能在此一一列舉。

就以我個人熟識的嶺南畫派而言，在2007年8月在廣州嶺南畫派紀念館，就舉行了一個《兩岸三地》(香港、廣州、台灣)的嶺南畫派邀請展，參展名家共有127人。開幕當日，兩岸三地藝術家和領導嘉賓聚首

一堂，作品水平非常高，氣氛熱非常。更有學術研討會互相交流心得，又一次證明書畫無疆土界域之分，書畫也是最佳兩岸人民和平接觸的文化活動。

今年四月廣東佛山市《石景宜，劉紫英伉儷美術館》舉行了一個盛大的“當代嶺南畫派名家邀請展”，在下有幸也是展出畫家之一。開幕禮當日，兩岸四地(穗、台、港、澳)的嶺南畫派精英薈萃一堂，觀家絡繹不絕，冠蓋雲集，可謂極一時之盛。石景宜博士伉儷之子，石漢基先生為了紀念此“嶺南畫派里程碑”展，除了畫展這個大型展外並特地出資出版了畫展專集贈送觀眾。在畫展後並一起與參展台灣、內地、港澳畫家嘉賓們赴韶關，訪問參觀了丹霞山，韶關大學，南華寺。

今年還有一件大事值得兩岸，以至全球書畫藝術界鼓舞的事情向大家報告，就是“石景宜博士盃”華夏書畫大賽的舉行，現正在全球、兩岸四地徵稿之中，這個比賽也是石漢基先生和他們的家族出資出力，本人有幸充當義務統籌，經過了一年半的籌劃時間，得到各方籌委，藝術同盟，顧問的認可。比賽徵稿啟示已登在各地報章、書畫雜誌，書畫報章。報名表格除了上網外，更可以在世界各大城市有關機構拿到。這個比賽除獎金豐富外，更有精美畫集出品，並將巡迴六個城市，明年2月將在北京、佛山，澳門，4月在香港、台北、高雄等地展出。

書畫藝術是我們兩岸和平共融最佳橋樑和高尚文化活動之一。我個人希望不久將來有更多的兩岸企業家能像石景宜博士，石漢基先生父子等出錢出力，關注、鼓勵兩岸書畫藝術發展。

站在我一個終身從事藝術和藝術教育的書畫人角度來說，我也希望我能學以致用，為祖國和平統一大業貢獻一份力量!

兩岸文教交流之契機與新局

台灣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教授 余小云 邵建民

2008年5月，中國國民黨重新執政後，將兩岸關係推至歷史新高峰，兩岸各項交流互動熱絡而頻繁地展開。其中，兩岸的文化與教育交流領域，基於兩岸間共通的文字、語言與血緣的共同文化認知基礎上，其交流互訪活動如雨後春筍般興起，加以文教交流較不涉及政治敏感，係屬相對中性的兩岸交流領域，故舉凡藝文研究、創作展演、出版品、新聞、廣電、體育、科技、宗教、學歷認證、陸生來台就讀與台商子弟在陸就學，乃至大專青年學生、原住民等之文化交流活動等皆涵蓋其中，並在兩岸雙方認同與相互接受前提下，展開更大範圍的交流。其中，又以學術和教育的交流最為頻繁，其次科技、表演藝術與宗教亦是兩岸文教交流的重點(見附表一)。

附表一：大陸地區文教專業人士來台從事交流實際人數統計

種類 日期	學術類				藝文類							大眾類			其他類
	學術	教育	科技	體育	文化資產	表演藝術	視覺藝術	綜合文學	少數民族	宗教	新聞	出版	廣電		
2008年 1-12月	2719	6507	2208	1214	215	3008	526	238	43	1079	397	774	871	930	
2009年 1-12月	4039	8894	3143	1423	463	3826	1447	158	146	2120	626	671	1545	1655	
2010年 1-5月	1817	4857	1461	681	201	2726	730	120	64	1632	356	282	584	942	

資料來源：行政院大陸事務委員會，<http://www.mac.gov.tw>

以台灣文化而言，其本源自中華文化的共通歷史脈絡中，但又從中歷經了特殊的六十年民主法治洗禮，而脫胎轉型並孕育出開放、自由的新台灣文化，對於中國大陸固有之中華文化思維應具有啟發與激勵作用。另一方面，具有傳統典範的中國文化教育事務，不少則是中國五千年來先人所遺留的經典寶藏，其間所錘煉蘊藏之中華文化精髓，勢將豐富並活化台灣的海島文化。事實上，兩者間文教領域事項交流之加強、激勵、互動與合作，不但可增進兩岸人民福祉與拉近兩岸同胞感情，且可維護並擴大偉大中華民族的整體發展利益。因此，值此兩岸政治氛圍和緩之歷史契機，兩岸政府更應加大深化兩岸文教的各項交流，以共創中華民族的文化教育事業之新局。

文教交流過程中，以各大學之學術交流互訪、大專生的相互研修最為熱絡，以中國文化大學為例，在張鏡湖董事長的務實領導下，早於二十多年前即開啟兩岸文教交流活動之窗，目前業已與中國大陸33所高等院校締結了姊妹校，舉凡書籍出版、辭典編撰、師生互訪、推動表演藝術活動等，皆有豐碩成果，對兩岸文教交流事業貢獻卓著。

另外，兩岸近年來不約而同地將文化創意產業列為兩岸文教重點交流發展事項。文創產業是一個新興文化傳播與知識創新的產業，兩岸的文創合作，可謂開啟中華文化寶庫的鑰匙。誠如前述，台灣方面，一向精於文創產業的資本營運與創意設計，大陸方面，則提供了文化資源的巨大市場，兩岸文創產業實具有互補、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效應。舉例一二，台灣廣播電視節目製作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汪威江曾表示，台灣把文創產業細分為16個項目，如果兩岸在文創產業的分類上能夠進行合作，將有利於今後兩岸文創產業的對接，大大提升中華文化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又如：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田青以兩岸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交流與合作為例，指出兩岸在對傳統文化的保護和繼承上可以進行廣泛的合作，則可讓世界認識到中華文化的巨大魅力，讓中華文化彪炳史冊。再如：2009年台灣領導人馬英九提議兩岸合編《中華大辭典》，2010年3月兩岸專業工作者已開始積極溝通與籌備，並訂出編纂步驟，著手實際作業，預計三年內可完成。兩岸專業工作者在編撰辭典方面的合作，將陸續完成常用語、科技用語、中小學語文等辭典。不遠的將來，兩岸就不會出現如納米一奈米、雷射一鐳射，這樣漢字不同而意思相通的新詞。總而言之，兩岸政府若能確實落實上述之相關文教政策與合作，並達成相關之交流合作協議，則將有助於兩岸文教事業發展，以及進一步推動中華文化在國際社會中的重大影響力。

不過，儘管兩岸的文教交流已呈現如火如荼、廣泛、熱絡而頻繁之互動，但是目前兩岸文教交流中最為頻繁的學術與教育方面，卻面臨無法有效落實對大陸學歷的認證。根據一項最新統計，目前大陸298所高校與台灣108所高校有簽訂交流合作協議。2009年大陸共計有2,000位學生赴台研修，而台灣則有6,755位學生在大陸就學。大陸在2006年業已承認台灣學歷，但台灣方面教育部基於大陸學歷採證問題，認為非單純教育議題，涉及國家安全、社會發展以及高等教育結構層面等問題，擬採漸進原則，在參酌其他國家之辦理經驗及實際了解大陸高等教育發展狀況下，需配合政府整體大陸政策而審慎推動之。因而，台灣方面採“三限六不原則”，所謂“三限原則”指：“限制採認高等學校”、“限制來台陸生總量”及“限制學歷採認領域”。限制採認高等學校，指僅認可學術聲望卓著、辦學品質績優之大陸地區高等學校，以確保來台學生有齊一品質；限制來台陸生總量，為台灣招收大陸地區學生總數將有所限制，原則上各校招生人數在核定招生總數之百分之二以內，但來台陸生總數不得逾核定招生總數之百分之一，約計2,000人；限制學歷採認領域，係不開放大陸地區所有涉及台灣證照考試相關高等教育醫事學歷之採認領域。

“六不原則”為：“不會加分優待”、“不影響台灣招生名額”、“不編列獎助學金”、“不允許校外打工”、“不會有就業問題”及“不得報考公職人員考試”等六項。不會加分優待，指陸生來台就讀或考試，均不予加分優待；不影響島內招生名額，為陸生來台就讀採申請制，並以外加名額錄取，不會排擠

現有台生之升學機會；不編列獎助學金，係政府不編列預算作為陸生獎助學金；不允許校外打工，是指來台之大陸學生不得於校外打工或兼職，來台陸生需準備在台生活費及學雜費；不會有就業問題，為陸生停止修業或畢業後不得續留台灣；不得報考公職人員考試，指大陸地區人民依法不得報考台灣“公務人員考試”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如公務人員高等或普通考試、會計師、建築師、律師等執業資格考試等。

此“三限六不原則”是因應台灣現階段之教育環境及經濟、社會所需而研擬之原則，鑒於大陸高等教育品質快速提升，世界各國多予以承認，從全球化觀點而言，高等教育全球化是時代、世界之潮流，台灣不應因為政治的因素而自我封閉，排拒包括大陸在內之高教全球化浪潮。依台灣教育部在2009年11月宣佈之政策規劃重點中，將承認學歷的大陸高校，以“985工程”的39所頂尖大學為主，在扣除“解放軍國防科技大學”之外，加入北京體育大學、中央音樂學院、中央美術學院等3校，共有41所。預期台灣若再放寬採認大陸高等教育學歷，則不但符合世界潮流外，亦可促進兩岸文教交流，將有助於兩岸之和諧發展。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台灣的技職教育與德國、日本、澳洲並列全球四強，具有相當之世界競爭力。在大陸技職教育只有專科階段情況下，台灣當局若能如期於2010年8月立法院順利通過攸關開放陸生學歷認證的“大學法”、“專科學校法”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等陸生三法修正案，則台灣之技職教育二年制技術學院或科技大學，將可銜接大陸專科學生來台就讀，這是台灣技職教育的優勢，其巨大之技職教育市場，將帶來台灣龐大商機和可觀效益。因此，在面對落實大陸學歷採證議題時，期盼台灣立法院能擺脫政治糾葛，朝互利共惠方向努力，回歸教育專業本質，以致力兩岸青年相知互信的交流為重，為兩岸高等暨技職教育開展一片藍天，這才是兩岸教育的百年大業。

總而言之，在全球化的今日，值此兩岸關係正處於相對和諧、穩定之時，加強兩岸間文教交流，勢必有助於兩岸人民之間的心靈溝通與社會文明之提升。更重要的是，藉由兩岸多層次、多項目、多種類的廣泛而大量的文教交流，這股經由相互滲透、彼此交融的兩岸人民情感和力量，假以時日，勢將會在潛移默化的交互影響中，逐步增進兩岸人民彼此間的了解、互信與認同，最後超越意識形態之歧異、衝破政治的藩籬，營造出兩岸共榮雙贏之新局。

三個故事的啟思

原香港城市大學校長 張信剛
〈根據錄音整理 未經本人審閱〉

剛剛聽到前面幾位的演講，對我來講是一個心靈的盛宴，我很滿足了。既然來到這裡，我想講3個親身經歷的小故事。

第一個故事講的是1980年，我當時為加拿大一所大學醫學院生理學教授。那年全世界的生理學會，國際生理學會在匈牙利的布達佩斯召開生理國際會議，我去參加了。參加會議的也有從內地來的，也有從台灣去的，也有兩三個跟我一樣是從北美洲去的華人。在那個年代，是三通還不可想像、ECFA都未有初型的時候。但源于血濃於水的感情，在會議期間，我們來自不同國家及地區的華人很自然有了交流。我建議我們這些能說華語的來個聚會，我們一起到餐館吃飯，那頓飯吃得非常高興。這也是一個心靈的盛宴，這是第一個故事。

第二個故事，兩年前，我在北京大學教書的時候，認識了一位從台灣到大陸讀書的女學生，她正在讀中醫博士。她告訴我說，現在在大陸讀書，學位不認可，回台灣沒有辦法當中醫師。她的話令我深思。我這一生就喜歡了解中醫，我自己是做生理學的。我們中華文化內一個相當好的瑰寶，值得我們繼續努力的研究和發揚，這就是中華醫學。中華醫學，在現代醫學的標準下，我們的中華醫學應該如何發展，我認為這個就是兩岸可以合作的時候。正如一位大師所言：“中國的醫術，有見效之功，無可通之理”。我覺得有很多奇蹟般的中醫治療方法都說不出道理來，很值得兩岸攜手，合作研究。在大陸學習醫術的學生回到台灣去不被承認學位，我認為是不對的。聽說這問題還未有解決，台灣的醫學院只承認台灣醫學的教授，台灣的醫學院還不承認大陸醫學院的學生，這十分可惜。

第三個故事，在2008年，我回去台北參加中學同班同學畢業五十周年的活動，我是台灣師範大學附屬中學(師大附中)畢業的。我們畢業後的五十年來還是有來往。我本來要授課時間不合，但我特意請了假到台灣。師大附中以前出了不少有名的人士，包括連戰、吳伯雄等等，他們都是師大附中畢業的。那天是2008年4月10日，我們六、七十歲的老頭，高唱現在還是師大附中校歌的校歌，其中有一句是：

附中青年 決不怕艱難

復興中華 相期在明天

今日的情況就如歌詞所說，我希望還有機會看到“復興中華 相期在明天”！

擴大兩岸文教交流 增強兩岸文化融合

台灣中國統一聯盟主席 紀欣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在7月9日於廣州舉行的“第六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開幕式”上強調：在加強經濟合作中，共同推進兩岸科技進步和創新，科技是支撐，教育是基礎，人才是關鍵。兩岸教育交流，應當更加注重圍繞提高兩岸競爭力這一目標，在培養高素質的勞動者，造就高層次人才等方面加強合作，為提高兩岸經濟自主創新能力提供智力支撐和人才保障。兩岸文化交流合作，也應當大力弘揚中華民族自強不息、勇於創新的優秀傳統，營造尊重人才、見賢思齊的社會環境和良好風尚。在全面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進程中，要努力使兩岸經濟、文化、教育交流合作共同推進、相輔相成，產生綜合效應，以提高全民族的素質，增強兩岸競爭力，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實現全民族的團結、和諧、昌盛。

與會的兩岸各界人士經過兩天的充分交流研討，在11日下午的閉幕式上提出22條“共同建議”，其中有十條與文化教育交流合作有關。這是繼2009年7月在長沙舉辦“第五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後，兩岸當局再一次共同宣示將擴大兩岸文化教育交流，推進交流的制度化、規範化，共同傳承和弘揚中華文化，意義重大。

今年有關文化教育交流合作的十條“共同建議”，內容豐富且具體，其中包括：鼓勵兩岸就協商文化、教育交流協議進行規劃研究，推動商簽工作儘快啟動；積極促進兩岸在合作編纂中華語文工具書、規範術語和專有名詞及建設中華語文技術資料庫方面獲得實質進展；繼續鼓勵和支持兩岸青少年，參加形式多樣的交流活動；加快推動兩岸學歷學位互認，鼓勵兩岸學生互至對岸學習研修，促進建立兩岸高等院校相互招生的聯繫與協調機制，建立兩岸學歷學位證件查驗及作業平台；建立出版物交流合作規範，繼續擴大出版物貿易和版權貿易；推動儘快實現兩岸媒體互設常駐機構；支持制定促進新聞交流與媒體合作的政策；完善兩岸廣播、影視、出版等業界溝通對話機制，鼓勵加強兩岸文創、數位內容、音樂產業的交流合作，支持制定兩岸合作發展文創產業的規劃及相關政策，共同開拓海外文化市場；推動落實兩岸智慧財產權保護合作協定，共同維護兩岸文化市場秩序，保障兩岸業者權益等等。

兩岸同文同種，同根同源，中華文化成為兩岸長期隔絕下，依然密切相聯的重要紐帶。文化也是消除兩岸政治分歧的最佳媒介；兩岸文化與教育交流不僅有助於兩岸關係現階段和平發展，也將使兩岸的中國人建立起共同的歷史記憶、文化認同和民族認同，並最終達成政治認同。筆者以為，承認兩岸同屬中華民族，同受中華文化教育與薰陶，甚至常以台灣比大陸更為重視中華文化傳統的中國國民黨執政當局，應該抓住兩岸大交流、大合作、大發展的時機，加緊推動文化教育交流，一方面徹底消除李登輝、陳水扁執政20年推行的“去中國化”、“文化台獨”，對於維護與發揚中華文化的不利影響，一方面確保與深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筆者希望，兩岸當局除能儘速遵循兩次論壇的“共同建議”，具體而為，一一落實以上十條建議，並能在兩岸經濟合作協議（ECFA）時代來臨之際，將兩岸文化教育交流擺上協商對話的議事日程，以增強兩岸文化融合，從而增進與擴大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互信基礎。

國共敵對宣傳應該休矣

台灣中國全民統一會青年部主任 陳沛雯

兩岸四地中華民族大團結，攜手聚會繼往開來，是21世紀的今天每一個炎黃子孫都嚮往的盛舉。本人做為參與促成此舉的一份子，從2005年起，即在中國大陸攻讀中醫，自當為兩岸和平發展、反獨倡統事業竭盡綿力，為此就教育與文化方面建議如下。

一、設立兩岸四地固定對口機構

目前不定期的開會建言雖然有其積極作用，但更重要的是須要落實在長期性、計劃性的執行上面，包括事先擬定短、中、長期目標，以及完成後的達成率和滿意度的審查，甚至需要進一步的考核、檢討等，如此才能確保效果。由於牽涉範圍廣闊，故建議設立有官方資源支持的民間組織，才容易推展其事。

二、教育方面的建言

1、兩岸四地攜手發揚國寶——中醫，深挖精華，並加緊向紮根和普及化推進，以利全球。可做的事情很多，如：

- A、尋找足為典範的中醫(可聘專家制定“典範”的標準)，其心得與行誼精編成套書、視聽節目、電子書等，以廣傳世。
 - B、集結中醫獨特的國際成就如SARS治癒、針灸麻醉等，以啟發後學的興趣與鑽研之心。
 - C、將中醫獨特的保健和養生知識編入學校教材，成為全民衛生教育的一環，從小學起可深入淺出的教導，不但可以促進全民健康，節省醫療資源，還可摘要譯成各國文字，造福國際。
- 2、建議兩岸四地無論科技、文史、農工、醫學等大專以上的學校，進行較長期的人員交流，如交換教授、學生，不要只是蜻蜓點水式的參訪，而是以年為單位，才能真正吸收到對方之長。
- 3、積極研究遠距教學的可行性，以電腦視訊越洋教學，使兩岸四地的學子可不必涉山渡水尋師學藝。
- 4、加速促進兩岸四地的學歷、證照等相互承認。
- 5、各級學校對待兩岸四地的同胞，減少差別待遇，如學費、住宿費、考試費等的訂定及其他。

三、文化方面的建言

- 1、鼓勵兩岸四地創意交流，首先大力提倡尊重智慧財產權，獎勵全民抓“盜”。
- 2、兩岸四地的優良電視節目交流，促進全民多方相互了解、真誠交流。

- 3、出版電子書儘量設計繁體、簡體字並行，可相互轉換，如此文化共用，自然加速交流。
- 4、全球氣候難民，牽一髮動全身！提高兩岸四地一體的環保憂患意識，重視空氣環保、節能、資源再生等的互動與支援。如工廠廢氣排放標準、車輛廢氣排放法規限制、對於超過一定年限的車子不許上路或台灣垃圾分類等。
- 5、兩岸四地衷心攜手，雖然有一些政治層面未達成共識或協議，但可暫行擱置，表現泱泱大度。譬如對於一直存有爭議的國共相爭之近代史恩怨，雖各持立場，各有解釋，但在台灣人民甚少談論，亦罕見以此為題材的廣電節目等，而在中國大陸，目前晚間有多個電視台的連續劇取材國共相爭史，無形中增強敵我意識並長期廣泛傳播，電視台不知不覺製造了兩岸四地團結的障礙，謹在此表達希望有所改善之意。

以上不辭愚陋，無非想拋磚引玉，代為台灣青年一代發聲，若能為兩岸四地大團結奠基一塊磚石，於願足矣。



兩岸文化交流之中文書寫探討

台灣中華金吾協會顧問 沈國楨

兩岸民間交流開放後，前往大陸探親、旅遊，由於沒有語言上的溝通問題和僅一海之隔的近距離，加上海空交通的便捷，以及大陸生活程度與投資環境的吸引，前往大陸的台灣人民逐年增加。

筆者一九四九年離鄉，一九九八年第一次踏上了返回祖國的旅程。但當飛抵杭州笕橋機場時，眼前呈現的除了兩岸的國旗早有認知外，所見的都是簡體的政治口號和商業廣告的看板字句。如果沒有聽到人潮中的鄉音，真讓我好像到了別的國度，陌生又迷惘，產生了對祖國認同上的落差。當然對大陸各地現代化的建設和進步以及環境綠化工程的成效十分欽佩。中國人的智慧和勤奮真讓世界刮目相看，不過中華優良文化的傳承是兩岸中國人的共同責任，因此就兩岸文化交流中文書寫规范化，提出一點淺見如下：

中文書寫組合排列在國民教育和傳統習慣上早年都有依循，中文書寫應自上而下，自右至左，英文數學和翻譯文件自左而右，機關學校商店招牌寺廟和匾額等一律橫寫，一個字算一行自右至左，如“少林寺”、“大雄寶殿”的書式，端正莊重。

大陸各地機關學校商場市招、書刊、報紙、街道路標等，都是一律自左而右而且有些簡體字過於簡化。例如：“瀋”改“沈”、“廣”改“广”、“廠”改“厂”、“愛”改“爱”失去了中文的意義和精神。如果用簡體字寫“對聯”，寫“詩詞”也自左而右，更失去了中文書寫藝術的傳統和美感。台灣社會由於政治意識的混亂和民主自由的濫用，近年來中文書寫滿街所見也是忽左忽右，書報排列也忽直忽橫，更可怕的是發明了一些以閩南語發音拼成的字典上也找不到的文字，誤導民眾造成困惑。

筆者到過世界各地的華人社會，例如：香港、澳門、新加坡、泰國和美國的紐約、舊金山的唐人街，市招和對聯、詩、詞的書寫還是保留著中國傳統文化，華僑對中華固有文化的傳承和執著，令人肅然起敬。

二十一世紀應該是中國人的世紀，為了早日完成華人社會統一的歷史使命，凝聚全球中國人的團結力量。因此必須重視中國傳統的、優良的、博大精深的教育文化，要先從文字的書寫統一著手，特提一點淺見，請予研討指正。

儒教文化應為中華富強統一基礎

台灣全統會嘉義分會副主委 趙少平

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似乎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顛撲不破的真理，目前中華民族正處於分隔的狀態，而且已分的太久了；將來，合是必然，我們希望能合的更久，而且合的過程，是和平的，為達此一目的，我們必須有些行動，而不是坐以等之。

兄弟來自台灣，大家都知道，台灣的獨派，甚為囂張，這不是沒有原因的，主要的原因是一九四五年以前，台灣在日本人統治之下，有五十一年之久，而一九四五年以後，又有閱牆之戰，文化被摧殘，忽視的太久、太久了，我們都知道，一時的勝利靠軍事，一代的富強靠經濟，永續的存在則靠文化；這個地球上，存在著基督教文化，伊斯蘭教文化，以及中華民族以立國之儒教文化，沒有文化的國家，不能垂諸久遠。

在此，無暇容我談大道理，請以名人為例來說明：

首先，咱們談談李登輝與彭明敏，他們代表日本皇民化的成功，但他們都已年近期頤，來日無多，無足多慮。其次，我們談談林毅夫與陳水扁，他們兩位都是台大學生，都成就非凡，只不過林毅夫博覽群籍，心向祖國，而今，貴為世界銀行之副總裁，名滿全球之經濟學家；而陳水扁，則是急功好利的嗜講義的學生，所以，在貴為總統之後，仍然鼠目寸光的只看到錢，今天，因貪入獄而為天下人所恥笑；坦白的說，此二人年紀相當，才智相若，而成就有雲泥之別，此無他，林君受中華文化之薰陶，而陳水扁則未預之聞也。最後，無論是台灣或大陸，都該重視這個根本問題，大陸，我了解的不深，不過對簡體字，我可以說是不敢恭維，奉勸柄政者，請對文化多尊重，少干涉，聽其自然發展可也。

至於台灣，可以說讓我非常慚愧（因為我一生都在從事教育工作），也非常憂心，在過去的二十年，李、扁主政之下，刻意毀棄我中華儒教文化；而今馬英九先生，實在不是一個具有大智慧、大氣魄的領導人，你看他任用的教育部長，先前的鄭部長，是一個兩邊押寶的偏綠分子，而今的吳部長，是一個無學術威望，無赫赫經歷，又缺乏擔當的循吏，這些年來的教改，可以說是越改越糟；而現在的馬吳政府，光是救災和應敷民進黨都忙不過來了，那有精神來注意這中華民族立國之本的千秋大計？所以，請今天在座的凡我同志，務須發揮你的影響力，發揚光大咱們的儒教文化，以奠定來日統一之基礎，並使我中華民族，千秋萬世長流。

內地應加強國軍抗日宣傳活動

台灣大中華鄉親聯誼總會總會長 張世飛

2005年9月3日北京隆重紀念抗戰勝利60週年，中共胡總書記錦濤先生昭告世界，高調肯定國軍著名的“八百壯士”抗日事跡等：

“在空前慘烈的抗日戰爭中，中國軍民前仆後繼、浴血奮戰，面對敵人的炮火勇往直前，面對死亡的威脅義無反顧，以血肉之軀築起了捍衛祖國的鋼鐵長城，用氣吞山河的英雄氣概譜寫了驚天地、泣鬼神的壯麗史詩。等眾多英雄群體，是中國人民不畏強暴，英勇抗戰的傑出代表。”

1938年 毛主席澤東先生在六屆六中全會講話中，高度讚譽並親書“八百壯士民族革命典型”。

2006年04月15日中共胡總書記錦濤先生表示，只要是對台灣同胞有利的事情，只要是對促進兩岸交流有利的事情，只要是對維護台海地區和平有利的事情，只要是對祖國和平統一有利的事情，大陸都會盡最大的努力去做，並且一定努力做好，而這也是大陸對廣大台灣同胞的莊嚴承諾。

2005年11月20日美國、加拿大等國發行最大之華人報紙《世日報》《亞洲時報》《大世紀報》等媒體報導八百壯士後起團長上官志標，當年為搶救謝晉元團長被刺六刀重傷，雖未能代為殉國，仍背負謝晉元團長遺體離開現場。後代上官百成現仍努力捍衛四行倉庫，仍保有上官志標被刺六刀重傷之血褲、八百壯士贈送之受傷紀念戒指及謝晉元團長之私章、遺墨。

因胡主席錦濤先生在抗戰勝利60週年提及國民黨抗戰功勳，上官百成致函胡主席錦濤先生，促設八百壯士抗戰倉儲博物館，及拍攝八百壯士電視連續劇。

1975年上官百成依據先父八百壯士後起團長上官志標遺留之手稿及資料彙編成“八百壯士與謝晉元日記”一書，由華欣文化事業中心出版，1976年建議由中央電影公司 辜董事長振甫（前海基會董事長）等負責改攝為“八百壯士”電影在海內外發行，並參加亞洲影展榮獲七項大獎，馳名海內外。

1985年再增攝“八百壯士”續集“旗正飄飄”電影，兩部影片上官百成均參加演出，在海內外電影及電視頻道播出，成為愛國教育之經典教材。

擬請大會促成下列三件事：

- 1、現已完成二十集大型愛國主義電視連續劇八百壯士初稿 懇請指導、促成拍攝為禱。
- 2、懇切祈望世人組團赴上海參觀四行倉庫，盡速成立抗戰倉儲博物館及蘇州河等整修工程（上海投資近四十億人民幣），並向上海市提出建言，作為世人暨兩岸人民觀光旅遊勝地。
- 3、祈望能協助本會，無償提供上海四行倉庫，成立兩岸愛國文化、經貿協商交流單位，以增進凝聚兩岸人民彼此的了解與弘揚愛國情操。

再次懇請 大會重視採納建言，請胡主席暨有關單位協助配合，增進凝聚兩岸人民合而為一及彼此的了解，激勵兩岸人民，由歌頌進而實踐中國一定強的愛國情操。

台灣青少年網絡教育不可忽視

台灣中國統一聯盟青年部幹部 殷壽銑

筆者近年來從事兩岸青年交流工作，對於台灣青少年的想法及需求，不敢說通盤，但具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今年年初，筆者帶領數十位台灣大專院校學生前往哈爾濱的北大荒博物館參觀，面對國家主席胡錦濤先生的巨幅掛像時，詢問在場學生，知不知道這是誰？五花八門的答案，從毛澤東到鄧小平、江澤民等都有。足見即使在網際網路如此便利的時代，青少年對於其所欲獲取的資訊，仍舊是充滿偏見以及選擇性的閱讀。尤其是對於祖國大陸的各項資訊，多半是不願意、不想、甚至是“不屑”獲得。因此，如何從網路這個有別於傳統的多元化媒介，從其中對於青少年起到教育的作用，成為在網路資訊時代最重要的課題。

舉凡各類型的入口網站，都屬於某個為特定需求人士服務的網路平台。根據Alexa-Top Sites in Taiwan所作之每日流量分析來看，2010年至四月份為止排名前五名分別為Yahoo（雅虎奇摩）、Wretch.cc（無名小站）、facebook（臉書）、GoogleTw（谷歌台灣）、Youtube.com（影音分享網站），五個網站的功能分別為入口網站、交友部落格、交友部落格、入口網站、影音娛樂網站。這幾個網站基本上包含了新聞傳達、聊天交友、資料蒐尋、生活娛樂等功能，也因為這幾個網站的高人氣，上述這些網站所陳述的事件經常躍上新聞版面。

根據Yahoo自己所做的調查，yahoo的到站率 高達97%，從這個數字來看，基本上顯示出Yahoo對於島內人民的重要性及不可或缺性。不過，在其中有個值得注意的地方，在點閱新聞一欄，在政治新聞類，以2010年5月5日為例，16則新聞中，出現了10則自由時報的新聞，佔62%強。眾所皆知，自由時報的立場在島內的政治光譜中，向來是處於極端分離主義，以及捏造不實假新聞而聞名的。如此一來，青少年在閱讀相關新聞訊息時，往往不自覺的落入被這種錯誤的意識形態制約之中。再者，在各大新聞討論區中，普遍瀰漫著一種“逢中必反”情緒，稱祖國同胞為“426”、稱中國人為“支那人”、“支那豬”，自覺高祖國同胞一等。以yahoo民調中心在2009年9月份對於ECFA所做的網路民調來看，反對簽署ECFA的網友高達70.4%，在以青少年為主的網路世界，這等情緒，是有歷史脈絡可循的：台灣地區自李登輝執政後期，加上陳水扁政府的推波助瀾，在勵行充滿台獨意識的“本土化”教育中，當下25歲左右的台灣年輕人，正好是受到這一係列錯誤教育政策荼毒下的產物。即便是國民黨馬英九執政以來，似乎也並未為扭轉此一局面多做努力，導致此一惡性循環不斷。

因此，在網路的宣傳上，實應避免容易產生群體盲思（Group Think）的網路社群。從這個邏輯來看，由於青少年普遍缺乏批判省思能力（Critical Thinking），無法建設性的思考各類資訊，因此也就缺乏分析、辯證、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總的來說，我相信這一點反映在兩岸青少年的身上是一樣的，由於物質條件的

成長以及資訊進步的快速，青少年對於周遭生活環境的關心表現出一種冷漠的態度，這對於社會的進步是一種很大的阻礙。

雖然網際網路的興起，但BBS仍舊有其無法取代的功能，這些功能主要表現在

1、情報流通快速：由於介面簡單方便，且單純的文字訊息較不易受網路頻寬速度所影響，即時的新聞資訊能以最快速的時間反映在版面上，同時，網友亦能夠在第一時間對於數量龐大的新聞訊息做出回應與評論。

2、互動性強：著名的BBS版面上經常有十數萬人流連於各大版面上，隨時可以找到人互動，較不若一般網站，人流不易集中，發言不易得到迴響。基於這些理由，BBS在台灣40歲以下的族群中，有極大的影響力，特別是在各大專院校的學生裡，甚至是高中校園，幾乎已經成為生活的重心。

PTT 為當前台灣最重要的青少年輿論平台，它是一個擁有超過兩萬個包含各種資訊的版面、以及每日可達12萬篇新文章發表、十萬人同時在線的訊息資料中心。較不同於Facebook、Youtube等出現在新聞版面上的模式，新聞媒體常到PTT的版面上“抄新聞”，以“鄉民”對於時事的評論、小道消息、胡言亂語等作為新聞的素材。本質上來看，這些素材是毫無新聞價值的，或許少數有，但也不過是亂槍打鳥，不小心打中而已。同樣以yahoo新聞做為搜尋平台，這半年之內，媒體就以PTT上的言論“製造”出了73則新聞，大至網友募款捐助台灣莫拉克風災，小至校園選美比賽，竟都成為了新聞議題！同時，由於人數眾多，言論管制不易，也經常成為犯罪的溫床。Ptt作為最大的青少年訊息平台，某種程度上反映了許多台灣學生的主流意見。

身為一個支持兩岸和平統一運動推行的台灣人，雖然不樂見這個現象，但卻也是吾輩非得面對的課題：那就是青少年間瀰漫的反中國大陸情緒。比如，PTT上討論到祖國大陸的問題時，眾人皆曰“蛆”國大陸；支持ECFA就是不愛台灣等言論，充斥在台灣青少年間。當然，台灣社會絕對不是只有這種反動的言論，但是，進步份子的聲音往往被淹沒於胡說八道的言論之中。PTT這個社群還有一個奇怪的功能，那就是“從政的跳板”。不可否認的，國民黨與民進黨的青年支持者，經常性的在政治討論區相互謾罵、叫囂，這些人被稱之為“網軍”，藍綠皆有之：或低俗；或假高尚；或理直氣壯；或聞雞起舞。這樣的環境下，卻也造就了有心從政的人有了發揮的空間。以今年台北市議員選舉為例，PTT的發言人高嘉瑜就代表民進黨參選。

即便如此，PTT仍舊是個在台灣青少年之間有極大影響力的網路組織。如果能在其中取得話題主導權，那麼這將成為非常厲害的武器。培養熟悉兩岸關係、祖國大陸相關政策等議題的人才，以理性的態度、客觀的分析，試圖導正因錯誤的“本土化”教育政策，觀念及思想偏差的台灣青少年們。當然，這是一個長期性的工作，人才的培養以及選拔並非一天兩天的事，若急著投入這個染缸，勢必會造成極為嚴重的反效果，對於兩岸和平統一的工作，反而形成一種阻礙。

資訊科技進步的速度，遠遠超乎我們想像。不論台灣也好，祖國大陸也罷，網路遊戲在近年都掀起一股巨大的浪潮。許多遊戲由於是兩岸年輕人共同有機會一起娛樂，這對兩岸交流的發展，本是好事一樁，但由於兩岸文化、習慣的些微差益，反而造成文化上的衝突。這個很渺小的衝突，在過程中沒有得到適當的紓解及緩衝，這種衝突就擴大成台灣人與中國人間的鬥爭。這種從人民內部的矛盾，逐漸演變為敵我矛盾，反而對於兩岸年輕人的交流造成了嚴重的傷害。

資訊媒體及網際網路的發達改變了當代青少年的生活經驗，也重新建構了人與人之間溝通的橋梁，生活在台灣，某種程度上也享受了這樣的優勢。從另一面來看，網際網路也造就了“宅男”、“腐女”這一代的年輕人，缺乏了對於生活的敏銳度，讓這些生活經驗不足的青少年們，無法對於周遭的意提認真的反省及思考，致而對社會議題較難有公正、客觀的評價。

事情似乎沒有轉圜的空間。的確，在號極端稱言論自由的台灣，透過“說嘴兒”出來的話語是不值幾兩錢的，網際網路亦然。網際網路的急速發展具有對人與人間關係的潛在破壞力，可能使人與其所生存的真实社會環境更加疏離；許多個人藉化名之掩護，企圖完全脫離真實世界對個人的強制性，追求網路人際關係帶來的滿足，或想藉電腦網路所提供的方便性，不斷的更換身份（ID）與遊走在不同舞台間，離現實生活越來越遠。也許青少年們會跳出來說：這就青少年。

總的來說，台灣青少年的網路使用，多半淪為深受媒體影響的祭品。筆者絕不是鼓勵青少年走出戶外，親近大自然，筆者不也是每天窩在電腦前嗎？不過，該如何從多元的網路中，獲取正確的、積極的資訊，而不是被成俗的錯誤觀點所制約，台灣的青少年是應該走出去了，網路這條橋樑，恰恰好接通兩岸。



推動“轉型正義”恢復台灣正史

台灣中國統一聯盟文宣部長 戚嘉林

今年7月8-11日“第六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在廣州舉行，論壇重要共識之一就是擴大兩岸文化交流。接著，總書記胡錦濤於12日在北京會見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時，續表示“要增強休戚與共的民族認同”。

眾所周知，由於中國悠久歷史文化的深層影響，中國人的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常相互滲透而難以分割。歷史是人類的集體記憶，是文化的核心組成部分，孕育強烈的近代國家認同。這也就是近一、二十年來，李登輝與陳水扁台灣分離主義者執政，啟動行政機器的強大資源，使“台灣分離史觀”論述從早期粗糙的“台灣民族主義”，到目前精緻的“台灣主體意識”，影響與日俱增，潛移默化地誤導台灣人民的歷史認知。

二十年來台灣歷史迭遭曲解顛覆

李登輝了解歷史事涉孕育人民的認同，故其執政期間，憑藉其總統的政治影響，除了以“凝聚台灣生命共同體意識”“新時代台灣人的主體覺醒”為由，提出撕裂兩岸歷史連結的“外來政權”論述，頌揚“台灣分離史觀”與極度美化日據殖民統治的“皇民史觀”。在具體運作上，除動員學者編撰《認識台灣》外，甚至換掉教科書編委陣容中有統派傾向的學者。陳水扁續之，除扭曲台灣歷史外，並任命教育部長杜正勝，藉學校歷史教育，推行“台灣分離史觀”不遺餘力。

李扁執政前後二十年，蓄意以兩岸分離為導向，切割、肢解、甚至不惜抹煞台灣先賢用鮮血和生命譜寫的壯麗抗日愛國史實，反而顛倒是非地美化日人據台殖民史。李扁因有龐大行政資源為後盾，故不乏學者相從或默然，成為虛構欺罔世人“台灣分離史觀”的共犯結構，建構不公不義的“台灣分離史觀”。

“台灣分離史觀”論述核心

“台灣分離史觀”論述的核心，主要有以下五點；

- 一、將台灣與南島語族連結，以多元文化為名，稀釋台灣的漢族主體性，虛構所謂的新興台灣民族。
- 二、美化荷蘭在台殖民，不提荷人在台大肆壓榨與血腥殺戮，反而稱頌澎(湖)荷(蘭)初會是台灣全球化的歷史開端，為台灣開了先進的海洋文明，相對於所謂落伍閉鎖的大陸文明。
- 三、淡化清朝對台灣長達210年的治理，抹煞期間台人曾參與全國一體化治理的歷史記憶，並將清朝與國民黨政權都打成“外來政權”，以塑造台灣自己建國的正當性。

- 四、淡化台灣先人在台灣慘烈犧牲的抗日壯烈史實，抹煞台灣先人赴內地抗日的英雄史實，切斷近代

兩岸歷史連結，相對地反而美化二元歧視狠毒壓榨台灣的五十年日據殖民統治，徒為日人識者所輕，愧對台灣先人莫此為甚。五、將“二二八事件”轉化為分離運動的催化事件(catalyst)，藉連結陳儀政府的失政，與國民黨政府的白色恐怖，極力挑撥族群仇恨。

回首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之初，台灣人民狂歡慶光復。故僅僅半個多世紀前，前述的“台灣分離史觀”論述根本不存在，換言之該論述可說是無中生有。然而，“台灣分離史觀”論述之所以在今天能無中生有，無疑地是國民黨政府為其提供了沃土。例如早期對黨外雜誌歪曲“台灣史”的論述，國府的黨內文工會、行政部門的新聞局、政戰與警總等龐大政權機器，卻無力在“台灣史”論述上撥亂反正，只是以查禁黨外雜誌為能事。然而，殊不知國府在其執政期間，不乏傑出“台灣史”之學者專家，諸如投身台史研究為日後“台灣史”蓬勃發展奠基的方豪，獻身發掘並普及台灣基本史料的周憲文等，惟不獲重用，徒令虛構的“台灣分離史觀”論述成形。

開啓台灣史的“轉型正義”

世上本來並無“台獨史觀”，“台獨史觀”是近半個世紀來台灣分離主義者所虛構的。既然“台獨史觀”是虛構的，那客觀真實的歷史應在“正確歷史”的這一邊，故闡釋客觀真實的歷史，就是“歷史正確”。因此，如何闡述客觀真實的歷史，建構兩岸人民未來的共同歷史記憶，是兩岸的共同時代責任。尤其是二十年來分離主義者執政，動用一切行政資源及民間資源，進行“台獨史觀”思想改造的深遠影響，今天我們也應該使用同樣的力量，恢復“台灣史”的本來面貌。

但如何恢復正常的“台灣史”？這又涉及方法，昔日國民黨解嚴時代就是用批判的方式，例如有學者抨擊李登輝親日的日據史觀，是欺宗滅祖，喪心病狂等等。雖然批判也是表達的一種方式，但未能從根本駁斥台獨論述。因此，正本清源，應從根本著手。亦即以堅實的史實，建構真實的歷史論述，其方法就是鼓勵歷史學者探討歷史真相，推動台灣歷史的“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以前瞻性的氣魄，以公義為本，恢復台灣歷史的“正常”，回歸正常的“台灣主體意識”，尋回遭惡意曲解而悖逆台灣先人的不公不義台灣靈魂。堅持大是大非理想性，引領台灣居民超越族群與兩岸迷失，告別顛倒是非欺罔世人“台灣分離史觀”的陰霾，恢復“台灣史”的正常。

“中道哲學”與兩岸和平統一

台灣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員 葛建業

孔子為中國的政治創造了道德的制高點，也為儒學的內涵灌輸了人道主義的色彩和養分，千古不朽！孔子還是一位謙卑自牧的學者，他對所有的人均不存惡意，也對萬事萬物心存仁厚。於是他就這樣地由繼承中國的“道統”、開展出他的“中道哲學”與“中道政治”；並以“天下為公”與“世界大同”的信念，為中國在國際間開拓一條文明的通道，通往世界人類最關注的核心價值，正如1988年1月18至21日在巴黎召開的第一屆諾貝爾獎獲得者國際大會結論中所說：“面對二十一世紀，人類要生存下去，就必須回到25個世紀之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中道”的詮釋與其內涵：

“中道”之理源在於“允執厥中”。“允執厥中”按照朱子的解釋：“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欲窺知“無過不及”之奧義，吾人必先設定兩極，或推演到兩個極端，在此兩個極端之間的都叫做“中”，故這個“中”就應有很長的距離。但絕非折衷之“中”，亦非政客口中所講的中間路線之“中”。而是哲學上的“中”。是指兩個極端之間的全部過程。譬如我們人類的行為標準，事業成就，只是在此兩極端中間的某一點上，不盡相同，必須經過一番奮發努力，才能獲得近似的相同。這就是“無過無不及”的解釋，亦就是“中道”的解釋。

“中道政治”主張永續發展與世界和平

永續發展，儒家主張人高於萬物貴於萬物者，乃在於人能體天地之心以為己心，盡保護萬物之責。所以他們堅持保護動物、保護生命、保護生態平衡。如：“萬物何以託命乎”？“子釣而不網，弋不射宿”。反對“焚藪而田”，“竭澤而魚”。“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林木不可勝用也”。對西方掠奪式的向自然界索取，是絕對禁止的。

世界和平：孔子雖說過：“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但除了非不得已而用“以戰止戰”外應盡量避免戰爭。因此他發明了一套止戰的策略，即中庸上所說的：“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即宇宙致中而和，則眾星有其定位而不亂；萬物致中而和，即能蓬勃發育而生長。這種“中”與“和”的比與效果。根本上就否定私慾、侵奪、暴虐等為手段的戰爭行為，是從根本上（人的心意初動之時）就消除了戰爭的心態，以為社會和諧世界和平奠下基礎。

所以說，如果我們今後的教育能回歸到孔子原始設計的儒學、儒士的精神，以及他念茲在茲所欲推行的大道（中道）理想，則中國未來的青年學子個個都能具備孔門弟子的學養（誠正修身），儒士的情操和擔當（齊家治國平天下），則中國一定會強！

兩岸和平統一，儒學文化先行是捷徑

第一，兩岸分隔已60年，儘管兩岸過去的領導人都曾有過惡言相向，甚至拚過你死我活，如今一提到孔老夫子，都會肅然起敬，都認為孔子是中國的偉人！當然也是兩岸的偉人！這種文化的交結與歷史的共識，並非壓力所造成，全是自動自發的。為此，請不要低估這種文化與歷史的能量，在這個混濁的世界裡，今後還得靠中國孔子的儒學與智慧使這個世界和平、國家清明，使中國與中國人和世界人都變得更為偉大呢！

第二，過去李登輝，曾別有用心地慫恿台灣獨立，他的所有政治論述中最毒辣的一個，就是“去中國化”（去除台灣人民心目中的中國歷史文化）！陳水扁隨之，還加上猛力打“蔣”（蔣中正）以掩飾他的貪腐無能。結果呢？台灣人民並不為所動！最後還造成台獨黨（民進黨）的三輸（2005年縣市長選輸；2007年立委選輸；2008年總統選輸），以資懲罰！所以說，他們企圖破壞兩岸和平統一的不義之舉，在傳統文化歷史的共識與檢驗下，注定是會失敗的！

第三，未來兩岸關係的發展，在政治議題短時間內難以獲得雙方信任之際，請回歸儒學及文化歷史的記憶與認同先行，建構兩岸共同的願景，才是正途！是以筆者曾寫過《夢土原鄉》、《追夢尋根》、《夢醒時分》三書，以提請台灣同胞覺醒，不要忘本，就是同一個意圖！因為台灣人民的中國文化信仰過去曾受到過外來文化的侵襲與摧殘，如今已是不完全或形成真空了，亟需恢復原有的儒家文化來挽救，不可操之過急！最後還要請不要忘記，回歸孔老夫子的“仁政德治”、“仁智雙修、從容中道”以及“大同世界理想”等，才能使兩岸統一（融合）趨於快捷！

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

英國史學家湯恩比，早就說過：“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香港第22任總督葛量洪（英國人），他於1958年5月4日（五四）前夕，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演講，他以多年（1949—1958）任港督期間，對中國的了解，他見證地指出：“中國文化最為高深，千古以來，世界上古老文化能綿延不絕，至今仍然光芒萬丈，屹立不搖，只有中國文化。中國人非常優秀，不但可以身無分文，到全世界各地成家立業，而且能和世界任何種族和平相處。尤其是中國人口眾多，佔世界第一，超越世界總人口的五分之一，全世界五個人中就有一個是中國人。有以上三者，二十一世紀必然是中國人的世紀無疑”！

中國人民似乎已經接受了這一挑戰，並在短短的30年光景，做出了驚人的表現。如：經濟發展突飛猛進，基礎建設亮麗耀眼，整體國力提升更是超出預期。中國人儼然像一位時代的巨人，在東亞的大陸上站立起來了！緩步地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

吾人在慶幸與喜悅之餘，也應該冷靜下來想一想！如果一味地向前衝，祇顧到發展經濟，而忽略了軟體實力的文化提升與配合，將會是個甚麼樣的景況呢？單調、空虛、缺少文化底蘊與內涵也！因此中國文化也必須加以充實，以回歸孔子原始設計的儒學為依歸，如“仁智雙修、從容中道”等，相信定能成為未來世界性的文化！主流文化也！

我的三點建議

1、中國儒學是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均貴在深植人心，才能發揮潛移默化之效。為此，先讓儒學現代化通俗化，不僅能讓現代人易於接受，還可以收到移風易俗之效果。至少對內：可淨化人心，提升國民道德，減少貪腐與社會不安；對外：可讓西方人清楚地見識到，中國確是個文化大國，禮義之邦，從而改變他們過去企圖圍堵中國演變中國的錯誤行徑，並進而仿效中國。

2、中國古文本“四書五經”係兩千多年前用竹簡等寫成，用字簡約，涵義深邃，若非多年寒窗苦讀，實不足以窺其堂奧，依筆者幼年苦讀背誦之經驗，如擺在現在，實在是難上加難啊！今日的學子們因資訊多元，將無暇也是無法接受的！故建請先在古文本每頁章句後，先加註白話文句解，俾讓讀者能迅速領會其意旨！

3、建議開發語體文“四書五經”，在經過國家標準化之後，翻譯成世界主要語言，俾便流傳全世界，讓希望學習中文與想研究中國文化的人們，在易讀易解之下，受惠受益！

中國儒學博大精深，已被有識之士認定為是世界人類的共同遺產，及最理想的世界性的文化也。能否早日讓儒學現代化普及化，端賴我炎黃子孫的共同努力，地不分南北，人不分東西（兩岸），攜手以赴，完成這讓普世受惠的文化歷史共業，幸甚！



冀望兩岸統一正體字

台北市文化教育經濟發展促進會理事 廖妙瑋

不可否認，兩岸三地在教育文化上，仍有其差異性，如何達至齊一的水準，還得靠各方的學者專家。在教育體制上，訂定出更適合國際潮流，亦能因應三方需求的規章，靠著大家共同的努力，相信達到那樣的目標、那樣的成果是指日可待的。

海峽兩岸三地尤其是文化教育專家、學者和老師們能重視對下一代，特別要加強中小學生們對文字所使用的正體傳統漢字，用簡化後的字型音義相比較均大相徑庭，常使我們在閱覽簡體字的報章、書刊、文物時，弄巧成拙，有時需要全句或全段猜謎似的反復判斷，才能獲得答案。例如：古字的“众”即“眾”、“万”即“萬”；俗字的“头”即“頭”、“双”即“雙”；草書的“为”即“為”、“盡”即“盡”；新字的“选”即“選”等，尚容易使一般人能夠接受。至於簡體字“幹”字簡化為“干”，“發”簡為“发”；“餘”字簡化為“余”；“華”字簡化為“华”；“潔”字簡化為“洁”；“廣”字簡化為“广”；“廠”字簡化為“厂”；“蕭”姓簡為“肖”；“龍”姓簡為“龙”，則是錯別字混用。使“頭髮（发）”與“發（发）財”難分，“餅乾（幹）”與“樹幹（幹）”無別。確實無從取得一般人的認同與接受，尤其是處於兩岸民間文化交流熱絡之際，難免不因之衍生正體與簡體“一國兩‘字’”使用上的切身難題。冀望將來兩岸文字的走向，能逐漸步入恢復傳統正體字的途徑。

教育是文化的交流根本，我們要注入“養分”，不斷提升教育的品質，汰舊換新，不但要能與國際水準並駕齊驅，更要能展現中華文化的獨特風貌。現在我們就“爭與讓”這兩個字來探討一下文化教育的內涵，“爭與讓”乍看之下是對立關係，實質上它是相輔相成的，互為依歸的。所謂的“爭”是指“良性競爭”：不是雙方爭執不下、面紅耳赤、你死我活、大動干戈，而是彬彬的“君子之爭”，這種競爭是以全人類的福祉為前提，不是惡鬥、奸詐，而是光明磊落、動機純正、豁然大度的競爭，這是“互助”的較勁，也提升“學習鬥志”，“你好，我要更好；你優，我要更優”，在醫療、經濟、科技、人文、藝術上努力競爭，也唯有不斷的競爭，才能爆發出更偉大的創造力來，這種“積極、正向”的力量，必會使整個群體更加提升躍進，這也是陽剛的、光明的力量，成果是不可限量的。所謂“讓”，是指“謙讓”、“禮讓”人生修養。“虛懷若谷”、“有容乃大”的傳統美德，而不是指懦弱、退縮的逃避，凡事一讓再讓，忍氣吞聲。這種“謙虛有禮”的美德，喚醒冷漠、疏離、金錢、權力、充斥的目前環境，重新震撼生命中善的種子，重新加強人與人的互助、關懷。這種精神是“我很強，但我不壓你，不欺負你，反而寬恕你、包容你，進而拉拔你、提昇你”，這種修養衍生出時時能“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的態度，必能懂得靜思、懂得檢討、也懂得對人愛的付出。你看前陣子國際上有國家遇上大災難，各國人士能愛的支援、出錢出力，盡心盡力，不分種族、性別、貧富，非常感人。這也就是“謙虛、禮讓”的最佳表現。

能提升“爭與讓”的精神，生活必是會積極地、樂觀地、充滿愛的氛圍，也更能改善全人類的生活，相信追求“優質生活”，提升“生活品質”，是我們長期努力的目標。增加“爭與讓”的養分，我們才能有一切的生活價值與態度，不論在人際互動、社會風氣、人格素養上都會邁向更璀璨的未來。

被遺忘的“北大人”

——剖析北大台籍校友在台學歷承認問題

台灣兩岸統合學會研究員 田立仁

畢業返台，矮人一節

在今日中國，如果說有人看不起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或復旦大學、浙江大學的畢業生，大概13億中國人都會感覺很奇怪，畢竟這些學子也算是中國著名高等學府培養出來的人才吧，不說別的，就是作小生意也會作出大文章來，例如一個北大畢業生賣豬肉，就賣出了名氣，還上了一陣子新聞呢。一位陳姓北大畢業生悄悄進入廣州屠宰售肉行業，在不到兩年的時間開設了近百家豬肉連鎖店，成了大學生“豬肉大王”。一個北大畢業生，不僅把豬肉賣出了“北大水準”，也改變了數千年來中國人對這個行業是貴、是賤的認識。

但是，因為台灣當局長期對內宣導的“中國黑心產品”印象，透過中國教育部港澳台招生的台灣學生，進入大陸名校修業合格畢業，返台後的大陸文憑，卻被一律當成“中國黑心學位”，受到台灣社會有意無意間的歧視。雖然馬英九上台後，開放陸生來台及承認中國學歷政策，加快了腳步，但馬英九至今任期執政過半後，學歷承認此一兩岸文教交流的重要議題，至今卻沒有如商人階級注目的ECFA經濟議題般，有突破性的發展，也突顯台灣只重經濟交流，而不重人才交流的功利主義政策傾向。

因此，台灣學生赴大陸求學，縱是取得碩士、博士學位，目前也不被台灣當局承認該等學歷。相反，凡是經台灣教育當局認可的大陸各台商子弟學校發出的高中學校學歷，當局卻承認。

台灣教育界既得利益團體的兩手策略

台灣的教育界，目前已經是大學過度設立，如不擴大對外招生，一定在2015年後有很多私立大學面臨關閉，造成高等教師失業問題，也因此，台灣教育界想出了兩種策略：一是夜郎主義的向自認為比較需要教育文憑的地區或國家招生，開闢生源。例如台灣外務當局為了落實馬英九“4年內延攬2萬名境外學生來台進修”的“萬馬奔騰計劃”，台灣與印度已於2010年3月10日在台北簽署“教育合作備忘錄”，雙方達成台、印高等學歷相互承認之協議，盼望2011年學年度台灣就能增加印度來台留學500名自費研究生，未來並以招收大學生為第二期的目標。菲律賓、越南方面也在推動當中，第一期目標名額也在數百個左右。台當局宣稱：印度大專以上學生目前約有1,000萬人，但因印度大學數量不足並追求國際化，每年約有50萬學生赴美留學，2009年，印度生在美人數103,260人，超過大陸學生在美人數98,235人；如果能吸引部份印度生來台，可帶給台灣可觀經濟、文化效益，更可與“陸生來台”政策相得益彰。此所謂相得益彰，不過就是盡

量對外招生，養活台灣私校而已。二是盡量與大陸知名高校拉攏關係，先行建立姐妹校、兄弟校、交換學生制度，這樣在島內招生時，就可增加學校吸引島內新生註冊入學的誘因，一些私立學校甚至連內地省級的大學也在拉攏，可見其面臨2015倒閉風潮的危機感。

但台灣教育界既得利益團體在陸生來台、外生來台上積極進取之際，對台灣籍大陸學歷學生認證上，則抱持消極，甚至暗中抵制的態度，因為擔心北大等各校回來的台灣人，會搶走他們的工作權，甚至在校園內傳播社會主義思想。這種把來台陸生當貴賓，把赴大陸台生當敵人的不平等、歧視作法，讓人見識到台灣教育界的功利主義傾向，一切以本身利益為考慮，兩岸人才交流、青年基本權益、基本人權等等，根本不是他們首要關心的事情，

這種兩手策略，會形成一種怪象，就是同樣是北大2008年前取得的碩士學位，如果甲君是內地人，並且2011年來台讀博士，台灣承認甲君的北大碩士學位，而這位甲君有個台灣好同學乙君，2008年也跟甲君一起在北大念碩士當同學並拿到學位，但2011年在台灣，同樣的北大文憑，那位乙君卻不被承認文憑有效。

這種區別對待法，已明顯的喪失行政公平性，甚至這種島內行政機關片面決定北大文憑部分有效、部分無效的落伍官僚作風，對北大等各大陸名校及校友來說，已構成是一種校格的羞辱！這對於一群名銜是教育家、教育主管機關的島內人士來說，更是個諷刺、並在中華教育史上值得痛心的現象！

撇開民進黨的一切問題政治化決策習慣不談，國民黨或台灣教育界既得利益團體目前這種披著兩岸人才交流外衣，而實際上是只想促進自身經濟（招生）利益，或只想解決島內社會失業問題的兩手策略，不僅顯示出對教育百年大業的不尊重，也顯示出對弱勢青年學子合法權益的不重視，這種教育議題商業化的資本主義決策傾向，有將兩岸人才交流走向低階目的化、短視化的可能。

應強化兩岸四地高等教育交流

台灣開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李汾陽

知識分子是國家進步發展的中流砥柱，是社會不可或缺的進步力量，對新世代人才的有效及正確的培育，才能確保21世紀與世界各國的有效競爭與持續發展。內地、台灣、香港與澳門兩岸四地的高等教育院校，集結了大批優秀青年，正是培育下世代人才基石所在。同時，中國早有知識分子敢為天下先的使命感與傳統，此亦為中國文化特色。自19世紀以來，由於歷史因素，使四地高等教育在起源與發展方向上完全不同，同時彼此之間了解有限，減緩了中國高等教育能量的凝結與強化，所以今日應該密切交流學習，互補短長，才能發揮集體合作的效用。

台灣高等教育源自日本統治時期的台北帝國大學，1945年後改名台灣大學，至1990年代高等教育改革之前，公私立大學設立與招生受到限制，每年通過大學聯招入學的新生錄取率約為三成上下，其餘七成學生僅能選讀技職專校或進入就業市場，在人才分流與就業市場上有著完整分工，但自1990年代開展所謂高等教育改革，藉由開放新設大學與大量改制私立專校為技術學院或科技大學，廣開大學之門之後。至今大一新生錄取率已經超過百分之百，除了僅佔招生名額百分之三十的公立大學院校之外，招收佔百分之七十名額的私校，早已面臨招生與公立部門對教育資源分配不平均及逐年減少的發展困境。因此，私校無不對教育部在2010年開放招收大陸學生的政策給予強力支持，並且希望立即施行。但是以每年2,000個名額來說，根本是杯水車薪無法解決現今台灣高等教育的困境，更不要說大陸學生來台就讀還應是以公立大學為主要選擇的對象。台灣高等教育的困境不僅是少子化所造成，更是錯誤政策所形成的現實情況，也讓大多數大學院校在學校未來發展規劃上日益短視，以求生存為唯一目標。

在21世紀的今日，大陸與港、澳地區的高等教育各自面臨不同的轉型問題，彼此之間都有共同的命題要面對與解決，在國際化亦或市場化的現勢驅動下，四地在世界一流大學的競爭中，多已忽略自我文化的特質，忘記了中國在學術傳承中，追求真理與學風塑造的優良傳統與使命。因此我們呼籲應共同合作，藉由優質文化傳統的發揚，形塑中國大學在世界學術殿堂中自我特色。

和平統一 是佛教之最高祈望

台灣中華和平發展聯盟代表團宗教代表 詹文源（道果法師）

僧伽出家於印度菩提伽耶，受戒於菩提伽耶正覺大塔，求法於金剛座菩提樹下。菩提伽耶是佛教導師釋迦牟尼佛證道成佛之聖地，是佛教之發源地，也是佛教徒朝聖皈依禮之中心。

本人有此榮幸代表菩提伽耶菩提寺與中華大覺寺，以中華大乘佛教僧伽身分，受邀參加貴會舉辦全球華僑華人促進兩岸和平統一大會、深感尊貴與榮耀。感謝貴會賢哲對佛教之尊崇與護持。

大家知道印度佛教自西元前五世紀，釋迦牟尼創教以來，經歷了2,500多年歷久不衰，並弘傳到東南亞各國，近世紀更弘揚到全世界，已成為世界五大主流宗教之一。佛教是慈悲之宗教，佛教是智慧之宗教，佛教是愛好和平之宗教，佛教是世界大同之宗教，這是世人都能接受與信仰大眾所共同體認的。

在西元前二、三世紀，古印度孔雀王朝，出現了一位英明君主——阿育王。起初他以武力統一了全印度。阿育王建國當初並非信仰佛教，還曾一度毀滅佛教。後來慢慢被佛法感召，進而虔誠信仰佛陀，護持佛教、弘揚佛法，並大力推行，以佛法統理全印度，建立孔雀王朝而成為印度最強盛，最文明之國家。以佛法與當地民情相互交融，而能和平統一，國富民強，創佛教在印度與政治相結合圓滿成功的首例。

中國於西元六世紀，時唐朝於長安出現了一位佛教高僧——玄奘大師。他到西域印度求法取經，歷經了18年的千辛萬苦後，終於榮歸回到長安，也受到人民的熱烈歡迎。當時皇帝唐太宗李世民和玄奘大師佛法相交，兩人相知相惜，唐太宗尊稱玄奘大師為國師，唐太宗在佛法滋潤下信仰佛陀，更護持佛法，弘揚佛法，也是以佛法治理國家，開創了大唐盛世，把佛法發揚光大而擁有了光輝燦爛歷史。

佛教在這一時期，大量翻譯經典使得佛教在中土落葉生根，開花結果，建立具有中華特色之大乘佛法，八大宗派，是佛教在中華疆土開拓弘傳最輝煌之時代，這也是政治與佛教互相結合，產生之昌隆國運局面的一例。

今日已進入二十一世紀，有人認為，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自1979年中國政府開放宗教自由信仰政策，大力扶植建設佛教古蹟以來，歷經三十年來社會菁英的努力，現在佛教在中國展現了前所未有的盛況，中華民族所信仰之大乘佛法所具有的八大宗派也在中國各地蓬勃發展。多文化的各宗各派佛法文化，也融合了中華民族各種族包容特性。正因如此，佛教在中華民族，社會文化中具有中流砥柱之道德力量，倫理力量，安定力量。今天大家有緣相聚，來參與促進兩岸華人和平盛會，實質是離不開佛教與宗教的信仰主題，大家知道，佛教的本質是慈悲與智慧，佛教的主題是和平統一，今天我們追求兩岸和平統一，這正是佛教徒所祈望之最高價值。

中華民族又稱為龍的傳人，在佛教裡，龍是屬於天龍八部之一，是佛教的護法，龍是吉祥的動物，龍也是代表財富，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龍的圖騰與供養，香港據說是龍的明珠，獨具意義，佛教講心、佛、眾生三無差別，每位眾生都有佛性。今天來參與盛會的每位貴賓都是各界名流，都是中華之精英，在社會貢獻良多。今日群集香港，百川納海，四海一家，共聚一堂，實屬珍貴。祈望各位賢哲達人，在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文化中，展現大慈悲、大智慧，期能在佛教滋潤中，心開蓮花，心性光明。

最後衷心祈望：

祈願盛會帶來中華民族，種族和融，相愛共處。

祈願盛會帶來中華民族，兩岸領導，智慧英明。

祈願盛會帶來中華民族，經濟繁榮，社會康樂。

祈願盛會帶來中華民族，和平統一，開創盛世。

恭祝各位貴賓，智慧增長，明心見性，早證佛道，印度菩提伽耶菩提寺，中華大覺寺僧伽代表，菩提達摩，道果合十。



文化傳統與現代教育

台灣中華儒家學術學會理事長 葉富乾

關注文化傳統與現代教育，乃自1990年夏見小學生言行粗野開始，之後不斷的參與教育文化研討會或座談會。尤以教改會兩年期間，每週五的教育大家談中，大家曾以一、宣揚禮樂教化的重要；二、教育辦不好會害死很多人；三、論說教育要有完整的一套不應瞎子摸象等三個主題輪流表達意見。其實吾個人主要的目的在於，說明禮樂教化的重要而已；但是後來發現原來是對牛談琴與聾子聽雷，其實大家都不知禮樂為何事何物。這幾年以來更可確定的是，我們不知禮樂乃是一套最完整的教育學術思想；也不清楚禮樂是最完整的品德教育。

就個人的理解，當今世界人類所有的問題就是教育問題，而這個教育問題就是，對品德教育的認識有缺失，這與不完整有直接的關係。例如：世界大國之一的美國對品德教育的認識，只停留於守法守規矩、做個好公民的層次水準而已。不知品德教育真正的意義乃是，造就一個人內在的學問修養，有此內在的學問修養方有機會轉換現成、既有舊的知識經驗，而加以創新或高層次的原創水準。

再如，今年5月12日聯合報A1版消息：法新社報導，莫札特故鄉奧地利的學者十日發表新研究指出，聽莫札特的音樂不會更聰明。主持這項研究的皮耶希尼（JakobPietschnig）表示原始研究樣本不足，而且原始報告一次性地分析他們的空間推理能力而非智商等。誠然，歐美這一二百年來對音樂的發展，有其紮實的基礎架構，也包括其他科學上的研究，值得世界各國的模仿學習。但是由這篇音樂報導再讓我們發現到，歐美資本主義社會對教育的認識有重大的缺失，此一缺失就是過早的商品化與過多的功利主義的思維，希望從小就教育出令人羨慕的天才，而能夠名利雙收。因為過早的商品化與過多的功利的思維，就人的教育學習而言，也往往不利於一個人身心的發展與健康。

可見，華人數千年前的主張“格物致知”充分廣泛有效的學習，而能達到誠意正心以及內外兼修的學問修養，這些才是教育學習的王道與世界人類主流的教育學術價值。再說，奧地利這篇音樂報導，也讓我聯想到四、五千年前華人的音樂文化，早已領先世界的水準。據歷史資訊，我們的祖先黃帝，其樂作代表“雲門大卷，咸池”，或堯舜禹湯文武亦各有其樂作名，如“大章韶大磬大夏大護大武”等，雖已年代久遠無法聽到他們的音樂曲式而加以對照。但是，各位女士先生您們總聽過客家山歌罷，客家山歌就是三千年前外交聯誼上的賦詩歌。今天告訴大家這些訊息的意義乃是，以華人的文化傳統之根本禮樂，早就足以引領世界人類教育學習的水準。但是很可惜，兩千餘年來我們是一代不如一代，不識自己高層次水準的文化傳統漢學儒家之源頭根本了。

再看看百餘年來，歐美資本主義社會挾其船堅砲利，而衝垮了世界各國的學者專家對自己個人的學問

修養的信心，在這方面尤以華人為最。崇洋媚外至今依然如故，任何事務包括教育學習，皆以歐美為馬首是瞻，反而對自己的學問修養一點信心也沒有。在這種情況下，更顯示華人自己長久以來，不但對自己個人的學問修養的信心不足，更告訴大家，沒看通那屬於世界主流的教育學術思想漢學儒家，是非常明確的事。

今年4月26日中國評論新聞：美國媒體憂孔子文化大舉入侵，設法平衡影響。中評社北京4月26日電：號稱世界文化大熔爐的美國，近來一反常態，擔心中華文化通過如雨後春筍般發展的孔子學院“大舉入侵美國”。吾個人由這則報導發現了三件重大問題：一、全世界包括華人，其實都不了解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漢學儒家。二、歐美資本社會的教育學習同樣有重大的缺失。三、華人這一、二千年來對文化傳統的認識不完整，不但自己的教育辦不成功，更錯失引領世界人類的教育學習。

其實孔子學說就是傳承漢學的源頭根本——禮樂教化，而衍生出治國之道、教育文化、社會安定、家庭親情倫理、以及個人的學問修養等等，皆於禮樂教化中可得。但是，我們對孔子的了解與關注只在於：論語中君子的為政之道、忠、孝以及仁、愛等等的修養，卻不清楚任何學問修養與成就，必須經過正常完整的教育學習，甚至成就為各式各樣的科學家或專家學者等，同樣得經過正常完整的教育學習，而你我方有一定程度的機會。正因為我們對孔子學說的認識有所不足，才造成美國媒體憂孔子文化的大舉入侵。而於今之計，惟有重新認識孔子、重新認識漢學儒家仍為時不晚，來得及，否則誤人誤己。

最重要的一件事，請大家記住并公告天下：漢學儒家乃是世界主流的教育學術思想；若對主流的教育學術思想能講清楚說明白，那麼世界各國還有甚麼疑慮可言呢？反而最讓人擔心的是華人自己，對漢學儒家講不出所以然，無說服力而感到憂慮呀！總之，對文化傳統有信心，就表示對個人自己的學問修養有信心。大家繼續努力，加油！加油！

論海峽兩岸書法藝術的傳承與發展

台灣中華國際文化藝術交流協會理事長 趙善燦

中華文化歷經五千年，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其書法藝術，亦為傳統文化之精粹，內蘊深厚。可遠溯自商、周、秦、漢、各朝以降，均重視並提倡書法藝術之發展，一脈相傳，代不乏人。進入現代，由於西方文化傳入之衝擊，電腦工業發達，印刷機之普及，以致書法之實用性弱化，文書作業以機械化取代，故對書法之書寫工作興趣降低，學習精神淡漠。大陸歷經上世紀七十年代的十年文革動亂，無數的古代精美的書法作品、經卷、文學詩文集等被毀，眾多書法教育家入罪，因此在中國書法的發展史上形成了十年的斷層，道致現今書法藝術之繼承不足；又因當前功利思想的驅動，以創新為藉口，用嘩眾取寵的手法，脫離漢字和書寫的基本法度，浮躁的風氣盛行。

現在要如何堅持優秀傳統，從繁榮傳統藝術、弘揚時代精神和保護民族文化、提升中華文化競爭力，確實需要認真探討現今書法藝術發展中所遭遇的問題，以便穩健地持續發展。大陸自改革開放以後，思想自由，體認到中國傳統文化之重要性與海內外交流的影響，便積極推行書法藝術之復甦，至今已呈蓬勃發展之勢，全國上下，書會林立，推展書法藝術之風潮日盛，一掃文革時之陰霾，此實為可喜之現象。

大陸的近代著名書法家甚多，如啟功、趙樸初、錢君匋、沙孟海、沈鵬、劉炳森、林散之、沈尹默、鍾明善、王崇人、歐陽中石等諸位先生，對書法藝術之推展和弘揚不遺餘力，受到海內外文化人士的景仰。然而大陸推行簡體字，實有礙傳統書法藝術之發展。從各機關所懸掛的單位名匾和市招所寫的簡體字書法可以看出，實在沒有傳統書法字形表現來得幽雅。因為中文傳統的每一個字，都是根據象形、指事、形聲、會意、轉注、假借的“六書”發展而來，整體的楷書，不只是一種表達思想的書寫工具，更是中華民族可貴的書法藝術，一個民族的文化要永續發展，文字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優秀的民族必然要有優秀的文字來傳播、保存與發揚光大，世界上歷史悠久的文化古國莫不如此。因此，如何善於保存優美的文字，是延續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條件。簡體字的實行，是值得大家一起來檢討和深思的。

台灣，根據歷史的考證，早期經西班牙及荷蘭人所佔領。自一六六一年，明朝遺將鄭成功收復台灣以後，閩、粵沿海同胞大批遷移來台，中原文化才植入台灣，後經清代的統治，書法藝術逐漸傳衍。由於清代在台實施科考取士制度，並於道光三年（一八二三年）產生第一位新竹鄭用錫為進士，全台興學風氣大盛之後，書法也隨著科舉產生的讀書風氣而逐步受到重視。至一八九五年中日戰爭，清廷戰敗，將台灣割讓予日本，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侵華失敗，無條件投降，台灣重回祖國的文化體系。雖在這段長達五十年的歲月受到日本的殖民統治，但是台灣人民畢竟是中國人的血脈，即使受到日本皇民化教育的侵蝕，卻仍然堅持中國的文化傳統，雖然以詩文結合書法的帖學為主，但是文風及書風之盛並不遜於前清。到了日

據晚期從日本輾轉傳入的碑學書法，為台灣婉約的行草書風注入新意。

1949年以後，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在大陸已有極高成就的各界人士及政府人員大舉入台，許多人都是文化的菁英，其中不乏在書法已有相當成就的書家和學者。來台的書家中，最有影響力的應推于右任先生。他不僅是當時的黨國大佬，擔任監察院院長，更以精湛的書法造詣，很快在台灣掀起于書風潮。他的碑體基礎所融合而成的書法風格和整理草書所創起的標準草書，都在台灣的書壇造成相當的震撼。于先生來台已是晚年，書法風格之敦厚被喻為當代第一人，雖然在民國五十三（一九六四）年以八十六歲高齡謝世，但是對於台灣書法的發展至今仍有相當的影響。

除了于右任先生以外，來台在書法具有相當影響力的當推吳敬恆先生及溥儒（心畬）先生等人。除了他們在書法的成就外，更重要的是本身的身分。吳敬恆先生以篆書見長，來台後沒幾年，即於民國四十二（一九五三）年以八十九歲高齡過世。由於他在大陸期間曾擔任過國民政府主席，是德高望重的黨國元老，所以他在書法的高超功力，在政治力高於一切的時代，更是受到相當的推崇。而另一位有影響力的溥儒先生，不僅書法高妙在詩文繪畫上成就亦高，堪稱來台詩書畫三絕成就甚高之藝術家，溥先生是前清末代皇帝溥儀的堂弟，具有王孫的身分，來台後受到相當的重視。溥先在民國五十二（一九六三）年過世，雖然畫名高於書名，但是對於台灣書畫藝術水準之提昇及普及，具有相當影響。其次是來台的人當中，如董作賓先生帶來了台灣以往從未有的甲骨文古文書法，及金石書法大有成就的高拜石先生和丁念先先生等都甚為突出，開古文字及金石書法之先河。

近年來推展書法教育活動的書法家首推張炳煌先生，他1949年出生於基隆。私立世界新聞傳播學院畢業精研各體書法，旁及詩文水墨畫等。1981年開始，在電視三台聯播主講“中國書法”及擔任“每日一字”標準國字書法示範近二十年，並全力投入書法教育及推展運動，使得台灣書法藝術蓬勃發展，享譽國際。十年前為強化電腦興起為推動書法之助力，於2001年開始與淡江大學資訊工程教授，共同研發“E筆書畫系統”，目前為全球最先進之數位書寫工具。在書法學會方面，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中國書法學會等對書法藝術之弘揚與推展，功不可沒。在電腦普及的現今，年輕的學子們，不再使用毛筆寫字了，這對書法的傳承基礎確實產生了影響，書法在台灣有沒落的趨勢，能夠寫出一手好字的新生代越來越少，台灣年輕人整體書法水準降低。其實我們也不必過度憂慮，儘管電腦越來越普及，但書法可以與科技結合，比如字型設計等，都是書法發展的出路。

中國的書法有其不可取代性的優勢，因為它屬於華人及東方世界獨有的文化藝術。儘管電腦利用鍵盤飛速地打好一篇文件，但是書寫有其多變性，書體可任意選擇，草書、行書、隸書、篆書及其大小可零活運用，電腦則不能。正如歐陽中石先生所說：“作字行文，文以載道，以書煥彩，切實如需”。他解釋說，在今天來說，“作字行文，文以載道”的功能，可以用印刷的書籍和電腦的資訊化處理，可以更加快捷地完成，那我們的書法還能幹甚麼呢？歐陽中石的回答是，書法可以煥發它的光彩。這樣寫和那樣寫，情況就不一樣。可以把它寫得非常工整，展示它的肅穆、莊嚴；也可以用草書的辦法來寫，展示他的靈

動、節奏。這個“彩”是用手展示出來、煥發出來的。但這裡有一個最重要的原則，就是“切實如需”，就是要切合時代的要求和需要。我們對於書法應該有本質與價值的認知，書寫是書法創作與鑒賞的思維核心，也是書法傳承發展的根本影響。日本學者石川九楊教授在其《書法是怎樣的藝術呢》書中認為“筆觸”才是書法之美的核心，他對日本的書法藝術思想發展曾深入剖析，也有其自我的體會。

筆者也認為書法是一種線性的造形藝術，由墨液透過筆尖的移動所寫成的墨線形體，作者可依漢字的基本結構為規範，從心而出，自由發揮，千變萬化地可創造出無窮個形體且萬人不同。從筆尖移動的速度、方向、輕重和墨液的濃淡，會自然產生各種不同的墨韻效果而形成的美感，表現出幽雅而莊嚴，可謂一種墨色的抽象藝術。如果書寫的是詩文，其內涵必具有深遠的情感和意境，在欣賞者的腦際會自然透露出各種畫面，是高山或海洋、是愁苦或歡欣，前賢曾說：文中有畫、畫中有詩的奇妙感受。所以筆者支持書法藝術就是美術論的觀點。

書法藝術是我國的國粹，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先人們將中華文明與道德融於漢字書寫，在書法的語言裡，大到恢弘宇宙大道，小至個人處世哲理，化為生動的筆墨意象，書法與中國文人的內在生命精神血脈相連，融為一體。書法不僅僅是“技”，是“藝”，更是“道”，尺幅天地，構建的是中國人的精神家園。今天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又有多少孩子還在學習中國的傳統文化包括書法？記得以前有一位日本的書法家曾對我們說：三十年後，歡迎你們到日本來學習書法。堂堂中華文化大國的我們還能再不反省和警惕嗎？



對兩岸文化合作之建議

台灣中國全民主統一會嘉義屏東分會會員 龔仁漳

1、中國文化部部長蔡武先生鼓勵台灣業者在大陸設立合資、合作、獨資經營的演出場所經營單位，支持台灣演藝經紀公司在大陸設立分支機構等，努力為台灣業界來大陸從事文化產業提供更好的服務，開創兩岸文化交流合作互利共贏的新局面。

【具體建議】：文化事業也要有利基，要有智慧財產的保障。

2、中國教育部副部長袁貴仁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教育部決定，參加台灣大學入學考試學科能力測驗，且考試成績達到台灣一流大學錄取標準（頂標級）的台灣考生，可直接向大陸高校申請就讀，經學校面試達到錄取標準即可入學。鼓勵、支持兩岸高校通過校際交流合作，實施互換學生計劃，並相互承認學分。

【具體建議】：成功例子多少，要追蹤輔導，讓學生現身說法。自然抉擇，不必強求。

3、中國廣電總局副局長田進在專題研討發言時公佈，允許台灣有線電視網絡服務公司，在福建省提供有線電視設備和相關技術諮詢服務。同時鼓勵台灣業者經批准在大陸參與合拍影片，建設、改造電影院，發行大陸影片等，以期進一步促進兩岸電影交流與合作。

【具體建議】：合拍影片，商業導向，自然需求，不宜政治指導，也不必負責盈虧。

4、中國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鄔書林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新聞出版總署將把北京、上海、福建、江蘇、浙江作為兩岸出版交流試驗區，支持兩岸業者以版權貿易形式合作出版科學技術類期刊。對在大陸台資企業開發並入圍國家重點網絡出版工程的精品項目，在表彰、獎勵、宣傳、資助等方面與大陸企業同等對待。

【具體建議作法】：智慧財產特別重視華人世界仿冒抄襲損害利益問題。重刑重罰！

5、論壇發表共同倡議提出，要以舉辦此次論壇為基礎，建立並逐步完善兩岸教育界人士就青少年社會教育進行定期交流的平台，進一步擴大兩岸教育交流的成果。

【具體建議】：定期交流平台，形成常態，吸取經驗，學習台灣早年救國團的經驗，讓青年學生喜歡，符合孩子們需求。

6、我們有責任攜起手來針對青少年社會教育面臨的新情況、新挑戰，展開教育科研和創新實踐活動，為兩岸教育事業的發展、為兩岸青少年營造良好的教育和發展環境作出積極的貢獻。

【具體作法】：透過民間或是大學社團服務青少年會更有吸引力。

7、中國教育學會中學德育專業委員會常務副理事長董柏林說：“雖然兩岸教育體制不同，但論壇促使兩岸教育界首次就青少年社會教育進行了充分的交流和研討，這是最大的豐收。”

【具體建議】：論壇要回收問卷，效益評估，而且回去之後電子郵件繼續鼓勵參與者提供批評指教，才能得到真心話，不是客氣話。

8、過往圍繞經貿議題展開而變為推進和深入兩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重點研討了包括中華文化傳承與創新、推進兩岸文化產業合作、拓展兩岸教育交流合作等三項議題。

【具體建議】：文化傳承太沉重，創新不易。

9、教育一題，最為各方所關注。涉及到教育的就有兩大方面：其一是促進兩岸教育交流與合作，提升兩岸教育品質；其二是共同探討協商簽訂兩岸文化教育交流協定，建立兩岸文化教育合作機制。

【具體建議】：品質把關，兩岸一起訂定，合作機制可以長期磨合。

10、兩岸教育的交流仍存在著一係列的制度性障礙，比如大陸學生赴台交流存在時間限制、兩岸學歷仍未實現互認等，制約了進一步發展。

【台灣障礙】：民主發聲，少數媒體或是反對黨阻撓，如果批評有理，可以檢討。如果民意少數支持，反對就沒有市場。

11、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在開幕式發表演講時明確提出：“在兩岸關係進入和平發展軌道的時期，兩岸學校、教師、學生以及家長對加強兩岸教育交流合作提出了更強烈的呼聲、更高的要求。”

【台灣方面】：政治口號或是訴求，台灣民間比較被動，不要忘記這是事實。冷漠慣，吵的是那些特定人。

12、學歷互認的問題，這一條非常重要，因為每個學生求學之後都希望自己的學習經歷能夠得到認可，否則，他就會對是不是到對方的學校學習產生顧慮；另外，最近兩年，很多大陸的高校學生以交換生的名義到台灣高校學習一年，我們也希望能夠對這些學生有更多的輔導。

承認學歷是早晚的事，問題在於信任，還是求證管道，文書認證的精確度。

13、我們要有一個統一的招生錄取計劃，但是這個計劃還要根據學生的需求量來考慮，如果學生的需求本來不多，比如大陸的學生到台灣後，發現當地的教育品質並不如想像的高，而更願意選擇到香港或是去國外就讀，那麼我們政策的意義就不大，我們首先是要尊重學生的意願。

台灣：支持尊重學生還有學生家長看法。

14、早在2006年，大陸就開始承認台灣高校學歷，福建省於2008年下發了《關於實施閩台教育交流與合作工程的意見》中，更明確提出，“全面擴大大本科院校、高職院校和中等職業學校招收台灣學生的範

圍，增加各院校招收台灣學生的學科和專業。”但是，在台灣方面就大陸學歷的認可及招生政策，則存在著一定的“不確定性”和“模糊性”，有較多限制。您怎麼看待目前這種兩岸教育交流中所存在的不均衡的問題？

【意見】：慢慢會把障礙撤除。大陸和台灣優秀學生，終將出頭，壓抑是徒勞無功的。

15、關於兩岸教育交流的優惠政策，都是大陸方面率先宣佈的。我們就給予大陸學生相應政策優惠也跟台灣相關主管部門有過溝通，但是結果並不是很好。

首先，學歷確認就一直沒有得到對方的回應。我最想表達的一句話，就是我們制定政策，要為兩岸的學生考慮，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滿足兩地學生求學的需要，盡可能給他們創造方便。尊重他們的選擇意願，給他們求學成才創造條件，這是我們應當做的事情。

【台灣看法】：善意之後，假以時日，輿論自然會出現良性發展。

16、台灣到目前為止不承認大陸學生的學歷，主要出於對大陸高校學生品質存在質疑，您怎麼評價這種說法？

袁貴仁回答：“我認為這種理由並不成立，大陸高校的學歷、學位在全世界範圍內被很多國家和地區所承認，這些國家和地區很多又都是教育發達國家。”

【看法建議】：少數懷有排斥及敵意，這是一些媒體及政黨運作，私下耳語傳播，其實開放或是自由存在，尊重學歷，對等和平友好是大多數人的期望。

17、台灣教育界還有另外一種擔心，怕學歷互認後，很多台灣學生會跑到大陸這邊來就讀高校，導致台灣高校尤其是一些所謂“後半段”的高校會更難招到學生，從而威脅到台灣高等教育的未來發展。您又是怎樣看待這種擔心的？

其實，隨著教育全球化的發展，學生是可以在全世界範圍內流動的，我們現在考慮所有的問題，包括教育問題，應當考慮國內、國際兩個市場，應當考慮國內、國際兩種資源。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個地區都要採取這樣一個開放的態度來滿足廣大群眾對於教育的需求。

【個人看法】：兩岸的經濟、收入、學費還有特色會自然互相吸引學生，這無法人力阻擋，也完全任由學術自由，自然淘汰，自己選擇。所謂尊重市場機制，學術也是如此，教育產業也是如此。

18、兩岸交流需建立固定機制交流就包括兩岸之間老師的交流、學生的交流等；合作則包括兩岸之間開展教育項目的合作。我們現在要在過去多年的工作基礎上解決兩個問題，一個是搭建平台，兩岸需要一個平台來開展合作；第二就是建立機制，我們在這個平台上形成一套制度，每年做，定期做，現在我們需要把它制度化，常規化，而不是僅僅在點上的工作。

【看法】：思考要周詳，制度辦法都要機動調整，不能一個制度死守，或是被動被迫修改。

19、我們希望能夠探索一條有利於兩岸教育交流的一套體制機制，這樣可以使得我們的工作能夠長期堅持下去。胡錦濤總書記與吳伯雄主席會談時都認為，國共論壇是一個成功的論壇，應該繼續辦下去，而且要越辦越好；都贊同要積極促進兩岸文化教育交流，舉辦以文教交流為主題的兩岸經貿文化論壇。根據雙方的共識，本屆論壇首次以推進和深化兩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為主題，重點研討中華文化傳承與創新、推進兩岸文化產業合作、拓展兩岸教育交流合作等三項議題。這樣的設計順應了新形勢下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需要，反映了兩岸大多數民眾的共同意願。

【看法】：學者或是民間意見非常好，充分表達了最好的一面。

20、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孕育著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創造力。文化與教育相伴而生，相隨而長，文化給教育以社會價值，教育給文化以生機活力。縱觀古今中外，文化的光大昌明莫不始於交流、基於教育。中華民族歷來強調人文教育，早在兩千多年前的古老經典《周易》中，就有“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論述。兩岸文化教育事業的進步需要交流，兩岸關係發展需要來自文教交流的動力，更需要強有力的文化認同、民族認同的支撐。開展兩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對推動兩岸關係發展具有基礎性、全局性、長遠性的重要作用。

【回應及補充上面的精彩意見】：活的文化是不斷吸收，不斷交流，交相影響的。隔絕是違反人性，阻斷生機的。因此看到這些“文化”、“教育”的根本工作才開始，後面的發展影響深遠，對於兩岸是良性的，光明正面的。多了解，彼此尊重，會贏得大多數民心。

21、號召兩岸同胞攜手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同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充分體現了我們為兩岸同胞謀福祉、為台海地區謀和平、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決心和誠意。講話全面系統地闡述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思想，提出了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六點意見，描繪了新形勢下兩岸關係發展的美好藍圖。

【看法】：民族主義是孫中山再三強調的，兩岸不必刻意鼓吹，意識自然可以形成。另外還有一些遠大目標，在於兩岸各有優勢，發揮長處，互相鼓勵競爭，歷史上從來沒有和平統一的前例，我們先由教育文化找出共同利益，共同價值觀，融合發展出最新的文化，國家統一在文化基礎，才是堅固的，也是開創歷史新頁的。

22、關於弘揚中華文化、加強精神紐帶的意見，號召兩岸同胞共同繼承和弘揚中華文化優秀傳統，凝聚推動兩岸關係發展的共同意志，形成共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力量；宣導協商兩岸文化教育交流協定，推動兩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邁上範圍更廣、層次更高的新台階。這是兩岸共同推動兩岸文化教育交流的基本思路。

【補充】：孔子學院之外，是不是諸子百家思想菁華也摘取適用好用的讓所有中華兒女受益？儒家是核心，名家的菁華也不宜放在門外排班。意思是百家爭鳴，造福國家。

23、兩岸文化教育交流從無到有，從單向發展為雙向，活動日漸頻繁，內容豐富多彩，形式多種多

樣，領域愈益拓寬，規模不斷擴大。

【建議】：發展的式樣多，核心目標應該拿捏準。

24、增進中華文化認同、中華民族認同，建設好我們共同的精神家園，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促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此提出以下五點意見：

第一、維護兩岸共同的中華文化傳承，加強兩岸同胞的精神紐帶。

第二、推進和深化兩岸文化交流合作，增強對中華文化和中華民族的認同。

第三、推進兩岸文化產業合作，提升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

第四、加強兩岸教育交流合作，增添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蓬勃活力。

第五，協商簽訂兩岸文化教育交流協定，建立兩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機制。

孫中山先生提出了“振興中華”的口號。經過一代又一代中華兒女不懈奮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展現出燦爛的前景。偉大的復興需要偉大的文化，偉大的事業需要人才輩出。

【建議】：孫中山是兩岸最大的公約數偉人，他的思想和社會主義融合不違背的。

兩岸教育交流政策文化價值觀之評析

文化價值觀是人類進步的助力，如果反文化，就成為人類文明的阻力因素。

教育作為傳承與發展文化的機制，其本質是文化價值導向的活動。透過兩岸協商，慢慢將政策法制化，自然可以導引或規範人民，達成兩岸政府所預設的教育交流的文化價值。

兩岸在不同程度上仍屬精英決策模式，著重政治與經濟價值取向。政治精英習慣以出身、學歷及經歷等背景因素主導政策選擇，與一般下層民眾需求之價值取向的切身利益並非完全一致，所以容易造成文化價值系統的危機與衝突。如果將兩岸教育交流政策問題從歷史、經濟、意識形態和教育情境對照，從中了解兩岸教育交流政策的變遷，找出官方與民間價值觀的落差，才能對症下藥，才能得到更多數民眾支持。

兩岸教育交流政策文化價值是一個多元體系的價值。兩岸在適應全球化與資訊化的過程中，傳統“漢賊不兩立”、“有我就不能有你”、“有你我就退出”的文化價值體系，必然會被一個多元的“有你、有我”、“合作、發展”、“人性、尊重”的文化價值體系所取代。因此，建議政治精英，兩岸執政者以包容的心，宏偉格局，開創兩岸教育交流政策。以前是拳頭槍砲屠殺的鎮壓，現在重視民意，強調溝通，單憑軍事、政治與經濟手腕，是無法釐清兩岸盤根錯節般的關係。

兩岸教育交流政策，若能跳脫五十多年來著重政治與經濟的價值觀，逐漸轉向提升人性的文化價值。兩岸人民學習提升公義、良善、合作、尊重、信義、愛好和平與關懷等人性價值，必然可以引導兩岸教育交流政策朝向良性互動發展。

錢穆先生曾云：“一切問題由文化問題產生，一切問題由文化問題解決。”東方傳統王道思想和作法是：“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而不是強調武力。西方學者也認為文化價值觀與態度，是造成進步的因素或阻力。杭廷頓（S.P. Huntington）於“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一書中說：“世界文化的分布反映了權力的分布”類此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的說法，受到各界批判，擁有文化價值領導權者，會通過教育場域來取得人民的認同，但也容易造成人民之間、人民與政府之間，甚至政府與政府之間的衝突。化解衝突，取得諒解和共識，目標正確，過程辛苦，但是果實必然甜美。

教育有傳承與發展文化的機制，本質是文化價值觀的活動。教育活動從一開始便是意欲達成某種預設的或者人們所相信的價值。因此，兩岸教育交流中，被政府選定的文化價值觀以政策為中介，進而透過政策法制化規範人民，達成政府所預設的價值。目前兩岸是不是取得一些共識，順應兩岸民間交流，也開始政府對等交流，先由經濟開始互利，進一步達到文化教育的質與量的大改變？我們樂觀其成也期待朝向好的方向邁進。

【總結論】：

一、促進兩岸和平統一的長期努力目標完全符合兩岸人民的期待與效益，日後更當積極繼續務實推動，增進兩岸民間企業團體之互訪交流，多溝通與協調必能達成人民共識，排除之間的政治障礙與意識上的紛歧，依序漸進、共同努力，以達兩岸國家全民的最大效益為理想，以建兩岸和平統一大業為長程願景。

二、促進兩岸和平統一的長期努力目標當優先考慮兩岸分治現況，勿以大國小邦之心態對待，大陸當公開聲明對台放棄武力威脅(建立互信的基礎與民心)、不在國際上對台灣地位的打壓(給予平等待遇與競爭空間)，展現和平統一的善意作法並與中華民族情感與兩岸經濟共榮圈的促進形成乃是確立兩岸交流良性互動和平統一的首要基礎。

三、促進兩岸和平統一的長期努力目標當以中華文化教育交流創新產業為共同發展基礎，文化與教育是一項傳統與創新的匯集產業與使命，提升學術新知的產值並與世界接軌，結合兩岸科技智慧創作提升人民生活品質並造福世人，兩岸文化教育交流將使兩岸的思想價值相當並產出自然融合的新力量(未來新中國的新思潮新主流勢力)。

發展兩岸文創產業可達雙贏

台灣中華崇德協會顧問 賈寶俊

繼以製造代工為主的“資訊產業”之後，“文化創意產業”被視為第四波的經濟動力，特別在世界各地陸續發生金融風暴，局勢丕變，以往被視為虛幻無形甚至不切實際的創意產業越來越被重視，許多國家的政府開始投注更多的資源，以擴大或整合規模與產值，並輔導及吸引民間投資，來提昇文化創意產業。如何保有文化特色及藝術創作，將創意與智慧財產結合，進而創造財富與就業機會，便成為各國兼顧文化與經濟發展的重要政策之一，例如英國提出創意產業概念、韓國推動數位內容產業發展、中國大陸頒布文化創意產業振興規劃包括台灣通過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等。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海峽兩岸都將文化創意產業視為新興經濟的發展重點，也正因為如此，許多相關的產業便面臨到競爭與合作並存的情勢。分析看來，台灣的優勢在於自由的創作環境，開放的多元社會，優秀人才輩出，尊重智慧財產權，而民間的創造力與藝文活動也呈現多元與多樣性，且科技發達、網路進步，擁有透明充足的資訊，接受新事物與觀念的可塑性高。弱勢則在於地方小，無法靠內需市場形成產業，國際市場的開發力也較弱，政府主管單位分散，缺乏整合，政策又容易受政治因素影響，資金來源不足不定等等。而中國大陸的優勢與劣勢恰巧幾乎與台灣相反。所幸在兩岸交流過程中，文化交流一直是一個比較開放的領域。無論是電影、電視、新聞、出版、廣告、設計、展覽、流行音樂、數位娛樂、動漫、視覺藝術、表演藝術等各領域，兩岸的民間合作，早就透過各種管道，依各自專業的需要有所開展。

事實上，台灣與中國大陸在文化創意產業推展方面已經進入新的互動階段，並且開始了許多合作的討論與計劃，包括“中國北京國際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2010海峽兩岸文化創意拔尖與學術卓越研討會”、“廈門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對策研討會”、“海峽兩岸（廈門）文化產業博覽交易會”、舉辦數屆的“海峽兩岸文化創意產業展”等等，一直到最近的“2010上海台北雙城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兩岸不管官方民間都在思考如何以整個華人生活圈作為腹地，利用中國大陸龐大的市場、資金、政策，加上台灣優秀的創意、人才、文化素養，互助互補一同建立領先世界的文創產業品牌。但是其中依然不乏有需要改進的部份，就像是許多鼓勵合作的討論與活動，容易流於空洞的形式，加上大陸的數位內容方面的產品重量不重質，用很低的成本就能創造豐碩的利益，導致台灣縱使有比較優秀的創意與品質，也會被忽視。不過隨著時間與觀眾素質的成長，相信所有內容作品都會更為精緻、更為講究，期盼更實際的政策計劃被落實，讓創意與製作緊密結合，將目標從利潤考量拉高到文化層次，再回饋到收益成果，利用文化感染力，在全球創造出更豐碩的雙贏成就，讓全世界變成華人的市場，前景將不可限量。

統一先從文字開始

台灣寬信聯合律師事務所律師 陳麗玲

台灣在解除解嚴之前，以統一中國為核心理念的反攻大陸，一直是基本“國策”之一；解嚴之後，隨著蔣經國先生過世和李登輝繼位，在政權更迭中，即使台獨聲浪日益喧囂，但連最獨的陳水扁都曾對宣布獨立一事公開說過：“我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加上馬英九就職之後，兩岸經貿合作快速發展，短短一年間，兩岸經貿關係逐步走向正常化，且大有突破。海基會與海協會歷經十年光陰終於重啟協商談判，相繼簽署“海峽兩岸包機會談紀要”、“海峽兩岸關於大陸居民赴台旅遊協議”，促成兩岸週末包機直航、大陸人士來台旅遊等政策，並於第二次江陳會簽署兩岸空運、海運、郵政、食品安全等四項協議；復於去年4月底，簽署“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海峽兩岸空運補充協議”和“海峽兩岸金融合作協議”。如今，象徵“終極統一”的ECFA業已簽訂，台灣在歷史進程的大方向，仍是朝著“統一”的方向前進，最多只有路線、快慢等枝節的差異而已。

而大陸方面，為追求、捍衛民族以及國家主權的統一，“血洗台灣”、“解放台灣”也是中共十三屆三中全會以前的基本國策。時至今日，在追求統一的主張上，舉世公認大陸方面比台灣更主動、積極和迫切；“反分裂國家法”的出台，更在法理上賦予統一的法源依據。

既然兩岸在歷史進程的大方向上，都朝著統一的方向前進，但談起統一，公認仍有許多障礙、難關暫時無法跨越，理由為何？一般而言，歸因於政治現實、意識型態和文化差異。其中政治現實和意識型態，在人類歷史上看，都是形格勢禁的東西，會隨著時間的推移或外在因素的改變而消弭，其內涵極為複雜，本文姑且不論；但文化差異卻極難統合，且文化差異往往是引發戰爭的重要因素。

兩岸中國人同文同種，照理不該有所謂文化差異；但現實卻是兩岸分隔60餘年，在不同意識型態和發展過程中，的確產生若干文化差異，其中最顯而易見的，就是文字和名詞的差異。文化的概念繁複，要消弭文化差異，確非一日之功，但就目前兩岸文字和名詞的差異先謀統一，卻是兩岸政府有能力做得到的。文字和名詞的統一，絕對有利於消弭或拉近兩岸目前的文化差距。

大陸方面推行簡體文字的主要理論依據，是郭沫若的一篇文章《由周初四德器的考釋談到殷代已在進行文字的簡化》，該文片面認為漢字的簡化趨勢是從商代開始，而推論出漢字是朝簡化的方向發展。但師大國文係教授季旭昇老師已明確無誤的考證出郭文的諸多謬誤。季教授以殷代甲骨文第一卷為樣本，經過統計後的結論是：殷代文字雖然已經有簡化，但繁化的現象卻更多，可見文字發展的大趨勢是繁化，而不是簡化。在季老師的統計中，殷代甲骨文中繁化字是簡化字的1.6倍；而季老師在95年4月20日所發表“文字發展的大趨勢是簡化嗎？”一文中以戰國文字為對象所做的統計，繁化字佔15%，簡化字佔9%，繁化是簡化的1.6倍，二者的比例完全相同。這顯示文字的演進總是繁簡同時，互相制約的。只要文明不斷進步，文字

演進的大趨勢總是向繁化進行，而無論其繁化的方式如何。

平心而論，大陸方面推行簡化字的深層原因，其實還是意識型態作祟。當年北洋政府時期“國語推行委員會”主要成員蔡元培、吳稚暉、胡適等人，在中共的認知中，都是國民黨人和“冥頑守舊的右派分子”，尤其是發明“注音符號”的吳稚暉，更因為“反共”最力且身為先總統 蔣公倚畀甚深的“國師”與經國先生的老師，所以中共建政之後，摒棄“注音符號”而採羅馬拼音。但兩岸學界的學術著述中，大多承認“注音符號”的確比羅馬拼音更能準確標示漢字發音。陸以正大使曾撰文指出：50餘年前，大陸公佈“pinyin”制度時，國外所有教授中文的學校都抱懷疑態度，各國的中文圖書館更同聲反對。時移勢遷，這股潮流今日已無從抗拒。台北市為與世界接軌，也被迫採用了它。若與台灣習用的威妥瑪制(Wade-Giles system)相較，漢語拼音確與中國話發聲比較接近，但仍有它的缺點。缺點之一是它與威妥瑪制同樣缺乏顯示四聲的指標。最近買到大陸新出版的字典，對這點已有改進，就是在母音上端增加了平上去入的符號。缺點之二是，連在一起的兩個母音如何分割，仍然混亂不堪。威妥瑪制用連接號(hyphen)表示，最常見的“西安”拼成Xian，初來的外國人無法了解這原是兩個字，會誤讀為“縣”。同樣地，台北市的Daan，怎樣也難使老外唸時，還原成“大安”區。西安有些飯店在Xi'an中間加了一撇，作為補救。這種做法雖解決了困難，似乎與中共原先的規定不合。而且借用的那一撇，在威妥瑪制是往上挑，與英文所有格往下撇(apostrophe)有別，只是當地臨時應急的變通之道，他地無從效法。至於兩岸的名詞差異，諸如“宵夜”和“夜宵”、“計程車”和“出租車”、“法治”和“法制”、“電腦”和“計算機”、“貨櫃”和“急裝箱”等等，更難一一列舉。

言歸正傳。大陸方面推行簡化字的結果，就是例如“鍾”、“鐘”同為一字，“發”、“髮”難以分辨，“受”、“授”合一而意義相反，“面”、“麵”混淆不清。曾到大陸旅行的國人，都感覺怪怪的，只會把人弄得更糊塗。在文化保存方面，兩岸的學者都承認正體字優於繁體字，注音符號優於“pinyin”；而大陸方面目前不願意恢復正體字的理由不外乎“正體字使用人數少”以及“學習或書寫困難”而已。

先就“正體字使用人數少”而言，使用正體字並非只有台灣2,300萬人而已，連海外華僑在內，少說也有5,000萬左右，大家同樣是龍的傳人，都有繼承發揚中華文化的責任，不該剝奪他們的權益。更何況，只有認識正體字，才能享受中華文化豐富的遺產。大陸今天的智識份子，不論簡體正體，都難不倒他們。換句話說，幼時教簡體字，其實只把學習時間拖長十幾年，分為兩個階段而已；為何不一次就教會正體字，免得麻煩呢？

再就“學習或書寫困難”而言，正體字筆劃雖然多些，書寫確實多費些時間，但大陸13億人口中，已有2億人會使用電腦及網路，電腦普及後，按幾個鍵就會出現一個字，筆劃多少已經失去意義，不能再成為使用簡體字的理由了。

此外，兩岸政、學兩界已有多人提出“識正書簡”和“官正民簡”或“公正私簡”等過度方式，都預先設想到大陸方面“捨簡就正”時可能遇到的困難並提出解決方案。大陸方面為追求統一，每年耗費人力、物力、財力至鉅，推動及名詞文字統一，費少而效巨，何樂而不為？

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

台北市議會副議長辦公室主任 楊立

前言

族群問題，在當前台灣社會中，是每逢選舉必被炒作的議題。絕大部分的政治人物，都信誓旦旦的指稱自己沒有族群意識，甚至經常義正辭嚴，絲毫不假詞色的批判挑撥族群爭議的政治對手。但事實上，族群問題已經成為每個主要政黨擬定選舉策略時，必然會慎重考量的元素之一。

在一般的認知中，台灣的族群問題好像由來已久，絕大部分的台灣人民，都想當然的以為，自1945年或1949年之後，台灣就存在著所謂的族群問題。但在王甫昌教授的深入研究之下，我們才赫然發現，當前台灣最敏感的族群問題，其實不過是最近十餘年才發生的事，而族群的定義，似乎也與我們的普遍認知有所出入。

族群的定義與特性：

依王甫昌教授的解釋，族群的定義是：“一群因為擁有共同的來源，或者是共同的祖先、共同的文化或語言，而自認為，或者是被其他的人認為構成一個獨特社群的一群人。”

在王甫昌教授的論述中，族群亦有下列的特性：

- 一、以“共同來源”區分“他群”及“我群”的群體認同。
- 二、是“相對性”的群體認同。
- 三、主要來自弱勢者。

令人驚訝的是，構成族群意識的最主要元素，居然是自我認知。當一個群體自我認知是一個有別於他群的我群時，這個族群就於焉產生。以台灣為例，所謂的閩南人、客家人和外省人，絕大部分都是來自中原地區的漢民族。這三個族群，雖然有時說著各自的方言，但大多數時候，都可以北京話互相溝通，且血緣、文化、風俗、姓氏、膚色都高度相同，只因為自我認知的不同，同樣講閩南語，世居福建省南方的金門人、廈門人，只要他的祖先是1945年以後才來到台灣的，就被歸類為外省人，而不是閩南人；同樣說著客家話，世居廣東省的潮、汕人，只要他的祖先是1945年以後才來到台灣的，一樣被歸類為外省人，而不是客家人；就算1945年以前就世居台灣的謝東閔和連戰，在大福佬沙文主義者的眼中，也不是道地的台灣人，只能算是“半山”。

除了自我認知之外，他人的歸類也是形成族群的原因之一，不論這個歸類是否合理，或是否為事實。譬如個人在第六屆立委選舉及第八屆立委補選中輔選的陳麗玲律師，她父、母親族都世居桃園縣蘆竹鄉，應該是道道地地不折不扣的台灣人或閩南人。但在選舉過程當中，她不止一次的被民進黨或台聯黨的候選人及支持者高罵“中國豬”，並要她“滾回大陸去！”

弔詭的台灣族群問題：

相較於美國因膚色不同而產生的黑白族群問題，或是北愛爾蘭和英國因為宗教信仰不同而產生的族群

問題，台灣的族群問題實在弔詭。

首先，除了原住民之外，不論閩南人、客家人或是外省人，都是同文同種的中國人。理論上，在台灣只應該有原住民和漢人的族群問題，實在不應該有閩南人、客家人或是外省人的族群問題。

其次，族群問題的特色之一，是弱勢者的群體認同。弱勢的族群自認為遭受不公平對待，而凝聚成一個共同群體意識，以爭取自身權益。但在台灣首先挑起族群問題的葉菊蘭、林濁水等人，都是在人數上佔絕對優勢的閩南族群。時至今日，在李登輝、陳水扁相繼把大福佬沙文主義發揮的淋漓盡致，閩南族群幾乎壟斷所有政經資源的時候，閩南族群仍不忘以愛台灣作為凝聚群體意識的口號，動輒訴諸悲情。

或許，在國民政府遷台之初，因為台籍人士的人才斷層，讓外省族群獲得超過人口比例的政治職務，會讓台籍人士自覺被壓迫。但奇怪的是，當外省族群面對原住民或客家族群時，彼此間所感覺到的族群意識，遠遠不如外省族群面對閩南族群時。如果在台灣劃分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和原住民四大族群的標準是正確的，為甚麼外省人和閩南人之間的族群問題，會遠超過外省人和客家人之間；外省人和原住民之間；閩南人和客家人之間；閩南人和原住民之間以及客家人和原住民之間？

此外，王甫昌教授的研究指出，優勢族群較不認為有族群問題，譬如美國的白人比黑人感受不到族群問題。但在台灣，不論那個族群，都明確感受到台灣族群問題的嚴重，幾乎四個族群都認為自己是弱勢，這更是台灣族群問題的弔詭之處。

如何看待台灣的族群問題：

依照王甫昌教授的研究，台灣四大族群的界定，是在1993年才產生的。依個人的心得及觀感，從“二二八事件”及國民政府遷台之後，直到蔣故總統經國先生過世之前，國民黨政府固然有“白色恐怖”，固然是“威權統治”，但對任何台籍人士或外省人，都是一視同仁的看待，甚至為了遷就或平衡“萬年國會”外省籍人士佔絕大多數的事實，還刻意不次拔擢省籍俊彥，此由彭懷恩、尹章義、陳癸淼等人的著述中，可以得到證明。

在那個時期所發生的政治事件，不論是“二二八事件”、“孫立人案”、“吳國楨案”、“彭明敏案”、“自由中國（雷震）案”、“李敖案”、“美麗島事件”甚至民進黨的成立，本質上都是台灣人民不分族群爭取民主與自由的過程，並沒有族群甚至省籍的因素。如果在“二二八事件”及國民政府遷台之後，直到蔣故總統經國先生過世之前，國民黨政府有打壓本省族群或閩南族群，謝東閔先生不可能有機會擔任副總統，李登輝更不可能擔任總統，陳水扁更絕不可能由一個三及貧戶的佃農之子，變成坐擁億萬家財的超級大總統。

國民黨第十三屆全國黨員代表大會時，力排眾議支持李登輝繼任國民黨主席的，都是外省籍中生代的宋楚瑜、趙少康、郁慕明等人。相反的，趙少康、郁慕明、陳癸淼、李勝峰等新國民黨連線成員發現李登輝的獨台傾向而離開國民黨成立新黨時，卻被李登輝極力打成外省黨，無視當時的陳癸淼、李勝峰、朱高正等人，其實都是省籍菁英。

1993年的9月25日的“九二五事件”中，個人親身在高雄市勞工公園，被民進黨群眾用冰塊、易開罐和雞蛋攻擊；2004年4月10日，個人也在台北市凱達格藍大道景福門前，被鎮暴警察用盾牌和警棍毆打。不論

在高雄市勞工公園面對民進黨群眾；或是在台北市凱達格藍大道景福門前面對鎮暴警察，我耳朵裡聽到的都是同一句話：“中國豬滾回去！”台灣當前所面對的，早已不是“族群議題”，根本是“族群仇恨”了！

不論我們如何鄙視政治人物為了政治利益挑撥族群、操弄民粹，我們都必須承認，佔有絕對政經優勢的閩南族群，會被絲毫經不起歷史檢驗的“台灣人的悲哀”挑起族群意識，是有其時空背景因素的，的確有部分閩南族群會被“台灣人的悲哀”撩撥起族群意識。但個人真的很疑惑，李登輝為了去中國化，不惜與所有生活在大陸和台灣的中國人決裂為敵，但面對“非我族類”的日本人時，為甚麼從來不曾為也是閩南人的慰安婦阿嬤們說過一句公道話？

王甫昌教授的研究指出，所有的族群，只是某個特殊時空下當代的分類而已。對早期的台灣人民而言，漳州人、泉州人或是惠州人、潮州人的身份，遠遠比閩南人重要的多，但時至今日，漳州人、泉州人或是惠州人、潮州人已不具意義。在中國大陸以及海外地區的客家人和閩南人超過一億，但對中國大陸以及海外地區的客家人和閩南人而言，客家人和閩南人的身份也沒有意義。而所謂的外省人，在大陸和海外有十幾億；即使在台灣的三、四百萬外省人，也分別來自卅三個省（台灣除外），分屬五十六個民族。所謂的外省人、閩南人、客家人和原住民，有只有在此刻的台灣，才會被人重視。放在整個歷史的脈絡中，我們的後代子孫一定會為我們今天去劃分外省人、閩南人、客家人和原住民的原因與動機而大惑不解。任何一個台灣的政治人物和政黨，都不會承認在操弄族群，也都失言要族群和諧、族群和解，但台灣的族群問題並未稍戢，一到選舉時刻，又會成為政治人物或政黨炒作的利器。

我們想問，到底是誰在操弄族群議題？答案應該是：“誰能從族群議題獲利，誰就有可能操弄族群議題！”民進黨、台聯黨、李登輝、陳水扁每次選舉高喊的“愛台灣”、“台灣人選台灣人”等煽情口號，固然是炒作族群意識，馮滬祥、邱毅等人在多席次的選舉當中，也是靠著切割以外省族群為主的深藍選票當選。操弄族群，已經是可以做、不能說的選舉利器。

結論：

生活在目前的台灣，任何人都很難自外於族群，就算真的有人不具任何族群意識，都難免被其他人歸類為某一族群。不論如何迴避族群問題，政客們在台灣肆無忌憚的高喊“中國豬滾回去”之後，到大陸做生意的時候卻可以熱情無比的握著國台辦官員的手，滿臉堆歡的說：“大家都是中國人！”再堅定反對台獨的外省人，到了大陸之後，一樣被歸類為台胞。在當前的台灣，族群問題是無法迴避的，如何看待以及因應族群問題，才是比較重要的課題。我們無法要求政客們不因為選舉利益去炒作族群議題，我們更難阻止因為當權者“去中國化”所激發外省族群的危機意識。在我們目睹族群議題不斷撕裂整個社會的時候，我們不知道該如何阻止，但我們很清楚的了解，族群鴻溝的深化，所帶給台灣人民的，只有無法預知的災難。

遙知兄弟登高處 遍插茱萸少一人

中國台灣致公黨主席 王瑞陞

王維在“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的詩句，以“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四句話表達對兄弟的思念，因內戰及帝國主義見縫插針，六十餘年來台灣多數具深厚傳統民族感情之同胞，莫不感慨在中華民族的大家族，仍是“遍插茱萸少台灣”，台灣終將回到這個大家庭。其理由分述如下：

一、民族大義

中華民族歷朝固有爭天下逐中原之實，但各族入主皆視為正朔，二朝為官為民，亦屬常態，惟台灣依附美、日帝國主義六十餘年，甘為馬前卒，為美、日利益張目，阻礙國之一統，即是背典忘祖，民族罪人，春秋之筆，必載史冊。

現今之中華盛世已勝過漢唐盛世，首要之務在教導或潛移默化台灣人民，回到中國人的事實與立場來思考兩岸問題，勿為他國利用而兄弟鬩牆，親痛仇快，國共內戰這一頁已然翻過去了，兩岸人民及主其事者，皆應以民族大義為基礎，以和平發展為手段為過程，以國之統一為終極目標。

二、民族感情與認同

劉鶚：“吾人生今之時，有身世之感情，有國家之感情、有社會之感情，其感情越深者，其苦泣越痛，……，棋局已殘，吾人將老，欲不苦泣也得乎？”，少小離家六十餘年，迄今莫不白髮蒼蒼，垂垂老矣，唯民族感情尚在，四百年一灣黑水溝相隔，縱經列強相繼殖民佔領，唯血緣、宗教、文化、語言之牽連不曾斷，現今海西經濟區之建構，像似祖堂迎接離家遊子返鄉的紅地氈，但海西經濟區不應以經濟為單一目標，更應納入血緣、宗教、文化、語言等臍帶連結，使民族感情與認同伴隨兩岸經濟整合更為落實。

三、血緣、宗教、文化、語言的連結

（一）血緣

台灣除高山族及平埔族等原住民外，四百年前鄭成功部將後代及明清以降唐山移民，大多係漳、泉、廈、潮、汕、福州及閩粵客屬，及國民政府軍民及其後代等，其血脈莫不是緣自大陸，各家各姓宗譜詳載在冊，豈容扭曲湮滅，應在百家各姓之發源地，每年各自舉辦世界級祭祖大典，凝聚各姓氏後代對祖先及祖國之向心。

（二）宗教

台灣無論佛、道及民間宗教莫不隨大陸先民而來，禮失求諸野，台灣山巔海角各個村莊皆虔誠膜拜無太上老君或媽祖、關聖等神明，對善男信女所傳達之教忠教孝，敬天法祖，影響深遠，除眾神明主廟金身來台巡境祝福外，並就眾神明在陸主廟，每年舉辦世界級祭拜大典，如消炎藥之於細菌，宗教的連結足以消滅台獨毒素。

（三）文化

中國之大，各省市、地區及民族有其特殊文化，但也因歷史長河中歷代間相互影響，產生大同小異的人類生活內涵，包括建築、節慶、習俗、曆法、食衣、倫理關係、社會關係等，但台、閩之間其文化並無二致，其底蘊內涵並未因時間與地處兩岸而有差異，海西對應海東的台灣，似應就兩岸文化做全面檢視整理，以閩南文化為軸心，召喚台灣人民重啟先民的文化基因傳承。

（四）語言

所謂台語實為閩南語，四百年後的漳、泉、廈所操閩南語，與多數台灣河洛後裔並無不同，大清台灣儒士有云：“台語通周語”，台灣宏儒亦係史學家的連橫先生所著“台灣語典”，顯示台語文言優雅，無一句一字無出處，語言承載著祖先榮耀與根源，也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迄今全世界仍使用閩南語的人口，據稱近五千萬人，大陸當局應以藝術、電影、戲劇、電視劇為載體，製作精緻閩南語節目，爭取大多數操閩南語的台灣人民對祖國之向心，取代大量充斥的韓劇、日劇。

兩岸統一宜叫兩岸合一

台灣大中華鄉親聯誼總會總會長 張世飛

慎終追遠本於“孝”，是我大中華民族特有的文化內涵，西洋文化沒有這名堂。“孝”即人倫所由生。孝經開宗明義第一章：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冤，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這“至德要道”真是偉大呀！它能“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冤”。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都在其中，我國歷代聖君賢相，無不以為之為治國愛民的大原則。歷史上也曾出現過如此的社會，那就是大唐盛世。

中華文化以老子、孔子、墨子為基本之起源，但以孔學為主流，其後引入佛學，近代有西教之滲進，但都不能撼動孔子的儒道。孔子之偉大在於“盛之時也”，亦即孔教會跟時代的需求而適應，這一點康有為所著的孟子微自序中有一段文字，對於孔子的博、大、高、遠，有極為傳神的譬喻，他說：“大醫王葯籠中，何葯不具？其開方也，但求病瘳，非其全體也，病變則方又變矣！無其病，又不能授以葯也。豈有傳獨步單方，而可為聖醫乎？未知孔子太平大同之道，天地之全，而以一言為輕重去取，是猶入罾井而遇燈，乃謂日月不明，不如燈也。其於觀盛也，不亦遠乎！夫天地之大，測者，難以驟明也。孔子之道之大、博、深、高、遠，當時弟子已難畫傳，子貢已謂得見宮廟之美，百官之富者，宜矣。數千年之後學，而欲知孔子之道，其益難窺萬一，不待言也。”

康有為這段文字的第一層意義說孔子開葯方，“病變則方又變矣”就是因時、事、人、地、物而變通而適應。第二是太平大同之道、天地之全，孔子是全面的，不能以一言為輕重去取。第三是孔子之道是大、博、深、高、遠。

中華文化既以孔子為主流，約言之為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禮義廉恥。分述之在個人則以正心誠意為起點，以達修齊治平；在群眾則以講信修睦為起點，以達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以言為國，內修則內聖外王，民胞物興，外化則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處國際則大不攻小，強不劫弱，以言齊家，則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以言朋友，則互信互諒；以言夫婦，則相敬如賓；論政教合而為一，禮記，“能為師，然後能為長，然後能為君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

前面我們把中華文化粗略的指出來了，但沒有提出具體的事例來說明，歷史上有關中華文化具體的事例很多，難以盡舉，現在我們舉宋太祖令左右除去白起畫像的故事來說明，中華文化中有一項很道德的事：“兩兵交戰，不殺已降”，這叫做“武德”。事實如下：

史稱“白起善用兵，攻趙用反間計，罷廉頗兵權，斬趙兵四十萬，坑於長平”。等到宋太祖乾德元年

時，問題來了。續資治通鑑說：“帝幸武成王廟，歷觀兩廊所畫名將，以杖指白起曰：‘起殺已降，不武之甚，為何受享於此？’命去之”。

趙匡胤認為白起沒有軍人應有的武德，他的畫像，不應該跟其他名將擺一起，叫手下除去之。

這故事，跟台灣有些縣市議會，拿下陳水扁照片，有類似的意義。

“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這古訓之“懼”懼甚麼，懼民族大義。台灣因國際形勢得以苟安，極少數淺薄之人的主張獨立，既誤判形勢，復盲違民族大義。筆者善葡兩岸合一，將因本會組團謁祭黃陵，並與有關單位聯合為遵循民族大義，兩岸祈福，舉辦促進兩岸“和諧”高峰論壇而提早來臨！

按筆者見解，兩岸如果沒有和諧，那有和平，沒有和平，那來統一，又因統一兩字，略有霸氣，必須以合一兩字來代替成為兩岸合一，符合中華文化的王道精神。



兩岸宜合作設立文字研究機構

德克薩斯州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 翁和毓

教育為傳授及塑造學子之事業，文化為宣揚及提升當代表現之水準；此二者互為表裡，不可脫節而發展，故常有以教育成敗而論其文化水準，或以文化表現而推測其教育事業。教育有學校、師徒、家庭、集訓、社團、研究機構等之種類，文化包括新聞、廣告、電影、戲劇、歌謠、展覽等之表現。

當今世界各國採用大致相同之學校制度，故可以轉校或繼續晉升就讀，學校各自制訂水準，政府不存異議；中國大陸學校與美國學校間互相承認，台灣學校與美國學校間亦互相承認，因此中國大陸學校與台灣學校間之互相承認應視為當然，政府機構不應存有異議；兩岸大批學者學生交流之後，即可達到教育之整合。

研究機構常存有指導哲學及方式，政府資助之目的，以及社會之商業利益，其中以效率為不可缺少之精神，過了時效便失去其意義；故從業者不宜兼職，避免社交應酬，有優厚薪金以安其志，安寧環境以靜其心，隨時可以到圖書館、實驗室進行未完成之功作，或新靈感之著述，對於外界之蒐集研究訊息應無缺漏。

研究之指導哲學，應以最有效辦法為原則，甚麼是最有效辦法？應為不斷嘗試累積之經驗，不應盲從古人之經典語辭。政府之委托研究有其政策方針，不能隨便增損，必須符合其目標；社會之委托研究有其商業市場，旨在供應需求為指標，利潤為不可缺少之條件；純粹學術之研究，乃在於充實教育內涵，而非在浪費資源。

中國為文明古國，近代派遣學生到各國留學，適逢西方有唯心與唯物之爭論，回國之後演成對立；其實中國自古已有一套完整之哲學理論，即常見之太極圖，此為陰陽共存乃心物合一，“是”中有“非”而“非”中有“是”，以偏大論“是非”；“是非”之交界為一曲線，有波長有頻率，乃“行”之表現；研究乃在“是”中求精進，“非”中避免其災害，此即創造與發明之原動力。

儒道各有偏重，但相補而行，在歷史上有輝煌之貢獻：儒家以“定、靜、安、慮、得”為功夫，以“苟日新，日日新，天命維新”，而反對墨守成規；道家之“無欲以觀其妙”（歸納），“有欲以觀其微”（演繹），“同謂之玄”（未知），為探索“眾妙之門”，又“以道可道非常道”，而反對食古不化。今日兩岸經濟發達，各自省悟是非，而消除對立之偏見，從逐末回到務本此其時也。

事業有成就常成為讚美或弘揚之對象，論古評今自然興起，文化興隆乃當代國運之表現；國必重視其歷史，以資鼓勵後人，並增加國人信心；富國必宣傳其致富之道，以鼓勵國人之進取心，提升社會福利及醫療衛生，為國人增進幸福。現在兩岸經濟已經合作，今後應致力於文化和諧，共同宣揚文化之成就。

文字及語辭為溝通知識及感情之工具，同文字不必多學一套文字，同語辭不必經過翻譯可直接領悟，工具相同節省時間，減少意外之誤會，增加彼此之向心力，兩岸宜合作設立文字及語辭研究機構，隨時公佈新譯名；在文字方面不宜隨便創造，文字要公定使用，單字能表達其意義時，可以用二字、三字、甚至於四字共同表達其意義。

文化是兩岸和平發展的基石

台灣河北省同鄉會顧問 陳玲美

前言

教育是文化的結晶，也是促進文化創新的動力。文化須經教育歷程的世代傳承，才能變成活水。

教育和文化在口頭上或文字上，往往會把這兩個名詞，連結在一起使用，在概念方面的涵義，二者之間，有一種內在的交叉、連環、不能分解，並存在著交互影響，相輔相成之密切關係，是很難劃定一個嚴格而不同的界線。

教育是使人成長、向上、向善、更好、更新，並能發現更多的興趣與價值，激發更多潛能與創造力的活動。教育活動亦是喚醒更多的自我、更多的好奇與主動，更多的自尊、自信與真、善、美、聖的歷程。

文化是全人類的智慧、科學、社會、政治、經濟、宗教、道德、法律、風俗、習慣和審美觀的生活經驗，累積而成的綜合體。所以，人類文化逐漸進步後，生活方式越來越複雜，需要學習的東西、事務、越來越多，必須透過教育，使學習容易、迅速且有效率。

就教育的涵義、實體、功能、價值和創造出來的成就，及綜合各專家學派的論點而言，教育是保存、傳遞民族文化和發揚民族文化的動力。所以，文化靠教育而世代相傳、綿延不斷。可說文化即是教育，沒有教育就難有文化。因此，教育和文化，乃是一而二（一體兩面），二而一，有不可切割的關係。

教育是百年樹人的大業，教育的良窳，攸關國家競爭力的提升與文化的發展，是整體實力和國力的關鍵。台灣的教育水準、人民素養、公民社會、藝文創新，是台灣最大的資產。

現謹將目前兩岸教育文化問題，申述淺見，就教高明。

尊重傳統、追求卓越

一、振興倫理道德、宏揚孔孟文化

所謂倫理，是指人與人之間及人對團體之間的行為規範，也就是人類行為的規範。

所謂道德，照禮記的解釋“德者得也，謂之身也。”即是凡對個人身心有益的，對物方面有珍惜，愛憐者，便是德；行事合理，合情，合法者，便是德，實即道德的簡稱。

中國固有的傳統文化，以倫理道德為根本，以儒家文化為中心。而儒家文化中，是以孔子思想為主流，建立與發揚道德體系，並以仁與忠恕為核心，以孝和禮為行為規範，成為中華文化的精華。

由於時代進步，科技發達，及世界思潮狂瀾澎湃，對求新、求變、求快 的物質文明需求與享受，使社會人慾橫流，價值混淆，倫理敗壞，道德淪喪，衍生出許多社會、政治、經濟等嚴重問題，概如下列五端：

(一) 校園倫理嚴重失序

- 1、有者家長蠻橫無理，尊師重道式微，教師地位低落。
- 2、學生同儕間、相互霸凌，有樣學樣，已成校園黑道。
- 3、學校內抽菸、販毒、勒索、詐騙，校外輪暴、打群架、飆車、吸毒等等，已嚴重戕害青少年身心，造成社會治安問題。

(二) 詐騙集團，橫行霸道

- 1、頻打電話，無孔不入，造成生活與心靈的困擾。
- 2、詐騙過程，編的合情合理，使人無防受騙。
- 3、手段高明、厲害，橫行兩岸三地，大小通吃。

(三) 自殺自殘，震撼人心

- 1、燒炭自殺、錯誤示範，攜子拐女，共赴黃泉，人神共憤。
- 2、家庭暴力層出不窮，子弑父，弟砍兄，大逆不道，夫婦婚姻暴力，駭人聽聞。
- 3、兒童、老人常遭家虐，時有慘不忍睹的新聞。

(四) 性侵案件，時見報端

- 1、家內父親性侵親生女或繼女，公媳亂倫，破壞家庭倫常。
- 2、師長誘姦學童，使杏壇蒙羞。
- 3、婦女常遭性騷擾、性侵害，添增社會治安問題。

(五) 民代嘩眾取寵，極盡能事

- 1、民代失守議會倫理，破壞社會風紀。
- 2、溫、良、恭、謙、仁、禮的文化美德、人倫素養，破壞殆盡。
- 3、嘩眾取寵、不顧自身形象及社會觀感，但求當選就好，盡失社會責任。

社會的變遷，已隨時代巨輪的腳步前進。由於變遷的現象，產生上述種種的社會問題與病態。對於兒童、老人、女性、弱勢者的保護與關懷之外，其他的校園倫理、遏止詐騙、政治歪風、家虐與性侵問題等。均需教育的力量，尤其大眾傳播媒體的功能發揮，加強改善，以個人教育、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四者教育結合。積極弘揚孔孟文化，並以孔子認定倫理的四大功能：(一)倫理可以安定社會秩序。(二)倫理可以培養好風氣(三)倫理可以啟導行為之至善。(四)倫理可以發揮互助合作精神。共同振興日益式微的倫理道德。

正體字與簡化字，宜正本清源

文字是民族的靈魂，中國文字更是中華民族精神寄託，憑依的實體。基於尊重傳統，發揚中華固有文化，兩岸的正體字與簡化字，實有正本清源，認真商榷與探討之必要。

正體字。所謂正體字係指正確形體的漢字。“正”即是我們歷代“字樣學”規律的積累，整理漢字異體，擬訂使用正體字原則，確立楷書書寫規範的準繩。簡化字。民初“新學之士”，以中國落後，是因漢字字體筆畫多又繁瑣、難學、難寫，妨害民智進步。遂有毛澤東主張說：“漢字必須改革，要走向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到1956年、下令推行簡體字，全面簡化，造字。

關懷新移民、尊重多元文化

當前世界正走向“地球村”的時代，所以社會國際化與全球化是必然趨勢。近年來，台灣社會發生產業外移的問題，加上越來越多的大陸配偶與外籍新娘來台，成為台灣社會舞台的新移民。對台灣人口結構及社會產生極大變化和衝擊，已為社會、教育與經濟方面帶來空前的挑戰與考驗。

異域婚姻所衍生的生活適應、語言溝通、人身安全、優生保健、成人的教育與就業、子女的教養和就學，如何融入家庭與社會或如何與家庭、社會相融等多元性和複雜性所隱含的問題，其中的愁、悲、善都是我們社會既美麗又沉重的負擔。這些都亟需要人民大眾一起關懷，也是政府相關部門必須共同面對和承擔的。

根據內政部的統計資料，到目前為止，大陸與外籍配偶，及其子女人數，已達五十六萬餘人，且正在快速增加中，並成為社會一大族群，使社會文化益形成多元化。

外籍配偶或許未受過中文教育，加上文化差異和語言溝通的障礙，極易衍生子女的教養問題，已成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因此，政府與相關單位已提出相關的因應之道與策略，更需結合新移民的自我概念、家庭氣氛、學校、教育、社會關注的條件，建構多元社會、多元文化的新氣象、新文明。

（一）增強自我概念的建立：

- 1、強化自信心以提昇自身知識和技術。
- 2、培養興趣、擴展視野。建立良好人際關係。

（二）營造家庭融合氣氛：

- 1、努力學習國台語，提高語文程度，增強溝通能力。
- 2、了解衍生家庭的習俗文化，孝敬公婆、友愛兄長、姑嫂。
- 3、夫妻相處，尊重包容彼此文化、習性及性別平等的適性發展，遏阻婚姻暴力。
- 4、容許並尊重子女在多元文化教育中，選擇多面的語言學習。

（三）多元文化與社會的融合：

- 1、要能潔身自愛、相夫教子，尊重中華道德文化，以個人良好的形象，跨越原生文化的壓力，清除社會刻板印象複製，所造成的偏見與歧視。
- 2、虛心學習，融入當地的生活狀態，敦親睦鄰及與他人情感交流。
- 3、自我肯定自立自強，建立詮釋權，勇敢表達自己的感受。
- 4、了解台灣民情民俗，關心時事，快速融入文化的脈動中。

總之，全球化的時代，多元文化社會，需以“人”為追求向上向善的指標。大陸與外籍新娘，嫁到台灣以後，就目前社會的大環境的狀態下，在人口增長、人力的支援、老殘的照護、傳宗接代增加、生育率的提高、多元文化的注入。從正向的思路與正面的肯定，確實有其貢獻的價值。

台灣正處於多元文化的“大熔爐”與“沙拉盤”的處境中。是故關愛新移民，疼惜新台灣之子及尊重多元文化，實為人民共同關心與努力的重要課題。

人類和文化相伴而生，有人類就有文化。所以，文化無所不在，他侵潤在每個人、每個族群及社會的生活中。讓我們體認到，每一種文化應是平等的，都享有平等的生存和發展的權利。多元文化教育更是一種理想的教育，推行多元文化教育，可說就是推行孔子“有教無類”的理念，讓所有人民都能得到平等的教育機會和學習需求。

善於學習和富於創造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尊重歷史和愛好和平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品質。讓兩岸的同胞，從社會的驟變中，發現教育文化的重要和問題，為尊重傳統追求卓越，從多元文化交流中，創新發展、落實兩岸“和平發展”的新里程，為中華民族建立一個永遠安和樂利的幸福社會，實乃兩岸同胞之共同使命！

現代生活面對大自然挑戰

台灣中華基金會顧問 孫若怡

一、西方近代文明的優勢與困境

自鴉片戰爭以降，因外力的交相入侵，古老的中國文明面臨前所未有的衝擊。為此，香港歷經百餘年的殖民統治；台灣則在飽受日本人掠奪之際，皇民化思想的影響至今仍為一股興風作浪的暗流；而大陸則在長期戰火的摧殘後，逆流而上以摸著石頭過河的實踐精神，尋找屬於自己民族的復興之路。

近現代的西方文明是一個以科學意識型態為核心價值、工業發展為導向、資本壟斷為手段、私有財產為標的、自由平等為口號的文化系統。它挾著充沛的活力與技術優勢，橫行全球五百餘年，所到之處古老文明或消失的無影無蹤，如印地安人的瑪雅（Maya）文明與阿茲特克（Aztec）文明；或慘遭變質、異化與割裂如中國文明。苟活者，為求民族生存與再起，無不須卯足全力，以自我犧牲的大無畏方式，勉力向西方學習。因此，現代化一詞已成為“西化”的代名詞。而二戰後迄今，美國不但在軍備戰力與經濟生產力上，均領先世界各國並成為最強大的國家；同時，在教育的過程中也向下一代傳達：“我們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是最好且最可貴的信念。”而美國政府與傳媒，更不遺餘力地透過文化宣傳，將自由民主的意識型態，傳佈至其他民族；同時，把其他民族改造成與自己一樣不但成為一種使命，更成為衡量他人（族）進步與否的準則。故而在全球化快速推進的二十世紀下半葉，現代化又有“美國化”之稱。

無庸置疑的一點是，無論是西化、歐化或美國化所代表的西方文明，的確是人類歷史上極為優秀的文化之一。科學技術與工業發展，不但給人類的物質生活，帶來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性與舒適感；另一方面，浩翰自宇宙天文的探索，細小到微生物細胞的複製，也都已精進至前所未有的境界。然而，這“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料”，以實驗、假設為研究前提與基礎而發展的西方文明，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確也顯現出極多的弊病，值得吾人關注並省思。

首先，是自然生態與環境惡化的問題。以機器代替手工作為生產工具的工業革命，須要龐大的市場與原料。因此，全球的自然資源就先後成為葡、西、英、法、德、日、美等工業先進國家掠奪的目標。自工業革命以降的百餘年，人類所耗用的資源，比之於人類自有文明時期的總和還多。換言之，我們只有一個地球，但確已沒有甚麼東西可以留給子孫。例如在長達6,440公里、有上千條支流的亞馬遜河，滋潤著800萬平方公里的廣闊土地，孕育了世界最大的熱帶雨林，其流域物種之多，居全球之冠，一向有地球之肺的美譽。然而，人類為了滿足私欲，對已有4億年多年歷史的森林加以濫伐，作成高級傢俱出口到法、美等國；專家估計若持續為之，21世紀中葉整片的森林將消失無蹤。其次，工業生產排放大量聚熱的碳氣，更加速地球暖化的現象。冰河面積縮小、海平面上升、四季轉弱及海洋酸化等問題，都成為人類迫切需要面對的

議題。

不僅如此，繼之地球暖化而來的，則是生態的浩劫。根據美國植物學專家雷文（Peter H. Raven）的預測：21世紀末，將有2/3的物種自地球上消失。這種狀況的惡化除因人口的增長與生活品質的改善，而對地表做過度開發，以致破壞了自然系統的平衡外；全球範圍內的氣溫上升與化學藥物如殺蟲劑（DDT）的使用，都是環環相扣、因果相承的因素。

高度工商業化的另一個衍生現象，即是大都會的出現；由鄉村變市鎮，最後整合進大都會的衛星城，幾乎是現代化國家的發展模式。這固然使城鄉間的差距縮小，提高了民眾的生活水準。但這種人為入侵操作的方式，也正是快速破壞自然生態的殺手；另一方面，更帶動了社會人際關係的改變。凡居處在商業貿易繁盛城市或地區的現代人，逐職業而居的現象日益普遍；其生活一如游牧民族之逐水草而居，往往無法隻恆定落居於一隅。當面對長短不一的遷徙頻率，大小不同的居處空間時，人只能力求改善、調整與適應。而在網路與媒體無遠弗屆的今日，我們所生活的地球似乎已然進入了一個高度整合的境域之中；所謂時間不是問題，空間不是距離。時間觀念的壓縮與拉近，反映出天涯若比鄰“地球村”（global village）生活方式的成真與想像。在繁華的都會裏，擁擠的人群摩肩擦踵，人與人間的距離似乎變的極近；事實上，疏離感與漂泊的心靈，卻始終是現代文學探索的主題。

此外，隨著資本主義全球化趨勢的加深，大都會地區是當代流行文化的策源地。“流行”泛指風行一時，源出於時髦時尚（Fashion），特別指時裝風格的變化與追求。但在晚近的流行文化中，人如偶像歌手或物如名牌皮包，都已成為流行文化的主要物件；在主打出新的過程中，乃集（跨國）資本與行銷於一。流行文化重視的是創造的新穎與變化，感受的是瞬間的滿足與擁有，要求的是物件的銷售績效與利潤。在綿密行銷網路的運作下，流行物件具有強大的渲染力，既引領流行也帶動模仿，因此，在流行文化中充滿了複製性的特色。社會學者曾指出，它是“在一定時期中，經由特定領域內，藉某種力量的推動而普遍快速的傳播，並在有限的週期內迅速起落的一種文化。”

因此，精神上的永恆與心靈上的寧靜追求，是不存在於流行文化的本質中。相對而言，典範文化中所有之時間縱深的歷時性、理想性、道德性與主體性，流行文化也不具備；它只能算是附屬於近代西方商業資本主義運作與科技發展下，文化系統中的一瞥驚鴻。近代西方文明在各個領域中披荊斬棘、探索研究，歷經五百餘年的發展，至此似乎已經喪失了它原創性的開拓精神且問題叢生。

二、文化交流與互動下的反省

自清末以降，中國知識份子為民族之存續、國家之富強藉由數代人前仆後繼的犧牲，終於在向西方學習、接軌的道路上，建力起自衛能的能力，其代價不可謂不大。然而，做為人類歷史長河中一顆永恆閃耀星辰的中華民族，在歷顛簸、摸索並已眼見西方文化所帶來的弊端之際，豈能全盤接納而不力求匡正？傳統中國文明與印度、伊斯蘭之宗教文明，最大不同處在於人本文化系統的建立。古典中國文化基本上是在師法自然的基礎上，以“仁”為核心價值，所建構的具有形上美學與主體性的道德文化。其內涵結構與規

範理想，誠其與當今社會多有落差之處，但其對人的尊重、重視人在現世追求幸福與和諧秩序的態度，卻是與西方近代文明最接近的古典文明。當西方文明無論於思想、制度、技術等各個層面，都面臨了極大的困境時，站在文明轉折與交流的十字路口，應如何去蕪存菁、融合中西以裨益於世道人心？自文化教育問題著眼，以下幾個面向有待吾人深思明辯。

這裏自然具有多重意義。它是形上本體的存在，是道、天、宇宙、真理也是主宰；吾人應跳脫西方科學意識型態與工具理性的狹窄功利思維，回歸民族文化傳統中，對自然所秉持的虔誠態度。近現代以來的西方科學，把自然當成一個純粹客體（物）的物理世界，人的主觀世界與自然構成主、客的二元對立；物的客觀世界是人研究、征服、推取乃至掌控的對象。這種潛在的自大與自負思維，演變延續至今日，導致近五十年來，人類耗用了地球1/4的表土、1/5的可耕地與1/3的森林。過度的開發與耗用、短視與急速擴張，也加速了生態的失衡。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早在十八世紀就已高舉迴反自然（Back to nature）的大旗。他指出原始人比文明人更高超的看法，並且認為科學知識的進步，足以損壞人類天性之美。誠哉斯言也！為智者多寂寥。有鑒於此，我們應從自身做起，面對自然應懷著謙卑、感恩的心，過著單純的生活。自然不只是我們生活的週遭“環境”，供養我們的資源的“空間”，更是我們應該仰望、師法、學習與敬畏的主宰。汲取祖先仰天、倚天、法天、齊天的智慧，在物質生活的豐盈與便利中，擺脫慾望的誘惑與奴役，返璞歸真，尋求一個與自然和諧共處的智慧人生。

在歷經民主選舉過程的現代社會，眼見政權移轉前後，多少人為個人的仕途瞬間變了樣貌。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也就罷了，還訴諸族群分裂來鞏固自己的利益。除了令人痛心、思之無解外，更讓人不得不反思我們的教育文化，應該再怎麼走下去？人心澆薄世態炎涼事小，但民族文化的根本生機豈可中斷？自漢代以降，由於儒學獨受歷代君王的禮遇並化約為官方的意識型態，不但影響中國文化的發展深遠，也獨享了極高的政治地位。因此，百餘年來每當鼎革之際，儒學便成為批判否定或援引鬥爭的對象，“打倒孔家店”，“批孔揚秦”，“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等不一而足；如今似乎已到了需要重新再思考其真精神的時刻了。

兩岸合璧中華民族復興之始

台灣中國統一聯盟前主席 陳欽銘

（一）

2010年1月27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在美國國會發表國情咨文，提出重振經濟方案，要在五年內把出口增加一倍，且強調：“美國絕不做第二名”，“為甚麼歐洲或中國有最快的火車，有新的乾淨能源產品，而美國沒有！”又云：“如今情勢惡化至此，我只問一句，我們還要等多久？中國不等，德國不等，印度也不等，他們重視數學與科學課程，他們不要做第二名，我不接受美國變成第二名！”

六、七十年來，美國——這個地球級的山大王，用所謂的“民主”、“人權”、“自由”、“美國利益”鞭撻天下，坐擁臬比，呼風喚雨，睥睨一切，誰敢說不？

如果說有，那是上世紀四十年代在延安山窪裏毛澤東所說：“所有反動派都是紙老虎”！那時所謂的反動派當然指美國、日本、德國這些“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及其走狗、嘍囉、馬前卒。歷史演變，果然！美國始挫於韓戰，再敗於越戰，三困於伊拉克，四陷於阿富汗。如今債台高築，國債累計已近十三兆美元；失業率百分之十以上，全國超過二百萬人待業；全國十分之一人口，超過二千萬人，靠政府發給的食用券維生；金融海嘯，淒風苦雨，至今尚未走出谷底；2010年財年預算赤字是一兆三千五百億美元，佔國內生產毛額（GDP）9.2%。

（二）

2009年十一月，奧巴馬訪問北京，參加“胡奧會”。美國《時代雜誌》特奉上奧巴馬宜向中國借鏡的五項成功之道一文，以作建言。略云：（1）中國勇往直前，目標遠大：中國充滿“向前衝”的動力，到處在施工，包括一萬六千公里的高速鐵路網。美國則否，近十年來美國基礎建設投資大減，7,700億美元的經濟振興方案中僅1,440億美元用於投資基礎建設。相形之下，中國人民幣四兆（5,850億美元）刺激方案，兩年內有半數經費投入基礎建設。（2）中國重視教育，向下扎根：中國數十年來大力投資教育，識字率達90%，比美國86%還要高。最近並全力推動科學、數學、英語教育，要求小學數學和科學教師需有相關學位，而美國八年級數學教師中，有數學學位者不及一半，而且中國學生作功課時間是美國的兩倍，甚至小學生週末也去補習數學。未來中國不僅提供“廉價勞工”，也提供“聰明勞工”。其他三項是：（1）中國人重視孝道，照護老人：中國兒女把父母送入老人院視為恥辱，而美國2007年老年人有3,860萬人，2030年將增至7,150萬人，安養院將嚴重不足。（2）中國人賺多花少，有儲蓄習慣，美國人習慣於寅吃卯糧。金融海嘯，美國家庭儲蓄率雖由4%增至6%，但中國家庭則是20%。美國有1.4兆美元預算赤字，中國則有2.1兆美元外匯存底。（3）當局的高瞻遠矚，造福後代。

中國傳統文化本來就十分重視優良的教育與人才的培養，所謂：“良師興國”，“中興以人才為本”，“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崇教育以培國本”。教育是國家總體國力的成就與表現，也是人力培育的主要來源，人才興衰，決定國家的興盛與衰亡。西諺云：“知識即權力”，美國名作家佛里曼說：“挖腦力比挖石油重要”。當代中國的崛起，最重要的動力之一，是在此科學日新月異的時代，中國教育事業迅速發展，人才隊伍不斷擴大所致。

（三）

十多年前台灣名學者侯立朝先生旅居上海，寫了一篇報導回台，說：當今中國據統計，從事自然科學工作的工程師、科研人員、技術工作人員共有三千多萬人，從事文學、歷史、哲學、藝術、音樂、體育工作的人員有五千萬人，黨員六千萬人。

當時筆者半信半疑。1999年10月北京舉辦“建國五十年成績展”，筆者有幸入內參觀，展覽室分別由三直轄市、28省區及中央各直屬機關主持，每直轄市和省區在統計上首先列出“我市我省各有多少人從事自然科學工作的工程師、科研人員或技術工作人員”，計北京市120萬人，上海市110萬人，福建省100多萬人，江西省90多萬人……總計，果然超過三千多萬人。大陸所有工作人員均以職等核發工資，縱使廚師、演員、車工，都有級別之分，故在統計上是十分確實的。

2003年12月曾擔任美國駐北京大使的弗里曼在華府參加中國問題討論會，曾舉出：美國每年工程科技畢業生有六萬人，日本七萬人，中國32萬五千人，即美日相加，尚不及中國之半。

2009年10月10日，保羅·克魯曼專欄，題曰“忽視教育，美國偉大地位倒退”。內云：“如果一定要用一個字解釋美國的經濟成就，那就是education（教育）。十九世紀美國率先普及基礎教育，二十世紀初的高中革命，帶領美國進入全新境界。二戰結束後，美國在高等教育領域建立主導地位，但彼一時也。美國是大學教育的偉大國度，獨特處在於普羅大眾也可接受高等教育。但近來美國年輕人從大學畢業的可能已不如很多國家。事實上，美國下一代大學畢業率已低於所有先進國家”。

2010年5月26日，美國國務卿希拉莉在北京第二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上與中國達成協議，美國將在未來輸送多達十萬名學生前往中國學習。

（四）

回溯中國現代教育，殆開始於“維新變法”。1895年馬關割台消息傳出，康有為率進京科考的各省舉人，在天安門前向滿清皇帝“公車上書”，除要求“誅奸相，絕和議”外，並要求“變通新法”。

“變通新法”的基礎在教育，因：“今地球既闢，輪路四通，外侮交侵，閉關未得，則萬國所學，皆宜講求……嘗考泰西之所富強，不在炮械軍器，而在窮理勸學”。故今應“令各省州縣開藝學書院，凡天文、地礦、醫律、光重、化電、機器、武備、駕駛，分立學堂，而測量、圖繪、語言、文字皆學之，選學童十五歲以上入堂學習”。

梁啟超名言：“吾國四千餘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台灣，償二百兆以後始也”（戊戌政變記）。

“公車上書”後，有“康梁變法”及“戊戌政變”。1898年3月，張之洞撰成“勸學篇”。六月，旨頒“勸學篇”於各省。在“勸學篇”中，大倡“新學”，當時為平息爭議，張主張：“中學為內容，西學為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即所謂“中體西用”，這是中國現代教育的濫觴。

自1928年北伐完成以後，國民政府雖與一些有野心的軍人、中共及日本帝國主義之間，衝突依舊持續，但至1937年全國抗戰全面爆發之前，衝突大體是局部的，所以國民政府也能把一部分精力用於國家建設上，此所謂“黃金十年”。

此十年中，在學校制度上，國民政府因襲北洋政府時代所採行的美國制，即小學6年，初、高中各三年的“六三三學制”。

據1933年鑑，當時全國大專學校共111所。中等教育方面，上海每萬人中213人有受學機會，陝西、貴州、甘肅等省，每萬人不到四人。中小學教育法規到1933年才完成。大學組織法有關細節及課程法規到1934年才完成公布實施。

1933年全國大學教職員共7,075人，學生總數46,758人。1936年全國中等學校總數，高初中合計2,042所，師範1,211所，職業學校370所，學生總數共計54萬7千2百多人。

1934年全國幼稚園及小學共26萬6千6百多所，其中公立佔21萬4千多所，私立佔46,648所。內完全小學22,726所，簡易小學5,754所，短期小學2,640所。

及至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中國歷經八年抗戰及三年內戰，人民的生命及財產損失實無法計算。據史學者唐德剛先生統計，中國自1927年所謂“清黨”開始，至1949年國民黨退出大陸止，中國人民非自然死亡，包括戰死、炸死、疫死、傷死、餓死、凍死、刑殺而死者，計五千萬人以上。教育之落後及人才的凋零，更無庸論矣。1949年據大陸統計資訊：當年文化教育方面，小學入學率只有20%，成人文盲80%，中等學生只有126萬人，高等學校學生只有11萬七千多人，研究生只有609人，印刷企業只有211家，全年報刊用紙只有20萬令，報紙只有315家，圖書總印數只有一億零500萬冊，報紙印發數只有四億1,200份。所謂“一窮二白”，信也。台灣軍中作家張拓蕪先生在“代馬輪卒手記”中說：他當兵時，“一個連三百多人，只有三個半的官兵識字，他是其中的半個人”。

（五）

新中國建國60年來，文化教育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驚人成就。

1. 2008年全國研究院所3,775個，研究實驗基地2,020個，國家實驗室（籌建中）6個，國家重點實驗室258個，全國研發人員達200萬人，科學家、工程師150萬人。

2. 2008年全國專業技術人才共4,505萬人，企業經營管理人才2,250萬人，黨政人才625萬人，高技能人

才2,239萬人，農村實用人才793萬人。

3. 2007年中國普通高等學校（大學）1,908所，較1978年增加1,310所，特殊教育學校（如地質、財稅等）1,618所，較1978年增加1,326所。2008年普通高等學校在校學生2,021萬人，畢業生512萬人，研究生176萬人。2008年全年研究生教育招生44萬6千人，在學研究生128萬3千人，畢業生34萬5千人，普通高等教育招生607萬7千人，在校生2,021萬人，畢業生512萬人。各類中等職業教育招生810萬人，在校生2,056萬3千人，畢業生512萬人。全國普通高中招生837萬人，在校生2,476萬人，畢業生836萬人。

4. 2008年全國圖書種類出版者27萬5千6百多種，報紙1943種，期刊9,549種，全國出版發行圖書共69億3千6百多萬冊，報紙442億9千2百萬份，期刊31億5百多萬冊。

5. 全國文盲由1949年80%，至2008年有文化之青壯年90%以上，文盲率降低至4%以下。2008年全國共有2072萬人取得各級教師資格。2008年佔全國人口99.3%地區普及了九年義務教育，98%兒童少年接受義務教育，全面實現城鄉免費義務教育。

（六）

台灣在教育與人才的培養方面，六十年來表現也不差。從過去到現在，台灣常以“優質人才”自負，創造“台灣奇蹟”時代如此，當今全球半導體產業稱雄的時代也如此。台灣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經濟極為窘困時代就延長了九年義務教育，如今私立高中高職常招不到學生。

今日台灣公私立大專院校已超過150個，2008年指考報名人數共計9萬3,681人，落榜者僅2,432人，錄取率97.1%。最低錄取總分只有7.69分（立德大學資源環境系），或13.94分（開南大學銀髮健康促進系），或17.4分（華梵大學電子工程學系）。由於考生逐年減少，且招生管道多，大學許多院係缺額暴增，未足額錄取院係竟高達22校，105係，缺額超過4,788名，招生錄取報到者常為0人至1人。

此乃過去二十年獨台、台獨執政時代，教改荒唐走板所造成的惡果。中小學生一樣辛苦，數十萬大學畢業生滿街走卻找不到工作，碩士、博士亦然。德國社會學家考夫曼（F.X.Kaufmann）名言：“教育與醫療是公共產品，國家應通過社會投入，建立普遍的社會安全網和大眾普及教育，保障絕大多數人的教育與健康，在這個基礎上可運用市場機制建立一部分私立學校與醫院，不過這只能作為一種補充。教育產業化和醫療私營化絕對會帶來災難，其後果往往要到十年、二十年就顯現出來。”這便是台灣對教育的低投資、私立學校寬鬆升格的便宜手法，無宏觀、亦無調控所造成的惡果，正如考夫曼所言。

雖然如此，2008年世界大學科研論文質量評比（不分領域），前500大排名，台灣入列者有5校（台大、成大、清大、交大及陽明大學）。在分領域排名方面，台灣有8校在工學領域入列，4校在理學領域入列，2校在農學領域入列，2校在臨床醫學領域入列，成績斐然。

中國崛起，兩岸合璧，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指日可待矣！

文化大學致力推動兩岸文化交流

台灣中國文化大學董事長 張鏡湖

台灣中國文化大學創辦於1962年，創辦人張其昀（字曉峰），早年畢業於南京高等師範（後更名為東南大學及中央大學，即現在南京大學之前身）史地專業，曾先後任教於中央大學與浙江大學。1949年來台灣曾擔任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秘書長及教育部長。卸任後即籌辦中國文化大學。創辦人有深厚的民族情結，對儒家學說和孫中山思想都有深入的研究，對於兩岸關係的改善更為關切。

1962年中國文化大學創校之初即成立“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班”，1967年成立博士班，又於1973年成立“大陸問題研究所碩士班”，此皆為台灣大學中之首創。

1985年創辦人逝世，鏡湖接任董事長，秉承遺訓積極推展兩岸關係之改善。

1989年，鏡湖有幸邀請趙松喬先生為第一位正式來台訪問的大陸學者，當時台灣當局規定不得邀請共產黨員及“九三學社”會員。趙松喬先生任職中國科學院沙漠研究所所長，為極少數非黨員之學者。

2001年，中國文化大學與寧波大學締結姊妹校，創兩岸大學交流之先河。

2002年，鏡湖安排第一個台灣立法委員次級團體赴北京訪問，討論有關氣象資料交換等問題。

2003年，鏡湖率領台灣教授協會各大學教授八十餘人赴北京、南京、上海訪問，前後七日，成果豐碩。

2005年9月，中國文化大學邀請中國科學院遙感研究所所長陳述彭院士來台灣，頒贈名譽博士學位，陳院士是文大創辦人的學生，有中國“遙感之父”的稱譽。

2005年10月，鏡湖安排台灣明華園劇團至北京演出歌仔戲，極為轟動。

2007年4月，中國文化大學董事長，校長李天任及理學院院長劉廣英赴北京頒贈名譽博士學位給陶詩言院士，表揚其對季風氣候研究的貢獻。

中國文化大學共有12個學院，59個學係，除醫學院之外其他學科都極完備，例如外語學院、環境設計學院、新聞暨傳播學院、藝術學院的許多學係，台灣大學都沒有，因此文大教授可能參與兩岸學術研討的題材也極為廣泛。包括廖正豪（司法制度）、邵宗海（兩岸問題）、李天任（色彩學與傳播）、吳瓊恩（公共行政）、金榮華（女媧神話）、李興才（中國印刷史）、王吉林（藏學與唐史）、陳鼓應（中國哲學）、楊泰順（地方治理）、曹俊漢（全球化、政府責任）、葉明德（兩岸經貿、新聞傳播、）王士儀（書法、泉州學、中國表演體系的建構）、楊之遠（氣候變遷）、郭瓊瑩（保護區、國家公園、曾參與九寨溝計劃）、陳明竺（都市規劃）、趙淑德（土地資源）、鄭貞銘（新聞傳播）、林明德（韓國文化）、陳鵬仁（日本問題）、陳藍毅（巴



羅克音樂演奏）、歐豪年（國畫展覽）、許坤成（後立體派畫展）、莊榮仁（國術）、李寶春（國劇）。

中國文化大學企業管理系教授江岷欽每週三次在中央電視台報導有關台灣的新聞，極受歡迎。

中國文化大學教師在中國出版之書籍包括創辦人張其昀著《孔學今義》，北京大學出版社；董事長張鏡湖著《世界的資源與環境》，中國科學出版社；胡品清教授著《唐詩三百首法文版》，北京大學出版社；姜道章教授著《中國歷史地理學》，北京大學出版社；文學院長王吉林著《唐代宰相與政治》，人民大學出版社；法學院院長梁宇賢著《商事法論》、《保險法新論》、《保險法新論》、《保險法實例解說》及《票據法新論》，人民大學出版社。

近二十年，中國文化大學與中國大陸三十三所大學締結為姊妹校，包括北京大學、南京大學、浙江大學、南開大學等校。

今後中國文化大學將持續加強兩岸文化和教育交流，包括：

（一）創辦人《孔學今義》中文版出版後，已分送世界各地五百館所“孔子學院”。中國文化大學將撰寫一英文版，由南京大學出版，預計2011年可以完成。對國際人士而言，英文版更能宣揚儒家學說之博大精深。

（二）中國文化大學於1962年編纂中文大典，收集單字五萬個，為最完備的辭典。2009年兩岸在湖南長沙召開經濟和文化論壇時，文大校長李天任即建議兩岸共同修訂《中文大辭典》，並加入簡體字，此一工程極為大，中國文化大學願貢獻所能，積極參與。

（三）過去兩岸交換學生人數太少而且來訪時間亦短。中國文化大學籌劃自2010年開始，舉辦暑期學校共兩期，每期六週。密集上課，學生每期可修兩門課六個學分，我們希望能設計一些專門的課程，供中國大陸大學生或專門機構人員修讀。

（四）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每年課程約有六千種，就讀人數十萬人，設備與師資俱極優異。清華大學與南京大學都已邀請中國文化大學推廣部分別在北京與南京設一辦事處，協助其發展推廣教育，此一合作計劃已推動一年。

（五）自從2005年以後，每年寒、暑假兩次，中國文化大學都組成學生訪問團三團，每團約八十人分別訪問北京、上海、杭州等地，與大陸學生交流，成效良好，今後將持續擴大舉辦。

綜上所言，中國文化大學與中國大陸的文化教育交流是多方面的，成果豐碩，今後我們將在已有的基礎上繼續發揚光大，務希兩岸人民有更深厚的了解。



港台青年交流論壇論文



港台青年交流論壇總結篇

報告人：台灣中華基金會執行秘書 王正

本次大會首次舉辦的“港台青年交流論壇”，為兩岸青年創造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思想交流平台。本次論壇共有來自兩岸四地數十所大學的青年朋友共襄盛舉。在論壇中，兩岸青年勇於創新、勇於超越，從不同領域、不同角度進行了思想的碰撞和對話，這些領域包括了兩岸和平發展、兩岸青年交流、兩岸經貿合作、兩岸青年的創新創業、青年人的社會服務與公共參與等等。我在此將論壇的內容簡單總結為以下三個方向：

第一，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兩岸ECFA的簽訂以及兩岸四地大中華經濟圈的形成，我們兩岸青年人面對的既是機遇、也是挑戰。對此，一位來自內地、在香港讀書、畢業後在香港創業的青年創業家，特別鼓勵兩岸四地青年一起攜手合作，勇於向高新科技產業方面創業，同時他認為香港擁有充足的條件可以作為兩岸四地大中華地區的高新科技創業中心。另外一位青年朋友則表示，隨著兩岸ECFA的簽訂，兩岸應該發揮彼此在經濟產業方面的互補優勢，繼續深化經貿合作，為兩岸人民創造更多實質的就業機會。

第二，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社會的和諧發展也日益受到人們的重視，在這當中青年朋友的社會服務與公共參與也就顯得特別重要。此次論壇有許多青年朋友擁有非常豐富的志願服務的經驗，他們認為青年人參與社會服務與公共事務，有助於促進社會的和諧與公正，有助於改善弱勢群體的生活境遇。除此之外，還有一位參與志工服務長達十幾年的香港傑出義工表示，社會服務對青年人而言不僅僅是一種付出，在付出的同時還會有所收穫，這個過程本身就是對青年朋友最好的一種鍛鍊與學習。

第三，我想也是大家最關心的，就是此次論壇青年朋友也對兩岸未來如何從和平發展邁向和平統一，以及青年人在這當中可以扮演甚麼樣的角色、甚麼樣的功能，提出了各種見解。一位來自台灣的朋友表示，過去20年來李登輝、陳水扁在台灣島內推行的“去中國化教育”，對台灣當代青年的身份認同、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產生了非常嚴重的負面影響。因此他提出，透過更多深度的兩岸四地青年交流，來建構兩岸四地青年的集體歷史記憶，有助於讓當代的台灣青年認識到一個完整的中國是包含了大陸、台灣、香港和澳門，並進一步讓自己“重新再作一個中國人”！此外，他還特別強調港澳經驗對台灣青年的重要性。我們都知道，香港在97年回到中國的大家庭中，這13年來香港青年是如何逐漸剝離其被殖民的歷史記憶、如何逐漸恢復中國人身份認同並以此為榮，他們的體會和認識都會對台灣青年產生非常大的啟發與衝擊。因此，我們主張應該把兩岸青年交流更多地擴及為兩岸四地青年交流。

除了以上三點之外，我想在場的青年朋友們都有一個共識，那就是在我們上一代、上一輩曾經發生過的內戰、敵對和對抗，絕對不能在我們這一代再次重演，因為，那是歷史的悲劇！因此，我們深刻地認識到，只有兩岸的和平發展與和平統一，才能夠為我們包括台灣人民在內最大多數的中國人創造最大的幸福和福祉！我們也意識到，這樣的歷史使命、這樣的時代使命，就落在了我們兩岸青年的身上，我們將義不容辭、義無反顧地把它肩擔起來！我們深信，兩岸的未來屬於兩岸的青年，兩岸的青年也將決定兩岸的未來！

建構兩岸青年集體歷史記憶

台灣中華基金會執行秘書 王正

身份認同是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基礎，而“集體歷史記憶”則是身份認同建構的關鍵。受到李登輝、陳水扁時期“去中國化教育”以及“台獨分離主義運動”的嚴重影響，當代30歲以下（尤其是20歲以下）的台灣青年普遍缺乏“對中國的歷史記憶”以及“對整個中國的認同”，這些年輕人每當滿20歲時便開始具有投票權，並因此逐年漸進地改變島內的“統獨”民意結構，這將是未來兩岸從和平發展邁向和平統一的潛在障礙。筆者認為，在兩岸當前難能可貴的和平發展時代下，我們應把握機會全面開展多層面、多面向、多渠道的兩岸四地青年交流，建構兩岸四地青年在當代的“集體歷史記憶”，以使越來越多的台灣青年恢復“對整個中國的認同”並讓自己“重新再作一個中國人”，進而改變未來10至20年台灣的民意結構，為兩岸最終走向和平統一奠定島內社會的民意基礎。

一、當代台灣青年的身份認同將改變未來20年台灣民意的“統獨”對比

考察台灣民眾過去近20年來身份認同與“統獨”意識的變化，可以發現由於受到島內政治變遷與美日外部勢力干涉的影響，近20年間台灣民眾的“中國人認同”總體呈下降趨勢、“台灣人認同”總體呈上升趨勢，而“偏向統一”的民意比例則持續下降。民意如流水，民意是會變動的——如果過去20年台灣民意可以有如鐘擺一樣從一端擺向另外一端，未來20年的台灣民意未嘗不可能再一次逆轉，使認同中國與支持統一的聲音重新成為島內的社會主流。而在30歲以上民眾的身份認同已漸趨固定的情況下，要促成20年後島內“統獨”民意對比的再一次逆轉，當代30歲以下台灣青年的身份認同將是極為重要的關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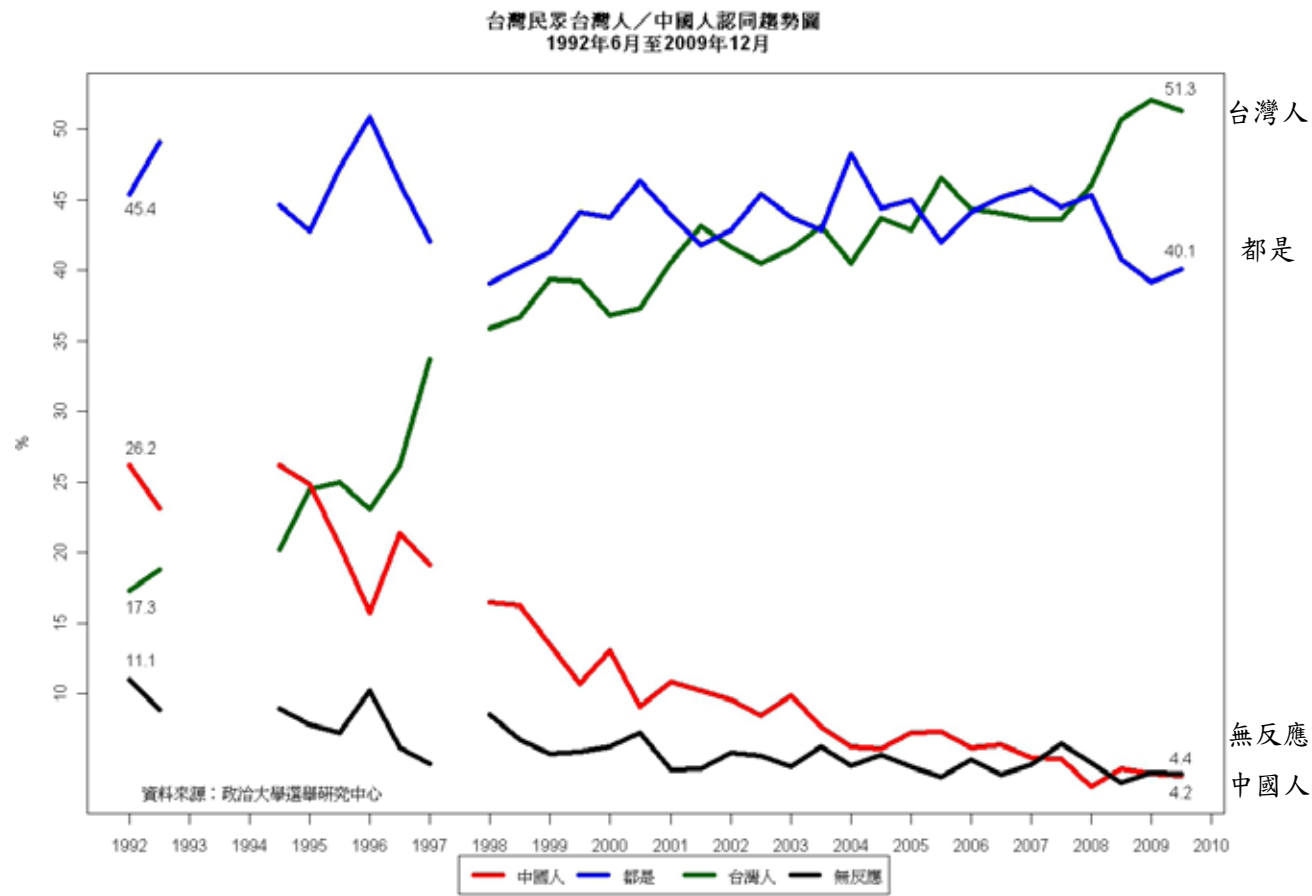
（一）過去近20年台灣民眾的身份認同與“統獨”立場的變化

為了較好地說明台灣民眾在過去近20年來的身份認同與“統獨”立場的變化，筆者在此引用台灣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所作的“台灣民眾台灣人/中國人認同趨勢圖(1992年6月至2009年12月)”及“台灣民眾統獨立場趨勢圖(1994年12月至2009年12月)”。

1、台灣民眾“台灣人/中國人”認同趨勢的變化

從圖（一）可以十分明顯地看出，從1992年至2009年台灣民眾的身份認同從“中國人”大幅度地向“台灣人”轉移。雖然認為自己“既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的比例一直都維持在四成至五成之間，但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加上“既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的比例，在1992年時高達71.6%，至2009年卻已降至44.3%，低於一半；而認為自己是“台灣人”加上“既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的比例，在1992年為62.7%，至2009年竟已高達91.4%，超過九成。在此同時更應警惕的是，2009年時已有過半數的民眾認為自己只是台灣人而不是中國人，由此可見“去中國化教育”的影響效果十分顯著。

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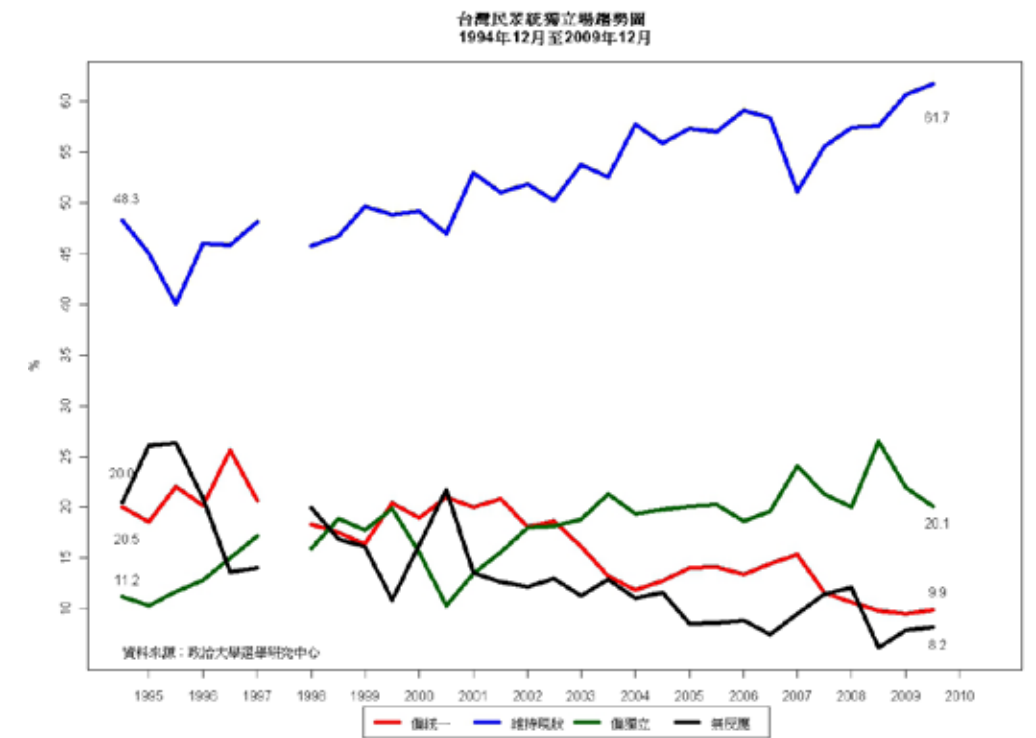


的“實質獨立”。“中國民國就是台灣”、“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已成民眾的基本共識，“中華民國認同”仍然是台灣民眾的最大公約數。這對兩岸和平統一的工作推動而言是一個非常嚴重的警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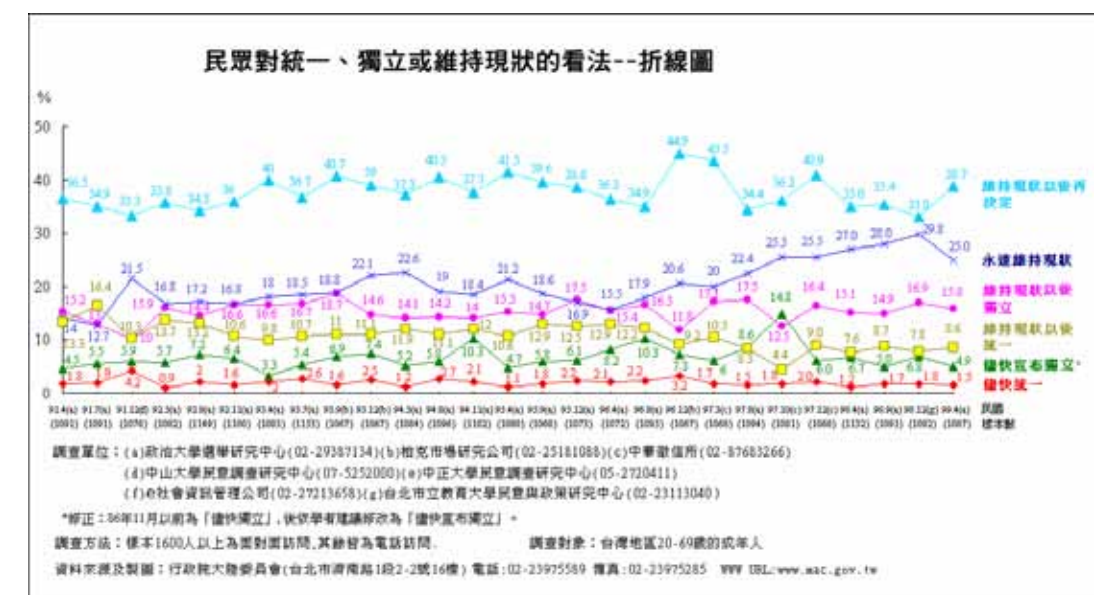
圖（二）

從圖（二）可以看到，1994年至2009年期間台灣民眾“統獨”立場有十分大的變化，“偏向統一”的比例從1994年的20.5%下降至2009年的9.9%，不到一成；“偏向獨立”的比例則從1994年的11.2%上升至2009年的20.1%，並在2008年超過25%。從這個圖表來看，不論“偏向統一”或是“偏向獨立”，兩者都不構成多數，“維持現狀”看來似乎才是這近20年來台灣民眾的主流民意，最低時為四成，最高時在2009年底已超過六成。

然而，“維持現狀”並非一個中性的選項，我們還可以將其細分為“維持現狀以後統一”、“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永遠維持現狀”、“維持現狀以後獨立”等四個選項。若我們參考圖（三）更為詳細的統計資料，可以發現到2010年4月時，“台獨”（“儘快宣佈獨立”加上“維持現狀以後獨立”）與“獨台”（永遠維持現狀）支持者的比例相加，竟已高達45.7%，將近一半；而“統一”支持者的比例卻僅有一成，只有與“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一起相加時，才能勉強超過“台獨”加“獨台”的比例。這說明“維持現狀是台灣主流民意”的說法只是一個表面的判斷，當前台灣的主流民意應該是“台獨”加上“獨台”



圖（三）



（二）台灣平均每4年便有100萬個年輕人成為第一次擁有投票權的“首投族”

根據台灣“內政部戶政司”截至2009年底的人口統計及人口年齡分配資料顯示，0至19歲的未成年人共有539萬6,345人，平均每個年齡層約26萬9,817人，未來20年平均每4年將有107萬9,269人成為20至23歲、第一次擁有投票權的“首投族”；若再加上目前總數為354萬767人的20至29歲青年人口，不考慮死亡率及其他因素的計算，今天未滿30歲的青年人在20年後將成為總數將近900萬的主要投票人口。

這20年後將近900萬的青年投票人口，若與台灣現在年滿20歲、具有投票權的1,772萬人相比較，已經過半；若與歷次台灣“總統大選”單一政黨候選人的歷史最高得票記錄（2008年代表國民黨競選成功的馬英九共獲得將近766萬張選票）相比較，更是遠遠超過一百多萬人。顯然，今天未滿30歲的年輕人將會決定20年後台灣的主流民意及島內的政治變遷，他們的身份認同及“統獨”立場也將會是決定兩岸能否走向和平統一的重要關鍵。

其實，考慮到台灣逐年少子化的因素，目前台灣0到9歲的幼兒僅有225萬8,087人，而10到29歲的人口便有667萬9,025人，若與歷次台灣“總統大選”總投票數的最高歷史記錄（2008年大選共有約1,310萬人投票）相比較，正好超過半數。這代表當代台灣青年的“統獨”立場及投票意向，在未來10年就會開始對島內的政治選舉及兩岸關係的發展產生巨大的影響。然而，他們卻正好是受到“去中國化教育”影響最大的一代，因此如何重建當代台灣青年的“中國人認同”，將是未來10至20年我們推動兩岸和平統一工作的重中之重。

二、過去20年“去中國化教育”使當代台灣青年缺乏對中國的歷史記憶

過去李登輝12年、陳水扁8年共20年的“去中國化教育”，相當於一個學生從6歲到26歲成長、讀書、上學的20年，也是一個人對自我的社會身份認同建構的20年，使得當代台灣青年普遍缺乏“對中國的歷史記憶”，而充斥著“對台灣的歷史記憶”。

這與上一代及上上一代不同的地方在於，今天30歲以上的台灣民眾儘管成長於“反共教育”與解嚴的年代，缺乏對大陸地區的訊息與了解，但由於蔣家父子貫徹“一個中國”的政策，並對全民實行“大中國思想”的國文、歷史與地理教育，因此台灣人民在解嚴以前普遍擁有一種很自然的對大中國的歷史記憶；而今天30歲以下的台灣青年則是成長於一個“台獨”勢力不斷竄長、“獨台”勢力與之合流的年代，尤其民進黨執政8年時在島內營造出近乎“綠色恐怖”的政治與社會環境，使得不論在媒體或是課堂上，“兩岸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我們是台灣，對岸是中國”、“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它的名字叫中華民國”等已經成為了佔據台灣社會主流的“政治正確”，耳濡目染之下，便使得當代的台灣青年普遍嚴重缺乏對大中國的歷史記憶。

在台灣媒體與政客多年來的“教育”之下，“維持台海現狀、避談主權爭議、兩岸和平發展”已成為

今天台灣的主流民意，也是大部分台灣青年的共同想法，這對結束民進黨執政時期不正常的兩岸關係、開啟兩岸的和平發展時期是具有階段性的作用。

三、建構兩岸四地青年的集體歷史記憶有助於重塑台灣青年的中國認同

建構屬於兩岸四地青年集體歷史記憶的方法，可以分為直接的與間接的、實體的與虛擬的。最直接的作法是舉辦面對面、具有深度性的兩岸四地青年交流活動，以及經營由此而延伸下來的後續互動。除此之外，透過媒體與網路在兩岸四地青年之間互相傳播的主流文化及次文化，包含流行文化、電影文化、音樂文化、藝術文化、網路文化等，可以為兩岸四地青年提供共同性話題，有助於台灣青年發現自己與內地及港澳青年的共同之處。簡單而言，建構集體歷史記憶的方法，就是讓大家一起完成一件事，讓大家擁有共同的經驗與回憶，以及讓大家一起想像一個共同的未來。

兩岸四地青年集體歷史的建構，應該包含對個體的情感與理性兩方面的作用，它的建構過程是先從情感的初步建立到理性的說服作用，再從理性出發使情感發生質的變化，進而促進認同的建立，也就是說這是一個“情感—理性—情感”的交互建構過程。人是情感性的動物，建構的過程必須始於情感而終於情感，理性在中間的作用僅是為了說服個體的理性思維並進而推動情感的質變，而整個建構過程的最終目的，就是要讓台灣青年從內心最深處對中華民族、對整個中國產生難以動搖的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

四、擴大兩岸四地青年交流有助於集體歷史記憶的建構

近年來，兩岸青年交流的次數已日漸增多，交流層面也越加廣泛，但大部分的交流活動仍僅限於大陸和台灣青年，較少含括到香港與澳門。筆者認為，由於“港澳經驗”（尤其是“香港經驗”）的特殊性對台灣青年反思自己“對台灣前途的選擇”以及恢復自己“對整個中國的認同”具有非常大的借鑒性和重要性，因此兩岸青年交流有必要擴及為兩岸四地的青年交流。透過兩岸四地青年的深度交流，可以幫助台灣青年認識到一個完整的中國是包含了大陸、香港、澳門和台灣，同時為自己的生涯發展建立起橫跨兩岸四地大中華圈的人際網絡，並進而建構出與內地、港澳青年共同的集體歷史記憶。

香港經驗對台灣問題的意義，在於其回歸前與台灣殖民歷史經驗的高度相似性，以及其回歸後“一國兩制”實踐對台灣人民的高度示範性。其中十分重要的是，回歸後的香港青年是如何“逐漸剝離其被殖民的記憶”、如何“逐漸恢復中國人身份的認同”、如何“重新建立起對中國的祖國意識”、如何“發自內心地以身為一個中國人為榮”等等，這些在舉辦交流活動時都對台灣青年具有非常大的啟發性與衝擊性。

五、和平發展時代是建構兩岸四地青年集體歷史記憶的新契機

自2008年馬英九率領的國民黨政府在島內重新上台以來，海峽兩岸終於揮別了過去李登輝、陳水扁時期的寒冬，開始進入春暖花開的兩岸和平發展時代。時至今日，兩岸民間、學界與政界的交流交往已越來越加頻繁，陸客與陸生來台的人數、赴內地旅遊與念書的台灣民眾也越來越多，尤其是兩岸簽訂了ECFA之

後，兩岸經貿關係將更加緊密，兩岸和平發展的大勢至此已難以逆轉，同時也因此為兩岸四地青年“集體歷史記憶”的建構提供了新契機：

首先，兩岸三通直航的實行、直航對飛城市與航班路線數量的增加、以及未來指日可待的陸客來台自由行，為兩岸四地青年的交流交往提供了交通的便利性。如何在進一步擴大台灣青年赴內地及港澳進行旅遊與交流的同時，將更多優質的兩岸四地青年交流活動（例如“龍願團”）移師到台灣舉辦，讓台灣青年自發地組織起來接待內地與港澳的青年朋友，並使內地與港澳青年更加了解台灣，從而在此過程中建構出兩岸四地青年的“集體歷史記憶”，是島內青年工作者未來可以努力的方向。

其次，陸生來台短期交換或是長期攻讀學位的政策開放，加上台灣校園裡原有的港澳學生，為兩岸四地青年直接提供了在島內校園的長期交流平台。如何將島內大專院校中的陸生、台生及港澳學生聚集起來，使其產生互動交流，進而形成屬於他們自己的群體意識，從而直接在島內的校園場域中直接建構出兩岸四地青年的“集體歷史記憶”，也是島內青年工作者需要努力的方向。而同理，如何在內地高校中形成上述工作效果，也是大陸各校對台工作者可以參考的思路。

第三，後ECFA時代的來臨與大中華經濟圈的成形，使越來越多的台灣青年意識到自己未來生涯發展的舞台必須擴及至大陸與港澳，提早擴展自己在大中華經濟圈的人脈網絡也就很自然地成為台灣青年參與兩岸四地青年交流的主要動因。因此，如何使兩岸青年從過去見面即互相比較、一爭高下的競爭心理，轉變為我們如何一起開創我們的共同未來的合作心理；以及如何將交流活動的內容從兩岸四地青年的各種競賽，調整為兩岸四地青年共同完成某幾項具有特殊意義的任務，或是在兩岸四地青年混和組成的小隊間進行競賽（例如兩岸四地青年模擬創業大賽，每一個參賽團隊的成員都必須是由兩岸四地青年所組成，評分重點為是否發揮出兩岸四地產業與技術的互補與互賴綜效），這些都是兩岸四地青年交流活動的規劃者可以進一步努力與突破的方向。

結語

在當前30歲以上台灣民眾的身份認同漸趨固定之下，未來20年爭取台灣民心的工作重點必須放在當前30歲以下的台灣青年，如此20年後台灣成年人口的“統獨”民意結構才有可能轉變。同時，由於當前30歲以下的台灣青年受到李扁時期“去中國化教育”的影響，逐漸失去對整個中國的歷史記憶與身份認同，因此建構兩岸四地青年在和平發展時代下的集體歷史記憶，重新塑造當代台灣青年的中國認同，如今已是我們刻不容緩的工作。

傑出義工分享愛心人生

香港義工發展局第三屆香港傑出義工 陳麗妍

我是一名機械工程師，我參加志願者的工作有十年的時間，我在香港主要是服務新移民的兒童，就是從內地移居香港的兒童，他們居住環境，生活條件都比一般的香港兒童低一點，還有一些他們有家庭的問題。我是他們的導師，幫他們適應香港的生活，融入社區環境，幫助他們培養良好品德。我也參與四川地震後學校重建的工作，因為我是工程師，我可以利用我的專業知識，幫助內地的學校規劃及監督重建工程及籌集重建的捐款。義務工作不是說的，是要腳踏實地，身體力行去做才可以真切的體會。

因為社會的變化，我覺得現在的年青人比以前的人更需要義務工作幫助他們，因為現在的孩子很幸福。我第一次的義務工作，就是幫助香港遊樂場協會賣旗，賣旗是一項香港的特有活動，是專門為一些慈善團體籌集經費。學校會派學生參與賣旗，每一個週末在街頭都會有學生在籌款活動，跟街上的行人籌款，以前小時候是自己一個人站在街頭硬着頭皮，作呼籲，叫人捐款，要跟陌生人談話，但是也是一種鍛鍊。現在我在街上看見的，都是一家人在賣旗，學生們都有爸媽幫助叫途人捐款，孩子都是站在一旁，他們都是被保護，他們參與的程度減少，滿足感也少。

現在的孩子都生活在網絡世界裏面，我覺得這是一種世界的潮流，但是他們更需要一些機會接觸人群，及別人溝通和合作。義務工作是一個個人成長的機會，可以提升技能，從一個只是小幫手，可以有不斷升級，到一個策劃幾千人的活動，你會得到很多方面的技能提升：人際技巧，溝通技巧，團體合作等等。我是親眼目睹很多例子，義務工作怎麼令他們改變了性格，他們變得更快樂，我以前有一個新移民的女孩，她十四歲，是一個很害羞的小女孩，因為她覺得她的牙長得不漂亮，所以躲在別人的身後，不敢講話，我就帶她一起參與不同的義工活動，到今天她是一個領袖帶領別人做不同的義務工作，很主動，對生活很積極，這是讓我最感動的事。我們香港的義工有一句話說：生命影響生命，就是我們做義工，表面上是我們幫助人家，我們施捨，但實際上，人家也讓我變成一個更好的人，這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我覺得一個優質的義工，不是“有空才做”，而是分秒必爭地做。這不只是義工，不是我高興才做，而是在他的生命中發心立願，義工是義務工作，在休假或工作休閒的空餘時間，去做不支薪的服務工作！而是做一個真正的志願者，則是將付出、服務人群當作志向，出錢又出力，有責任心、使命感，不計較時間、代價、體力的付出，能克服艱難，完成任務，並且做得滿心歡喜。我也是上班族，我也體會整個社會風氣，城市工作的時間很長，壓力很大，尤其是在經濟不好的時候，我們都加班，或者是晚上要進修。但我個人義務工作裏面學會時間管理，增力自己的效率。我也建議大家不斷地思考，怎樣可以更有效地幫助有需要的人士，因為我們的資源有限，所以更需要有效地運用，不斷地向有經驗的人士學習，從不同義工人士吸

取經驗及互相學習。最近我認識了一班長者義工，他們教曉我跟長者溝通的秘訣，也讓我知悉退休人士也可以繼續貢獻社會。

最後我想說的就是，很多人都說現在的年輕人一代不如一代，但我在服務的時候都看見很多20歲的年青人很熱情，他們都有自己的想法，很會創新，他們不會墨守成規，勇於打破前人的框框，他們電腦技能特別強，經常會用Facebook把活動推廣，一呼百應，我也要跟他們學習，這令我感到很有希望，所以義務工作讓我有機會接觸不同世代的人，綜合各世代的人的特長，再加以發揮。



青年公共參與與實踐

台灣成功大學電機系學生 盧彥澤

公民時代的來臨意味著全民都可以透過各種管道、方法，可以直接或間接的參與公共事務。在公民實踐公共參與的同時，透過廣泛的交流討論可以得到共識、透過組織動員的分工合作可以進而對社會產生正面的幫助，因此不管是兩岸三地或世界各個角落，都該重視公民時代的來臨，鼓勵青年提早參與公共事務，可以幫助社會一些相對弱勢的族群或是改善既有的不公平現象。以下，我以幾個公民可以參與、改善的兩岸三地的題目來作討論。

文化多樣性保存與延續

兩岸三地都存在著豐富的方言地方文化，台灣有所謂的原住民、大陸也有所謂少數民族，然而這些地方文化若不妥善保存，將會快速的失傳甚至消失。

台灣中、東部有相當多的原住民族群早期因為政府的政策而逐漸漢化，漸漸失去原本的文化，然而，近年由於體認到多元族群的重要性，政府、民間組織紛紛鼓勵各地方言的母語教學、舉辦活動來展現地方族群文化的特色，透過這些方式來幫助地方弱勢文化的延續與保存，而其中不乏有相當多青年志工擔任其中的要務來身體力行。然而台灣東部普遍的青壯年人口流失仍然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如何透過鼓勵、誘因的方式來幫助青年留在家鄉、部落工作，將仍是一個需要面臨的重要的課題。

我過去曾到過杭州烏鎮，發覺透過政府的政策以及民眾的配合，讓烏鎮成為一個維持在很古樸的地方觀光小鎮，這可以說是讓地方文化相當完整的保存下來，那裡的人民不管是建築、生活方式、商業模式等等方面，都延續保存的相當好。然而在這樣的情況下，雖然說是讓文化各方面都保存下來了，但烏鎮顯得相對生活方式較為古早、落後。因此，如何讓文化保存和現代化並存，又是一個重要而待需解決的課題。

在台灣和大陸的例子，其實都可以透過青年自發性組織一個團體，來到地方小鎮、部落，透過設計活動(如文化祭典)等方式來促進地方文化的活絡與延續。

資源分配不均

兩岸三地同時都有資源分配不均而導致城鄉差距問題，這可能是因為開發歷史、產業慣性聚落、政府政策主導等等因素，因而導致的城鄉差距，而香港的貧富差距在世界上就是屬於相當大的。

台灣長期以來偏重西部的發展，而台灣東部則較少開發，而近年來多以發展地方觀光來促進地方繁榮，雖稍微緩解東部落後的情況，但仍有待改善。對青年學生來說，可以簡單做到的就是到偏僻落後的地方、小學，幫助當地學生的學習，譬如說有數位落差的地方，幫助當地的學生學習電腦。透過這樣的青年

公益參與，也可以幫助改善社會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

而大陸則自改革開放以來都以偏重沿海城市為開發的重點，對於西部的開發明顯不足，也因此有所謂的一線、二線等城市的分別，近年來雖沿海企業有西進的現象，政府也有一些鼓勵在家鄉工作的政策，但仍無法有效改善東南沿海和西部內地的城鄉差距問題。而身為一個青年學生可以做的應該就是到西部偏遠落後地區，實行偏遠地區教育或是進行人道關懷。

結論

雖然青年學生的公共參與可能對於社會的改善有限，政府政策主導可能才是強而有力並且可持續而穩定的改善，但仍應該鼓勵青年學生關注社會議題、進行公共參與或公益活動，這樣的話即使他現在做的是“小善”，但因為有去深入了解社會議題、知道問題出在哪，一旦這些青年學生長大有能力，便可以做“大善”來對這個社會產生積極正面的影響。



兩岸關係與台、港、澳交流

台灣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生 林珪五

兩岸開放交流已經20多年，兩岸從原本的對立，和平相處到目前熱烈的交流，這都是一種進步的象徵，本是同根生，文化和語言都是相同的，所以再怎麼說也不可能切斷關係，然而近年來官方、民間在經貿、文化、婚戀、宗親等各個領域的互動交流，不但可以增加兩岸人民的了解，化解雙方的敵意，甚至合作以致於更深遠的統一。

對台灣來說，台灣的教育水準、人民素質、公民社會、藝文創新，綜合起來，就是文化。文化就是台灣的關鍵實力。這是目前台灣要把握的，不然大陸進步那麼快，很快就把我們趕過去，放開手，拆除障礙，全力推動兩岸文化交流，這才是對台灣有幫助，也能讓台灣人更重新認識大陸的文化，認識中國的博大精深，也讓對岸了解台灣，了解台灣人的可愛，消彌兩邊火藥味。

兩岸關係除了在文化上，在經濟上的突破，更是重要。無論是直航或是開放陸客來台觀光，皆是有助於台灣經濟發展與加強兩岸人民間的交流，這是絕對正面的助益，日後台灣跟大陸會更密不可分，隨著我們出口對大陸依賴度，台灣出口大陸的比率也愈來愈高，所以大陸出口比率增加，相對也帶動台灣出口比率的增加，大陸經濟好，台灣跟著受惠。

然而中國成為世界泱泱大國之勢，已經銳不可擋，而未來也會成為兩大陣營的態勢：中國和美國，美國大家都以為它很好，它還不是處處佔台灣的便宜，所以我們真的要認清楚，誰才是台灣的好朋友。中國原本就是我們祖先的國家，血緣文化語言密不可分，光從外表看也知道你比較像中國人，只有大家緊密合作，衝出太平洋，才能讓台灣跟大陸在世界鼎足而立。讓我們中國人在世界上發揚光大。(因為大家都是中國人，祖先相同)。

但是，兩岸關係在政治上的突破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兩岸既存的政治現實，誰要改變？如何能改變？又該如何改變？綜觀歷史，是一定會統一，只是用甚麼方式統一，我們老百姓當然希望是透過最溫和的方式統一。而要統一雙方要拿出誠意出來。

第一：大陸要撤兵撤飛彈：因為你要娶人家當媳婦，哪有拿著刀叫人家嫁給你的，那我相信女生都很難答應，先把刀拿起來，相信感情馬上跨一大步，不害怕了才能敞開心胸接納對方。

第二：大陸要多給台灣在經濟上的優惠：因為要娶人家總是要給聘金，要巴結人家我們才能了解對方的誠意囉！讓台灣人解決荷包的問題肚皮的問題相信很多人對大陸的歧見會更消彌。

第三：大陸要保護台灣：要娶人家當然要好好保護那個女生，愛一個人士希望他幸福，要保護他，總

不能光說不練吧!相同道理也是，當台灣在國際上被欺負時，大陸可以跳出來幫台灣講話，甚至出兵。這樣台灣才會認同大陸是真的有誠意愛護我們同胞，也相信大家都是中國人的道理。

第四：雙方要建立軍事的合作，共同協防：大家都是中國人，要認清楚共同敵人是誰，不要自家人打自家人，那只會讓人家計謀得逞，爽到別人，台灣不要去當人家的小弟，畢竟家人再怎麼吵，最後還是要團結一致對外。

第五：建立兩岸高層溝通模式：在對等尊嚴善意的基礎上，建立一套雙方高層都能接受的溝通模式，暢通兩岸關係溝通管道，因為要解決問題，大家一定要好好溝通，大家都懂囉，問題就好解決囉。

第六：開放兩岸海空直航：初期以桃園中正、台中清泉崗、台北松山、高雄小港、澎湖馬公、花蓮、台東七個機場列為兩岸直航機場。甚至將來開放船可以對開，因為只有交流密切密不可分，感情好囉自然就合囉。

第七：開啟兩岸經貿協商新時代：兩岸經貿協商要更快更深，建立應有制度及規範，以符合國家長遠的利益，推動對等協商，開啟兩岸經貿協商新時代。協商議題包括兩岸貿易正常化及特定產業保護機制、兩岸投資保障及經貿糾紛調解仲裁、兩岸智財權保護及專利認證規範協調、產品標準規格化及標準檢測認證規範協調等等這些很多都是需要去規範的，大家做事方法都相同囉，也對等囉!那就更像一家人囉!

第八：開放大陸企業對台投資的限制，互相研發關鍵技術，建立更不可分的關係，讓經濟帶動政治。

第九：雙方的貨幣政策應該更寬鬆：讓人民幣台幣都可以在各家銀行都可以兌換。

第十：循序漸進承認大陸學歷，擴大兩岸學術及教育交流：教育是百年大業，也是奠定國力甚至改變民俗風情改變人心，潛移默化最大的力量，教育都相同，統一的路就更近囉!

當然這些或許都講的很不可思議，但如果雙方能大肚量都做到，我相信離統一也不遠囉，不然時間拖的愈長，對兩岸的情勢就愈不利，最後有可能就是武力解決，我相信台灣問題兩岸問題在我們這個世代是一定要解決的，也是我們這個世代一定會碰到的問題，甚至讓彼此雙方的人民開放性的去討論去這些話題，相信有智慧的兩岸的中國人，會找到一個解決的路，因為中國最強的不是武力而是融和，而是包容，五千年以來中國融合了多少個種族，相信台灣跟大陸會在中國文化這個大熔爐融合跟統一，我們期待最和平最璀璨的融合。

開放陸生來台政策與兩岸學術交流

台灣中正大學化學暨生物化學研究所博士生 孫翊倫

清華大學、交通大學、中山大學、故宮博物院、中國化學會、中國政治學會，這些學校、組織全部都是同時存在於台灣與大陸。無論兩岸的政治情勢如何，無論政客的台獨口號喊的多響亮，兩岸具有相同的語言、相同的文化背景、相同的種族，兩岸同屬一個具有五千年歷史的中國，這是永遠無法改變的事實。因此，兩岸之間的學術交流，就如同呼吸般的自然，早已存在於各種形式的合作之中，如學術研討會、論文研究與大學之間的交流。

早期受限於台灣政府的三不政策影響，兩岸的交流受到限制；然而，自從1987年蔣經國開放台灣民眾赴大陸探親後，台灣就有學生開始赴大陸就讀，此後，儘管兩岸關係時有波動，到大陸求學的台灣學生的數量仍然穩定上升。1993年開始，台灣也開放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台從事專業活動，依宗教、經貿、財金、農業、勞工、學術、文教、體育、法律、交通、環保、大眾傳播及民俗技藝等20類專業領域進行專業交流活動。直到現在，不管是經濟、觀光、學術等等的交流，兩岸早已密不可分。

大學對外開放，讓全世界的優秀學生都能就讀，這早已是全世界各頂尖大學長久以來的做法，台灣許多的大學也都可以常常見到外國留學生，如果台灣的大學對外國學生都開放，卻將與我們同文同種的大陸學生拒於門外豈不怪哉？且大陸早已承認我方學歷並開放台灣學生赴大陸就讀，甚至今年更進一步承認台灣地區的大學入學考試成績，在此環境之下實在沒有不開放大陸學生來台就讀的道理。此外，大陸有許多國際上公認的頂尖大學，其評價並不比台灣的大學差，開放陸生來台將更有助於兩岸大學之間的競爭，提升台灣學生與大陸學生在國際上的競爭力。

就在2010年8月19日，台灣立法部門正式通過開放大陸學生來台的“陸生三法”修正案，包括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大學法、專科學校法，台灣將正式承認大陸學歷，並開放大陸學生來台灣大專院校就學。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開放陸生來台的條件“一限二不”也入法，包括限制醫事學歷採認、陸生不得考證照及公職、陸生不得就讀與國家安全有關科係等三項原則。另外，陸生不可打工，則以附帶決議方式加以規範。國民黨的妥協固然有選票的考量，但新修訂的“陸生三法”卻已經明顯的違反國際人權的內涵。作為普世價值的人權理念，它不只是要求賦予人民平等的權利，還需要在實質上對人身安全提供保障，以及工作權、生存權等權利的不被剝奪。但“陸生三法”中的限制卻對部分留學大陸的台生與來台陸生有嚴重的歧視性態度，尤其是讓其他國家的留學生打工，卻單單限制陸生不許打工，這實在是一件令人非常諷刺的事，也使得民主化的台灣未來將面對更多人權保障不足的批評。

自國共內戰後，兩岸已經分隔60年，開放陸生來台，讓兩岸的學生交流互動，將更能促進相互的了解，這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更是一個讓兩岸三地全體中國人能深入了解對方文化的機會，透過如此直接的了解、認識、學習，進而有了互信的基礎，才能為兩岸帶來永久的和平與發展。

成功方程式

利興控股有限公司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甄韋喬

甚麼叫成功／成就？像李嘉誠一樣，才叫成功，才叫有成就？達成人生理想＝成功／達成個人目標＝成功

一說到成功，很多香港人便會想起李嘉誠。然而，是不是事業有成、富甲天下方可稱得上是成功呢？在我而言，能達成人生理想是成功；能達成個人目標是成功，因此，我認為人人都可以成功。至於成就，就是成功的累積。換句話說，取得成功次數越多，成就就會越高。

1 + 1 = 2，那，成功也有方程式嗎？信念+行動=結果

我認為成功是有方程式的。就是要有信念，把這個信念付諸行動，做到自己想要的結果，便是成功的基本方程式。

信念+行動=成功／信念+行動=失敗

事實上，成功和失敗的方程式是一樣的，都取決於信念。很多時，阻撓自己成功的人，就是自己。老是告訴自己不行，結果當然就是不行；告訴自己明天才開始行動，那麼成功當然就永遠站在捉摸不到的明天。所以要成功，必先要明確自己想法、目標和理想，並持續執行。

小時候來到香港，家境清貧，只能住板間房。當時，我已矢志要努力賺錢改善生活，將來要有屬於自己的車，屬於自己的樓房。結果，我在二十五、六歲時已經達成目標。

蓋茲先生（Bill Gates）十三歲時，在編寫了首個電腦程式後，已立志在電腦界發展，希望能發明一個令全世界人都能容易使用電腦的系統。結果，他成功創辦了他的電腦王國微軟公司，更連續十三年蟬聯福布斯富豪排行榜的首位。

機會總喜歡繞道走，老是碰不上這是真的嗎？你該問問自己：機會來了，你看到了嗎？你抓得住嗎？

很多人只看到成功的人行大運，然後自怨自憐怎麼自己懷才不遇。我卻相信多倒楣的人，都有成功的機會，只在乎你是否懂得把握機會。要把握機會，就必先要相信自己，明確自己想法、目標及理想。畢竟，機會是會留給有準備的人。

且容我再用蓋茲先生作為例子。二十二歲時的蓋茲既沒有營商經驗，也沒有創業資金。但是，他相信電腦這個行業有無限的發展潛能。於是他堅持寫程式。直到有一天，幸運之神向他叩門——IBM首次聘請蓋茲編寫作業系統，然而編寫工作必須能在三個月內完成。這個可以說是幾乎不可能達成的條件，他一口便答應了，還真的在幾個星期後完成了MS-DOS 系統。為甚麼他可以做到呢？只因他目標明確，相信自己，一

直朝著目標走。

終於碰上了機會，然而，也碰上了壁。信念+行動=預料之結果/積極面對，跨過峭壁，就是康莊大道

好不容易碰到個機會，但是哪會事事順利呢？所以要成功，便得要懂得高瞻遠矚，在事前從多角度探討問題，做好一切準備，一旦真的遇上難題，也能迎刃而解。

其次是要正視問題，一個人的行動方式會直接影響結果。倘發現行動後未能取得預期結果，切忌將失敗與個人掛鉤，應清楚告訴自己失敗只源於行動方式出現偏差，並以正面的心態處理問題，重新部署，再訂定目標，朝目標進發。

2003年沙士肆虐，清潔用品和防護用品的成本不斷上漲，加上清潔需求增加，人手開支也增加了不少。雖然經營艱難，但我以積極的態度去面對，同事亦齊心緊守崗位完成工作。結果，我們不但熬過了這段困難時期，還獲得客戶垂青。

誰才是成功最大的敵人？最大的敵人=自己—超越自我，成功機會增倍

說到這裡，我得告訴你這個方程式最關鍵的因素——“自己”。一個人的行動是取決於其信念，而能夠操控自己信念的，是“自己”；能夠明確自己想法、目標和理想的，就只有“自己”；能夠調整自己心態去面對困局的，也只能是“自己”。

即使達到目標，取得成績，也得多加自我反省，經常提醒自己不要驕傲自滿。要知道一次的成功，不代表一世的成功；今天取得一百分，正是明天由零分的開始。

所以，越是能超越自己的心魔，成功的機會就越大。持之而行，成就也必然越高。

我的格言：“要相信自己，理想必達到”

最後，我希望與大家分享我的格言：要相信自己，理想必達到。

是否應全面開放台灣企業赴大陸投資

國立台灣大學會計系學生 張晉豪

一、兩岸政經環境

1、台灣

台灣是全球第十六大經濟體。早期台灣中小企業眾多，現在的經濟結構以服務業與高科技產業為主。台灣的電子工業在世界舉足輕重，大多數電腦電子零部件都在台灣生產。而對外貿易則是台灣的經濟命脈，日本和美國長久以來一直是台灣前兩大貿易夥伴，但在2005年中國大陸成為台灣進出口貿易第一大地區，另有部分轉向歐洲和東南亞市場。台灣是中國大陸、泰國、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和越南的主要投資來源，在中國大陸有5萬多間台資企業，長期居留的台商及眷屬則有30-40萬人之多。至於在政治方面，台灣人民依憲法享有言論自由且民主政治運動澎湃，各人可持有不同政治主張。台灣廣泛受到爭論的政治問題是台海問題與統獨問題，因而使人民支持的政治立場大致可劃分為泛藍陣營、泛綠陣營。

2、中國大陸

1978年實行經濟改革以來，中國大陸經濟發展迅速且平均購買力驚人，僅次於美國居全球第二位。中國大陸亦是國際貿易的重要一員，其2009年出口額居世界第一，進口額和貿易總額均居世界第二。中國政府不斷強調增加個人收入，並鼓勵採用新的管理模式來提高產量。政府也將外貿作為刺激經濟增長的手段，因此20多年間建立了五個經濟特區和超過2000個規模不一的經濟技術開發區，為外資提供更寬鬆的政策以及更好的投資環境，以吸引外國資本，因此目前中國大陸的經濟政策仍繼續朝改革開放的方向邁進。

結論

由正文中可知台灣以及大陸在目前的經濟發展上仍有些許差距，但大陸以龐大的人口所蘊藏的驚人消費力以及其經濟規模的持續擴大，大陸將在近年內追趕上台灣，成為一個相當可觀的經濟體。而目前許多外資在大陸做投資，且有相當多的企業在大陸設廠，無非是因為看上大陸的經濟發展潛力及其低廉的勞力成本。因此我認為在經濟面上理應開放島內企業赴大陸投資，因為這樣能讓島內企業的資本額壯大且台灣也能利用大陸的蓬勃發展取得一個有利的中間位置獲取利益。然而仍然要注意應該要對投資有所限制而不能全面性自由的開放，如果不加以限制，可能會導致台灣的資金大量流向大陸，讓台灣反而沒有足夠的資金去運用及刺激經濟，如此一來將會本末倒置。而在政治面上，兩岸目前處於相對於先前較為穩定的狀態，且因為政治的因素讓兩岸在經濟交流上更加蓬勃，因此在政治面的考量對於開不開放這個問題結論也應當是正面的。然而，還是要避免過度的依賴大陸，因為發展快速的經濟體都會有泡沫化的危險，所以在開放以及投資的同時仍應注意其潛在的風險。

創業香港

在港內地畢業生聯合會主席 耿春亞

充滿活力和機遇的香港

眾所周知，香港從一個小漁村，發展到今天成為國際性的大都市。其社會環境，產業結構均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尤其是隨著香港上一兩代創業者賴以起家的生產及製造業不斷向內地轉移，香港本地越來越倚重於服務業。年輕人就業，也越來越傾向於從事金融、投資、證券等熱門行業，創業意願不高。

我本人在香港回歸的1997年，還是一名高二的學生，當時，透過電視機看香港回歸的我，壓根就沒有想到自己會和香港產生甚麼聯繫。然而，在香港回歸四年之後，也就是2001年的暑假，原本計劃去美國讀博士的我，獲得一個來香港實習兩個月的機會，那兩個月，我近距離地觀察了香港，當時，我對“一國兩制”並沒有特別深刻的認知，但眼前這個充滿活力和生機，充滿機遇和挑戰的香港社會深深吸引著我。於是我做出了一個至今無悔的抉擇，我要到香港，到香港來追尋我創業的夢想。

創業香港的要素

當然，創業不是一句口號，而是一個有策略、有計劃、有步驟、有條不紊循序漸進的過程。2002年，我揣著幾千塊錢來了香港。雖然已經不是電影《甜甜蜜蜜》所描繪的那個年代，但是黎明所經歷的一些事情，在我們這批來港新青年身上也陸續發生。比如：語言不通，文化差異，吃麥當勞和燒味飯省錢，融入主流社會的困難，青年男女的情感困惑等。

當然如果要創業，需要克服的困難就更多。例如：如何獲得啟動資金，如何取得合法工作的簽證，如何建立辦公和居住的條件，如何尋找到可以在香港發展的項目，如何尋找志同道合的夥伴，如果真正在這個競爭激烈的商業社會立足。我用了兩年讀研究生的時間，去解決所有這些問題，在04年底，05年初，“東方蜘蛛”誕生了。

一路走來，我們學會生存，找到了發展的道路。也更加堅定了我對當初來香港求學創業的選擇。創業公司雖小，但五臟俱全，缺一不可。而香港，確確實實為我們提供了發展必不可少的條件。

創業資本

為鼓勵創業，發展高新科技產業，香港特區政府在多年前就面向全球建立起了高新科技創業支援平台，通過創新科技署、香港科技園、數碼港等機構，為符合資格的創業項目提供包括資金在內的全方面協助。本人就是在創業之初一窮二白的情況，獲得香港科技園價值一百萬港幣的創業孵化計劃支持，爭取到寶貴的發展空間。

另外，香港有著極其豐富的民間資本，有錢人多，有投資意識的人多，好的項目，好的團隊，尋找不超過一百萬港幣的早期天使投資絕不是件困難的事情。再加上法制社會，一紙合約可以有效約束被投資者

和投資者之間的責權關係，我在創業之初，就是通過私人關係，獲得了寶貴的早期現金投資。

至於項目發展起來後所需的風險投資，Pre-IPO的投資，在香港都有相關領域的世界級投資機構代表在此駐守，好的項目獲得資金絕對不是難事。

商業模式

我始終認為，香港是內地未來發展的範式，也意味著香港很多的好東西會是內地特別需要的。香港不是一個大的市場，但香港絕對是一個好的實驗場。創業階段就是要在商業試驗場去測試產品服務的反應，看是否能在香港市場上獲得接納，如果反應良好，就可以投入更廣泛的內地市場，進行批量生產和銷售。就我們自身的團隊發展來看，在香港這個比較精細的實驗市場環境下，我們尋找到了商業模式和盈利模式，那麼下一步往內地發展就不是件困難的事情。

營商環境

香港的營商環境是世界一流的，這從每年的世界城市競爭力報告中就可以看出。法治社會下的自由商業市場，保障了每一項合約的有效履行，利得稅制和低稅率，幫助處於投入期的高新科技項目創業者來說，節省了寶貴的研發資金，能夠在推出市場獲取利潤前，以低納稅甚至零納稅的方式運行。香港發達的工商服務業和銀行服務業，也為創業者提供了便捷高效的工作平台，使之專注於核心競爭力的發展。這方面的好處，我在創業頭幾年感受頗深。

產權保護

香港對於知識產權的保護是非常重視的，在商業服務領域尤其規範，哪怕是中小企業，都要尋求正版的解決方案。香港已有為數眾多的專業律師，為企業提供全世界範圍的專利及知識產權申請和保護服務，香港政府也特別提供資源，為中小企業申請專利等提供資助，香港科技園亦專門成立有知識產權服務中心提供企業級的服務。

團隊和人才

80後的一代，其實是接收了完整而良好高等教育的一代，是伴隨資訊技術發展和互聯網革命成長的一代，互聯網、高科技、創業、風險投資、NASDAQ上市等概念，深深地刺激的一代人的神經，比爾蓋茨是全世界這代人心目中的偶像。香港為了實現產業轉型，亦積極制定面向全世界的人才引進政策，為他們提供創業的土壤，和發揮才能的空間。我們公司的骨幹，就是通過內地專才計劃留港發展。在香港科技園，除了香港本地的年輕人，除了我們這樣來自內地的專業人才，亦有來自台灣，日本，美國，歐洲等地的創業者，他們被香港這樣一個開放而充滿機遇的城市所吸引，在這裡紮根發芽。

我在香港快8年了，在這裡學習、創業、結婚，安居，變成了香港人。我熱切地向各位傳達一個訊息，香港是一個文化多元，包容性極強的國際化都市，無論是來自香港、內地、台灣，還是外國的年輕人，都能夠尋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如果希望創業的，香港也一定不會讓你失望。

正如香港回歸十週年的主題曲《始終有你》所唱：“任誰留下汗水，就是個精英，因為香港始終有你”。

論兩岸三地青年交流之未來

台灣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生 賴弘仁

武昌起義革命成功後，國父孫中山先生與其所領導的有志之士終於創立了中華民國。不但改寫了世界近代史，也改變了全中國的命運。怎知好景不常，建立民國後百廢待興，國家制度也好，建設也罷全部必須從頭開始。但是，好景不常，礙於當時的國際情勢，新的中國面臨了內憂外患，前者為正統之爭，後者則是國際體系權力的重組，而導致許多戰爭，一個建國者最不願意見到的情形終於發生了。西元1949年10月1日中國共產黨在北京建政，改國號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而由蔣中正所領導的國民政府軍被迫退守台灣，定都台北，至今，兩岸形成由兩個政治實體分治與對峙的狀態。

分治後的兩岸，從武力衝突到互不往來，從互不往來到漸漸緩和的關係歷經了幾十年之久，這種穩定的關係在冷戰結束後尤其明顯，兩岸能夠走到今天的地步，主要原因除了整體國際情勢的改變外，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兩岸的交流頻繁所導致。雖然稍早退居到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曾採取三不政策，即不接觸、不妥協、不談判，尚未開放通商與及限制台灣地區人民前往內地，但由於自始至終無法改變的事實，兩岸人民屬同文同種，許多跟隨國民政府到台灣的人民在中國大陸皆有親人，有的甚至已有家室，故即使在政府不允許的情況下，兩岸人民還維持著些許的聯繫，國民政府來台後第一件銀行搶案，其主角李師科的故事就是在跨時代下最典型活生生悲慘的例子。在解嚴後，陸續又開放台灣地區人民可赴大陸探親，許多台灣商人再透過第三地而到中國大陸經商，兩岸的交流隨即如雨後春筍般浮出檯面，關於這點，若從國際關係理論『功能主義』學派者的論點來觀察兩岸的交流，則不難理解會演變為今天這樣的局面。

即使2000年台灣歷經第一次的政黨輪替，由謊稱要台獨建國的政黨執政，兩岸的交流不減反增，全球化浪潮有如人們思維轉變的加速器，交流的頻繁程度，應屬2008年中國國民黨重新獲得執政權後，更為明顯。筆者到大陸參訪與同為年輕學子交流的次數近五年來就有五次，深深的認為兩岸青年的交流是必要的與不可或缺的，因許多在未到大陸的同儕朋友眼中，其想法與認知皆停留在舊時代的教科書中，深不知大陸雖經過大躍進、人民公社與文革的大浩劫後，前領導人鄧小平1978年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奠定了『改革開放』的政策後有了重大的改變。筆者認為，中國大陸即使目前尚未全面發展完成，但它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的經濟實力絕對更勝台灣，不只在經濟上，例如，世界一百所知名大學裡，中國大陸佔的為數眾多，反觀台灣第一學府台大，卻沒擠進百榜，所以面對中國大陸要全面去看。

青年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不是嗎？隨著中國的崛起，新的一個世紀絕對是中國人的世紀，兩岸三地青年學子在此佔了很重要的角色，無論兩岸關係未來的走向如何，是競是合，還是既競爭又合作，青年學子們應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唯有敞開胸懷，暫時拋棄政治上的立場與成見，學人之長以補己之短，相信新事物會讓人產生新思維，兩岸青年學子的交流對於其雙方來說是很好的良性互動，小則建立良好自我的人生觀，大則幫助國家社會的進步與繁榮，也為全球華人在世界史上再度寫下嶄新的一頁。

青年精英聚香江 共話世博與環保

極地博物館基金創辦人 李樂詩

多少世代以來，人們都期望天長地久，風調雨順，與天人合一。可是進入近代，科技發明，宇宙探索，物質生活豐富反而給予環境帶來不斷的災難，地震，龍捲風，風暴，海嘯，旱災，洪水等。氣候暖化，使南北極的冰雪持續融化，令這片最後的淨土現在也受到牽連。

中國為了研究極地與全球的環境關係，自八零年代起，先後在南極洲建立了長城站、中山站及昆崙站。二零零四年在北極地區也設立了黃河站。並積極參與國際考察活動，同時有實力組織科研項目與國際科學工作者不斷為氣候暖化對人類影響而作出貢獻。

今年，世博環保與創新能源會在中國上海舉辦，正是世界關注問題。今年世博的主題為“城市讓生活更美好”。

上海世博會提出以和諧作為城市發展理念，包括人與自然和諧、歷史、現在與未來的和諧以及人與人的和諧設計理念是“城市發展中的中華智慧”。

東方之冠的中國館，巨型的LED動畫全長20多米的“清明上河圖”，還有講述中國近年來發展的電影歷程及低碳生活館，讓人們了解到低碳環保的新概念。

其他各國都是高科技，富現代氣息的場館，充滿生活與幸福感的城市氛圍，表達精彩的世界和美麗的未來為今後的生活帶來新希望，發明對全球、人類及社會有幫助的技術，更多是對環保的創意。

多個國家都強調水資源的管理，我們更應了解“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這一老子的理論。宣傳地球資源應用之有節。

世博會歷屆的主題都以科技與人類的關係如一九八八年以主題“技術時代的娛樂”，再由科技以至“人類—自然—技術”、“發現時代”等。

如今，中國發展迅速的時代，世博會在中國上海舉辦，不但對國際上展示我們的能力及創新的技術，對環境保護的決心，也值此而全民教育、學習，讓我們認識世界的文化、科技、創新的設計。更多的是對將來的憧憬，發生激勵作用。

地球是一個資源豐富的地方，在宇宙，科學家到目前為止，仍未發現能夠孕育萬千物種的星球。讓我們攜起手來，共建繁榮的祖國。

陸生入台對台灣教育的影響

台灣世新大學傳播管理學系學生 陳軍翰

對於陸生來台所能帶來的正面影響：

大陸學生用功程度，對本地學風，一定會有很大激勵及促進作用；還有台灣的制度及文化，對陸生一定會有影響如思維、行為及態度。

校園越多元時，不同的背景、觀念、想法，有相互激蕩的時候，產生創新的可能性也越高，這就是為何創新的大學，都把大門打開，把全世界最好學生找到校園來，所帶來的真正動力，才是學校進步真正的動力，這動力才能成為台灣走向創新驅動最重要的基礎。

這些來台學生回到大陸後，表現和來台之前，完全不一樣，思想更開闊了。互相影響，對台灣的大學是有幫助的，台灣走向國際化，更需要有不同背景的學生，能把台灣教育好處帶到大陸去。

對於陸生來台所帶來的省思：

就提升台灣大學的競爭力，因台灣並非大陸學生之首選、且三限六不中言明不提供陸生獎學金不能打工，沒有誘因下如何招收到大陸頂尖優秀學生。另外，陸生來台不管是內含或外加都會稀釋我們的教育資源，降低師生比，影響台灣納稅人權益。開放研究生來台牽涉到承認大陸學歷的複雜問題，之後又可能引起社會問題。

目前教育部推動的五年五百億、高教卓越計畫、獎勵私校發展計畫的改革，可能因引進陸生後而稀釋掉高教資源，開放陸生來台與這些計畫之執行相矛盾。陸生來台會造成“成本外部化”，亦即非法打工的問題，該問題應厘清後再談配套。

結論

雖然整體的規劃以及前景都是為了提升台灣學生的競爭力和市場的需求，但是在於配套的措施上則必須多加思考和規劃，不然結果往往都只是空想，無法和現實相互連結，反而損失了更多的資源、人民納稅的錢和現階段正在接受教育的學生權益，沒有一個良好的規劃只會一再的更改政策，讓學生要不斷的接受、適應，而無法安穩的將精力投注在課業上，還要不時注意這變動不定的政策改革，且在教育上也無法得到大家的認同，更別說是要進一步的提升台灣整體競爭力跟與國際接軌等等空而不實的目標了！

對於開放大陸學歷的看法

台灣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學生 陳孟好

開放大陸學歷這個議題在台灣早就已經吵得沸沸揚揚，而在最近台灣立法院也通過了陸生三法，正式承認大陸學歷，開放大陸學生來台就讀大專院校，但是附帶“一限，一不，一國安”這個原則。“一限，一不，一國安”也就是限制採認大陸醫事學歷，陸生不得考公職考證照，陸生不得就讀台灣國家安全相關科係。

而根據台灣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的大陸學歷承認的檢討與利弊裡提到之前造成開放大陸學歷問題擱置的原因有，1、承認之73所大學名單決定過於草率，有甚多大學並未參與台港澳聯招，服修台生必須透過大陸內地的高考制度入學。由於考試科目中列有政治科目，台生並未修習該科，造成台灣在與大陸本地生競爭之困擾；同時亦將影響台灣學生之政治意識形態，長此以往對台灣不利。2、將造成台灣學校招生來源不足問題。3、將對台灣就業市場產生衝擊，由於台灣現況已是充斥高學歷高失業現象，若前往大陸就學取得高學歷之學生返台後，更將使此情形日益惡化，對台灣就業市場產生不利衝擊。4、造成中醫藥界之不利競爭。5、大陸高等教育水準良莠不齊。6、將影響台生對台灣忠誠度。

根據以上幾點我的看法是，造成台灣學校招生來源不足這點讓我覺得是政府對台灣的高等教育沒有信心，如果認為開放大陸學歷會造成台灣學生流失到對岸就讀大學，那是不是要先檢討一下台灣的高等教育，現在有很多大學和對岸大學相較起來不一定有比對岸大學好，學生為了得到更好的教育而選擇自己想受教育的環境這難道有錯嘛？如果政府承認大陸學歷那麼也可以讓台灣優秀的學生去對岸和大陸學生競爭早點看看台灣以外的世界這樣不是很好嗎。關於對就業市場有不利衝擊這點，我認為，去大陸讀大學的學生能早一點到大陸建立人脈以及一定比只在台灣對於大陸一點都不認識的學生能夠對大陸市場有更多的認識，如果畢業後對於想拓展大陸市場的台商企業來說不正是一個很棒的人才嗎？再來是“國家忠誠度”的問題。前往大陸讀書或許會讓台灣學生了解到大陸的風土民情，但是大學生在台灣土生土長，受台灣教育多年本身也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如果僅是在大陸讀書幾年就能改變他對台灣的忠誠度那也只是他本身個人的問題罷了。舉例來說，就算是到別的國家留學的台灣人也很可能對那個國家產生認同，總不能以“國家忠誠度”這種理由而把台灣學生都關在台灣吧！所以我認為開放大陸學歷是可行的，只是現階段島內對於大陸學歷有太多的疑問，應做好相關的配套措施再開放是最好的辦法。

以ECFA為例淺論兩岸三地經貿

台灣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學生 章鈴

一、兩岸經貿

兩岸三地近年來有許多經貿合作以及協議。事實上今年2010年上半年開始，兩岸的經貿就因為一係列的採購以及大陸推動的兩岸雙方企業投資而使大陸對台灣的進口有所增長。尤其直得關注的是今年6月才在重慶簽署的《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以下簡稱ECFA)，對兩岸之間的經貿關係實為一大突破。此協議被看作是自1949年國共內戰以來兩岸最顯著的協議。

二、簽訂ECFA的原因

為了使台灣不致陷入被邊緣化的經濟危機，ECFA以兩岸部分產品關稅減免為主要內容，實施互惠的自由貿易協議。在國際間不被承認為國家的台灣，藉由此與大陸的協議，除了期盼在經貿上能達到雙贏的效果，也盼望能邁向國際化，為日後與其他國家進一步的經貿合作鋪路。此表現友好的舉動也引起國際間的關注。美國《華爾街日報》便指出簽訂ECFA是中華民國馬政府走出過去的一項成功的施政。

三、對ECFA的反對聲

即便ECFA看似對兩岸利大於弊，在台灣仍然有反對的聲音。兩岸之間的政治關係敏感，想要撇開政治只談經濟的說法不能信服所有人。有人認為此條規中的路有可能一去不復返，使台灣對大陸的依賴加深。更堪慮的是未來有可能會對台灣要求開放進口，進而造成對台灣產業的衝擊。以現在直接的效用看似是好的，但隨著開放而消失的產業卻也可能帶來更高的失業率以及更嚴重的貧富差距。而對於台灣農產品及勞工等較敏感的產業的保護，為效時期只有十年。在此期間台灣就要做好轉型、防護措施以及適應和大陸的自由貿易。

四、ECFA與CEPA

被拿來比較及作參考“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補充協議”(簡稱CEPA)和ECFA的性質有些相同。香港同樣因為CEPA而有全面進口的增長，然而對其衝擊亦不小。若能有前車之鑑，做好應對措施並將損失降到最小，想必可使此協議錦上添花，達至最大的雙方效益。

中國近代城市發展

台南科技大學國際貿易系學生 洪千雯

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都市化現象呈現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從沿海地帶的一級城市開發，逐漸到二級城市，現在甚至連內陸城市也開始呈現都市化的現象。從統計資料指出，都市化的人口從1978年的17.8%提升至1998年的30.4%，成長的比例幾乎是1950年到1978年近30年間的二倍。

此種都市人口大量成長的趨勢，一方面是來自於城鄉關係的推拉力量，另一方面則是與國家的政策有關，例如：中國正馬不停蹄地興建高鐵，未來將交織成中國路上交通最快速的蜘蛛網絡。中國近代城市的發展，使得眾多的鄉村人口進入城市找尋工作的機會，不論是擁有城市戶口的、或是流動人口的，都促使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後城市人口大量的成長，形成了一些都市快速擴張或是眾多都市聚集的新的大型都會地區，這些大都會區，無論在人口比例上和經濟成就上，都扮演中國經濟改革之後的一個舉足輕重的優勢地位。

除此之外，現在正在舉辦的2010年上海世界博覽會，也以“城市發展”（Better City, better life）為主題，可見中國政府當局，對於都市的永久發展非常重視。甚至在現今全球資本主義的時代，預料將成為中國重要的成長中心和全球的競爭區域。這個高度成長的都市化現象，逐漸形成一個屬於中國改革開放後中國都市區域研究的主題和氣氛，一個有別於西方都市化特色的中國範例，例如：上海市，就是非常典型的模範，上海自古以來即是中西交流的必經之地。因此，現今上海在黃浦江的洋式建築和豫園或上海老街的中國式建築，就是此具有中國特色的城市範型。

沿海地區的快速發展的都市區域正呈現了都市化和都市集中的現象，新的中國的都市區域發展將呈現一個來自於全球化動力所形塑的結果，而不再只是一味地著墨在一個城鄉關係的協調上。而二級城市的開發，主要是來自於企業的投資，配合著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經濟發展和都市成長而逐漸地明顯與重要，特別是介於區域內都市間的關係。不過沿海和內陸的城鄉和貧富差距，此種不均衡的現象，正是中國政府所需要重視的。因此不管在已發展的沿海地區，或是正在發展的二級城市地區，甚或是內陸比較貧窮的鄉下區域，三者間的拉扯，將是中國大陸必須面對的當務之急。

ECFA對台灣經濟的衝擊與再突破

國立台灣大學經濟系學生 鄭亦麟

前言

ECFA是台灣與大陸於2010年簽訂的經濟協議，其中談判歷經五次江陳會，並於2010年8月17日於“中華民國立法院”三讀通過。此主題的研究最主要是針對ECFA對台灣經濟的影響，以條列式標題探討ECFA之目的、早收清單、以及ECFA後續問題，試著凸顯ECFA所帶來的效益和衝擊。而在正文中，筆者會以所蒐集的資料整理出簽定ECFA主要的原因和影響，並且重心將會放在後ECFA時代。

一、ECFA 簽署目的

1、兩岸經貿關係正常化：

目前雖然兩岸都是WTO的成員，但是彼此之間的經貿往來仍有許多限制。

2、避免台灣邊緣化：

區域經濟整合是全球的重要趨勢，面對台灣無法加入東協的劣勢，應積極尋求其他管道脫離邊緣化困境。

3、促進台灣經貿投資國際化：

希望藉由與大陸簽定經濟合作架構協議，讓台灣早一步與全球經貿接軌，能與其他國家簽訂架構或協議。

二、ECFA 短期最受矚目焦點—早收清單

早收清單即兩岸約定好“提早降關稅”、“提早開放”的項目。國際間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時，條文中明白寫出早收清單者，過去只有四例，分別為中國與東協、中國與巴基斯坦、泰國與印度、馬來西亞與巴基斯坦。台灣早收項目：539項，台灣外銷到大陸的金額：一百三十八億四千萬元（美金）。在早收清單中，汽車零組件、紡織品、農產品等，可能受益的中小企業家數達22,700家，聘僱員工約42.6萬人。

三、早收清單的爭議

從項目來看，台灣早收清單項目有539項，大陸是267項；從金額來看，台灣早收產品出口中國達138億美元，大陸輸台僅28億美元。然而以如此懸殊的數字對比是否可以真正代表台灣迎來黃金十年？台大經濟學教授林建甫曾公開發言：“ECFA並非萬靈丹，雖然台灣產業有創新能力與活力，但若政府無法清楚台灣未來優勢產業以及發展方向，簽了也沒用”，也就是說台灣的黃金十年應立基於下一波優勢產業，換取全球最大市場。

以下為平面媒體整理的四大爭議：

- 1、許多項目純粹衝數字，實際優惠小
- 2、關鍵原料給中國大陸，恐使產業外移
- 3、污染產業豐收，變相替中國減碳
- 4、部分利基產業比重過小

雖然以上四點不盡然十分符合政府公佈早收清單之利益，但無庸置疑的一點是，台灣目前最有需要出口的面板、汽車、工具機以及石化產業上游原料聚丙烯、聚氯乙烯、聚乙烯等，雖然工具機在業者公會理事長賴清基強烈爭取下以列入出口，但石化業者台塑集團總裁王文淵卻也對媒體表示“很傷心”。而中國堅不開放稀土元素，也使得台灣產業從LED 到發電都受到發展限制。

四、ECFA 後續問題

根據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先生表示ECFA只是一個框架，生效之後，接下來有三個重要的協議要協商簽署，這才會對台灣經濟有深刻影響。依據協議，ECFA生效後六個月內，要啟動的三項協議談判：貨品貿易協議、服務業貿易協議、投資協議。江丙坤先生說，他相信三個協議會同時啟動協商，哪一個先完成，就先簽署。

江丙坤形容，如果把兩岸關係想像成一個三角形，分成三段，最下麵的一層，是兩會過去簽署的十二項協議；中間這一段，就是今後兩會要繼續協商的經貿議題，例如科技、文化、能源、氣候合作等等，最頂尖這一段，就是ECFA。

在頂尖的這一個小三角形中，最底層的就是智慧財產權保護協議，再上去就是投資合作，不只是投資便捷化和透明化，也包括投資保障。再上去則是服務業開放，最頂尖的就是貨品貿易協議，也就是所謂的自由貿易協定。兩岸真正的大戲，就在後續這三個重要的協議，兩岸之間“有爭、有執，而且會越來越多”。

遠東企業集團董事長徐旭東也曾指出，ECFA像是大門打開，但很多細節需要處理。他提醒政府，兩岸市場規模不同，未來兩岸零關稅後，很多事情會非常有趣，要事先想好應變方式。

結論

無論ECFA 對台灣是利多抑或是弊多，勢必對台灣產業有著很大的改變，若沒有跟上腳步很快就會被淘汰，不管工商業或是農業都需要做更多技術上的學習與研發，走出屬於台灣的特色與品質，與大陸貨品做出區隔，讓台灣能有更多的成長增加經濟與就業，再經由ECFA 突破大陸對台灣對外貿易的封鎖，漸進與其他國家簽訂FTA，並藉由配套措施保護原本於台灣的農民勞工們，這些都是台灣當局政府需馬上去執行的，而不是一直對保護優勢產業，在自由經濟競爭下，我們也要有對於本土人民的責任與省思。

兩岸經濟合作不可避免地細部微觀層面上，存在著利益衝突，如果處理不妥，將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投下未知變數，然而以國際觀點似乎都是樂見其成，畢竟兩岸三地牽動得並不是只有亞洲的經濟，而是在全球化的今天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應不應該開放大陸醫師到台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學生 鍾彥右

先前在報章雜誌上看到的一則新聞“開放大陸醫師？台灣醫界：5年後再說。”在醫學院唸書的我便開始思考這樣一個議題。

新聞內容如下：

ECFA陸方早收清單要求台灣開放醫療產業，部分大陸醫師也希望台灣官方讓他們來台從事醫療行為。但台灣醫師界認為，政府應守住底線，五年後再考慮。

有大陸醫師表示希望來台行醫，如同大陸提供台灣醫師管道，協助申請證照，以便在大陸從事醫療行為。

目前台灣醫師獲得大陸醫師資格認定標準為：在台擁有合法行醫資格，且是台灣地區永久性居民的醫師；一旦領取證照，就可在大陸從事臨床、中醫、口腔等醫療行為。但台灣仍不准讓大陸醫師來台執醫。兩岸簽署的ECFA，大陸提出的早收清單，在服務業項目中要求台灣開放醫療產業與牙醫，但政府迄今並未正式回應。

如果用同樣的角度來看，大陸人也應該不會讓大陸醫生來台灣發展，畢竟是自己辛苦培養出來的菁英，當然不願意這樣外流。現在大陸儼然成了醫療人才輸出國，這樣的狀況在菲律賓、波蘭都有相同的問題。所以我們其實只要針對稅賦減免、承認學歷、開放工作……等相關配套措施，來搭配兩岸交流的政策執行，真的不需要有太多的敵意。其實台灣相當保護自己的產業與人民，因有太多先例在前。像是義大利曾經開放大陸的番茄醬後非常後悔，因為大陸會將包裝做的很像義大利國內知名品牌，又以低廉價格銷售，嚴重造成市場的扭曲。因此義大利政府規定國產與外國產要有不一樣的標章標籤區別以免國民被誤導，農民權益受損，而且也會限量進口。在這個前例下，我覺得台灣這一點還要再多深思，台灣那麼小，經不起一個錯的政策，對於台灣居民來說，他們繳的醫療費用想換取的是真正的醫療品質，腳踏實地執行醫療過程，而非從全民健保中圖謀暴利。

台灣在考慮經濟面向國際化的同時，可以參考島內的醫界大佬建議，也許近年來局勢上來說還不適合大陸醫師的開放，但是也不能固步自封，將自己局限在象牙塔裡。在地球村的時代我們生病需要的是好醫德、好醫術的醫生，而非是議論醫生是從哪來的。政府可以透過專業證照考試、醫學倫理教育、臨床實習經驗等多方面下手，整體來說必能提升台灣的醫療水準。

城市變遷模範：廣州大學城

台灣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學生 洪子茵

前言

廣州大學城，入駐有中山大學、華南理工大學、華南師範大學、廣東外語與廣州外貿大學、廣東工業大學、廣州大學、廣州中醫藥大學、廣東藥學院、星海音樂學院、廣州美術學院等10所高校。廣州大學城第一期工程分為五大校區組團，各組團均由教學區、生活區、資源共用區、組團公共綠地等構成。廣州大學城不僅僅被定位為中國一流的大學園區，華南地區高級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和交流的中心，還是學、研、產一體化發展的城市新區，更是適應市場經濟體制和廣州國際化區域中心城市地位、生態化和信息化的大學園區且集商業、交通、人才等為一體。

在中國進入改革開放階段之後，中央政府的“土地有償使用與出讓制度”的建立，導致地方政府對於城市土地開發的權利與誘因增加。在這樣的情況下，使得地方政府開始去思考如何提升城市競爭力，以及如何去經營與利用有限的土地資源。在接下來的三十年內，開發區的整頓始見成效，與此同時，地方政府另一種轉向二、三級產業發展的大規模土地開發模式——大學城，也正在代表著知識經濟時代背景的出現。

近年來，根據統計，中國已經出現超過五十座的大學城，目的除了是為了提高高等教育入學率而發展出來的辦學模式外，更是地方政府期許能夠帶來商業、房地產業與科技產業的土地開發模式。大學城在建設、開發到運行後的過程中，地方政府利用強大的行政資源，以獲取土地開發所帶來的財政收入與利得。且廣州大學城採用集約化的規劃模式，例如：分散式能源系統、分質供水系統、以及城市綜合管溝，實現全城資源的統一管理和分配，可以說是把大學城所有可用的資源和優點全部搬出檯面。

結論：

廣州市是華南地區第一大城市，而廣州大學城對外交通幹道，形成放射線形成開放式路網，交通可以說是非常便利。但是相較於台灣，例如：新竹市，也就是國立清華大學的校址，交通方面仍然有待加強。除此之外，商業區廣大到還可以分成：廣州大學商業區、北亭廣場、大學城南商業區、大學城北商業區，可見實體規模應該是非常遼闊。像廣州大學這樣，學區帶動周邊區域的繁華，台灣也挺多的，但畢竟規模上仍有所差距，倘若台灣可以此成功的城市為模範，且台灣各個大學比較並改進，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各個區域都可以像廣州大學城一樣，把所有可用的資源和優點發揮得淋漓盡致。

兩岸簽訂ECFA的優與缺

台灣東吳大學社會學系雙修心理學生 柯惟文

之前在台灣電視上看到一則有關ECFA廣告，內容敘述香港的樓有多高，物質生活有多好，但回歸中國、簽訂CEPA後，香港已逐漸變成富人的天堂、窮人的夢魘。根據台灣立法院法制局2010年7月出爐的ECFA相關報告，香港簽訂CEPA後，已成世上貧富懸殊情況最嚴重的地區。每年香港生產總值逾2,000億美元，但最富有10%人口分走34.8%，最貧窮的10%人口只享2%，兩者差距是世界最大的17.8倍。資本往來內地和香港變得更方便，導致房價、物價飛漲，勞工實質薪資卻不增反減。CEPA還使香港產業空心化，對中國內地依賴更深。我們不是反對經濟成長，但政府不該只幫富人圈地炒樓，吃魚翅、上酒家，卻任令窮人代代當籠民，喝不起一杯羹湯。

這個廣告出自哪一個政黨我想大家應該很明白，很多台灣人對於簽署ECFA抱持的是一種莫名的害怕和不清楚的態度，這邊稍微解釋一下甚麼是ECFA。ECFA本質上仍屬於“區域經貿協定”（Regional Trade Agreement, RTA）的一類。從國際經貿經驗及馬總統在總統大選所提的“兩岸共同市場”政見內容，目前關於ECFA的初步說法，ECFA的具體內容將是要逐步取消關稅、排除非關稅、投資保障、雙重課稅避免、智慧財產權保護、爭端解決機制、放寬兩岸人員往來等所謂“深度整合”或“邊境內”議題。

兩岸簽署ECFA的主要內涵，就是降低關稅及排除非關稅貿易障礙，讓兩岸經貿往來更順暢，讓台商權益得到更多的保障，是純經濟議題。ECFA只適用於台灣及中國大陸，中國大陸關係要正常化這項協議定位在經濟合作。簽署的優點有以下這幾點，取消關稅、排除非關稅、投資保障、雙重課稅避免、智慧財產權保護、爭端解決機制、放寬兩岸人員往來等。但是缺點是開放後，傳統產業產品會受到大陸產品的競爭，相對有弱勢，因為大陸有比較低廉的價格和人力，留在台灣的受薪員工則更難找到工作，生活難以為繼，貧富差距將創歷史新高。

既然ECFA不僅有政治分歧，同時也有經濟利弊的差異，或許有極少數產業會有短期利益，但也會對其他更多人造成長期傷害，如此高度爭議的政策，應該秉持民主參與的精神，交由社會公開辯論，凝聚出利益極大化的策略，避免再度撕裂台灣社會。而這一個議題延續需要多方考量和推估，也要做出適當的措施。現在雖然是全球化的世代，但是要做好地方性的經濟發展也是需要多方的考慮和商榷，畢竟大家也是希望在簽署中獲得最大的利益和最大的善意。

兩岸青年“拜網絡為師”共識多

國立中央大學產業經濟所法律組研究生 楊懷箴

我家是外省人家庭，從小就常聽爺爺奶奶說起他們在家鄉以及逃難時的故事，雖然我沒有機會親身經歷，但這樣的鄉愁好像也隱隱在我心中生根，看龍應台的書“一九四九大江大海”時，也彷彿能感同身受。總是跟著他們聽一些傳統戲曲，爺爺的京劇、奶奶的廣東大戲，還有相聲。所以長大後總覺得和大陸的距離似遠又似近，遠的是除了不時從新聞媒體注意到兩岸消息，或是偶而隨父母一起欣賞一些來自對岸的藝術表演，我對大陸的認識真的很少，這可能也是在台灣政治環境下長大的小孩普遍狀況；近來，可能就是因為文化的聯繫對我的影響很深吧。

一直到數月前有機會接待了一群來自對岸的交換學生，帶他們熟悉學校環境時，對他們特別留意圖書館印象深刻。後來從他們口中知道，我們有許多他們沒有管道接觸的藏書，尤其是歷史方面的；他們對於內戰、文革以及台灣的白色恐怖時期也都很想了解。兩岸三地由於特殊的政治情勢，一直以來的交流總是有戰戰兢兢之感，彷彿有許多禁忌話題，然而從這群年輕學生中我了解到其實拜網路發達之賜，這批學生對於那些被隱藏的歷史其實並非如此蒙在鼓裡，甚至有追求事實的心，這和我本來的想像是有很大落差。

還有帶他們去參觀故宮時，看他們對館藏的精緻讚嘆不已，並分享北京故宮展品有多大不同；和他們討論考試制度，才知道大陸的競爭是多麼激烈；還有學生和我分享了他們當時火紅的戲劇“蝸居”，對於即將面臨就業的我，看了實在是對大陸現在年輕人買房和現實生活工作的狀況心有戚戚焉，原來即使是在不同的環境成長，最後還是面臨了一樣的壓力。而這些由過來人說出的感想，都不是從書本甚至報導能體會萬一的。

即使是近日google事件弄得沸沸揚揚，讓人對中國大陸究竟是否已如其所宣稱的那樣開放產生懷疑，但充滿活力和求知慾的青年學子確實是代表一股嶄新保持開放心態的力量，能讓兩岸三地學子有機會交流，才是真正能影響下一個時代的關鍵。

大陸不再是廉價工廠台企怎麼辦

國立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學生 王策緯

前陣子的富士康員工連續跳樓事件引起國際注意，這件事情最重要的背後意義，是讓國際正視到中國投資發展的新現實：中國將不再是世界的廉價工廠。隨著鄧小平時代後的經濟開放，中國每年GDP成長迅速，在沿海重鎮的物價指數更屢創新高，近年中國政府對於勞工政策的保護逐漸嚴格，除了對外國企業規定工廠中國籍主管比例外，基本薪資規定也開始提升。以往台灣企業在中國大陸設廠的區位因素——廉價勞工優勢已經流失。

對中國政府而言，眾多的勞工是經濟發展的基石。但在貧富差距極大的社會裡，上層階級過著優渥揮霍的生活，下層階級的生活成了極大反差。沿海經濟特區最初採取政策優惠，並且提供大量廉價勞工以吸引外國企業投資。然而經濟的發展下中國政府需要面臨龐大的通貨膨脹壓力，在無法提升居民生活水平及穩定物價的情況下，必要迫使企業提高工資。然而富士康跳樓事件可以說是在中國政府採取手段之前，人民對於自己生活情況抗議採取的激烈手段。儘管鴻海集團將薪資提升200%，然而這樣是否問題就能完全解決？

造成中國貧富不均及差異擴大的原因很多，其中區域發展不均便是其一很重要的問題。為了區域均衡發展，近年在開發大西部計畫下，將沿海經濟特區的政策移植至西部，希望吸引企業投資。除此之外，提升東南沿海的勞工最低薪資標準及日趨嚴苛的稅務政策都對企業有很大影響，尤其台灣到大陸投資的企業。兩岸經貿交流越來越多的現實下，台灣大型企業在大陸的下一步，是遷廠或者是轉型？

反觀台灣，我們早已經脫離所謂的經濟起飛期進入下一個階段。60年代迅速成長的情況不會再發生，勞力密集型產業不具優勢的情況下，我們可以拿出甚麼來面對兩岸經貿交流的擴大？或許在不考慮品質的情況下我們會開心可以零關稅的購買中國低價產品。回溯北美小麥機械化種植大量傾銷歐洲的情況下，使得北歐小農幾乎完全無法生存。同樣的情況，我們該如何面對大量廉價產品的傾銷？基礎部門勞工的就業如何轉型？種種背後帶來的問題都是在兩岸經貿交流發展下我們該探討的。

陸生來台交流學習好處多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視覺藝術學系學生 溫騏華

前陣子鬧的沸沸揚揚的大陸學生來台就學的新聞，據媒體的報導，在台灣分成兩種截然不同的對立聲音。

支持的一方就學業方面，認為台灣已是個自由開放的民主社會，大陸大學在國際間的評價並不比台灣的大學差，透過陸生來台的機會，教學相長，提升我們台灣學生的競爭力以及開拓我們的視野，開放陸生來台除了學術交流更有文化交流的意涵，台灣的文化制度對於大陸人民具有強大的吸引力，雙方學子互相學習必能激發更輝煌的火花，對於雙方未來可創造偉大的影響力，我們不可妄自菲薄，就務實面來說，台灣的大專學校已飽和，許多學校招生不足，如果開放陸生來台對於台灣大專院校財務方面將有不少助益。

反對的一方認為，由於雙方政治的立場不同，輕易的開放大陸學生來台就讀可能會導致許多的問題，要是來台的不是一流的學生呢？要是來台的學生並不是來學習，而來台灣工作而亦或是從事政治方面的活動呢？這些種種的問題都是需要去考慮、研究的。

在開放學生來台的前提下，適當的對應政策有助於保護我們台灣方面的權利，政府先後提出了不同的原則，在這過程中從原本的“三限六不”為限制承認認高等學校、限制來台陸生總量、限制學歷採認領域、不涉及加分優待、不影響國內招生名額、不編列獎助學金、不允許在學打工、不得在台就業和不得報考公職考試，而開放為“一限二不”，限制承認醫事學歷、陸生不得報考國安機密相關關係所等，從中我們可以清楚的體會到政府對這件事情的重視、謹慎以及開放，不是一味的去否認、反對。

就我對這件事情的看法，我是支持大陸學生來台灣的，在我所接觸的大陸學生中，我覺得他們跟我們其實是很像的，一樣的有休閒嗜好、一樣的會因為期中期末而跑圖書館，但為甚麼我們台灣一流學府的學生在國際上卻無法贏過大陸一流學府的學生呢？我認為在台灣自由開放的氣氛下，學生所能得到的資源是非常豐富的，但懂得利用這些資源的學生越來越少了，原因出在於太過的安逸放縱，大學太多、招生不順而導致於招生錄取門檻每每屢創新低，這樣的大學生一旦走出了學校、出了社會，怎麼會有競爭力呢？我認為，如果在這樣安逸的環境中，加入一些不確定的因素，好比是大陸學生亦或是國外學生，這樣我們台灣學生所面臨到的，就不再是只有週遭的同儕了，而是來自四面八方不同的力量，在這樣過程中所磨練出的實力，才值得去應對未來多變的社會。

全球化下海峽兩岸交流共贏

台灣東海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生 林子翔

前言

兩岸三地長久以來受到台灣海峽的阻隔。1911年的辛亥革命，孫中山先生推翻專制君主政權，於1912年建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締造中華民族歷史新篇章；清朝末年香港、澳門地區分別租借予英國與葡萄牙，台灣地區先後也經歷荷蘭、葡萄牙、日本的統治。二十世紀，兩岸三地經歷截然不同的歷史背景，在這近一世紀中，兩岸之間無法因為科技發展而有效互動，也減少了彼此相互認識的機會。

1947到1987年，台灣正值解嚴時期，台海溝通管道長期中斷，直至1987年蔣經國先生解除解嚴，逐步開放兩岸探親等交流活動，惜經過長時間的隔閡，兩岸人民在文化及思想上產生差異，甫交流就出現鴻溝；而香港、澳門地區，分別在1997、1999年以前經歷不同政權統治，對中國大陸以及與台灣地區互動也須經過該地政府，減少彼此交流的機會，長久以來缺乏全面性的互動環境，使得甫回歸之初，亦發生不少交流上的思想、文化衝擊。

過去因為分別經歷不同的歷史經驗，衍生出兩岸三地各自的新核心思想與近代的新文化，近代社會歷史中也可窺見相似的民族區域交流問題，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分隔長久的東、西德人民在那一瞬間即展開全新的接觸；二十世紀末東歐因共產解體，也曾面臨歷史長期隔閡所造成的交流斷層。不過透過幾世紀以來的歷史借鏡，仍可發現文化缺口的彌補固然有其難處，但可行性卻相當之高。

時代的潮流將兩岸三地匯集到全球化的熱潮當中，現今兩岸三地所需面對的問題不再局限於彼此的互動，全球零時差的交流無時無刻衝擊著中華文化，因此，建立起屬於兩岸三地新交流平台的必要性更顯重要與急迫性，中華文化若無法在這波新的熱潮中嶄露頭角，極有可能成為歷史的記憶。

一、科技交流共創兩岸新契機

無論由資本主義、共產主義或自由經濟主義等角度觀看今日世界經濟，不難發現世界各經濟體在全球化趨勢下，儼然成為單一的全球經濟共同市場，兩岸三地倘使欲在世界經濟中獨佔鰲頭，必須建立起共同的經濟互動平台。兩岸三地各有不同的經濟強項，中國大陸因人民幣成為世界主要貨幣之一，發展成世界重要經濟體，中國大陸擁有龐大的人力資源，可滿足大量人力及人才需求；香港地區長期以來是亞洲重要之金融中心，上海地區在近幾年也逐漸抬頭；近幾年台灣地區有“科技島”美譽，若能將彼此強項適當結合於一共通平台，必定能強化中華民族的經濟競爭能力。

1、技術交流

科技時代來臨，強化經濟競爭力的重要關鍵在於該經濟體的“科技力”，科技能夠無限創造市場潛在商機，促使該經濟體永續且強勁的發展，全球化下的兩岸應該因上述原因，建立起妥善的科技交流平台，使兩岸三地的科技力加值。

兩岸三地應建立共同建立一個迅速、有效且具前瞻性的技術交流平台，在該平台上各地區分享彼此的科技成果與經驗，透過彼此觀摩、學習，使新科技在發展過程中減少研究失敗的機會成本，並透過相互的激盪，創造出更為新穎、貼近市場需求的生活科技，由此建立兩岸共同的科技實力，直接促進兩岸經濟提升。

2、提供良好經濟環境，達成區域合作

科技交流的前提，必須是處於一完整且穩定的經濟環境下，在這經濟環境中提供充足的資金資源、人力資源以及人才資源，穩定的經濟環境能吸引大量企業投注資金，提供新技術發展的可能性，良好的投資環境必定能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以此可降低兩岸的就業問題，並且良好的人才不會因為缺乏發揮空間而外流他地。在這資金、人力、人才充足的環境之下，兩岸的科技交流不僅更富有意義，交流的效率和效益也更能大幅提升。

良善的經濟環境建立正好符合兩岸三地的各自特色，各自長久的人才經驗、金融經驗和人力提供經驗都能在此交流平台中得以彰顯，在兩岸沿海地區強化各加工出口區、科學（科技）園區，透過區域合作的方式，建立起平行的通路管道，使兩岸三地在此一平台中大幅減少產品的運輸成本，該區域合作關係能大幅提升兩岸三地科技產品於世界市場的競爭力。

3、尋找定位、放眼全球

科技交流的最終目的是達成該區域合作的綜合效益，兩岸三地共同於平台中提供過去經驗與成果，讓各地區彼此的優勢發揮至極大值，減少各自發展所可能帶來的風險與無謂損失，在世界市場中找尋各地區所適合的市場定位，將過去的地方經濟發展至區域經濟，並且更進一步的成為強而有力的經濟體系，依此建立起彼此的科技眼光、經濟視野。

二、文化交流發揚中華文化

1、民族精神的再興起

歷史分合的更迭，不斷在史書記載，中華民族在近代也經歷了一場強大的時代衝擊，清朝過去的固步自封、鎖國政策，在西方列強的洋槍大砲下，迫使中華民族的長久歷史備受檢視，過去封建制度的體制不敵西方的科學與民主，造成中國受列強割據、佔領，當時的中華民族精神產生了分歧，後又因租借、佔領等因素，外來的文化大大震撼中華傳統的民族價值。

進行文化交流的首要步驟是找回文化的核心價值，新、舊文化思想充斥著兩岸現代社會，理應建立起

兩岸文化交流平台，在這平台上，兩岸三地分享著過去共同的歷史記憶，彼此欣賞近代的新文化價值，近代兩岸三地歷經不同的變動歷程，產生具差異性的文化與社會核心價值，透過文化交流方式彼此了解、互動，不僅能彌補過去的思想斷層，更能創造全球化時代下的“新中華人民思想”。

中華民族的民族主義再興起，成為全球化時代下的必經歷程，兩岸三地將各自的文化、社會核心價值交流，能夠演化出全新的民族精神，讓新時代在歷史上劃出全新標記。

2、官方推動、民間配合

兩岸三地的文化交流應該由“官方推動、民間配合”的模式進行，兩岸政府主導文化交流平台，讓文化交流的寬度與深度加值，例如2009年2月14日至16日，台北故宮訪問北京故宮博物院，2009年3月1日，兩岸故宮博物院達成“兩岸故宮落實合作交流方案”。

民間單位應該主動響應兩岸官方所提倡的文化交流，以文化活動讓兩岸三地民眾可以彼此了解，共同分享歷史記憶，共同體會全新的各地區社會核心價值，民間交流不應局限任何特定形式，無論是傳統、創新都是各地的社會元素，文化的範疇也不再局限於音樂、藝術、戲曲等。

台灣的慈濟基金會在2010年8月20日獲得中國大陸國務院批准，成為第一家大陸境外人士所成立的全國性基金會，於二十日在江蘇省蘇州市掛牌。台灣慈濟基金會是一個民間的宗教慈善組織，傳遞的不僅是對兩岸、對世界的關懷和愛心，在彼此付出愛心的過程中，亦是一種無形的文化交流，兩岸慈善團體透過互助合作，相互了解對方的社會核心價值，達成文化交流不拘泥形式，使文化交流不斷的建構於任何當下。

3、傳統與創新的激盪

中華文化濫觴五千年，多項科技發明西傳，影響現今西方文明社會深遠，思想體制東傳至日、韓等地，其影響力無遠弗屆。清朝末年，中國採取閉關自守策略，然而不敵西方的思想開放、不敵文化復興及宗教、科學革命，傳統科舉制度廢黜，現代共和代替了專制權威，清末動亂使得中華文化根基動搖，文化革命使得傳統中華文化再受檢視。然而，時至今日，傳統中華文化經歷過多重檢視，以全新的面貌保存於中華民族心中。

文化交流的平台上不應僅以傳統文化做為價值性的交流要素，近代社會受到開放的思想與科技影響，傳統中華文化也受到世界各地獨特文化激盪，產生不同以往的新價值。雲門舞集以西方現代藝術手法呈現屈原的九歌，古典京劇登上奧林匹克運動會，這些都是傳統與創新的產物。兩岸三地的文化交流應該將新、舊文化的產物做為主要元素，傳統文化在各地區發展出全新面貌，

4、大眾傳播媒體發揚中華文化

大眾傳播媒體在全球化時代中扮演重要角色，世界各地消息都能經由傳播媒體迅速而有效的傳遞至世界各角落，中華文化的發揚也應利用此新時代利器，強化中華文化在世界媒體的色彩。

大眾傳播媒體可透過不同的方式傳遞中華文化給全世界，例如一般新聞傳播，可使世界了解一般華人

生活動態，電影工業亦是發揚華人文化的方法之一，香港地區的電影事業發展多年，近來台灣與中國大陸地區也正蓬勃發展中，這些都是一種將文化商品化的行銷方式，讓世人輕鬆卻深刻的體驗中華文化。

近日上海世界博覽會也是利用媒體傳揚文化的方式之一，以國際型的大活動帶入中華文化色彩，讓各國旅客、媒體共用中華文化精髓，使世界簡單、即時的體驗中華，使中華文化能在全球化時代中大放異彩。

三、教育交流，培養優質人才

1、廣泛建立兩岸學術交流平台

高學歷是全球化時代伴隨而來的新現象，為了因應世界性的競爭市場，年輕學子往往必須強化自身的學術專業，使得現今社會高學歷人口不斷上升，兩岸三地高等教育日益發達，各自有不同的教育特色與教育資源，倘使能廣泛建立兩岸學術交流平台，則能達到兩岸三地高等教育資源共用、共同成長的目標，學術專業不該閉門造車，理應廣泛的相互討論、觀摩，利用妥善的資源相互激盪，以求更高的學術貢獻。

兩岸學術交流範疇應當廣泛，無論大學院校、學術學會、研究機構，都應主動的建立起彼此溝通橋樑，使兩岸三地的高等教育能因精湛的學術研究，進一步提供青年學子良好的教育內容；近來，台灣地區逐漸開放大陸學歷，讓兩岸三地學子有機會在相同學術殿堂求學，彼此相互切磋、學習，必定有助學子們學習成效，以此可提升兩岸三地高等教育水準。

2、教育經驗交流

中國傳統的封建科舉教育在西方的船堅砲利下瓦解，西方現代教育迅速傳入中國，現代思想也因此敲開中國教育之門，經過八國聯軍震撼後的中國興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新觀念，期待能在中、西教育上找到屬於中華民族的立足點，晏陽初在1920年代展開平民教育運動，致力將教育資源廣布中國各角落，成為現代平民教育運動之父，減少文盲的數量是當時最單純的動力之一，然而，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中國地區興起破四舊運動，導致許多中國傳統教育流失，直至1978年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地區的教育才再次回上正軌。

基於上述的歷史背景，中國大陸地區的教育發展在近代相較於台灣地區、港澳地區，出現一個巨大的教育斷層，中國大陸地區的當代教育急需其他兩地的經驗交流，以彌平過去的不足之處。

個人認為，兩岸三地應該就教育經驗，建立一個常態性的經驗交流平台，讓兩岸三地教育工作者可以相互研討，同時也能將彼此的教育資源加以整合。由於兩岸三地學子的思想立足點可能不盡相同，未來發展趨向也有些許差異，因此，良好的教育交流平台，也將幫助各地區學子的學習發展，以供良好教育條件。

四、兩岸三地青年共建交流平台

1、建立共同文化圈

全球化時代來臨，中華文化的傳承與發展成為重要民族議題之一，這議題的主角即是兩岸三地的青年學子，現代青年以相互學習、發揚的角度，為全球化的中華民族建立新的契機。

中華共同文化圈的建立，對於青年交流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共同文化圈內兩岸三地將不再有任何距離，青年可利用網際網路、大眾傳播工具等，將中華文化在各地區的發展相互傳遞，共同分享傳統中華文化，一同創造全新面貌的現代中華。

2、志工與學術活動邁向全球

新時代的兩岸青年學子應該勇於創新、勇於接觸新事物並與世界接軌，個人認為志工活動與學術活動是當今青年所能努力的方向，年輕的熱情與活力可以發揚於世界各角落，青年學子應將自己所學、所長服務其他需要者，將服務的精神做為新時代的新價值，讓學子在服務過程中成長，體會不同的人生價值，並且將志工活動觸角延伸至世界，成為地球村的公民之一。

跨國籍的學術活動亦是青年成長的方式之一，透過專業領域的相互學習，能激勵青年學子的專業技能，以此方式可以使中華青年在學術、實務領域中有顯著成長，培養新時代高價值的全方位人才。

3、青年經驗交流使人才加值

兩岸三地因背景不相同，各地區的青年有不同的發展方向，青年經驗交流能令兩岸青年透過良善的互動，彼此了解長處，從交流過程中交換經驗與激勵，創造更好的未來人才。

青年經驗交流可包含工作經驗交流、求學經驗交流、創業經驗交流等，整合兩岸青年生活經驗，相互學習、成長，並且將經驗傳承於新世代青年，如此，能夠讓三地青年更具時代競爭能力，使兩岸人才優質化，並且達到相互交流的功效。

結語

兩岸三地長時間阻隔，同是中華民族，在思想、觀念、事務都有很大差異，在全球化之下，這道鴻溝正快速縫合，值此一切講求資訊化、快速化、透明化的時代，兩岸三地剛好搭上此時代潮流，建立相互溝通的學習平台是必要且急需的，而這座平台應該是廣泛且快速的，讓兩岸三地青年有機會相互學習、經驗交流，才能讓中華民族在世界發展洪流中共創一席之地，甚而領先全世界。

也談兩岸文化教育交流

Sheffield Hallam University Global Business 蔡敏純

自ECFA簽訂之後，台灣與大陸關係越來越密切，不限定只是經濟上，就連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開始交流，增加了雙方和諧關係。

在教育上，陸生來台與台生在對岸取得學位，這樣可以互相交換學術上的知識，是近年來兩岸關係的一大突破。

過去十多年兩岸的學生其實有很多交往的經驗，每一次其實都有達到很好的交流目的與效果，也都發現彼此可以相互學習、分享的地方。因此，兩岸的年輕人如果能夠早一點交朋友，等他們更加成熟後，會依然記得在台灣或是對岸念書的情景，絕對有助於對雙方有更多的了解。其次，是希望透過學生交流，讓兩岸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更具有挑戰性，因為多元化能讓學生更有適應能力。至於第三個目的，台灣是全世界極少數，高中生進大學至少都有一個位置的地區，倘若只算高中應屆畢業生的數據，相信錄取率是超過100%；因此不可否認的，台灣高等教育的資源是有過剩的問題，如果不充分利用是一種浪費。

當然，我們並不只以大陸學生為對象，教育部部長吳清基日前到越南、馬來西亞、印尼等國家考察，一方面帶十二位校長去評估設分校的機會，另一方面也是去招生，將來透過中文或英文課程吸引更多東南亞學生來台念書，希望將台灣的教育，從過去的良心事業再加上產業功能。吳清基指出，並非放棄良心事業，而是同時擁有產業的功能，例如美國一年光教育的收入就創造出將近150億至200億美金，不只如此，透過設分校還可以賺更多，不過這並不影響其教育品質以及崇高的教育理念，這還是可以並行的。

台灣教育的軟硬體俱佳，但由於生源缺乏的結果，我們的學生卻沒辦法來達到充分的利用。這並不只是針對大陸學生，開放承認大陸學歷應該跟其他的地區一起來做，可以讓台灣的校園更國際化，對台灣不只有形象上的利益，也有實質上的利益。教育可以成為很好的產業，因此，教育理念都將不會被放棄，而且還可以讓它創造出更多的機會，讓台灣的教育更加的國際化。開放陸生只是其中一環，希望教育部能儘快建立起例如英語課程的評鑑制度等等，結合外交部的“台灣獎學金”，逐步將台灣高等教育變成可以外銷的產業，吸引更多的國際學生來台交流。有外籍或大陸學生來台就讀，會在台灣消費，也對台灣是一種利益現象。教育部已規劃把目前佔1.3%的外國學生增加到2.6%，儘管與世界其他地區仍有相當的差距，但至少是讓我們的校園更國際化好的開始，孩子們可以在更早的階段了解到普世價值、將心比心。

對於不同的文化、種族及思維，能從認識到了解，進而到欣賞與接受，這是很重要的國際化過程。有些制度走太快反而不穩，相關部門需要做好配套措施，要逐步推動而不必一步到位，漸漸的讓大家習慣之後，時機成熟後再逐步增加，才是有益的對台灣整體的發展，順便營造台灣在國際的形象。教育部表示，相關法案是前年提出的，目前時機已差不多成熟，若法案順利通過，明年春天的博、碩士班應該就可以辦理，大學部則要等到明年九月，走出這一步，將可讓台灣在全球教育和人才的競爭中不會輸在起跑點。

兩岸民俗信仰交流簡評

南台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學生 黃怡珊

自民國七十六年十一月政府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以來，兩岸交流日益熱絡，交流涉及的範圍十分廣泛，幾乎遍及所有類別，交流的形式、管道和層次也不斷地擴增及提升，對兩岸關係的影響逐漸從量變到質變。以台灣的觀點來看未來兩岸交流，我們一貫主張兩岸應降低敵意，不再對立，並同時維持台灣自我的尊嚴，以建構兩岸交流活動的正常化發展。

以彰化市的南瑤宮來說，近期前往中國大陸，以採取傳統古式盟書的模式，與對岸的泉州、漳州、天津、同安等四大天后宮相結盟，建立兩岸宗教交流新的里程碑。

具有兩百年歷史的彰化市南瑤宮，香火相當鼎盛，因為具有相當特殊的“十大會媽媽祖會”——老大媽會、新大媽會、老二媽會、興二媽會、聖三媽會、新三媽會、老四媽會、聖四媽會、老五媽會及老六媽會的龐大宗教組織，每年從農曆三月份開始，來自全台各地前往進香、遶境祈福的宮廟、陣頭不計其數；近二十年來，各地信眾與媽祖會積極推動兩岸尋根與宗教文化交流，讓兩岸重新找回不少失落的宗教文化與習俗。

了解兩岸傳統與現代藝文現況，通過各具特色藝文人士及文物藝術品之交流，促進兩岸藝文發展。推展兩岸師生互訪、觀摩、研討及傳習等活動，互相提供教育發展經驗，提升中華民族教育水準。藉由兩岸報紙、書刊、廣播、電視、電影、出版等傳播事業、出版品以及人員之交流，提供兩岸人民充分資訊，豐富文化生活。

透過兩岸宗教人士互訪、宗教學術研究、宗教文物與出版品交流及宗教性社會公益服務，充實兩岸人民心靈生活。

對兩岸科技交流的感受

台灣建國科技大學運動健康與休閒系學生 沈易

在近幾年，台灣與大陸有了許多的互動，開放中國大陸對台灣觀光，開放陸生來台進修等等。讓兩岸彼此更多交流與互動，也讓兩岸變得更了解更親近。社會已經邁入二十一世紀，科技也漸漸取代了取多東西。科技已成為帶動經濟發展的動力，並成為現代社會主要的趨勢。

中國大陸已成為台灣最大的出口地，兩岸合作的效益和虧損，在短時間內還沒辦法顯現出來，其對台灣的經濟影響力已慢慢增加，對於中國大陸的強大商機，台灣應該重視並努力拋開對立，加強兩岸之經濟合作，才是未來台灣經濟的希望，兩岸關係受到許多政治因素，由於共識上的差異，造成合作上的困擾，也阻礙了許多互補的需求，在台灣有科技配套完整、技術引進能力強、產業國際分工合作、市場經驗豐富等優勢，兩岸如果能交流科技資源與和合作，每邊都具有各自的特色，對兩岸都因該會有相對的利益，現階段應多鼓勵兩岸人才交流合作。

大陸擁有龐大的人力與資產，是一個不可小看的力量，兩岸合作會在發展上有所互補，台灣多少也要靠著大陸的資源與人力來提升台灣的產業技術，這會是台灣近期和未來主要注意的策略，希望在台灣與大陸交流的過程中，縮小觀念、認知的差異，建立良好的關係，讓雙方在進步的合作上有良好的交流，與大陸的科技交流將會是往後熱門討論的話題。



促兩岸教育交流 創中華人民利益

台灣長榮大學企業管理系學生 黃洄翎

前言

目前兩岸教育、文化交流雖開始正常化，但尚不屬熱絡，兩地區間互動仍受到相當的限制，大中華地區培育人才的教育資源尚未整合，兩岸地區學歷相互承認仍不夠開放，人才未得其所；教學品質不一，學歷同等能力不等。另外，兩地區間互相認知仍存在衝突，如加大教育交流，必能增加雙方認同，使兩岸間共生共榮，創造中華人民利益極大化。

兩岸政策現況：

（一）大陸方面：

- 1、“歡迎就讀，一視同仁，就近入學，適當照顧”。
- 2、批准設立的民辦和公辦中小學、幼稚園及中等職業教育機構皆可就讀。
- 3、台胞子女入學、升學、收費方面均與大陸學生同等待遇。

（二）台灣方面：

- 1、一限二不：醫事學歷不予採認
- 2、三限六不：僅承認41所大學學歷
- 3、十二不認：
 - (1)、非經正式入學管道入學者。
 - (2)、採函授或遠距教學方式者。
 - (3)、經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方式通過者。
 - (4)、在分校就讀者。
 - (5)、1967年至1977年期間取得學歷者。
 - (6)、非正規學制之高等學校者。
 - (7)、以兼讀方式取得者。
 - (8)、涉及醫療法所稱醫事人員相關係所之學歷者。

- (9)、高等教育學歷未同時取得畢業證及學位證者。
- (10)、大學下設獨立學院授予之學歷者。
- (11)、職前教育及教師資格取得者。
- (12)、其他經教育部公告不予採認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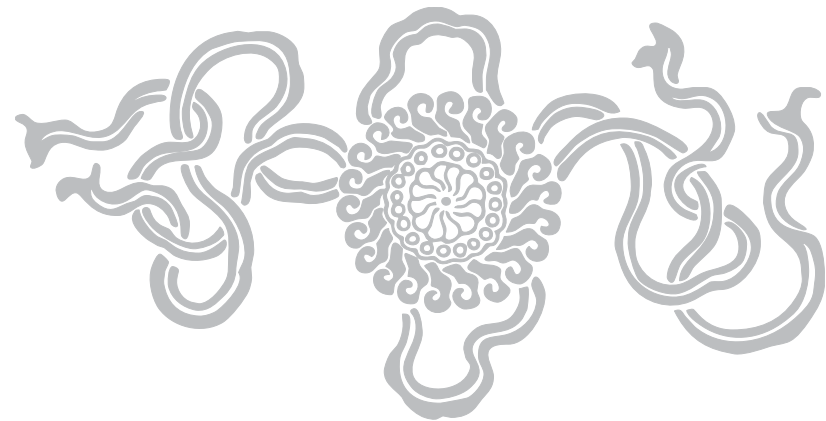
從以上兩岸政策現況可以看出，大陸在對台生方面明顯寬鬆過台灣。

交流之優點

- (一)兩岸學生互相流動，增加兩岸人民互動機會
- (二)開放後必增加兩岸教育單位互動研討機會，提升兩岸學校競爭力
- (三)學生可選擇的學校增加，因此也增加學子升學機會
- (四)兩岸互動增加，為未來的和平鋪路

結論

兩岸雙方的教育交流利多於弊，但不可否認地仍存在疑慮，如兩岸少數大學畢業生能力受到質疑、對於陌生文化的抗拒、以及增加就業市場的競爭，但多數針對能力考核方面問題，雙方應組織兩岸相關人才，訂定各式各樣的審查標準，並針對各教育機構進行嚴格的評比、篩選，以減少學歷及能力方面的相關問題；若其他方面因素導致實施的困難性，不妨考慮其他難度較低的選項，如增加交換學生的名額、雙方學術交流機會等等，皆可達到類似效果，且若領導階層們有意改善的前提下，相信一定能創造其他機會和選項，也一定能夠創造出增進兩岸雙方和平的機會和選項。



消除仇視走出陰影

台北藝術大學劇場設計系學生 沈容

原先在同樣基調的中華思想的兩岸，因為政體的不同，大陸和台灣似乎發展出了很不一樣的文化，但其實很多是異曲同工之妙。不開口說話，台灣人和大陸人其實沒甚麼太大的差別，加上本源同儒家思想，很多道德或價值觀其實很接近，並非媒體吵得沸沸揚揚那般的格格不入。

因為政治和地理因素，我們對彼此的認知大多還是建立在自己身長環境下的教育，因此很多對立的看法都是在成長的環境下形成，並非接觸過的真正了解，在過度封閉或過度激進的環境下，造成很多偏見。而要改變，這是一個需要突破的地方，突破了才代表我們終於脫離那些我們一直在反對的陰影。現在還是青年的我們就是被我們的上一輩影響，而我們也會影響到我們下一輩的人，然後會不斷的循環，如果我們不把誤解與仇視消除掉，我們的下一代就會繼續存在於陰影之中。

國家是有人民才成立，而人民需要生活，生活是實際的並非紙上談兵，要實際的去做、願意打開心接觸，相信大家都想好好地生活，如果可以的話，建立大家都可以安心的生活環境，就是要不斷的努力，直到彼此能共存為止。

在強調多元化的當代社會，不是說一定要完全認同彼此，但是因為了解而包容，每種文化都有其優缺點及不可被取代性，就像地球需要越多樣化的物種越好，而非被淘汰就甚麼都沒有的非單一化。在大陸，他們的多元來自於民族的多元性，而小小的台灣則是文化的多元性，卻同時存在島嶼的封閉短視，而我們也不應只是把問題都停留在簡單的要不要統一上，而是看看彼此能為大家做些甚麼，讓我們生活得更好。

在歐美文化當道的現今，讓中華文化的優點有機會被發現、肯定，不論是大體亞洲的文化或說中國的文化，其實有很多可以並存的地方，只是不管是大陸還是台灣單體來看都還太薄弱，應該要結合兩邊的特質及既有的資產，不論是想法上、技術上、文化的傳承到現代的管理方面等等，因為兩者有同樣的東西又有巨大的差異，就像都是水彩卻是不同的顏色，每個顏色都不可被代替，加在一起又可以混出不同的顏色。兩岸交流是可激盪出更多不一樣的火花，一些只有我們才可以創造的，火花並非宣示我們有多強，而是要讓大家更往前一步，

更加肯定自己，對自己的文化有自信，且可以分享讓更多人享有其帶來的好處。

兩岸學術交流之必要性

台灣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學生 張珣甄

近幾年來，兩岸學生交流的機會越來越多，不管是民間團體或是政府主導，雙方的交流愈加密切，學術交流提供了兩岸關係在政治之外的一道出口。

筆者認為，不管是民間團體或是政府，都必須為兩岸交流作努力，擴大兩岸交流的規模，同時也兼顧質的提升，能使兩方學子在有品質的交流中，獲得學識的增長，同時也藉由學生時代的交遊增進兩岸文化異同的認識，對於未來兩岸關係將有正面的助益。

筆者對於兩岸交流的必要性，主要有下列幾項論點：

一、兩岸政治議題膠着難解，若能透過政治外的手段增進雙方認同，將有益於未來兩岸友好關係合作。

二、兩岸有著共同的語言，且都為中華文化的一環，在交流合作上，自然能獲得更大的效益。

三、亞洲區東方意識想被世界看見，自己內部的區域整合，必須事先完善，交流能夠增進區域統合，未來可望向歐盟借鏡，形成亞洲區域共同體。

四、近年來，官方陸續簽定了幾項經貿條款，最近的ECFA相當受人注目，這意味著未來兩岸的就業市場將緊密結合，經濟上的相互依存度也會提高，對於兩岸人才而言，高度的競合關係是可想而知的，而現在的交流，都是為了使得學子能夠對於未來將面臨到的工作夥伴，能有一些基本的了解，將來能在職場上藉由合作關係，創造傲人的產業成果。

五、關於文化而言，因中國大陸在文革時期遺失了相當多寶貴的傳統，但在台灣，民俗傳統卻還相當盛行，台灣能夠提供過去幾十年下來保存的文化成果，輔以中國大陸出土的物件，對於文化研究上面，可以有更卓越的貢獻，對於東方文化的修復和保存，相當重要。

六、台海兩岸過去十幾年來，政治制度的分歧培養出具有不同特質的人才，未來兩岸學術合作，將能收相輔相成之效。

以上是筆者對於兩岸交流之必要性提出的幾項論點，筆者對於兩岸交流的日趨密切樂見其成，也相信在兩岸四地，同為中華世界的中國大陸及台港澳學子的努力下，能夠提供亞洲一個世界的新地位，成為世界中閃耀的亞洲之星。

城市按等級劃分不如按功能劃分

台北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學生 黃聖翔

在一個國家的發展中，一定會有某些地方是重點發展地方，通常是首都，或是重要港口，廣義來說這就是所謂的都市分級。說到都市分級，其實台灣也有分直轄市跟一般縣市，不管是在預算、生活水準、公共建設等等，直轄市都優於其他一般縣市，只是台灣地方比較小，感覺沒那麼強烈。而在大陸如此廣闊的土地上，總共有三十多個省、市（自治區），都市的分級就很明顯！大陸的都市分級總共分七級，其分類方法主要看各都市資訊(IT)級別。IT級別衡量項目包含平均人口GDP、國內生產總值、人口、家庭、每年平均所得、恩格爾係數(Engel's Coefficient)、主要資訊電子產品銷售量、軟體與規模、有多少台電腦有上網等各項指標，並定期考察當地資訊發展程度。一級城市中，有大家耳熟能詳的北京、天津、上海跟香港等大城市，都是在交通便利的沿海地區，這些大陸的重點城市，也是發展最快速的城市。

但因為都市分級，加上中國大陸這幾十年驚人的發展速度，也使得在東部沿海地區，與西部內地的城市發展落差越來越大，造就了嚴重的貧富差距，也產生了許多社會問題，西部的某些地方，甚至還過著沒有電的生活，而跟上海等地的景象呈現強烈的對比，這在一般人的眼中，是非常不直觀的，因為明明是在同一個國家，竟然會在生活水準上有這麼大的弱差。我想這應該是因為中國跟歐美比起來，算是比較晚發展的，而為了加快腳步追趕上歐美等大國，只好集中資源發展重點城市了！

但隨著近幾年，中國逐漸從有著廉價勞工的世界工廠，慢慢變成有著驚人消費力的世界市場，也證實了中國成功發展了北京、上海等一級大城市，就在這個時候，隨著產業西移，也連帶開始發展西部內地的城市，看起來一切都很美好的進行中，東部發展完換西部，但力道是否有拿捏得當呢？

現在上海等大城市，有著高房價與高生活開銷，使得上海居已大不易，嚴重的貧富差距將會導致城市社會不穩定（治安惡化、社會抗拒、社會糾紛、社會衝突等現象），如果這些問題沒有解決，不久的將來勢必會反噬中國的經濟本體！

個人認為，與其是貼標籤似地將城市分級（也連帶對生活在其城市的人們進行分級），不如將城市分類，例如觀光之都、美食之都、科技之都等，以取代冰冷的城市分級制，一方面可消除不平等的等級制，也可強化對自己所在都市的使命感，相信這樣對一個國家的發展會比較健全且長久穩定。



編後語

“全球華僑華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會(2010·中國香港)”已落下帷幕，但我們的工作仍在繼續。

為了延續大會的主旨精神，我們將收集到的近150篇大會論文匯集成冊，以饗讀者。由於作者所處地域、文化，社會制度、行文習慣各異，我們秉持尊重之心，盡量保留原文的精神和文風，不作或略作修改。對於個別有爭論性的稱謂、提法以及各類引用、轉述等資料，我們也本着文責自理的原則予以刊登。部分因往屆大會用過或確實與大會主題無關的文章，恕無收編並致歉意。

囿於時間緊迫、編力不逮，難免有削足之嫌，疏漏之處，尚希見諒。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

二〇一〇年十月於香港

出版：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
地址：香港皇后大道中183號新紀元廣場中遠大廈37樓
電話：(852)3695 2222 傳真：(852)3695 2223
網址：www.haprc.hk
承印：和諧印刷有限公司
規格：210毫米 x 285毫米
出版日期：2010年10月
印量：500本
訂價：港幣60元
ISBN: 978-988-19708-1-7

（版權所有，不得翻印）

